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二)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出版说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了长达 20 余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中华民族的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是中共中央军委赋予军事科学院的一项重要科研任务。编史的目的就是为了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曲折发展的历程，总结经验，揭示战争规律，宣传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承担这项任务的军事历史研究部，在军事科学院党委的领导下，自 50 年代末开始，就搜集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电及其他资料，为编撰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十年动乱使这项工作陷入停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编史工作。在编撰过程中，我们力求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客观地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的面貌，使这部战史成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军事科学院宋时轮、郭化若、舒同、郑文翰、谭知耕、石一定、韩双亭、王诚汉、姜思毅等领导同志先后不断给予指导。但是，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缺点和错误很难避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分为三卷：第一卷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战史；第二卷为抗日战争时期战史；第三卷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战史。各卷正文之后，附有各革命战争时期的形势要图、重要战役战斗经过要图以及敌我双方的序列表、我军战绩统计表、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等图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以及军内外党史、军战史的专家、学者和参加过历次革命战争的老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谨以此书，作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60 周年的献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第一章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中国共产党的 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第一节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 方针、步骤和准备

(参见附表 1、2)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这场战争的爆发，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目标，进而吞并亚洲的“大陆政策”的结果，是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的内外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国际上绥靖主义者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姑息纵容政策的结果。

早自 19 世纪末叶，日本由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国家，即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把“大陆政策”定为它的基本国策。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发动以争夺我国东北为目标的日俄战争，先后从中国攫取了台湾、澎湖和旅顺、大连等大片领土，获得了在中国开矿、办厂和驻兵等项特权，勒索了巨额战争赔款，从而增强了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一个新崛起的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且跻身于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之中。为了实现其进一步侵略扩张的野心，1927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7 日，日本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以解决“满蒙政策”为中心议题的“东方会议”。会后，田中义一将“东方会议”的实质内容写成“帝国对于满蒙积极根本政策”，密奏天皇，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西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露骨地表明了它先夺“满蒙”，后取整个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和侵略步骤。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日本国内矛盾激化，连续发生经济危机。1927 年日本即发生了金融危机，1929 年，日本又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空前的经济危机，至 1931 年达到了顶点。工业总产值比 1929 年危机前减少了 32.5%，出口减少了 37.3%，进口减少了 40.3%。经济危机加深了政治危机。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对内镇压劳动人民、对外加紧侵略要求的法西斯势力频繁发动政变，自 1929 年至 1937 年八次更迭内阁；工人罢工和农民抗缴租税的斗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和实现夺取中国东北的计划，日本帝国主义者于 1931 年蓄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局部战争。

9 月 18 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大营附近柳条湖地区的一段铁路，伪造现场，诬称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采取“绝

对不抵抗”政策，日军兵不血刃即于19日晨占领沈阳，接着占领营口、长春、吉林等地，一个星期就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并准备继续向黑龙江省发展进攻。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动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愤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9月22日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进行广泛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并且先后派出一批领导干部，协同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然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9月23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演说，表示“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同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告全国军民书》，仍宣称“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10月中旬，日本关东军开始向黑龙江省会龙江（齐齐哈尔）发起进攻，激于民族义愤的守军广大爱国官兵，奋起抵抗，给了日军以有力的打击。至11月中旬，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展开全线进攻，守军终因伤亡过重被迫撤退，日军遂占领龙江。接着，日军向辽西进犯，于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数十万东北军迫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退入山海关内。日军占领锦州和辽西地区后，又向北进攻哈尔滨。驻守哈尔滨的东北军部队与日军展开激战。2月5日，哈尔滨失守。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仅四个多月的时间，日军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于1932年3月操纵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此，东北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策源地。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行动，以英法为代表的国际联盟和美国均采取姑息纵容态度。它们一则为了应付本国的经济危机，二则希望日本北进侵苏，三则企图与日本共享在华权益。所以，在日军北进入侵吉林、黑龙江省时，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日本在东三省之建设事业，令人钦佩，东三省与日本有物质上重要关系，中国政府在东三省所为或有不合中日条约之精神，日本有所表示，亦情理所应有。”法国官方报纸也说：“日本是在一个混乱无法治的国家维持秩序的好宪兵”。美国则与日本达成谅解，美国答应“不与闻满洲事变”。当日军占领黑龙江省会龙江后，挥戈南进，夺取锦州，违背与美国达成的谅解时，美国才对日本提出警告，并示意中国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由美英法共管，中国军队退至长城以内的方案。这个方案尽管对日本侵占东北三省采取默认态度，但仍为日本所反对。于是英法美等国在国联理事会上通过了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的决议。这种无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事实的所谓调查，就是对中国的侮辱。而经过所谓调查之后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则更是荒谬绝伦。它竟然说中国“并非有组织的国家”，“应取消其国际联合会会员的资格。所有盟约中之保护条款，均不适用于中国”；诬蔑苏联是造成满洲事变的“基本因素之一”；并且提出对中国东北三省实行国际共管。这个调查报告书理所当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通电，指出它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号召全国人民粉碎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解放。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北后，为了压迫国民党政府承认日军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加速灭亡全中国的步伐，又在上海进行挑衅。1932年1月

28日，日军对上海驻军发动军事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在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和张治中的指挥下，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等部队，在中国共产党和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打退了日军的连续进攻。日军死伤逾万，并三易主帅。然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决意对日妥协，不向上海增派援军，致使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优势敌军进攻下被迫撤离上海。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承认日军可以留驻上海，而中国军队必须撤离上海且不得在上海周围地区驻防，并取缔抗日活动。中共中央在淞沪抗战的关键时刻，于2月26日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坚决支持第十九路军等部的抗战。4月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对日战争的宣言和通电，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与完全独立。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于1933年1月初开始入侵华北，攻占山海关，3月侵占了热河全省。接着向长城一线进犯。国民党第二十九、第三十二、第十七军和东北军一部在长城之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地进行了英勇的抗击。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不向长城防线增援，致使守军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于5月中旬放弃长城防线，河北省东部（简称冀东）20余县遂陷入敌手。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与日本签订了出卖领土主权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得越过该线，不得有挑战扰乱之行动；日军为确悉上述规定执行情形，随时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观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以保护及予以各种便利；日军在证实中国军队遵守上述规定后，不再越过该线追击，并自动归还至长城之线；长城线以南及上述规定之线以北以东地区的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担任，但不得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这个协定，不仅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而且划冀东各县为日军可以“自由行动”而中国军队不能进入的“非武装区”，中国军队则退至北平（今北京）、天津附近。这样，就置华北于日军监视控制之下，为日本侵略军攻取北平、天津，进而夺取整个华北打开了方便之门。

日军在向长城各口和冀东进攻的时候，还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察哈尔，5月初攻占多伦，继而侵占沽源等地。为了反抗日军入侵华北，中国共产党早在1933年1月17日即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三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协定，共同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协助下，原西北军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5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开展了轰动全国的察哈尔抗战。同盟军部队向侵入察哈尔的日军展开英勇反击，不断取得胜利，连续收复沽源、多伦等地。但是，蒋介石却以同盟军妨碍统一政令为由，调动十几万国民党军与日军夹击抗日同盟军。在此形势下，同盟军一部退至热河、长城一带继

热河，旧省名，1956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察哈尔，旧省名，1952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山西两省。

续抗战，但终因弹尽粮绝、孤立无援而失败。共产党员吉鸿昌于11月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李济深等人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1934年1月，在蒋介石的重兵压迫下，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促进中国的抗战，1934年4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签名，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了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等六项抗日救国纲领。这一纲领，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愿望，从而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广泛支持和热烈响应，公开签名赞成的达数十万人，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

为了制造扩大侵华战争的舆论，1934年4月17日至26日，日本政府外务省以情报部长天羽英二的名义先后发表声明，公开叫嚣日本是“维持东亚和平的唯一基础，负有全部责任”，并把中国视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声称“其他外国和国际联盟对于中国实行利己本位政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伊然以亚洲的主宰者自居。日本关东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司令部的报告中更加露骨地提出：“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

日本侵略者为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于1935年5月，借口中国方面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关于中国军政机构退山冀察两省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调兵入关，以武力相要挟。6月初，在日军的武力威胁下，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秘密谈判。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接受日方6月9日信件中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答应取消河北省与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长，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等。6月27日，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方代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规定撤退驻察哈尔省的国民党军和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撤销宋哲元察省主席职务，成立察东非武装区。这样，日本侵略者便获得了冀、察西省的大部主权，为全面侵华开辟了前进基地。接着又积极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自治运动”，组织亲日政权，以实现其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图谋。9月，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鼓吹华北五省“联合自治”。10月，日本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同时，日本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具体策划华北五省自治。11月11日，土肥原到北平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建立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统辖五省两市。11月25日，日本噤使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后又扶植内蒙的民族败类“德王”组织“内蒙自治政府”。在日本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下，国民党政府于12月宣布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殖民化的危机日趋严重。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中的法西斯分子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以此力标志，日本完成了国内的法西斯统治体制，从而为对外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铺平了道路。“二·二六”政变后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完全听命于军

部，8月7日，在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上，制定了《国策大纲》。其基本精神是对内加强法西斯统治，大力扩军备战；对外加紧侵略扩张，提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并进一步确定陆军准备“北进”对抗苏联，海军准备“南进”与英美争夺太平洋霸权的长远的战略目标。同时，在其《帝国外交方针》中规定：当前力求与苏联和解，增进与英美的“亲善关系”，加强与德国合作，以便集中力量解决中国问题，“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这实际上是采取中间突破先打中国的方针，为尔后“南进”或“北进”建立战略基地。广田内阁制定的这一根本国策，继承和发展了1927年田中内阁所确立的侵略方针，形成了一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方案。

为实现其既定的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入侵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同时，还加强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日本政府在1936年8月制定的《国策大纲》中，把“扩充国防军备”摆在首位，大量增加军事工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1937年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比1936年增加了2.2倍，占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61.7%。至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达55亿多美元，年产钢580万吨，石油169万吨，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余吨。同时，日本政府还大量增加直接军费，1937年即达13.6亿日元，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49%。在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增加军费的条件下，日军数量及技术装备水平得到迅速增强。至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日本陆军兵力增加到40余万人，其中包括17个常设师团和10余个独立混成旅团、骑兵旅团、独立守备队（相当旅团）；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共有91个中队，2600余架飞机；海军共有4个舰队，200艘大型舰艇，总计77万吨。此外，还有日本扶植的伪满军和伪蒙军以及冀东保安队等，共12万亲兵。同时，在国内大力加强法西斯统治，对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灌输“八纮一宇”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总之，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1937年下半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美、英、法等国还没有从上次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又陷入了新的危机。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由于大力发展军事工业，虽尚未陷入经济危机，但也面临危机的威胁。为了逃避危机，它们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英、美、法等国虽与德、日、意法西斯侵略势力存在矛盾，不愿自身利益受其侵犯，但它们一则忙于应付本国的经济危机；二则企图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求与德、日、意达成妥协，维护其自身利益；三则企图把德、日、意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因此，它们对德、日、意法西斯侵略行动，采取“不干涉”、“中立”等绥靖主义政策，并向日本、德国输出大量的战略物资，从而助长了法西斯侵略气焰，加速了战争的到来。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反法西斯力量，自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坚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斗任务以后，积极倡议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遭到英、法等国的反对。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建设并打破英、法等国企图把法西斯侵略矛头引向苏联的阴谋，苏联也避免过早与德、日、意法西斯直接发生冲突。上

述国际形势，给了德、日、意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以可乘之机。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已在有准备的基础上，决心利用上述对其有利的国际形势，乘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完全形成之机，迅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战的实现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进行了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危亡的紧急关头。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已成为中国时局的基本特点。在国际上，德国纳粹党头子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建立起法西斯独裁专政，并不断扩军备战，继日本之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又一个策源地。德、日、意法西斯互相勾结，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形成世界法西斯侵略势力。

鉴于国际法西斯侵略势力猖獗，新的世界战争危险日益严重的形势，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根据这次大会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经过艰难的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1月13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这两个宣言，号召全国军队与人民团结起来，开展抗日反蒋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影响与组织领导下，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首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等口号，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次日，北平各校实行总罢课。16日，学生和市民一万多人集会，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形成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议强调当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号召全党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

“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报告”还深刻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政治形势，尤其是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着重论述了与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建立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指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因此，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而“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报告”在批评“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还提出必须防止右的错误，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提醒全党注意 1927 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方针，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中共各级党组织一方面积极促进全国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一方面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及其军队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与被迫在西北进行“剿共”内战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达成停战协议。

为了推动抗日，准备直接对日本侵略军作战，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以红军第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于 1936 年 2 月中旬开始渡河东征，进入山西。不久，蒋介石协同阎锡山以重兵拦阻红军东进。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 1936 年 5 月 5 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尔后迅速回师河西。8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书中国国民党，敦促国民党担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并提议国共两党进行具体实际的谈判，实行两党合作，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9 月 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主动调整统一战线政策，改变过去“抗日反蒋”的口号，确定“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也转向抗日战线，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促进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的分化。以宋庆龄、冯玉祥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赞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敦促蒋介石集团停止反共内战，实行全国抗战。国民党军队中广大爱国官兵抗日情绪日益增长。然而蒋介石仍然坚持反共内战政策。1936 年 12 月初，蒋介石亲赴西安，督促主张联共抗日的东北军、西北军进行“剿共”内战，并对西安抗日青年的爱国请愿运动进行镇压。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和广大群众的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抗战热情的激励下，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于 1936 年 12 月 12 日扣留了蒋介石和十余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它是一次爱国的进步行动。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刻电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抗日救

国大计。面对国内出现的极其复杂、紧张的政治局势，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捐弃前嫌，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先后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代表到西安参加谈判。经过紧张、艰苦的工作，终于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一道，与蒋介石的代表达成了协议。蒋介石在表示同意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并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备军的救国会议并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以及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等六项条件之后，获得释放。“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将军以及国民党主和派几个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至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

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国民党毅然决然以此为国策，共产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向国民党作出下列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共产党的上述正确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斗争，通过了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决议案。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改变，同时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和国共两党合作初步形成之后，为进一步促成全国性抗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林伯渠等代表，自1937年2月开始，以我党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所提出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为基础，同国民党当局多次举行正式谈判，主要解决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共同纲领等问题。在谈判中，国民党企图通过“合作”、“统一”达到削弱、控制甚至取消共产党和红军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独立自主原则，同国民党当局展开艰巨复杂的斗争。在陕甘宁边区政权问题上，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改变苏维埃制度，成立陕甘宁特区政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指导，特区政府行政官员经民主选举产生，由南京国民政府委任。然而，国民党当局仍坚持要向边区政府派人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国民党当局始则不同意保留红军建制，继则只同意保留1万余人，余者遣散。在中共代表的据理力争下，国民党始同意红军编3个师，共4.5万人，但不能设独立的指挥部，并且由国民党派员担任要职。共产党坚持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坚持设立总指挥部，并拒绝国民党当局派员来红军任职，但同意派联络人员，以便协同作战。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其无理要求，谈判未能完全达成协议。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与共同纲领问题，

也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继续坚持其一党专制和独裁而未能达成协议。在谈判过程中，共产党既坚持原则，又进行了必要的重大让步，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早日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的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明确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7年4月15日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并于5月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明确了党在目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号召全党必须以极大努力，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发挥和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和领导作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党中央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要求全党全军迅速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要求我军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以及教育上完成抗战准备，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这次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准备。

根据这次党的代表会议所提出的任务要求，红军首先进行了政治整训，进一步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纠正了“左”的关门主义倾向，提高了执行新时期党的路线的自觉性，正确地理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和红军改编的重大意义，并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求全体指战员坚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从而为出师抗战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政治整训的同时，红军还针对日本侵略军这个新的作战对象，加紧进行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以提高军事素质，增强战斗力，并将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培养抗战所需的军政干部。在军政整训的基础上，部队着手进行整编，以便在组织上适应全国抗战的需要。

第三节 “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参见附图 1、2，附表 3、4)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于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城搜索。在其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县城，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驻守卢沟桥附近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广大爱国官兵，在旅长何基津指挥下奋起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此为标志，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为了进行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参谋本部早于1936年5月即根据其国小、人少、兵少、资源贫乏而经不起长期战争的特点，在《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要旨》中提出“制敌先机，采取攻势，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6月，其陆军部根据上述方针，制定了《昭和十二年(1937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具体规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计划)的两个军(五个师团)外，根据情况再增加三个师团，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五省进行作战”；“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九军(三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的阵地网，……因此，计划调新编第十军(二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作战计划，仍按去年度计划大致为一个师团的用兵计划”。为加强其在华北的兵力，以巩固和扩大其全面侵华的前进基地，日本侵略者于1936年4月决定，将驻北平、天津及山海关等地的中国驻屯军兵力，由1700人增至5700人。9月，其中国驻屯军在丰台地区进行军事演习，与中国驻军发生军事冲突。日军遂以此为借口，先后侵占丰台、通县，并以汉奸殷汝耕的伪冀东保安队占据昌平、顺义等地，从而形成对北平南、东、北三面包围的态势。1937年上半年，敌中国驻屯军之步兵旅团第一联队多次在北平附近丰台等地进行军事演习，企图占领北平西南要冲卢沟桥，实现对北平的完全包围，为进而夺取北平创造条件。

当时，驻守在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地区的中国第二十九军有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5个独立步兵旅以及保安团队达10万余人的兵力。其部署：以第三十七师驻守北平，以第三十八师驻守天津，以第一三二师驻守任丘、河间，以第一四三师驻守张家口，以骑兵第九师驻守良乡、固安。而日本在华北的中国驻屯军兵力只有1个旅团、2个联队和炮兵、骑兵共5700余人，而且分布在北平、丰台、通县、天津、塘沽、唐山、滦县、秦皇岛、山海关之北宁线上。由于兵力有限，而且分散，因而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为了欺骗世界舆论，麻痹国民党当局，争取时间调动兵力，首先放出“不扩大”事态的烟幕，于7月9日宣称：“我方坚持事件不扩大方针”；然后于11日却发出《派兵华北的声明》。同日，日军参谋本部发出命令，从朝鲜和中国东北抽调第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赶赴华北，以加强其中国驻屯军，并委任香月清司中将为驻屯军司令官。接替病危的田代皖一郎中将。12日，新到任的香月司令官认为，参谋本部所预料的那种“对华一战”的形势正在出现，于是命令所属部队“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

战的准备”。16日，日军参谋本部制定“对华作战要领”，规定“在华北方面待使用的主要兵力集结完了后，即以主力指向北平近郊，一举击溃平津地方之中国军队。”“在此期间，以一部兵力在青岛方面作战，使有利于主力作战，并占领上海附近，以保护侨民。”同时还规定，“交涉结果如认为中国方面没有诚意，立即动员三个师团及随同部队派往华北，增强中国驻屯军”；“另外，准备两个可随时动员的师团，届时指向山东及上海方面。如情况需要还可动员若干师团，派往满洲受关东军司令官指挥。”20日，当第一批加强中国驻屯军的第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到达天津、密云和高丽营（怀柔以南）地区，完成对平津地区的进攻部署后，日军参谋本部即“决定使用武力”首先夺取平津，并把在南满待机的临时航空兵团编入中国驻屯军，同时着手动员国内师团准备增援，以便夺取华北。至此，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攻部署基本完成。

日本帝国主义者肆无忌惮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7月8日，中共中央即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应以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就地抵抗：令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两个师和庞炳勋部一个师开赴保定、石门（石家庄）准备应援第二十九军。9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和第二十九军并通电全国，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策励第二十九军为保卫平津而战；同时请缨杀敌，与日寇决一死战。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工农商学兵各界人民、抗日救国团体、海外侨胞，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将领的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积极支持第二十九军的抗战行动。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重申共产党和红军愿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总目标下，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撤销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17日，由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在庐山再次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共提交的宣言内容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尽速发动全国的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蒋介石于同日就国民政府对日方针和立场向各界人士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同时他又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个正确的宣言，因而受到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同胞的欢迎。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是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要争取抗战胜利，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就必须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反对一切

游移、动摇、妥协、退让；要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就必须采取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外交。改良人民生活、加强国防教育、厉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建立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等项办法。这篇文章，不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办法，而且为争取全面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7月下旬，日本侵略者在其增调兵力陆续到达，完成对平津的进攻部署后，即发起大规模进攻，企图首先夺取平津，尔后以平津为出发地，沿几条主要交通线展开战略进攻，夺取华北冀、察、晋、绥、鲁五省。7月26日，日军攻占廊坊。同日，向中国军队发出最后通牒：限八宝山、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须于27日中午前撤至长辛店，北平市内及西苑的第三十七师须于28日中午前经平汉线北面撤至永定河右岸，以后继续移驻保定地区，如不按上述要求行动，日军将采取行动。日军蛮横无理的要求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

为保证实现夺取华北五省的战略企图，日军参谋本部于27日命令驻本土的第五、第六、第十师团开赴华北，同时命令中国驻屯军指挥所属第二十师团、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及驻屯步兵旅团等部，消灭或驱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并夺取平、津。28日上午，在其最后通牒限定时间未到，即向平、津发动疯狂进攻。驻守北平南苑的第三十八师和北上增援的第一三二师部队，与日军展开激战。中国守军在敌机和炮兵火力的猛烈轰击下，浴血奋战，付出了重大代价。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殉国。是夜，第二十九军放弃北平向永定河以南退却。29日，北平失陷。同日，日军猛攻大沽、天津等地。经过抵抗之后，第三十八师放弃天津，向马厂方向退却，30日天津陷落。

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其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在侵占平、津之后，又在上海制造事端，企图攻占上海，夺取南京，迫使中国政府屈服。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一水兵驾车强行冲入虹桥中国机场，不听中国哨兵警告，反而枪击中国哨兵，遂被击毙。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国民政府撤退驻上海的保安部队和拆除所有防御工事，中国国民政府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于是日军立即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备战，并派遣海军第三舰队主力进入上海附近海域。淞沪之战已不可避免，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急令驻京沪警备司令长官张治中率驻京沪沿线的第五军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向苏州、上海机动，准备保卫上海；同时令该军第三十六师火速由西安开赴上海，参加作战。12日，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分别进驻杨树浦和闸北地区。

8月13日上午，日军突然向上海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日本军舰也向上海市区实施猛烈炮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淞沪抗战遂告爆发。

14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15日，“陆海空军大元帅”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将全国临战地区划分为五个战区，并将大批主力部队调往上海方向。同日，日军参谋本部正式决定组成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第三、第十一师团等部攻取上海。17日，日本政府公开宣布放弃“不扩大”方针，向中国发动全面军事进攻。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划定淞沪、江苏南部和浙江为第三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下辖第九、第十五、第十九集团军，总兵力达30余万人，重点防守吴淞、宝山、月浦、罗店、浏河

沿江防线。23日，日军第三、第十一师团分别在吴淞、川沙附近登陆，向宝山、罗店、浏河之线进攻，遭到中国守军顽强抗击，进展缓慢。于是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再次向上海增兵。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日军第一、第九、第十三师团先后在吴淞、上海间登陆，并向中国守军发动更为疯狂的进攻。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也增强兵力并调整部署，以第八、第十集团军为右翼军，以第九、第二十一集团军为中央军，以第十五、第十九集团军为左翼军，总兵力达40余万人，由蒋介石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直接指挥，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交战。

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的形势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始发表我党于7月15日提交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进行坚决抗战，国际上各种不同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各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支援中国抗战。苏联政府于8月21日同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给予中国物资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航空队支援中国抗战。共产国际发表宣言，指出“中国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及整个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支援中国抗战。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纷纷在道义上和物资上援助中国抗战。以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为首的加拿大人与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以爱德华为首的印度医疗队以及其他国际友人，则直接献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英、美等国家反对日本独占中国、损害其在华权益，对日本扩大侵略战争进行了谴责，对中国抗战表示了同情和支持；然而它们为了应付1937年下半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和德、意法西斯在西方的挑战，并惧怕中国人民力量兴起，同时希望日本北进侵苏，因此在反对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同时，又极力缓与日本的矛盾，谋求在一定条件下的妥协，并继续向日本输出大量战略物资。

德、意法西斯则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竭力支持日本全面侵华。为此，德国拒绝参加1937年11月召开的讨论日中问题的布鲁塞尔国际会议，并积极向日本提供军火援助。意大利则在布鲁塞尔国际会议上为日本侵华辩护，并宣布参加日德反共协定。

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中，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抗战之后，根据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针对国民党不发动与武装人民群众，实行一条单纯政府的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多次提出关于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以及持久战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是弱国反抗强国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只有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全国广大民众，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战胜敌人。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中，即提出“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15日在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指出，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21日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再次提出，实行“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进行“全面的抵抗”，进行“统一的积极的抵抗，立刻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决定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大规模地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全面抗战的八大纲领，指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问将不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爆发后提出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是一条人民战争的路线，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路线。

为了促使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迅速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加强对日作战的指导，中共中央于“七·七”事变后不久，即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提案”在分析敌方情况时指出：日本陆军在东亚是最强大的，常备军已扩大到60万人以上，其武器和军事训练优于中国军队，战时能动员参战者约300万人。日本海军居世界第三位。陆海军航空兵有飞机两千多架。但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称霸东亚，必然危及英、法、美的利益，而遭到英、法、美的反对，日本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必然遭到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而且日本的国土小，人口少，难以支持长期作战。因此，估计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将以速战速决为原则。其战略部署，将集中兵力以华北为主要战场，背靠东北和平津向南发展进攻，首先夺取华北；以一部兵力由冀察西进夺取绥远、宁夏，切断中苏联系；以一部兵力封锁沿海，夺取沿海各工业城市，威胁甚至夺取首都南京。“提案”在分析我方情况时指出，中国工业不发达（1937年中国工业总产值约为13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4），物资供应、武器装备和经常性训练均不及日本（1937年日本钢产量为580万吨，中国仅为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大口径火炮744门，中国均不能制造）。然而，中国有4.5亿人口和约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日本仅有7000万人口，本土面积为37万平方公里），有丰富的资源和大量的陆军（200余万人），特别是中国所进行的战争是反侵略的自卫战争，是求民族的生存与解放的战争，所以能团结与发动全民族之一切人力、物力投入战争，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组成

实际为40余万人。

部分，必能获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有力支援和配合。基于上述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之战争非正义性、我之战争的正义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些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提案”提出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

“一、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

“二、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

“三、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

“四、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钳制敌人。

“五、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在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的应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只有积极的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

“六、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

“七、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提案”还强调指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

为了确定全国抗战的统一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提出“立即召开国防会议”的建议。同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也要求“召集国防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统一战斗意

8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召开国防会议，并邀请中共代表参加。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为代表参加会议，并同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准备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就国防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的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开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由西安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在11日的会议上，就我党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作了阐述。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当前主要战场在华北方面，华北的第一、第二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之翼侧和后方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扰乱敌人，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牵制和消灭敌人。并且强调只有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正确建议，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京国防会议正式确定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

为使全党和红军适应全国性抗战开始后国内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新形

势，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2日至24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以及红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并在《决定》中指出：7月7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决定》还指出，“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制定并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十大纲领》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也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正确措施。

会上，毛泽东作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关于两党关系，他指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保持无产阶级政治警惕性，切不可忘记蒋介石想通过抗日战争来取消或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必须保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关于军事问题，他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按照目前敌情，日本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红军主要作战地区是冀、察、晋三省之交地区。红军应以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为当前基本任务。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所谓“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相对的独立自主，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就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走。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着重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明确我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

为了加强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等11人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期新的历史转折关头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为全国抗战制定了正确路线，确定了统一战线中的正确政策，规定了我军深入敌后的战略任务，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第二章

我军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开展 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和 坚持东北抗日斗争

第一节 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 前线，配合友军作战

一、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参见附表5)

中共中央为促成全国抗战，自1937年2月，即就红军改编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当局企图通过改编取消、削弱和控制红军，因而直到全国抗战爆发一个多月后，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时，国民党当局始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师1.5万人。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

和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和总部特务团。第一一五师，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及陕南第七十四师等部编成，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萧华任副主任，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以及独立团和3个直属营，全师共1.55万人。第一二师，由红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二十八军及独立第一师、第二师、赤水警卫营和总部特务团一部编成，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副主任，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以及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全师共1.4万人。第一二九师，由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军、独立第一至第四团和第十五军团的骑兵团等部编成，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以及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全师共1.3万人。此外总部直属队3000余人。全军共4.6万人。

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9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同时，在前方军委分会领导下，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10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任命任弼时为主任。22日，中共中央、中央

军委决定恢复因受国民党干涉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先后任命了师、旅政治委员。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任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萧华、黄克诚、李井泉、王震，王维舟、王新亭分别任第三四三旅、第三四四旅、第三五八旅、第三五九旅、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的政治委员。并撤销各级政训处，恢复了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在改编中，坚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保持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人民军队的本色，胜利地完成了改编，并通过改编对广大指战员进行了一次普遍深入的形势任务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使红军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转变，更加坚定地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奋斗。

二、华北战局危急，八路军向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挺进

(参见附图3，附表6、7)

日军以第二十师团、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及中国驻屯步兵旅团等部侵占平、津后，为迅速夺取华北，不断增强兵力。8月中旬，关东军之混成第二、第十五旅团以及新编成的大泉和堤支队，到达平、津与张北县，并与先期到达之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直属日军参谋本部指挥。其主要任务是夺取察、绥两省，控制平绥铁路全线，切断中国与苏联联系，保障沿平汉、津浦两铁路南犯之主要进攻集团的侧后安全。与此同时，由国内调来之第五、第六、第十师团，也到达了平、津地区。

在上述兵力到达后，敌即以平、津地区为出发地，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国民党军发起新的进攻。8月11日，敌中国驻屯军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由北平沿平绥路向防守南口、居庸关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实施正面进攻；尔后以第五师团由镇边城、横岭等地迂回南口、居庸关侧后。19日，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由张北南下，进攻张家口，从而使平绥路东段国民党军陷于腹背受击的不利态势。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军事当局，急令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部）由石家庄经北平以西山地，驰援防守南口、居庸关之汤恩伯部。然而，在敌第五师团迂回包围情况下，汤部已向晋东北地区撤退。27日，敌占领张家口，控制了平绥路东段。敌在向平绥路东段发动进攻的同时，以第二十师团向房山、良乡进犯；以第六师团一部向门头沟以西山地进犯，以截击驰援南口的国民党军；以第十师团由天津南犯独流镇等地。

在日军对华北和淞沪地区展开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8月20日，正式确定战略方针，划分战区和调整部署，将临战地区划分为5个成区：在河北省和河南省北部设立第一战区，辖第一、第二、第十四集团军；在晋、察、绥三省设立第二战区，辖第六、第七及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在苏、浙两省设立第三战区，辖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五集团军；在闽、粤两省设立第四战区，辖第四、第十二集团军；在山东省和苏北（长江以北）设立第五成区，辖第三、第五集团军。此外，还编成第一至第四预备军，直属军事委员会。为阻止日军沿平汉、津浦两铁路线南犯，

第一战区以第一集团军宋哲元部，负责津浦铁路北段的防御，其阵地前沿在固安、永清、独流镇东西之线；以第二集团军刘峙部负责平汉铁路北段的防御，其阵地前沿在房山、琉璃河、至固安（不含）一线。为阻止日军沿平绥铁路西犯，第二战区以第七集团军傅作义部之第六十一军防守平绥铁路天镇、阳高一线，以第十七军防守蔚县、广灵地区，以第十三军防守涿源、灵丘地区；以第六集团军杨爱源部之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军等部，防守平型关至茹越口内长城线。

在国民政府建立战区、调整部署、加强在华北的防御时，日军参谋本部于8月24日决定再由国内抽调第十四、第十六、第一八、第一九师团赶赴华北战场，以便迅速实现其夺取华北的战略企图。由于其兵力不断增加，战区扩大，原中国驻屯军指挥机构已不适应，遂于8月31日成立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下辖第一、第二军共8个师团另1个独立旅团和1个临时航空兵团。其任务是沿平汉、津浦两铁路南进，并以平汉路为主要突击方向，企图歼灭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主力于河北地区，夺取冀、晋、鲁三省和豫北地区。至此，华北日军兵力已达30余万人。

在敌不断增强兵力并大举进攻，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于8月22日，以第一一五师主力由陕西省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9月3日，第一二师主力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第一一五师之后北上。4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进。30日，第一二九师主力由庄里镇出发东进。为使八路军展开于敌之翼侧和后方，向着沿平汉铁路南进和沿平绥铁路西进之敌实行侧后的游击战，袭扰、牵制和打击日军，协同友军作战，洛甫和毛泽东于

8月4至5日提出，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讨论同意，决定八路军全部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之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根据这一战略部署，第一一五、第一二师向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恒山地区挺进。在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为加强对后方留守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成立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以萧劲光为主任，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三、中共中央军委适时变更八路军的战略部署， 强调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

在八路军日夜兼程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时，沿平绥路西犯之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先后突破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之天镇、阳高等地防线，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并以一部在伪蒙军配合下向绥远进攻，以便切断中、苏联系，并保障沿平汉路进攻军队的翼侧安全；主力则沿同蒲铁路南下，向雁门关、茹越口进攻。与此同时，由平绥路上之宣化、新保安、怀来向晋东北进犯之敌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占领了蔚县。广灵、涿源，并向平型关进犯，企图配合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击溃国民党军第二战区主力，实施右翼迂回，威胁平汉路沿线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主力的侧背。9月中旬，敌华北方面军以平汉铁路沿线为主要突击方向，以第一军之第六、第十四、第二十师团和方面军直属之第一八师团，沿平汉铁路及其两侧南犯；以第二军之第十六、第一九师团（欠第一一八旅团）沿滏阳河南下，迂回平汉路沿线国民党军侧背，企图协同第一军歼灭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主力于河北省中部地区；以第二

军之第十师团和第一九师团之第一一八旅团沿津浦铁路南犯，以保障其沿平汉铁路南犯之主要突击集团的左翼安全。在此形势下，毛泽东于9月17日，就八路军的战略部署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夺取华北五省之企图；判断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因此，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基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大迂回中，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八路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第一二师转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一二九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第一一五师即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19日，毛泽东再电八路军总部指出：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五台、定襄、盂县地区狭小，敌占太原后，即在其包围中，因此，第一二师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展开游击，方能给进攻太原之敌以相当有效的钳制。所以，第一二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如再去五台则失去战略意义。第一二九师可与第一一五师靠近，位于晋南太岳山脉中。20日，毛泽东又电八路军总部强调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中央军委依据战局发展趋势，适时改变我军的战略部署，将原定三个师集中部署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的计划，改变为分别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向着敌占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取四面包围的态势，这对八路军摆脱敌之迂回包围，扩大回旋余地，以及各师的相互策应，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和迅速实现战略展开，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加深八路军指战员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理解，以保证顺利实现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并使友军也了解与同意八路军这一方针，毛泽东于9月12日致电彭德怀指出：应向我军广大指战员和友党友军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中包含：我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友党友军不得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只作战略规定，我军有依据情况灵活机动地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并坚持依托山地和不打硬仗的原则。21日再电强调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25日，

中共中央致电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

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八路军总部于9月21日和25日，先后对各师发出指示和训令，要求各部队“应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小部”，同时，立即在我军所到之处“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开创持久的胜利发展的局面”。指示还划分了各部开展游击战争和做群众工作的地区：第一一五师于涞源、灵丘以南，五台、盂县以东，灵寿、曲阳以西的晋察冀边区；第一二师主力于左云、清水河、保德、宁武、平鲁等晋西北地区，第三五九旅于柏兰镇、定襄以南，盂县、井陉以北，平山县以西地区；第一二九师预定在正太铁路以南地区。依据上述指示和地区划分，第一一五师于9月中旬进至五台、繁峙、灵丘等晋东北地区及冀西阜平地区；第一二师主力于9月下旬进至宁武、神池等晋西北地区，其第三五九旅进至五台、平山地区；第一二九师准备向正大铁路以南之晋东南地区开进。

四、第一一五师发起平型关战役，首战告捷

（参见附图4）

当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向晋东北抗日前线挺进时，敌第五师团已侵占阳原、蔚县、广灵，并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茹越口要隘，协同沿同蒲铁路南进之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击溃国民党军第二战区主力，实现右翼迂回，配合华北方面军主力歼灭平汉铁路沿线之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主力。9月16日，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以其第二十一联队主力由广灵西进占领浑源县城。同日，第五师团之第九旅团主力由蔚县南下，占领涞源。20日，第二十一旅团以两个大队兵力南下，占领灵丘县城，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以两个旅团兵力，由大同、怀仁南下，协同第五师团向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进攻。

在敌向平型关、茹越口内长城防线进攻时，国民党军第二战区调整部署：以第六集团军（辖第十五、第十七、第三十三军）和第七集团军（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十九、第六十一军）分别部署于平型关、茹越口、雁门关一线，企图凭借长城一线山地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阻止敌之进攻，保卫山西腹地。同时，要求八路军先头部队迅速挺进至晋东北协同其坚守长城防线。

为了协调八路军与友军的作战行动，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入，多次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卫立煌等会谈，对保卫山西的作战计划、部署、兵力使用和八路军的任务，以及发动与组织群众，成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等问题提出了重要建议。并强调指出：八路军只宜在进攻之敌的翼侧和后方进行游击战，担负袭击敌后方交通线和兵站据点的任务，不宜担负正面的阵地防御任务。为了积极配合第二战区友军防守平型关至茹越口和雁门关的内长城一线，八路军总部即令第一一五师进至平型关以西之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之敌。9月14日，第一一五师先头部队进抵大营镇，并派出侦察分队查明平型关地区情况。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窄谷道。其间，关沟至东河南镇长约13公里的地段，沟深道窄甚为险要，两侧高地便于我军隐蔽部署兵力、

发扬火力与展开突击，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根据当面敌情和地形，第一一五师首长决心抓住敌军骄横、疏于戒备的弱点，利用平型关东北有利地形，出其不意，以伏击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配合友军作战。为此，令第三四三旅由大营镇前出至平型关东南之上寨地区隐蔽集结，并进行战前准备；令第三四四旅向上寨地区机动。

22日，敌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并占领东跑池地区。23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侧击该敌。当日，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在上寨召开干部会议，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并令独立团、骑兵营向灵丘、涞源方向活动，扰乱敌之后方，牵制和打击增援之敌。师部率主力于当日夜进至平型关以东之冉庄、东长城村地域。24日，第二成区第六集团军给第一一五师送来“平型关出击计划”，拟定以第七十一师附新编第二师及独立第八旅一部，配合第一一五师向平型关以东之日军出击。同日，第一一五师组织各级指挥员进行现地勘察，并确定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镇道路两侧高地，利用居高临下便于隐蔽和突击的有利地形，采取一翼伏击的战术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具体部署是：以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占领小寨村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之敌，尔后向东跑池方向发展进攻；以第六八五团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敌先头部队，协同第六八六团围歼进入伏击地域之敌，并阻击东跑池之敌回援，尔后协同防守平型关的国民党军，夹击东跑池之敌；以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镇以南高地，断敌退路，并阻击由灵丘、浑源方向来援之敌；以第六八八团为师预备队。这种拦截敌之先头、切断敌之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的部署，既保证了在伏击敌人的兵力上的优势，又保证了有足够阻击援敌的兵力。为隐蔽行动企图，发挥战役的突然性，各部队当晚利用夜暗、冒雨进入伏击阵地，并于25日拂晓前完成了各项战斗准备。

25日拂晓，敌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7时许，全部进入我伏击地域。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其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我第一一五师抓住有利战机，全线突然开火，给敌以大量杀伤，并乘敌混乱之际发起冲击。第六八五团迎头截击，歼敌一部，封闭了敌南窜道路。第六八七团将敌后尾部队分割包围于蔡家峪和西沟村地区，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敌之退路。第六八六团勇猛冲向公路，与敌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格斗。此时敌虽伤亡惨重，但仍利用车辆辎重作掩护，凭借优势火力进行顽抗。其中一部企图夺占公路西侧高地，掩护突围。我第六八六团第二营迅速抢占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与公路东侧部队构成对敌夹击之势，继之将敌压缩于狭谷之中。敌虽疯狂向老爷庙连续反扑，企图突围，但均被我击退。为解救被围之敌，先期进占东跑池之敌一部回援，又被我第六八五团所阻。敌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急令其在蔚县、涞源之部队向平型关增援，但被第一一五师独立团、骑兵营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灵丘以东之腰站毙伤其300余人。被围于小寨村至老爷庙之敌，在6架飞机掩护下，再次猛攻老爷庙及附近高地，亦未得逞。第六八六团遂集中全力，在两翼友邻的协同下，将被围之敌歼灭。至13时许战斗胜利结束。当日黄昏，第三四三旅向东跑池日军展开攻击。由于国民党军未按计划出击，致使该敌由团城口突围。是役，第一一五师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余辆、

马车 200 余辆，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出师后，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这一战役由于慎重初战，战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正确地选择了战场并利用有利地形，采取伏击手段，以及正确地部署和使用兵力，注意隐蔽行动企图，发挥了战役的突然性和近战特长，使日军飞机、大炮难于发挥威力，因而取得了首战胜利。这一胜利，首先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敌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败退，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表现出中国人民确有战胜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使全国人民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增强了抗战胜利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与好评。其次，在军事上有力地打击了敌之疯狂气焰，挫伤了敌之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迟滞了敌军的进攻，打乱了它的右翼迂回计划，并有效地钳制了敌之精锐第五师团，迫使其将进至浑源和保定的一部分兵力转移到平型关方向，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线上友军的作战，同时也为开辟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五、 八路军在日军之翼侧和后方作战， 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

(参见附图 5)

在八路军给予进攻平型关之敌第五师团以有力打击时，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 9 月 27 日和 28 日，先后突破国民党军茹越口、下社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而沿平汉、津浦铁路进攻之敌，已占保定、沧县等地，并继续南犯。国民党军第一战区部队已向石家庄、德州以南撤退。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 29 日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敌已从平汉、津浦两路的中间突破进来，保定已失，敌正迂回石家庄的侧面，河北局面已经完结了”，“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因此，我们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正如毛泽东所料，10 月上旬，国民党军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忻口东西一线阵地，企图集中兵力与敌决战，保卫太原。10 月 6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要其转告国民党军事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注：应为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这是忻口战役能否胜利的关键之一。同时，他指示八路军要在敌之翼侧和后方积极打击与钳制敌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八路军总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于 10 月 6 日、7 日，令第一一五师协同友军袭取平型关、大营镇，相机略取浑源、应县；令第一二师以主力位于岱岳（今山阴县）以西山地，完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以第三五八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宁武以南之敌；令第一二九师以一部进至正太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

出击察南、冀西，打击晋东北之敌， 切断张家口至代县敌之交通线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第一一五师首先以独立团由晋东北向察哈尔省

南部地区出击。10月10日，该团攻占涑源县城。15日拂晓前，该团以主力进至广灵、灵丘之间的冯家沟设伏。当日上午，敌第五师团的运输大队100余辆马车和担任掩护的步骑兵50余人进入伏击区。我独立团突然开火，并乘敌混乱之际发起冲击，经一小时激战，毙伤敌100余人，缴获大车100余辆和大量弹药给养，乘胜于16日收复广灵县城。19日至20日，蔚县之敌1000余人在坦克支援下猛攻广灵县城。我独立团给敌以杀伤后主动撤离，转移至广灵东南山地，待机歼敌。23日，广灵之日军1000余人在20余辆坦克、装甲车及5架飞机掩护下，沿公路向灵丘进犯，我独立团于冯家沟、南阁崖一线山地，顽强抗击，打退了敌人连续两天的猛攻。25日，我第三四四旅以一部增援独立团，向进犯之敌侧后实施威胁，敌遂向广灵撤退。独立团乘势追击，于当日黄昏再次收复广灵县城，并歼敌一部，余敌向蔚县逃窜。至26日，我独立团又相继攻克紫荆关及灵丘、蔚县二城。

在独立团出击察南的同时，骑兵营等部由晋东北挺进冀西。10月18日2时，该营奔袭曲阳县城，歼敌大部，残敌分向定县、新乐逃窜。骑兵营收复曲阳县城，缴获大量给养，并于当日打退定县之敌的反扑。至10月29日，骑兵营等部又连克平山、唐县、完县等县城，并袭击平汉铁路之清风店车站，严重地威胁了敌平汉铁路北段的交通。

在独立团、骑兵营向察南、冀西出击的同时，第三四四旅奉命打击晋东北之平型关、繁峙一线日军。10月14日，该旅主力于平型关东北小寨村附近，截击由灵丘驶来之敌汽车130余辆，并打退该敌一个大队的连续反扑，激战终日，毙敌100余人，毁敌汽车数十辆，迫敌退回灵丘县城。接着，该旅连续收复平型关、团城口、沙河镇及繁峙、浑源县城。经一个月的作战，第一一五师在晋东北和察南、冀西先后收复县城10座，并广泛袭击敌后方兵站和据点，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的敌后方交通线。

挺进雁北，威胁大同，切断大同至忻口之日军交通线

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二师于9月底，以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第二营为基础组成雁北支队，在支队司令员宋时轮率领下北越长城，挺进雁北地区。10月1日，该支队首袭井坪（今平鲁县），歼敌一部，收复该镇；4日，又北进收复平鲁县城（今平鲁镇）。接着，对同蒲铁路朔县至大同段展开破袭战。7日夜，袭击岱岳，攻占该镇以南之东榆林、马邑，并破坏桥梁数座；10日夜，又于怀仁以南之辛庄伏击敌运输队，毙敌100余人，击毁敌汽车18辆；23日，于周庄伏击由大同至岱岳之敌运输队，毙敌100余人，毁敌汽车10余辆；尔后，直逼大同，并于26日夜袭击大同西南之口泉村，毙敌一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该支队积极作战连续获胜，并广泛发动与组织群众，初步打开了雁北地区的抗战局面，严重地威胁了大同敌军和同蒲铁路北段敌之交通。

在雁北支队于雁门关以北积极作战的同时，第三五八旅主力于10月8日袭击宁武县城，歼敌一部，至13日，在友军配合下，收复该城。10月上旬，第三五九旅主力由晋察冀边区之平山返至忻口以西归建。14日，第三五八旅在第三五九旅协同下，攻占同蒲路上的大牛店等地，歼敌一部。18日，第三五八旅以第七一六团主力于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敌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10

时许，敌汽车 50 余辆满载步兵由北驶入我伏击区，我第七一六团即以密集火力向敌车队进行袭击，击毁敌部分汽车。正当我与该敌激战时，由阳明堡方向驶来敌汽车 200 余辆。我第七一六团当即以一部兵力阻击该敌，激战至夜，敌又增援，我第七一六团遂撤出战斗。此战，共毙伤敌 300 余人，击毁敌汽车 20 余辆。20 日夜，第七一六团以一部袭取了雁门关，以另一部破坏了广武至太和岭间的公路及桥梁。21 日，该团再次于黑石头沟地区设伏。9 时许，由南向北行驶之敌汽车 200 余辆和由北向南行驶之敌汽车数十辆，同时进入我伏击区，我军随即展开攻击，敌下车顽抗，并在 8 架飞机支援下向我反扑。我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歼敌一部，击毁其汽车 10 余辆，尔后主动撤出战斗。从 18 日至 21 日，我第七一六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敌 500 余人，毁敌汽车数十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与此同时，第三五九旅主力于阳明堡以南之王董堡附近数次伏击敌之运输队，先后毙伤敌 300 余人，毁敌汽车 30 余辆，使敌交通运输进一步陷于瘫痪。

至此，日军由大同经朔县至宁武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以及由张家口至代县间的交通均为八路军切断。进攻忻口之日军的粮、弹、油料供应濒于断绝，攻势顿挫。

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遂更加频繁地由代县西南阳明堡前线机场出动飞机，对忻口国民党军阵地进行连续轰炸。这时，奉命于崞县、代县以东地区侧击敌人的第一二九师先头部队第七六九团，进至滹沱河南岸苏龙口、刘家莊一带。该团发现敌机不断由滹沱河北岸的阳明堡机场起落。经周密侦察获悉：阳明堡机场有敌机 24 架，并驻有警卫分队和地勤人员共 200 余人。大部配置于机场北端，机场周围设有铁丝网并构有简单防御工事。据此，第七六九团首长决心夜袭敌机场，其部署是：以第三营袭击机场；以第一营钳制和阻击崞县的日军；以第二营（欠第七连）为团预备队，并以第八连破坏王董堡的桥梁，保障第三营侧后的安全；团迫击炮连位于滹沱河南岸，准备支援第三营战斗。10 月 19 日夜，第七六九团各部分别向预定地区开进。第三营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偷渡滹沱河之后，以一个步兵连警戒阳明堡方向可能来援之敌，以两个步兵连和机枪连组成突击队，以一个步兵连作营预备队。突击队避开敌警卫分队驻守的机场北端，从机场东西两侧秘密进入机场，当接近到距敌机约 30 米时，敌哨兵始发觉，我突击队当即按预定计划发起攻击，一部将敌警卫分队压制于掩蔽部内，并打退其连续反扑；一部迅速扑向敌机群，先以猛烈火力突击，尔后将集束手榴弹塞进机舱，敌机顿时爆炸起火。此时，敌警卫分队疯狂实施反扑，我突击队与敌展开白刃格斗。经一小时激战，歼敌 100 余人，毁伤敌机 24 架，我第七六九团完成任务后，顺利撤出战斗。此次战斗，主要由于兵力部署得当，战斗组织周密，加之隐蔽接敌，正确选择攻击方向和时机，发挥近战夜战的特长，所以取得了胜利。这一战斗的胜利，削弱了忻口当面之敌的空中突击力量，打击了敌之空中运输，有力地配合了友军作战。

打击沿正太铁路西犯之日军，支援友军作战

10 月中旬，沿平汉铁路进攻之日军已占石家庄、邯郸等地，前出至漳河北岸，从而控制了河北大部地区。而进攻山西企图实施右翼迂回之第五师团与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由于遭到八路军和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部队有

力阻击，尚停滞于忻口一线。于是，敌华北方面军决定转移兵力，以夺取山西为主要战略目标，令第二十、第一九师团由平汉路上之石家庄和高邑附近转向正太铁路及其南侧西进，迂回忻口、太原侧后，企图配合其忻口正面进攻的部队夺取太原。这样，山西就成为华北日军的主攻方向。在此情况下，我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二九师向进攻娘子关之敌的侧后挺进，寻机歼敌，配合友军阻止敌军西进。该师自10月22日至24日先后于娘子关以东之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处，以袭击、伏击、阻击等手段，打击进犯之敌。此后，为阻击和牵制由井陘沿正太铁路南侧西进之敌第二十师团左翼纵队，第一二九师主力迅速进至测鱼镇以西的七亘村地区。

10月25日，敌第二十师团主力一部经测鱼镇向平定进犯，其后方辎重部队1000余人进至测鱼镇宿营。第一二九师首长判断敌辎重部队必尾其先头部队经七亘村西进，遂决心以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一部，于敌必经之地七亘村，利用高山狭谷、道路曲折的有利地形设伏，歼灭敌之辎重部队。26日9时许，当敌由测鱼镇进入我伏击地域时，第七七二团放过其前卫部队，向其本队突然发起攻击，在短促猛烈的火力袭击后，即发起冲击，经两小时激战，毙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余敌退回测鱼镇。我第一二九师首长判断敌先头部队急需补给，其退回测鱼镇之辎重部队，因无他路可走，必再经七亘村前送粮弹，同时敌可能根据“兵无常势”的一般原则以为我军不会再于七亘村设伏，因此，只要我军注意隐蔽伪装，继续在七亘村实行“待伏”，仍可收出敌不意之效。据此，令第七七二团再次于七亘村附近设伏。28日，敌果然以步骑兵400余人掩护辎重部队经七亘村西进，并加强了搜索警戒。11时许，当敌进至七亘村至改道庙之间时，我第七七二团突然发起攻击，战至黄昏，歼敌100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敌被迫再次退回测鱼镇。两次伏击战，该团仅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400余人的胜利，给进犯之敌以较沉重的打击。

由于国民党当局未按毛泽东的建议预置重兵加强娘子关、九龙关的防守，直至敌逼近后，始令第二十六、第二十七路军、第三军等部进至娘子关仓卒组织防御，致未能有效地阻止敌之进攻，26日，放弃娘子关，向西南撤退。在晋东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于10月28日，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三四三旅，由五台地区南下进至寿阳以南地区，并指挥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主力，积极打击沿正太铁路及其南侧西犯之敌，配合友军作战。

此时，日军第一九师团正经九龙关向昔阳进犯。为打击该敌，迟滞其西犯，第一二九师主力于10月31日进至昔阳以东地区。11月2日，敌第一

九师团之第一三六联队一个大队，由东冶头镇经黄崖底向昔阳进犯。第一二九师首长在查明情况后，决心在黄崖底利用两侧高地采取诱伏手段歼灭该敌。其部署是：以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于黄崖底以南之凤居村占领阵地，并派出小分队与敌保持接触，诱敌至黄崖底歼灭之；第七七二团隐蔽集结于黄崖底以东之巩家庄待机，准备协同第七七一团歼灭该敌。当日7时，日军经南界都进至黄崖底，我第七七一团派出之小分队与敌接触后，节节抵抗，退至凤居村西北高地扼守。敌屡攻不逞，遂撤到黄崖底河滩集结休息。我第三八六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轻重机枪及迫击炮，突然向敌实施火力急袭，敌顿时混乱，一小时后，才集结500余人，向我第七七二团阵地连续进行反扑，但均被击退。敌乃退据黄崖底村，固守待援。我军为避免过大伤亡，遂撤出战斗。此次战斗，共毙敌300余人，毙骡马300余匹，我军仅伤亡30

余人。

为继续阻击和迟滞西进之敌，打破其由平定、昔阳迂回榆次、太原侧后的企图，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一五、第一二九师主力，于昔阳以西地区积极打击西进之敌。10月30日，我第一一五师主力进至昔阳以西之沾尚地区，待机歼灭由平定、背阳西犯之敌。11月2日，敌第二十师团第四十旅团先头之第七十九联队主力逼近马道岭。我第三四三旅以第六八六团第二营，在马道岭一带节节抗击，迟滞与疲惫敌人，以掩护旅主力完成伏击部署。敌在我第二营的不断抗击、袭扰下，前进缓慢，日行程仅7公里。我第三四三旅抓紧时机，迅速占领广阳及其以东道路南侧的有利地形，完成一翼伏击的作战部署：以第六八六团占领广阳镇南之瑶村、前小寒以北的高地，担负主要攻击；以第六八五团第三营由狼窝沟北山出击，协同第六八六团歼灭进入我伏击地区之敌。4日13时，敌先头两个联队通过广阳进至松塔镇，而其辎重部队则正处于我伏击地区内。我第一一五师采取避强击弱的原则，放过其先头主力，对其辎重部队突然发起攻击，将其分割成数段，经4小时激战，即将进入我伏击地区之敌全部歼灭。是役，我军歼敌近1000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我军伤亡200余人。敌遭此严重打击后，不敢冒进，进至松塔镇之敌两个联队亦于6日返回广阳。

7日，我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及第七六九团，又于广阳以东之户封村地区设伏。17时许，当由沾尚镇西进之敌进入我伏击区时，我军突然发起攻击，经一小时激战，歼敌250余人。由于敌占据户封村进行顽抗，我军遂撤出战斗。

八路军在正太铁路南侧地区的连续作战，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第二十、第一九师团经娘子关和九龙关的西犯，特别是在广阳附近进行的两次伏击战，予敌以严重打击，迫使其改道由广阳以北之上、下龙泉西犯，迟滞敌军行动达一周之久，从而掩护了防守娘子关地区之国民党军撤退。娘子关失守后，日军迅速进占寿阳、榆次，防守忻口一线的国民党军侧后受到威胁，遂全线向晋西南撤退。11月8日，太原失陷。

在此期间，沿平绥铁路西进之日军于10月14日占领归绥（今呼和浩特市），17日占领包头，控制了平绥铁路全线。沿平汉铁路南进之敌，突破国民党军漳河防线，于11月5日占领安阳。沿津浦铁路南进之敌，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防线，于11月13日占领济阳，控制了黄河以北大部地区。敌以3个月时间即占领察、绥、晋、冀四省大部 and 山东省一部，控制了华北的主要交通线。

八路军自1937年8月下旬出师华北至太原失陷期间，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执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日军翼侧和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采取袭击、伏击等战术手段，在战役战斗中直接配合了国民党军作战，先后取得了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和广阳等100余次战斗胜利，歼敌1.1万余人，毁伤敌机24架，击毁敌汽车400余辆，缴获步马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6挺、骡马2000余匹及其它大批军用物资，收复了10余座县城和广大乡村，给敌以沉重的打击，挫败其夺取山西、实施右翼迂回，威胁河北国民党军侧背的企图，有力地支援了友军作战；并在集中主力对敌作战的同时，以部分兵力分散开展地方工作发动和武装群众，为尔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实现在山西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节 八路军实行战略展开，广泛开展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粉碎日 军的围攻，创建抗日根据地

日军侵占太原和上海后，继续发展进攻。在华中，日军连续突破第三战区的防线，直逼南京。在华北，沿平汉路南犯之敌，于11月上旬，突破第一战区漳河防线，进占大名和豫北重镇安阳；沿津浦路南犯之敌，于11月中旬进至齐河、济阳黄河北岸，并准备渡河攻占济南，夺取山东全境；沿同蒲路南犯之敌，于11月中旬，进占太谷、平遥。而沿平绥路西犯之敌早于10月中旬即占领归绥、包头。至此，国民党军已退出冀、察全境和晋、绥大部以及山东北部地区。这时，日本侵略者为加强侵华战争的统一的战略指导，于11月17日成立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同时，设立了大本营与政府首脑的联络会议。11月24日，大本营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听取和批准了参谋本部对华作战计划，确定在华北首先对残存于占领地区的中国军队实行“扫荡”，力求安定这些地区，并准备抽调兵力夺取山东全境；在华中，扩大淞沪地区的战果，不失时机地向南京进攻。据此，敌华北方面军决定以第二军之第十师团并准备抽调第五师团夺取山东全境；以第一军主力在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协同下，对活动于晋察冀边区、晋西北和晋东南严重威胁其后方和交通线安全的八路军进行大规模围攻，企图消灭或驱逐八路军，以确保其后方特别是平汉、同蒲、平绥、正太等主要铁路交通线的安全。

对上述形势，毛泽东于11月9日，在给八路军的指示中即指出：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军不久即将以主力向我军所在的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各要点进攻。我在上述四区活动之部队，应控制一部，执行袭击敌人的任务，大部分散于各要点，组织群众武装，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办粮饷，实现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发展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期于一个月内取得显著成效，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我内线的进攻。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因此，争取实现全面抗战是“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为实现全面抗战，在党内，必须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在全国，必须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13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负责人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八路军的当前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进全面抗战的实现。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确定当前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78、380、384页。

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并决定第一一五师除以一部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外，师部率第三四三旅创建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则继续创建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主力及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由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

一、第一一五师一部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八路围攻”

(参见附图6)

晋察冀边区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是威胁敌占之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及平、津等大城市和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早在9月20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的指示中就指出，“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战争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据此，八路军总部在平型关战役后，即令第一一五师以一部兵力开展群众工作，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该师以师政治机关和教导队分别组成工作团，在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率领下，在五台等地协同中共当地组织开展群众工作。10月11日毛泽东电示聂荣臻：“你们应着重一个月内建立武装与群众工作之基础，以便一个月后有充分力量反对日寇的进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随即以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以及总部特务团等各一部共约3000人，在副师长聂荣臻(11月2日任师政治委员)率领下，以五台为中心，分向四面发展。以师独立团向晋察冀边之浑源、广灵、灵丘、阳原、蔚县以及涞源、易县展开，并收复上述7座县城和广大乡村；以骑兵营向冀西地区展开，收复曲阳、完县、满城等县城及广大乡村；以一部兵力掩护工作团向南发展，开辟平山、盂县地区；以另一部兵力掩护工作团向西发展，开辟五台以西和定襄地区。各部队一面作战，一面配合工作团与当地中共组织，首先摧毁日伪组织；尔后，放手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接着，建立各级战地动员委员会或抗日救国会，通过这种带有政权性质的组织形式，进一步组织群众，建立农会、青教会、妇教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同时，号召广大青年参军或加入民兵自卫队，保卫家乡；建立起县、区、乡的抗日自卫委员会和不脱离生产的抗日救国自卫队，以及脱离生产的抗日义勇军。并实行抗日的经济政策，没收汉奸的财产，进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号召“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枪出枪”，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由于深入动员和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初步解放，因而抗日热情高涨，抗日武装也随之迅速扩大。经一个月的工作，北部地区除组建了一批游击队外，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后改为第一支队)，东部地区组建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共4000余人，南部地区建立了平山团、井(陘)获(鹿)等游击队，西部游击武装也有很大发展，而主力部队也由近3000人扩大到7600余人，从而为进一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11月7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4个军分区。12月，各军分区主力部队均整编为支队，每个支队辖3个大队(相当团)，每个大队辖3至4个中队(相当营)。第一军分区兼第一

支队。辖第一、第二、第三大队；第二军分区兼第二支队，辖第四、第五、第六大队；第三军分区兼第四支队，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大队；第四军分区兼第三支队，辖第七、第八、第九大队。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会议决定统一边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民运工作等各项方针政策，并以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边区的政权机关——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以聂荣臻等9人为委员。军区和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胜利建成。

粉碎日军“八路围攻”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和游击战争的蓬勃展开，对四周敌占之铁路线和北平、石家庄、太原等中心城市构成严重的威胁。敌为消除后顾之忧，遂于11月下旬，以第五、第十四、第一九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由平绥、平汉、正太和同蒲铁路沿线，分八路围攻我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企图消灭或驱逐我军，摧毁我创建不久的抗日根据地，以确保其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

晋察冀军区根据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指示，早自10月中旬即着手进行反围攻的作战准备。首先对根据地军民普遍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增强军民反围攻作战的胜利信心；并在政治动员的基础上，组织与武装群众，加速抗日自卫军、游击队的组建和训练，加强各军分区主力部队的建设和反围攻的各项准备。

晋察冀军区首长根据敌军动向，判断敌围攻的目的在于驱逐我军，以确保交通线的安全；但其兵力不足，地形生疏，故不敢贸然深入我晋察冀边区腹地。据此，确定反围攻作战部署是：以部分老部队为骨干，带领新组建的游击队，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不断袭扰、消耗、疲惫进入我根据地之敌；以部分游击队日夜袭击敌后方据点和交通线；以第一军分区主力于广（灵）、灵（丘）、涞（源）之间，第二军分区主力于五台地区，第四军分区主力于上社镇、洪子店地区，第三军分区主力于阜平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11月23日，军区发出反围攻作战指示，要求各军分区加强侦察，迅速完成作战部署和各项准备，发动与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和封锁消息。

11月24日，各路敌军开始向我根据地进犯。我晋察冀边区军民遂展开反围攻作战。

由平汉铁路沿线出动之敌第十四师团分两路向西进犯。一路3000余人，于11月24日，由保定和易县出动，在飞机掩护下向涞源进犯。其中由易县西犯之敌于12月2日进占大尤华。该敌由于沿途遭我游击队袭扰，已十分疲惫，疏于戒备。据此情况，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

以一部于当日夜袭击大龙华，一举突入镇内，与敌展开巷战，激战一夜，歼敌200余人，残敌100余人逃回易县。而由保定西犯之敌则为我骑兵营阻止于满城附近。与此同时，由定县、新乐向曲阳、行唐进犯之敌1000余人，于高门屯和豆家庄遭我第四支队的有力阻击。于是企图进占曲阳之敌退回保定。由新乐出动之敌在进占行唐后，也停滞不前。至此，由平汉铁路西犯之敌遂停止向我边区腹地进犯。

由同蒲铁路东犯之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 1400 余人由应县出动，在占领浑源后继续向广灵进犯。为打击该路进犯之敌，11月27日，我第一支队以主力于浑源、广灵间之乱岭关的道路两侧高地设伏。当敌进入伏击区时，我军突然向运动之敌发起猛攻，经数小时激战，歼敌 200 余人，随即主动撤出战斗。敌进占广灵县城后未敢冒进。

由平绥铁路南犯之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以 3400 余人，由怀来、天镇分两路南犯，并于 12 月 4 日占领蔚县后，分别向广灵、涞源进犯。5 日，我第一支队主力一部占领蔚县南之北口村，截击由蔚县南犯之敌。当敌进入该地谷口时，我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袭击敌人，并乘敌混乱之际发起冲击，经半日激战，歼敌 200 余人，迫敌退守蔚县。

在反围攻作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于 12 月 5 日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晋察冀边区反围攻作战应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处于我包围中；在确实有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歼灭和有力打击；同时要求第一二、第一二九师在同蒲、正大铁路上积极活动，予以有力的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遵照上述指示，积极在敌远近后方活动，抓住有利战机打击敌人。

12 月 14 日，我第二支队乘代县、原平、忻口之敌第一九师团一部 1000 余人进占繁峙，后方空虚之际，夜袭原平镇，一举攻克该镇，歼敌 100 余人，残敌分向代县、忻口逃窜。此时进占繁峙之敌迅速回援，我第二支队随即转移。

12 月中旬，正太铁路之敌第五、第一九师团备一部共 4000 人，分别向平山、盂县进犯，在我第三支队与群众武装连续打击下，十分疲惫。晋察冀军区首长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令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由五台西南之东冶镇进至平山以西之洪子店地区，协同第三支队伺机打击进犯平山之敌。15 日，敌第一九师团一部 1500 余人，由寿阳、平定出动合击盂县。我第三支队集中主力于盂县东南地区隐蔽待机，当由平定出动之敌进至清城镇时，该支队乘其立足未稳，突然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歼敌 200 余人，尔后主动撤出战斗。同日，第三四四旅以第六八七团一部，于小寨地区设伏，击退由井陘北犯之敌，歼其 100 余人。21 日，敌第五师团之第二十一联队 1000 余人由平山出动，继续向温塘地区进犯。第三四四旅主力与第三支队一部，于温塘地区占领有利地形伏击该敌，当敌进入我伏击地域时，即以优势兵力对敌突然展开猛攻，敌顿时陷于混乱，经数小时激战，歼其 400 余人，余敌逃回平山，未敢复出。

为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的反围攻作战，我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各以一部，分别对同蒲铁路北段和正太铁路沿线展开破袭战，调动围攻晋察冀边区之敌回援其交通线。至 12 月 21 日，围攻晋察冀边区之敌，除一部兵力占据蔚县、广灵、浑源、定襄、盂县、平山和行唐等县城外，大部退回铁路沿线。至此，反围攻作战胜利结束。是役，晋察冀地区军民共歼敌 2000 余人，缴获部分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

这次反围攻作战，是在根据地建立不久，主力部队少，群众抗日武装缺乏战斗经验等不利条件下进行的。但由于晋察冀军区部队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充分地动员与组织群众，采取军民结合，主力部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实行坚壁清野和封锁消息；同时采取“以老带新”。以部分老部队为骨干带领新部队和群众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消耗疲惫

敌人，主力则避免正面抵抗，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抓住有利战机，歼击敌之一路，并向进犯之敌的远近后方行动，寻机打击敌人，并在友邻第一二、第一二九师积极配合下，粉碎了敌之围攻。反围攻作战的胜利，进一步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使边区所辖发展到 30 余个县，部队发展到 2 万余人，并为尔后反围攻作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向平汉、正太、同蒲铁路线出击， 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1938 年 2 月初，侵入山西之敌以第二十师团沿同蒲铁路南下，向临汾、风陵渡进犯，威胁潼关，以第一九师团沿汾（阳）离（石）公路向晋西黄河渡口进犯；与此同时，以第一八师团由平汉铁路线上之邯郸沿邯（郸）长（治）路西犯，配合第二十师团夺取晋西南。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部队，大部退至晋西南，部分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在此形势下，八路军总部于 2 月 4 日，令所属部队向敌占之平汉、正太、同蒲等铁路线出击，打击和钳制敌人，断敌交通补给，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晋察冀军区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即部署各军分区向平汉、正太、同蒲等铁路之敌出击。9 日夜，第三军分区部队分路破击平汉线保定至新乐段，先后攻占定县、望都、新乐三县城，袭入满城、保定及方顺桥、清风店等车站，毙伤敌 500 余人，破坏铁路 50 余公里，焚毁新乐等 6 处火车站，使平汉铁路北段交通一度中断。与此同时，第一、第二、第四军分区部队，分别攻占了蔚县的九宫口、北口，袭击了浑源、忻口、原平、崞县、代县和井陘等城镇，毙伤敌军一部，给同蒲、正太铁路沿线之敌以有力打击。此次作战，由于我军多采取夜间突然攻击，因而使敌措手不及，损失甚大，达到了牵制敌人、援助友军的目的。

击退日军对冀西地区的进犯

敌遭我打击后，于 3 月 4 日，调集 1.2 万余人，由易县、满城、完县和曲阳等地分别出动，再次进攻晋察冀边区，先后进占了大龙华、倒马关、党城和阜平等地，沿途疯狂烧杀，仅在阜平一地即杀害群众 200 余人。晋察冀军区依照八路军总部关于“采取拖疲敌人”和向敌侧后机动打击敌人的指示，令主力先机转向进攻之敌侧后，在曲阳、阜平间的党城等地设伏，先后毙伤敌 200 余人。与此同时，各游击队在敌后方交通线昼夜袭击敌人，使敌首尾难以相顾，疲于应付。10 日夜，敌军撤退，我军乘胜追击，于曲阳北之南庄又毙伤敌 200 余人。

3 月中旬，敌以第一一四师团一个联队，由易县经紫荆关进攻涞源，企图打通易县、涞源公路，建立封锁线，割裂我根据地，并阻止我军向北平以西地区发展。21 日，敌占紫荆关后，随即以 500 余人进占王安镇。25 日拂晓，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以主力一部，出敌不意袭击王安镇，经两小时激战，共毙伤敌 400 余人，尔后我军主动撤出战斗。敌在增兵后于 27 日进占涞源。我第一支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以一部围困袭扰涞源之敌，以主力向涞源、王安镇间敌之交通线频繁出击。4 月 3 日至 10 日，仅在二道河、佟川、浮图峪 3 次伏击战中，即毙伤敌 300 余人。进占涞源之敌由于后方交通补给断绝，遂于 4 月 11 日夜弃城东逃易县。我军乘胜收复涞源县城，并在追击中歼其一

部。经 20 余天作战，晋察冀军区部队共毙伤日军 1400 余人，打退了敌之进犯，巩固了冀西抗日根据地。

由于我军多次打退敌之进攻和向敌占交通线的出击，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地区日益扩大，成为向平西、平北和冀东发展的重要战略基地，成为威胁敌华北指挥中枢北平、天津和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条铁路交通线的坚强的敌后抗日阵地。

二、第一二 师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围攻

(参见附图 7)

晋西北地区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线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联系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1937 年 9 月中旬，日军侵入这一地区。为开展该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即指示第一二 师开赴以管涔山脉为中心的晋西北，展开于大同、太原之翼侧，并向绥远发展。第一二

师遵照这一指示于 9 月下旬进入宁武、神池地区，即一面以主力侧击沿同蒲铁路南进之敌，配合友军作战；一面以教导团和师政治机关等共 700 余人组成工作团，在师政训处主任关向应（11 月 2 日后任师政治委员）率领下，分赴朔县、偏关、临县、岚县等 14 个县。同时，以雁北支队挺进平鲁、左云、右玉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和进行群众工作。工作团到达各县后，在当地统一战线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配合下，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收容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动员群众，组织工、农、青、妇等抗日救国会，争取乡村各阶层及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工作；建立各级战地动员会，执行合理负担的政策，从而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经一个多月的发动与组织群众，各县先后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脱离生产的自卫军，总人数达 1.1 万余人。太原失陷后，地方工作团随师主力进至汾阳、离石地区和晋中平原，进而在晋西北全境展开。至 1938 年初，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一二 师由出征时的 2 个旅 3 个团共 8200 余人，扩大到 2 个旅 6 个团共 2.5 万余人。雁北支队也由 1 个营扩大为 5 个营。同时，将神池、五寨地区的游击队编成了独立第一支队。

开展同蒲铁路北段破袭战

1938 年 2 月中旬，第一二 师根据八路军总部关于配合友军作战、破袭敌占交通线的命令，决心以师主力对同蒲铁路阳曲至忻县段展开破袭战，并令第三五八、第三五九旅主力于 17 日在忻县平社以西三交、岔上一带集结。18 日，破袭战开始。第三五九旅首先袭击平社车站，歼敌一部，占领该车站，切断敌之铁路交通，接着，向东发展进攻，连克铁路沿线及其附近要点豆罗村、麻会镇、关城镇及石岭关等地。敌为恢复该段交通，由忻县出动 800 余人，由高村出动 200 余人，向在关城镇、石岭关地区的第三五九旅进攻，但均被击退。与此同时，第三五八旅主力于平社以南之黄岭村附近设伏，击毁敌南行军运列车，歼敌一部。敌为寻求报复，由阳曲出动 700 余人经高村向

第三五八旅进攻。该旅于河庄、田庄地区将敌击溃，并乘胜追击至高村车站附近。在此期间，第三五八旅还以一部兵力连续袭扰太原城郭及飞机场之敌，造成敌之恐慌。经 10 天奋战，第一二 师攻占平社、田庄等车站 7 处，炸毁敌军运火车 3 列、汽车 10 余辆，破坏桥梁 8 座，拆毁铁路 10 余公里，歼敌 500 余人，切断了同蒲铁路北段的交通，有力地配合了友军作战，对敌占之大同、太原和同蒲铁路北段交通构成严重威胁。

粉碎日军首次围攻，收复七城

八路军第一二 师在晋西北的展开和对同蒲铁路北段的破袭战，使敌之后方受到严重威胁。

敌为摧毁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消灭或驱逐我军，解除其后顾之忧，并配合其对晋南的进攻，于 2 月下旬，乘第一二 师主力于同蒲铁路北段作战之际，以驻蒙军第二十六师团、华北方面军第一 九师团及伪蒙军备一部共 1 万余人，由平绥、同蒲铁路和太（原）汾（阳）公路沿线各据点出动，分五路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攻。21 日至 28 日，敌第二十六师团以 1 个联队由朔县出动，攻占宁武、神池、保德和五寨；另以 1 个联队由朔县出动，攻占偏关、河曲，并西渡黄河侵占府谷；以伪蒙军一部占领清水河后，南下与偏关之日军会合，以第一 九师团一部 2000 余人由汾阳进占离石后，继续向黄河东岸的军渡、碛口进攻；以第一 九师团另一部由文水、交城出动，进占岔口、古交、河口地区，并向娄烦进犯。当时在晋西北偏关、兴县、临县、静乐和宁武等地区，虽有晋绥军 4 个军，但除第三十五军对进犯方山、临县、娄烦之敌稍作抵抗外，其余均先后撤退。

为粉碎敌之围攻，第一二 师首长除今留在根据地内的部队和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袭扰、疲惫敌人外，率师主力于 28 日由同蒲铁路北段星夜回师根据地，并以第三五九旅主力进至奇岚地区，阻击五寨南犯之敌；以第三五八旅主力进至离石、破口以北地区，侧击企图渡河西犯之敌。3 月 2 日，军渡、碛口之敌突然东返离石，并北犯方

山、临县。接着府谷之敌退至河东保德，五寨之敌则继续南下占领岢岚。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 6 日电示第一二 师，指出：“敌分五路包围一二师及傅作义军，企图压迫我军渡河情况已明，但每路敌

力均不大，我贺师应与傅作义协力各个击破之。”“如觉王旅和张旅单独作战不能击破敌之一路，而集中则确能击破一路，则以集中打一路为合宜”，“目前重点在坚决击破正向静乐、方山、五寨三点前进之敌，必须击破此三路中之一路或两路，方能破坏敌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他区域之作战。”据此，第一二 师首长决心集中 4 个团的优势兵力首先打击深入五寨、岢岚孤立突出的一路敌军，尔后向神池、宁武方向发展。

3 月 7 日，第一二 师首长令第三五九旅（欠第七一九团）和当地游击队，采取围困战，将守敌第二十六师团步兵团第十一联队 1000 余人围困于岢岚城内，并断其交通补给和水源，迫其弃城突围，尔后于运动中歼灭之；令第三五八旅向岢岚东北机动，准备截歼弃城逃窜之敌，令警备第六团、雁北

傅作义军，系指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司令傅作义所指挥的第三十五军等部队。

王（震）旅即第三五九旅，张（宗逊）旅即第三五八旅。

支队、独立第一支队、师骑兵营、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团、决死第四纵队及地方游击队，分别在保德至神池之间和朔县以北以及宁武外围，袭扰牵制日军，配合主力作战。侵入岢岚之敌在我第三五九旅及地方游击队围困和连续袭击下，补给特别是水源断绝，而且待援无望，遂于3月10日15时弃城突围北逃。第三五九旅立即跟踪追击。当夜该敌逃至三井镇，第三五九旅趁敌立足未稳，连夜向敌发起攻击，歼其一部，大部敌人退守该镇北端房屋顽抗。次日晨，第三五九旅再次发起攻击，毙伤敌200余人，余敌仓惶逃入五寨县城。

岢岚之敌逃至五寨后，该地守敌兵力达1000余人，而且城墙坚固，并有义井镇、三岔堡等地之敌策应。据此，第一二师首长遂以第七一八团及地方游击队围困五寨；以第三五八旅主力进至义井镇与神池间地区，以第三五九旅主力进至五寨、三岔堡之间，待机歼敌于运动中。17日，当第三五八旅进至义井镇以南的虎北村、山口村地区时，与由神池南下增援五寨之敌1000余人遭遇。该旅迅即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展开，居高临下，向敌多次冲击，经6小时激战，歼敌300余人，并乘胜追击逃敌至义井镇附近。接着，第三五九旅又击退由三岔堡增援五寨之敌。五寨之敌遂完全陷于孤立。与此同时，我警备第六团、雁北支队及各地方游击队，对敌后交通线不断进行破袭，使侵入晋西北根据地内之敌补给困难，处境日益不利。因而，自3月20日起，偏关、河曲、保德、五寨之敌，先后弃城东撤。我军收复四城，并乘胜截歼撤退之敌。21日，当保德、三岔堡之敌向神池撤退时，我第三五九旅主力于田家洼截歼该敌一部，余敌逃至义井镇。22日夜，集结于义井镇之敌共3个大队，继续向神池撤退。我第三五八旅主力于凤凰山附近伏击歼敌300余人，余敌连夜逃向神池。我军遂跟踪追至神池，并以一部越过神池进至大水口及阳方口以西地区，断敌退路。神池之敌在其退路受到威胁下，于23日弃城逃往朔县，我军遂收复神池。

我军收复神池后，侵入晋西北根据地之敌，除宁武县城尚有1500余人外，其余均已被击退。在此情况下，第一二师首长决心乘胜歼灭宁武之敌。遂以第七一六团及第七一八团第二营围困宁武县城，以第三五八、第三五九旅主力集结于宁武至阳方口之间的石湖河地区，伺机歼灭撤退或增援之敌。31日，朔县之敌步骑兵共6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经阳方口南犯，企图接应宁武之敌突围。10时许，当敌进至石湖河与麻峪附近时，第三五九旅突然发起攻击，该敌仓惶据守石湖河有利地形顽抗。宁武之敌500余人，乘机出城反扑，威胁第三五九旅侧背。这时，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立即主动向出城反扑之敌出击，并与第三五九旅形成对敌夹击之势。激战至黄昏，宁武之敌退守城内，石湖河之敌窜回阳方口，我军共毙伤敌300余人。宁武之敌见待援无望，遂于4月1日晚乘夜暗分路沿铁路线北窜。我军立即发起追击，又于石咀子、石湖河附近歼敌后尾一部。余敌经阳方口逃往朔县，我军收复宁武县城。

至此，反围攻作战胜利结束，第一二师共歼敌1500余人，缴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收复宁武、神池、五寨、岢岚、保德、河曲、偏关等7座县城。

此次反围攻作战，由于我军贯彻集中主要兵力击破敌之一路，而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其他各路，选择深入腹地孤立突出的一路为主要攻击目标，采取围困战，断敌补给和水源，迫敌出逃，于运动中歼灭之等项原则，因而取

得反围攻的胜利。这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增强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信心，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而且对保卫陕甘宁边区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第一二九师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粉碎日军“九路围攻”

(参见附图 8、9)

晋冀豫边区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敌之主要交通线，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和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1937年9月下旬，在日军占领保定、继续南犯威胁正大铁路的情况下，中央军委电令第一二九师主力速开正太铁路以南地区。10月中旬，该师挺进晋东南平定地区后，随即以主力侧击沿正太铁路西进之敌，同时，以教导团第五连及部分干部在太谷、榆次、阳泉、昔阳、和顺等县开展群众工作。11月初，又派骑兵营深入冀西的临城、赞皇地区展开群众工作。11月13日，第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体布置了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会后，由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等率领工作团和部分武装，分别到沁县、长治、晋城、武乡、襄垣、平顺、沁源、安泽、屯留等地，同当地中共组织紧密结合，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和抗日自卫队，镇压汉奸，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进行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政策。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全区掀起了参军的热潮，至12月，以该师教导团及部分连队为骨干，先后成立了秦（基伟）赖（际发）支队、八路军游击支队、先遣支队、谢（家庆）张（国传）大队、汪乃贵支队、赵（基梅）涂（锡道）支队等抗日武装，并不断袭击日军据点和交通线，曾一度中断敌之平汉铁路的交通运输。

我军在晋冀豫边区的展开，给敌造成严重威胁。敌第一军为保障其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遂调集步骑兵5000余人，于12月22日由太谷、榆次、寿阳、阳泉、平定、昔阳等地出动，分六路向寿阳东南之花泉地区围攻，企图歼灭或驱逐我军。我第一二九师遂以第三八六旅之第七七二团，于花泉、松塔及南北军城等地，在内线予敌以打击，以第七六九团等部转移至昔阳以西之西寨、沾尚等地，在外线袭击敌人。在我内外线部队打击下，敌被迫于26日撤退。是役我军共毙伤敌700余人，为开创晋冀豫边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第一二九师还以教导团的部分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越过平汉铁路进入冀南地区，与中共当地组织取得联系，尔后于1938年1月初又以6个连兵力组成东进纵队，由第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率领挺进冀南，加强冀南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为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2月初，该师在辽县（今左权）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总结了太原失陷以来该师的工作，进一步部署开展全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根据会议的决定，首先以新建的补充团南下，协同赵涂支队开辟太行山南部及道清铁路沿线地区。并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以新扩建的骑兵团由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率领东进冀南，协同先期到达的东进纵队和当地中共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创建与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2月下旬，在日军向晋南进犯时，第一二九师又

派出部分军政干部，协同中共晋豫边特委建立了晋豫边游击支队，开展该地区的游击战争。至此，晋冀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全面展开，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正太铁路破袭战

为钳制与打击向晋南、晋西进攻之敌，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总部于1938年2月18日令第一二九师和第三四四旅，向正太铁路阳泉至井陘段出击。据此，第一二九师首长决心以第七六九团袭击井陘至阳泉间的敌军重要据点旧关，诱井陘之敌出援；以第三八六旅主力于井陘、旧关间之长生口设伏歼灭该敌；以第三四四旅主力袭击正太铁路上娘子关至井陘间之敌军据点。2月21日夜，第三八六旅以主力于长生口附近占领伏击阵地。22日拂晓，第七六九团一部袭入旧关并将敌军包围。井陘之敌闻讯，以200余人乘汽车8辆出援。当该敌通过长生口附近时，我伏击部队突然发起攻击，经激战，毙敌130余人，击毁汽车5辆，缴获迫击炮3门。与此同时，第三四四旅袭击娘子关至井陘间之敌军据点，毙伤守军200余人，一度切断正太铁路交通。正太铁路彼袭战，有力地牵制了敌军，支援了友军。

邯（郸）长（治）路破袭战，神头岭和响堂铺战斗

当第一二九师主力出击正太铁路时，敌第一八师团由邯郸经东阳关沿邯（郸）长（治）路西犯，并于2月20日进占长治，企图夺取临汾，配合沿同蒲铁路南下之第二十师团消灭退至晋南的国民党军。为了打击和钳制沿邯长路西犯之敌，第一二九师遵照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迅速南移的电令，于3月上旬进至襄垣东南地区，伺机破袭邯长路，打击西犯之敌。

邯长路是进占长治之敌从平汉铁路取得补给的主要交通线。因此，敌在线上各要点均驻兵防守。位于该线上的黎城，是敌重要兵站基地。而黎城与潞城之间系丘陵地带，便于我军选择伏击阵地。第一二九师根据当面敌情、地形，决心“攻其所必救”，袭击黎城，吸引潞城之敌出援，于潞河村与微子镇之间的神头岭地区伏击歼灭该敌；并相机打击由涉县出援之敌，以钳制沿邯长路西犯之敌第一八师团，支援晋西、晋南友军。其部署，以第七六九团一部袭击黎城，以该团主力于东、西黄须伏击由涉县来援之敌，以第三八六旅（辖第七七一、第七七二及补充团）于神头岭设伏，歼灭由潞城来援之敌。并限各部于3月16日拂晓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

16日4时，第七六九团第一营袭入黎城，在歼敌100余人后，即于拂晓前主动撤出黎城。该团主力亦于东、西黄须击退由涉县来援之敌。与此同时，第七七一团特务连烧毁黎城西南赵店镇的大木桥，切断黎城、潞城之间的交通。在我军袭击黎城时，潞城之敌以步骑兵1500余人向黎城增援。9时30分，当该敌全部进入神头岭我军伏击阵地时，第三八六旅突然向敌发起攻击。第七七一团于神头岭北端迎头截击敌人；第七七二团、补充团从公路两侧对敌实施夹击，并以一部切断敌之退路。日军遭此突然袭击，加之兵力兵器受地形限制难以展开，顿时陷于混乱，死伤惨重。经激烈战斗，大部被歼，一部窜入神头村内，凭借房屋、窑洞负隅顽抗。战至11时13分，进入神头岭之敌除100余人窜回潞城外，其余均被歼灭。此后，潞城、黎城之敌虽又连

续出援，但均被阻援部队击退。是役，第三八六旅共歼日军 1500 余人，俘敌 8 人，击毙与缴获骡马 600 余匹，缴获长短枪 550 余支，我军仅伤亡 240 余人。

神头岭伏击战是我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之后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战。这次战斗，由于我军准确掌握敌情，适时定下“攻其所必救”、“吸打敌援”伏击歼敌于运动中的正确决心；注重现地勘察，巧妙利用地形，正确选择伏击阵地，进行严密伪装，同时，周密部署和使用兵力，采取三面伏击，形成“口袋”，因而收到了隐蔽突然、出敌不意、速战速决之效。

为进一步打击沿邯长路西犯临汾之敌，支援晋西南友军作战，第一二九师首长根据掌握的敌情，决心以主力干涉县西南之响堂铺，伏击敌往返之运输部队，断敌前方补给。其具体部署：以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全部和第七六九团主力，预伏于响堂铺公路以北之后宽漳至杨家山东西长 5 公里的一线山地，以一部伏于公路以南之山脚下，阻止敌军抢占南面高山，以第七七二团全部及第七六九团一部，阻击由黎城和涉县可能来援之敌，并掩护伏击部队侧后的安全。3 月 31 日 8 时，敌辎重部队汽车 180 辆及其掩护部队，由黎城经东阳关向涉县开进。9 时许，敌军车队开始进入伏击圈。我第七七一团放过前 100 余辆汽车，让其进至第七六九团伏击区，待其余汽车全部进入伏击区时，在副师长徐向前统一号令下，两个团以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同时向敌实施猛烈的火力袭击，随即冲向公路，以刺刀、手榴弹消灭敌人。敌仓惶应战，有的迫击炮、机枪还未及开火，即被击毁。经 2 小时激战，敌除 30 余人逃窜外，余均被歼。与此同时，由黎城、涉县分别出援之敌，亦被我阻援部队击退。此次战斗，我军共歼日军少佐以下 400 余人，毁敌汽车 180 辆，缴获长短枪 130 余支、迫击炮 4 门，以及其它大批军用物资。由于战前后方勤务工作组织得好，以及民兵和群众随同部队打扫战场，迅速转移缴获物资，因而当战斗结束后 2 小时，10 余架敌机来袭时，我已安全转移。这次战斗决心正确，部署得当，动作勇猛，速战速决，并迅速打扫战场和安全转移，以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第一二九师在正太铁路和邯长路上连续取得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等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日军，支援了晋西、晋南的友军。

粉碎日军“九路围攻”

侵入晋东南的日军遭连续打击后，为消灭或驱逐八路军等部，以保障其后方安全，决定于 4 月初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围攻。八路军在获悉敌这一企图后，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于 3 月 24 日至 28 日召集了东路军将领会议。会上根据敌准备对晋东南地区围攻的企图，研究和统一了反围攻的作战方针，决定以一部主力在地方部队、游击队的配合下，钳制进犯的各路敌军，集中主力寻机歼灭敌之一路，以粉碎敌之围攻。并确定了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各部的部署和任务，以及动员群众和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4 月 4 日，敌华北方面军第一军集中兵力 3 万余人，由同蒲、正太、平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176，180 页。

1938 年 2 月，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将在山西的部队分为东、南、北三路军。东路军以八路军为主，包括部分国民党军队，朱德任东路军总指挥。

汉铁路线及长治、屯国等地出动，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企图以分进合击歼灭八路军总部、第一二九师等部和部分国民党军，并摧毁抗日根据地。敌以第一八师团为主刀，由长治、屯留及平定各出动1个联队，分三路向沁县、武乡和辽县进攻，以第二十师团1个联队由洪洞向沁源进攻，以第一九师团1个联队和另2个大队，由太谷、祁县和榆次出动，分两路向沁县和马坊进攻，以第十六师团一部由元氏、赞皇、邢台以及涉县出动，分三路向九龙关、浆水镇和辽县方向进攻。

当各路敌军开始出动时，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和第三八五旅之第七六九团及第三四四旅之第六八九团，由辽县以南转移至敌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机；今留在内线的我军各部和协同作战的国民党军各部，按预定的部署、任务，以游击战和运动防御战消耗与疲惫敌人，阻止敌军深入，为转入外线的部队创造战机；同时，令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师各以部分兵力向平汉、正太、同蒲等铁路线出击，钳制敌军，配合晋东南地区军民的反围攻作战。

至10日前后，由榆次出犯之敌，被第一二九师独立支队阻滞于阔郊、马坊一带；由祁县、太谷出犯之敌被防守该地的国民党军第九十四、第一六九师与八路军游击队，阻止于东、西团城地区；由洪洞出犯之敌，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和国民党第十七军等部阻击于沁源地区；由屯留、长治出犯之敌，由于国民党第三军败退，迅速侵入我晋东南根据地腹地之沁县、武乡和襄垣、辽县；由涉县出犯之敌，被国民党军骑兵第四师阻滞于麻田地区；由邢台出犯之敌，被第一二九师先遣支队等部阻滞于浆水镇以东，由元氏、赞皇出犯之敌，被第一二九师游击支队和当地游击队阻滞于九龙关以东地区，由平定、昔阳出犯之敌，在第一二九师秦（基伟）赖（际发）支队、汪（乃贵）支队和第一一五师第五支队等部坚决阻击下，多次变更进攻路线，于14日才进至辽县、芹泉地区。至此，六路敌军均被阻止，只有第一八师团3个联队分三路侵入晋东南根据地腹地。但该敌连续作战，已相当疲惫。并且孤立、突出。在此情况下，八路军总部抓住有利时机，即令转入外线的第一二九师主力及第六八九团，迅速由涉县以北隐蔽地返回武乡以北地区，伺机歼灭侵入武乡的疲惫孤立之敌。

4月15日，侵占武乡县城之敌第一八师团第一一七联队3000余人，北犯榆社扑空后，仓惶撤回武乡，并于当日黄昏放弃武乡连夜沿浊漳河东撤。在此情况下，第一二九师首长决心以转回内线的4个主力团，迅速发起追击，歼灭该敌于运动中。具体部署：以第七七二团和第六八九团为左纵队，以第七七一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实施平行追击；以第七六九团沿武乡至襄垣大道尾追敌人。16日晨，我在敌两侧实施平行追击的部队超越敌人，在武乡以东长乐村将敌大部截住，并迅速发起攻击。第七七一团和第七七二团各以一部份别向型村、李庄突击，以猛烈火力袭击拥挤于道路上的敌军，并将敌行军纵队分割为数段。随之，各部队勇猛冲向敌群，与敌展开激烈搏斗。这时已过长乐村之敌1000余人，为解救其被围部队，向我第七七二团之左翼戴家垆阵地猛攻。防守该地的第十连与敌激战4小时，打退敌多次冲击，其中1个排全部壮烈牺牲，阵地被敌攻占。12时，我第六八九团赶到该地，向敌展开猛烈反击，经反复冲击，将阵地夺回。14时，由辽县来援之敌第一五联队1000余人，向我第六八九、第七七二团阵地猛攻，但均被我军阻止，而被围于长乐村以西之敌，也已悉数被歼。这时，发现辽县之敌又以1000

余人来援，我第一二九师首长遂决定以一部迷惑、钳制敌人，掩护主力撤出战斗，转移至云安村、合壁村等地区隐蔽待机。此次战斗，我军共歼日军 2200 余人，自己伤亡 800 余人。第七七二团团团长叶成焕光荣殉国。长乐村战斗的胜利，对粉碎敌之围攻起了决定性作用。此后，各路敌军纷纷撤退，我第一二九师等部乘胜转入追击，在沁源以南及沁县、沁源间，在辽县、和顺间，又各歼敌一部。27 日，盘踞长治之敌第一八师团向南撤退，当其窜至长予以南的张店等地时，又遭我军截击，被歼近 1000 人。至此，敌之“九路围攻”遂被彻底粉碎。是役，历时 23 天，我军共歼敌 4000 余人，收复县城 18 座。从而使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为我军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反围攻作战中，第一二九师针对敌之企图，采取了内线与外线、广泛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贯彻了“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的原则，首先选择对粉碎敌之围攻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已被削弱的敌之主要一路，适时集中兵力，于运动中歼灭之。从而取得了击破敌之主要一路，震撼其他各路，粉碎敌之围攻的效果。

第一二九师经过 5 个月的作战，不仅粉碎敌人多次进攻，而且使部队获得了大发展，由出征时 3 个团，发展到 6 个团另 6 个游击支队。4 月下旬，成立了晋冀豫军区，倪志亮兼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下辖 5 个军分区。

四、第一一五师主力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午城、井沟战斗

(参见附图 10)

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和联系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纽带。在太原失陷前，毛泽东即指出：对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八路军应作适当部署，第一一五师师部和第三四三旅，应立即向该区转移。据此，八路军总部于 1937 年 11 月 9 日令第一一五师由正大铁路南进，适时转向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由于国民党阎锡山部的无理阻挠，第一一五师于 12 月进抵赴城、洪洞地区后，即停止向吕梁山开进。1938 年 2 月中旬，日军第二十师团由祁县向晋西南发起进攻，先后侵占介休、孝义等地。国民党军纷纷退向晋南和黄河西岸，吕梁部分地区已成为敌后。此时，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立即进至灵石、孝义以西地区，打击南犯之敌。2 月 19 日，第三四三旅分别袭击孝义以西之兑九峪、辛庄，并于兑九峪附近侧击由孝义西进之敌汽车 40 辆，歼敌一部，随即于 20 日收复大麦郊。21 日至 22 日，该旅主力在川口附近与由双池镇西犯之敌 1600 余人遭遇，我军毙伤敌 200 余人，阻止了敌之西进。同时，派出地方工作队赴石楼、永和等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抗日武装，开创抗日根据地。

2 月 26 日，敌第二十师团一部南下占领隰县。27 日，敌第一九师团西犯占领军渡、碛口。我陕甘宁边区黄河河防受到威胁。28 日，毛泽东电示第一一五师：“敌从军渡、碛口两点猛击河西，准备渡河，绥德危急”，应“迅速以一部控制大麦郊、水头、川口、石口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

巩固战略枢纽”，并“派出足够的工作人员，大力发动石楼、永和两县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渡河点”，“主力应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寻机作战，相机消灭该敌。”遵照这一指示，代师长陈光（3月2日，林彪在隰县以北为国民党军哨兵误伤，回延安治疗）、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师主力于3月3日进至隰县午城镇附近。

3月14日12时许，第一一五师先遣分队在午城镇以东地区，与由蒲县西犯之日军步骑兵1000余人预期遭遇。先遣分队按作战预案先敌展开，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开火，经两小时激战，毙敌100余人后，主动转移至午城西北高地，继续钳制敌人，掩护主力进至机动位置。14时许，敌进占午城，并继续西犯进占大宁。16日，我第三四三旅主力隐蔽于大宁以东之罗曲、午城、井沟公路两侧，待机歼敌。当日，敌辎重部队200余人，骡马100余匹，由午城西进至罗曲村附近时，被我第六八五团全歼。17日，蒲县之敌汽车60余辆，向大宁运送物资，当其进至井沟以西地区时，我预伏于该地的第六八六团突然向敌出击，歼其200余人，缴获汽车6辆，余敌西逃午城。同日，第六八五团于罗曲村将由大宁出来接应其辎重车队的敌军500余人击退。17日夜，第三四三旅又以一部兵力袭击敌兵站要点午城镇。进攻部队潜入镇内，突然发起攻击，毙敌50余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60余支，烧毁敌汽车10余辆，余敌乘夜暗突围逃窜。

第一一五师首长判断，敌遭此打击后，其主力必来报复，遂以第六八六团和汾西游击队预伏于井沟至张庄公路两侧高地，歼灭由蒲县来犯之敌；以第六八五团于午城南北高地阻击由大宁出援之敌。18日，敌第一八师团步骑兵8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由蒲县出动，进犯午城。14时许，其先头部队进至井沟地区，并加强搜索警戒，向公路两侧高地实施火力侦察，但我预伏部队沉着隐蔽，待其后续部队全部进入伏击圈时，突然发起攻击，敌顿时陷于混乱，一部窜入井沟、张庄据守，一部占领张庄以南地域顽抗。我军遂迅速调整部署，乘敌立足未稳，对其展开围歼战。这时，敌机6架轮番轰炸扫射，投弹100余枚；同时，被围之敌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疯狂反扑，企图突围，战斗异常激烈。我第六八六团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战斗，终于打退敌之连续冲击。当晚，第三四三旅在游击支队的配合下，再次向敌发起猛攻，并以小分队组成战斗群，逐个歼灭隐藏于窑洞的小股敌人。战至19日拂晓，敌除100余人逃窜外，余均被歼。在14日至18日的5昼夜战斗中，我军共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10余人，毁敌汽车79辆，缴获步枪200余支、机枪9挺、山炮2门，以及其它大批军用物资，缴获和击毙骡马800余匹。午城、井沟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切断了蒲县至大宁段的交通，迫使大宁之敌东撤，从而粉碎了敌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对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和巩固陕甘宁边区河防都有重要意义。

五、粉碎日军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

陕甘宁边区地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南临泾水、东靠黄河，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老根据地。在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这里就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抗战爆发后，它是全国人民抗日的政治指导中心，是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和总后方。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辖23县，面积1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在

八路军主力挺进抗日前线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一五师炮兵营、辎重营，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之第七一八团，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欠第七六九团），及该两师之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共 9000 余人留守陕甘宁边区，归总留守处指挥，担负保卫边区的任务。10 月 2 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将各国守部队统一整编为警备第一至第七团，尔后又将第七一八团改为警备第八团。同时，成立了边区保安司令部，下辖保安基干大队和各县保安队、警卫队等，并组织了大批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为进一步安定社会秩序，巩固边区，留守部队继续对流窜于边区境年的残余土匪进行了清剿，先后消灭数十股土匪，基本肃清了边区匪患。12 月，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改称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在此期间，留守部队配合边区政府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抗战动员，建立工、农、妇、商、青年等各抗日救国会；实行民主政治，全边区选民 70% 以上参加普选，选出了边区、县、区、乡各级参议会和各级政府，颁布边区施政纲领，实行减征田赋，动员机关、部队学校进行自给性的生产，使边区经济建设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此同时，边区大力发展政治、军事、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开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由抗日红军大学改称）、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学院等一批干部学校，为抗战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为抗击日军对我黄河河防的进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1937 年 11 月 17 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由神府至宜川以北整个河防划为 3 个地段，分别由神府、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和绥德等五县警备司令部负责设防，萧劲光兼任河防总指挥，并在沿河西岸构筑河防工事和派出小分队至东岸开展游击战争，与第一二师相配合，拒敌于河东，以保障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敌军在对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展开围攻的同时，不断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犯，妄图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并威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中枢的安全。1938 年 2 月下旬，敌第一九师团主力，由太原出动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先后侵占中阳、离石，27 日，进占黄河东岸之军渡、碛口，并猛烈炮击西岸我河防阵地。3 月 13 日，日军第二十六师团 2000 余人进抵神府河防对岸，首先炮击河防阵地，尔后在 10 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强渡黄河。留守兵团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在敌渡河时，以突然猛烈火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并以机动兵力一部，迂回河东，袭击敌之侧背，毙伤其 140 余人。在第一二师积极配合下，迫使进犯河防之敌撤退。4 月，敌第一九师团在离石一带集结兵力，企图再犯河防。5 月初，敌约一个旅团经大武向军渡进犯，企图占领军渡，突破我宋家川河防阵地。我留守兵团为打破敌之企图，令警备第八团主力东渡黄河，进至汾离公路翼侧，寻机打击敌人。5 月 10 日夜，该团在离石城西北王老婆山地区袭击西进之敌，击溃其一个大队，歼其 200 余人。日军遭到我打击后，随即撤退。在河防战斗中，留守兵团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指导思想，防守部队依托黄河天险和工事，以猛烈火力击敌于半渡中；同时，以机动部队大胆渡过河东，迂回敌之侧后，给敌突然打击，有效地挫败了敌之渡河企图，使陕甘宁边区河防日趋巩固。

六、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人民抗日 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华北党组织迅速而切实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宣传、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发动游击战争，保卫华北。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华北各地党组织深入农村，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抗日，并于1937年11月15日在《北方局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华北党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党组织，遵照北方局的指示，并在八路军派出的干部协助下，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山西地区

“七·七”事变前夕，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争取和推动山西军阀阎锡山参加抗日，即决定以薄一波等人组成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在北方局直接领导下，赴山西对阎锡山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经与阎商定，由薄一波等一批共产党员负责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并组建10个国民兵军官（军士）教导团。“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在日军侵入山西、其原有之晋绥军迅速溃败的形势下，遂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协助其建立新军的协议。8月1日，以军官教导团一部为基础，在太原成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相当于团），10月，扩大为第一纵队，由薄一波任纵队政治委员。各级军事干部多由阎锡山委派旧军官充任，政治工作人员由“牺盟会”派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同时，八路军总部亦派遣一部分干部到决死队中工作。接着，决死队第一纵队之第一总队开赴五台地区，协助八路军创建根据地。11月，按照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并取得阎锡山的同意，转至晋东南沁县、沁源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协同八路军开创太岳根据地，并发展成3个总队。随即以第二总队赴洪洞、赵城地区并扩编为决死队第二纵队，张文昂任纵队政治委员，下辖3个总队。1938年2月以后，又以其余教导团为基础，相继成立了决死队第三、第四纵队，各辖3个总队。第三纵队由戎子和任政治委员，活动于晋东南曲沃、翼城等地。第四纵队由雷任民任政治委员，活动于晋西临汾、大宁、临县等地。此外，还先后组建了政治保卫队第二、九、第二一二、第二一三旅和工人武装自卫旅及暂编第一师等部，以上各部统称山西新军。由于新军是由共产党员担任主要领导，并按红军的建军原则建立了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因而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受八路军总部指导的抗日武装。这支抗日武装在协同八路军创建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河北地区

中共河北各地党组织，遵照北方局的指示，先后于冀中、平（北平）西和冀南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冀中地区于保定失陷后，即由中共保属省委组织群众武装，建立了河北游击军。1937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在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领下，拒绝国民党的南逃命令，于晋县小樵镇举义，改称人民自卫军，在中共保属省委领导下，与河北游击军一起开展游击战争。不久，该部开赴冀西阜平整训。

1938年1月，由阜平返回冀中，在河北游击军配合下，积极袭击日军据点，破袭平汉铁路，并连续消灭汉奸土匪武装10余股。2月，人民自卫军一部北进大清河地区，连克新镇及霸县、永清县城。4月下旬，河北游击军抗击交河、献县之日军向河间的进犯，并收复河间县城。与此同时，动员军民大力挖道沟、拆城墙，改造平原地形，以利平原游击战进一步的发展。4月下旬，遵照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指示，成立冀中区党委，接着，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和冀中军区。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任纵队和军区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支队和4个军分区。至此，冀中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七·七”事变后，北平以西地区中共地方组织建立了“国民抗日军”，后改编为游击第五支队。1938年2月，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以第一军分区一部组成游击支队，3月挺进平西，先后攻占懋山堡、门头沟，并击退来援之日军。在游击第五支队等部配合下，将抗日游击战争逐步发展到房山、涿县、涞水、良乡、宛平、昌平等地，建立了3个县的联合抗日政权，组织起1500余人的自卫队，使平西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并成为向冀东发展的出发地。

1937年10月，日军侵入冀南后，中共冀南特委，即组织抗日武装，成立了八路军别动大队、第五路军等部。1937年冬至翌年初，在第一二九师先后派出的挺进支队和东进纵队的协助下，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大力进行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收编和改编了巨鹿、南宫两县保安团（队）和威县、冀县的一部分武装，先后组成了第一团及津浦支队。为进一步打开冀南地区抗战局面，3月中旬，由第一二九师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率领的骑兵团也进至冀南之南宫地区，接连解放了广宗、平乡、曲周等县城及附近广大地区。与此同时，津浦支队向东挺进，于4月中旬，攻占鲁西北之恩县城（今恩城），破袭德州南之黄河涯和津浦铁路桥，有效地牵制了日军，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同月，冀鲁豫省委、冀南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先后建立，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下辖5个军分区。至此，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山东地区

1937年10月上旬，日军占领德州后，中共山东省委随即在济南召开省委会议，制订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同时，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派来一批干部（内有红军干部数十人）作为武装起义的领导骨干。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抗日武装起义如火如荼，遍及山东全省。11月，中共冀鲁边工委在盐山等地领导起义，成立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军，一度攻克盐山、无棣、乐陵和庆云等县城，初步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接着，中共鲁西北特委与国民党山东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实现了共同抗战，并发展了抗日武装，组成了第十支队，初步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12月，中共胶东特委组织领导了天福山起义，组成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推动了胶东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与此同时，中共清河地区党组织领导了黑铁山起义，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活动于小清河以南、胶济铁路南北地区，不断打击敌人。1937年12月底，中共鲁东工委领导寿光、潍县、昌邑等地人民起义，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第八支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了鲁中地区的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活动于新泰、蒙阴、莱芜、淄博等地，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省委部分干部还在泰（山）西组织领导了夏张镇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中共鲁东南（后称滨海）沂水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六大队。3月间，中共苏鲁特委在鲁南地区组织武装起义，成立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接着，中共苏鲁特委和中共鲁西南工委在微山湖西地区组织武装，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上述10次抗日武装起义，为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山西、河北、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对八路军完成在山西展开和创建根据地，是一个有力的策应和支援，并为八路军由山区向平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太原失陷至1938年4月的5个多月中，八路军实现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完成了在山西的展开，在地方党的配合下，创建了晋察冀边、晋西北、晋冀豫边和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先后作战400余次，歼敌2万余人，粉碎了敌对各根据地的多次围攻，钳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友军，并为由山区向平原发展，完成在整个华北的战略展开创造了条件。这是我军正确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是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的结果。然而，这一正确的方针、政策，却遭到右倾投降主义者王明的反对。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1937年12月会议和翌年3月会议上，提出了一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反对我党我军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主张“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王明的这些错误主张，受到毛泽东等许多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因而未在全党占统治地位，亦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节 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军事著作

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一些人轻视游击战争，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争上。同时，国内还有一些人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在国民党内，抗战前就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有人叫嚷“再战必亡”。由于国民党当局推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造成战争失利，因而在国内一部分人民中也产生了悲观情绪。而国民党内另一部分人，则鼓吹“速胜论”，幻想依赖外援迅速结束战争，认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战役胜利后，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此外，共产党内也有人过高地估计中国的力量，过低地估计日本的力量，存在着轻敌思想。

为了阐明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加深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战略意义及其方针原则的理解，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定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讲演。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指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结果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然而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同时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发挥中国农民巨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全国抗战爆发后，朱德于7月15日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9月18日，张闻天撰写了《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一文，对中国抗战的持久性及战争特点作了具体分析。10月16日和11月15日，刘少奇先后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和《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文章，指出：“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目前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并“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作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前途。”11月16日，周恩来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演讲，具体分析了坚持华北持久抗战的可能性，指出“它的持久战，将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开展。”又说：“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争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1938年，朱德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论著。他说：抗日游击战争就是“大众战、民兵战”，“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这一历史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

广泛的斗争方式。”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并集中全党的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重要军事论著，紧接着又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的重要讲演。他科学地分析了抗战以来的战争进程，全面系统地总结了10个月来的抗战经验，驳斥了各种错误思想和观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发展规律和胜利前途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着眼战争的全局，从战略的高度深入考察抗日游击战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而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样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但日本是小国，兵力不足，必然在其占领区中有许多空虚地方，因此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中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的正规战。并且由于有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加，因而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进攻一整套的东西发生了。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于是根据地问题和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些情况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是毛泽东以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实践经验为依据提出的科学创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等一系列具体战略问题，并指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科学论述，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的发生和发展。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国小，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处于进步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唤起全民族同仇敌忾，得到国际上的援助。这些特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指出：“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不利方面，而看不到其他的有利方面，“速胜论”者只看到有利方面，不承认敌强我弱这一特点。他们都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者。

根据对敌我双方存在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对这些因素在战争进程中的发展变化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持久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

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毛泽东为这三个阶段描画了一个轮廓。在敌之战略进攻和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中，日军挟其军事优势大举进攻，占领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和交通线，扩大其领土、人口和资源；同时，由于日军兵力不足，中国的游击战争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也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毛泽东着重地分析了争取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以及相持阶段敌我斗争的形势，指出：第一阶段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这时敌虽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取战略守势，但敌强我弱的形势仍未发生根本转变，所以中国尚难举行战略反攻。相持阶段的时间将是相当长的，战争将是残酷的，中国将会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游击战争能够胜利。这个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中国是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中国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从而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毛泽东在分析战略反攻阶段时指出，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不断增长的力量，同时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根据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状态，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此起彼落的姿态。同时，他还断言：“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大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抗日战争的实际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科学预见。

认识战争发展规律的一个根本目的，在于能动地、正确地指导战争，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在论证了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持久战三阶段的发展规律，以及为什么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之后，进一步阐明了如何进行持久战和如何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以争取战争最后胜利等问题。首先，他正确地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离不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普遍深入的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其次，毛泽东进一步探讨了实行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与原则。指出：在战略上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必须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变战略上的劣势、被动的不利态势为战役战斗的优势、主动的有利态势；而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作战方针，又必须发挥组织指挥上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在作战形式上，要善于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三种不同形式。就全国抗战的三个阶段来说，战略防御和反攻两个阶段是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与阵地战为辅，而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与阵地战为辅。在整个战争中，正规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依靠正规战，尤其是运动战，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其战略作用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即向运动战发展。同时，毛泽东还进一步明确我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此外，他还正确地解决了消耗战与歼灭战的关系以及决战等问题。指出，抗

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用战役的歼灭战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持久战，以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他还根据日军在 10 个月侵略战争中所犯指挥方面的错误 指出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上，毛泽东提出“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指出，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最后，毛泽东进一步突出地阐明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正确地解决了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及其在战争问题上的认识论根源——唯心论和机械论；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

《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和哲学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它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统一和提高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的认识，对全国坚持持久抗战，对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有着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

第四节 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

一、 八路军一部挺进冀鲁平原， 发展敌后游击战争

(参见附图 11)

冀、鲁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平汉、津浦铁路纵贯南北，是日本侵略者竭力争夺与控制的地区。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地区的中共组织，积极发展群众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在八路军派出的先遣部队和部分军事干部协助下，到 1938 年春，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开展起来。同时，八路军经过 7 个月的作战，粉碎了敌人对山区各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完成了在山西“四角”的展开，创建了山区抗日根据地，在山岳地带站稳了脚跟。这些都为八路军主力深入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 年春，日军为了打通津浦铁路，以其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1938 年 2 月由华中方面军改称）各一部，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企图消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主力。为钳制和打击敌人，策应津浦线上的友军作战，八路军总部于 2 月 4 日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积极向平汉、津浦铁路北段发展，打击与钳制敌人，破坏敌之铁路交通。5 日，令第一二九师派得力支队出平汉铁路以东，袭扰津浦铁路沿线之敌。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令第三军分区部队向平汉铁路保定至新乐段出击，令冀中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积极向津浦铁路进击；第一二九师派出骑兵团挺进平汉路东之冀南地区，威胁津浦铁路之敌，策应友军作战。2 月中旬，南进至山东邹县地区的敌华北方面军第二军之第十师团，在其左翼第五师团的策应下，继续沿津浦铁路南下。其先头濑谷支队（以第三十三旅团为骨干）孤军深入，3 月下旬，于台儿庄地区被国民党军第五战区李宗仁部重兵包围。日军迅以第五师团之坂本支队（以第二十一旅团为骨干）由临沂方向南下救援，也遭到国民党军的阻击。激战至 4 月 6 日，台儿庄地区日军近万人被歼。这是继平型关战役之后中国抗战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接着，敌华北方面军又增调第一一四、第十六、第十四师团，协同第五、第十师团由北向南进攻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同时，敌华中派遣军也以第十三、第三、第九等三个师团沿津浦铁路由南向北进攻，企图南北夹击围歼在徐州地区的第五战区主力。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为阻止日军的进攻，集中 64 个师又 3 个旅，以徐州为中心，依托既设阵地，与敌展开会战。当日军基本形成对徐州的包围态势后，为避免不利形势下的决战，国民党军第五战区部队遂放弃徐州，向皖西、豫南、鄂北地区退却。5 月 19 日，日军占领徐州，随即乘胜西进，直逼郑州。为阻滞日军前进，国民党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于 6 月 9 日炸开郑州以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决堤虽暂时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但却造成河水改道泛滥，致使下游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而日军则避开黄泛区，以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配合其主力沿长江及其两岸攻取武汉。

鉴于山区根据地已初步巩固，而冀鲁平原游击战争虽有一定基础，但急待加强，同时敌华北方面军主力南下进攻徐州地区友军，其在冀鲁平原的兵力薄弱等情况，为进一步发展平原敌后游击战争，以钳制与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于 4 月 21 日向八路军发出关于

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组织民众抗日战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拨给养”，“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22日，八路军总部作了具体部署：令徐向前率两个团、一个支队挺进冀南；令陈再道、宋任穷部仍发展冀南，并组建一个支队挺进冀鲁边；令宋时轮支队与邓华支队组成一个纵队深入冀东；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在正太路和晋冀边地区积极活动，以策应平汉路东的我军迅猛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和第三四四旅与决死一纵队开辟太岳山脉南部地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各部积极向平原推进。

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一部 挺进冀南、冀鲁豫边区

1938年4月下旬，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领该师之第七六九团和第一一五师之第六八九团、第五支队，由晋东南出发，挺进冀南，5月初到达南宫地区，与先期到达的东进纵队、骑兵团等部会合。为了消灭临清、威县至邢台一线敌人，向南扩大抗日根据地，5月10日夜，我军主力一部袭入威县城，歼灭日军百余人，震慑了邢（台）、临（清）公路沿线敌军。15日，威县、临清、南和、平乡等地之敌逃往邢台。接着，我军平息了南宫以东及清河一带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六离会”的叛乱，并随即分兵向东、向南发展。至6月上旬，先后收复了临清、高唐、夏津、枣强、永年、成安、肥乡等县城，消灭伪军近2000人，开辟了卫河东西和漳河以北广大地区。与此同时，第三八六旅政治委员王新亭率第七七一团，由晋东南进至永年、肥乡、成安地区；不久，汪乃贵支队也进至栾城、赵县、宁晋、束鹿一带。上述各部在冀南地区展开后，即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到6月底先后收编、改编了各地民团、保安队等游杂武装2万余人。7月，在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领导下，将部队统一整编为新编第一团、冀豫支队、青年抗日游击纵队、东进纵队（第一至第八支队和独立团）。部队经过整编，充实了战斗骨干，军政素质均有提高，同时，从部队中抽调大批党员干部，协助地方党建立和改造政权。8月，召开了各县代表会议，改组了冀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9月建立了全区的工人、农民、妇女等各界抗日救国总会，同时在30余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和民兵自卫队，其中基于民兵达万余人。至此，以南宫为中心，西起平汉铁路，东抵津浦铁路，北至沧石公路，南跨漳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8月下旬，为钳制企图进攻渔关、洛阳之敌，并开辟漳河以南地区，消灭盘踞该地的伪军，第一二九师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令陈再道、王新亭统一指挥青年纵队、东进纵队、第六八九团和新一团等部发起漳南战役。31日，上述各部分四路进袭临漳以南的贾河口、秤钩湾等地，消灭伪军2000余人。9月上旬，又连续攻占临漳、内黄、安阳间之回隆、楚旺、吕村集、

豆公集、大韩集、崔家桥等重要集镇，歼灭伪军近 2000 人。9 月中旬，第三四四旅副旅长杨得志奉命率领第六八八团由晋东南沁水地区进至平汉路东，并与青年纵队、新一团和第六八九团组成漳南兵团，由王新亭、杨得志统一指挥，继续南下，开辟豫北平原。9 月下旬，该部收复滑县、道口等城镇，并在汤阴西南地区歼灭伪军一部，俘 1400 余人。经过一个月的漳南战役，基本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南北数十公里地区的伪军和土匪，并协助中共直南特委开辟了安（阳）、内（黄）、汤（阴）、浚（县）、滑（县）地区，建立了安、内、汤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为建立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

冀东是联结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 1933 年以来，冀东地区逐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5 年，日本侵略者炮制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伪军、伪警驻扎各县城镇，加强殖民统治，冀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抗战爆发后，中共组织陆续向冀东派遣干部，加强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1938 年 2 月 9 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指出：“雾龙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须作充分准备。”4 月，在平西根据地初步建成后，八路军总部即指示第一二师，令宋时轮率雁北支队东进平西，与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会合，编成一个纵队，受晋察冀军区指挥，挺进冀东，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5 月下旬，宋时轮支队进抵平西斋堂、杜家庄地区，随即与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一支队（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大队）、第十二支队（辖第三十四、第三十六大队）和独立营、骑兵大队，共 5000 余人。6 月 8 日，第四纵队由平西地区出发，取道平北，向冀东挺进，沿途连克昌平、延庆、永宁、四海、兴隆等城镇，并在平北的沙峪歼灭日军 200 余人。除留下第三十六大队和骑兵大队开展平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外，主力于 6 月 21 日进抵冀东蓟县以北的将军关、靠山集和下营地区。

在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的有利形势下，中共冀热边特委于 7 月上旬提前发动了冀东 20 余县和开滦煤矿共 20 多万人参加的抗日武装暴动，组成 7 万人的抗日联军，连同其他抗日武装约达 10 万人。此后第四纵队根据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关于巩固蓟县、平谷、密云基本区，逐步向东南发展的方针，在暴动武装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敌人，一度切断北宁铁路线，先后收复了平谷、蓟县、迁安、玉田、乐亭、卢龙等县城和冀东广大村镇，初步形成以蓟县、平谷、密云为基本区的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8 月中旬，第四纵队和暴动武装主力在遵化县铁厂镇会合。下旬，中共冀热边特委和第四纵队及暴动武装的领导干部，于铁厂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下辖 5 个军分区，由宋时轮、邓华分任军区正、副司令员，以统一部队指挥，另成立行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地方行政工作。铁厂会

即雾灵山，位于河北省兴隆县境内。

议后，第四纵队以主力一部向北行动，准备越过长城，进军青龙以北的都山，建立根据地；以另一部主力向西行动，进军兴隆山地，建立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尔后依托这些山区根据地逐步向平原发展。向兴隆山地挺进的部队，几经转战，进至白河以西，袭占赤城，歼灭日伪军 200 余人，缴获步机枪百余支（挺），同时袭击了龙关城，歼敌一部。向都山进军的部队，其先头到达长城线上之桃林口、燕河营一带，遭到敌关东军和伪满军的阻击而退回滦河以西。

第四纵队进入冀东和冀东人民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暴动，以及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震惊了敌人，特别是直接威胁了敌占之平津大城市和北宁铁路的交通安全。因此，敌急由国内抽调第一一师团于 7 月间进入平津地区。8 月，该师团纠合当地日伪军及东北伪满军，对冀东地区开始进行大规模“讨伐”。第四纵队苦战数月，部队伤亡较大，弹药也无法补充；加之暴动队伍成份复杂，未经整顿，并且时值秋末，平原地区青纱帐已倒。于是，纵队党委提出，除留下部分八路军骨干和一部暴动武装坚持冀东斗争外，第四纵队主力和暴动武装大部转移到平西整训，准备来年再回冀东。随后，在河北省委、纵队党委、冀热边特委和抗日联军的一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决定暴动武装大部随第四纵队向平西转移。10 月中旬，除留 3 支游击队在冀东坚持斗争外，暴动武装约四五万人随第四纵队开始西移。由于途中遭到日伪军的围追截击，暴动武装大部失散，一部随第四纵队抵达平西，一部随冀东党组织返回冀东。

第四纵队挺进冀东，与地方党共同领导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扩大了我党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为以后建立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经验。正如 11 月 25 日中央军委在给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和第四纵队的电报中指出的：“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同时还指出：由于“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中央军委还决定以第四纵队为基础成立冀热察挺进军，继续开展与坚持冀热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九师各一部挺进冀鲁边地区

1938 年 5 月，八路军总部决定从冀南地区抽调第一一五师第五支队和第一二九师津浦支队，挺进冀鲁边，协同冀鲁边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游击战争，扩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6 月底，这两个支队由冀南地区经鲁西北越津浦铁路，于 7 月上旬进抵乐陵、宁津地区。协同当地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7 月下旬于庆云县城西北的黑牛王地区歼灭伪军 800 余人；8 月收复宁津县城，歼灭伪军千余人，摧毁了该地伪组织，打开了该地区的抗战局面。为了加强该地区的领导。9 月下旬，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奉命率第三四三旅司令部、政治部百余名干部进抵乐陵，随即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并将该地部队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兼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扩充了部队，津浦支队由两个营扩编为 3 个营，第五支队由 3 个营扩编为 3 个团，冀鲁边起义武装整编为第六支队，下

辖3个团。部队整编后，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分别袭占了沧县城东南七里淀、盐山城西孟村等敌伪据点，破坏了沧（县）盐（山）公路，袭击了连镇、安陵、泊头等车站，几度中断津浦铁路德州至沧县段敌之交通运输。与此同时还协同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根据地工作，先后成立了津南、泰山、鲁北、惠民、宁津、阳信、商河等若干个地方游击支队。至1939年上半年，冀鲁边武装扩大到2万余人，根据地包括天津以南和山东省北部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15个县的地区。

冀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冀中军区和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后，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广泛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加强了根据地建设工作，正式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统一了县区村各级政权机构，实行了必要的税收政策，组织了工、农、青、妇、文各界抗日救国会，建立了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冀中人民抗日自卫队分指挥部，以及县的总队部、区的大队部和村的中队部，为更广泛地发展群众武装奠定了组织基础。与此同时，还遵照晋察冀军区指示，不断破袭敌占之平汉、津浦、平津等铁路。1938年7月中旬，第三纵队一部袭击石家庄车站，歼敌20余人，毁敌汽车7辆；27日，又以一部夜袭安次（廊坊），一举攻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战至次日晨，毙敌40余人，并争取了30余名伪军反正；同日夜，另以一部袭击正定车站，毙敌20余人，缴获军用物资一部。9月，第三纵队以一部深入大青河北，打开该地区抗战局面，成立了第五军分区。9月24日夜，第三纵队一部袭击津浦铁路上的陈官屯车站，毁敌机车1台，毙敌20余人。25日攻入平汉铁路上的定县城，毙敌数十人。10月9日夜，攻入青县城内，与敌激战数小时，毙敌60余人。10月16日，我军又袭入青县南之徐官屯，捣毁了伪青年学校，俘获日军教官以及学生42名，缴获军用物资一部。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对敌占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的破袭，不仅扩大了冀中抗日根据地，而且策应了正面战场友军的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直接配合了晋察冀边区的反围攻作战。

为了更好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冀中军民还大规模地开展了拆城、破路，改造平原地形的群众运动。继1938年1月拆除肃宁县城墙后，又先后拆除了河间县城墙，和以“固若金汤”而闻名的蠡县城墙，并且发动冀中腹地的群众普遍进行拆城活动，在两个多月时间中，共拆除24座县城的城墙。在拆城的同时，冀中军民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破路活动，至秋末，将冀中平原上的公路基本破坏，将纵横贯通各个村庄的大道都挖成能走大车，不能行驶汽车、坦克的道沟，挖出的泥土堆在道沟两旁筑成土墙，既给敌机械化部队行动造成严重障碍，又便于我军民作战和隐蔽转移，从而为发展和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至1938年10月，冀中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西迄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北宁路，南至沧石路，共有44个县、8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1938年4月至10月，八路军以主力一部深入冀鲁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行动，不仅开辟和发展了平原根据地，而且使山区根据地与平原根据地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并为坚持长期抗战提供了比较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源。发展平原以巩固山区，巩固山区以支援平原，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条件。实践证明，平原地区虽然地形平坦，

交通便利，便于敌军机械化部队行动，缺乏可供我军依托和隐蔽的有利地形；但平原有比山区人口多和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优越条件，便于我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利于我藏兵于民，实行人民战争。同时，平原有稠密的村庄，可以利用村落作为掩护和依托进行战斗。因此，只要树立开展平原游击战的胜利信心，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放手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充分利用平原的各种地物，并大力改造平原地形，如拆城、毁路，挖掘不利于敌军机动而有利我军隐蔽行动的道沟等，平原游击战争是能够坚持和发展的。

二、发展和保卫山区抗日根据地

在徐州会战和八路军一部向冀鲁平原挺进时，八路军主力在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晋西南等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大力开展交通破袭战，有效地牵制了日军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开辟与发展冀鲁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行动，同时也支援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并巩固和发展了山区根据地。徐州失守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和部署曾多次作出指示。1938年6月15日，毛泽东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则均暂时无法多顾，反给我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目前为配合友军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创造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27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徐州失守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在上述情况下，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目前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大青山脉。”

第一二 师一部开展大青山抗日 游击战争和粉碎敌之围攻

(参见附图 12)

大青山位于绥远境内，横亘内蒙古高原。开辟这一地区，使其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对坚持绥远抗战，钳制日军向大西北的进攻，掩护我之战略翼侧，具有重要的意义。遵照毛泽东 1938 年 5 月 14 日关于“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的指示，八路军总部决定，以第一二 师第七一五团、独立第四支队和骑兵营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执行开辟大青山地区的任务。该支队组成后，在第三五八旅政治委员李井泉率领下，于 7 月下旬，由晋西北五寨地区北进，首先进抵平鲁、左云、右玉地区，积极进行挺进大青山的各项准备，尔后于 8 月下旬，向绥远进发，并在凉城地区留下第七一五团第一营，建立以蛮汗山为依托的绥南根据地，以保障晋西北与大青山的联系。9 月 1 日夜，大青山支队主力冲破敌之拦阻，在旗下营与三道营之间跨过平绥铁路，进入大青山地区，不久即与当地党领导的蒙汉人民游击队会合。3 日，大青山支队首袭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歼敌一部。随后，挥戈西进大滩地区，并组建了绥蒙总动员委员会，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绥中地区的游击战争。

大青山支队进入绥中后，查明该地区的地形、敌情，决定攻击归绥以北重镇乌兰花(今属四子王旗)，歼灭该地的伪蒙军，以便打开大青山地区的

抗战局面。9月9日，我军由大滩进至乌兰花东南之五塔背、韭菜沟地区，完成战斗准备，10日夜突然袭入乌兰花镇内。守敌毫无戒备，在我军突然打击下，迅速瓦解，一部向西逃窜，其余均被俘获。此战共俘伪蒙军70余人，毙伤一部，缴枪70余支，军马80余匹。我军攻占该镇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凛冽的寒风中露宿街头，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民族政策，并全部释放被俘的伪蒙军官兵，从而得到当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

在此期间，留在绥南蛮汗山活动的部队积极打击敌伪，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政权与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严重威胁当地敌之统治。于是，日伪军于9月11日集中一部兵力分四路向蛮汗山发动围攻，企图聚歼我军。我军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分途抗击敌人进攻，激战终日，于黄昏转移至蛮汗山主峰附近。由于夜暗和山区地形复杂，敌不敢贸然深入，遂暂停进攻。我军在查明敌情之后，除留少数部队分散活动钳制敌人外，主力连夜隐蔽地跳出敌之包围圈，转移到凉城西南地区，破坏敌之后方交通线。12日，敌继续向蛮汗山进攻，由于我主力已经转移，敌到处扑空，遂纷纷撤退。在反围攻作战中，我军共毙伤敌200余人。

9月下旬，大青山支队主力于武川以东的后窑子地区击退日军数百人的阻拦后，进入归绥至武川公路以西，10月1日奔袭了包头以北的石拐子敌据点，歼敌一部，10月中旬，又袭击了平绥线上的陶思浩、苏安盖等车站和毕克齐等据点，破坏平绥铁路一段，毁敌汽车两辆，歼敌一部，因而威胁了包头、归绥之敌。11月上旬，日军在围攻我大青山东部地区扑空后，又以两千余骑兵分四路围攻绥西萨拉齐以北山区。大青山支队以一部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空室清野，与敌人周旋，以游击队在敌后袭击武川、萨拉齐、百灵庙等据点；主力则乘隙深入敌侧后，在马厂梁、大沟、德胜沟门等地予敌以有力打击，毙敌200余人。由于广大军民的艰苦奋斗，终于粉碎了敌之围攻。经数月作战，初步开辟了归绥至武川公路以西之绥西，归绥至武川公路以东之绥中，及平绥路南以蛮汗山为中心的绥南等3个游击根据地，并且建立了绥蒙总动员委员会，同时在3个游击区内分别设立办事处，下属各县也成立了动员委员会，以代行政权职能。这样，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便基本形成。

发展晋冀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

为扩大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和策应平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1938年4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二九师主力迅速由晋东南向豫北、冀西发展；令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向晋南发展。

4月下旬，第三八六旅主力进至平汉路西侧冀豫边地区，即指挥在该地区活动之先遣支队等部由北向南于邢台、沙河、武安、磁县以西山区，先后歼灭10余股伪军，连克峰峰、西佐、彭城等敌之据点。打击了日伪势力。至5月底基本上扭转了自2月日军控制武（安）涉（县）大道以来这个地区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为进一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发展根据地与抗日武装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6月上旬，第三八六旅主力继续南下，进至漳河以南、道清路以北的豫北地区，并统一指挥先期到达的补充团和赵（基梅）涂（锡道）支队，相继攻克观台、水冶，袭入汤阴、辉县和平汉铁路上的潞王坟车

站，共歼灭日伪军近千人，并打击汉奸土匪，将日伪势力逐步从山区驱逐至铁路沿线。同时配合地方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初步开辟了安阳、林县、辉县等地山区抗日根据地和道清路两侧的广大游击区。

在第三八六旅向豫北发展的同时，第三八五旅并指挥秦（基伟）赖（际发）支队和八路军游击支队等部，也积极活动在正大、平汉铁路和平定至昔阳公路沿线，连续破击敌交通线，袭击敌之据点，消灭和瓦解大量伪军、伪组织，并打退敌多次进攻，粉碎了敌依托交通线扩大占领区的企图，保障了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工作的展开。

向晋南发展的第三四四旅主力，于7月初进至晋城、阳城地区。时值敌第一八师团由晋城西进，配合其第二十师团进攻晋西南国民党军。为配合友军作战，第三四四旅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决心在阳城、沁水间打击与钳制西犯之敌。7月6日，敌第一八师团一部乘汽车50余辆，另骑兵一部，先后由晋城西犯。10时许，其先头到达上、下黄岩，主力进至沁水东南之町店附近大休息。此时，进抵町店以北地区的第三四四旅，迅即占领町店以北高地和上、下黄岩以北有利地形准备攻歼该敌，另以一部进至町店东南美泉村公路两侧高地担任阻援任务。各部部署完毕后，随即向敌发起攻击。第六八七团主力向进至町店之敌猛攻，第六八八团主力向进抵上、下黄岩之敌进攻。敌遭我突然猛烈袭击，极度混乱，经过稍事整顿即向我军反扑。我军连续打退敌之反扑。经数小时激战，共歼灭日军500余人，击毁敌汽车20余辆。敌遭打击后，行动迟缓，不敢长驱直入。我军达到了迟滞敌人、策应友军的目的。

在上述主力部队向外展开后，晋冀豫军区所属5个军分区的基干支队，积极活动在敌占区和铁路沿线，取得了多次战斗胜利，并扩大了根据地。6月，晋冀豫省委根据北方局指示及本区当前的有利形势，作出关于建立巩固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从7月开始，一个以扩大民主、改善民生、改造政权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便在全区开展起来。在一些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进行了肃清汉奸和改造政权的斗争，先后在冀西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豫北建立了3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而提高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群众生活。随之，在全区广大农民中形成了参加八路军、游击队、民兵和担负战勤的热潮。在短短的两个月中，各基干支队均由原来几百人发展到一至两千人，至9月，晋冀豫军区所属基干武装已由几千人发展到近2万人，游击战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自5月开始至10月，晋冀豫边区的广大军民还先后对平汉、正太、道清等铁路进行了10余次破击行动，在第一二九师的统一号令下，第三八五、第三八六、第三四四旅等主力部队和各基干支队以及广大民众一齐行动，袭击敌车站、据点和小股部队，毁坏路基、桥梁，拖走铁轨，烧毁枕木，砍倒电线杆，割取电话线，使敌交通运输陷于半瘫痪状态，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在徐州和武汉地区作战，巩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九师主力粉碎 敌对五台、冀西地区的围攻

(参见附图 13)

为了贯彻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一次代表会议所确定的努力扩大和巩固根据地以及加强党、军队与根据地建设的方针、任务，并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晋察冀军区决定向东向北发展抗日根据地，威胁敌平汉、平绥铁路交通线。1938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首先以一部兵力向平汉铁路北段出击，破坏铁路80余公里，使平汉铁路交通中断三日，并将根据地推进到铁路附近地区，5月下旬，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由崞县地区挺进浑源、阳原等地，协同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执行向北扩展根据地的任务。6月上旬，该旅攻克应县东南之下社，进至浑源、灵丘、广灵、蔚县、涞源地区，先后恢复了该地抗日政权，并以一部深入到桑干河以北地区，先后袭击了大同东南的友宰堡及后子口，歼灭日伪军300余人，还连续袭击了平绥铁路之聚乐堡、罗文皂、永嘉堡等车站。经过连续紧张的作战，以浑源、广灵、灵丘、涞源为中心的察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为进一步牵制敌人，配合友军保卫武汉，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晋察冀军区部队和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又分别向平汉、平绥、正太等铁路沿线城镇出击，直至北平近郊，破坏石景山发电厂设备，袭击香山附近敌军，先后共歼敌1400余人，破坏铁路50余公里。我军上述行动，使敌人极为震惊。为消除后顾之忧，日军决定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的同时，在华北对以五台为中心的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新的围攻。

晋察冀军区和边区党委，根据敌之动向，及时发出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强反围攻作战准备。全区党政军民立即投入反围攻准备：首先，广泛深入地进行政治思想动员，讲明反围攻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以坚定军民反围攻斗争的胜利信心和防止轻敌麻痹思想；同时，组织群众拆除可能为敌人利用的城墙围寨，破坏便于敌军机动的道路，做好战场准备；并加强各县脱产的游击队的组织指挥，和大力发展不脱产的民兵自卫队，以及组织教育群众迅速收藏秋粮，实行彻底的“空舍清野”，不留可供敌人利用的资材，使敌难于立足。

9月中旬，敌华北方面军集中第一一、第二十六、第一九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第四旅团共5万余人兵力，准备由平汉铁路北段、平绥铁路东段、同蒲铁路北段和正大铁路沿线同时出动，以五台、阜平为主要目标，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攻。敌接受以往围攻失败的教训，改变以前长驱直入的战法，采取逐步推进，压缩包围圈，尔后分割“清剿”、各个击破的方针，妄图歼灭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针对敌之企图，八路军总部决心以晋察冀军区部队和第一二师主力，在广大民兵游击队的配合下，采取内线与外线、广泛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粉碎敌之围攻。晋察冀军区根据敌情和总部指示，决定在敌开始围攻处于锐势时，我首先以小分队不断袭扰、消耗、疲惫敌人，为主力歼敌创造有利战机，而主力则隐蔽集结于机动的位置，伺机歼灭或打击敌之一路；当敌兵力占优势，我不可能阻止其进攻时，则以一部分主力和群众武装采取灵活的游击战与敌周旋，主力则到外线机动作战，在敌深入我边区腹地，进行分割“清剿”或据守据点时，我内线部队则继续袭扰敌人，配合彻底的“空舍清野”、或采取围困战，逼退敌人，外线部队则猛袭敌后方交通线和据点，迫敌回防；在敌被迫撤退时，则集中兵力，抓住有利战机，

追击、伏击和截击撤退之敌。

反围攻作战的第一阶段：

9月20日，敌军由平汉、同蒲、干绥、正太等铁路线出动，向我边区四周各要点进犯。敌按照其既定的分进合击，逐步推进，压缩合围圈的方针，实行东西对进、南北夹击，企图歼灭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于五台、阜平之间地区。我军也按既定方针，以部分主力与广大民兵游击队相结合，采取阻击、伏击、袭击等手段，钳制、消耗、疲惫各路敌军；主力则隐蔽于机动位置，伺机打击对我威胁最大的西线或东线敌军。

在东线，由平汉路之定县、望都、保定等地出动之敌，于9月20日分路向曲阳、唐县、完县进犯。当敌进至曲阳之七里庄和唐县之店头镇时，遭到我第三军分区部队的有力阻击，死伤达250余人。敌遭打击后，即大量施放毒气，我军遂撤出战斗，敌进占曲阳、唐县、完县。24日，上述3处敌军继续西犯。当曲阳之敌西进至刘家马时，遭我第三军分区一部伏击，敌被迫退回曲阳。27日，敌分三路进占党城、灵山、王快一线，进窥阜平，但在我军民不断袭扰下，不敢贸然前进。这时，晋察冀军区首长鉴于东线敌人对我威胁最大，遂适时调整部署，令第一军分区主力向南台以北机动，准备侧击经王快进犯阜平之敌；令第三军分区以1个营兵力节节抗击，迟滞敌人前进，以待第一军分区主力到达；令冀中第三纵队之独立旅西进尾击敌人。10月3日，敌以一部向东、西庄一线进行试探性进攻。我第三军分区一部先后在王快、方代口袭击敌人，毙敌百余人，敌被迫退回。4日晨7时，敌集中千余人在飞机和炮兵的火力掩护下，以骑兵为先导，向阜平方面进攻。当敌进至东、西庄地区时，我第一、第三军分区和冀中独立旅各一部，发挥近战特长，与敌展开激战，毙敌甚众，仅方代口一地即歼敌300余人。但由于我军通信联络不畅，相互协同不够密切，未能全歼该敌。12时，敌增援部队数千人赶到，对我实行猛烈炮击，并发射毒气弹400余发，我军有5个营遭敌毒气袭击，遂撤出战斗。6日，东线之敌始进占阜平。东、西庄战斗，我军共毙伤敌1300余人。

在西线和南线，9月24日，西线之敌由代县、定襄出动，南线之敌由盂县、井陘、平山出动，兵分五路，以五台、洪子店为主要目标，企图合击我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当盂县之敌西千余人侵入神泉村时，我第四军分区之第九大队绕道赶至上社镇，对敌实施突然袭击，歼敌一部。与此同时，由定襄、代县出动的西线之敌，在向东冶镇、河边村进犯时，遭我第二军分区第六大队有力阻击，行动缓慢。29日拂晓，南线之敌北渡滹沱河，在飞机掩护下向柏兰镇进攻。这时，我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正在耿镇、石嘴、金刚库地区。为保障领导机关安全，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二军分区的第五大队和军区学兵营，事先抢占有利地形，当敌经过牛道岭时，我军突然开火，予敌以重大杀伤。当晚，敌进占耿家庄。次日晨，敌继续向柏兰镇进攻。我军迅即对敌侧后展开猛攻，敌伤亡惨重。此战共歼敌清水联队长以下400余人。然而我军也付出较大代价。10月3日，西线与南线之敌进占五台县城。与此同时，由井匠、平山出动之敌经温塘进犯洪子店，我第四军分区第七大队依托有利地形与敌展开激战，洪子店两次失而复得。

在北线，9月20日，由蔚县、广灵、浑源出动之敌分别进占我边区之北口、九宫口、松子口等地。24日，进占上述各地之敌以及由易县出犯之敌，向灵丘、涞源等地进攻。我第三五九旅主力和第一军分区一部于邵家庄、圣

佛寺等地不断阻击敌军。26日晨，敌军在炮火掩护下分别向邵家庄、圣佛寺一带我军展开进攻。我军英勇沉着抗击敌人，战至日终，敌伤亡很大，遂退至张家湾、直峪宿营。我军乘敌疲惫夜袭直峪，歼敌一部，并救出被虏民伙2000余人。北线我军经过7无激战，共歼敌5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直到10月1日，敌始进占涞源、灵丘县城。

在我军反围攻作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彭真于10月2日电示晋察冀军区，指出：敌“此次围攻较前任何一次来得较有计划与持久性”，因此要“在党政军民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建立起持久抗战胜利信心”，“动员群众参战”，“实行清野空舍”；“根据敌人构筑据点，步步推进，紧缩边区，及敌人顽强与敌力不足的优缺点”，应“相当地集中主力于我有利的各种条件(敌人弱,地形有利)方面准备待机”，“以小部队与敌进行极不规则的小战，迟阻和疲惫敌人，以相当有力部队转入敌之后方交通线，打击敌之运输”，“如敌无弱可乘，不便我主力集中打击或消灭敌时，……仍以小部队分途逐渐引敌深入，使敌疲惫疏忽扑空，待敌转移方向或退却时给以突然的袭击或追击”。同时，令第一二九师“对正太路有计划地进行破坏，并相机以适当兵力越路北进，分途尾击敌人”，令第一二师“积极地吸引原平、忻口、关城之敌，并相机越路东，尾击东进之敌”，以策应晋察冀边区的反围攻作战。这一指示，对我军夺取反围攻作战胜利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至10月6日，敌军虽进入我根据地腹地，侵占阜平、五台等县城，但其聚歼我军主力和领率机关的企图却未能得逞。

反围攻作战的第二阶段：

敌在侵占五台、阜平后，即在我根据地内加修道路，建立据点，妄图以先分割、后“清剿”的手段，达到各个消灭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摧毁我根据地的目的。我晋察冀军区针对敌之企日，遵照毛泽东、朱德等人指示，于10月7日决定以主力一部化整为零，以大队或营连为单位，配合民兵游击队，开展广泛分散的游击战，不断袭扰敌人，攻击或围困敌薄弱据点，使敌惶恐不安；而以主力深入敌之后方交通线上打击敌人，断敌交通补给，增加深入我腹地之敌的困难，使其难以立足。为此，军区首长令第一、第三军分区主力转入进占阜平之敌侧后，在定县、曲阳至阜平的交通线上，截击敌之辎重部队，并由东向西逼近阜平，迫敌撤退，在敌退却时予以打击或歼其一部；令第二军分区主力向高洪口至耿镇、五台至东冶的道路上出击，切断敌运输线；令第三五九旅之第七一七团于王家庄、限门口一线侧击向石嘴进犯之敌；令第四军分区之第九大队，在第二军分区部队到达柏兰镇地区后，即向东转移，破袭正大铁路阳泉至井匠段，第七大队仍于洪子店、温塘、平山一线，第八大队仍于灵寿地区继续打击敌人。遵照上述命令，各部积极袭扰敌之交通线，断敌运输补给，以粉碎敌将我根据地分割数块，尔后逐一“清剿”、各个击破的企图。

10月中旬，侵占五台之西线和南线敌军3000余人，在东线和北线敌军配合下，向我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石嘴、台怀、金刚库地区实行“清剿”。我军区首长遂以小部队与敌周旋，主力和军区领导机关则乘敌尚未形成严密的包围，迅速、隐蔽地南下，插至“清剿”之敌后方蚊潭庄地区隐蔽待机，从而使各路敌军扑空。此后，东线和北线敌军分别东撤、北返，南线放军也向盂县撤退。我第二军分区部队遂展开追歼南撤之敌，歼其一部。此

时，西线敌军龟缩于台怀地区，但在我军不断袭扰打击与断其补给的情况下，于 13 日向沙河撤退。与此同时，第四军分区之第八大队，在同下村伏击歼灭由灵寿出犯之敌一部，迫使敌退回原据点。其他各军分区部队和第三五九旅等部，则按军区部署积极打击敌人，使敌惶恐不安，难以立足。特别是晋西北、晋东南以及冀中我军向敌占之同蒲路北段、正太路沿线和平汉路北段频繁出击，迫使敌抽调参加围攻的兵力回防备主要交通线，从而有力地策应了晋察冀边区军民反围攻作战。敌之分割“清剿”、各个击破我军的企图遭到失败。

反围攻作战的第三阶段：

侵入我边区之敌，在我军民的打击下，退缩于阜平、五台、蔚县、涞源、广灵、灵丘、盂县、温塘等城镇据点，陷入被动地位。我晋察冀军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除以一部兵力配合民兵游击队继续开展游击战，不断困扰敌人，以一部兵力破袭敌后交通线，断敌补给、迫敌撤退外，决定集中主力相机歼灭困守据点或撤退之敌。

首先，集中主力打击进占阜平之敌。阜平地处晋察冀边区腹地，是我重要后方基地。晋察冀军区首长决心集中第一、第三军分区主力和第三五九旅之第七一七团收复阜平，打退东线敌军。为此，以一部兵力并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于定县、曲阳至阜平的敌后方交通线上积极破坏道路和电话线路，断敌交通补给。第一、第三军分区部队先后在曲阳至阜平的交通线上对敌运输部队进行了 19 次袭击和伏击战斗，其中尤以 10 月 20 日于郑家庄伏击敌之辎重部队，对敌打击最重，缴获敌向阜平运送粮弹的大车 200 余辆。与此同时，军区骑兵营袭击曲阳、定县间之高门屯敌后方粮站，缴获了大量的给养，从而断绝了阜平之敌后方补给。21 日，敌为打通曲阳、阜平间的交通运输线，分由两地出动约 6000 人的兵力，企图夹击消灭我军。我军迅速转移，致使两地敌军于当日夜在韩家峪发生误会，死伤甚众。在困守阜平之敌惶恐动摇之际，晋察冀军区即令第三五九旅之第七一七团、第一军分区之第三团于 26 日夜袭入阜平县城。敌不明情况，在夜战中自相混战，死伤很多。27 日晨，敌在飞机掩护下，大量施放毒气，弃城东逃。我军乘胜追歼逃敌，并炸毁石高崖隘口，断敌退路。残敌遂改路逃向曲阳、定县。我军收复阜平和曲阳以西地区。晋察冀军区遂令第七一七团和第一军分区主力北返涞源、灵丘，打击北线之敌。

侵入边区北部灵丘、涞源之敌，在我军民打击下也处于困境。敌北线指挥官独立混成第二旅旅团长常冈宽治于 10 月 26 日由蔚县到广灵，准备前往灵丘督战。此时我第三五九旅以第七一九团于广灵以南之邵家庄设伏，打击由广灵可能出犯之敌；以第七一八团于灵丘西北之黄台寺设伏，打击由灵丘可能出犯之敌。28 日上午，常冈宽治率 200 余人乘数辆汽车由广灵南下，当其进入我邵家庄伏击地域时，我军突然发起攻击，经激战，歼其大部，击毙常冈宽治。与此同时，由灵丘出动接应之敌，乘 12 辆汽车北驶，当其进入我黄台寺伏击地域时，压发我埋设于道路上的地雷，我军趁地雷爆炸、敌军慌乱之际，向敌发起冲击，击毁汽车 5 辆，歼敌 200 余人，残敌逃回灵丘。在此之后，我第三五九旅和第一军分区侦悉蔚县敌运输大队准备接济涞源之敌，遂以第七一七团和第一军分区一部设伏于蔚县、涞源间之明堡。当敌运输大队进入我伏击圈，我军立即发起猛烈攻击，全歼日军大队长以下 400 余人，击毁汽车 35 辆。至此，北线之敌龟缩于涞源、灵丘、广灵、蔚县等据点，

不敢轻易出犯。

为增强晋察冀边区反围攻作战的力量，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二师以第三五八旅主力于10月下旬东越同蒲路，到达五台东南地区，准备在五台至河边村地区寻机歼敌。11月3日，该旅得悉敌第一九师团一个大队500余人由五台向高洪口地区进犯，判断该敌孤军深入，扑空后必返回五台，遂以第七一四团、第七一六团等部于高洪口以西之滑石片地区设伏。当日夜，待敌全部进入滑石片沟我伏击地区时，我军突然发起冲击，将敌分割成数段，并连续打退敌人的5次反扑，战至4日拂晓，敌除数十人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4日上午，我军又追歼逃敌于五台城下。此战，我军共毙伤日军500余人，俘敌20余人，缴获步枪300余支，轻重机枪30余挺，山炮、小炮6门，军马100余匹，电台1部及其他军用物资一批。

为打破敌之围攻，南线我军积极破袭正太铁路，迫敌撤退。10月中旬，我第四军分区以第九大队在正大铁路阳泉至井陘段积极开展破袭战，以第七大队不断袭击回舍、洪子店等地敌军；第一二九师也以主力一部向正大铁路沿线出击，从而迫使平山、盂县等地敌军主力回防正太铁路。我军乘机收复回舍、洪子店等地。

至11月7日我军反围攻作战基本结束。在历时48天的反围攻中，我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36次，毙伤日伪军5200余人，缴获长短枪570余支，轻重机枪49挺，各种火炮10门及其他军用物资一部，粉碎了敌人围攻晋察冀边区、消灭我军主力和领率机关的企图，保卫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同时有力地策应了正面战场友军的武汉会战。

此次反围攻作战胜利，首先是战前深入的思想动员和充分的作战准备，讲清反围攻作战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既坚定了边区军民反围攻作战的胜利信心，又防止了轻敌麻痹思想，并动员军民大力拆除城墙围寨，破坏敌人可能利用的道路，实行彻底的“空舍清野”，其次是根据敌情适时调整部署，灵活地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变被动为主动；第三是组织相邻各区的策应，配合作战。

在这次反围攻作战进行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给晋察冀边区领导和党政军民发电慰勉，指出：“全会完全相信你们必能更加团结一致，联合一切友党友军，胜利地粉碎敌人对于你们的围攻，并且进一步地巩固与扩大你们的根据地。希望你们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动员一切力量，执行灵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进行坚壁清野，镇压汉奸敌特，准备长期战斗，粉碎敌人的围攻”；同时还指出：“全会完全同意边区党委所执行的坚定的统一战线方针，并在这个方针下，由于全党全军的努力，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不独坚持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慰勉电，极大地鼓舞了晋察冀边区军民，成为粉碎敌之围攻和巩固扩大根据地的巨大动力。

第一一五师主力汾离公路三战三捷

(参见附图14)

午城、井沟战斗以后，第一一五师主力继续活动于晋西南地区。1938

年7月8日，毛泽东指示第一一五师，目前第三四三旅“仍以对同蒲、太军（太原至军渡之公路）两路大肆破坏，妨碍敌渡黄河为主要任务，协助地方发展游击队为辅助任务。”该师根据这一指示，以第三四三旅于汾离公路及其以南以及介休至灵石铁路沿线，破袭敌之交通。9月上旬，敌华北方面军为策应武汉作战和围攻晋察冀边区作战，以第一一八师团一部沿汾离公路西犯，先后占领离石、柳林，进逼军渡、破口，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为粉碎敌之进攻，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迅速向汾离公路开进，并以第六八六团于9月14日拂晓进至吴城镇东南的薛公岭附近设伏。该地是敌军来往必经之地，而公路弯曲，两侧山高林密，不便敌军观察，利于我军隐蔽。敌为防我袭击，曾在公路北侧筑有碉堡，用以保障交通。我第六八六团遂以主力于公路南侧设伏，一部伏于公路北侧。当日10时许，由汾阳西进之敌汽车20余辆载步兵200余人进入我伏击圈。我军突然开火，首先以迫击炮击毁敌之碉堡；尔后勇猛冲击，经一小时战斗即全歼该敌，缴获汽车20辆。为进一步打击进犯黄河河防之敌，17日拂晓，第一一五师又以第三四三旅补充团于吴城镇至离石间的油房坪附近，选择有利地形再次设伏，歼灭由汾阳向离石开出的敌运输队100余人，击毁汽车9辆，缴获军用物资一部。敌连遭打击后，特别是汾离公路补给线被切断，被迫于19日开始由离石向东撤退。我第一一五师遂令第三四三旅以第六八六团、第六八五团一部及补充团于薛公岭东南的王家池附近公路两侧，利用有利地形设伏。20日拂晓各部进入伏击地域，做好战斗准备。9时许，敌800余人进入我伏击地区，我军展开突然猛烈的攻击，经一小时激战，全歼该敌，缴获军马百余匹、各种枪400余支。三次伏击均选在敌必经之地和便于我隐蔽突击的有利地形上，构成两翼伙击部署，因而取得较大战果。汾离公路三战三捷，共毙伤敌1200余人，粉碎了敌进攻黄河河防，威胁我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山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的10次较大规模武装起义之后，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抗日武装迅速扩大，先后在鲁中、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鲁南、湖西、泰西、鲁西北等地区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并且控制了部分县城和重要山区，为尔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为使山东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战略一翼和联结华中敌后战场的战略枢纽，中共中央于1938年1月15日指示山东省委，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5月，中共中央、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派遣部分主力部队入鲁，作为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骨干，并派大批干部到山东加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同时指示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大力组织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山东各地人民抗日武装，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和创造根据地，并配合友军作战，积极打击敌人，8月间，我清河地区抗日武装先后袭击了张店、周村、黄台车站，并于13日黄昏袭击济南。由于我军进行喊话，开展政治攻势，驻守济南东关之伪保安队大开城门，我军即冲入城内，占领伪省政府，击毙日伪军10余人。此时，敌军200余人乘装甲车三面向我包围，经20余分钟激战，我军遂撤出战斗。此战政治影响很大，打击了敌之气焰，振奋了我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在此期间，我胶东地区抗

日武装数次袭击烟台之敌，并于蓬莱、龙口、栾家口连续阻击了企图由海上登陆之敌。10月，日伪军1000余人占领平度，并向掖县进攻，我抗日武装予敌以迎头痛击，毙伤敌200余人。9月，鲁中地区抗日武装，在胶济、津浦等铁路的交通线上展开破袭战，破坏了胶济铁路周村至张店段，及张（店）博（山）铁路数十公里，毁敌机车3台，摧毁张店以南之洪山煤矿，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击落敌机1架，给敌以严重威胁。与此同时，鲁南抗日武装于临（沂）枣（庄）公路上的燕柱山地区伏击敌汽车队，毙伤敌60余人。

鉴于山东各地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开展，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中共中央于12月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以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山东各抗日武装。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由分散的各自为战的游击队成长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成为发展与坚持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力量。

1938年4月至10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和毛泽东两篇重要军事著作的指引下，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区发展到平原，由山西扩展到整个华北。八路军不仅粉碎了敌对山区根据地的围攻，而且以主力一部挺进平原，协同当地人民抗日武装，广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打击和钳制敌人，共作战千余次，歼敌2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的徐州、武汉会战，并完成了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开，部队也发展到15万余人；同时取得了在平原开展与坚持游击战争的初步经验，丰富了山区根据地的反围攻的作战经验，为尔后打破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巩固和发展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新四军实行战略展开，在 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 争，创建根据地

（参见附日15，附表8、9）

一、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 新四军，向皖南、皖中集中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虽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拒不承认湘、赣、粤、浙、闽、鄂、豫、皖八省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仍调集重兵进行“围剿”。“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虽停止了军事“围剿”，但企图通过“谈判”改编来取消红军和游击队。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1日发出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和包围袭击。”特别强调：各红军游击队“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随后，中共中央又针对谈判中出现的问题，多次指示南方各游击队：要坚持独立自主，拒绝国民党派人来游击队任职；不能无条件地完全集中，游击队驻地应背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杂，不要移驻大地方，严防国民党的暗袭及破坏，避免重蹈闽粤

边、湘鄂赣 等地区的复辙；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避免陷入右倾机会主义。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以及陈毅、曾山、张云逸等负责人分赴各游击队，阐明时局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教育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多数游击队都能根据中共中央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地分析形势，及时识破和挫败国民党的阴谋诡计，坚定而灵活地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因此，仅用了 3 个月时间，就比较顺利地完成了集中和改编。但有的游击队领导人，由于认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对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缺乏正确理解，对下山改编存有疑虑，个别的甚至拒绝下山改编，有的在谈判过程中遭到国民党军的暗算。

中共中央在正确指导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同时，还派出代表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南京国民政府企图削弱、控制红军游击队，不肯给正式番号和必要的武器装备，还要派人到红军中任职。中共中央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成立 1 个军，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于闽浙两省与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经过中共中央的努力，加之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国民政府始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10 月 1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 8 省 13 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1937 年 12 月 25 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 年 1 月 6 日移至南昌。2 月上旬，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之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之竹沟集结改编，并决定以湘鄂赣边的红十六师，粤赣边、湘赣边及赣东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下辖第一、第二团；以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下辖第三、第四团；以闽北、闽东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三支队，张云逸兼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下辖第五、第六团；以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豫南红军游击队等改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和手枪团，以湘南及闽中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军部特务营。全军共 1.03 万余人，各种枪 6200 余支（挺）。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自 1938 年 2 月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三四月间，第一、第二和第三支队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四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会合后进至皖中舒城地区。4 月 4 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继之，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

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何鸣，与国民党谈判后，按国民党当局的要求，率部近千人到漳浦城集中，于 1937 年 7 月 16 日晨被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包围，除部分突围外，大部被解除武装。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在改编时曾接受国民党派人到我军任副司令等职。

二、华中地区形势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部署

华中地区北起陇海铁路，南跨长江，西迄汉水，东至海滨，包括苏、浙、皖、鄂、豫等省和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徐州等大中城市与战略要点，地多平原、丘陵和河湖港汊，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日本侵略者力图夺取的主要地区，也是我党我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日本侵略军自1937年“八·一三”事变至10月底，先后在上海投入了陆军6个师团、海军舰艇数十艘以及陆海军航空兵数百架飞机的兵力，但在中国第三战区所属7个集团军70个师及若干旅的顽强抗击下，未能实现迅速占领上海的企图，战局陷于僵持状态。为打破僵局，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将战略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并从华北和日本国内抽调兵力到华中，先后组成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其第十军的任务是由杭州湾登陆，迂回淞沪地区中国守军的侧背，配合上海派遣军夺取淞沪地区，尔后向南京进攻。11月5日，第十军于杭州湾金山卫附近地区登陆成功，6至8日，日军迅速突破浦东之亭林、枫泾中国守军防线，占领松江，威胁淞沪地区中国守军侧背。为统一指挥，11月7日，组成了华中方面军指挥机构。其任务是：在海军协同下迅速攻占上海，尔后攻占南京，摧毁中国抗战意志，创造结束战争的条件，并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在敌实施侧后迂回的形势下，淞沪地区中国守军被迫放弃上海，向吴（江）福（山）既设防线撤退。11月12日上海失陷。敌占上海后，即以上海派遣军沿京沪线向南京进攻，以第十军主力由太湖南侧，经湖州、宣城、郎溪、溧阳向芜湖、当涂、江宁进攻，企图迂回南京侧后，与正面进攻之上海派遣军形成对南京的包围态势。至11月下旬，敌先后突破第三战区之吴福防线和澄（江阴）锡

（无锡）防线，并逼进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分别迁往重庆和武汉。12月13日，南京失陷，25日敌占杭州。第三战区部队退向浙西、皖南和赣北地区。敌占南京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南京地区30万人民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1938年春，敌华中派遣军以第三、第九、第十三师团，沿津浦铁路北进，协同华北方面军夹击徐州地区中国第五战区主力，企图打通华北、华中联系；以另一部沿江西进攻取合肥。此时，苏浙皖大部地区已成敌后。然而敌军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乡村尚无敌踪；同时，国民党军队和政权机构大部撤走。这对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个有利时机。而且，在苏浙皖地区，共产党的影响较深。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地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有的地方还组织了抗日武装。这就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创造了条件。

根据华中战略地位、形势及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毛泽东于1938年2月15日，致电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指出：新四军“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5月4日，毛泽东又在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中强调：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是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并要求新四军军部“在

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14日，中共中央再电强调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因此新四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部署，新四军军部于5月间向所属各部发出指示，明确提出该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同时，还具体地分析了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指出我军活动于交通发达的平原地区加之河川湖泊纵横，虽有小山，但公路甚多，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活动；而我军缺乏平地河川战斗经验，以及与近代装备的敌人作战的经验；但是，敌人兵力不足，空隙地区甚多，而且我军素能团结群众，即使地形不利，同样能开展游击战争。并且强调指出：“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是开展游击战的最基本条件。”基于上述条件，新四军军部在指示中提出，该军的作战原则是“积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歼灭大的敌人。”

遵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和军部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华中敌后挺进，实行战略展开。

三、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第一、第二支队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苏南地处京、沪、杭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该地区沦陷后，汉奸、土匪活动猖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开展苏南敌后抗战，牵制向华中内地进犯之敌，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遵照中共中央4月24日关于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侦察的指示精神，中共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以第一、第二、第三支队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在粟裕率领下，于4月28日由皖南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5月中旬，先遣支队到达苏南镇江地区。与此同时，第一支队在陈毅率领下由岩寺出发，挺进苏南。5月下旬，第一支队在途经南陵时，召开了干部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军部指示精神，结合江南地形、社会特点以及部队缺乏平原水网地区作战经验等情况，陈毅作了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报告分析了敌我情况，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军部关于开展华

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部署，着重指出在作战中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挥我军机动灵活、夜战、近战的特长，以袭击、伏击和破击战等战术手段，战胜装备优势的敌人。报告阐明了平原水网地区作战特点，指出在平原水网地区作战虽比在山区作战困难多些，但“寇能往，我亦能往”，

要善于利用地形而不为地形所限，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地形。同时，提出要防止不顾主客观条件，想打大仗的轻敌急躁思想。报告还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各阶层人民，战胜敌人的基本路线，而新四军的模范纪律、政治宣传鼓动和战斗胜利，是争取人民帮助军队的三大条件。这一报告，统一和提高了全体干部的思想认识，明确了挺进苏南敌后的方针任务，增强了开创苏南抗日根据地的信心。6月中旬，第一支队到达苏南溧阳竹箠桥，随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6月23日，项英在给陈毅的指示信中指出：你们目前应以茅山、瓦屋山为根据地。主力要集给于茅山、瓦屋山、新桥一带，以策应各方；现第二支队出动，当以茅山以北为宜。随后，第二支队在张鼎丞率领下进入苏南敌后，展开于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

新四军先遣支队在到达苏南后，发现镇江至句容公路上敌汽车来往频繁，遂决定在镇江西南15公里之韦岗设伏。6月17日8时许，镇江日军30余人乘汽车向句容行驶。当其进入我伏击地域时，我预伏部队突然发起攻击，经半小时战斗，击毁敌汽车4辆，毙伤敌少佐以下20余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待镇江之敌赶来增援时，先遣支队已安全转移。我军在江南首战告捷，振奋了当地民心，提高了新四军的声誉。战斗结束后，先遣支队人员即分别归建。

在继先遣支队首战获胜之后，第一、第二支队在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着手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又取得多次战斗的胜利。

位于京沪铁路镇江与丹阳之间的新丰车站，是敌军守备兵力较为薄弱的据点。站内仅驻有日军40余人，且警戒疏忽。据此，新四军第一支队决心以第二团第一营，在丹（阳）北地区8个乡人民自卫团和千余群众配合下，袭击该车站，全歼守敌。第二团第一营，根据上级赋予的任务，以1个连于车站西北500米处担任警戒，掩护地方武装和群众破坏铁路和电信线路；以1个连为突击队，歼灭车站守敌，摧毁车站设施；以1个连为预备队。7月1日夜23时许，第一营隐蔽接近车站，突然发起攻击。敌10余人冲出房屋企图突围，被我歼灭。其余敌人凭借房屋顽抗。在其拒绝向我投降后，我军举火烧毁房屋，歼敌30余人，并在彻底摧毁车站一切设施后撤出战斗。与此同时，担任破路任务的地方武装和群众也完成预定任务。这次战斗，全歼守敌40余人，摧毁车站，拆除路轨，使京沪铁路交通一度中断。8月12日，第一支队又以第二团主力袭击句容县城。当日下午，该团由句容东南之麾东出发，进抵距县城约2公里之吉利隐蔽集结，并进行具体部署：以第一营攻歼城内之敌，以第三营攻歼城北门外飞机场，以第二营于东昌街阻击镇江可能来援之敌，并掩护群众破坏道路桥梁。担任攻城的部队由东南门之间无敌防守之处搭梯登城袭入城内，歼敌40余人，余敌据守县政府和教堂顽抗。袭击机场部队，因机场内没有敌人，遂参加攻城战斗。后因敌人依托坚固房屋顽抗，我军无攻坚火器，遂撤出战斗。这次战斗虽歼敌不多，但能袭击敌占中心城市南京附近的县城，对敌人的震动和对群众的影响颇大。在新四军连续取得京沪铁路和京杭公路袭击战斗胜利的情况下，敌始感到对其威胁，遂调集兵力、车辆和船只，利用铁路和河川交通之便，不断出扰，寻我主力作战。8月23日，驻金坛之敌200余人分乘两艘船，1艘向导墅桥进犯，1艘沿丹金漕河北犯。第一支队遂令第二团集中主力相机歼敌一路。第二团根据支队命令及掌握的敌情，决心采取伏击手段歼灭沿丹金漕河北犯之敌。遂以第七连

为突击队、第九连为预备队，设伏于敌必经之地珥陵镇；另以地方武装一部在珥陵以北担任警戒，阻击丹阳可能来援之敌。当设伏部队进至珥陵附近东方桥预伏地区刚刚展开时，敌军已发觉我军行动，并且大部已离船登陆占领河堤。我军随即向敌展开猛烈攻击，敌凭借河堤进行顽抗。我军在毙伤敌 49 人后即撤出战斗。

第一、第二支队在对日军作战的同时，还大力摧毁了伪政权，并正确对待当地各种武装。对勾结敌人、残害人民的土匪武装，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对主张抗日的武装，则采取团结、争取改造的方针，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其改造、提高和扶助其发展。由于第一、第二支队贯彻执行了党的正确政策，因而，绝大部分游击武装均愿与我军合作共同抗日。其中丹阳抗日自卫团，在第一支队的指导下获得了发展，扩建为丹阳县游击纵队。与此同时，第一、第二支队还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配合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陈毅还亲自争取了茅山地区的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促使他们积极支持新四军抗战。至此，以茅山为中心包括溧阳、溧水、金坛、丹阳、句容、镇江、江宁、当涂、武进、宜兴、无锡、吴县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苏南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开创，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后方。敌遂调集 4500 余人，并配有飞机、坦克、大炮，于 8 月 22 日和 23 日由秣陵关、溧水、当涂、采石、江宁等地，兵分八路，水陆并进，企图围攻小丹阳地区，消灭我第二支队，摧毁初创之抗日根据地。23 日黄昏，我第二支队在获悉敌将围攻小丹阳地区后，当即以一部兵力阻击和袭扰敌人；主力则隐蔽集结在小丹阳以西之杨家庄，伺机打击敌之一路；另以一部兵力转至外线，袭击陶吴和当涂之敌军据点。与此同时，我第一支队则动员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对京杭、京沪、句丹等公路展开破袭战，并派出精干小分队袭击南京近郊麒麟门，以钳制敌军，策应第二支队反围攻作战。24 日，敌合击小丹阳，第二支队主力于鸡笼山给进犯之一路敌军以有力打击后，随即转移。敌合围扑空，加之其后方据点受到威胁，遂于 26 日开始撤退。在反围攻作战中，我第二支队以主力在内线作战的同时，以另一部转向外线对敌后方据点展开袭击，调动敌人回援，减轻了内线部队的压力；加之，第一支队对敌主要交通线积极展开破袭战，予第二支队以有力策应，从而粉碎了敌之围攻。9 月以后，敌又连续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至 12 月，苏南地区军民先后粉碎敌之“扫荡”近 30 次，初步巩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第三支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1938 年 7 月 1 日，新四军第三支队亦进入皖南抗日前线，活动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 60 公里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区面对敌之长江交通线，系日军第十五、第一一六师团的结合部，两部敌军经常出动“扫荡”，敌我战斗比较频繁。

9 月底，国民党军第三战区令新四军第三支队担负坚守青弋江阵地的任务。10 月 29 日，第三支队侦悉敌在湾沚、凤凰闸、大洋桥一带增兵 800 余人，企图向我青弋江阵地进犯，以配合其主力对铜陵、大通镇沿江地区的“扫荡”。我第三支队首长根据上述敌情，决心坚守青弋江阵地，以掩护南陵，策应友军作战。其具体部署：以第六团第三营在夫子决、马家园，十甲村一

线担负正面防御，以第五团第七、第九连于跑马山一带侧击进犯马家园之敌，以第八连于三叉河担任警戒，以第五团和第六团各1个营为预备队集结于蒲桥、弋江镇。30日，湾沚之敌500余人向我红锡镇阵地发起进攻。6时许，敌一部与我第六团第八、第九连各一部于清水潭展开激战。我军在歼敌百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敌占清水潭后，于11月3日，又增加400余人兵力，并分四路围攻马家园我军。我第六团第三营等部在予敌以杀伤后，主动撤离，敌遂占领十甲村、马家园。我第三支队随即调整部署，集中主力对敌实施反击，敌退至红花铺等地，我即收复马家园。当日夜，第三支队另组派精干小分队袭击湾沚及九里山敌军据点。敌人于4日上午退回湾沚。经4天战斗，我军共歼日伪军300余人。12月，第三支队奉命转至铜陵、繁昌沿江地区担任防御任务。

第四支队展开于皖中敌后

1938年4月底，新四军第四支队即展开于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并与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取得联系。5月上旬，该支队先遣队东进至巢县以南地区，侦悉蒋家河口渡口为敌西进必经之地，而且该地便于隐蔽设伏，遂决心在此伏击进犯之敌。12日，日伪军百余人由巢县向蒋家河口出动。该支队遂以第九团一部在运漕河西岸蒋家河口伏击该敌，江北首战胜利，歼敌20余人，余敌窜回巢县。

6月中旬，日军继攻占安庆后，相继占领舒城、桐城，打通了安（庆）合（肥）公路。国民党军继续西撤，六安、商城、潜山、太湖等县亦相继沦陷。为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新四军第四支队于安合公路河侧，积极开展游击战。7月间，第九团以4个连兵力，袭击无为以东运潜地区伪军，击毙50余人，俘伪副司令以下100余人，缴获步枪150余支、轻机枪6挺。9月3日，该支队特务营和第七团第三营，在桐城以南之棋盘岭伏击从安庆北开之日军运输部队汽车80辆，经半小时激战，毙敌70余人，俘4人，击毁汽车50余辆。10月，该支队1个连于安（庆）桐（城）公路铁铺岭伏击敌运输车队，经半小时激战，毙敌29人。第四支队连战皆捷，牵制了日军的西犯行动，重创了伪军，鼓舞了皖中人民。正当第四支队对日伪军作战时，巢县、庐江、无为、桐城、舒城等县封建势力，搜罗土匪、兵痞和流氓，组织保安团队，并勾结日伪军与第四支队为敌。为坚持皖中地区抗战，第四支队于10月下旬攻克庐江、无为两县城，共歼灭保安团队3000余人。

为贯彻东进方针，开展江北地区统战工作，加强对皖中抗日战争的领导，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令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北上，11月抵达无为地区，当即与国民党桂系军队建立了统战关系，并将庐江、无为地方党领导的游击队统一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与此同时，第四支队以第八团等部进至淮南铁路以东，与地方党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至此，第四支队初步打开了皖中地区的抗战局面，为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游击支队东进豫皖苏边区

豫皖苏边区位于津浦铁路、陇海铁路、新黄河及淮河之间，包括豫东13

县、皖北 8 县和苏北 3 县，对沟通华北、华中联系，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十分重要。

1938 年 5 月下旬，中共中央多次指示中共河南省委，立即动员平汉、陇海两铁路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与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河南省委迅速把工作重心转到组织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上来。首先由中共豫东特委组织了第一战区自卫军第七路和豫东游击第三支队，两支抗日武装活动于豫东睢县、杞县、太康等地。7 月间，中共河南省委又以百余人组成先遣大队，从竹沟出发，进入睢杞太地区，配合豫东游击第三支队开展游击战争。8 月 19 日，豫东游击第三支队在先遣大队的配合下，首战张固集，消灭伪军百余人。与此同时，由江苏丰县、沛县、萧县抗日武装编成的人民义勇军第十七、第十八大队袭击了杨楼车站和官桥据点。9 月 2 日，中共河南省委又根据周恩来、叶剑英关于把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开创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边区部队沟通联系的指示精神，决定开创豫皖苏边根据地，并以省委武装部长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 300 余人挺进豫东。9 月 30 日，新四军游击支队由竹沟出发东进，经遂平于 10 月 11 日到达西华社岗，与豫东游击第三支队一部及先遣大队合编，扩大为 3 个大队，共 1000 余人，仍称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统一领导豫东工作，组成了军政委员会，彭雪枫为主席。10 月下旬，新四军游击支队东渡新黄河向鹿邑前进。10 月 26 日，进至淮阳以北 20 余公里之窦楼时，驻戴集之敌约百余人向该支队进攻。该支队决心歼灭进犯之敌，以便继续执行东进任务。具体部署是：以支队直属队扼守窦楼，另以一部占领马菜园以北有利地形，钳制敌人，支队主力则对进犯之敌实施迂回包围。27 日，对敌发起反击，经 2 小时激战，歼敌数十人，残敌窜回戴集。我游击支队取得挺进敌后的初战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当地人民。30 日，该支队到达鹿邑，11 月下旬进入睢杞太地区，相继取得睢县西陵寺、杞县陈寨、宋庄等战斗的胜利。此后，睢杞太商（丘）地区的日伪军 2000 余人，对游击支队进行报复性“扫荡”。该支队及时转移，使敌扑空。由于连战获胜，游击支队的影晌逐步扩大，加上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了共同抗日的关系，初步打开了豫东抗战的局面，为尔后建立豫皖苏边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新四军自成立至 1938 年 10 月，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较为顺利地完成了集中、改编和向华中敌后挺进的任务，取得了一百数十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敌人，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在长江下游苏皖地区的广大乡村，发动与组织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着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打击汉奸、土匪，争取和改造当地各式抗日武装，使之走上与我军合作共同抗日的道路；同时大力组建群众抗日武装，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在对敌作战中，新四军针对敌兵力不足和分散固守点、线的弱点，发挥自己机动灵活的近战、夜战的特长，广泛地运用袭击、伏击与破袭等作战形式，灵活地部署和使用兵力，适时地集中、分散或转移兵力，使敌陷于迷盲困惑、顾此失彼的境地，收到了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常以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达到了在战略上消耗、削弱与牵制敌人、支援正面战场友军的目的。经半年的英勇奋战，新四军初步实现了在华中敌后的战略展开，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等抗日根据地，部队由集中时的 1 万余人，发展到 2.5 万余人，这就为进一

步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第六节 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坚持 抗日游击战争

一、积极打击与牵制日军，配合华北、华中军民抗战

(参见附图 16、 17，附表 10、 11、 12)

1936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至第七军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中号召组织抗日联军的精神，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第一至第七军。同年6月，为加强地区性的统一指挥，首先由第一、第二军组成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为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在中共东北地方组织争取下，一些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加入了抗联序列，先后又成立了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军。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抗联总兵力3万余人。其具体分布：由中共南满省委领导的第一路军（辖第一、第二军）活动于辽宁和吉林省的通化、柳河、磐石、长白、桓仁、本溪、抚顺、清原等地；由中共吉东省委领导的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和由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的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则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和牡丹江部分地区，以及榆树、五常、舒兰地区。至此，东北抗联在南起长白山，北至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的广大地区内，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日军为确保东北占领区，巩固全面侵华的战略后方，加紧推行“三年（1936—1939）治安肃正计划”，实行所谓“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方针，加强军事“讨伐”和殖民统治，同时，为对苏战备，至1937年7月初，关东军总兵力增至4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3个骑兵旅团以及5个独立守备队（相当于旅团），共10余万人，同时，还扩充伪军，使伪军总兵力达33个旅，约10万人。“七·七”事变后，日军参谋本部从关东军先后抽调4个旅团和2个支队（相当联队）的兵力，侵入华北，并以其中大部组成察哈尔派遣兵团。由于其在东北的兵力减少，被迫对抗联改取重点“讨伐”，并于同年底将重点置于北满，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包围的战法，企图将抗联第三至第十一军聚歼于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的“三江”平原。

在全国抗战形势的鼓舞下，东北各族人民抗日热情更加高涨。1937年七八月，抗联第一路军先后发出《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和《布告》，8月下旬，中共吉东省委以东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发表《关于目前抗日救国宣传运动的紧急通知》，要求抗日军民联合行动，号召伪军哗变共同对敌。9月18日，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也发出通知，号召北满地区人民积极行动起来，配合全国抗战，为光复东北而斗争。东北人民响应抗日救国会的号召，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同时，伪军警也开始分化，整团和整大队地携械反正，加入抗联。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第一路军坚持长白山区游击战争

“七·七”事变后，第一路军总部指示所属各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钳制敌关东军及伪军，配合华北、华中军民抗战。7月中旬，杨靖宇率第一军一部，由桓仁西进，9月转战到宽甸县境。10月，以第一军第一师连续在辽宁本溪和宽甸县四平街等地袭击日军守备队，共击毙日军牛岛队长、水出少佐等以下100余人。第二军在濛江（现靖宇）、辉南、抚松、桦甸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老黑顶子、榆树川、二站、西岗等地重创敌军。

由于第一路军各部有力地牵制、打击了日伪军，于是，日伪军于秋后开始对第一路军各部进行报复性“讨伐”，长白等县游击根据地遭到破坏。我第二、第四、第六师转移到吉林桦甸、濛江等地密营（设于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之中，作为临时指挥所、安置伤员、屯积军需给养和休整的场所）休整。入冬，总部和第一师也由本溪等地返回桓仁地区密营休整。1938年初，杨靖宇率总部和第一师等部由桓仁进入辑（集）安，在老岭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掠夺我通化地区资源的计划。3月13日，该部破袭老岭铁路隧道工程，使敌修建通（化）集

（安）铁路工程一再延期。4月，第二军第六师400余人，攻占长白县六道沟镇。在此期间，第二军一部和独立旅，为同杨靖宇会合，研究今后军事行动计划，从金川向南转移，于集安老岭地区与杨靖宇会合。

5月中旬至6月1日，中共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总部在老岭召开高干联席会议，决定重建第一军第三师，执行西征热河、沟通与关内八路军联系之先遣任务，军部率第一、第二师随后跟进；第二军各师留在长白山地区坚持斗争，牵制敌人，掩护西征。会后，正当第一军部署西征时，由于第一师师长叛变，暴露了西征意图，第一路军总部遂于7月初召开第二次老岭会议，果断决定放弃西征，并将所属第二、第四、第五、第六师以及独立旅先后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及警卫旅，同时令活动于集安地区的部队立即转移，以摆脱敌之围攻。7月10日，第二军一部在北移途中，于通化七道沟袭击日本武装勘探队。8月2日，第一军一部于集安西北长岗击溃伪军索玉山旅之第四十二团，缴获步枪140余支、手枪30余支、轻重机枪8挺。10月18日，杨靖宇率第一军400余人在临江以北外岔沟地区遭敌围攻，经多次战斗，歼敌百余人，胜利突围。1938年冬，第一路军所属各部继续转战于吉林集安、通化、临江、辉南、濛江、桦甸等地，不断给敌人以打击。

第二路军成立和第四、第五军西征

1937年秋，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在中共吉东省委领导下，积极协同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的抗联第三、第六、第九军重创下江地区敌军，先后取得袭击宝清县凉水泉子伪警察所、桦川孟家岗伏击战、奇袭聚宝山伪警察署等战斗胜利。

为加强统一指挥，协同作战，1938年1月5日，中共吉东省委在吉林省饶河县（今属黑龙江）境召开下江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抗联第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下辖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

由于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抗联各军不断打击敌军，因此，关东军以其第四师团为主力，纠集伪军混成第十六、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二十八旅等部，共2.5万余人，于1937年底开始对活动在下江地区的抗联各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讨伐”。抗联各军遂展开艰苦的反“讨伐”作战。1938年3月18日，敌骑兵约400人进攻第五军营地，被该军第三师之一连的16人，

阻击于宝清县石灰窑。战斗从拂晓持续到傍晚，歼敌一部，毙战马 90 余匹，我连长以下 12 人壮烈牺牲。为迅速跳出敌之合围圈，第二路军总部于 1938 年 4 月决定第四、第五军主力西征，总部率第四军一个团、第五军第三师和第七军在宝清、饶河等地坚持斗争，牵制敌人，掩护西征。

根据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的部署，西征部队分东西两路：西路，以第四、第五军之骑兵为主，由第四军统一指挥，首先夺取苇河县之楼山镇，攻占苇河县（镇），建立临时游击根据地；尔后越中东路前出至五常、榆树、舒兰等地，再视情况西进，争取与活动在南满的第一路军取得联系，并进而与关内沟通联络。东路，以第四、第五军之步兵为主，由第五军统一指挥，首先强袭中东路上绥芬河，并留少数部队建立后方基地；尔后主力转向东（宁）、宁（安），汪（清）、琿（春）等县开展游击活动，并争取恢复东老爷岭游击根据地。5 月中旬，参加西征的第四军主力和第五军一部分分别从富锦、宝清等地出发，向牡丹江方向前进；6 月中旬，部队绕经勃利、林口到达依兰莲花泡地区，与在当地活动的第五军军部和第一师会合。由于日军在中苏边境挑起武装冲突，并对中东路沿线加强封锁，我第四、第五军西征行动受阻。6 月底，西征部队于林口县之刁翎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将东、西两路部队集中，统一向五常、舒兰方向前进，与在五常活动的第十军取得联系。具体部署是：以第五军第一师为先遣队，以第四军一部、第五军第二师为前梯队，以第四军第二师、第五军教导团为后梯队。7 月初，各部由林口以西之四道河子越张广才岭，12 日拂晓攻占苇河县之楼山镇。战后，第五军教导团等部转向牡丹江地区。第四军主力和第五军第一、第二师分路向五常前进，但因地形不熟，误入延寿县境，几经辗转，至 7 月末，这两支部队始又在苇河县境会合。尔后，两部协同作战，袭击珠河（今尚志）县元宝镇“集团部落”获胜。8 月初，敌由哈尔滨、长春等地空运千余人兵力围堵我西征部队。西征各部与敌展开连续苦战，至 9 月初，始突破敌之堵截进入五常县境。此后，第四军主力和第五军第一、第二师即分散活动。第五军第一师在强敌围追下，难于立足，遂决定突围东返。10 月上旬，该师回到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岸边与敌遭遇。随该师行动之第四、第五军军部妇女团 8 名各族女战士，为掩护部队突围，与敌激战，直至弹尽，毅然跳入乌斯浑河激流之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此即为东北人民广为传颂的“八女投江”。第五军第二师余部，由舒兰突围东返宁安，几经辗转，方与第二军第五师会合。第四军主力虽同在当地活动的第十军取得联系，并积极协同作战，但处境日益艰难。至 11 月中旬，该军负责人被害，部队遂大部失散。

为配合第二路军西征行动，第一路军之第五师于同年 6 月即集中主力待命，7 月末，该师在破坏敌镜泊湖北湖头水电站设施并全歼守敌后，进入额穆地区活动。由于敌以重兵封锁，虽尽力试图与第四、第五军主力取得联系，但终未如愿。活动在五常的第十军，也曾于同年 8 月北上接应西征军，但因遭日伪军阻击未达目的。后虽与第四军会合，并取得攻打伪森林警察队、袭击沙河于日军守备队等胜利，但在强敌围攻下，也遭受很大损失。

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远征海伦

鉴于北满抗联各军聚集于松花江下游地区，有遭敌合击的危险，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 1937 年 7 月初，邀请中共吉东省委代表参加，在黑龙江省汤原

县汤旺河召开执委扩大会议，根据海伦地区日伪统治力量薄弱，易于抗联斗争、生存、发展，而且早在1936年第三、第六军即有远征小部队在海伦地区开展活动。于是决定活动于下江地区的各军以一部坚持原有地区斗争，主力远征海伦地区，发展新游击区。

会后，留第三军大部及第九、第十一军坚持延寿、方正、汤原、依兰等地抗日斗争。第六军军部率保安团及第二、第四师约700人向海伦远征。该部进入海伦县境，因强攻预有准备的敌据点，遭受较大损失。后在强敌跟踪追击下。遂返回汤原老区。同年11月，第三军又以第九师由汤原向海伦远征，并在该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到1938年6月，北满抗联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与敌连续作战数百次，取得较大战果；但自己伤亡过大，有的减员过半。为保持部队战斗力，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整编部队，将第三军缩编为4个师，同时指示各军突破敌之包围，继续向海伦远征。6月，召集各军会议确定分三批远征。首批为第六军主力，由萝北之老等山出发，8月进入海伦县境。第二批为第三军和第六军一部，于9月上旬由萝北地区出发，10月上旬进入海伦县境。10月16日，上述两批部队在海伦境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以第六军一部在海伦建立后方临时基地，以接应第三批远征部队；以第三、第六军各一部组成西北远征队，向讷河、德都发展，开辟新区；另以第六军一部执行开辟北安、通北游击区的任务。11月，由第六军教导队、第十一军一部组成第三批远征队，在富锦集结后，向海伦进发，到12月下旬抵达海伦地区。第九军主力仍留依兰地区坚持斗争，归第二路军指挥。

至此，第二路军之第四、第五军及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的西征与远征行动告一段落。各军特别是第四、第五军虽遭受较大损失，但打破了敌企图将吉东、北满抗联各军压缩包围于三江平原聚而歼之的计划，并开辟了部分新的游击区，扩大了抗联的政治影响。

二、抗日联军在极端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

日军为彻底消灭东北抗联，巩固其殖民统治，以及准备对苏作战，于1938年下半年，将关东军兵力增至7个师团，并加紧对抗联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开始进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到1939年底，关东军增至9个师团。同年，敌调集重兵，以抗联第一路军为重点，连续地进行“讨伐”，使抗联部队得不到休整机会；并提出“匪民”分离等口号，加紧招抚诱降，企图分化瓦解抗联队伍，致使抗联中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先后叛变投敌。同时，实行所谓“米谷管理法”，以及控制布匹、鞋帽、油盐、医药等物资，以断绝抗联生活必需品的来源。日本侵略者还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先后在哈尔滨平房镇、长春孟家屯设立代号为“731部队”和“满洲100部队”等细菌研究机构。“731部队”还于海拉尔、林口、孙吴和牡丹江等地设支所，惨无人道地用抗联被俘人员和群众进行细菌试验，致使数千人惨遭杀害。

由于日伪军疯狂的军事“讨伐”、严密的经济封锁，抗联活动地区日渐缩小，部队大部被迫转移到深山密林，战斗在冰天雪地之中，粮食断绝，常以树皮和野果充饥，备受艰难困苦。然而，抗联在几经辗转得到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六中全会给东北抗联、东北人民致敬电的鼓舞下，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的思想指导下，尽管斗争形势日趋恶化，处境日益艰险，

但绝大多数部队仍不屈不挠地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第一路军的艰苦斗争

为坚持吉林、辽宁两省东部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粉碎敌之重点“讨伐”，1939年春节前夕，第一路军一部在杨靖宇的率领下，袭击吉林省桦甸县木箕何林场，全歼伪森林警察队，缴获步枪近百支、轻机枪3挺、军用物资一部。4月初，又袭击了敦化大蒲柴河日军野战仓库，解除了伪警察200余人的武装。尔后，第二军继续在桦甸一带活动，第一军向东部山区转移。这时，敌集中日伪军警共7万余人，重点“讨伐”抗联第一路军。敌采用“分兵驻守、随时出动”，“分进合击、穷追搜捕”，以及封锁要路等手段，并组织“特殊工作队”（亦称“特别搜索班”）实行“狗虱战术，盯住不放”，跟踪追击。在敌人的围攻中，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艰苦转战，牺牲较大。第二、第三方面军虽受到一些损失，但仍给日伪军以很大打击。6月上旬，第二方面军在安图红旗河附近闭门屯设伏，歼敌50余人。尔后袭击敦化大蒲柴河，全歼日军助川“讨伐”队；破袭延吉地区天宝山铜矿，迫其停产一年。8月23日和24日，第三方面军在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指挥下，采取“攻城打援”战术，以一部兵力攻克安图县城，消灭伪警察署，以另一部兵力于安图以北大沙河伏击由明月沟出援之敌。这次战斗，全歼日军宫本队长以下100余人，缴获步枪近百支、轻机枪2挺，毁汽车7辆。25日，又在大沙河以北柳树河子附近设伏，毙敌“讨伐”队近百人，毁敌汽车5辆。9月20日，该部又于敦化以南寒葱岭伏击敌军，毁敌汽车12辆。秋后，鉴于敌情严重，该方面军即以团为单位分散活动。入冬，中共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总部在桦甸以东红石砬子附近召开干部会议。为减少牺牲，保存实力，会议决定部队分散活动。1940年初，杨靖宇率总部直属队攻克濛江西北龙泉镇，虽取得毙伤敌近百人的胜利，但暴露了总部行踪，加之叛徒告密，日伪军警遂组织多支“讨伐”队跟踪追击。杨靖宇将部队化整为零，并单独率一支小分队在濛江县西部、辉南县东部与敌周旋，转战50余天，作战40余次，仍未能突出重围。2月23日，杨靖宇在濛江西南保安村三道崴子壮烈殉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尔后，第一路军在魏拯民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第二路军突破敌人封锁向东部国境转移

1939年初，敌集中约6000人兵力，编成十几支“讨伐”队，对第二路军总部和第五军等富守部队轮番进行“讨伐”。3月底，周保中在林口县牡丹江西岸四道河子主持召开中共吉东省委扩大会，决定总部率第四军国守部队向宝清、密山方向转移，第五军向穆稜、东宁方向转移。4月初，日军黑石“讨伐”队步、骑兵约700人，跟踪追击第二路军总部。在周保中等指挥下，总部直属队及第五军一部于海林以北葫芦崴子予敌以打击，毙伤敌百余人。4月15日，部队由林口以北后刁翎出发，隐蔽地通过敌之封锁，于6月20日到达宝清兰棒山后方基地。4月15日夜，第五军由林口徐家屯附近渡过乌斯浑河，向穆稜方向转移。23日，该部于穆稜泉眼河一带伏击跟踪之敌获

胜。5月初到达宁安镜泊湖地区。在此期间，第七军在虎林、饶河袭击敌据点，截击敌运输队，并巩固了后方基地。第十军在舒兰等地不断打击敌人，继续坚持斗争。

第三路军成立和开展黑（龙江） 嫩（江）平原游击战

为加强和统一指挥，抗联第三路军于1939年5月30日，在黑龙江省德都县东北之朝阳山正式成立。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活动于黑龙江省北部十几个县境内，先后开辟了朝阳山、阿荣旗、甘南等游击区。在嫩江两岸活动的部队，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共与敌作战40余次，攻占讷河等城镇，歼敌25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支。同年9月，第三、第六军各一部联合袭击德都县伪警察署，毙敌百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

第一、第二、第三路军缩编和 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鉴于抗联各路军均遭受较大损失，中共吉东、北满省委的部分代表于1940年1月20日，在中苏边境地区集会，决定采取保存实力、逐步收缩的方针，将第一路军缩编为第一、第四、第七支队，第二路军缩编为第二、第五、第八支队，第三路军缩编为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支队。三四月间，第三路军所属部队完成了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支队的缩编。4月1日，第二路军总部将第七军缩编为第二支队，1941年2月，将第五军缩编为第五支队；第十军由于军长牺牲，部队大部失散未能编成。第一路军远在南满，联系中断，故仍以几个方面军番号开展活动；到1941年3月始将第二方面军一部编成第一支队。各路军基本完成缩编后，积极展开对敌斗争。1940年9月25日，第三路军第三、第九两个支队攻占克山县城，重创日军守备队，缴获步枪100余支，解放狱中300余名同胞。10月，第三支队袭击嫩江以北霍龙门车站，烧毁车站、仓库等建筑物，打乱了敌人修筑黑（河）嫩（江）铁路的计划。8月上旬，第十二支队奉命由木兰地区出发，8月底9月初进入哈尔滨附近之肇东、肇州地区活动。9月11日夜，首袭肇州东北丰乐镇，歼敌80余人，尔后，于11月8日攻克肇源县城，歼敌一部。这些胜利，鼓舞了人民，震惊了敌人。敌遂调集重兵围追第三、第九和第十二支队。上述各部即分散转移。在此期间，第二路军之第二支队在虎林，第五支队在林口、东宁、瑷春等地活动，先后取得了奇袭穆棱以南大碱场、东宁杨木桥等战斗胜利，并争取了驻宝清以北七星镇伪军1个连反正。第一路军在桦甸、敦化等地坚持斗争。1940年3月下旬，第二方面军袭击安图大马鹿沟敌“讨伐”队，毙敌50余名。入夏，第三方面军在安图红旗河设伏，毙日军前田总指挥以下140余人。

1941年，抗联全部兵力不足2500人，魏拯民等负责人相继牺牲。为适应形势需要，东北党组织于1940年12月下旬至1941年3月中旬在中苏边境地区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确定采取保存力量、培养干部的方针。会后，抗联部队于中苏边境分别组成南、北两个野营，进行军政整训，并组成若干个游

击小分队深入内地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东北人民的支援下，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长期坚持东北抗战，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表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坚强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全国抗战爆发后，抗联钳制与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大量兵力，对全国抗战起到了战略上的配合作用，支援了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了重要贡献。

然而，在长期残酷的抗日斗争中，抗联受到很大损失。客观上是敌强我弱，特别是1938年以后敌我力量更为悬殊，而东北铁路、公路交通发达，便于敌军机动，并且自然环境比较艰苦，抗联活动地区大部人烟稀少，冬季严寒长达半年，加之敌人实行“归村并屯”，建立“集团部落”，切断抗联与人民的联系，迫使抗联退居深山，风餐露宿。主观上，长期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领导，独立奋战，特别是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王明、康生决定撤销中共满洲省委，使东北抗日斗争失去统一领导，形成各自为战，缺乏战略上的有机配合，给敌人各个击破以可乘之机。

抗联的斗争实践表明，要坚持长期的敌后游击战争，就要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讨伐”。敌在“讨伐”中通常先以一部兵力组成所谓“警备队”，固守点线，对抗联所在地区构成严密封锁包围；尔后，以主力组成若干“讨伐队”，对抗联所在地区进行反复“清剿”。抗联则根据情况，如敌兵力不大，则在内线以伏击、袭击、近战夜战，声东击西，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或转移，坚持“不攻坚，不死守，不打硬仗”的原则，以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拖疲拖垮敌人。如敌集结重兵，形成合围，企图聚歼我军时，我军则以一部兵力就地分散坚持斗争，钳制敌军，掩护主力转移；主力部队迅速转向外线作战和开辟新的游击区。转移方向和地区，应是敌之兵力和统治薄弱的地区，并避免通过敌之主要交通线及其统治的腹心地区。

在军事上反“讨伐”的同时，还必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在政治上，敌人提出“匪民”分离和“专打共产党，不打山林队”等口号，企图分化、瓦解各抗日武装；同时，实行“归村并屯”，建立“集团部落”，企图切断抗联与群众的联系，以孤立抗联。在经济上，日伪统治者实行“配给制”，进行严密控制和封锁，企图断绝抗联的物资来源。抗联则针对敌之企图，在政治上，提出“不分党派、信仰、山头，共同抗日”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派人打入伪军、伪政权和“集团部落”内部，掌握敌情和组织群众斗争，以粉碎敌人的分化瓦解和孤立抗联的阴谋，同时，通过各种渠道，购买转运物资或袭击敌之兵站和交通线，取之于敌，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要坚持长期的敌后游击战争，还必须建立根据地。根据地是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基地。“七·七”事变前，在长白山区和松花江下游地区，1938年后，在黑龙江省北部，抗联都曾经建立过游击根据地。但均由于没有充分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因而很不巩固，相继遭到破坏。以后，各部普遍建立的密营，又因地处深山老林，远离群众，所以不能持久。这是抗联遭受严重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坚持长期敌后游击战争的部队，还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战胜困难，应付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抗联部队成份复杂，除少数部队工农群众比例较大外，多数部队系收编的“山林队”、义勇军，甚至土匪、民

团。对这些武装，尤其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将他们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但因战斗频繁，缺乏经验，抗联的大多数党组织只注意一般的思想教育，对军事领导权的掌握不够，只注意上层的统战工作，对下层士兵的思想教育不够；对上层的统战工作只注意团结，甚至迁就，忽视对不良倾向的斗争和部队成份的改变。因此，在形势恶化，条件艰苦，敌人诱降，以及战斗失利等情况下，出现了动摇甚至叛变，使抗联蒙受较大损失。

在 14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一些在中国东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分子及其所创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在与共同敌

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其中许多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充分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本章小结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是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扩大阶段。在此阶段中，日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国民党军广大爱国官兵虽浴血奋战，但由于其最高当局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因而作战失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局十分危急的形势下，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奋斗于白山黑水之间，积极牵制日本关东军，对华北、华中抗战起到了战略上的配合作用。在这一阶段中，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缴获各种枪1.2万余支，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并使自己由出师时的4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对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八路军、新四军贯彻执行党的洛川会议确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结果。八路军、新四军取得伟大胜利的主要经验是：

一、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现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先决条件。正确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处理好既统一、又独立的辩证关系。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战是被迫的，因而，它具有动摇性、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并企图借“统一”来控制、削弱以至消灭我党我军。所以，我党我军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阶级的警觉性，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样，才不致把合作变成混同，束缚自己的手脚，才能保持自己原有的阵地和发展新的阵地，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国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然而，独立自主必须服从抗日这个总目标，必须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否则也将妨害统一战线，不利于全国抗战的坚持。只讲“统一”，就会导致无原则的迁就，犯右倾错误；只讲“独立”，不顾抗日的大目标，就会犯“左”倾错误。

我军在抗战初期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正确地处理了独立与统一的关系。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时，既坚持了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权和建立独立的指挥机构，又在名称和数额上作出了让步。在建制上，我军虽属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序列，“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但各项工作和作战行动，仍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受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对有关协同作战与装备、经费等重大问题，则通过国共两党谈判解决。这样，既有利于共同抗日，又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取消、削弱和控制我军的图谋，保持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人民军队的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89页。

1937年7月15日见《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本色。在共同对敌协同作战问题上，我军根据统一战略下独立自主的原则，贯彻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发挥我军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特长，在敌之翼侧和后方积极牵制与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避免担负与本身装备、特长不相适应的正面的阵地防御任务，避免在战役战斗上受国民党当局的直接指挥，以保证自己有在规定的战略任务下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和组织游击队的自由。这样，既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有效地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又迅速地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以便使我军逐步成为坚持抗战的主要力量。这是正确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执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结果。但是，在个别地区和单位，由于一度受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因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自己的发展受到了影响。实践证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必须不断防止和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在统一战线形成之前，主要防止“左”倾关门主义；在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主要防止右倾投降主义。

二、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坚决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

抗战初期，我军数量很少，装备很差，而面对着的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强敌，同时，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军，对我不怀好意；而战场又是脱离战略大后方的华北、华中敌后广大地区。依据这一形势和特点，中共中央、毛泽东制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深刻地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并要求我军迅速由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正规战向抗日战争的游击军（指分散使用兵力）和游击战转变，以便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实现军事战略转变，必须注意防止和纠正轻视游击战争的倾向。抗战开始，由于一些人对敌强我弱和抗日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认识不足，曾产生轻视游击战和主张以大兵团运动战为主的思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这种思想，反复地阐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时地予以纠正。特别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发表，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指战员对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使本来是极为困难的转变，得以较为顺利地实现。战争实践证明，这一转变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能否在敌后生存和发展，关系到敌后抗成伪坚持和胜利，也关系到全国抗战能否坚持和胜利。正是由于我军执行了基本是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没有按照王明提出的“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的方针去同敌人进行所谓正规战，才保存和壮大了自己，创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正是由于我军在敌后战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才牵制了敌军大量兵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友军，对停止敌之战略进攻，争取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要作用。

我军自挺进敌后到武汉失守，主要在日军之翼侧和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采取伏击、袭击和反围攻等作战形式，迟滞、疲惫、牵制、消耗和歼灭敌人，在战役和战略上配合与支援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创建与保卫抗日根据地，并取得了对日军作战的初步经验。在挺进敌后之初，我军针对日军长驱直入，骄横麻痹，疏于戒备和对交通线依赖性大等弱点，

充分发挥自己的近战、夜战和山地战的特长，主要采取伏击战和袭击战的作战形式。伏击战主要打击运动中的日军，根据情况，在日军必经之地选择便于隐蔽、观察和发扬人力与展开突击的有利地形，构成一翼、两翼或三面伏击的部署，进行严密的阵地伪装，待敌或诱敌进入伏击地域，尔后以突然猛烈的人力和突击，分割包围歼灭之，可收隐蔽突然，以逸待劳，出敌下意，速决全歼之效。袭击战，主要对驻守交通线、后方兵站和机场之日军实施奔袭或夜袭。通常选择夜暗、天雨等有利时机，迅速隐蔽地开进、接敌，选择敌军守备薄弱之处为主攻方向，组织强有力的突击队和足够的钳制与阻击援敌的兵力以及预备队，并在作战行动上勇猛果敢，速战速决，迅速转移。在我军实施战略展开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日军通常依托交通线和中心城市，采取多路围攻的战法，企图乘我军立足未稳，加以消灭或驱逐，并摧毁初创的抗日根据地。但由于日军兵力不足，缺乏后续力量，因而只能控制“点、线”，难于实现“面”的占领，并且对各抗日根据地只能逐一进行围攻，这是日军的弱点。针对日军之企图和弱点，我军采取军民结合、主力兵团与群众武装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广泛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在部署上贯彻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的原则。即以主力一部配合群众武装，以老部队为骨干带领新组建的部队，于内线广泛开展游击战与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相结合，钳制、袭扰、消耗、疲惫敌人，为主力部队隐蔽转移、待机歼敌创造条件；主力大部则避敌锐势，或集结于内线机动位置隐蔽待机，或乘敌之隙转至外线待机，待敌在我内线军民不断袭扰打击下，已疲惫沮丧、战斗力受到削弱时，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选择敌之一路，以战役战斗的袭击战歼灭之；或采取围困敌占城镇据点，断敌交通补给，迫敌出逃，于追击中歼灭之；或采取围点打援，调动敌人，于伏击中歼灭之；或在外线袭击敌后方交通线和据点，迫敌回援，于途中截歼之。总之，力求歼敌于运动中。如此打破敌之一路以后，再转移兵力击破其它各路。同时，友邻各战略区部队，亦适时向围攻之敌后方交通线出击，以打击与钳制敌军，策应反围攻地区部队的作战。在集中兵力打破敌之一路时，则根据情况，有时选择深入我根据地腹地孤立、突出的一路，有时则选择对粉碎敌之围攻具有决定意义，并且已被削弱的主要一路。实战证明：围攻之敌往往在其一路特别是主要一路被打破之后，其余备路便纷纷撤退。

三、抓住有利时机，大胆深入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

抗战开始，日军长驱直入，其后方空虚；国民党军迅速撤退，大片国土沦陷，这正是我军深入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抓住了有利时机，迅速大胆深入敌后，首先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太岳山和吕梁山，展开于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和晋西南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对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形成四面包围的有利态势；尔后，以山区根据地出发点，进一步向冀、鲁、豫平原发展，完成了在华北的战略展开。新四军虽因某些领导人受王明的右倾错误影响，失去一些有利的发展时机，但在中共中央的指引下，也逐步深入长江南北，实现了在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的战略展开。我军

实行战略展开，初步开辟了敌后战场，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略展开必须围绕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一中心任务。抗日根据地是我军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必要条件。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由于我军脱离战略总后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必须依托根据地，才能站住脚跟，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才能取得人力、物力的源源补充，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完成抗战的历史任务。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都将失去基础，敌后游击战争就不能长期坚持和发展。因此，中共中央在我军挺进敌后实行战略展开时，便着重从思想认识上解决分兵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与集中兵力作战的正确关系问题，纠正了少数人一度存在的只想集中兵力打仗而忽视创建根据地的思想，从而使我军抓住了建立抗日根据地这一中心环节，摆正了对敌作战与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关系。我军到达敌后之初，首先集中主力部队积极作战，消灭与驱逐敌人；同时，以一部兵力掩护地方党着手发动组织群众。在初步打开局面后，即以部分兵力担负对敌作战，而以主要兵力分散协同地方党政干部组成工作团，深入广大乡村，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加紧进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实践证明，只有积极作战才能消灭和驱逐敌人，赢得广大人民群众信任、拥护和支持，为建立根据地创造必要的条件；而作战又必须以开创、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为主要目的，这样才能获得赖以长期坚持的依托。只有发动和组织了广大群众武装，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

第三章

广泛深入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华北、 发展华中、开辟华南抗日根据地

第一节 武汉失守后的形势。我党 我军的方针和任务

（参见附日 18，附表 13—17）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早自占领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武汉和广东的作战计划，但由于兵力、资材和船舶运输等条件的限制，遂暂告停止。及至 1938 年 5 月中旬侵占徐州后，日军大本营于 6 月 15 日的御前会议上再次研究了攻占武汉、广州的作战计划，认为只要占领武汉，控制黄河、长江之间的中原地区，并侵占广东，切断国际上援华的补给线，就可以支配中国；而且攻占武汉、广东的兵力、船舶和资材已准备就绪，遂作出攻取武汉、广州的决定。据此，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于 7 月 23 日订出《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明确攻取武汉的作战目的，在于摧毁中国军队的统一的指挥中枢，控制黄河、长江之间的中原地区；确定在作战指导上，首先尽力给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以“重大损害”，尔后“竭力限制战局的扩大，采取紧缩持久的阵势”，“在汉口附近留下若干机动兵团”，“预期北自武胜关、南迄岳州（今岳阳）附近构成一条持久战线”，并控制武汉以东长江沿岸各要点。明确广东（州）作战的目的，在于切断国际上援助中国政府的主要补给线，挫败第三国援华意图，其作战指导方针是：“采取急袭方式”，“果敢迅速地攻陷广州，然后在广州附近，切断粤汉线、珠江、西江交通，采取紧缩持久态势”。

8 月 22 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进攻武汉作战命令。同日，其华中派遣军也向所属第二军（7 月 4 日由华北方面军转隶）、第十一军发出命令，决心集中 9 个师团共 20 余万人，在海军和航空兵协同下攻取武汉，消灭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挫伤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据此，令第二军和派遣军直属兵团由庐州（今合肥）集结地区出发，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北岸向西进攻，并占领豫南之信阳，夺取武胜关，切断平汉铁路，尔后向汉口进攻；令第十一军由九江、安庆集结地域出发，沿长江及其南岸向西进攻，占领湖南岳州，切断粤汉铁路，并向武昌进攻。针对日军之企图和部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心以第五、第九战区及第三战区和鄂豫边总司令部所属部队共 50 个军 124 个师 70 余万人的兵力保卫武汉地区。其部署：以第五战区于鄂豫皖边依托大别山抗击江北日军的进攻，以第三战区一部于皖南沿江一带阻击和牵制沿长江及其南岸进犯之日军，以第九战区（原为武汉卫戍司令部）担任武汉外围及长江南岸的防务，以豫鄂边区总司令部所属部队于鄂豫交界平汉路西侧击沿平汉路南犯之日军。

8 月下旬，各路日军展开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抗击，给予日军很大杀伤，但由于最高当局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各路日军先后逼近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 10 月 25 日决定放弃武汉。27 日，日军占领武汉。在华中日军进攻武汉的同时，华南日军第二十一军（9 月 19 日编成）第十八、第一四师团，于 10 月 12 日由广东大亚湾

登陆，尔后分两路向广州进犯。10月13日，由华北方面军转隶该军的第五师团由青岛起航，20日抵达珠江口，尔后溯珠江而上，进攻虎门要塞。21日，日军占领广州，23日占领虎门。国民党军第四战区主力退向粤北地区。日军遂以广州为中心向北、南、西三个方向发展进攻并占领增城、佛山、三水等地。

广州、武汉失陷后，敌、友、我三方面的战略态势发生了变化。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战线进一步延长，兵力进一步分散，其华北方面军的战线，北起绥远的西苏尼特、包头，中经山西的同蒲铁路至风陵渡，接着沿黄河东至河南开封，转而南至安徽亳县，上述各点连线以东地区均成了华北方面军的后方。其华中派遣军的战线，一部分北起合肥，中经芜湖、宣城，南至杭州的连线以东地区，一部分以武汉为中心，北至信阳，西至安陆、应城，南至岳州，东至九江附近地区。其在华南的第二十一军则控制以广州为中心的地区。

根据战局的变化，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1月下旬召开南岳（湖南衡山）军事会议，决定重新调整部署和划分战区：以第八、第二、第一战区共60余个师的兵力，在北起绥远西部、中经山西的西北、西南部以及河南西部、中部和安徽北部与敌华北方面军相对峙，以第五、第九、第三战区共100余个师的兵力，于皖西、鄂北、豫南和鄂南、湘北、赣西以及皖南、苏南、浙西、豫北等地与敌华中派遣军相对峙；以第四战区10余个师的兵力于粤北、粤西等地与敌第二十一军相对峙；同时，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指挥派回华北敌后的部队。

至广州、武汉失守，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大青山、晋西北、晋西南、晋察冀边、晋冀豫边、冀中、冀南、冀鲁豫边、鲁西、鲁中、胶东、豫东、皖中、苏南、皖南等抗日根据地，消耗和牵制日军大量兵力，对日军造成严重威胁，并与正面战场友军在战略上构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形成了正面与敌后、内线与外线、有后方与无后方、包围与反包围、大块与小块以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斗争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

广州武汉失陷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和中国国民党方针政策的改变。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武汉，虽部分地实现了它的侵略意图，但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国内人民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决抗战，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广阔的华北、华中战场上消耗与牵制其大量兵力，对其构成严重威胁；因而，在侵占广州、武汉后，不得不改变其侵华的方针和策略。

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1938年11月3日至22日，日本近卫内阁连续发表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近卫三原则”，声称只要中国允许日本在特定地区驻军和开发华北、蒙疆的资源，日本则考虑撤销治外法权、归还租界，从华中和华南撤兵，企图以此为诱饵，引诱国民政府投降反共，从而达到其“以华制华”的目的。

在军事上，日本侵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改取以保

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打击我党我军，并将重点置于华北。1938年12月初，日本大本营在其命令和决定中，要求侵华日军必须确保占领区的“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扑灭抗日势力”，实现由“点、线”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要求华北方面军必须确保已占领的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并迅速加强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以及包头以东的“蒙疆”地区的“治安”；要求华中派遣军必须确保合肥、芜湖、杭州以东的占领区及主要交通线，并迅速加强京、沪、杭地区的“治安”。为了贯彻上述命令和决定，对侵华兵力部署进行了调整。在华北，成立了第十二军司令部（驻济南），以接替转属华中派遣军的第二军，负责指挥山东和苏皖北部地区的日军；在华中撤销第二军司令部，并由华中、华南抽调第十、第二十七、第五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同时由国内向华北、华中增调9个师团、5个独立混成旅团。至1939年4月，侵华日军总兵力（不含关东军）达到30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3个骑兵旅团、1个支队和4个飞行团，共80余万人。为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加强对伪政权、伪军的控制以及“促进对重庆的工作”，根据大本营决定，于1939年9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同时撤销华中派遣军的指挥机构，调出7个师团，调入7个独立混成旅团，并在上海设立了第十三军司令部。至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一军，共23个师团、16个独立混成旅团、3个骑兵旅团。此外，还大力扩充伪军，使华北、华中的伪军增加到14万余人，企图以增强伪军力量来克服其兵力不足的弱点，达到其巩固占领区的目的。

在经济上，加紧掠夺占领区资财，建立所谓“长期自给体制”。在华北，成立所谓“开发公司”，大肆掠夺煤、铁、盐等资源；在华中，成立所谓“振兴公司”，掠夺粮、油、棉等物资；在华南则获取所谓“特殊物资”。企图通过上述措施，克服财经困难，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

在外交上，加紧与德、意法西斯的勾结，对英、美施加压力，企图通过英、美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尽早结束侵华战争。同时，做出反苏姿态，继张鼓峰事件之后，又制造了诺门坎事件，以迎合英、法等国的反苏情绪。

在日本侵略者疯狂侵华的同时，法西斯德国在欧洲也加紧对外侵略扩张，继1938年4月吞并奥地利之后，于5月陈兵捷克边境，进一步提出吞并捷克苏台德地区的要求，并以战争相恐吓，胁迫与捷克有同盟关系的法国以及英国让步。英法等国为了谋取同德、意法西斯的妥协，并把法西斯侵略的矛头引向苏联，于9月30日与德、意法西斯签订了出卖捷克民族利益的慕尼黑协定。然而，德国法西斯并不以此为满足，于1939年3月15日出兵吞并了整个捷克。在此形势下，苏联向英、法等国倡议建立反法西斯联盟，以阻止德、意法西斯侵略，但却遭到了英、法帝国主义的冷遇和拒绝。为了推迟苏德之间的战争，苏联在德国主动提出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情况下，于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了条约，从而挫败了英、法帝国主义者“祸水东引”的阴谋，赢得了反侵略战争准备的时间，并且加深了德、日法西斯之间的矛盾。日本本想借德国在西方牵制苏联，以便其调集兵力在诺门坎地区再次向苏蒙联军进攻，但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迫使其不得不停止再次进犯，与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在英、法、美等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的怂恿下，德国法西斯于9月1日入侵受英、法保护的波兰。英、法于3日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欧战爆发后，英、美、法等国为了在西方与德、

意法西斯对抗，因而在东方极力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对日本继续推行绥靖主义政策，积极策划“东方慕尼黑”阴谋，准备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企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同日本的妥协，以维护其在远东和太平洋区域的殖民利益。

日本侵华方针的改变，英、美等国“东方慕尼黑”的阴谋活动，对中国抗战产生了严重影响。中国抗战开始出现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危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七·七”事变至武汉失守期间，抗战比较努力，与共产党关系较好。国民党军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上互相配合作战，因而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挫败了它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但至武汉失守后，在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和英美对日妥协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内部发生了进一步分化。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一步与日本勾结。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离重庆跑到河内，公开叛国投敌，成为可耻的汉奸卖国贼。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由于受英美对日政策的影响，加之战争失败主义情绪的滋长，以及仇恨和惧怕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因而，逐渐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在其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设立了所谓“防共委员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2月，蒋介石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于是，不断制造反共惨案，并以部分主力及大量游杂武装返回敌后，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制造反共军事磨擦，同时以其第十战区和第二、第八战区各一部共50余万人的兵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接着在11月召开的五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随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由于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后，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因而，中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正是在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1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毛泽东在报告中总结了15个月的抗战经验，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新阶段全国抗战的总任务以及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全会讨论了上述报告，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从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明确了新形势下我党我军的方针任务。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的全国抗战的总任务；要求全党全军站在抗日战争最前列，成为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坚强核心，发挥先锋与模范作用，为实现新阶段抗战总任务而斗争。并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总任务，必须不断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注意防止与纠正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或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错误倾向，正确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还指出，党的主要工作方面应放在战区和敌后，必须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进一步贯彻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但应看到在某些重要地区，如华北和长江下游将遇到敌之疯狂进攻，平原地区

将难于保留大的兵团，山区将成为主要根据地。因此，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在游击战争已经充分发展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基础，以准备在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在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以免敌人回师后发展困难。根据上述分析判断，全会最后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任务。为适应发展华中和华南战略任务的需要，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为贯彻“巩固华北”的方针，并针对敌在华北先取平原，后取山区的企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以3个师的主力，于1938年12月，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地区和山东地区，协同各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壮大自己，巩固和扩大各抗日根据地。同时，要求新四军大力发展华中，首先开辟豫鄂边、豫皖苏边和皖东等地区。要求广东地方党组织迅速组织抗日武装，在琼崖和东江、珠江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1939年7月，中共中央针对抗战中出现的日趋严重的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危险，在纪念抗战两周年宣言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同国民党中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顽固势力作斗争，坚决抗战，直到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自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各项正确的方针政策，是我军打破日、顽夹击，继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第二节 八路军主力挺进冀鲁平原和 粉碎日军对山区各抗日根据地的 “扫荡”

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后，根据其大本营确定的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把打击的重点指向华北的八路军。为此，相继从华中、华南正面战场及其国内抽调7个师团又5个独立混成旅团加强华北方面军。至1939年4月，华北日军总兵力达到15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占其侵华总兵力30个师团（不含关东军）的半数以上。6月，敌虽从华北调出5个师团，但仍保留10个师团、11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

敌华北方面军为了确保占领区的“安定”，特别是确保河北省北部、山东和山西省北部、察哈尔以及绥远等占领区的“治安”，制定了1939年度的“治安肃正计划”，其企图是：首先集中兵力摧毁抗日根据地，尔后分散兵力占领要地建立据点，再依托这些据点，对八路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使八路军“得不到喘息时间和安身处所”，逐步削弱并最终消灭八路军，从而达到由“点线”扩大力“面”的占领和确保占领区安定的目的。计划分三期实施，第一期从1月至5月，首先集中兵力对冀中、冀南等平原地区，尔后对晋西、晋北、五台等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为高度分散部署兵力打下基础；第二期从6月至9月，高度分散部署兵力，广泛建立据点，并依托据点反复地进行“扫荡”；第三期从10月至1940年3月，主要是继续完成第二期的任务。为实施上述计划，敌华北方面军调整了兵力部署：以第一军所辖5个师团和3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山西全境，以第十二军（1938年11月11日编成）所辖4个师团和3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山东全境和苏皖北部；以驻蒙军所辖1个师团和1个独立混成旅团及骑兵集团，部署于察、绥地区；以方面军直辖的5个师团和4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河北全境和河南北部，并执行机动作战的任务。华北方面军在调整部署的同时，向各兵团下达了第一期“肃正作战”任务。其要点是：以第十、第一一、第十四师团，首先沿平汉铁路以西封锁山西边境，切断北岳、太行山区与冀中、冀南平原的联系，尔后以主力对冀中、冀南和山东北部实施大规模的“扫荡”。这一任务达成后，再转移兵力“扫荡”太行、北岳山区。

根据敌情和中共中央赋予的“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1938年10月至1939年12月多次发出指示，指出，敌将继续增兵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华北将转入严重的、艰苦的斗争环境，对此我们必须有所准备。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八路军深入发动与组织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健全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以调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注意征集资财，以支持长期战争，加强宣传教育，以坚定军民的抗战胜利信心。同时，还针对日军首先“扫荡”平原地区，尔后“扫荡”山区的企图，提出了坚持平原以巩固山区，巩固山区以支持平原，坚持以游击战为主，削弱与疲惫敌人，相机集结主力实行反击，以粉碎敌之“扫荡”的作战指导原则。1938年10月至12月，八路军总部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命令第一二、第一二九、第一一五师等部主力，挺进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和山东地区，执行巩固抗日根据地、帮助当地抗日武装提高战斗力并发展壮大自己的战略任务。

一、八路军主力挺进冀鲁平原，协同

当地武装粉碎日军的“扫荡”

第一二 师主力挺进冀中

(参见附日 19、 20)

1938年11月12日至12月9日，日军以第一一 师团和第二十七师团各一部共6000余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攻，12月21日至1939年1月24日，日军又以千余人的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攻，并占领了安国、博野、蠡县以及容城、雄县等县城。此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冀中抗日武装虽有约10万人，并成立了冀中军区和八路军第三纵队，但部队成员较新，组织领导系统还不够健全，缺少骨干，根据地的党政建设也急待加强。为此，八路军总部于12月命令第一二 师主力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帮助第三纵队和发展部队的任务。12月23日，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率师直属队、教导团、第七一六团、独立第一支队等部，由晋西北岚县出发，越过同蒲、平汉铁路，于1939年1月下旬进抵冀中的河间县惠伯口地区，与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合。2月上旬，该师第七一五团也由大青山进抵冀中。中旬，成立了以贺龙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并建立了以贺龙、吕正操为正副总指挥的指挥部，从而统一了冀中地区党政军的领导。

日军继1938年11月和1939年1月两次围攻冀中抗日根据地之后，又从1939年1月25日起，以第二十七师团、第一一 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各一部共7000余人，分别从定县、保定、沧县、泊头等地出动，对储龙河、子牙河之间地区进行第三次围攻，企图歼灭我驻该地的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和部队。为打破日军的企图，初到冀中的第一二 师主力与冀中部队，在贺龙、关向应的统一指挥下，以冀中军区部队一部在子牙河东和潞龙河西，积极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以第一二 师主力隐蔽于河间地区待机。2月2日晨，日伪军200余人，由河间县城向肃宁方向进犯。当其进至曹家庄附近时，第一二 师第七一六团及独立第一支队突然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歼敌150余人，残敌逃向河间县城。战后，第七一六团转移至大曹村。4日，敌近千人又由河间西犯，当其向大曹村实施攻击时，第七一六团依托村落展开抗击，激战一天，毙伤敌300余人，粉碎了敌之第三次围攻。但敌不甘心失败，又于2月9日至15日，以2400余人的兵力对冀中进行第四次围攻。9日，敌从博野、蠡县出动600余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进占邹村；从安平出动400余人进占王村；从献县出动1000余人进占武强，并在深县集结400余人待机。企图合击驻邢家庄、北村地区第一二 师第七一五团。10日拂晓，敌以坦克、装甲车掩护步兵对邢家庄发起猛烈冲击，第七一五团待敌迫近时，以集束手榴弹打击敌坦克和装甲车，并与敌展开白刃格斗。至16时，在达到杀伤与消耗敌之目的后，主动转移。

在连续打破敌两次围攻后，第一二 师主力由武强西北转移至河间西南地区集结。当时河间驻敌为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第二大队600余人及伪军一部。该敌经常以小部队在县城周围抓伏抢粮。第一二 师根据敌人经常双日出东门、单日出西门的活动规律，决心于3月1

日伏击由西门出扰之敌。遂以第七一六团之第二、第三营在河间西南的黑马张庄设伏，以第一营和晋察冀军区第三十大队在梅家店、达子房隐蔽待

机。3月1日晨，日军步骑兵 200 余人果由西门出动，向黑马张庄进犯，我预伏部队立即发起攻击，将敌包围歼灭。3月18日，

日军又以 9000 余人的兵力，分由献县、饶阳、河间、安平、大城、藁城等地出动，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攻。鉴于日军兵力较大，第一二师以“盘旋式的打圈子”战术，摆脱敌之合击，使敌连连扑空。4月1日，第一二师主力转移至河间东北的大、小朱村、卧佛堂、齐会村等地区，准备利用战斗间隙整训部队。

4月22日，驻河间县城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第二大队 800 余人及伪军数十人进抵任丘以南的三十里铺宿营。第一二师首长判断该敌可能在大城等地的日伪军配合下，从东西西面夹击我军。当时，我军在大小朱村、卧佛堂、齐会村等地驻有独立第一旅、第二旅共 7 个团的兵力和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的部队，兵力集中。于是决心寻求战机，歼灭该敌。23日晨，敌由三十里铺东犯，9 时许炮击齐会村，并以步兵发起攻击，将我第七一六团第三营包围于村内。这时，第一二师首长令第七一六团第一、第二营对敌实施反包围，令第七一五团第七连突入齐会村，增强村内守备力量，形成对敌内外夹击态势。当日，我军与日军激战 8 小时，给敌以很大杀伤。17 时，日军向大、小朱村发射毒气弹，贺龙师长及司令部 20 余人中毒，但仍坚持指挥战斗。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并判断日军有突围的企图，遂令各部迅速占领齐会外围刘古寺，东、西保车，杨庄，四公村，张庄等要点，防敌突围。当夜，第七一六团第一、第二营向被围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敌死伤惨重，于 24 日拂晓向南突围，至中午，敌退至南留路、找子营之间的树林和坟地中，企图负隅顽抗，等待援兵。当夜，第一二师调整部署：以 3 个团又 1 个营的兵力围歼退至南留路、找子营之间的日军，以两个团的兵力阻击可能来援之敌，至 25 日拂晓，敌大部被歼，残敌继续顽抗。当日黄昏，正当我准备发起总攻，最后歼灭残敌时，风沙骤起，影响观察，敌 80 余人乘机突围逃回河间县城。是役，我歼敌 700 余人，俘日军 7 人，缴山炮 1 门、轻重机枪 20 余挺、步枪 200 余支。齐会战斗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敌在冀中平原由“点、线”扩大到“面”的占领的企图，对坚持华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起到推动和鼓舞作用，而且证明了在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中，只要充分发挥主动性、灵活性，注意捕捉战机，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发扬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是可以取得歼灭战的胜利的。

齐会战斗后，第一二师继续在冀中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同时派出地方工作团，协助冀中党政领导机关组织游击队，开展根据地建设工作，加强了区乡抗日民主政权。为提高冀中部队的战斗力，第一二师还与第三纵队联合召开了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会议，交流政治工作和作战训练的经验，并帮助第三纵队开办各种军政人员训练班。在此基础上，协助冀中军区整编了 14 个主力团和回民支队、任（丘）河

（间）大（城）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到 1939 年 7 月，第一二师在冀中共作战 160 余次，歼日伪军 4900 余人，部队也由挺进冀中时的 6000 余人发展到 2.1 万余人。8 月上旬，当敌将“扫荡”重点转向北岳山区时，第一二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由冀中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转移。

第一二九师主力挺进冀南

(参见附图 21)

1938年11月，敌在围攻冀中地区的同时，以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和第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共3700余人，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先后占领了根据地边缘的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等重要城镇和鲁西北的聊城等地，此时，国民党军鹿钟麟部也积极与八路军磨擦，包围八路军驻守的枣强县城，并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等反动口号。接着又宣布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冀南行政公署，另派国民党的专员、县长。从而使冀南抗日根据地处于日伪顽军夹击的形势下。为坚持冀南抗战，八路军总部于11月命令第一二九师主力挺进冀南，协同冀南军区部队巩固抗日根据地。12月下旬，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第三八六旅主力和先遣支队一部进入冀南地

区，随即在南宫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冀南地区的斗争形势，确定依托广大乡村，依靠群众，坚持冀

南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民主阵地的斗争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第一二九师一面协助冀南地方党政机关继续执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改造乡村政权，加强群众的教育与组织工作；一面分别派遣部队积极向日军出击，并动员群众拆城挖沟，改造地形，准备反“扫荡”作战。同时，对冀南敌后的国民党军石友三部开展统战工作。

1939年1月，日军从平汉、津浦铁路沿线调集第十、第一一、第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分多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我军根据敌在平原地区行动迅速，且便于集中兵力的特点，把部队分成若干部分，分区活动，寻机歼敌：并以小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疲惫、消耗敌人。1月7日，西线之日军先由石家庄、邢台、邯郸、大名等据点出动，陆续侵占了赵县、隆平（今隆尧）、平乡、广平等县城，接着，东线日军于2月初由泊头、德州、聊城出动，会同西线日军，在航空兵掩护下，分路向我根据地中心区推进，侵占了冀南中心区所有县城。在敌推进时，我以主力转至敌之侧后，连续袭击武邑、阜城、富庄驿、景县、清河等据点的敌军。在袭击敌军的过程中，第三八六旅发现敌每遭袭击后，必派出部队报复。于是决心利用敌这一活动规律，以旅主力在咸县以南的香城固地区设伏，诱歼报复之敌。兵力部署是：以第六八八团设伏于香城固；以补充团设伏于香城固东南和东北的南香固、庄头；以新编第一团设伏于香城固西南的西孝固，并向西警戒；以骑兵连进至香城固以北的第什营、南草场向威县之敌进行侦察、游击。我军部署就绪后，即以东进纵队第三团、新编第一团、第六八八团等各一部连续袭击咸县、曲周等县城，诱敌出犯。10日上午，威县之敌以1个加强步兵中队向南出击，12时许，进至南草场附近，我第三八六旅骑兵连且战且退，将敌诱入我预先设伏的香城固地区。我伏击部队从东、西、南三面同时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将敌全歼。计毙放大队长以下200余人，俘敌8人，缴炮4门。

香城固战斗后，第一二九师主力渡过卫河，进至冠县地区休整。日军在寻歼冀南地区八路军的企图失败后，即以一部兵力占据冀南的各个县城，并修建公路，增设据点，建立伪军、伪政权，同时依托据点进行分区“扫荡”，企图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为使冀南抗日游击战争坚持下去，第一二九师将部队分散，一面带领地方游击队袭扰日伪军，断其交通，使其不能立足，一面进一步发动与组织群众，发展群众武装，改造平原地形，为坚持冀南游击

战争创造条件。从1月至3月，我军作战100余次，歼日伪军3000余人。3月以后，由于日军“扫荡”重点逐渐移向山地，第一二九师在对冀南平原的游击战争作了部署以后，师部率第三八六旅主力、先遣纵队第二团、冀豫支队、青年纵队第三团和骑兵团等部，返回太行山区。

日军在“扫荡”冀南之前，还“扫荡”了与冀南相毗邻的鲁西北地区。坚持团结抗战的国民党山东第六专区保安司令范筑先以身殉国，形势危急。为坚持鲁西北的抗日斗争，第一二九师派出先遣支队和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进入鲁西北之馆陶、冠县等地，协助当地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稳定了局势。为纪念范筑先，1939年1月，以鲁西北地方抗日武装编成了筑先纵队。

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

(参见附图22、23、24)

0

武汉失守后，日军增强在山东的兵力，占据着山东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开始向乡村伸展。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统一对山东各地抗日武装的领导，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1938年12月成立了山东纵队，下辖6个支队。为进一步加强山东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力量，第一一五师根据八路军总部1938年10月的命令，以第三四三旅之第六八五团于12月下旬由晋西进入山东省微山湖以西地区（简称湖西），与当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合编为苏鲁豫支队。接着，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部及第三四三旅（欠第六八五团），于12月由晋西出发，跨越同蒲、平汉铁路，于1939年3月2日到达鲁西地区。为迅速打开运（河）西地区的抗战局面，3月4日，第一一五师以第六八六团对郸城县西北之樊坝伪军据点发起攻击，将守军1个团800余人全歼，并击退郸城日军100余人的增援。首战告捷，鼓舞了当地群众，扩大了我军影响。

樊坝战斗后，第一一五师以第六八六团第三营在运西地区坚持斗争，大部继续东进，于4月抵达泰（山）西地区，随即召开了山东津浦路西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会上，罗荣桓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了创造泰西根据地的任务。会后，我军拔除了汉河西岸的伪军据点，加紧扩大武装和建设政权。5月初，日军从济南、泰安、兖州、东阿、位上等地调集5000余人的兵力，附汽车、坦克100余辆，火炮100余门，分九路“扫荡”泰西地区，企图寻找第一一五师主力决战。5月2日至8日，敌首先对大汶河南岸的东平、汶上地区进行“扫荡”。9日，开始以“步步为营”的战术，对第一一五师师部及活动于肥城、宁阳山区的人民抗日武装实施合围。10日，第一一五师首长决定，除留下第六八六团两个营在原地坚持斗争外，师机关、直属队、津浦支队向大峰山区转移，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向平阴、东阿转移。但各路日军已迅速形成合围。第一一五师师部、第六八六团（欠第三营）、津浦支队、冀鲁边第七团、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等部和中共鲁西区党委、泰西特委等党政机关共3000余人未及转出外线，被包围于肥城东南陆房一带纵横不足10公里的地区内，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第一一五师首长决定，以少数兵力在正面阻击与钳制敌人，其余部队和机关于当晚乘夜暗突围转移。但当夜突围时，除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由于熟悉地形道路秘密跳出敌包围外，其余各部均为敌所阻。在此紧急时刻，我各级指挥员沉着冷静，指挥部队击退敌之多

次冲击。11日，敌曾一度逼近我师部驻地陆房村，我军与敌展开白刃格斗，顽强反击，终于守住了阵地。当晚，敌收缩兵力，监视我军行动，企图待天明后再次向我发起攻击。22时许，我军利用敌不善于夜战的弱点，逐渐收拢部队，整理装备，宣布纪律，实行分路、轻装、隐蔽突围。至12日晨，各部及党政机关均由敌军间隙全部跳出包围圈，安全转移至东平以东地区休整。当日上午，敌以炮火掩护步兵攻入陆房村内，才发现我军早已转移。是役，我毙伤日军大佐联队长以下1300余人。陆房突围战斗的胜利，对保存骨干力量和坚持山东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说明，处于敌重兵包围的不利形势下，只要各级指挥员临危不惧，沉着冷静，严密组织，发扬机动灵活、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是可以转危为安的。

陆房战斗后，第一一五师在运（河）西、泰（山）西地区，一面以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一面协助当地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政权，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鄆城、鄆城、汶上等地的国民党保安武装共同抗日；同时大力发展部队，新扩编了第一一五师独立旅。在此期间，根据地的扩大与巩固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运西、泰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控制了津浦铁路以西、运河两侧、黄河以南的三角地区。运西泰西地区游击战争的深入发展，给敌以严重威胁。7月底，敌从津浦线抽调第三十二师团1个大队及炮兵和伪军各一部共400余人，由汶上进至梁山一带。为巩固新区，我第一一五师首长决心打击该敌，随即以师特务营等部于梁山附近设伏。8月2日上午，日伪军进至前集庄附近。我即以骑兵连诱敌进入伏击区，我担任伏击的部队随即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毙伤其一部，余敌退守梁山西南的独山庄。当夜，我军以独立旅第三营向独山庄猛攻，于村内与敌展开巷战，并控制了制高点。敌不支，在炮火掩护下向外突围，我军跟踪追击，将敌大部围歼。此战，我共歼敌300余人，俘日伪军24人。

梁山战斗后，第一一五师遵照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乘敌大举“扫荡”鲁南之际，速向津浦铁路以东、胶济铁路以南的山区挺进，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指示，以师部率随营学校、第六八六团和特务团于9月初进入鲁南腹地抱犊崮山区，并决定向南控制郟（城）、码（头）平原，打通与华中的联系，向西打通与湖西区的联系，向北打通与鲁中区的联系，向东发展滨海地区，创造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各师主力挺进冀鲁平原地区，对粉碎敌之“扫荡”，巩固与扩大平原根据地，加强当地抗日武装的建设以及发展壮大部队和提高战斗力，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粉碎日军对山区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北岳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参见附图25—28）

1939年夏，日军对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由冀中平原转向北岳山区。4月，敌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制定了从5月上旬至6月下旬对五台山地区的“扫荡”计划，确定从5月8日开始，先以一周时间围歼五台山以南

台怀地区我军；得手后，再分别由五台、台怀一线和原平、代县、沙河一线，合击五台山以西地区我军。上述企图实现后，再进一步对龙泉关地区和滹沱河谷进行“扫荡”，彻底摧毁北岳区根据地。当时，我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归晋察冀军区指挥）正在晋东北的恒山及五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旅直属队位于三楼、河浙村、神堂堡、大寨口、大营、沙河等地区；第七一七团主力位于茶铺、豆村地区；第七一八团主力位于上寨；第七一九团主力位于沙河、大营以北。5月8至9日，日军第一九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各一部共5000余人分路出犯，其中从五台出动的2000余人经耿镇、石嘴进犯长城岭、铜钱沟地区，从豆村出动的千余人进犯台怀镇，从大营出动的1000余人经白坡头、大寨口进犯神堂堡，企图合击驻阜平以西龙泉关地区的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针对日军的企图，晋察冀军区令第七一七团由茶铺、豆村地区向龙泉关方向转移，阻击由五台、豆村东进之敌；令第二军分区第四团及第六大队向豆村、台怀镇游击，迟滞敌人前进；令第三五九旅旅部率第七一八团由下寨进至神堂堡地区，相机歼敌。

5月9日，由大营镇出动之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1个大队800余人，沿大寨口、神堂堡向台怀镇进犯，11日到达台怀镇以北土川里、盘道村，因前面山路还有积雪，不好通行，遂企图沿原路经神堂堡回撤大营镇。我第三五九旅首长察明敌之企图后，决心利用神堂堡至上下细腰涧一带有利地形，集中主力歼敌于运动中。据此，以第七一七团由峨河进抵文溪里一带，准备参加合围该敌的战斗；以第七一八团和教导营、骑兵大队顶伏于口泉村、青羊口以南，准备伏击北撤之敌；以第七一九团钳制繁峙和沙河镇之敌；同时要求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以适当兵力钳制五台、豆村方向之敌。13日，土川里、盘道村之敌由原路向大营镇撤退，当其进至口泉村地区时，当即遭我第七一八团、教导营和骑兵大队阻击，激战竟日，敌被歼一部。当晚，敌见经神堂堡撤回大营镇无望，遂改经上下细腰涧撤回大营镇。此时，第三五九旅一面令第七一八团等部跟踪追击，一面令第七一七团先敌进至上下细腰涧截击。14日晨，该敌在上下细腰涧被我包围，激战至15日中午，歼敌500余人。这次战斗，我军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手段，把敌人引向不利的地形、不利的方向，从而变被动力主动，变防御为进攻，取得了歼敌于运动中的胜利。

8月上旬，为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力量，中央军委令第三五九旅除留一部组成雁北支队继续坚持恒山地区外，主力立即开赴陕甘宁边区之绥德警备区。10月初，第三五九旅到达绥德地区。

日军在“扫荡”龙泉关地区的同时，以一部于5月7日进占河北省易县至涞源之间的大龙华镇，企图隔断我北岳地区与平西地区的联系。为打破敌人的分割企图，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心攻歼该敌。5月20日1时，我攻击部队在大龙华党组织的帮助下，乘夜暗绕过敌警戒哨，隐蔽接敌，突然发起攻击。战至20日下午，歼敌4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敌分割我北岳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企图。

1939年9月，第一二师除第七一五团开赴灵丘以南之上寨地区外，师部率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九团、独立第一旅和独立第一支队等部在行唐县西北之口头镇、南北城寨、牛家下口、穆家庄、南北谭庄等地准备整训。

9月25日上午，驻石家庄及正太铁路沿线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第三十一大队及灵寿、正定等4个县的伪警备队共1500余人，由灵寿出动，占领慈峪镇，企图采取所谓“牛刀子战术”，奔袭晋察冀边区南部重镇陈庄，寻

歼我军主力，摧毁抗日根据地的后方设施。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 师首长根据敌之企图，决心以少数兵力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尔后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该敌于运动中。随即以第七一九团于正面抗击，吸引敌人，以独立第一旅第二团、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独立第一支队等部，隐蔽集结于牛家下口、程家庄、刘家库池及大小文山之间地区，准备向敌侧后突击，并在我正面阻击的部队的配合下，歼该敌于东西岔头、南北谭庄地区。另以第三五八旅第四团向行唐、曲阳方向警戒；以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独立第五团在慈峪以南地区监视敌后续部队行动。

26日拂晓，进占慈峪镇之敌向该镇以北的南五河、北霍进攻，遭第七一九团阻击，不能前进，下午撤回慈峪镇。27日拂晓，敌以1100余人轻装由慈峪镇沿鲁柏山及秋山南麓，经南燕川、湾子里、长峪奔袭陈庄，11时占领陈庄。我第一二 师首长判断该敌孤军深入，后勤无保障，必将迅速撤退；并且根据敌撤退时一般不走原路的规律，判断敌可能由陈庄向东，沿大路经南、北台头，东、西岔头等地向灵寿撤退。据此，师决心迅速调整部署，在磁河两岸的东、西寺家庄及冯沟里地区设伏，歼敌于运动中。具体部署是：以独立第一支队（欠1个营）进至陈庄以东七祖院、大庄地区，与敌保持接触，诱敌进入我预伏区；以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隐蔽集结于东西寺家庄至南北台头之间待机；以独立第一旅第二团隐蔽集结于冯沟里，破门口及其以南地区，担负伏击任务；以独立第一支队和第二团各一个营进至长峪附近，防止敌经长峪撤退；以第七一九团于南北谭庄及东西白头山占领阵地，阻止慈峪之敌北援；以第三五八旅第四团主力集结于牛家下口待命；师设前指于南台头。

27日夜，我以小部队连续袭扰陈庄之敌。28日6时，敌焚毁陈庄向东撤退，我第一支队一部按计划节节阻击。10时许，敌全部进至冯沟里、破门口地区，向我第二团阻击阵地猛烈攻击。第二团顽强坚守阵地，使敌不能前进。至14时，我军完成对敌之四面包围。当日，灵寿、慈峪敌800余人增援，被第七一九团阻于白头山地区。黄昏，我军对敌发起总攻，至23时，将敌分割包围于冯沟里、破门口两个村内。28日夜，敌突围抢占鲁柏山两侧高地和石佛峪西山，但又被我军包围。29日，敌数次拼死突围未逞。战至30日下午，将敌1100余人全歼。这次战斗，由于我指挥员对敌情判断正确，定下决心果断，兵力部署周密，情况处置及时，部队战斗作风英勇顽强，虽日军兵力较大，但仍能经数日激战，将其全歼。

敌遭我打击后，于1939年10月中旬，调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一一 师团主力共2万余人，对北岳区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企图彻底摧毁我根据地，打通曲（阳）阜（平）间的交通，缩小我军的回旋地区。25日，驻灵丘、涞源之敌出动1000余人，向上寨、下关地区合击，企图围歼第一二 师第七一五团。该团在雁北支队的配合下，连续阻击和袭扰敌人，毙伤其200余人。28日，敌被迫撤退。11月2日夜，退回涞源之敌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一大队等部共1500余人，向水堡、走马驿、银坊方向进犯，企图“扫荡”上述地区。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 师首长得悉敌行动后，决心在涞源至银坊之间的雁宿崖地区设伏，歼敌一路。即以第一军分区之第一、第三团，第三军分区之第二团分别急行军于3日拂晓前进至雁宿崖峡谷两侧设伏，以第一军分区游击第三支队于三岔口、张家坟一线，担负诱敌任务；以第一二 师第七一五团担负牵制敌人的任务；以第一军分区第二十五团等部为预备梯

队。3日7时许，出犯之敌一部共500余人，进至三岔口与我游击第三支队接触。该支队按预定计划节节抗击，将敌诱入雁宿崖地区，我预先设伏的部队立即发起攻击，将敌压缩于雁宿崖峡谷内。激战至下午4时，全歼敌大佐以下500余人。战斗结束后，晋察冀军区首长根据敌每遭我重大打击后必行报复的规律，令部队迅速脱离战场转至机动位置休整，待机再战。11月4日，涞源等据点之敌1500余人果然出动，在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领下，从涞源向雁宿崖方向进犯，企图寻找我主力报复。晋察冀军区首长得悉后，决心待敌进至对我有利地区时，集中兵力再次予以打击。据此，即令第二十五团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监视敌之动向；令第一、第二、第三团，游击第三支队及第二十五团一部立即进行战斗准备。同时，第一二师亦令特务团从神南镇北上，准备参加战斗。4日晚，敌进至张家坟、雁宿崖、三岔口一线。5日，抵达银坊。6日，敌继续沿崎岖山路向司各庄、黄土岭进犯，当晚，敌抵达黄土岭、上庄子一线。晋察冀军区首长决定利用这一带有利地形，采取伏击手段歼灭该敌。遂令集结于寨蛇、煤斗店一线的第一团和第二十五团迅速占领寨坨附近阵地，截断敌之去路；令位于大安的第三团迅速占领黄土岭至上庄子以南山地；令第一二师特务团接替第三团进至大安，随时准备加入战斗，令第二团尾随敌后，待敌占领司各庄后，绕到黄土岭北面占领有利地形；令第三支队控制通往涞源的要道。

7日晨，敌主力由黄土岭出发，沿山谷向东移动，下午3时进入我伏击圈。我军当即发起攻击，敌伤亡惨重。激战中，我第一团发现一独立家屋附近猬集一群敌人，即令第一军分区炮兵连以迫击炮火力对其进行袭击，当即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击毙。8日，敌在猛烈炮火和飞机掩护下向上庄子西北突围。这时，从唐县、定县出动的援敌1200余人已接近黄土岭，我军遂撤出战斗。此战，我共歼敌900余人。

阿部规秀被击毙，使敌极为惊恐。11月中旬，敌急调第一一师团的两个支队、第二十六师团的1个支队以及驻蒙军一部至唐县、完县、涞源、满城、阜平等地。尔后，从11月23日开始，兵分七路，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直插我根据地腹地，妄图以突然迅速的行动围歼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于阜平地区。为避敌锋芒，晋察冀军区决定，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迅速转向阜平以南地区隐蔽待机，同时令冀中军区部队和冀热察挺进军积极打击敌人，策应北岳区军民反“扫荡”作战。26日，敌进占阜平县城，由于我军已先期转移，并威胁敌之侧后，迫使敌在破坏我后方设施后，于12月3日放弃阜平县城东窜。晋察冀军区立即以一部于阜平以东的五丈湾伏击东窜之敌，歼其100余人。此后，进犯阜平地区之敌又对第一、第三军分区进行“扫荡”，但均因我军及时转移而连连扑空。敌在连续扑空并遭我不断打击后，疲惫沮丧，遂开始撤退。我军乘机于4日在阜平西南的北高洪口伏击敌人，歼敌300余人。8日，敌被迫全部撤回原据点。至此，历时40余天的冬季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此役，我军共作战100余次，毙伤敌3600余人，不仅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且使敌不敢再轻易以少数兵力深入我根据地腹地。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感染中毒，不幸于11月12日在唐县病逝，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太行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参见附图 29)

1939年7月初，敌华北方面军以第二十、第一九师团主力和第十、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一八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各一部，由第一军司令官指挥，对我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首先打通白（圭）晋（城）、邯（郸）长（治）、平（定）辽（县）等交通线，占领主要城镇，分割我抗日根据地，尔后逐步压缩围歼第一二九师部队，并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首长，根据敌人兵力较大，可能会长期占据我根据地内的部分城镇与交通线，并把我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然后逐一“清剿”，加以摧毁的情况判断，决定以广大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以分散的持久的游击战疲惫消耗敌人，主力则分散隐蔽适当集中，相机歼敌，以粉碎敌之“扫荡”，打破敌之分割计划。据此，第一二九师并指挥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晋豫边支队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以及广大地方武装、民兵游击队展开了反“扫荡”作战。

从7月3日起，同蒲、正太、平汉、道清等铁路线之敌，先后出动，向我根据地进犯。其主力沿白晋、平辽、邯长等交通线向我根据地腹地推进，企图合击第一二九师主力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其另一部则向阳城、晋城进攻，企图合击我太行山南部地区的部队。这时，我晋冀豫根据地军民已完成反“扫荡”作战准备，破坏了敌可能利用的城墙围寨、道路，准备与敌作长期的艰苦斗争。当敌由各交通线出动“扫荡”时，北线我军即对正太、平汉、同蒲等铁路展开破袭战，并以小部队配合民兵游击队伏击、阻击消耗疲惫敌人，主力集结于武乡西北及辽县西南地区待机。7月6日，敌第一九师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各一部占领沁县、武乡、辽县等县城，并向榆社地区合击。当敌第一九师团第一七联队进至榆社以西云簇镇时，我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即展开攻击，歼其一部。该敌遭到打击后即回窜。与此同时，敌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在辽县以西石匣村遭我军第三八五旅的伏击，死伤300余人。而由武安沿邯长路西犯之敌，在涉县城西之河南店亦遭第一二九师特务团严重打击。敌在合击我第一二九师的企图破产后，即改以控制交通线，分割我根据地为主，至14日，沿白晋路南犯之敌占据长治及其周围的襄垣、屯留、长子、壶关、潞城等城镇，打通了白晋路北段。8月7日，由涉县、潞城出动之敌，东对进，占领黎城，打通了邯长路。我第一二九师遂指挥各部对被占的交通线上之敌展开袭击战、围困战，给敌以打击。敌为巩固已占点线，于8月下旬撤出阳城、晋城、沁水等地，第二十师团北移长治，以巩固长治及其周围地区。至此，敌之“扫荡”结束。此次反“扫荡”作战，我军共作战70余次，歼敌2000余人，收复榆社、武乡、沁源、高平等城，粉碎了敌以重兵聚歼我军主力的企图。

由于敌在“扫荡”中占据了我根据地的大部县城，控制了白晋路北段和邯长、平辽等路，因而第一二九师继反“扫荡”作战之后，以主力部队结合地方武装组成游击兵团，在广大民兵配合下，主动向敌占点线展开广泛的群众性的破袭战，以冷枪、埋设地雷、破坏道路桥涵、切断电话线等多种手段，打击敌人。自8月下旬至12月初，晋冀豫边区军民共作战200余次，毙敌2800余人。敌所占交通线经常被切断，因而不得不以更多的兵力分散固守点

线。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

1938年12月，第一二师主力由晋西北挺进冀中后，以留下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了新三五八旅，由彭绍辉任旅长，罗贵波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七一四团，警备第六团，独立第一、第二、第五团，雁北支队等部，坚持晋西北的抗日斗争。1939年春，敌以第一九师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各一部4000余人，“扫荡”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之静乐、岚县、方山地区，企图扩大同蒲铁路西侧的占领区。新三五八旅第七一四团、独立第一团等部，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四纵队、新编第一师、工人武装白卫旅和警备第六团的配合下，不断打击敌人，收复了岚县、方山等地，保卫了根据地。

新三五八旅在晋西北坚持对日作战的同时，还担负了繁重的护送任务，保障了陕甘宁边区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络。从1939年5月至12月，该旅先后护送过往人员1万余人及大批物资、文件。12月，该旅第七一四团（欠第一营）护送弹药到晋察冀边区，返回时于27日在阳曲县西北之耀子村围歼来犯日军百余人。

在此期间，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得到发展。1938年11月上旬，大青山支队粉碎日军2000余骑兵对萨拉齐以北山区的进攻，歼敌200余人，1939年春，又先后肃清了武川西南地区的伪军、股匪，部队发展到1700余人。此后大青山游击支队改称为大青山骑兵支队。

山东抗日根据地鲁中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鲁中区是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所在地。在山东纵队指挥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分别依托沂蒙山区和泰山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严重威胁日军控制的津浦、胶济两铁路。1939年5月下旬，日军第十二军开始集结兵力，以第五师团为主力及第二十一、第三十二、第一一四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以鲁中的沂蒙山区为主要目标，由北向南，由西向东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企图一举歼灭我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以及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

6月4日，敌分别由临沂、平邑、新泰、莱芜、临朐、安丘等地出动，9日占领莒县、沂水、蒙阴等县城，并控制台（儿庄）潍（县）公路和沂、沭两河沿岸以及滋（阳）临（沂）公路与沂河，企图切断鲁中区与滨海区和鲁南区的联系。中共山东分局与山东纵队针对敌之企图，发出反“扫荡”作战指示：要求缩减与分散后方机关，并配备自卫武装，以利独立行动，在作战指导上，避免正面作战，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广泛的分散的游击战，向敌之侧后薄弱点和交通线出击。据此，山东纵队领导机关率特务团转战于沂蒙山北部地区，坚持内线斗争，并组织指挥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不断袭扰放军。主力部队则分散活动于外线。第一支队主力活动于新泰、蒙阴、泗水间；第二支队活动于费县以北敌之侧后；第三支队活动于鲁山以北地区；第四支队活动于泰（安）莱（芜）边之莲花山区。各部积极钳制与打击敌人，先后在莱芜东北之苗山和蒙阴以西之旋风峪等地予敌以重创。自15日起，敌开始增加兵力，并向沂蒙山区腹地压缩包围。国民党军于

学忠、沈鸿烈等部损失较大。我山东纵队则在外线积极打击敌人，以掩护友军突围转移。至7月上旬，我军共作战70余次，歼敌1000余人，迫使敌回援其后方，结束“扫荡”。

从1938年冬至1939年底，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赋予的“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针对敌先“扫荡”平原地区，尔后“扫荡”山区，首先以主力挺进平原，协同当地军民，粉碎日伪军“扫荡”，巩固了平原根据地，并帮助当地部队提高战斗力；协助当地抗日民主政权加强根据地建设，从而为长期坚持平原抗战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发展壮大主力部队本身。当日军转向重点“扫荡”山区各抗日根据地时，主力大部又回师山区，粉碎日军对山区的“扫荡”。实践证明，坚持平原有利于巩固山区，巩固山区更有利于坚持平原。平原和山区各抗日根据地互相配合，互相策应，对粉碎日军先平原、后山区的“扫荡”计划，挫败其由“点线”扩大为“面”的占领的企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节 实行自卫反击，打退国民党 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和英、美对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后，即在全国各地挑起反共磨擦，制造流血惨案。3月至11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在山东的博山、河北的深县、湖南的平江、湖北的鄂东和河南的确山制造流血惨案，杀害我党政军人员达1600余人。11月，国民党在其五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确定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12月，以胡宗南部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和阎锡山部进攻晋西地区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为起点，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中可能出现的动摇妥协与分裂倒退危险，中共中央早有预见，并及时提出批评和劝告，敦促其放弃反共政策，坚持团结抗日。1939年7月7日比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的宣言中，适时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向顽固派作斗争，坚持抗战直到胜利。8月19日，中共中央在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示中指出：“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反共高潮到来后，中共中央又及时告诫全党全军准备应付突然事变。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指示中指出：现在国民党在各地发动的反共军事进攻，带有准备投降的性质，我党应极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力争中间阶层，进一步依靠群众，极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局部的突然事变。同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西北、中原一带，凡遇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均应“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绝不轻言退让”。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对胡宗南部，在山西省对阎锡山部，在晋冀鲁豫地区对石友三、朱怀冰部的进攻实行了自卫反击作战。

一、陕甘宁边区军民坚持自卫原则， 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国民党顽固派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便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借口，宣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绝对不能令其存在”。为达到取消边区政府的目的，国民党先后调集胡宗南等部及反动地方武装共30余万人，从北、西、南三面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包围，并不断派出武装，配合当地反共势力制造磨擦与流血事件。1938年12月，胡宗南令其第一六五师侵占陇东分区之赤城、白马铺。随后，又于1939年4月纠集镇原等县保安队，进攻镇原、宁县八路军，制造了第一次“陇东事件”。5月，国民党又集中关中地区8个县保安队，袭击驻栒邑县（今旬邑）土桥镇之八路军残废军人医院，杀害抗战有功之伤残人员10余名，并侵占栒邑县城，制造了“栒邑事件”。8月，胡宗南采取了更大的军事行动，指令其暂编骑兵第二师由三原北犯，企图攻占郿县（今富县），并以一部兵力绕过郿县，进至延安以南三十里铺一带，直接威胁延安。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民党顽固

派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反共磨擦和军事挑衅事件达 150 余起。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挑衅，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并多次派出代表与国民党谈判，力求避免武装冲突。同时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力量，准备迎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大规模军事进攻。1939 年 8 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一二 师主力由冀中返回晋西北，第三五九旅由恒山地区返回陕甘宁边区。同时令留守兵团调整陕甘宁边区的防御部署，以警备第四、第五团进驻鄜县，以警备第三、第八团增防关中地区，并成立了关中警备司令部，以加强反顽作战的指挥。

1939 年 12 月初，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新的军事进攻，从 10 日至 16 日先后调集第九十七师 3000 余人，袭击八路军驻宁县、镇原城之第七七 团，杀伤该团干部战士 300 余人，夺占宁县、镇原两城，制造了“第二次陇东事件”。同时，盘踞于庆阳、合水等县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也乘机向八路军进行骚扰袭击；盘踞于关中地区各县的国民党保安队亦大部集中，准备袭击关中地区的八路军，以策应其对陇东的军事进攻。

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12 月下旬，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致电蒋介石等，呼吁停止进攻边区，恢复团结，勿使事态扩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中共中央也及时指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蒋介石、何应钦等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其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恢复 8 月以前的边区态势。同时，陇东地区军民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展开反击，打击了顽固势力，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为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八路军击退了解县地区的顽固势力，迫使国民党暂编骑兵第二师撤至洛川以南。在关中地区，由于八路军兵力的增强，顽军未敢轻举妄动。

国民党顽固派在其对陇东和关中的军事进攻被制止后，又于 1940 年 1 月，令其驻绥德专员何绍南，集中五个县的保安大队准备进攻八路军在绥德地区的部队。当地军民纷纷声讨其罪行，并做好迎击准备。何绍南见八路军已有准备，且惧怕人民群众的力量，遂于 2 月 5 日率部逃往榆林，尔后又潜回绥德，煽惑当地国民党保安队哗变为匪，并袭击八路军河防部队第七一七团等部。八路军忍无可忍，遂展开反击，并乘胜肃清了绥德地区五县的反共顽固势力，巩固了绥德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

在陕甘宁边区军民的自卫反击下，国民党顽固派被迫停止对边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从而保障了中共中央的安全，使边区也得到巩固。

二、阎锡山制造“十二月事变”，山西新军和八路军打退阎军的进攻

(参见附图 30)

山西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惧怕迅速发展起来的山西新军变为异己力量，于 1938 年 6 月和 9 月，在吉县的古贤村相继召开了晋绥军高级军官会议和抗敌行政工作检讨会议，制定了重整旧军，压制新军的计划。1939 年 3 月，阎锡山又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简称“秋林会议”)，逼迫共产党人退出新军，当即遭到薄一波等新军领导人的坚决反对。阎锡山坚持其反动立场，提出改编新军，沿用旧军的番号，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

解除共产党员的军权；派亲信充任“联络官”、“观察员”，并秘密制定了“讨伐”新军的作战计划。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极力支持阎锡山排斥我党我军，破坏山西各派力量之间的团结，从而使山西出现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

针对上述形势，中共中央于1939年5月13日，在给华北各区党组织及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中明确指出：阎锡山转向反共，山西新旧派的斗争可能会加剧。我党我军可能要受到部分打击与限制。山西环境将比过去更复杂、更困难。为了维持山西各派力量的团结，我党的基本方针仍然是“拥阎抗日”，反对破坏山西内部团结，反对离间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关系。对山西新派应帮助巩固其已得阵地与力量。当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日益猖獗时，中共中央于八九月又进一步指出：对阎锡山继续倒退，向进步势力的进攻，应给予有力的与必要的反击和抵抗。在新军中应清洗坏分子与投机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使山西我党有战斗力，才能团结左派分子在我们周围反对山西逆流，才能转变局面和克服投降危险。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为发展山西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对付顽固势力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指明了方向。

1939年11月，山西形势进一步恶化。阎锡山经过密谋策划，于下旬命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其所属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等部，分南、北两路向驻晋西南的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12月3日，阎军首先在永和附近袭击了决死队第二纵队之第一九六旅旅部，同时破坏永和、石楼等地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洪洞县、蒲县县长及位于限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制造了“十二月事变”。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从抗日大局出发，指示八路军对山西反共旧军要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继续争取阎锡山抗日；同时要求对阎军严加戒备，掩护与支援新军实行自卫，审慎而坚决地同阎锡山的反共行动进行必要斗争。12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晋西南事件与我们方针的补充指示》中明确指出：“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活动于太岳区的晋西独立支队第二团速返晋西南，令晋西北的第一二师新三五八旅加强战备。

面对优势顽军的进攻，晋西南新军于12月6日组成了“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指挥决死队第二纵队之独立第二旅、第一九六旅和保安旅，及新军政治保卫队（简称政卫队）、第二九旅等部，配合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于12月10日至15日在隰县之东和宿地区，以及中村、暖泉头等地，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击溃阎军一部。尔后，新军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于16日夜撤出战斗，向北转移至孝义以西郭家掌、枯桑园一带。

暖泉头战斗后，晋西独立支队第二团奉命由沁源返回晋西南归建。此时，南北两路阎军在进占康城、大麦郊等要点后，又向新军、八路军北撤之部队实施包围，并与汾（阳）离（石）公路之日军相配合，对我新军、八路军形成夹击之势。为避免事态扩大，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率晋西独立支队掩护新军北撤，于12月27日夜越过离（石）军（渡）公路，安全抵达晋西北临县以南的招贤镇地区。晋西南地区遂全部陷入阎军之手。

在“十二月事变”发生的同时，晋西北阎军骑兵第一军和第三十三军等部，在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指挥下，放弃忻州（今忻县）、神池、宁武、五寨、静乐等地的对日阵地，集结兵力于兴县、临县、方山一线，监视晋西北新军与八路军，并伺机发动进攻。赵承绶还采取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等手

段，阴谋策动决死队第四纵队中部分反动军官发动叛乱。针对上述情况，决死队第四纵队在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于12月13日，逮捕了阴谋暴乱的反动军官，从而粉碎了赵承绶破坏新军的阴谋。

12月16日，赵承绶召开高级将领紧急会议，具体拟定向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新三五八旅进攻的计划。参加会议的爱国进步将领、新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续范亭借故退席，毅然奔赴岚县史家庄，向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及新三五八旅领导人揭露了阎军的阴谋。中共晋西北区党委针对阎军这一阴谋，决定调整部署，迎击阎军进攻。遂令新三五八旅主力集结于岚县地区，决死队第四纵队由交城地区移驻新三五八旅附近，暂编第一师向第四纵队靠拢，工人武装自卫队（简称工卫队，后改称工卫旅）于五（寨）岢（岚）保（德）地区集结。

在晋西南新军和晋西独立支队撤至离（石）军（渡）公路以北后，阎锡山即令赵承绶指挥第三十三军6个团，进至临县以南的三交地区实施拦截；令骑兵第一军8个团，由临县、方山一线前出至寨上和开府地区，向岚县地区八路军进逼。同时令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火速北上，向离（石）军（渡）公路推进，企图南北夹击并消灭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2月23日在给彭德怀、彭绍辉、罗贵波的指示中明确指出：“阎已令赵承绶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对此冲突，应当采取下述方针：（甲）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二）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31日，中共中央在给八路军总部及第一二师的指示中，又进一步指出：“胜利的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据此，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于12月31日成立了以续范亭为总指挥的“晋西北侷阎抗日讨逆军总指挥部”。同时决定以新三五八旅、决死队第四纵队、暂编第一师等部，分别向方山和临县东北白文镇之阎军反击，接应决死队第二纵队及晋西独立支队北上。1940年1月2日至9日，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把阎军骑兵第一军驱逐到临县附近地区。此时，决死队第二纵队和晋西独立支队，已由招贤镇附近顺利转移到静乐县西南的米峪镇、天池店地区，与晋西北新军取得了联系。1月11日至13日。讨逆军总指挥部指挥新军和八路军，在临县地区击溃阎军骑兵第一军和第三十三军各一部，迫使阎军于13日夜退向晋西南地区。

晋西北八路军和新军反顽作战取得胜利后，中共中央于1月25日致电八路军总部及第一二师，指出，“在武装磨擦中，对于我们有利的是战争的局部性和防御性，而不是战争的全面性及进攻性。”我军应停止于汾离公路以北待命，“巩固现有阵地，严阵以待，来者必拒”。同时还指出：要巩固晋西北，建立抗日民主新政权。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贺龙、关向应任正副书记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西北和绥远大青山地区的党政军各项工作。1940年2月初，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师主力返回晋西北，随即以新三五八旅主力及新军暂编第一师一部，肃清俞岚、河曲、保德等地区的反动武装700余人，并说服进至河曲、保德间的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和国民党第二十二军高双成部退回原防地。至此，晋西北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完整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阎锡山在晋西南、晋西北挑起武装冲突的同时，令其在晋东南地区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率独立第八旅乘八路军对敌进行邯长路破击战之机，于

1939年12月8日至26日进攻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并破坏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陵川、壶关、长治等七县抗日民主政权，袭击第五专署和“牺盟会”等机关，杀害共产党员及其他进步分子达500余人，绑架1000余人。在阎锡山策动下，决死队第三纵队部分反动军官，于23日发动叛乱，强行带走3个团及直属队一部共4000余人。1940年1月中旬，蒋介石一面迫令八路军退出太（行山）南、太岳根据地，一面以其第九十三军和第二十七军主力向临（汾）屯（留）公路以北进攻决死队第一纵队，以其第四十军和第二十七军一部在阎军独立第八旅的配合下，由高平、陵川、壶关等地出动，进攻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和决死队第三纵队。同时，阎锡山令其第十九军之暂编第二旅、新编第二师分由晋西北、晋察冀边区南下，配合蒋军的进攻。

为粉碎蒋、阎军的进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心集中兵力打击进攻最积极的阎军孙楚部，避免与蒋军发生军事冲突，以巩固太岳，逐步恢复太（行山）南根据地。据此，以第三八六旅主力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于1月中旬进入太岳地区，阻止蒋系第二十七军北犯。以第三四四旅、晋豫边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决死队第三纵队及民军第四团等部于16日在高平以西之南北杨村一带，歼灭阎军独立第八旅一部，从而恢复了太南部分地区。1月30日至2月2日，第三八五旅2个团、第三八六旅1个团及独立支队在榆社游击队等部配合下，于榆次东南及榆社以北地区，歼灭阎军暂编第二旅和新编第二师大部。至此，蒋、阎军采取南北夹击夺取八路军太南、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企图，被彻底粉碎。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企图压制新军、排挤八路军的目的是未能达到。相反，其自身力量却被削弱，而蒋介石的势力则乘隙而入。为稳定山西局势，避免蒋介石势力取代阎锡山统治山西，争取阎锡山继续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毛泽东致函阎锡山，晓以大义，调解新旧军冲突。2月25日，中共中央又派萧劲光、王若飞为代表到达秋休，与阎锡山进行谈判。阎锡山在反共失败和蒋介石企图乘隙而入的情况下，遂与共产党达成和解协议，并划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为分界线，南为阎军防区，北为八路军和新军防区。

三、晋冀鲁豫地区我军反击顽军的进攻

（参见附图31）

1939年11月下旬，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率部由陵川、辉县北进，12月初进入冀西，抢占要点，包围压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青年纵队、冀西游击队等部，摧残抗日政权，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争取朱部共同抗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亲赴冀西，向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表明八路军严正立场，指出：“我们已经退避三舍了，实在无地可退，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地！八路军一个师抵抗了10万日军，10万伪军，并非怕你们，不过为了团结，不忍自相残杀，要是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但鹿、朱置若罔闻，于12月下旬，指使驻赞皇、元氏以西地区的侯如墉部和驻束鹿、宁晋间的乔明礼部向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大举进攻。八路军被迫自卫，遂以第三八五旅主力以及冀西、冀中部队，于1940年1月12日，向侯、乔两部反击，歼其大部，迫使鹿钟麟、朱怀冰部于2月初南撤武安、涉县、磁县地区。

1940年1月下旬，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在冀南的南宫、威县、枣强、清河等地，先后将八路军东进纵队2个连和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接着，又围攻东进纵队第三团和清河县大队等部，并准备夺占冀南抗日根据地。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2月3日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指出：对石友三部采取争取的方针已不适用，应在其向我出击时坚决彻底消灭之。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总部命令冀南、冀中、冀鲁豫等军区各以一部兵力，在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下，于2月9日发起自卫反击作战，将石部主力包围于威县东南下堡寺、马鸣堂一带。15日，顽军突围西逃。此时，日伪军3000余人进至广平、邱县间的平固店一带，向八路军进逼。石部主力则乘机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退向清丰东南地区。

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虽连遭失败，但并不甘心。1940年2月初，蒋介石令其进占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和清丰等地区的朱怀冰和石友三等部，再次向太行、冀南地区八路军进攻；同时令在黄河以南之第四十一、第七十一军迅即渡河北进，协同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夺取八路军太（行）南和冀南抗日根据地。据此，八路军总部决定乘黄河以南的顽军尚未北渡，朱怀冰部孤立突出于武安、涉县地区，鹿钟麟、孙殿英等部暂时处于观望，以及石友三部在清丰等地立足未稳的有利时机，于3月初在平汉铁路以东进行卫（河）东战役，驱逐石友三部；在平汉铁路以西进行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驱逐朱怀冰部。

2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令冀中、冀南和冀鲁豫军区各以一部在冀南军区统一指挥下，进行卫东战役，集中兵力打击石友三部于濮县（今濮城）、濮阳、清丰地区，并阻止其窜入太（行山）南地区。3月4日，我军先后在观城、濮县以及清丰县东南之卫城集、六塔集、双庙集、东北庄等地展开反击，歼灭顽军一部，大部顽军于3月6日分数路南退。11日，石友三残部窜至民权以东地区。至此，八路军全部恢复了卫河以东地区，并建立了濮阳、长垣等七县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在鲁西建立了范县、朝城等四县抗日民主政权。

顽军朱怀冰部所辖第九十四师及新编第二十四师等部，窜至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之武安、涉县地区后，在武涉公路以南、漳河以北纵横30余公里的地区内不断抢占要点，切断交通，破坏抗日政权。2月18日，朱怀冰部突然袭击驻磁县以西贾壁、大湾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支队第一大队和青年纵队第二团。八路军伤亡百余人，并撤出该地区。为反击朱怀冰部，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各一部，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于3月5日在磁武涉林地区展开反击作战。

此时，朱怀冰部2个师共8000余人，配置于磁县、武安、涉县间的张家庄、崔炉、南北王庄、东西达城地域；鹿钟麟率冀察战区总部位于林县以北、任村集以东地区，孙殿英部位于林县及其西南地区。针对顽军部署，第一二九师首长决心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朱怀冰部，监视并争取鹿钟麟、孙殿英两部中立。3月5日，第一二九师首先反击进占古台、前后牧牛池、南王庄、齐家岭等地的顽军；6日，击溃南北岔口、东西花园、南北贾壁、青碗等地的顽军。在八路军的有力反击下，朱怀冰率残部退入修武境内。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适可而止”的指示，停止了反击作战。是役，八路军收复了武涉公路以南、林县以北地区。

磁武涉林战役后，中共中央本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继

续抗战的政治立场以及保持八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有理有利地位，毛泽东于3月16日电示彭德怀：“军事上必须立即刹住，转为守势，彼军进迫，我军后退，一枪不打”，“如彼再三再四进迫不已，然后我军加以还击，其曲在彼”。3月中旬，太南地区八路军主动北撤至平顺、漳河之线。随后与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议定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采取又联合又斗争政策的胜利，对于实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对于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挑动内战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阻止其对日妥协投降和争取时局好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反顽斗争中，共产党和八路军从顾全抗战大局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和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胜利原则以及适可而止的休战原则，即“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运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思想，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顽固派，把反顽斗争的坚定性与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把联合与斗争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均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于1940年3月11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经验，为以后反顽斗争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四节 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军 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连续 “扫荡”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后，日本帝国主义急欲迫使中国屈服，迅速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以便准备力量，伺机南进或北进。为此，日军中国派遣军在上加紧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诱降，以其在香港、澳门代号为“桐”的特务机关与蒋介石代表进行秘密“谈判”。同时，积极扶植汉奸头子汪精卫，拼凑伪中央政权和扩大伪军。为促进蒋汪合流，把汪伪中央政府成立时间推迟到1940年3月30日。在军事上，为配合政治诱降和继续切断国际援华补给线，先后占领潮安、汕头、厦门、钦州、南宁、南昌等地，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蒋介石在“谈判”中接受日方条件，达到其政治诱降的目的。同时，为进一步巩固其占领区，对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的大规模的“扫荡”。根据派遣军总部关于巩固华北占领区的意图，敌华北方面军具体分析了华北的形势，认为：在华北占领区内的重庆系统军队，由于日军的讨伐及其后方补给的缺乏，势力不断缩小，共军则巧妙地乘隙渗透其势力，或以武力迅速扩大其地盘。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方面军对中共的活动予以深切的注意”。“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据此，华北方面军制定了1940年度肃正建设的基本方针，提出：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尽快把华北建成特别巩固的地区，用以示范和指导其他占领区，“应以‘治安第一’为各项施策的基础，将各项工作有机地统一于剿灭共军的前提下，继续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积极进行讨伐”，另外，凡对生产发展有用的资源应促进其开发及取得。3月15日，华北方面军召开了所属各兵团参谋长会议，具体布置贯彻上述方针，特别强调“讨伐重点在于剿灭共军”。并计划分两期进行：第一期由4月到9月，第二期由9月到年底。同时确定了第一期的“讨伐”重点地区和兵力部署，以第二十、第一一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和第十二军一部，重点“扫荡”平汉、津浦两铁路之间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冀中地区，并打通保定、石门（石家庄）和滏阳河、卫河的水路交通；以第一军及驻蒙军“扫荡”山西省北部和南部的抗日根据地，并将治安区扩展到平陆、沁水及泽州（今晋城）平原。随后，华北方面军各部队，即按照上述方针部署，开始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正当八路军准备粉碎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扫荡”之际，国民党顽固派自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太行山南部和冀南等地的八路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使八路军不得不在对日军作战的同时，反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216页。

同上第223页。

同上第224页。

同上第227页。

在上述形势下，中共中央在 1940 年 1 月 28 日给北方局、中原局和东南局的指示中指出：时局的发展充分证明，只有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而现时能够发展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和华中。因此，在山东、华中要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特别要广泛地大量地组织不脱产的群众自卫军，否则无法扩大军队，无法巩固抗日根据地。而组织自卫军、扩大军队、巩固根据地，就必须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要求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要集中一切力量发展抗日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2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提出党和军队的基本任务是“ 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关于战略任务的指示中，明确八路军、新四军当前的战略任务是：粉碎敌人“ 扫荡 ”，坚持游击战争，打退一切投降派和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华中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并着重指出：在华北应以继续巩固为主，在巩固中求发展；在华中应以发展为主，在发展中求巩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华北敌后战场的形势，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 1940 年 4 月在晋东南的黎城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三大任务。会议还强调在执行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的同时，必须做好反“ 扫荡 ” 的准备。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和八路军总部 1 月发出的 1940 年整军训令，八路军各部队在 1939 年两期整军基础上，又进行两期整军，以巩固大发展的成果；同时加强反“ 扫荡 ” 作战和广泛开展交通破击战，以打破敌之分割和“ 囚笼 ” 封锁，巩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

一、粉碎日军 1940 年春、夏季“ 扫荡 ”

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 扫荡 ” 作战

1940 年春，敌华北方面军开始执行 1940 年度“ 肃正建设计划 ”，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春、夏季“ 扫荡 ”，并将“ 扫荡 ” 重点指向平西、冀中、冀东平原地区。

平西军民的反“ 扫荡 ” 作战 日军为维护平汉、平绥铁路交通，于 3 月初调集独立混成第二、第十五旅团和伪军一部共 9000 余人，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 扫荡 ”。9 日，日军从涿鹿东南之矾山堡、蔚县东北之桃花堡和平西的门头沟等地出动，分十路向平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斋堂合击。为粉碎日军“ 扫荡 ”，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以第九团和第十团各 1 个营，分别于斋堂东北和斋堂以西地区，在当地民兵配合下，袭扰敌人；以第十团和第九团主力分别于青白口和张家庄、齐家庄设伏；同时令第七团速由涑水县进至大龙门附近协同第九团作战。15 日，日军 1500 余人，由雁翅等地进犯斋堂，在青白口西部山谷遭我第十团伏击，被歼 100 余人。尔后，第十团以一部兵力阻敌西进，主力向西转移，支援第九团作战。15 日黄昏，由小龙门地区进犯斋堂之敌遭我第九团伏击，被歼 200 余人。15 日夜，我第七团袭击谢家堡敌据点，使该敌不能向斋堂增援。17 日，日军一支辎重队由老婆岭向张家庄运送给养，被我第九团全歼于杜家庄西山。日军在到处遭我打击后，遂于 23

日撤退。是役，我军连续作战 14 天，歼敌 800 余人，击落敌机 1 架。这次反“扫荡”作战，我军针对敌采取的分进合击的战术，以少数兵力在民兵配合下，以游击战消耗、疲惫敌人，集中主力打击敌之一路，得手后迅速转移兵力打击其他各路敌人，从而使我处于主动地位，收到了各个击破敌人的效果。平西反“扫荡”作战结束后，我军以主力一部活动于永定河北岸地区，不断袭击北平郊外的阳坊、瓦窑等地之敌，有力地配合了平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冀中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日军继 1939 年围攻冀中失败后，又于 1940 年春抽调大量兵力对冀中进行全面“扫荡”。2 月下旬，敌从定县、安国、高阳等地出动步兵 1000 余人，在骑兵、炮兵及飞机配合下，对滹沱河两岸进行侦察性“扫荡”，企图消灭冀中军区驻滹沱河两岸的后方机关，并为尔后的全面“扫荡”作准备。我军针对敌之企图，采取避敌锋芒，分散活动，与敌周旋，抓住敌之薄弱部分坚决歼灭的作战方针。从 21 日开始，敌渡过潞龙河、滹沱河后，经深县、武强再渡滹沱河抵河间，始终未发现我军主力，反而到处遭到袭击，被迫于 3 月 5 日撤回原防。3 月 17 日，敌第一一师团等部又从高阳、蠡县、安平、河间、武强等地出动 6000 余人的兵力，分别“扫荡”滹沱河以北、潞龙河以东、滏阳河以西地区，企图寻歼冀中军区主力。我军仍以分散的游击战，广泛袭击敌人，使敌“扫荡”连连扑空，不得不于 3 月 30 日撤退。敌两次“扫荡”失败后，又于 4 月上旬从津浦、平汉铁路沿线调集第二十七师团、第一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备一部及伪军共 3 万余人，分路对大清河以北、唐河、潞龙河、子牙河流域，沧石公路沿线进行全面“扫荡”。4 月 13 日，大清河以北地区之敌 3000 余人进犯固安、新城、永清地区，企图合击我第十军分区主力。扑空后于 23 日北进，“扫荡”涿县东部之平景一带，遭我第十军分区部队伏击，死伤 100 余人。28 日，该敌南返，在固安、新城、霸县地区建据点、修公路，又遭我第十军分区部队和县区武装的不断伏击、袭击，被迫于 5 月底撤回平汉、津浦铁路沿线据点。与此同时，“扫荡”唐河及潞龙河流域之敌第一一师团以 1200 余人组成“讨伐队”，配合各据点之守备队对唐河及潞龙河地区我第四军分区部队合击。4 月 16 日，我第四军分区以直属队在王力地区对敌进行袭击，毙伤其 300 余人，粉碎了敌之合击。25 日，敌以 1000 余人的兵力合击我驻白塔的第三十团，该团与敌激战终日，歼敌 200 余人后跳出包围圈。敌两次合击我主力失败后，又在潞龙河两岸反复“搜剿”，我仍分散活动，寻机伏击、袭击敌人，先后作战 10 余次，毙伤敌 600 余人，迫使敌于 5 月下旬撤回原防。“扫荡”子牙河地区之敌于 4 月初组成 3 个“讨伐队”，分别进犯窝北和商家林以东地区，企图围歼我第三军分区主力。我第三军分区部队及地方武装，时而分散，时而集中，以机动灵活的战术连续打击敌人，先后作战 20 余次，歼敌 700 余人，并攻克敌据点 9 处，迫使敌于 5 月下旬撤回原防。由沧石公路沿线出动之敌约 9000 人，首先合击活动于深县、晋县、深泽之间地区的冀中军区第三十二团，扑空后向东“扫荡”武强、饶阳、安平等地区。我第三十二团及各县区游击队，先后在豆店、时晨镇、刘官庄等地与敌作战 8 次，迫使敌撤出师钦、豆村、许司马等据点，并于 5 月返回原防。至此，敌“全面扫荡”结束。

日军的春季“扫荡”结束后，冀中进入麦熟季节。为保卫麦收，中共冀中区党委决定破坏敌交通、封锁敌据点、袭击抢粮之敌。5 月下旬，衡水、安家村之敌频繁出动，四处骚扰，对麦收危害极大。6 月 1 日夜，我活动于

衡水地区的回民支队决心打击出扰之敌。6月2日凌晨，该支队以第二、第五、第六中队、特务大队、衡水县游击大队第一中队分别设伏于东西康庄、南漳桥、白庙、北漳桥、杨家庄等地，以第一中队袭击敌安家村据点，12时许，衡水据点之敌40余人来援，在康庄以北被我全歼。6月6日，回民支队侦悉永清县韩村、杏马房、王希城等据点之日伪军500余人，于上午9时向永清东北的张庄进犯，企图围歼我掩护群众麦收的特务大队。我军根据敌之企图，迅速抢占张庄周围有利地形，决心打击该敌。11时，敌进至张庄附近，并对我军发起进攻，我据险英勇抗击，歼敌近百人，将敌击退，从6月1日至25日，我冀中地区军民为保卫麦收，先后与敌作战40余次，歼日军500余人、伪军300余人，攻克敌据点9处。

麦收过后，青纱帐起，阴雨连绵，日军处于不利地位。冀中军区抓住有利战机，以两个团的兵力，从6月25日起，在肃宁、博野、高阳、安新、清苑、蠡县及河间，献县、青县以北等地区，利用青纱帐作掩护，连续伏击、袭击日军，经3日作战，第一军分区第十六团、第三军分区第二十三团于河间、献县地区歼敌160余人，缴枪100余支，军马20匹，收复和摧毁敌据点数处。其他各军分区部队也频繁出击，先后袭击了饶阳、霸县、武强、深县地区之敌据点，歼灭部分敌人。至8月10日，冀中军区部队共作战140余次，毙伤日伪军2500余人，俘伪军500余人，攻克据点15处。在此期间，我广大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还破坏公路300多公里，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

在1940年春、夏季反“扫荡”中，冀中我军针对敌人经常依托“点、线”，分路合击我根据地的行动特点，将部队以营或连为单位，分散活动，相机歼敌。在敌疲惫或扑空撤退时，我则适当集中兵力，打击敌之一路。对敌扩建和新建的据点，则以小部队趁其立足未稳予以袭击、摧毁，并发动群众大力破坏敌交通线，切断敌据点与据点之间的联系。青纱帐起来以后，我军则以青纱帐作掩护，主动向敌出击，拔除敌新建和扩建的据点。经反复斗争，我终于打破了敌由“点、线”扩大到“面”的占领的企图。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夏季“扫荡”

(参见附图32)

1940年2月上旬，第一二师主力由晋察冀边区返回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关于把晋西北建设成为连结陕甘宁边区与华北的“战略枢纽”的指示，部署所属部队积极开展晋中平原与同蒲铁路北段的游击战争，以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时加强大青山根据地的斗争，并向绥东发展。2月下旬，日军出动5000余人，分路“扫荡”五寨、静乐、临县、方山、文水和交城以西等地区，目的在于侦察我军情况，为尔后进行大“扫荡”作准备。5月，敌在我晋西北根据地周围部署了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和第二十六师团一部共2.5万余人，并从5月下旬开始，修筑公路，增设据点，运输物资，派出特工人员潜入我根据地侦察。第一二师针对日军的动向，对部队进行了战斗动员，补充了作战物资，勘察了地形和道路，制订了作战预案，并协助群众进行空室清野，决心粉碎敌之“扫荡”。

5月底，日军开始进行兵力调动。第二十六师团一部由大同、平鲁、朔

县等地向偏关地区集结；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由崞县、代县等地向五寨、神池、宁武地区集结；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由文水、交城、忻县、太原等地向静乐、河口、古交地区集结，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在离石、大武、柳林等地集结。其作战企图是：先占领苛岚、岚县两城，驱逐或消灭交城、文水以西我军，并占领黄河各渡口，切断晋西北我军通往陕甘宁边区的道路，尔后由东、南、北三面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合击，逐步压缩围歼我军，彻底摧毁我根据地。针对敌之企图，第一二 师首长决心：第一阶段，相对集中兵力，打击敌之薄弱部分，争取歼敌一部；第二阶段，以分散的游击战为主，疲惫与消耗敌人，迫敌撤退；第三阶段，再相对集中兵力，歼敌一路于运动中。具体部署是：以第三五八旅并指挥第二支队，集结于王狮、普明之间地区待机；以第三支队集结于岚县以北之河口地区，准备打击向岚县进犯之敌；以独立第一旅进至临县、三交以东地区，相机打击由大武向临县进犯之敌；以决死队第二纵队在离石、方山之间活动，以决死队第四纵队在汾（阳）离（石）公路沿线游击，袭扰敌后方，断敌交通；以独之第二旅与新军暂编第一师集给于苛岚、五寨以西地区，相机打击由五寨向讨岚进犯之敌；师特务团及新军工人武装自卫旅活动于文水、交城西北地区，积极打击该地敌人，配合作战。此外，第一二 师首长还令驻黄河西岸宋家川之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进行战斗准备，相机以一部兵力东渡黄河，在军（渡）离（石）公路沿线袭击敌人，配合反“扫荡”作战。

战役的第一阶段从6月7日开始。当日下午，集结于静乐之敌1100余人分两路向岚县进攻。8日，占领该城。12日，文水、交城、古交和静乐等地之敌2500余人，分九路向文水西北的双龙镇、对久镇地区合击，企图歼灭我特务团和工人武装自卫旅。我军及时跳出敌合击圈，使敌扑空。此时，我第一二 师首长判断敌已完成对我之进攻部署，并且南面是敌之主要进攻方向，遂下达了补充作战指示：令第三五八旅将主力集结于东村东南地区待机，令第三支队钳制岚县之敌；令独立第一旅以第七一五团于三交以东地区打击由大武出犯之敌，待敌向临县进攻时，再转移至机动位置待机；令独立第二旅主力与暂编第一师在五寨、苛岚间打击由五寨向奇岚进犯之敌，并将敌向保德方向吸引，以减轻敌对第三五八旅等部的压力；令决死队第二纵队在敌大举进攻临县、方山时，转至大武、方山至三交的交通线上作战；令决死队第四纵队以两个团于汾离公路线上切断敌交通，令师特务团与工人武装自卫旅在文水、交城西北地区坚持游击战。

15日，第三五八旅由赤坚岭转移至东村以南之曲井村、上马铺地区。16日，侦悉由静乐进攻对久镇地区之敌一路700余人退至米峪镇，并有向静乐方向继续撤退的征候。第三五八旅决心利用米峪镇附近有利地形歼该敌于运动中，遂以第七一六团、独立第四团和独立第二支队，于当日下午进至米峪镇以北的大夫庆附近设伏。但米峪镇之敌未动，于是第三五八旅以独立第二支队于大夫庄对娄烦方向实施警戒，主力立即向米峪镇开进，并准备以预期遭遇战消灭该敌于米峪镇附近。17日7时，第三五八旅先头第四团在曹家掌与敌遭遇，该团迅速抢占有利地形与敌展开激战。9时许，第七一六团加入战斗。至12时，我军占领了曹家拿西山与南山阵地，完成了对敌之包围。17时，我军发起总攻，歼敌大部，残敌负隅顽抗。18日，古交等地之敌驰援米峪镇，同时敌对晋西北根据地的全面“扫荡”已经开始。在此情况下，我第一二 师令第三五八旅以独立第四团围歼残敌，主力向赤坚岭转移。19日，

独立第四团歼残敌大部，尔后迅速转移。此战，我共歼敌 500 余人。至此，第一阶段的反“扫荡”作战结束。

自 6 月 20 日开始，敌分多路向我根据地内推进。第一二 师遂展开了第二阶段的反“扫荡”作战。当日，岚县之敌 1000 余人占领乐村、普明、寨子等地；静乐、古交、文水之敌 2500 余人经米峪镇向赤坚岭、马坊、开府等地寻歼我军；占领普明之敌 400 余人也向赤坚岭进攻；大武之敌 1000 余人向方山进犯，对我军形成合击之势。我第三五八旅及时跳出敌之合围圈，于 21 日晨转移至阳坡、寨上地区。然而各路敌人也向阳坡、寨上推进，企图追歼我军。当夜，第三五八旅由阳坡、寨上迅速向北转移，并于兴县附近与师部会合，摆脱了敌之合围。

6 月 18 日，敌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一部 3500 余人进占三交、碛口和临县。随后向我驻安家庄、清凉寺、梁家会等地的独立第一旅进攻，该旅适时转移，日军扑空后，于 24 日和 25 日先后占领了黄河沿岸的罗峪口、剋虎寨等地。在此期间，敌第二十六师团 4500 余人，也于 16 日从偏关地区分路出动，并从 17 日至 24 日先后进占岢岚、保德、河曲、旧县镇、沙泉等地。第一二 师针对各路进攻之敌互相配合，向我根据地腹地推进的情况，决定我军采取分散活动，避敌锋芒，于敌之翼侧及后方，以伏击、袭击为主，疲惫与消耗敌人；同时以一部兵力断敌交通。根据上述方针，师机关率第三五八旅主力集结于兴县以北地区：独立第一旅由雷家集以北转移至临县窑头以西地区，袭击与伏击由临县出动之敌，独立第二旅及暂一师由保德地区转移至敌翼侧，以一部在五寨至岢岚以西地区活动，以 1 个团进至三岔、五寨间，以 1 个团进至新屯堡以北，袭扰三岔、岢岚、新屯堡各点之敌，决死队第二、第四纵队进至大武、离石间以及汾阳附近开展活动；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以 1 个营由碛口东渡黄河，活动于柳林、李家垣、离石之间，威胁敌后方据点。在我军的积极打击下，敌无法在我根据地内立足，遂于 6 月 26 日开始撤退。但敌并不甘心失败，图谋在撤退时仍寻机报复。于是，我军又展开了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

6 月 28 日，敌近 3000 人分三路向兴县合击，7 月 2 日，敌由东、西、南三面形成对驻兴县的第一二 师领导机关的包围态势。为打破敌之企图，第一二 师机关率第三五八旅由兴县及其以北地区转移至兴县西南的曹家坡、张家圪台地区，寻机打击敌之一路。当侦悉参加这次“扫荡”的日军大部撤回原出发地，而进攻兴县之敌已孤立突出时，第一二 师首长决心集中第三五八旅和独立第一、第二旅及第三、第五支队，在兴县以东二十里铺地区伏击企图由兴县东退之敌。

4 日上午，兴县之敌 2000 余人分三个梯队进至会阳崖东西地区，我独立第一旅第二团和第七一五团突然向敌发起猛攻，给敌以重大杀伤。但由于我预定参加战斗的部队有的未按时到达伏击位置，故未形成对敌之四面包围，当晚，我军发起总攻，但敌已完成防御部署，且由保德南援之敌 1000 余人已到达兴县城，我军遂撤出战斗。此战，毙伤敌 700 余人。7 月 6 日，敌全部撤退，我军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这次反“扫荡”，历时月余，我军共作战 250 余次，歼日伪军 4500 余人，缴枪 300 余支（挺），收复了兴县、临县、方山、保德、河曲等县城。反“扫荡”胜利后，晋西北军区于 1940 年 11 月 7 日成立，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至此，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已拥有东起平绥铁路大同至集宁段和同蒲铁路大同至平遥段，西至黄河，

南迄汾（阳）离（石）公路，北至大青山的广大地区。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1940年春，我军反击国民党顽军进攻胜利后，冀鲁豫边区出现了新局面。4月，八路军第二纵队由太行山南部地区转移到冀鲁豫边区，并成立了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军区司令员兼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崔田民任军区政治委员，杨得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下辖3个军分区。同时成立了鲁西军区，萧华任司令员，下辖4个军分区。正当我加紧整训部队和加强根据地建设之际，敌第三十五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共6000余人，于6月5日从开封、商丘等地出动，分三路向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之濮阳地区进行“扫荡”。冀鲁豫军区新编第三旅第八团在小渠、黄村与敌展开激战，歼敌4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激战后，敌以为发现我军主力，遂调驻兖州、泰安、徐州等地之日军第三十二、第二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各一部共1.5万余人，分多路向清丰、濮阳合击。这时，我第三四四旅、新编二旅已奉命南下协同新四军开展豫皖苏边的抗日斗争，留下的新编第三旅、第二旅之第四团和河北民军第一旅等部，采取分散的游击战，到处打击敌人。敌因到处扑空，并不断遭到袭扰，遂于6月18日结束“扫荡”。之后，敌除留一部兵力占据清丰、濮阳、内黄、东明等县城和滑县部分地区外，大部兵力撤回津浦铁路各据点。

山东抗日根据地鲁南、鲁中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鲁南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第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后，首先开辟了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临（沂）、费（县）、峰（县）、滕（县）边区，继之，于1940年1月开辟了郯（城）码（头）平原根据地。2月，第一一五师以第六八六团、特务团等部攻占了鲁南山区的白彦镇，全歼驻守该镇的伪军。白彦地处鲁南山区中心，又是鲁南区交通之枢纽，地位十分重要。因此，第一一五师攻占白彦后，敌拼死反扑。

3月7日，滕县日军100余人，向白彦进犯，被我击退。12日，日军700余人分三路向白彦进犯，我特务团、第六八六团、苏鲁支队等部将敌击退，并歼其200余人。19日，敌又调集2000余人，分商路向白彦进犯，于21日占领白彦。我军于21日夜袭入白彦，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日军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出该镇。在3次白彦战斗中，我军共毙伤日伪军800余人，缴枪350余支。白彦战斗的胜利，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鲁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严重地威胁着日军占领的津浦、胶济、陇海等铁路交通，因此，敌第十二军以第三十二、第二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六、第十旅团各一部共8000余人，于4月14日，由邹县、滕县、枣庄、临沂等地出动，分路向抱犊崮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一举歼灭我军主力，摧毁抗日根据地。敌首先“扫荡”我根据地边缘区，并建立据点，尔后步步为营，向我根据地中心区推进。我军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以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特务团结合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作战，主力则转至外线作战。以第七团和第六八六团活动于费县西北，以东进支队活动于郯码地区，以教导大队活动于崮口山区，以苏鲁支队活动于滕费边地区，以峰县支队和

运河支队活动于峰县以南地区。当敌“扫荡”开始后，我内线部队在抱犊崮山区东麓之大炉、车辆、埭阳一带灵活穿插，与敌周旋，多次避开敌之合击，并在大炉以西战斗中给敌以杀伤。转至外线之教导大队、第六八六团、苏鲁支队、峰县支队和东进支队等部，为策应内线作战，从4月21日至30日，分别在崮口山区、费县西北、峰县西南、驼山等地多次与“扫荡”之敌展开激战，歼敌560余人。至5月上旬，敌在我军民打击下，已疲惫不堪，遂结束“扫荡”，撤回原据点。在这次反

“扫荡”中，我共作战30余次，毙伤日伪军2200余人，保卫了鲁南根据地。

鲁南反“扫荡”胜利后，我军继续向天宝山方向发展。7月，第一一五师以一部东渡沭河，开辟了临（沂）郯（城）赣（榆）之间的广大地区，打开了向滨海发展的通路。至1940年底，我第一一五师完成了开辟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并打通了鲁南与鲁中、湖西、鲁西的联系，为坚持鲁南的抗战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鲁中区军民打退日伪军的多次进犯 1940年3月16日，沂水日军300余人，伪军100余人，向沂水西南的孙祖进犯。我山东纵队以第二支队等部于孙祖附近山地伏击敌人，毙伤日伪军120余人，并收复沂水以南的铜井。5月，泰安、莱芜之敌600余人进犯泰山区，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以伏击、袭击等手段，歼其300余人。8月，临沂、蒙阴之敌约1500人，再次向孙祖等地进犯，我军在孙祖以南的鼻子山歼敌300余人，并收复青驼寺、垛庄等据点。9月，敌又集中1400余人向沂蒙山区南部进犯，又被我击退，并收复了半程和沂河沿岸的汤头、葛沟等20个据点。经过半年多的作战，以沂蒙山、泰山为依托的鲁中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并打通了与周围各区的联系。

与此同时，胶东、清河、冀鲁边、湖西等抗日根据地军民，也先后粉碎日伪军多次进犯，发展壮大了自己，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 开展交通破击战

1939年冬，日军加紧对交通线的控制，在交通线上及其两侧地区建立据点，并依托这些据点，对我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以实现其由“点、线”占领扩展到“面”的占领的计划。在晋冀豫边区，敌主要加紧对平汉铁路、邯（郸）长（治）公路、白（圭）晋（城）铁路以及武（安）沙（河）公路的控制。为打破敌之企图，我第一二九师首长，号召本区军民面向交通线，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广泛的交通破击战，以打破敌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在第一二九师的统一指挥下，晋冀豫边区军民从1939年冬至1940年6月，先后进行了邯长公路、平汉铁路、白晋铁路、武沙公路四次破击战。

邯长公路破击战 邯长公路跨越冀晋两省，横穿太行山，是驻晋南日军后勤补给的重要交通线。敌控制邯长公路后，将我太行根据地分割成南北两部分。为打破敌之分割，1939年冬，我军乘驻白晋铁路及邯长公路之敌第二十师团与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换防之机，发起了邯长公路破击战。第一二九师及晋冀豫军区部队各一部，并指挥第三四四旅，自12月8日起，首先以地方自卫队、游击小组对敌进行不间断的袭扰，转移敌之

注意力，掩护主力集结。14日开始，第六八八团、第六八九团和特务团袭击潞城、赵店镇、黎城、停河铺、东阳关、响堂铺等敌军据点，并破坏敌之交通；第七六九团切断黎城至涉县的公路，并攻击响堂铺、涉县据点之敌。22日10时，第一二九师特务团以一部结合当地游击武装，于下桂花，麦仓方向钳制黎城之敌，主力分两路经东、西水洋向赵店镇迂回，第六八七团及第六八八团各一部，经东岭沟分三路直袭赵店镇，击溃守敌500余人，于22时攻克该镇。23日，师特务团主力转至上桂花、麦仓方向，分两路进袭黎城，第七六九团一部由靳家街急袭戚里店。15时，我军对黎城发起攻击，守敌900余人弃城东窜。25日，我第七六九团及第三四四旅一部袭击涉县，先遣支队及地方游击队袭击井店及响堂铺，并相继攻克涉县城及响堂铺、井店镇。至此，邯长路交通完全中断，我破击战胜利结束。是役，我军共歼敌700余人，拔除敌据点23处。

平汉铁路破击战 1940年初，日军依托平汉铁路向东扩张，先后筑成石家庄至南宫、内丘至巨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把冀南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并加以封锁。为打破敌之分割、封锁，冀南军区部队在民兵2万余人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于4月7日起，对于汉铁路以及由该路伸向冀南抗日根据地内的主要公路展开了全面破击。经十余日连续作战，共破坏内邱至邢台段铁路数公里，石家庄至南宫、邢台至威县、内丘至巨鹿、大名至邯郸等公路干线100余公里，有力地打击了敌分割、封锁我冀南根据地的企图。至20日，平汉铁路破击战结束。

白（圭）晋（城）铁路破击战 日军在冀南修筑公路的同时，积极抢修山区的白晋铁路，并计划修筑临（汾）邯（郸）铁路，企图将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分割成四块，尔后依托这些铁路线进行分区“扫荡”，逐一加以摧毁。为了破坏敌之修路计划，5月初，第一二九师在太岳、太行抗日根据地2万群众和民兵的配合下，发起了白晋铁路破击战。其部署是：以师特务团和部分地方武装，破击东观至来远段；以第三八五旅、平汉纵队主力与晋冀豫边纵队第一、第三团破击来远至权店段，并攻击南关镇；以第三八六旅及决死队第一纵队，破击权店至段柳村段。5月5日，我军民向100多公里的铁路线展开大破击，并袭击了白晋铁路沿线的沁县、固亦、漳原、权店、南关、来远等敌军据点。至7日，白晋铁路破击战结束。我军民共破坏铁路数十公里，毁大小桥梁50余座，炸毁火车一列，歼敌350余人，打破了敌修路计划和分割太行、太岳根据地的企图。

武（安）沙（河）公路破击战 1940年初，日军修筑了邢台至羊范、沙河至公司窑等公路，企图以武沙公路进一步隔断我太行、冀南两根据地的交通联系。为打破敌之企图，6月中旬，第一二九师发动了武沙公路破击战。6月20日夜，我军以第七六九团和第三十二团分别进攻刘石岗和范下曹日军据点，公司窑之敌600余人出援，在下关村遭我第十四团阻击，毙伤其100余人。21日，我第七六九团和第三十二团相继攻克刘石岗和范下曹。与此同时，我以冀中警备旅袭击赵店，破坏公路6公里；以第三十一团攻占伊郭村，破坏邢台至官庄段铁路5公里。是役，我歼敌伪军700余人，缴枪270余支（挺），炮2门，挫败了敌切断我太行与冀南根据地交通联系的企图。

交通破击战是我军主动对敌占“点、线”进攻的一种作战方式。采取这种作战方式，必须事先做周密的计划和部署，充分发动群众，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及群众的积极性，并把参战的部队和群众区分为破路

队、掩护队、预备队，以工兵在技术上加以指导。在破击战进行中，应掌握先破（路）后袭（击）的原则，即首先将敌之交通破坏，达到目的后，利用敌交通中断，无法互相支援的有利时机，选取若干薄弱据点加以攻击。

三、加强根据地和军队建设， 巩固大发展成果

随着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也迅速扩大。但由于战斗频繁，发展迅速，因而，尚待巩固。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的方针、任务和适应持久抗战的需要，从 1939 年下半年以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共北方局，先后发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根据地和军队建设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认真做好党的巩固工作，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巩固并训练部队，以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1939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在过去大发展的基础上，以整理和巩固党的组织的工作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1940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要求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完全民选的、以既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参加的抗日政权。同时还强调要巩固与扩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给八路军、新四军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中，重申了执行 2 月 1 日决定的重要性，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将华北华中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决定，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 1940 年 4 月召开的黎城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建党、建政、建军三大任务。据此，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和八路军各部队，展开了加强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工作。

首先是整顿共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建设是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因此，各抗日根据地在巩固大发展成果中，都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在晋察冀边区，中共北方分局提出把巩固党、克服党的工作的不平衡现象作为中心任务，进行了整顿支部和加强党员教育等工作。至 1940 年底，对党支部以上的干部普遍进行了审查，对所有的基层党支部进行了整顿，并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同时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通过整顿，健全和纯洁了组织，提高了党员的政治觉悟，进一步加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分局提出了一面发展、一面巩固的方针。到 1940 年底，地方党组织的党员发展到 11 万人，党的支部和小组已在农村中普遍建立起来，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冀鲁边、鲁西、湖西、鲁南、鲁中、清河、胶东等区党委及其下属的地委、县委、区委等组织。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展开了整顿党的组织的工作。

其次是加强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各抗日根据地都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晋察冀边区于 1940 年开展了基层政权大选举运动，经过一年的努力，由边区到村级的抗日民主政权基本上建立起来。这些政权领导着面积达 21 万平方公里，1500 万人口的根据地。在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了二十条施政纲领（简称“双十纲领”），对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原则和任务、人民群众的权利义务以及各项具体政策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使根据地的施政工作有章可循。晋冀豫边区在中共

北方局黎城会议后，进一步加强了政权建设工作。1940年8月成立了冀南、太行、太岳联合行政办事处，并把冀南、太行、太岳划分为3个行政区，下属15个专区、115个县政权；同时实行了普选，成立了区乡等基层政权，并制订了各种施政条例，使根据地的党政工作逐步地走上正轨。晋绥根据地于1940年2月1日成立了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并颁布了施政纲领，接着对各专员公署、县、区、村各级政权进行了整顿。并在绥远地区成立了绥中、绥西、绥南等3个专署。与此同时，山东抗日根据地也大力开展政权建设工作，至1940年底，先后建立了9个专员公署和5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各抗日根据地在加强政权建设的同时，把组织人民群众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加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1939年，晋察冀边区遭受20多年罕见的水灾，1万多个村庄被洪水淹没。为了战胜困难，1940年春，北方分局和边区政府认真分析了边区生产的形势，专门发出了发展生产的指示，提出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工作的口号，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部队组织群众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根据北方分局和边区政府的指示，各地区都开展了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生产运动。1940年春，冀中区修筑了堤坝30余处，长260余公里，疏通河道9条，长80余公里，100多万亩土地及时种上了作物。北岳区修筑堤坝310多处，开凿渠道2000余条，打井3500余眼，使17万亩土地及时得到灌溉。在此期间，晋察冀军区所属各部队，也尽最大努力抽调人力、畜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修复河滩、耕地18万亩，开荒3万余亩。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注意了加强工业、手工业生产，大力举办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纺织、造纸、榨油、磨面、开矿等手工业。晋察冀军区还建立了机械厂，生产手榴弹和地雷。为了活跃商品经济，冀中区开办了3300多个合作社。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进行财政经济的恢复工作，确定以开源节流、自力更生为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并颁布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减租减息和交纳爱国公粮等法令。从而保证了根据地内社会安定。在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的同时，党政机关和部队还开荒、种菜、养猪，部分地解决自己的生活所需，尽力减轻群众的负担。

第三是加强军队建设，八路军进行整军。1939年和1940年，是八路军的大发展时期，1938年底总兵力为15.6万余人，1939年底为27万余人。由于发展迅速，干部新、成员新，加之战斗频繁，许多部队未及教育和训练；因而，部队的军政素质亟待提高，组织体制急需整顿。为巩固大发展成果，适应持久抗战的需要，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2月1日、6月23日和1940年2月21日连续发出整军训令，强调整军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内部团结，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克服军阀主义和游击习气，使部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大大提高一步；并要求在政治整训的基础上，加强军事整训，重点为游击战的战术和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训练。在军政整训的基础上，进行组织编制整顿，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计划1939年两期共整顿60个团，1940年两期共整顿50个团。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整军训令，各部队在整军中始终把加强党的建设放在首位，先后举办了各种干部党员、新党员训练班，学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党的基本知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并在教育的基础上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纯洁内部和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从而使部队党员的数、质量都得到提高。据一些部队统计，整军后，主力团的党员人数占部队总人数一般都在40%左

右，地方团队也达到 30%。在整顿党的组织的同时，对部队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使全体指战员对抗战的前途和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都有比较明确的了解，从而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在整军中，全军普遍开展了投弹、射击、刺杀、爆破、土工作业和单兵、班、排、连的技术战术训练，使部队的军事素质有了提高。

在军政整训的基础上，进行部队整编。依据八路军总部的计划，1939 年两期共整编了 61 个团，1940 年又整编了 50 个团。整编中除加强充实原有的各主力旅外，还组建了许多新旅。计第一一五师先后编成 7 个教导旅，山东纵队先后编成 5 个旅，第一二九师和冀鲁豫军区先后编成 9 个新编旅，第一二师先后编成 2 个独立旅，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先后编成 2 个警备旅。

八路军 1939 年至 1940 年的整军，是贯彻落实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的一项重大措施。通过整军，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这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在整编部队的过程中，有的地区过多地编并地方武装，以致对这些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1940 年，敌在华北把进攻的矛头全面指向八路军，不仅对各抗日根据地连续不断的大规模“扫荡”，而且实行企图窒息我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斗争十分残酷和艰苦。然而，我军在党的领导下，继续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充分发动群众，实行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采取以分散的游击战为主，相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的方针，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而且主动地发起了以反击敌“囚笼”政策为目的的交通破击战，打破了敌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的企图，并且使我军力量继续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

第五节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

(参见附图 33, 附表 18、 19)

1940 年夏秋, 日本帝国主义在德国法西斯军队横扫西、北欧, 取得暂时胜利的刺激下, 决心乘美国的战备尚未完成, 英国又无力东顾之机, 积极准备实行南进政策。因而, 在中国战场加紧诱迫国民党投降, 同时继续以主要力量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 特别是在华北加紧推行 1940 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住、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 把进攻的矛头全面指向八路军, 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 以巩固其占领区。

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我军的全面进攻, 打击其“囚笼政策”, 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 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 克服国民党投降的危险, 八路军总部于 8 月 20 日, 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役。由于战役发起后, 我军参战兵力迅速增至 100 个团以上, 故称“百团大战”。

一、战役意图和兵力部署

1940 年 7 月 22 日, 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下达了关于以破击正太铁路为中心的《战役预备命令》, 并报中央军委。

《命令》指出: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 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 国内困难增加, 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 所以, “一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 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同时, 敌人依据几条交通要道, 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区, 增设据点, 封锁与割裂我各抗日根据地, 特别是对晋东南实施“囚笼政策”。因此, “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 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 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 创立显著的战绩, 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 兴奋抗战的军民, 争取时局好转, 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 打破进犯西安之企图, 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 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 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 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 大举破击正太路。”战役的目的是: “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 消灭部分敌人, 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 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命令要求各兵团, 对其他各重要铁路线, 特别是平汉、同蒲等铁路“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 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命令规定直接参加正太铁路作战之总兵力, 应不少于 22 个团; 其他各铁路线配合作战之兵力, 由各兵团自行规定之, 并限于 8 月 10 日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各兵团接到预备命令后, 重点对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北段沿线及其两侧地区之敌情、地形、敌之工事构筑和居民社会等情况, 进行了侦察和调查。各参战部队进行了短期的攻坚和破路训练, 以及物资器材等方面的准备。地方政府则大力动员群众, 积极准备支援前线作战。

8 月 8 日, 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命令》规定: 晋察冀军区以主力约 10 个团, 破击正太铁路阳泉(不含)至石家庄(含)段, 重点为阳泉至娘子关段; 第一二九师以 8 个团附总部炮兵团 1 个营, 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含)段, 重点为阳泉至张净段, 另以 1 个团之主力位于潞城、襄垣间, 阻敌向正太铁路增援; 第一二师以 4 至 6 个团, 破击

忻县以北之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以主要兵力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敌向正太铁路增援，另以1个团进至榆次南北地区，配合第一二九师作战；总部特务团集结于下良、西营地区待命。命令要求各集团对其他有关铁路、公路线，也必须以足够兵力破击之，相机收复某些据点，阻击可能向正太铁路增援之敌。命令规定，上列各集团和总部特务团统由总部直接指挥，并限于8月20日战役开始。

二、战役经过

战役首先从正太路发起，尔后迅速扩展到除山东以外的整个华北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其中包括：冀察全境、晋绥大部和热河南部地区；正太、平古铁路全线，安阳以北之平汉铁路，德州以北之津浦铁路，临汾以北之同蒲铁路，归绥以东之平绥铁路，北宁铁路之山海关至北平（今北京）段，白晋铁路之平遥至壶关段，以及正在修筑的德石铁路、沧石公路等。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驻有日军3个师团的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飞机150架，另有伪军约15万人。我军参战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一二师（含决死队第二、第四纵队等）20个团，第一二九师（含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等）46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此外，尚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

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

我军中心任务是开展交通破击战，重点摧毁正太铁路。正太铁路横越大行山，全长231公里。它连接平汉、同蒲两铁路，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如果正太路被毁，山西境内日军的给养补充和外运掠夺的战略物资将发生极大的困难。因此，日军历来以重兵守备。此时，在正太铁路沿线驻有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驻阳泉）全部，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司令部驻石家庄）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司令部驻太原）各一部。敌在沿线城镇、车站、桥梁、隧道附近，筑有坚固防御工事；在铁路两侧10至15公里地区，还设有外国据点。在此情况下，我军必须先攻占敌据点，尔后才能实施破路。

按照八路军总部的战役部署，晋察冀军区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指挥下，以18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又2个骑兵营、3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5个游击支队，分别组成左纵队、右纵队、中央纵队、钳制部队和总预备队，破击正太铁路之阳泉至石家庄段；同时对平汉铁路元氏至卢沟桥段、津浦铁路德州至天津段、北宁铁路北平至山海关段以及沧石公路等，也作了相应的破击部署。第一二九师在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下，以10个步兵团、3个独立营、4个工兵连，分别组成左翼破击队（以下简称左翼队）、右翼破击队（以下简称右翼队）、总预备队和平（定）和（顺）支队，破击正太铁路之阳泉至榆次段；同时对平汉铁路元氏至安阳段、同蒲铁路榆次至临汾段、白晋铁路平遥至壶关段以及邯（郸）长（治）公路等，也作了相应的破击部署。第一二师在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指挥下，以2个步兵团破击同蒲铁路忻县至宁武段和忻（县）静（乐）公路，以3个步兵团破击

同蒲铁路宁武至朔县段，以3个步兵团破击神池至五寨间公路，以1个步兵团围困岚县地区之敌，以1个步兵团围困离石以北地区之敌，以9个步兵团破击太（原）汾（阳）公路和汾（阳）离（石）公路，以1个步兵团在离石、军渡间打击敌人。

8月20日晚，正太铁路破击战全面展开。22日，晋察冀军区右纵队的第五团、第十九团向娘子关和阳泉间的敌据点发起攻击。经3小时战斗，第五团两个连攻入晋冀交界的险要隘口娘子关，守敌大部被歼，残敌在途经娘子关车站的800名退役归国士兵的支援下，顽强抵抗，与我形成对峙状态。翌日上午，我军乘胜破坏了娘子关以东的桥梁，并割断了敌之通信线路。同时，我第五团以1个连攻击磨河滩、程家陇底，后因日军500余人乘铁甲列车赶来增援，遂撤出战斗。21日下午，磨河滩敌100余人开始反击，第五团遂停止对娘子关的攻击，撤至王家岩附近。21日晚，第五团以1个连再度攻击磨河滩，仍未奏效。22日上午，日军300余人向我反扑，该连英勇奋战终日，于当晚撤出战斗。与此同时，我第十九团对移粮、巨城、乱流和上、下盘石的攻击，也未得手。

中央纵队的第二、第三、第十六团和井（陘）获（鹿）支队一部，于20日23时攻击娘子关（不含）至微水（含）段之日军据点。担负攻击井陘煤矿任务的第三团，在矿工支援下，首先切断矿区电源，尔后利用夜暗发起冲击，激战至21日黎明，占领了主要矿井东王舍新矿，毙伤日军一部，彻底破坏了该矿设施。与此同时，第二团攻入了蔡庄，破坏了乏驴岭桥梁；第十六团攻占了地都、北峪、南峪等据点，破坏了南、北峪之间的桥梁。23日后，阴雨连绵，河水暴涨，严重妨碍我军作战行动。同时，由于左纵队攻击微水至石家庄段的岩峰、上安等据点未能得手，我军遂转移兵力，实施对铁路、桥梁的全面破坏。

在攻击井陘煤矿战斗中，我军战士从战火中救出两名日本小女孩。聂荣臻司令员对她们极为关怀，派专人照顾，并致函当面日军指挥官阐明我军革命人道主义立场，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日本士兵和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军阀发动的不义战争，尔后派人将小女孩送进日军据点，引起日军内部的很大震动。

担负正太铁路西段破击任务的第一二九师，于20日20时发起攻击。其左翼队之第十六团，在进攻芦家庄战斗中，连克碉堡四座，并火烧据守仓库的日军，歼其80余人，缴枪50余支。21日黎明，右翼队之第三十团，在进攻桑掌和铁炉沟战斗中，全歼守敌130余人。总预备队之第十四团对狮脑山的争夺，战斗更为激烈。狮脑山位于阳泉西南四公里处，是正太铁路西段的咽喉要地。战役发起后，为防敌抢占狮脑山，攻击我侧背，第一二九师将总预备队开进平定以西之天华池、苇池村地区，并以第十四团控制了狮脑山。从21日至26日，敌从200余人增至6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并施放毒气，连续向狮脑山猛攻。我军据险英勇抗击，坚守六昼夜，歼敌400余人，保障了破击战的顺利进行。尔后，第十四团主动转移。经数日连续战斗，第一二九师部队先后攻克了正太铁路线上的芦家庄、和尚足、马首、桑掌、铁炉沟、上湖、燕子沟、坡头、狼峪、张净等据点及车站多处；同时，还攻克了冶西、落摩寺等外围据点数处。至此，除寿阳、阳泉等少数城镇，正太铁路西段基本为我控制。尔后，我军在广大参战群众积极协助下，对铁路、桥梁、隧道进行了大规模破坏，使正太铁路西段陷于瘫痪。

担负同蒲铁路北段破击任务的第一二 师，于 8 月 20 日晚对该段铁路和铁路两侧之主要公路展开了大规模破击。至 8 月 31 日，先后攻克了北龙泉、康家会、丰润村、阳方口等据点多处，并一度袭入五寨城，共歼灭日伪军 800 余人，切断了同蒲铁路北段和忻静、汾离、太汾等公路。

在破击正太铁路、同蒲铁路的同时，八路军在地方游击队和民兵配合下，对华北其他各主要铁路、公路，也进行了广泛的破击，并攻克了一些据点，歼灭了部分敌人。冀南军民严重破坏了平汉铁路元氏至安阳段，迟滞了日军修筑德石铁路的进程。太岳军民破击了白晋铁路和同蒲铁路南段。冀中军民除破击本区内部分交通线外，还袭击了一些敌据点。冀东军民破击了北宁铁路，一度袭入唐山市，攻克了赵各庄、唐庄子等据点。

在八路军突然猛烈攻击下，正太铁路沿线的日军在数日内联络中断，情况不明，陷入混乱状态。但在察明情况后，便紧急调集兵力，进行疯狂反扑。在正太铁路西段，日军从白晋铁路沿线和同蒲铁路临汾南北段，抽调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各一部，配合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向第一二九师反击。在正太路东段，日军从冀中、冀南抽调约 5000 人，增至石家庄、娘子关及其以北地区，配合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向晋察冀军区部队反击。反击之敌采取东西对进，企图重新打通正太铁路。在同蒲铁路北段，日军也开始进行反击。

8 月 26 日，八路军总部根据敌情变化，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晋察冀军区以 3 个步兵团坚持正太铁路寿阳至石家庄段沿线的游击活动，以 4 个步兵团力求收复上社、下社以北各据点，并向盂县、寿阳以北，定襄、忻县以南开展游击活动，第一二九师以 4 个步兵团破击平（定）辽（县）公路，相机收复辽县、和顺两城，以 2 个步兵团坚持阳泉以西正太铁路沿线和榆次、太谷地区的游击活动；第一二 师以 5 个步兵团破击同蒲铁路忻县至太原段。

9 月 2 日，日军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各一部，共 8000 余人，合击正太铁路南侧安丰、马坊地区的第一二九师。该师以 4 个团兵力英勇抗击敌人，毙伤其 200 余人，掩护了师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9 月 6 日，上述第一二九师部队于榆社西北双峰地区，将日军 1 个大队包围，激战一昼夜，歼其大队长以下 400 余人。同日，第三八五旅在张建设伏，重创向辽县撤退之日军。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乘日军集中兵力向正太铁路南侧反击，北侧较为空虚的时机，以主力 4 个团，主动向盂县周围之敌出击，收复了会里、上社、下社等 6 个据点，歼敌 200 余人。9 月上旬，活动于正太铁路东段的晋察冀军区第三团和第四军分区特务营等部，再度袭击了娘子关和井陘煤矿，有力地钳制了敌人。在此期间，第一二 师对同蒲铁路忻县至太原段的破击，也使敌人难于继续从该线抽调兵力增援正太铁路。由于晋察冀军区主力在盂县地区积极行动，向正太铁路南侧反击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主力，从 9 月 5 日起，被迫陆续回调寿阳、阳泉、盂县地区，并向晋察冀军区部队反击。在此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决定于 9 月 10 日结束第一阶段作战。

我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由于战役部署周密，准备工作充分，严格保守了军事机密，部队行动迅速，充分发挥了战役的突然性，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

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

我军中心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战果，继续破击交通线，重点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我根据地内之日军据点。这一阶段我军主要进行了涞（源）灵（丘）和榆（社）辽（县）战役。

8月31日，八路军总部在致各兵团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敌之严重弱点是兵力不足，因此我们可以彻底摧毁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忻县至朔县段，使晋西北、晋东南和晋察冀三个基本根据地联成一片。9月16日，总部发出第二阶段作战命令，要求各兵团继续破坏敌之交通线，摧毁敌深入我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作战的具体部署是：第一二师以截断同蒲铁路北段交通为目的，集中主力彻底破坏同蒲铁路宁武至轩岗段；晋察冀军区以打开边区西北局面为目的，集中主力破击涞灵公路，夺取涞源、灵丘两城，并以有力一部于同蒲铁路东侧，积极配合第一二师作战；第一二九师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的，进行榆辽战役，并以有力一部破击白晋铁路北段。

涞灵战役9月22日，我晋察冀军区部队发起涞灵战役。驻涞灵地区之敌为日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司令部驻张家口）和第二十六师团（司令部驻大同）各一部共1500余人，另有伪军1000余人。晋察冀军区决定首先夺取涞源县城，同时拔除涞源县城附近各据点。为此，以5个步兵团、2个游击支队、1个骑兵营、1个特务营组成右翼队，实施涞源地区作战；以2个步兵团、1个游击支队组成左翼队，首先准备阻击灵丘、广灵、蔚县方向可能增援涞源之敌，尔后在右翼队协同下，向灵丘及其附近敌据点发动攻击；以1个步兵团为总预备队。22时，右翼队向涞源县城发起猛烈攻击。由于敌人工事坚固、防守严密，加之我军攻击力量分散和缺乏攻坚手段，经一昼夜激战，仅夺取东、西、南3个城关和两个外围据点。23日，我军停止攻城，集中兵力拔除外围据点。当晚，我第二团在第一团1个营配合下，向涞源外围日军的重要据点三甲村发起攻击。至24日晨，占领了三甲村，守敌大部被歼。与此同时，我第三团向涞源外围日军另一重要据点东团堡发动了猛烈攻击，守敌依托坚固工事顽抗。战斗从23日傍晚进行到25日黄昏，我始将守敌全部歼灭。至26日，我军共攻克涞源外围据点10余处。

28日，张家口日军3000余人乘汽车，在飞机、坦克配合下，急速向涞源地区增援，并于当日进抵涞源县城。至10月1日，我攻克的大部据点，又被日军占领。在此情况下，右翼队奉命放弃夺取涞源，向灵丘、浑源方向转移。

10月7日至9日上午，左翼队在右翼队一部配合下，于灵丘、浑源一线，先后攻克了南坡头、抢风岭、青磁窑等日军据点。9日下午，大同日军千余人增至浑源，并继续向灵丘地区进犯。同时，在易县、保定、定县一线，也发现大量敌人活动。于是，我军于10月10日结束了涞灵战役。此役共进行18天，歼敌1100余人，我军伤亡1400余人。

为策应涞灵战役，冀中军区以主力10个营于10月1日发起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至12日，战役结束。此役，我军共歼日伪军1500余人，攻克据点29处，破坏公路150公里。

榆辽战役9月23日，第一二九师发起榆辽战役。驻榆辽地区之敌为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1个大队，另有2个大队驻和顺、昔阳与榆次之间地区，与榆辽地区之敌相互呼应。敌主要守备榆辽公路，企图使这条公路经武乡向

西南伸展，与白晋铁路相连，以达其分割我太行北部地区的目的。为打破敌之企图，第一二九师以第三八五旅（附第三十二团）为右翼队，重点攻取榆辽公路东段各据点，以一部扼守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之敌，并准备协同新编第十旅相机收复辽县；以第三八六旅、决死队第一纵队两个团为左翼队，重点攻取榆辽公路西段各据点，并准备与沁（县）北支队协同，夹击可能由武乡、故城北援之敌；以新编第十旅主力组成平（定）辽（县）支队，破击平辽公路之和顺南北地段，并钳制辽县之敌；以太岳军区第十七、第五十七团组成沁北支队，破击白晋铁路沁县至分水岭段，钳制敌人从白晋铁路抽调兵力增援榆辽地区。9月23日23时，右翼队和左翼队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至30日，陆续攻克了沿壁、王景、铺上、小岭底、石匣、管头等据点和榆社县城。在我第三八六旅进攻榆社时，守敌4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并施放毒气，负隅顽抗。我军三次强攻不下，第四次改取近迫作业，实施坑道爆破，尔后发起攻击，才将守敌全歼，并缴各种炮12门、轻重机枪17挺、步枪200余支。新编第十旅进攻辽县的战斗尚未发起，和顺、武乡之敌共800余人即分别向辽县、管头增援。于是，八路军总部决定先打援敌，后攻辽县，并重申集中优势兵力坚决消灭一个大队以下的援敌。第一二九师遵命转移兵力于红崖头、官地垆地区，伏击由武乡东援之敌，对和顺南援之敌暂以一部兵力钳制之。但正当我第三八五旅向伏击地域开进时，援敌600余人已先我通过红崖头、官地垆地区向东急进。此时，已进入伏击阵地的第三八六旅和决死队第一纵队各一部，即向敌人侧后展开攻击。从30日9时至次日零时，我军向敌连续发动10次攻击，歼其大部。残敌依托有利地形顽抗，与我军形成对峙。同时，辽县西援之敌400余人，已突破我狼牙山阻击阵地。在此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决定第一二九师各部撤出战斗，并结束榆辽战役。

第一二九师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以独立第一旅破击同蒲铁路忻县至原平段，以第三五八旅破击原平至宁武段，以独立第二旅破击宁武至朔县段，另以一部兵力破击敌占公路线，袭击敌据点，钳制敌人，配合作战。我军于破击战发起前，在同蒲铁路西侧三打头马营，袭击了奇村、楼板寨、忻口等敌军据点，扫除了向同蒲铁路开进的障碍。9月22日22时，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展开了猛烈破击。至26日，同蒲铁路北段交通再度陷于中断。

我军在第二阶段作战中，重点攻击敌占的四座县城，除榆社得而复失外，其余县城均未攻克。主要原因是，敌人工事坚固，增援迅速，我军技术装备差，缺乏攻坚手段。实践证明，在我军装备处于劣势情况下，不宜对敌坚固设防的城镇采取强攻手段。此外，敌人经过我军第一阶段突然打击后，提高了警觉性，防范严密，从而增加了我军攻击的困难。

反击日军报复“扫荡”的作战

日军遭到我军连续两个阶段的攻击后，深感八路军对其威胁的严重性。为稳定局势，巩固占领区，遂调集重兵，从10月6日起，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19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反“扫荡”作战命令，要求在敌对我根据地采取空前毁灭政策的形势下，各根据地党政军民要密切配合，实行空室清野，坚决歼灭敌一至二路，并分散部分主力部队协同地方游击队、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粉碎敌之“扫荡”。于是，我军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和战斗减员，英勇地投入了反“扫荡”作战。

太行地区的反“扫荡”作战从10月6日起，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三十六师团各一部近1万人，连续“扫荡”太行区榆社、辽县、武乡间的浊漳河两岸和清漳河东西地区。敌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麻田、王家峪、砖壁、左会等地区以及涉县、偏城一带，企图歼第一二九师主力和我党政军首脑机关。为打破敌之企图，14日，第一二九师以新编第十旅一部于和辽公路之弓家沟设伏，歼敌1个运输队，击毁汽车40余辆。29日，又以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和新编第十旅主力，以及决死队第一纵队2个团将日军第三十六师团1个大队包围于武乡以东之关家垴高地。被围之敌，抢修工事，固守待援。我军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迅速突破敌之防御阵地，将敌压缩于狭小地区，展开白刃格斗。战至31日拂晓，歼敌400余人。31日下午，日军约1500人赶来增援，我军遂停止攻击，主动转移。援敌扑空后，分路西进，合击砖壁、王家峪、东田等地区。为掩护总部机关转移，第一二九师令第三八六旅阻击进犯之敌。战斗从11月3日上午进行到4日凌晨，完成了预定任务。5日，敌向白晋铁路线撤去。至14日，各路“扫荡”之敌全部撤退。

太岳地区的反“扫荡”作战 从11月17日起，日军第三十六、第四十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各一部，共约7000人，分路进犯太岳地区，重点合击沁源及其以北之郭道镇地区。太岳军区将主力组成沁东、沁西两个支队，跳跃于敌合击圈内外的沁河两岸地区，寻机灵活打击敌人。23日，敌合击扑空后，转向分散“清剿”，疯狂摧残我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仅沁源一县被害群众即达5000余人，被抢被杀牲畜近万头。23日至27日，我沁西支队第四十二、第五十九团于官滩、胡汉坪、马背地区，歼敌260余人；我沁东支队第十七、第五十七团于光凹、陈家沟、龙佛寺、吾元镇、南卫村、南里等地，予敌以重创；同时，我游击队、民兵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广泛袭击敌人。在我军民紧密配合反击下，至12月5日，敌人陆续撤出了太岳区。

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作战 从10月13日起，日军驻蒙军、第一军、第一一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临时混成第一一旅团各一部和部分伪军共万余人，分十路对平西之斋堂、三坡地区进行合击。平西地区八路军协同游击队、民兵，以内外线相结合的广泛游击战，歼敌190余人，至27日，“扫荡”之敌撤退。11月9日，日军第一一师团等部共1万余人“扫荡”北岳区，合击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21日，敌占阜平，随后转入“清剿”。我北岳地区军民以分散的游击战广泛袭击敌人，破坏交通线，迫使敌人于12月3日前，将大部分兵力撤出了北岳地区。但在阜平及王快、党城、灵山地区，仍有敌1000余人驻守，企图长期盘踞，以分割北岳区。为打破敌之企图，晋察冀军区以主力4个团，从12月13日开始，发起了阜(平)王(快)战役。战役中，我军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机动灵活地打击“扫荡”之敌，迫使其于1941年1月初全部撤退。北岳区的反“扫荡”作战，持续55天，歼敌700余人。

晋西北地区的反“扫荡”作战 从10月下旬起，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十六旅团各一部，共4000余人，“扫荡”晋西北八分区和三分区米峪镇地区。为粉碎敌之“扫荡”，晋西北军民密切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和实行空室清野；同时，集中主力一部，寻机歼灭小股敌人，或转到外线，断敌交通，袭敌据点。在我军民多种形式的打击下，敌人整日不得安宁。12月中旬，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和第二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国

等各一部，总兵力达2万余人，对晋西北实行全面大“扫荡”。12月14日，敌5000余人从太汾、汾离公路各据点出动，加强对八分区和三分区米峪镇地区的“扫荡”。同时，敌4000余人从离石、柳林出动，北犯临县地区。19日，敌6000余人从岚县、奇岚出动，“扫荡”兴县和保德以南地区。至23日，敌攻占了除保德、河曲两县以外的全部县城和大部集镇，以及黄河渡口。敌在“扫荡”中对我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致使许多村庄被烧光，许多家庭被杀绝，许多妇女被强奸后又被杀害。在兴县，敌将我男女老幼200余人关进房内烧死。晋西北全区被惨杀群众达5000余人，被抢被杀牲畜达5000余头，被烧毁的房屋、窑洞达1.9万余间。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空前浩劫。然而，晋西北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反击敌人的报复“扫荡”。从12月14日至12月27日，我军民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连续作战近100次，迫使敌人由疯狂“清剿”转为修路、建点，并在其控制的点线内，如兴县、临县、方山等地区，停止烧杀，改取怀柔政策，企图长期驻守，以割裂晋西北根据地。为打破敌之企图，第一二师分散部分主力部队，配合游击队和民兵，坚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斗争；同时，集中部分主力部队，破击交通线，袭击敌修路部队和运输队，并于敌撤退时歼灭其一部。晋西北军民在反“扫荡”中，共作战217次，歼敌2500余人，迫使日军于1941年1月24日全部撤出了晋西北根据地。

我军在反“扫荡”作战中，坚持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反击敌人报复“扫荡”的胜利。

在百团大战中，华北人民踊跃支援前线作战。仅冀南一个区，参战群众即达25万余人。各地群众除就地协助军队作战外，还组织起来随军远征。在频繁的战斗中，他们除直接参加战斗和破路，还担负运送伤员、弹药、粮食等繁重任务，为争取作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

三、战役的作用和影响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我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我华北几十万军民齐心协力、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在百团大战中，我军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降47人，伪军反正1845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桥梁和隧道260多处，缴各种炮53门、各种枪5800余支（挺）。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决死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董天知光荣牺牲。

百团大战严重地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使正太铁路停运一个多月，两次切断同蒲铁路北段，平汉、津浦、北宁等铁路和部分公路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拔除了敌人深入我根据地内的部分据点，歼灭了大量日伪军，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彻底破坏了敌重点掠夺的井陘煤矿，钳制了敌人大量的兵力，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望，锻炼了部队，并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

百团大战的胜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问题，主要是：战役的规模过大，

持续的时间太长，特别是第二阶段采取与我军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因而过多地消耗了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和根据地的人力物力，给后来坚持华北抗战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而且采取强攻日军有坚固设防的城镇据点的打法，也不符合当时以游击成为主的作战方针。

第六节 新四军东进北上，发展 华中抗日游击战争

日军侵占武汉后，以 7 个师团又 1 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长江中游及武汉、南昌周围地区，主要对国民党军作战。在长江下游的苏浙皖地区，有日军 4 个师团又 3 个独立混成旅团，主要部署于京、沪、杭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约 10 万人位于苏北敌后，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进攻新四军，鱼肉乡里，为人民所痛恨。上述形势，对于我军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是有利的。为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周恩来于 1939 年 3 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三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依据这些原则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同年 4 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也是在战略上连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6 月，毛泽东又指示东南局：必须大大发展华中的党与游击战争的工作，在复杂的环境中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为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11 月，中共中央再次指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不到海边，决不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而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发展。上述指示，为新四军发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明确了方向。

一、新四军向淞沪、扬中、皖东、 豫皖苏边及皖东北发展

第一、 第二支队巩固茅山根据地和实行东进北上

1938 年底，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完成在苏南的展开，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39 年初，日军在茅山根据地周围增设据点，企图对我根据地实行封锁，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为打破敌之企图，新四军活动在金坛、芜湖周围地区的第一、第二支队，主动向敌出击，进行了一系列战斗。1 月 6 日，日军 100 余人在“扫荡”宣城地区以后向北撤退，于当晚在芜湖以东的水阳镇宿营，7 日晨，我第一支队第三、第四团在水阳镇以东设伏，伏击由水阳镇向东撤退的日军，经 3 小时战斗，歼敌 30 余人，余敌逃窜。23 日，我第二支队第三团对芜湖敌机场外围的伪军据点官陡门发起攻击，毙伤伪军 60 余人，俘 50 余人，并将敌据点捣毁。2 月 8 日，我第一支队以第二团对溧（水）武（进）公路上日伪军之重要据点东湾发起攻击，经 1 小时战斗，歼日伪军 110 余人，缴枪 20 余支和一批弹药。接着，该团又袭击了延陵日伪军据点，歼日伪军 80 余人。新四军在金坛和芜湖周围地区作战的胜利，对巩固茅山根据地和依托茅山根据地向北向东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1939 年 2 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先以第二团（欠 1 个营），在丹阳游击纵队配合下，向北挺进扬中，将盘踞该地的伪军 1 个团大部歼灭，并以一部北

上进至扬州以东之大桥地区，同时对驻泰州地区的国民党军苏鲁皖边游击军李长江、李明扬部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统战关系。至4月，我军控制了扬中和大桥一带沿江地区。

5月，第一支队又以第六团向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地区东进。途中与无锡、江阴游击队合编，沿用当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开展抗日游击战争。5月下旬，“江抗”一部于无锡东北之黄土塘与敌遭遇，歼敌100余人，取得东进途中第一次战斗胜利。接着，夜袭苏州西北之浒墅关火车站，歼日军50余人和伪军1个中队。尔后，直插上海市郊并夜袭虹桥机场，击毁敌机4架，使京沪线上的日军大为震惊。此后“江抗”与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的常熟、嘉定、青浦等地的抗日游击队相配合，共同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山）游击根据地。同年夏，第一、第二支队又派出干部和部队开辟了太（湖）滬（湖）地区。第一、第二支队东进北上的作战行动，推动了苏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1939年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奉命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同时将“江抗”主力与丹阳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北渡长江，在扬州、泰州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另以第四团主力与“挺纵”一部合编为苏皖支队，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发展。

第三支队保卫皖南抗日阵地

1938年底至1939年初，第三支队由南陵青弋江地区调至铜陵、繁昌沿江地区；同时将第一支队第一团、第二支队第三团由苏南调回皖南，归军部直接指挥。此时，日军为确保长江交通，对皖南地区进行频繁“扫荡”，铜、繁一带是日军“扫荡”的重点。一二月间，新四军第三支队与敌两次争夺繁昌县城，两失两克。5月，日伪军1000余人再攻繁昌，又被我击退。11月和12月，日伪军又各以3000余人两次进攻繁昌，亦均未得逞。我军取得5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之疯狂气焰。至年底，第三支队和第一支队第一团、第二支队第三团在铜陵、繁昌和泾县地区共作战200余次，胜利地保卫了皖南抗日阵地。

1940年4月下旬，日军为巩固江防，确保长江交通运输，调集第十五、第十七、第一一六等师团各一部共1万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对皖南进行大规模“扫荡”。26日，驻芜湖之敌5000余人，分两路向我进犯。其中一路20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向第一团的父子岭阵地猛攻，该团与敌激成8小时，毙伤敌370余人，将敌击退；另一路日军3000余人向南（陵）青（阳）公路上何家湾第三团防地进攻，经9小时激战，毙伤敌300余人，迫使日军撤退。10月上旬，日军以第十五、第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1万余人，再次“扫荡”皖南。其中一路50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从铜陵、繁昌、南陵出犯，经戴家会等地直扑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新四军第三支队及第一、第三团，在叶挺军长指挥下，于云岭外围阵地与敌展开10余次激战，毙伤日军数百人，保卫了云岭。日军在云岭遭到打击后，东渡青弋江，进占了国民党军驻守的泾县。我军渡江英勇反击侵占泾县之日军，并收复了泾县城。

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

为贯彻执行东进方针，开展江北的统战工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于1938年11月派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抵江北无为地区，随即与国民党豫鄂皖边游击总司令廖磊建立了统战关系，并将庐江、无为地区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抗战任务。同时，以第四支队第八团挺进淮南铁路以东，与当地游击队和东北军挺进团取得联系，共同在皖东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初，大别山的国民党桂系军队积极向皖东伸展，企图把我第四支队挤出皖东地区。在此形势下，1939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派员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的新四军，并由东南局和江南新四军抽调一批干部到江北。5月，叶挺军长根据上述指示，亲赴庐江东汤池，组织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了中共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书记。接着，整编了部队，由徐海东兼任第四支队司令员，辖第七、第九、第十四团；另以第八团为基础，成立新四军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辖第八、第十、第十五团。此后，第四、第五支队分别在津浦路西和路东作战。经过两个多月，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的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1939年12月中旬，敌从南京、明光（今嘉山县）、蚌埠等地出动2000余人“扫荡”津浦路西藕塘以南之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我第四支队与敌激战3天，歼敌160余人，敌被迫撤退。我军乘胜收复周家岗等地。这次胜利，对巩固和开展皖东敌后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游击支队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游击支队在初步打开豫东局面后，于1939年初，由杞县、太康、淮阳、鹿邑地区向东挺进，开辟商丘、亳县、永城地区。1月，游击支队在亳县以北之芦家庙歼伪军300余人。2月在杞县瓦岗，我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击退敌2000余人的进攻。5月，主力进军开辟淮上地区（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铁路以西，宿县至蒙城公路以东地区）。9月初，主力回师涡阳新兴集整训。11月，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此，全支队发展到9个团1.2万余人，并打开了豫皖苏边的抗战局面，抗日根据地也初具规模。

1939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以两个大队由微山湖西地区南下苏皖边区，与萧县地方武装合编。6月初，该部在灵璧以北的张家集击退日军1700余人的进攻，歼敌300余人。尔后，苏鲁豫支队除留第一大队坚持现地斗争外，主力西移津浦铁路西。此时，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一部也初步开辟了邳（县）睢（宁）铜（山）地区。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的南下，为打开皖东北敌后抗战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1939年7月，中共苏皖省委书记张爱萍率部分干部进入皖东北，与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取得联系。8月成立了苏皖区党委。至此，我党我军在皖东北取得了有利阵地。

二、贯彻向东发展的方针，开辟苏北，粉碎日军“扫荡”和顽军进攻

为加速发展华中，1939年11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豫皖苏边抵达合肥东北大桥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2月19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并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提出：皖东在武汉失守前后完全有可能建立相当完满的根据地，但现在时机已失。目前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而大有发展希望的地区是江苏北部，应集中最大力量发展苏北。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3次中原局会议，讨论了华中的局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意图和华中敌、友、我各方面情况，深入地研究了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问题，认为向西发展受国民党军第一、第五战区限制，且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苏北地区已成敌后，国民党军仅有韩德勤部，且内部矛盾重重，并为人民所痛恨。同时，苏北地区靠近山东，可与八路军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利于发展。据此，中原局会议确定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从而初步解决了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问题。在此期间，刘少奇还向中共中央提出八路军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苏北的建议。194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刘少奇关于全力发展苏北的意见。13日，刘少奇又向中共中央和项英提出进军苏北的具体建议，指出：目前时局紧张，在半年内外将发生变化，我需迅速发展自己，不然时机稍纵即逝。中原局和刘少奇对时局的分析和行动部署，完全符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但项英对此却不同意。1940年1月14日，项英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华中南部各省在政治与群众基础上均有利于我，在战略上发展北部必须有南部配合，因此中原局和刘少奇要求皖南部队北渡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应按战略要求努力发展与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为说服项英接受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月19日致电项英，指出：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来到新四军时又取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目前最好发展的地区，而大江以南则受友军的限制。在蒋介石尚未公开投降和继续抗日反共的形势下，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应在现地力求发展。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各部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抓紧时机发展皖东，作为发展苏北的前进阵地，并取得很大成绩，至1940年3月，第四、第五支队已由原来5000余人发展到1万余人。

粉碎顽军进攻和日军“扫荡”， 发展与巩固皖东根据地

(参见附图34)

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在皖东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1940年3月，国民党桂系军队李品仙部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以其第一三八、第一七一师越过淮南铁路向皖东进逼，其先头一部5000余人分别围攻合肥以北青龙厂我第四支队和定远以南大桥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另以两个保安团向无为以西开城桥地区我江北游击纵队进攻。苏北地区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也积极配合，准备向津浦铁路东我第五支队进攻。在此紧急时刻，毛泽东、王稼祥等于3月29日对反顽斗争的策略问题作了指示。指出：华中武装磨擦，

我军应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冲突，在此线以东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并首先反击当地的顽固派，对桂系军队力求缓和；对韩德勤部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当其进攻我军时，应坚决反击之；陈毅部应立即向苏北发展。根据上述指示，中原局一方面令江北指挥部作好应战准备；一方面与国民党桂系李品仙部谈判，提议以淮南铁路为界，分区抗日，我不向西，彼不向东。但李品仙部对我之提议置之不理，继续进逼。在此情况下，中原局决定集中主力于津浦铁路西，首先反击当地顽固派武装，制止桂系顽军东进，巩固路西阵地；尔后挥戈东向，击退津浦铁路东之韩顽的进攻。

3月初，驻全椒顽军第十游击纵队进抵距我江北指挥部驻地大桥镇15公里之复兴集；驻定远顽军第十二游击纵队进至距我江北指挥部两公里之王回岗（今四清）；桂系顽军第一三八师先头一部进至八斗岭、王子城一线，向我江北指挥部发动进攻。江北指挥部集中第四、第五支队及苏皖支队主力，于3月12日向进攻大桥地区之顽军发起反击。在给进犯的顽军以有力打击后，主动停战，再度提议和谈。正当我主力在路西反击桂系顽军之际，韩德勤部集中8个多团的兵力，于3月19日围攻我路东第五支队驻地半塔集地区。当时我第五支队主力已去路西参加反顽作战，半塔集仅有留守机关及部队约千人，形势十分危急。刘少奇当即令路东部队固守待援；令挺进纵队主力西援；令江北指挥部率第五支队、苏皖支队立即东援。从19日至26日，我驻守半塔集的部队与顽军激战8昼夜，打退了顽军10余次进攻，终于守住了阵地。27日，我各路援军陆续赶到路东，并于29日在王店集、莲塘地区将顽军击溃。大桥与半塔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粉碎了桂顽、韩顽东西夹击我军的阴谋，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6月中旬，我第四、第五支队在大桥镇东南的古城集再次击退了顽军第十游击纵队的进攻。此后，第四、第五支队深入发动群众，开展皖东根据地的建设工作。8月，第五支队与八路军第五纵队共同开辟了淮（阴）宝（应）区，使皖东与淮海两地区打通了联系。下旬，日军抽调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及伪军各一部共万余人“扫荡”皖东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第四支队于津浦铁路西防止桂军袭扰，以第十四团、独立第一、第二团及干部学校于路东以游击战袭击日伪军，以第五支队的第七、第八团和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五团在外线积极策应。从9月5日至17日，我军作战60余次，歼日伪军600余人，日伪军被迫撤退。经过反顽斗争和粉碎日伪军“扫荡”，进一步巩固了皖东根据地

粉碎日伪军对豫皖苏边抗日 根据地的“扫荡”

刘少奇率中原局南下苏皖途中，对新四军第六支队和豫皖苏边区的工作作了指示，指出：除创造永（城）夏（邑）萧（县）宿（县）等四县根据地和睢（县）杞（县）太（康）鹿（邑）亳（县）商（丘）等小块根据地，以便尔后连成一片外，还应巩固扩大部队，加强政权建设。根据上述指示，第六支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永、夏、萧、宿、亳等县政权机构；同时派出4个主力团向北展开，开辟商（丘）亳（县）宁（陵）夏（邑）和碭（山）南游击区。1940年3月中旬，日伪军2000余人“扫荡”永（城）萧（县）地区，被我粉碎。4月1日，日伪军3000余人又向永城东北进行报复“扫荡”。第六支队第一总队英勇抗击，挫败了日伪军的进攻。第六支队在连续打破敌

伪军的两次“扫荡”后，即深入发动群众和组织地方武装，继续巩固与扩大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1940年1月，顽军李品仙部千余人进入皖东北的泗县地区，企图消灭和驱逐在该地的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一团。2月4日，当顽军展开进攻时，该团在大柏圩子将其击退。至此，皖东北为我军完全控制。中共党组织所掌握的这一地区的武装也统一改编为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

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上， 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南下，协 同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进攻江北新四军屡遭失败后，继续坚持其反动政策，打击和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一再致电项英，强令新四军将江北部队调到江南，并声称：“否则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论罪”。与此同时，顾祝同还调兵遣将，以两个师、1个旅又两个团的兵力，于南陵、繁昌、铜陵、大通、贵池、青阳一线，包围监视新四军军部；另以4个团的兵力封锁长江，防我北渡。在江北，桂系顽军以两个师又1个旅构成两道封锁线，切断新四军的江南江北联系。上述部署完成后，顾祝同提出与新四军谈判，妄图以实力相威胁，强迫新四军接受其无理要求。在此严重局势下，

4月14日，项英向中共中央提出将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意见。16日，中央军委复电项英，指出：江北部队不应南调，应配合八路军向苏北发展。2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项英，指出：蒋、顾阴谋把新四军全部集中到苏南敌后狭小地区，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联系，尔后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同时还强调指出：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败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围在敌后，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因此，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指叶飞领导的挺进纵队第六团、张道庸领导的苏皖支队第四团）南调。叶、张两团及苏北部队均暂归中原局指挥，调动应依照中央的电令。至于江南部队如何部署，可视情况自行决定。为使项英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于1940年5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发给东南局的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强调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同时明确指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必须实行针锋相对的政策，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党和军队；才能争取团结中间派。指示要求东南局将此指示传达到党和军队的全体干部坚决执行。

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南下豫皖苏边

六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由要江北新四军统统撤到江南，一变而要黄河以南新四军八路军统统撤到黄河以北，企图将我军全部挤出华中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除彻底揭露顽固派的阴谋外，令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迅速南下，协同新四军发展与巩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总部令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5个团1.2万余人，于6月下旬抵达豫皖苏边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根据中央军委6月27日的指示，上述两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随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也越过陇海铁路抵达泗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苏皖斗争形势，刘少奇提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力量发展苏北的具体方针。为实现此方针，由黄克诚率一部到皖东北，协助巩固与扩大根据地，作好东进苏北的准备。至8月，先后以第三四四旅（欠六八七团）与第六支队（欠第四总队）编成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下辖第四、第五、第六旅，共9个团1.7万余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以新编第二旅、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编成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共9个团2万余人，执行东进淮海的任务。整编后，第四纵队以一部坚持豫皖苏边区，以一部进军怀远、凤台，控制淮河下游地区；9月，进入淮上，建立淮上办事处及怀（远）蒙（城）、怀凤（台）、宿（县）蒙、宿怀等4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并以第五、第六旅分驻涡阳南北地区进行整训，协同当地中共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根据地。第五纵队主力则立即东进。其第一支队于8月初渡过运河，进占沭阳、淮阴地区；9月，在高沟、杨口地区粉碎日伪军两次“扫荡”。随后，第二支队第四团及第三支队也相继进入淮海地区。不久，建立了沭阳、泗阳、宿迁、淮阴、涟水、东海等县抗日民主政权，地方武装亦发展到4000余人，初步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

与开辟淮海地区的同时，第五纵队的第二支队主力，坚持皖东北斗争，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淮（安）宝（应）地区，沟通与皖东地区的联系。尔后，又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粉碎了日军对淮南津浦路东的“扫荡”，攻克淮河北岸小柳巷伪军据点，并乘胜渡河南进，直逼津浦路上的明光车站。随后，该支队又在淮河北岸双沟一带击退敌千余人的进攻，坚持了皖东北地区，保持了与皖东区、淮海区的联系。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渡江北上。黄桥战役

（参见附图 35、36）

1940年5月，陈毅根据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立即调集主力，部署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6月，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向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开进，在句容东南之西塔山，击退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冷欣所部两个团的阻拦，为苏南新四军渡江赢得了时间，并保卫了苏南阵地。

在江南指挥部准备渡江北上时，江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盘踞于苏北泰

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两部，在韩德勤的挑拨、拉拢与威胁下，由中立转向军事反共。5月中旬，新四军挺进纵队在西援半塔集战斗后返回江都县大桥西北之郭村休整。这时韩德勤借口挺进纵队侵占李明扬、李长江的防地，煽动“二李”出兵围攻我军。李明扬、李长江在韩德勤的挑唆下，遂调集13个团的兵力，于6月28日向郭村发起进攻。在此情况下，挺进纵队（欠第四团）奋起自卫。同时，中共中央中原局一面呼吁“二李”停止进攻，一面令苏皖支队及江南主力3个团迅即驰援，对李军实施反击，迫使“二李”退守泰州城。7月3日，陈毅赶到郭村，与挺进纵队领导人共同分析了苏北斗争形势，认为：“二李”进攻郭村，是韩德勤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挑起新四军与“二李”的矛盾，从中渔利；如我军将李部歼灭，必然会造成苏北各派势力联合反共，对发展苏北敌后抗战不利。因此，我应争取“二李”中立，共同抗战，孤立打击最顽固的反共分子韩德勤。根据上述分析，陈毅决定我军乘胜攻取塘头，直逼泰州城下，但不攻占泰州，尔后呼吁“二李”与我团结抗日，重修旧好。4日，我军按预定计划出击，一举攻占泰州以西的塘头，随即向“二李”提出：只要李军不再攻击新四军，新四军也停止反击李军，并且释放全部俘虏、归还枪械；如果李军不阻碍我军东进黄桥地区，我军可将郭村、塘头、江都、宜陵等三十里防地让给李军。“二李”在兵败城危和我军一再争取下，接受了我军所提的条件，谈判议和。郭村战斗的胜利，为新四军东进黄桥，打开苏北敌后抗战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开创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渡江北上后，于7月奉命改称苏北指挥部，并将先期北上的部队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合编，成立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辖9个团7000余人。

黄桥战役 早在渡江北上前，江南指挥部就对进入苏北后以何处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议论过三个方案：一是扼守扬州、泰州地区，二是北进兴化，三是东进黄桥。最后认为，扬州、泰州是中间派李明扬的腹地，我军进入易引起磨擦，于抗战不利；兴化是顽固派韩德勤的指挥中心，韩必不肯让我军向此发展；而最有利的是东进黄桥。黄桥位于泰州东南，处于泰州、镇江、常州、无锡、南通之间，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便于向南通、如皋、海安、启东发展和控制长江通道，并可与江南新四军相呼应，因而决定东进黄桥。7月25日至28日，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由泰州以西直下黄桥，29日，击溃顽军保安第四旅的两个团和苏北游击第八军陈太运各一部后，进占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随后，即转兵南向，积极打击日伪军，连克靖江东北的孤山、西来镇等日伪军据点，并粉碎了敌人两次报复“扫荡”。正当我军展开对敌作战时，韩德勤却调集重兵准备南犯，企图趁我军立足未稳予以消灭。

面对韩顽重兵来犯的局势，苏北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决定采取严守自卫立场，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方针，以表明我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争取广大群众的拥护和中间阶层的同情。于是将主力集中于黄桥及其以东地区休整，同时派出干部在泰州、靖江、如皋等县开展群众工作，并积极做好反击韩顽来犯的准备。

9月3日，韩军分两路南犯；以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等部为右路军，集结于姜堰地区；以第八十九军的第一一七师（欠第一旅）、独立第六旅（欠第一营）、保安第一旅（欠第二营）为左路军，集结于曲塘、吴家集、海安

地区。9月6日，其左路军一部在营溪以南向我军发动试探性进攻，我军被迫反击，予顽军以重创，余顽回窜姜堰、海安一线。为争取保一旅中立，战后，我全部释放了被俘的保一旅副旅长以下1500余人。

韩顽试探性进攻失败后，即令其驻姜堰的保安第九旅严密封锁我军粮食来源，并强令李明扬、陈太运部向我步步进逼，企图将我压缩在沿江狭小地区，尔后勾结伪军对我进行夹击。为打破顽军这一企图，苏北指挥部决心以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全力攻取姜堰，并以第一纵队担任伏击海安方向来援之顽军。9月13日，经一天激战，我攻占姜堰，打开了粮食来源。此时，我军再次呼吁韩顽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韩顽却提出以我军退出姜堰为条件实现停战。韩德勤以为，我军决不会退出姜堰，若不退出，彼即可以此为借口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为争取停战，团结抗日，我当即决定同意韩德勤提出的条件，于9月30日撤出姜堰，交由李明扬、陈太运部接防。我军的这一行动，获得李、陈的完全赞同，而韩德勤却一无所获，从而加深了韩、李等之间的矛盾，并且得到了苏北人民和各界人士的拥护和欢迎。这时，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已抵达涟水以北地区，新四军第五支队已进至宝应湖、大运河西岸，从而威胁了韩德勤部的侧后。

韩德勤得知我将姜堰交李、陈接防后，极为恼恨，自恃兵多粮足，决心倾其主力，不惜孤注一掷，与我决战。其企图是：先以优势兵力，聚歼黄桥地区我新四军，尔后回师北上与八路军较量。为此，决定以其嫡系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分别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从北而、东面进攻；以李明扬、李长江及陈太运等部组成右路军，以保安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旅组成左路军，分别掩护其主力中路军之两翼，从西面、南面助攻黄桥。

苏北指挥部遵照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在战役指导上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歼韩顽主力于黄桥地区，以解决苏北问题的指示，决心以第三纵队坚守黄桥，以第一、第二纵队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的顾高庄、横巷桥一带，待机出击，歼灭来犯顽军于运动中。

10月1日，韩军齐头并进，我第一纵队一部担任正面钳击，节节抵抗，诱其深入，掩护主力集结。3日，顽军进抵黄桥外围。4日，顽第三十三师经分界向黄桥东北进攻；第一一七师在野屋基、何家塘之线进攻黄桥；独立第六旅经高桥从北面进攻黄桥。在顽军对黄桥发起进攻后，我第三纵队在正面坚决阻击，第一、第二纵队埋伏于高桥至黄桥间伺机出击。下午，韩军主力独立第六旅由高桥出动，攻击黄桥。当其先头接近黄桥，后尾脱离高桥时，我第一纵队从顽军独立第六旅行军纵队的两侧突然出击，将其切成数段，并分割包围，经3小时激战，全歼该旅，尔后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此同时，第二纵队经八字桥直插分界，切断进攻黄桥的顽军之退路，这时第三纵队也由黄桥正面出击。至此，我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将顽军第三十三师及第八十九军军部包围于黄桥以北地区。接着，我以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夹击顽军第三十三师，歼其主力于小二房，尔后围攻第八十九军军部和第三四九旅。战至6日晨，顽军第八十九军军部及第三四九旅大部被歼。与此同时，增援第三十三师的顽军预备队在营溪遭我阻击，彼歼大半，残部向海安退却。我军乘胜追击，占领海安。韩德勤见大势已去，遂率残部向兴化逃窜。当我与韩军主力在黄桥激战时，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等部见韩军失利不敢妄动，使韩顽主力的右翼失去掩护。在黄桥作战期间，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东渡盐河，先后击溃顽军保安第二旅、第八旅各一部，进占阜宁、东沟、益

林，直下盐城、凤谷村等地，于10月14日进抵东台县的白驹镇，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部队胜利会师。至此，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黄桥反顽作战的胜利，对开辟苏北，发展与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黄桥战役后，中共中央指示在苏北应继续团结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和扩大军队。据此，苏北指挥部进一步争取了李明扬等与我合作，并于10月底共同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共商团结抗日大计。接着，又在海安召开了苏北临时参议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成立了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县区政权，组建地方武装6000余人，苏北指挥部主力部队也扩大到1.2万余人。11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陈毅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在江北的新四军发展苏北的同时，坚持苏南斗争的新四军又另行成立了江南指挥部，罗忠毅、廖海涛分任正副指挥，并以留在苏南的第四团两个营为基础新建4个团，转战于镇江、句容、丹阳地区，在日伪顽军的夹击下艰苦奋斗，坚持了茅山抗日根据地。

从武汉失守至1940年底，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领导下，新四军江南和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坚决贯彻东进北上、发展华中的方针，并正确地选择了发展方向，从而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此期间，华中我军对日伪军作战24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1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4万余支，轻重机枪540余挺，各种炮30余门，建立了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新四军也由2万余人发展到9万余人，初步完成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赋予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第七节 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豫鄂边区（1941年后称鄂豫边区）地处武汉周围、长江两岸，包括豫南、鄂中、鄂东、鄂南等广大地区。这里，水陆交通纵横，山岳起伏，湖泊密布，是中原的战略要地。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其周围28个县也相继被日军占领。保卫武汉的国民党40万军队，在日军的攻击下，分别撤向鄂东北、鄂西北、鄂东南山区。在沦陷区，日军主要控制各城镇与水陆交通线，广大农村则被打着各种旗号的游杂武装和土匪所盘踞。他们拥兵自重，各霸一方，为非作歹，残害人民。时隔不久，国民党也组织了游击队，返回武汉周围地区，打着抗日的旗帜，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就是在上述复杂环境中，又没有主力部队作骨干的情况下发动的。并且，从发动伊始，就与其他战略区相隔绝，独立自主地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然而，豫鄂边区的大部分，曾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皖等老根据地，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较深。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后，部分地区仍有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继续坚持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派董必武等到武汉，以后又陆续派干部来豫鄂两省开展抗日活动。1937年9月和1938年6月，中共豫鄂两省委先后成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豫鄂边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国民党军内的爱国官兵抗日热情高涨。这些，又是发动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

一、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

1938年5月，在徐州沦陷、日军积极准备进攻武汉的紧急形势下，中共中央指示长江局：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铁路以西、平汉（铁）路以东、浦（口）信（阳）公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中心任务是武装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要求河南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要求长江局动员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中央还明确指出：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是不应顾惜的。然而，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拒不执行中央的指示，他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张正规战，依赖国民党，继续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武汉三镇非武装的群众斗争上，根本放弃了在武汉沦陷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

武汉沦陷前后，豫鄂边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同仇敌忾，工人、农民和爱国青年，纷纷要求拿起武器，抵抗日本侵略军。而且日军攻占武汉后，敌后一度是空虚的，国民党军撤退时又遗弃了大量可资利用的武器装备。这些，都是发动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然而，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下，却错过了发动游击战争的这一大好时机。许多党员和干部，对王明的错误行径极为不满，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抵制。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等，就是在此情况下，派遣部分党员干部深入武汉外围农村，恢

复与建立党的组织，发动与武装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长期坚持豫鄂边区斗争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游击队，也在党的领导下，转入抗日武装斗争。

豫南，是抗日游击战争发动较早的一个地区。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于同年3月开赴皖西，并继续东进抗日。第八团东进后，于确山县竹沟镇设立了留守处。中共河南省委以竹沟为依托，在豫南各地发动与武装群众，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开办教导队与训练班，为开展游击战争积极创造条件。中共中央为加强豫鄂边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还陆续抽调干部经竹沟转赴各地工作。竹沟已成为豫鄂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基地和后方，起着重要的作用。

1938年9月，沿大别山北麓进攻武汉的日军侵入豫南，逼近信阳。大敌当前，中共豫南特委在信阳、罗山、泌阳等地，加紧了武装抗日的发动工作。同时，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与我合作抗日。在信阳谭家河组织了农民抗日自卫队，开办了谭家河农民游击战训练班和柳林工人游击战训练班。10月中旬，日军攻占信阳，国民党军后撤。信阳国民党进步县长李德纯，响应我党合作抗日的号召，率军警200余人进入游击区，与我党领导的几支抗日武装合并，共同组建了信阳挺进队，下辖3个中队，共300余人。挺进队成立后，经过整顿与扩充，成为豫南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并以豫鄂边之四望山为中心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在鄂中，从1937年底至1938年6月，陆续建立了中共鄂中特别支部，应城、京山、天门区委，沔阳县工委、鄂中特委和湖北省委。同时，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底，经董必武与鄂中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协商，决定以湖北省合作委员会名义，于应城之汤池举办由陶铸主持的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培养了200多名干部，为开展鄂中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然而，时隔不久，国民党当局竟诬蔑我党要建立农村“苏维埃”，遂片面撕毁协议，并勒令汤池训练班停办。武汉沦陷后，鄂中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加紧了武装抗日的发动工作。1938年底，汉阳游击队已发展到300余人，活动于金牛、玉贤、三合等5个乡。在孝感成立了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在应城成立了抗敌自卫总队（简称“应抗”）。同时，加强了与友党友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在鄂东，1938年3月，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于黄安（今红安）七里坪设立了留守处。6月，中共鄂东特委于七里坪成立。在鄂东特委领导下，黄冈、黄梅、罗田、黄陂、蕲春、广济、英山、麻城等地党的组织也陆续恢复与建立起来，并着手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7月，长江沿岸战事紧张，中共黄冈中心县委讨论和决定了武装抗日的行动计划。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带头参加游击队，积极筹集枪支、弹药、军费和粮食。10月下旬，日军攻占武汉，国民党军撤退。黄冈中心县委发动群众收拣了国民党军撤退时遗弃的许多枪支、弹药，武装自己，打击敌人。黄冈中心县委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开始称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不久改称独立游击第五大队。至11月，这支游击队已发展到近200人，拥有500余支枪。12月，鄂东特委警卫排和黄陂梅店自卫队，以及由竹沟前来护送干部的1个排合编，成立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

在鄂南，1938年8月，中共鄂南特委成立。随后，从武昌至幕阜山之间的大多数县的党组织也陆续建立起来，并开始了游击战争的发动工作。至12

月，阳新、崇阳、咸宁、武昌等县分别建立了200至400人的游击队。1939年4月，鄂南人民抗日总队已发展到1500余人。但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下，鄂南党组织没有把游击队置于党的真正领导之下，有的沿用国民党军的番号，有的内部组织严重不纯。因此，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引诱和内部叛徒的破坏下，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吞并和围攻，游击队迅速瓦解了。同时，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一些领导人惨遭杀害。从而，给鄂南游击战争的开展，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二、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游击队的统一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1939年1月，刘少奇从延安到达中原局所在地竹沟。中原局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撤销河南、湖北两省委，成立豫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等区党委；同时，规定党在沦陷区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发动与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鄂中区党委根据中原局的指示，立即确定了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政权、扩大党的组织等三项任务，并将“应抗”部队整编为3个支队，由陶铸率领积极打击敌人。4月，又在随县三合店、鹿头镇地区组建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9月，中原局在创建根据地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鄂东、豫南、鄂中敌占区域是今天党开展华中游击战争最重要地区之一，创立坚强的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打成一片，这是今天鄂豫皖、鄂豫边区以及鄂中三个区党委最主要任务。”

为推动豫鄂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建立，中原局于1939年1月和4月，先后派李先念、陈少敏（女）各率一支武装和一批干部，向豫鄂边区敌后挺进，联络各地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关于开展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和部署。

李先念率领的由第八团留守处两个中队和60余名干部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1939年1月从竹沟出发后，首先以豫鄂边之四望山为立足点，往返活动于信（阳）罗（山）边地区，先后会合了中共豫南特委、平汉铁路东地下党组织和信阳挺进队、铁道破坏队等抗日武装。同年2月，独立游击大队到达应山罗家庙与中共应山县委会合时，适逢日伪军100余人向该地进犯，国民党守军1个营不战而退。我独立游击大队协同当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奋勇抗击，毙伤日伪军20余人，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初战胜利，鼓舞了当地人民，扩大了我军影响。尔后，独立游击大队又返回信罗边地区，并于3月间在九里关与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会合。在中原局的正确领导和独立游击大队的协助下，豫南的抗日武装发展迅速。至1939年5月，信阳挺进队已扩大为3个支队，信罗边中心区党委和确山县委也分别组建了200余人的游击队。

1939年4月，李先念率独立游击大队向鄂中挺进。5月，进至孝感地区的青山口，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会合。与此同时，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为打开黄陂、孝感地区局面，也从札山（今大悟）进至青山口以南，并与独立

1939年9月18日，中原局《关于创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决定》。

游击第五大队 1 个中队协同，于李新湾、吴家湾地区，歼灭了伪军第八军司令部和 1 个营又 2 个连，俘伪旅长以下 300 余人，缴枪 500 余支。在我军威慑下，其余伪军大部溃散。这次战斗，我军以少数兵力奇袭大股伪军并取得重大胜利，初步打开了黄陂、孝感地区抗战局面，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声望。

1939 年 6 月上旬，我数路部队会合于安陆赵家棚地区。其中有李先念率领的独立游击大队，陈少敏率领的信阳挺进队的 2 个中队和竹沟留守处的部分干部，以及应山县的 2 个抗日中队和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的 4 个中队。为统一指挥，经过协商，将这些部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下辖 3 个大队。挺进团成立后，2 个大队活动于安陆、云梦、孝感地区，1 个大队在李先念、陈少敏率领下，开进京山地区与鄂中区党委会合。6 月中旬，鄂中区党委在代理书记陈少敏主持下，于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原局关于在最短时期内创立一支 5000 人以上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队伍，以应付各种事变，确立我党我军在鄂中的地位的指导，决定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公开树起新四军的旗帜，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后由陶铸代理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队和挺进团。以后，又陆续组建了第四、第五两个团队。从此，豫鄂边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始有了主力游击兵团，并在统一的战略部署和指挥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

1939 年 7 月上旬，在京山、应城、安陆、云梦、孝感地区活动的第一团队和挺进团，于孝感之杨家河、沙子岗地区，歼灭伪军 200 余人，缴枪 100 余支。7 月中旬，在我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安陆伪军 200 余人反正。8 月上旬，日军第三师团一部约 1000 人，“扫荡”安陆赵家棚地区。我挺进团一部与敌周旋 3 昼夜，毙伤其数十人，击退了敌之进攻。同时，活动于黄陂、孝感地区的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在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一个中队配合下，向盘踞东阳岗以北地区的伪军第二十五师出击，俘伪旅长以下 200 余人，缴炮 3 门、机枪 3 挺、掷弹筒 6 具。在我军威慑下，另一部伪军溃散。8 月，日军第三师团一部 400 余人，“扫荡”豫南朱堂店地区我军。活动于该地的我第二团队，以 1 个大队从正面阻击敌人，以 1 个中队向敌侧翼出击，以 1 个大队从背后打击敌人。经一整天战斗，我军毙伤其 80 余人，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尔后，我军乘胜袭击信罗公路上一伪军据点，迫使伪军 1 个中队反正。10 月上旬，日军 300 余人，从京山罗店、贾店出动，袭击新街我军。活动于该地的我第一团队第一、第三大队，在第二团队第二大队支援下，将敌击退，毙其 20 余人，缴枪 10 余支。12 月上旬，日军第三师团和伪军各一部共 1500 余人，分五路向京山马家冲进攻，企图消灭我军首脑机关。我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 200 余人，在支队首长亲自指挥下，与敌周旋一整天，毙伤其 70 余人，于夜间胜利突围。

我军的发展壮大和对敌斗争的胜利开展，振奋了民心，鼓舞了士气，扩大了我军活动区域。然而，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1939 年 9 月，国民党军在确山竹沟地区，加紧了反共磨擦活动，严重威胁我后方领导机关的安全。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刘少奇于 10 月率中原局机关进入苏皖敌后，继续领导包括豫鄂边区在内的华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同时，豫鄂边区党组织的负责人朱理治，率干部、部队 600 余人，也转移到豫鄂边区敌后。

1939 年 11 月，朱理治、陈少敏等根据中原局的指示，于四望山召集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的负责人会议，讨论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和指

挥问题。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是撤销豫鄂边、鄂豫皖、鄂中3个区党委，成立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党委，由郑位三任书记，陈少敏任副书记（郑位三因病未到职，由陈少敏代理书记），李先念为军事部长，陶铸为统战部长，委员共11人；二是由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边区各地的党组织和武装，并将边区各地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1940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由朱理治任书记（3月，朱理治赴延安，由任质斌任书记），统一领导边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同时，将豫鄂挺进支队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下辖6个团队、3个总队，以后又陆续组建5个团队和2个独立团队。为培养干部，还成立了随营军事学校。

豫鄂边区党和军队的全面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立。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应“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为达上述目的，“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鄂东，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扩大军队至三万以上”。遵此指示精神，李先念率第二、第三、第五等3个团队，分东西两路南渡襄河，进逼汉阳，并于侏儒山歼灭伪军120余人。在这次战斗的影响下，武汉日军戒严3天，深感我军对其威胁的严重性。同年2至4月，我第四团队和第二、第五团队各一部，于京山、天门、安陆等地，连续击退日军300至1000亲人的“扫荡”4次。5月初至6月中旬，日军进攻襄樊、宜昌国民党军。为钳制日军西进，支援友军作战，我军于鄂中、鄂东积极袭击敌军据点和破坏交通线。同时，主动驰援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使川军1个团安全突围。我军还收容国民党军伤病员300余人，并于治愈后全部送回。

日军攻占襄樊、宜昌后，中原局决定我军向襄河以西敌后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鄂中阵地。为此，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以主要力量转向大洪山方向，尔后逐步向襄河以西发展。1940年6月，先后控制了安陆以西的白兆山和坪坝等地，歼灭伪军一部。坪坝是白兆山通往鄂中各县的门户，我军控制坪坝之后，对敌人构成了严重威胁。同年7至10月，日军先后3次向坪坝进攻，企图夺取这一交通要地。7月，日军第三师团两个大队1200余人，从安陆西北雷公店出动，沿公路向坪坝搜索前进，被我第一、第二团队击退，毙其30余人。9月，日军第三师团600余人改由小路隐蔽前进，当地群众发现后主动报告我军，我第三团队迅即占领有利地形向敌猛攻，毙伤其40余人，将敌击退。10月，日军第三师团以步兵和骑兵约1000人，于深夜发动进攻，我第六团队将其击退，毙伤其数十人。与此同时，我军还击退了日军对鄂中其他各地的频繁进攻，巩固了鄂中阵地。

1940年8月1日，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于白兆山召开边区县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确定了继续完成战略展开的任务。会议还决定成立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作为边区最高的政权机关，统一领导边区根据地的建设。会后，军队的团队、大队、中队、分队，改称团、营、连、排，并建立和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了部队的建设。

襄樊至武汉间的汉水别称，当时称襄河。

三、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在日军占领武汉及其周围广大地区，国民党军全线撤退的危急形势下，为打破敌人巩固和扩大占领区的企图，共产党在豫鄂边区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反对，蒋介石曾数次电令新四军军部和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当局，要将在鄂中、鄂东抗日的新四军撤走，否则以武力解决之。在蒋介石的策动下，豫鄂边区各地的反共磨擦迭起，流血惨案时有发生，严重威胁当地新四军的生存和发展。

国民党湖北省鄂东行署主任兼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是坚决反共的顽固派，他拥有4个纵队2万余地方武装，背靠位于大别山区的国民党桂系军队，勾结敌伪，疯狂地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1939年5月，我黄梅新四军江北游击第八大队组建不久，即遭到程汝怀1个纵队和桂系军1个营共3000余人的袭击。尔后，又于七八月间进行残酷围剿，使第八大队损失殆尽。同时，还杀害我地方干部、共产党员、爱国进步人士和拥护抗日的群众200余人。同年9月，程汝怀的1个纵队在桂系军两个团配合下，于麻城夏家山地区围攻我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和转移至该地的中共黄冈中心县委机关，杀害我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100余人，逮捕我伤病员50余人，制造了严重的“夏家山事件”。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暴行，中共中央指示我军，必须在严格自卫的立场上，予进攻我之顽军以应有的反击，但要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积极争取国民党军大多数官兵与我团结抗日。同时，中原局根据边区周围国民党军派系林立的情况，还提出在反击顽军的进攻中，要利用矛盾，区别对待，争取多数，反对少数。中原局还要求边区各地建立巩固的抗日政权，发动和依靠群众，以利反击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我军在反击顽军的进攻中，集中打击最反动的顽固派。从1940年1月至4月，豫鄂挺进纵队一部三次东进大、小悟山地区，还击鄂东国民党顽固派程汝怀的军事进攻，巩固了鄂东抗日阵地。

1939年9月下旬，我军还粉碎了鄂中国民党顽固派鄂中专员石毓灵发动的军事进攻，巩固了我军在鄂中的抗日阵地。

在豫南，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确山县长在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的指使下，纠合确山、信阳、汝南、泌阳等四县国民党地方武装近两千人，围攻我新四军竹沟留守处。我留守处机关、部队奋起抵抗，于13日夜突出重围。但我伤病残人员、家属和职工200余人惨遭杀害。竹沟惨案发生后，新四军军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

1940年五六月间，正当日军进攻襄樊、宜昌，我军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先后在鄂中和鄂东向我军发动1000余人和1万余人的军事进攻，并夺占了我军在鄂东的抗日阵地。我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于6月21日通电全国，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

我军在豫鄂边区两年多的斗争中，共对日伪军作战280余次，歼敌1.4万余人，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多次军事进攻，创建了鄂中、鄂东和豫南抗日根据地，使我军从几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1.5万余人的主力游击兵团，并拥有民兵近10万人；我军活动范围已遍及襄河两岸、长江南北的广阔区域，并逐步成为中原地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坚力量。这些成绩的取得，是

由于我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正确领导下，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消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坚持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结果。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指出：“新四军挺进纵队（有九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其经验证明“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或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与发展。但其先决条件是地方党应有组织武装的坚决决心与工作布置”。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证明党中央上述结论是正确的。

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对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工作指示》。

第八节 开展与坚持华南地区的 抗日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廖承志等到广东，先后建立了八路军驻广州、香港办事处。1938年4月，又成立了以张文彬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这些领导机构成立后，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至广州沦陷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的成员已达数万人，为建立抗日武装和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准备了条件。

广州失陷后，国民党军退守清远、新丰一线与日军对峙，广州外围和广（州）、九（龙）铁路两侧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根据华南地区的形势，中共广东省委于1939年1月召开了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会上，张文彬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确定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是：动员组织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长期的抗战中发展力量，使党逐步成为在华南地区最后战胜日寇的决定因素。同时决定以东江、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岛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点地区。

一、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地处珠江门户，广九铁路纵贯其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占领这一地区，就能控制广九铁路，封锁珠江口，切断中国南方海上的主要交通线。1938年上半年，华南沿海的形势日益紧张。2月，日军两次由珠江口

向虎门要塞作试探性的进攻；3月，日军占领蒲台、担杆、三灶等岛屿，6月占领南澳岛；7月以小股部队侵犯大鹏半岛的虎头山。种种迹象表明，日军企图扩大对华南的侵略。据此形势，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指示成立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并立即在东江地区筹组抗日武装。东莞中心县委成立后，根据省委的指示，于1938年7月，以国

民党社训总队的名义组建了东莞壮丁常备队，共110余人。同时还在农村组织了几个游击小组，共三、四十人。在此期间，增城、宝安、惠

阳等地的中共党组织，也建立了一些群众自卫武装。1938年10月12日

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中共东江地区的党组织加紧了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10月13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又成立了东莞模范壮丁队，约150人。10月24日，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从香港派中共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等到惠阳县坪山圩，成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进行组建抗日武装的工作。12月2日，成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曾生任总队长，100余人。1939年1月，东莞常备壮丁队和模范壮丁队以及增城、宝安等地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整编，成立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由王作尧任大队长。曾生、王作尧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东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部队。

东江地区抗日武装边组建，边作战，积极打击入侵的日军。1938

年10月，增城县的抗日武装在竹园村附近伏击日军船只，击沉敌橡皮

艇 1 只，缴获木船 1 艘，毙日军 10 余人；东莞常备壮丁队和模范壮丁队一部，在东莞县城东北之峡口，据险阻击企图强渡东江支流的日军，迟滞了日军对东莞县城的进攻。12 月 7 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收复惠阳县的淡水镇，建立了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东江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并接连取得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日斗志，扩大了政治影响，为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条件。

1939 年春，日军为确保广州和珠江、西江的交通线，收缩兵力，撤出惠州等一些城镇。国民党军进占惠州，并设立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四五月间，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和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分别编为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第四游击挺进纵队直辖第二大队（以下简称第二大队）和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新编大队（以下简称新编大队）。部队虽接受国民党军的番号，但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从 1939 年夏季开始，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继续在惠阳、东莞、宝安等地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日军。9 月初，日军 500 余人占领大亚湾沿岸的葵涌、沙渔涌，威胁惠州。9 月 12 日，新编大队乘夜暗袭击日军，战至天明，克复葵涌、沙渔涌，日军从海上撤退。12 月，新编大队又在横岗的鸡心石伏击日军的一个大队，毙伤其 30 余人。在此期间，第二大队也发动和依靠群众对宝安县城南头镇实行封锁包围，迫使日军于 11 月 30 日撤出南头镇。

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在 1939 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东江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同时也给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以良好的影响。在人民群众和港澳同胞、爱国华侨的支援下，部队迅速扩大，至 1939 年底，新编大队发展到 500 余人，第二大队也发展到 200 余人，并分别在坪山圩和乌石岩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和对敌斗争的胜利开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1940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波及华南，广东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一步加剧。2 月，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命令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集中惠州整训，企图借集中整训之机，解除我党领导的这一部分抗日武装。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领导人及时发现了国民党当局的阴谋，表示不能执行其集中整训的“命令”。于是，国民党当局即以此为借口，调集第一八六师等部共 3000 余人，于 3 月 8 日将我军包围于坪山圩与乌石岩。当晚，新编大队 500 余人，第二大队 180 余人，秘密通过顽军封锁线，跳出包围圈，分路向海丰、陆丰地区转移。途中，遭到顽军堵截，部队损失很大。4 月，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转移到海陆丰的高潭、鲘门地区。由于这些地区是国民党的后方，部队不能公开活动，只能分散隐蔽在丛林山洞中，给养困难，医药缺乏，部队继续减员。至七八月，两个大队仅剩 100 多人，处境十分险恶。

在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处于严重困难的关键时刻，6 月初，廖承志从香港转来中共中央 5 月 8 日发出的电报指示。电报指出：目前全国的形势是拖的局面，国民党不易整个投降，国共合作也不会轻易分裂，但也不易好转。我们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同时不怕磨擦，才能生存和发展。曾（生）、王（作尧）两部仍应回到东（莞）、宝（安）、惠（阳）地区，大胆坚持抗战与反磨擦，决不可在国民党的后方停留。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接到中共中

央的指示后，于8月上旬秘密返回宝安县的上下坪村。

9月中旬，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军事委员会，在上下坪村召开了部队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5月8日的指示精神，总结了5个月来斗争和东移海陆丰的经验教训，同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是：第一，坚持在东、宝、惠地区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第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工原则；第三，在组织上坚持独立自主，不受国民党的限制，在斗争中大胆发展壮大自己。根据上述方针原则，会议确定放弃国民党军的番号，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原新编大队改称第三大队，第二大队改称第五大队，分由曾生、王作尧任大队长，林平任两大队的政治委员，梁鸿钧负责两个大队的军事指挥。上下坪干部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对于开展与坚持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会后，第三大队70余人于10月初挺进东莞县大岭山客家洞地区，开辟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第五大队30余人在宝安县的阳台山创建根据地。

大岭山位于东莞县西南部，面积约130多平方公里，人口10余万。其周围的莞城、石龙、厚街、太平、霄边等地，均有日伪军据点，驻守着日军长濑大队和伪军一部共3000余人。针对上述敌情，第三大队进抵大岭山后，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和自卫武装，清除汉奸。11月初，日军1个加强中队和1个炮兵分队共200余人，由厚街、桥头出动“扫荡”我大岭山根据地。当日军一部进至大径村时，第三大队突然出击，将日军包围于村内，经4小时激战，杀伤日军大部，随后即转移兵力阻击另一部日军，掩护群众转移。日军遭第三大队突然打击，不敢深入，撤回原防。1941年6月，驻东莞县城之日军长濑大队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奔袭大岭山，企图歼灭第三大队。10日，当日军进至百花洞附近时，第三大队组织各乡自卫队迅速抢占百花洞周围高地，出敌不意地发起攻击，将日军一部包围于百花洞村内。从11日拂晓激战至下午3时，日军数次突围未逞。12日，日军以飞机支援，空投粮弹，但仍未能突出第三大队的包围圈。这时，日军又从广州、石龙等地出动步骑兵1000余人增援，第三大队为避免与日军打硬仗而撤出战斗。此战，第三大队歼日伪军50余人，击毙日军长濑大队长，缴枪10余支，战马多匹。在坚持以游击战打击日军的同时，第三大队还注意了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专门设立了民运部，并由民运部派出工作组，帮助群众建立兄弟会、姊妹会等抗日组织。还开办夜校，进行文化学习和抗日教育。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按“三三制”的原则，建立了连平、大沙等8个乡、村的抗日民主政权。还成立了中共大岭山区委。

第五大队进入阳台山地区后，立即着手开展根据地建设工作。首先清除了望天湖、乌石岩等地的汉奸、特务，同时派出人员深入各乡、村发动群众，建立8个抗日自卫队，动员了200余名青年参军。1941年5月，在龙华、布吉、乌石岩、望天湖等地建立了乡级抗日民主政权。6月17日，驻南头日军约40人，向望天湖、游松等地进犯。18日，第五大队以1个中队的兵力在梅林坳伏击日军，迫使日军撤回南头。7月7日，日军400余人分两路“扫荡”阳台山地区，第五大队集中兵力打敌一路，激战一天，击退了日军的进攻。8月18日，日军400余人分三路再次“扫荡”阳台山地区，第五大队将兵力分散游击，到处袭击敌人，敌不能立足，不得不撤回深圳、南头。我军

几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使阳台山根据地逐步巩固。

从上下坪会议到 1941 年底，东江抗日武装正确地坚持了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部队由从海陆丰东返时的 100 多人发展到 1500 余人。其中，第三大队由 70 余人发展到 800 余人，下编 3 个中队和 1 个短枪队；第五大队由 30 余人发展到 600 余人，下编 4 个中队。民兵发展到 1000 余人。此外，在增城、从化、番禺地区建立了增从番独立大队，约 100 人。从此，东江抗日武装成为这一地区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

二、珠江三角洲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珠江三角洲的番禺、顺德、南海、中山等县位于广州外围。广州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区的党组织，立即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以南海县农民运动领导人吴勤为司令的“广州市郊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和中共南（海）、顺（德）工委负责人林锵云领导的游击队。吴勤领导的广游二支队，从 1938 年冬至 1939 年冬活动于顺德、番禺南部，最盛时期曾达到 2000 余人。但部队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缺乏党的领导骨干，吴勤实际指挥的只有数十人。林锵云领导的游击队，于 1939 年 5 月曾袭击驻守顺德县城的日军，因而在顺德地区颇有影响。但由于缺乏党的领导骨干和有游击战争经验的干部，部队发展不快。1940 年 3 月，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要求对曾生、吴勤等游击队加强领导，并在精神上物质上予以援助，使他们尽可能扩大，并帮助他们依托有利地形建立根据地。1940 年夏，广东省委从中共中央派给广东的干部中，抽调谢立全、谢斌等人到珠江三角洲，加强这一地区的领导。同时，在省委的领导下，对当地的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将南顺工委改为南顺中心县委，充实了干部，健全了党的领导。廖承志还从香港陆续派了一些党员干部来到珠江三角洲。南顺中心县委成立后，决定在顺德县城附近的西海村周围加强游击活动，逐步以西海为中心向外扩展，建立西海根据地。同时决定整编部队，将林锵云领导的游击队编为广州市郊游击第二支队独立第一中队，作为第二支队的骨干。

根据中心县委的决定，独立第一中队于 1940 年 10 月进驻西海，在西海成立了广游二支队司令部，并公开宣传广游二支队抗日、团结、爱民三大主张。经过发动群众，开展扩军工作，独立第一中队发展到 120 多人。同年冬，广游二支队将主要兵力转向顺德，以西海为中心，向陈村以西及石壁一带发展。在西海成立了南（海）番（禺）顺（德）抗日自治委员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游杂武装共同抗日。1941 年春，又通过保卫春耕，进一步发动了群众，部队的威信日益提高。至 7 月，部队发展到 200 多人，编 1 个大队，1 个独立中队，并在西海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广游二支队的游击活动，对日伪军珠江的交通运输构成了威胁。从 1941 年夏季开始，日军以伪军 2000 余人进驻西海外围的三善、古坝、碧江等地，逐步形成对西海的包围。西海地区是平原水网地带，广游二支队只控制西海村及其周围少数村庄，缺乏回旋余地，如日军连续进攻，要坚持长期斗争十分困难。因此，中心县委决定从广游二支队抽调 70 余人进入中山县五桂山，与当地抗日武装结合，开辟五桂山根据地。

伪军在完成对西海的包围以后，于 1941 年 10 月 5 日和 15 日，各以 1 个营的兵力对西海进行两次试探性进攻，但均被广游二支队击退。尔后，南

顺中心县委召开了军事会议，对反围攻作战进行了周密部署。当时，广游二支队留驻西海的兵力为5个中队，加上民兵，共300余人，而伪军的兵力却有1000余人。针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心县委决定充分利用西海周围的水网地形和甘蔗田形成的“青纱帐”，以伏击、袭击等手段杀伤与消耗来犯之敌。当敌发起进攻时，我依托西海村周围的既设工事阻击与消耗敌人，待敌消耗到一定程度并疲惫时，集中兵力歼敌一路，得手后再实施全面反击。同时，把西海的群众也组织成各种保障分队，参加战斗。

10月17日晨，伪军一部1000余人，分三路向西海进犯，遭到广游二支队预伏部队的阻击，战至11时，伪军仅占领一座糖厂，其余均被压缩在稻田、鱼塘等开阔地里，不能前进。下午，广游二支队趁敌疲惫并即将撤退时，集中兵力实施反击，伪军陷入我游击队、民兵和群

众的包围之中，争相逃命，一部分被我击伤击毙，一部分掉进鱼塘、河沟溺水而死，残敌逃回原据点。此战，广游二支队毙伤伪军团长以

下300余人，俘营长以下300余人，缴枪300余支，保卫了西海根据地。西海战斗的胜利，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三、海南岛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抗日战争爆发前，海南岛地区保存了3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琼崖特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当局经过一年多的谈判，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议，并于1938年12月5日在琼山县云龙圩将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以下简称独立队），冯白驹任队长。改编时约300人，编为3个中队。

1939年2月10日，日军以台湾混成旅团一部，在海军的支援下。在海南岛北部的天尾港登陆，迅即占领海口、琼山、定安、文昌等地。14日，日军又以第五舰队一部，在海南岛南部的三亚港登陆，迅即占领三亚、榆林等地。尔后，日军南北对进，海南全岛遂告沦陷。国民党守军保安第十五团等部退入五指山区。

日军登陆时，刚改编的独立队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毅然开赴南渡江的重要渡口潭口，冒着敌机的猛烈轰炸，构筑工事，阻击日军渡江。独立队的这一行动，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此后，独立队以第一中队在琼山县的云龙、道崇、三江、丰演，以第二、第三中队在琼山县的咸来、树德和文昌县的大昌等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不久，与国民党当局联合成立了琼崖战时党政处，颁布了《动员委员会组织条例》，在部分县、乡成立了保卫琼崖动员委员会。由于这一时期琼崖地区的国共合作较好，琼崖抗战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各地的农民抗日协会、青年抗日协会、妇女抗日协会等抗日组织纷纷成立；许多失散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要求独立队收编，共同抗日；不少国民党军队和行政机关要求独立队派员协助加强政治工作，整顿组织；而独立队本身也迅速发展到1000余人。为了适应部队迅速发展的形势，1939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将独立队改称独立总队，由冯白驹任总队长，下编3个大队。

独立总队成立后，中共琼崖特委和总队部即以第一、第二大队于琼山、

文昌地区，以第三大队于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3月中旬，第一大队在琼（山）文（昌）公路干线上的罗牛桥伏击日军的运输车辆，击毁汽车1辆，歼日军大佐指挥官以下20余人。5月，第二大队在海口市郊长村桥附近伏击修路的日军，缴枪7支。6月，第一大队化装潜入文昌县城，袭击日军北门哨所，歼日军数人。日军遭独立总队连续打击后，出动1000余人对琼（山）文（昌）地区进行“扫荡”。为牵制敌人，独立总队以第二大队一部西渡南渡江，进至琼山县龙塘、十字路、龙桥、府城和海口郊区活动，威胁敌心脏地区，并将游击战争发展到海南岛西部地区。从1939年2月至年底，第一、第二大队在琼文地区作战70余次，歼日军800余人，开辟了琼文抗日根据地。

为了发展海南岛西部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独立总队第三大队于1939年冬组织了围困那大日军据点的战斗。那大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是情县、临高、昌江、感恩、白沙五县的交通枢纽，驻有日军100余人及伪军1个中队，独立总队第三大队决定联合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动员群众，采取围困战术将日军挤走。战前，在独立总队第三大队的主持下，召开了陶江、南丰等8个乡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成立围困那大行动委员会指挥部，在国民党儋县县长和各乡镇行政人员的支持下，组织工作队深入群众，建立各种围困组织，参加围困的有武装人员400余人，群众2000余人。10月下旬，围困战斗发起，第三大队以两个中队及部分地方游击武装对那大之敌连续进行袭扰，以部分武装人员带领群众在那大外围严密警戒，切断那大之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至11月初，那大之敌因给养断绝，孤立无援，被迫乘夜暗突围向儋县县城逃窜。第三大队进入那大后，未及逃跑的伪军1个中队全部就俘，缴枪60余支。那大战斗的胜利，促进了海南岛西部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1940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琼崖特委：海南岛应作长期抗战的打算，应以全岛为目标，大力发展党和武装，开展民运工作，不顾国民党的任何阻碍，坚决组织全岛人民的抗日斗争。要自力更生，把琼岛创造为争取900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中共中央的指示，指明了海南岛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方向。

为了发展海南岛西部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共琼崖特委于1939年12月决定将特委和总队部转移到临高、儋县、白沙交界的纱帽岭地区，建立以那大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下旬，特委及总队领导机关率特务大队向纱帽岭地区转移。2月中旬，转移部队抵达美合地区时，那大镇已被日军重新占领，特委及总队机关不能继续西进，于是决定留在美合地区创建根据地。

美合位于澄迈县东南部山区，是控制屯昌、澄迈、临高、儋县的要地。独立总队进至美合后，迅速控制了美合周围的仁兴、南坤等乡，并建立了100余人的民兵。与此同时，在儋县、昌江、临高等县成立了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同年夏，在美合建立了干部学校。9月，中共中央派庄田、李振亚抵琼崖，加强了独立总队的领导和指挥。接着，整编了部队，统一编成2个支队，1个特务大队和1个独立大队（亦称第四大队），共3000余人。同时，充实了总队领导机关，由冯白驹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庄田任副总队长，李振亚任参谋长，王业喜任政治部主任。

独立总队的迅速发展壮大，引起了海南岛国民党当局的恐惧。从1939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就不断制造借口，限制独立总队的发展。独立总队始终

以大局为重，据理交涉。但国民党地方当局不仅不听独立总队团结抗战的劝告，反而于1940年11月7日，以保安第七团及部分地方武装共3000余人向美合根据地发起进攻。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独立总队被迫撤出美合，向琼山、文昌地区转移，于1941年1月进至琼山县树德乡。3月，国民党军保安第七团再次向独立总队发动进攻，独立总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坚决实行自卫反击，歼顽军一部于罗蓬坡。6月，独立总队又粉碎顽军3000余人对琼山文昌根据地的进攻。在反击顽军进攻的同时，独立总队于7月以两个支队的兵力袭击日军美德村据点，击毁日军军车2辆，歼日军60余人，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20余支。此后，第一、第二支队向琼山县甲子乡挺进，继续巩固和扩大琼文根据地。

自1939年2月日军登陆海南岛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在海南岛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琼(山)文(昌)，乐(会)万(宁)、澄(迈)临(高)地区建立了根据地。1941年5月至11月，相继成立了乐万、文昌、澄(迈)临(高)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和琼崖东北抗日民主政府，独立总队也由原来的300多人发展到3500余人。此外，还在许多县、区、乡建立了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其成员达5万多人，从而使海南岛的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本章小结

自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改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而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来打击我党我军，以巩固其占领区。同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并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就使我党我军处于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下，全国抗战出现了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危险。

然而，由于我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方针，因而在两年中，不仅抗击了 58% 至 62% 的侵华日军（不含关东军）和全部伪军，粉碎了敌人千人以上至 5 万人的“扫荡”近百次，作战万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军，并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而且使自己和抗日根据地获得了大发展。至 1940 年底，部队发展到 50 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 1 亿多，成为克服投降、分裂和倒退危险，坚持长期抗战的中坚力量。同时还进一步取得了敌作战和对顽斗争的经验。

一、在游击战争已经充分发展的地区，必须采取以巩固为主、在巩固中求发展的方针

敌占武汉后，改以巩固其占领区为主，集中其侵华兵力（不含关东军）半数以上于占领区，重点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同时，八路军自挺进华北敌后，虽完成了战略展开，创建了大片抗日根据地，部队也获得了大发展，但基础还不巩固。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确定在华北采取以巩固为主并在巩固中求发展的方针。为实现这一方针，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针对敌在华北失取平原后攻山区的企图，以及平原根据地刚刚建立，缺乏战斗骨干，亟待加强等情况，首先以 3 个师的主力挺进冀鲁平原地区，增强了平原抗战力量，帮助当地抗日武装提高了战斗力，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打破了日军先控制平原的企图，坚持了平原的抗日斗争，壮大了 3 个师的主力部队，增加了八路军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来源，并牵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为巩固山区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平原的抗日斗争，才能有利于巩固山区根据地；只有巩固了山区根据地，才能更有力地支持平原的抗日斗争；只有把平原和山区的对敌斗争协调起来，相互策应，相互依存，才不致被敌各个击破。为实现巩固华北的方针，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以主力加强平原抗日斗争的同时，还提出并执行建党、建政和建军三大任务。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增强了敌后抗战的领导力量；通过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实行“三三制”和减租减息政策，团结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增强了敌后抗战的力量；通过加强军队建设，先后进行了四期整军，共整编了 110 个团，虽在个别地区因较多地编并了地方武装，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所影响，但就整体来说，是增强了主力部队，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巩固了大发展的成果，所有这些，对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都起了重要作用。

二、在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的地区，必须实行以发展为主、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

日军占领武汉后虽以巩固其占领区和打击我党我军为主，但其重点在华北，这对我军进一步发展华中和开展华南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有利的。因此，中共中央确定在华中、华南实行以发展为主的方针。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南、江北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决定在江北采取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方针，在江南采取向东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向东向北发展，地属敌占区，在政治上有利，且敌顽势力较薄弱，在军事上有利，又可与华北八路军相互策应；而向西向南发展，地属顽占区，必与顽固派发生磨擦，引起中间派疑惧，政治上对我不利。因此，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江南指挥部制定的方针是正确的，因而取得了开辟苏北、豫皖苏边、豫鄂边和皖东等重大胜利。在华南，南方局和广东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也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了开辟东江、琼崖和珠江地区的胜利。

实践证明，在执行以发展为主的方针时，必须抓住有利时机，正确的发展方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大胆放手地发动与组织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不要为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这是取得发展胜利的关键。如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束缚而停滞不前，不仅不能发展，反而会遭到重大损失。

三、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都必须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

战略相持阶段是转变敌我优劣形势，消耗与削弱敌人，发展与壮大自己，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的过程。然而，相持阶段前期，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特别是在敌停止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回师其后方，以巩固占领区为主，集中其百分之六、七十兵力，重点打击我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时，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只能以广泛的群众性的分散的游击战争，逐步消耗与削弱敌人，积小胜为大胜。通过长期的斗争过程，积蓄自己的力量，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尔后才能举行较大规模的正规作战。因此，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实践证明，凡是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全面贯彻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时，不仅能粉碎敌之“扫荡”，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而且能积蓄力量和发展壮大自己，以小的代价获取较大的胜利；反之，凡是忽视敌强我弱的实际，进行较大规模的、与我军装备实力不相适应的运动战和阵地攻坚战，则必付出较大代价，过多地消耗自己的力量，甚至对以后战局带来不利影响。当然，在战略相持阶段中，游击军和游击战不能总是停留在原来地位，必须随着战争的发展逐步由游击军和游击战发展为正规军和正规战，这样才能战胜敌人。但这是一个长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在武汉失守至 1940 年底期间，随着敌人战略战术的改变，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也有了新的发展。敌为巩固其占领区，变“点线”占领为“面”的占领，通常依托占领的城市据点和交通线，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在“扫荡”中，敌改变过去围攻时的长驱直入为逐步推进，企图不给我军以打击其一路的机会。同时大力修道路，设据点，企图以这些新的点线来分割我根据地，尔后再分区“清剿”，各个击破，以实现“面”的占领。在兵力的使用和部署上，采取先集中，唇分散，即“扫荡”开始时，首先集中主力四面包围，分进合击，并建立新的

点线，尔后高度地分散部署兵力，依托点线进行所谓“神速机敏的讨伐”。然而，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分散，因而常常顾此失彼，虎头蛇尾，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针对敌之“扫荡”的特点和弱点，改变过去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的战法，采取广泛分散的游击战，以分散对敌之集中，以集中对敌之分散。即在敌“扫荡”开始后，避其锐势，主力分散转移，到各路“扫荡”之敌的侧后，打击敌人，切断其后方补给线，以主力一部与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于内线袭扰、消耗、疲惫敌人。当敌分兵转入建立新点线，采取高度分散部署时，或敌军在我根据地难于立足实行撤退时，我则集中兵力，逐一摧毁敌之据点，或在敌撤退中选择好打之敌予以歼灭或歼灭性的打击。对敌依托大小据点和交通线，对我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时，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则广泛开展主动的、积极的交通破袭战。以部分主力军为骨干，协同广大地方武装，并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参加，对敌之主要交通线及沿线敌军据点进行较为彻底的破坏和有利的攻击，如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军民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所进行的平汉、自晋铁路和邯长、武沙公路的破袭战，以及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破袭战等，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使许多铁路、公路交通一时陷于瘫痪。这种主动的、积极的交通破袭战，对打破敌之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四、正确运用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反共政策，并由以政治反共为主转为以军事反共为主，对我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与敌构成对我军之夹击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不打退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就不能坚持抗战；不斗争，就不能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对顽固派的进攻，必须进行坚决的反击，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不能无原则地迁就退让。这样才有利于支持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坚持长期抗战的目的。

然而，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正确运用斗争策略。首先要坚持有理即自卫的原则，保持斗争的防御性，这样有利于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第二，要坚持有利即胜利的原则，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并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最反动的顽固派，保持斗争的局部性；第三，坚持有节即休战的原则，掌握时机，适可而止，停战议和，保持斗争的暂时性。实践证明，这些正确的策略原则，是我军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我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顽斗争的胜利。

第四章 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

第一节 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的形势。 我党我军的方针和任务

(参见附图 37, 附表 20、 21、 22)

1940 年夏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十分严重。德军继侵占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之后，在意大利军的协同下，入侵法国，迫使法国投降、英军退出欧洲大陆。德、意法西斯在西方所取得的胜利，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南进野心。于是日本侵略者决心乘英、美无力东顾之机，实行南进政策，夺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为此，7 月 23 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决定了《伴随世界形势进展对时局处理纲要》，声称“为了应付变化着的世界形势”，“应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遂开始研究南方作战计划，海军则进行对英、美的作战准备。与此同时，日本还通过德国压迫法国维希政府同意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9 月 23 日，日军一部进占法属印支北部，27 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三国军事同盟，从而加剧了与英、美的矛盾。由于中国抗战消耗和牵制了大量日军，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英、美为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遂由推行牺牲中国利益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转为采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以牵制日本的“远东策略”。10 月，英国重开滇缅（甸）公路；接着，英、美向中国政府提供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苏联为防止日本北进，避免两面作战，继续采取积极支援中国抗战的政策。而德、意为利用日本在亚洲钳制英、美，力促日本南进，并极力劝蒋介石对日妥协和加入德日意军事同盟。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着日本侵华的方针、政策和抗战的形势。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放手南进，急谋在巩固其侵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遂于 11 月 13 日，在御前会议上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除继续进行武力战外，应采取断绝英美的援蒋行为及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治和军事手段，力求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迫使其迅速屈服”，实现“蒋汪合流”。至 1940 年底，如达不到上述目的，即转取长期战的战略，以确保华北和华中的长江中、下游及华南沿海等重要占领区，特别要加强占领区的“治安”；同时，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对中国内地政治、经济中心的空袭。据此，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于 1941 年 1 月 16 日，制定

《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规定“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不要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敌中国派遣军依据上述“纲要”、“计划”，对国民党继续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更加强调以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为主，充分发挥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总力战”的威力，集中其侵华兵力（不含关东军）的 75% 和伪军全部，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连续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因而，敌后抗战的形势

日趋困难。

根据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的方针，敌中国派遣军调整了部署，增强了华北的兵力，使华北方面军的兵力达到 11 个师团 112 个独立混成旅团和 1 个骑兵集团（2 个旅团），主要对八路军作战，同时与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八战区在绥远西部、山西的西南部，以及河南、安徽北部对峙；以第十一军共 7 个师团又 3 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以武昌为中心，北至河南信阳、西至湖北宜昌、南至湖南岳阳、东至江西九江、南昌的地区，主要对国民党军第五、第九、第三战区和新四军第五师作战；以第十三军 3 个师团又 4 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长江下游苏、浙、皖等省，主要对新四军作战，同时与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在浙江西部、安徽南部对峙；以华南方面军（1940 年 2 月成立）的 6 个师团部署于广东、广西和福建沿海，主要对国民党军第四、第七战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珠江、琼崖等游击队作战。

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也直接影响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内外政策。在日本诱降，德国劝降，英、美、苏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处于“左右逢源”、“待价而沽”的地位。他借与日本谈判，以压美、英、苏给他更多的援助和支持其内外政策；借美、英、苏支持中国抗战，以与日本讨价还价；并且看到日本决心南进，在中国重点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以巩固其占领区，不可能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时局发展趋势，因而决心继续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既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1940 年 7 月初，他召开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讨论进一步反共问题，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与此同时，以所谓“中央提示案”形式，强令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军队，不得超过 10 万人，并全部集中到旧黄河以北冀察地区。接着，蒋介石调整其军事部署，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增加到 50 余万人；同时，加强其在华中的兵力，密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由豫西和鄂东东进，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密令鲁苏战区韩德勤部进攻苏北新四军；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准备围歼皖南新四军。对于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敌后抗战即将出现的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有预见，在 1940 年 7 月至 11 月期间，曾多次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7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三大阵线的斗争。”“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由于德国进攻，意国参战，法国投降，英国已退出欧洲大陆的结果，陷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中”。“日本准备在太平洋参加德意战线”，并“企图用增大的压力分裂中国内部，压迫中国投降，这样就使中国抗战局面亦处于新的环境中”。“投降危险的来源，主要的现在已不是英美法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而是日本的压力与德意胜利对于日本的鼓励以及可能的劝和政策”。《决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作出 17 项政策规定，号召全党认真地执行中央的政策，达到战胜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9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出：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况正处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党对于这种变化，必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国际上，首先是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的斗争，目前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美国已日益积极地援助英国与准备参战，一方面德、意法西斯与日本勾结的结果，已使日本转变政策。日本参加德、意阵线

与实行南进方针已日益明朗化，这样就使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日益严重起来。日本为了放手南进与准备对美战争，便正在采取各种办法（交通封锁、军事进攻、政治引诱），以求迅速结束对华战争。英美为了对抗日本南进，便由劝和中日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转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德国为了利用日本牵制英美与利用中国市场增强德国经济，却又准备劝和中日结束战争。在国内，国民党顽固派动摇于英美与日德之间，暗藏的投降派策动蒋、汪合流，进步与中间势力则要求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日。对于顽固派在暗藏的投降派策动下的分裂投降的危險，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加速准备一切条件，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苏、美、英支持中国抗战，国内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包括国民党广大爱国人士和官兵反对投降、分裂，以及我党我军力量的发展壮大，克服投降分裂危險，坚持持久抗战是完全可能的。那种“对于时局的悲观估计与不耐烦情绪，显然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态度是“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 10月25日，毛泽东在《关于形势的估计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中指出：“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險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 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出：“日本与亲日派之目的，在于引起中国分裂，使国共两党互相火并，两败俱亡，以便彼等坐收渔人之利。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为此，我党我军“必须积极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必须充分的准备着去粉碎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 12月25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和党的政策的指示中，强调指出：自日本帝国主义者与汪精卫伪政权签订条约，美国向中国提供贷款，苏联援助中国，以及我党反投降斗争展开以后，“此次投降危机已被制止。虽然将来仍有发生此种危机可能。但目前则是继续抗战局面。”国民党仍将采取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因此，我们也应继续实行一面团结抗战，一面进行反顽斗争的革命的兩面政策。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既联合、又斗争，既统一、又独立自主的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军民，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统一战线中不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时，要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和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对敌斗争的军事战略方面，要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不断发展壮大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占区要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一要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坚决执行“三三制”政策，共产党员只能占1/3，吸收广大非党人士参加政权；二要实行正确的劳动政策，必须改善工人生活，调动工人抗日积极性，但切忌过“左”，加工薪减工时不应过多，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对抗日和工人本身都不利；三要彻底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以调动农民抗日积极性；四要实行合理的税收政策，一切有收入的人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但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五要正确执行锄奸政策，坚决镇压汉奸、敌特和坚决反共反人民分子，保护抗日人民，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人；六要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应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

七要加强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八要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吸收各方面人才参加，以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对于战胜严重困难，争取时局好转，坚持敌后抗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二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 第二次反共高潮

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我党我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随即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向华中，企图消灭和驱逐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40年3月，国民党当局即制定了“肃清”淮河流域和陇海铁路东段以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方案。7月，在所谓“中央提示案”中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集中到旧黄河以北冀察地区。同时，密令顾祝同、韩德勤等部消灭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并指使韩、顾通电全国，诬蔑新四军“破坏抗战”，大肆宣传统一“政令和军令”，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制造舆论。10月19日，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所谓“皓（19日代号）电”，除继续诬蔑我军“破坏抗战”、“不服从军令、政令”外，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后一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地区，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提出了斗争方针和对策。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发动新的反共高潮，“我们要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我们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11月2日至6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关于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等指示中进一步指出：“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我们应极力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内战，并把重点放在准备应付投降和内战的最黑暗局面。同时，指示中原局、东南局和新四军，加紧进行对付顽固派军事进攻的各项准备；指示我党驻重庆、西安、桂林等地代表“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国亡党，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有百害无一利。”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指明“时局危机极端严重”，要求动员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9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佳（9日的代号）电”，驳斥何、白“皓电”对我党我军的攻击和强令我军全部集中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的险恶用心；同时，申明我党为顾全抗战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限时日。15日，毛泽东在向全党发出的《关于击退蒋介石反共高潮的措施》中，进一步指出：“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朱、彭、叶、项的“佳电”的发表和我党驻各地代表积极活动，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阴谋，表明了我党我军的严正立场，从而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然而，蒋介石视我“佳电”所取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态度为怯懦可欺，竟步步进逼。11月14日，蒋介石制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案”；接着，密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和鲁苏战区韩德勤等部共20万人，准备向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进攻；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

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及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我们除“佳电”中表示和缓、在皖南作出让步外，其他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准备抽调7万精兵，待命出动，协同新四军粉碎顽军对华中的进攻。30日，毛泽东再电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进一步指出，蒋介石的政策实质，仍是既反共又抗日。因此，我们的方针是争取缓和，准备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以争取群众，抵抗以保卫自己，软则给蒋以面子，硬则给蒋以压力。各地必须积极准备，给敢于大举进犯者以迎头痛击。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对我军又发出“齐（8日的代号）电”，继续坚持其“皓电”的反动立场和无理要求。9日，蒋介石发出“佳电”，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限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1941年1月底以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至此，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反共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战略部署的指示》，除令新四军皖南部队迅即北移外，要求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在中原局和华中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坚决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要求全国各地党组织在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和高压政策的同时，必须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争取中间势力和顽军中的广大官兵，注意灵活运用策略。

根据党中央历次指示精神，中原局和华中总指挥部立即确定坚持皖东，巩固苏北，贯通苏皖联系，粉碎顽军东进的方针，并进行了坚决自卫的紧急动员，同时，指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苏南部队准备接应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

二、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新四军 皖南部队遭受重大损失

（参见附图38）

新四军皖南部队活动地区，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是一个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五六十公里的狭长地带，且面对强敌，背有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监视、封锁，处境十分险恶。为使皖南部队摆脱险境，中共中央自1940年10月起，多次令其尽早由无为以东北渡长江进入皖东，或经苏南渡江北上。并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但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以“军部北移困难”为由，主张继续留在皖南。

1940年10月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等电。

11月24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已抽调兵力，进行围歼新四军军部的部署，遂电令新四军皖南部队务必“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此后，项英虽派出部队侦察了经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的渡江路线，筹集了渡江船只，并将部分物资和1000余机关人员向苏南转移，但未及时组织部队行动，以致贻误了时机。

蒋介石在其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遂于12月10日，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按照前定计划”，“立即将其解决”；并故意泄露皖南部队北移路线，暗示日军加强沿江封锁兵力；同时令皖中李品仙部于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企图与日军相互配合夹击新四军皖南部队。12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调集了7个师8万余人兵力，任命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采取“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方针，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29日，上官云相于安徽宁国召开作战会议，确定进攻部署：以其第五十二、第一八师为右翼军，展开于南陵、泾县、水济桥、丁家渡之线，向戴家会、三里店、汀潭进攻，尔后向繁昌方面追击；以第四十、第一四四师、新编第七师为左翼军，展开于湾滩、茂林、苏口、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向云岭、何湾、沙土角进攻，尔后与右翼军协同向长江南岸的旧县、荻港、坝埂头方面追击。企图首先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我军压缩至长江边上，相机歼灭之。同时，以第七十九师于太平、石埭之间，以第六十二师于榔桥、三溪镇之间，占领阵地，阻止我军南进；以第八十八军、忠义救国军和第二游击区部队于苏皖边郎溪地区，切断苏南与皖南的联系，阻止我军东进。并限定以上各部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此后，顽军又部分调整了上述部署。

这时，新四军皖南部队北渡长江或转移至苏南的困难虽然增加，但转移的条件还是具备的。首先，敌顽之间、顽军内部均存在矛盾，只要皖南部队突入敌占区，顽军即不敢深入；其次，沿江地区群众基础较好，并有江北、苏南的新四军部队接应；再次，皖南部队指战员同仇敌忾，具有克服一切困难的顽强斗争精神。但是项英自12月中旬起数次向中共中央请示“行动方针”。26日，中共中央复电对他作了严厉批评，指出：“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此后，项英于28日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决定皖南部队以临战姿态，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同时，进行了战斗编组：以第一团和新编第一团为第一纵队，以第三团和新编第三团为第二纵队，以第五团和军部特务团为第三纵队，军直机关随第二纵队行动。1941年1月1日，项英将转移苏南的决心电告党中央，但对向苏南转移的具体路线，未加说明。3日，中央复电同意立即向苏南转移。

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由云岭分三路出发，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河水猛涨，部队行动迟缓，至5日15时各纵队才先后到达大康王、凤村、茂林、潘村、铜山等地。由于部队疲劳，遂停止前进，就地休息。顽军乘机紧缩包围圈。6日下午，我警戒部队在大蔭岭、丕岭与顽军小部队遭遇。我将其击溃。黄昏，我各纵队按原定计划分三路继续向旌德方向前进，拟于星潭会合。7日，我先头部队在星潭附近遭到顽军拦击，遂组织两个营对星潭展

开攻击。这时，项英于百户坑召集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会议对攻下星潭后能否向苏南转移，认识不一致，争论达7小时之久，至晚12时，始决定部队改向西南方向行动，经廉岭和高岭转向太平，待机再向苏南转移。这一决心打乱了原定的行动计划，增加了突围的困难。8日，当我军向西南方向行动时，又遭顽军第七十九师阻击，不能前进。遂又决定改向西北茂林方向突围。这时，顽军第四十、第一四四师加紧向我左右两翼进攻，云岭、茂林等地也被顽军新编第七师、第一四四师占领。我军退路已被切断，处境更加险恶。8日晚，当我军进到茂林东南五公里的高坦村时，又遭顽军第一四四师猛攻。此时，叶挺指挥部队进行顽强抵抗，经一日激战，终将顽军击退。尔后，我军转至茂林以东五公里的石井坑，正当整顿队伍、准备继续突围时，又遭顽军第四十、第五十二、第一八、第一四四师等部的围攻。我军宁死不屈，浴血苦战。

1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叶挺、饶漱石（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全权指挥，坚决率部突围；同时电告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坚决要求其在皖南停止进攻，撤围让路。蒋介石一面口头答应下令查处，一面却督令顾祝同加紧围攻，务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皖南部队在叶挺指挥下，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继续与顽军作殊死搏斗，多次打退顽军的进攻，充分表现出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至14日，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项英、周子昆遇害，袁国平牺牲。叶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注意与当面顽军谈判撤围让路的指示精神和组织上的决定，亲赴顽方谈判时被扣。这就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声称要将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三、重建新四军军部，打退国民党 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

（参见附表23）

为了坚持抗战，反对分裂，中共中央决定“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的方针，以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和1月17日命令的反动实质。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形式，揭露和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要求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做好反击顽固派的充分准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我党组织，开展反对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个声讨顽固派的群众运动。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准备迎击顽固派新的进攻。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向国民

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

党当局提出关于处理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要求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严惩肇事祸首，释放叶挺和新四军被俘人员。与此同时，我党代表周恩来为打破国民党封锁皖南事变消息，怀着极大的义愤，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并通过各种活动和途径向中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25日，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尔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将我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以苏中地区部队编为第一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以淮南地区部队编为第二师，张云逸兼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以盐阜、皖东北地区部队编为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淮北豫皖苏边区部队编为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鄂豫边区部队编为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苏南地区部队编为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皖中、皖南地区部队编为第七师，张鼎丞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全军共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

我党针锋相对、义正辞严的斗争和处理皖南事变的严正立场、合理主张，获得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力量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宋庆龄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三次致书蒋介石，要他悬崖勒马。民主党派提出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海外爱国侨胞纷纷通电谴责蒋介石，反对枪口对内。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通电国民党政府并全国同胞，要求制止内战，团结抗日。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将领，也纷纷表示不愿内战，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战。

在国际上，苏联提出了抗议。英、美出于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也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影响抗日。美国总统代表居里于2月14日在重庆会见我党代表周恩来时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中国分裂，美国很难赞助。而华中日军则于1月24日至2月12日乘虚而入，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溃败。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为了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局面，蒋介石企图以诱骗我党参政员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来掩饰其破坏团结抗战的真面目，减轻国内外对他的谴责和压力。

为了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进一步争取中间力量，挽救时局，坚持团结抗战，中共中央于3月2日提出了《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要求

“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拨款抚恤死难家属”等，并指出只有国民党当局执行上述条款，表示悔改，中共参政员才能出席会议。我党这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坚定立场，得到了广大中间势力的同情和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又一次遭到严重打击。3月6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把皖南事变说成是“整饬”军令、军纪，不涉及党派政治问题；接着，又选中共代表董必武为参政会常驻委员，这实际上是他结束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退兵一招。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打遏。经过这次斗争，我党我军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相忍为国的正义立场，赢得了国内外广大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与赞扬。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蒋介石驱逐我军至黄河以北、与日军夹击而歼灭之的图谋，被彻底粉碎。国民党的政治地位进一步降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进一步

提高。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局面得以继续。5月8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指出：在对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时，首先，不要忘记中国的基本矛盾。“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国共两党继续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就存在，不能因为一时反共逆流而忘记了中日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才不致犯“左”的错误。其次，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有清醒的、本质的认识。他们具有两面性：既反共，又不愿意完全破裂；既抗日，又不积极，甚至有时与日本勾勾搭搭。只要他们还没有投降，其对我们的政策依然是一打一拉。因此，我们的方针，便只能是“以打对打，以拉对拉”，“针锋相对”，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循。否则，我们就要犯右倾错误。“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第三，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要从最坏处即全面破裂作准备，努力争取好的即继续共同抗日的前途。只有作好应付最困难、最黑暗的局面准备，才能争取好的前途。“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第四，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不仅要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加以区别对待，而且要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和一般的、统制中央政权的和地方实力派加以区别对待，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顽固派，以利更加广泛地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这些就是我党我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这是蒋介石一手造成的。但从主观方面检查，与项英受王明的右倾错误影响是分不开的。首先，他强调华中特殊性，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向敌后发展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长期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局促于皖南狭小地区，处于敌顽夹击的不利态势。其次，丧失了北移的有利时机。早在何、白“皓电”前后，党中央即指示新四军皖南部队迅速渡江或先移苏南待机北上，但项英迟疑犹豫至12月末，在敌军加强长江封锁、顽军行将完成围歼我军的部署时，才下决心转移。再次，选择了错误的行动方向和路线。党中央要求新四军皖南部队直接渡江北移，或经苏南北移，这样就可以避开顽军重兵堵截，然而，项英错误地决定向南行动，企图绕道三溪、旌德，经天目山麓转移至苏南，从而陷入顽军的重围，导致部队遭受重大损失。

第三节 华北敌后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和反“治安强化运动”斗争

一、华北日军的企图，我军的方针和任务

(参见附表 24)

敌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和派遣军总部的作战计划，于 2 月下旬下达 1941 年度的《肃正建设计划》和“剿共”政策纲要，确定仍以“剿共”为重点，要求其各部更加积极作战，迅速恢复“治安”：在作战指导上，强调必须发挥军政会民的总体力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以巩固其占领区。为加强华北方面军，敌中国派遣军从华中抽调第十七、第三十三两个师团到华北，从而使华北日军兵力达到 11 个师团另 12 个独立混成旅团约 30 万人。此外，尚有伪军 10 万余人。其部署是：以第一军所属 3 个师团和 4 个独立混成旅团位于山西地区；以第十二军所属 2 个师团和 3 个独立混成旅团位于山东和苏、皖北部；以驻蒙军所属 1 个师团、1 个独立混成旅团和骑兵集团主力位于察绥地区；以方面军直属的 5 个师团和 4 个独立混成旅团位于河北和河南北部，并以其中 2 个师团作为机动兵团，随时加强各军进行“扫荡”作战。由于敌以华北为重点，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的残酷“扫荡”、“蚕食”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因而华北敌后抗战的局势日趋困难。

在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军约有 50 万人兵力，但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同时，在“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下，又有 3 万余人公开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向我军进攻，从而加重了我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困难。

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打破敌顽夹击、战胜困难的方针和政策，结合华北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 1941 年 1 月 6 日和 2 月 26 日先后发出对敌斗争指示，指出：敌可能增加华北兵力，进行大规模“扫荡”，国内可能会发生突然事变，华北战局将比以往任何一年严重。要求八路军广泛进行交通破袭战，打破敌人的分割封锁，做好反“扫荡”作战准备，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与瓦解日、伪军，削弱敌人的力量；利用战斗间隙，加紧整训部队，提高战斗力；尽一切方法和一切努力积蓄力量；同时，全面加强根据地建设，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以利坚持华北抗战。

二、粉碎日军对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春、夏季“扫荡”

敌华北方面军为巩固占领区，确保重要资源开发地区及主要交通线的安全，于 1941 年 1 月至 6 月先后对鲁西、冀鲁豫边、冀东、冀中等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行分期分区的大规模“扫荡”。其特点是：集中兵力，统一行动，有重点地进行分区“扫荡”，并以汽车、坦克和步兵组成机械化部队，迅速

捕捉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力图围歼。

鲁西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兼鲁西军区）为打击对鲁西抗日根据地威胁较大的郟城之敌，并掩护我主力一部南下开辟巨（野）南地区，以旅主力及地方武装一部，于1月7日晚隐蔽地进入郟城和侯集之间的潘溪渡附近地区，并以一部兵力围困敌据点侯集，以诱歼郟城来援之敌。8日上午，日、伪军近200人从郟城进至潘溪渡我伏击地区，我军即对敌连续发起数次冲击，激战至傍晚，将其全歼，尔后主动撤出战斗。15日，日军第十二军以第二十一、第三十二师团及伪军各一部约1万人，在航空兵及装甲部队的支援下，由临清、济宁、菏泽、大名等地出动，分六路对以范县、观城为中心的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报复“扫荡”。教导第三旅（兼鲁西军区）决心以第七团和特务营掩护边区党政机关适时转移，以第八团在郟城西北之黄河西岸、第九团在巨野以南积极行动，配合留在中心区的部队和民兵进行反“扫荡”斗争。17日拂晓，敌乘汽车70余辆，向转移至朝城西苏村、马集地区的鲁西军区和地方党政机关以及第七团及特务营进行合击。第七团掩护军区和党政机关突出重围。特务营为拖住敌人，掩护领导机关转移，依托苏村与敌展开激烈战斗。敌人用飞机轰炸，并以坦克掩护步兵冲击，均未奏效，最后施放大量毒气，致使我特务营两个连大部壮烈牺牲。随后，敌以装甲部队纵横穿插，将鲁西根据地分割为五块进行反复“清剿”。我军则分散以营为单位，配合民兵游击队在南乐、清丰、观城、郟城地区积极打击敌人。至2月6日，敌军疲惫不堪，遂结束“扫荡”，退回原据点休整。鲁西军民迅速展开恢复根据地工作，并准备粉碎敌之再次“扫荡”。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日军在“扫荡”鲁西地区后，调集第三十五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各一部共8000余人，隐蔽集结于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沙区（内黄、濮阳、滑县之间的沙地）周围据点内，准备对沙区进行“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摧毁抗日根据地。4月11日，敌先以伪军2000余人进占内黄西南之茨藩、杨文城等地，其他各路敌军则秘密地向我根据地边缘区推进。13日，第二纵队以主力向占据杨文域的伪军发起围攻。战至15日拂晓，在该敌即将被歼之际，日军突然分别由五陵集、大堤口、许村、蔡村等地出动，对沙区进行“扫荡”。第二纵队针对突变的敌情，决定采取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和内外线结合的作战原则，进行反“扫荡”作战。当即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部队和民兵在内线坚持斗争，纵队机关率主力分两路突围，利用沙丘、枣林，巧妙地穿插于敌之间隙中，当晚转移至观城地区，并在外线不失时机地猛烈攻击敌守备薄弱的据点，配合内线部队作战。敌合围扑空后，即进行反复“清剿”，实行“三光”政策，烧毁南张堡、薛村等140多个村庄，屠杀群众3400余人，并在中心区的15个村庄砍伐群众赖以生活的枣树5万余株，使我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敌之暴行激起我根据地军民更大愤慨。坚持内线的部队和民兵游击队遂集中一部兵力，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先后给分散“清剿”之敌以沉重打击。南张堡民兵模范班依托村落，毙伤敌40余人。转入外线的主力部队，袭扰敌清丰县等据点，毙伤敌700余人。在我内外线军民打击下，敌于20日全部撤退。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立即组织力量救济被难群众，恢复社会秩序，继续坚持抗战。

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军为确保华北与东

北的交通走廊，于1941年1月，以第二十七师团一部和伪军共3000余人，对冀东抗日根据地丰润西北的鲁家峪进行“扫荡”，将九沟十八峪洗劫一空。25日，敌又从迁安、滦县、遵化和丰润等据点纠集1500余人兵力，突然包围丰润东北的潘家峪，首先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尔后以机枪和火烧，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5月29日，敌又以第二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各一部以及伪军共4万多人，东起三屯营，沿滦河至北宁路南的滦县，北沿长城的喜峰口、马兰峪、兴隆、镇罗营等地，南至北宁路的唐山、东坨子头，对我冀东地区形成包围。然后由东向西、由北向南对冀东根据地进行“扫荡”。冀东军分区领导机关及所属部队，先后被压缩至玉田以南杨家套和杨家板桥等狭小地区。6月1日，军分区部队开始向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突围。经过艰苦作战，毙伤日、伪军800余人，部队大部突出重围，一部转移至丰（润）滦（县）迁（安）地区，一部转移至平北地区，在外线打击敌人。未突围的部分机关和部队则采取分散隐蔽行动，率领广大群众，利用村落、青纱帐，发挥我军对地形熟悉、行动隐蔽的特长，灵活机动转移，与敌人兜圈子，并不断袭击敌人，使敌人到处扑空，消耗、疲惫敌人，配合外线部队作战。7月初，敌疲惫不堪，遂撤退休整。冀东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立即整理部队，发动群众，恢复社会秩序，健全政权和群众组织，开展恢复根据地的工作。

敌人在“扫荡”冀东期间，还对地处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的冀中第十军分区进行“扫荡”。6月10日，日军第一一师团主力和第二十一、第二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2万余人，分别由保定、固安、安新、新城等地出动，采取四面包围，逐步压缩的战术，向大清河以北地区节节进逼。第十军分区部队，以分散的游击战与敌周旋，15日转至容城以西地区。敌随即跟踪追击，对我军进行第二次合围。因敌众我寡，再战不利，第十军分区除留少数部队坚持斗争外，机关及主力部队即转移至白洋淀附近地区，并在以民兵组成的白洋淀水上“雁翎队”的配合下，利用湖泊、水荡、芦苇草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时而水上，时而陆地，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此后，敌人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反复“清剿”，并在许多地区建立了伪政权，使第十分区大部变为游击区和敌占区。8月，第十军分区部队重新进入容城地区，积极打击敌人，摧毁伪政权，恢复了这一地区抗日斗争。

由于鲁西、冀鲁豫、冀东和冀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齐心协力，奋勇作战，终于粉碎了敌春、夏季“扫荡”，挫败了敌消灭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的图谋，保存了抗日力量，坚持了平原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三、开展反封锁、反“蚕食”斗争

日军为摧毁或缩小我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自1941年将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三种地区，计划在3年内逐步实现其变“准治安区”为“治安区”，变“未治安区”为“准治安区”，最后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企图。为实现这一企图，敌首先大力增修铁路和公路，并在铁路和主要公路两侧挖封锁沟，筑封锁墙，特别在平汉路北段两侧各10公里地带，构筑了长达500公里的封锁沟，以切断北岳、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与冀中、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断绝山区根据地的经济来源。与此同时，在平原抗日

根据地沿纵横交错的公路大量增设据点，三里一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形成“格子网”状，并严加封锁，切断相互联系。尔后，在分割封锁基础上，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边沿蚕食”和“跃进蚕食”。所谓“边沿蚕食”，即在抗日根据地边沿工作的薄弱地区或游击区，事先潜入特务，建立秘密汉奸组织，待时机成熟时，即突然乘虚而入，建立据点和封锁线，成立伪政权，使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变为敌占区。所谓“跃进蚕食”，即以“扫荡”为先导，在抗日根据地内部安设据点，然后依托据点逐渐向外扩张，变抗日根据地为其占领区。

为了打破敌依托交通线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和“蚕食”，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6日发出关于开展交通战的指示，指出：凡对我有害的道路，必须彻底破袭之；凡为敌必争，而我又无力控制者，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凡是我方需要通过的交通线，不可破坏，以免引起敌之注意，加紧封锁，而不便我通过。

由于敌人实行封锁和“蚕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出现退缩局面，特别是冀中、冀南、冀鲁边及鲁西等平原根据地退缩得较为严重。6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冀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对敌之“蚕食”政策，“若不予以击破，则我在平原将困难立足。”“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对被“蚕食”的地区，应多采用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要加强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引导其在适当的范围内为我服务；另一方面，抗日团体及政权组织，应采取隐蔽的方式，注意保存自己。《指示》还强调要健全由当地干部领导的、与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地方武装，以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遵照上述指示，采取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自卫队相结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开展广泛的分散的群众住反封锁、反“蚕食”斗争。

冀鲁豫军区部队于3月间对南乐、清丰、内黄、濮阳、滑县之间的许多公路展开破袭战。八九月间，又以教导第三旅和第四军分区部队连续袭击聊城、东阿之间的七级、官门和周庄等敌据点，并给由聊城向外“蚕食”之敌以严重打击。在此期间，冀中南下支队在冠县、堂邑、莘县地区连续攻克敌10个据点，并在清丰、南乐、观城间破路填沟，打击了封锁和“蚕食”之敌。教导第七旅与第七军分区部队共同恢复了东明、菏泽间的五坝地区。

冀南军区部队，于5月上旬以新编第七、第八旅及各军分区部队并动员7万群众参加对冀南各主要公路展开五昼夜的大破袭战，切断了敌之交通线，打破了敌之封锁与“蚕食”计划。

太行军区以第三八五旅、新编第一、第八旅及地方武装一部，于8月31日发起邢（台）沙（河）永（年）战役，对平汉铁路两侧敌封锁线进行了持续三昼夜的破袭战，一度攻克南和、沙河两县城，攻克据点8处，摧毁碉堡53个，歼敌1300余人，打破了敌之封锁，保持了山区同平原的交通联系。与此同时，太岳军区还对同蒲、白晋铁路进行了破击，打击了封锁、“蚕食”之敌。

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军民于3月间，在平山、建屏、井陘地区摧毁了100多个村的伪政权；4月，袭击涞源县城及紫荆关等敌军据点，并破坏了敌之修路计划；5月，在易县、井陘、行唐等地，又先后攻克19个敌军据点。为进一步扭转根据地被敌分割、封锁和“蚕食”的局面，北岳区各军分区在统

一部署下，对敌之公路、封锁沟进行大破袭。至8月上旬，破坏了涞源、易县、徐水、唐县、平山等地区的许多公路和封锁沟，并攻占了一些碉堡据点，使北岳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有了初步好转。

冀中区军民于7月中旬至8月底，乘青纱帐发起反“蚕食”作战，破坏敌公路、铁路共150多公里，攻克据点碉堡多处，打开了青县、大城、任丘、高阳等地区的局面。9月上旬至12月下旬，冀中区又动员40多万群众对敌占公路和铁路进行大破击，破坏公路、铁路近400公里，平毁封锁沟100多公里，毁碉堡近40个，有力地打击了封锁、“蚕食”之敌。

山东、晋西北根据地军民，在反封锁、反“蚕食”斗争中，以主力部队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积极打击敌人，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为打破敌之封锁、“蚕食”，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除开展军事斗争外，还根据八路军野战政治部5月2日发出的关于抓索时机继续开展政治攻势，派出小部队接近敌据点，进行武装宣传的指示精神，于七八月间普遍组织了由党、政、军基层骨干组成的武装宣传队进入敌占区，开展以“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攻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组织的武装宣传队，经常跨过封锁沟向日、伪军进行宣传。第三八六旅组织的武装宣传队，在襄垣、潞城地区，全部摧毁了距敌据点十里以外的伪组织。冀南军区组织的武装宣传队，向敌占区散发宣传品39万份，瓦解了不少伪军、伪组织，争取了大量同情分子，并以他们作内应攻克了近30个敌据点。第一二师直属队及独立第一、第二旅，分别组织武装宣传队赴祁县、太谷、清水河、和林格尔等地区，开展对日、伪军工作，发动与组织群众破路填沟，镇压汉奸，并在宁武、崞县、神池、朔县之间恢复了200多个村的抗日政权。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大力开展政治攻势，有力地推动了瓦解日伪军的工作，被我争取的伪军、伪组织比1940年增加了2倍。武装宣传队是在新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及斗争形式，它对瓦解日伪军和伪组织、打破敌之封锁和“蚕食”起了重要作用。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一年的反封锁和反“蚕食”斗争中，由于实行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攻势相结合，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因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效地制止了敌之封锁和“蚕食”。

四、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

德国法西斯在侵占西、北欧之后，于1940年下半年转兵东进，至1941年四五月间，即侵占了巴尔干半岛和北非部分地区。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片面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背信弃义地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2000多公里的战线，对苏联发动了突然的、闪电式的大规模进攻。苏联军民在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领导与指挥下奋起抗战。苏德战争的爆发，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反法西斯同盟国阵线进一步扩大和加强。

苏德战争爆发后，6月24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明确日本的方针是：无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帝国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并为解决“中国事变”而努力；同时，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继续向南方扩展；此外，要根据形势的演变，“解决

北方问题”。7月2日，这一“纲要”经御前会议批准付诸实施。据此，日军一方面加强对苏战备，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向我国东北调集大量兵力和资材，使关东军增至70万人；另一方面，加紧南进准备，并于7月5日编成第二十五军，执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使命。25日，该军由我国海南岛三亚港起航，28日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从而，使日、美矛盾进一步尖锐化。26日，美、英、荷三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在各该国家的资产。8月9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帝国陆军作战纲要》中宣布，放弃北进企图，专心注意南方，并以11月底为限，完成对英、美的作战准备。9月6日，在经御前会议批准的《帝国国策实施要点》中，最后定下如美国不接受日方条件，就立即对英、美开战的决心，并将完成开战准备时限提前到10月下旬。

为了稳定南进的后方，建立巩固的“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令其中国派遣军“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方案”，加紧对中国占领区的“治安肃正”作战。

五、粉碎日军对山区抗日根据地的 秋、冬季“扫荡”

敌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和派遣军总部关于适应形势演变，加紧占领区的“治安肃正”作战，将华北建设成为南进的巩固后方的指令和年度的“治安肃正”计划，决心继上半年“扫荡”我平原各抗日根据地之后，重点“扫荡”我山区各抗日根据地。其特点是，以其机动兵团及由各地抽调的兵力，构成暂时的局部的兵力优势，在方面军或军的统一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清剿”，进行较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残酷“扫荡”，力图围歼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使我军失去生存条件。

为粉碎敌之“扫荡”，八路军总部于6月21日发出关于加强反“扫荡”作战准备的指示，指出：敌有可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分区“清剿”、企图彻底消灭我军；“各部应速侦察该区四面各据点敌调动情形、兵力（并派得力干部查明报告本部），以后应经常注意侦察敌人动态”，当敌“集中极优势兵力向我某一地区进攻时，该区之部队应尽一切方法取得外围之配合，同时加强技术的准备，多制地雷、炸车毁路器具，只有如此，才不致被敌各个击破”。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遵照上述指示，进行了反“扫荡”准备，积极开展反“扫荡”斗争。

粉碎敌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 平西地区的“扫荡”

（参见附图39）

敌华北方面军于7月9日发出“扫荡”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命令，但由于受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影响，而推迟进行。8月中旬，敌在晋察冀根据地周围集结日军6万亲、伪军万余人，并区分为“进攻兵团”和“封锁兵团”，由新上任的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统一指挥，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清剿”等战法，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平西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其部署是：“进攻兵团”分为甲、乙、丙3个兵团。甲兵团以第二十一师团

1个联队为主配置在北平附近，乙兵团以第一一师团1个旅团为主配置在石家庄附近，丙兵团以第三十三师团为主配置在束鹿附近。“封锁兵团”由华北方面军直属部队及第一军、驻蒙军各一部组成，分别在平汉路北段、正太铁路全线、同蒲铁路北段及涞源、广灵、灵丘一线，对北岳、平西区构成封锁包围。另以第一军3个步兵大队和第十一装甲列车队主力为预备队，配置于石家庄地区。此外，还以飞行团支援作战。

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和敌情变化，于7月22日发出反“扫荡”准备工作的训令和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全区广泛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做好长期反“扫荡”的思想准备，加强战备，组织群众坚壁清野；要求各军分区加强对各级武委会的领导，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袭击敌深入根据地内的据点，破路填沟；并组织坚强的武装宣传队，同敌人展开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斗争，打击敌之别动队。北岳、平西区军民根据上述指示，加紧进行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

8月14日敌开始“扫荡”，对晋察冀军区部队实行“铁壁合围”，我军展开第一阶段的反“扫荡”作战。日军为了隐蔽其“扫荡”北岳、平西的企图，麻痹我军，首先以甲兵团“扫荡”平北根据地古北口、密云地区；以乙、丙兵团“扫荡”冀中地区深泽、安平、无极、安国等地区。同时，以“封锁兵团”两万余人对北岳、平西区实施封锁包围。晋察冀军区察明敌之动向后，于8月21日发出作战命令，要求各部队继续完成反“扫荡”准备工作，严密组织对敌之纵深侦察，防敌突然袭击。

敌在对平北和冀中地区“扫荡”后，突然于8月23日将“扫荡”重点转向北岳和平西地区。敌甲兵团3000多人，由红煤厂、涿县、涞水等地分三路向平西十渡地区围攻；乙兵团8000多人，由定兴、方顺桥等地分三路向北岳娄山、水泉地区围攻；丙兵团及其他部队共1.5万多人，由新乐、正定、井陘等地分三路向位于陈家院、陈庄地区之中共晋察冀分同等机关围攻。另以封锁部队5000余人，由马家庄、东峪、上庄等地出动，配合丙兵团向位于蛟潭庄、湾子里、六亩园之晋察冀军区机关围攻。当各路“扫荡”之敌对我形成合围之际，晋察冀军区为避敌锐势，保存力量，遂以主力一部结合地方武装留在原地，开展广泛、分散的游击战，与敌周旋，以消耗、疲惫敌人。边区党政军机关迅速转至阜平西北的马驹石。主力部队则按预定计划进至平汉、正太铁路和进攻之敌的侧后，对敌交通线、据点进行袭击，在敌必经的干河、劳山、温塘等地伏击或阻击，突然开火，速战速决，杀伤敌人。这样，把内线的“拖”与外线的“打”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给敌以沉重打击。敌合围扑空后，于31日以甲兵团6000多人分六路合击位于蓬头、小峰口的我平西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我先期转移，敌再次扑空。与此同时，敌乙、丙兵团等部共5万人，对转移至阜平地区的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进行大规模合围。由于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人员近万，行动不便，未能适时跳出敌之合围圈，陷于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35公里的狭窄地区内，处境非常危急。为迷惑敌人，以便突围，9月1日黄昏，军区首长派出侦察分队携带电台到阜平东北的台峪地区，采取声东击西、制造假象、迷惑敌人、隐蔽自己行动企图的办法，以“军区呼号”与各方联系，造成敌人判断错误，以利我各机关转移。2日下午，敌果以7000余人的兵力向台峪合击，并以飞机对台峪轮番轰炸。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一部，即乘机于当晚向阜平以西隐蔽转移，进至常家渠一带山区，同时中断与各方的无线电联络，并不

准烧火做饭，靠当地人民群众供应红薯、瓜果充饥，从而在敌重兵包围中成功地隐蔽了5天。7日，军区领导机关安全转移至平山县的东西文玉地区继续指挥反“扫荡”作战。至此，敌围歼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的计划彻底破产。

9月4日，敌转入分区“清剿”，我军展开第二阶段反“扫荡”作战。敌“进攻兵团”各部以大队或中队分驻各要地，在“封锁兵团”一部配合下，一面搜剿我军，破坏地方组织，捕杀人民群众；一面有组织地摧毁抗日根据地和掠夺物资。为粉碎敌之“清剿”，晋察冀军区于7日和15日先后发出指示，要求所属各部一面集结主力一部，打击敌之运输队，消灭搜剿之敌；一面采取分散的游击战，打击日、伪军和伪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同时，要求地方武装和民兵。以游击战掩护群众收割、保藏粮食，保卫秋收。北岳、平西地区军民遵照上述指示，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自19日至23日，第二军分区一部在古树台伏击向六亩园前进的敌人，第四军分区特务团伏击由马蹄沟向古玉树前进的敌人，军区教导团伏击由温塘、城南庄出动的敌人，第四、第五、第六团各一部分分别在王家坪、红岭子、大悲、新言村等地伏击、袭击敌人。在这些战斗中，共歼敌600多人。24日，敌3000余人分多路搜剿涞源、易县、徐水、满城之间的狼牙山区。当晚，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奉命掩护4个县的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25日拂晓，第七连第六班5名战士将敌诱至狼牙山绝境，与敌拼搏，先后打退敌4次冲击，毙伤敌90余人，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和手榴弹，誓死不屈，最后英勇跳崖，3人牺牲，2人负伤脱险，后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在此期间，我军转入外线的部队。深入北平西郊和宣化、涿鹿、怀安等地打击敌人，有力地策应内线部队作战。与此同时，晋西北、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和冀中、冀东军民，遵照八路军总部指示，对平汉、同蒲、正太、北宁等铁路的部分路段展开破击战，袭击敌人据点，破坏敌人交通，有力地配合了北岳和平西地区的反“扫荡”作战。

在我军打击下，华北方面军被迫于9月24日下令进攻北岳和平西地区的日军撤退。晋察冀军区各主力部队迅速集中，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袭击、伏击、追击撤退中的敌人。在连续20多天的作战中，先后进行了山阳庄、赵家岔、黑水坪、蛟潭庄等战斗，给敌以有力的打击。至10月16日，日军大部撤退。

北岳、平西地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历时两个多月，在友邻部队的有力支援下，共作战800多次，歼敌5500多人，粉碎了敌人消灭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图，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我军伤亡2000余人，人民群众伤亡4000余人，房屋被烧毁15万余间，粮食损失6000余万斤，给根据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

粉碎敌对太岳、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1941年6月，日军在中条山战役击败国民党军后，控制了晋南地区。八路军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为打击侵占晋南地区的日军，于8月初以第三八六旅和决死第一纵队各一部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在活动于浮山、安泽以南地区的太岳军区第二一二旅策应下，进入临屯公路以南、沁河以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开辟了抗日根据地。敌为驱逐我军，于9月20日以第三十

六、第四十一师团各一部及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主力共 2 万余人，向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太岳南进支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小部队与敌周旋，疲惫、消耗敌人，主力部队主动转移，避免与敌拼消耗，使敌接连扑空。10 月 2 日，敌“扫荡”结束。3 日，“扫荡”太岳南部地区的日军和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各一部约 3 万人，开始对我太岳北部根据地进行“扫荡”。我岳北军民预有准备，彻底进行了坚壁清野，并分遣干部加强对各区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指挥，坚持内线游击战，主力则转到外线在安泽、沁源等地连续打击敌人。同时，以地方武装一部在同蒲铁路平遥、灵石段开展破袭战。至 18 日，日军被迫退出我根据地。太岳纵队坚持了岳南和岳北抗日根据地，为尔后向中条山区发展创造了条件。

10 月，日军采取“捕捉奇袭”的战术，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消灭我军领导机关。31 日夜，敌第三十六师团一部 4000 余人，由潞城、襄垣等地出动，夜袭第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赤岸和八路军总部驻地西井等地。11 月 3 日，敌独立混成第四旅团 2000 余人，分别由辽县、武乡出动，奔袭大有、贾豁、宋家庄等地。由于我顶有准备，敌在“扫荡”开始即遭我军民的麻雀战、地雷战的有力打击。6 日，北路敌军窜回武乡，南路敌军撤至黎城。9 日，退集黎城之敌又奔袭黎城北黄崖洞、水腰地区八路军后方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山险，以刺刀、手榴弹与敌进行肉搏，连续打退敌数十次冲击，经过八昼夜奋战，杀伤敌 800 余人。16 日，特务团主动转移，兵工厂被敌摧毁。为配合总部特务团作战，第一二九师以 4 个主力团在进犯水腰之敌的侧后不断袭击敌人，迫使敌军于 20 日夜退至潞城。至此，历时 20 多天的人行区军民反“扫荡”作战即告结束。

粉碎敌对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参见附图 40)

敌华北方面军为消灭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鲁中沂蒙山区根据地，于 9 月中旬至 10 月上旬，首先对沂蒙山区周围的泰山区和鲁南的郯城、码头地区进行“扫荡”。同时，抽调第二十一、第三十三师团和第一军第三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第九旅团各一部，加强第十二军，以增强其驻山东地区的兵力。

为了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加强山东地区的军政领导和统一作战指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9 月 13 日的指示，山东纵队、第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山东纵队归第一一五师首长指挥。10 月 7 日，山东军政委员会根据敌对鲁中“扫荡”的动向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全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全面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取内外线斗争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反“扫荡”作战。13 日，第一一五师也发出反“扫荡”作战准备的指示，要求军区、军分区应立即划定地方武装及游击小组的作战地域；领导机关应有计划地分散，加强反“扫荡”斗争的领导；主力部队应灵活地袭击敌之翼侧和后方交通线与据点；我军后方兵工生产及各种机器，应准备随时分散隐蔽。

10 月下旬，敌第十二军得到加强后，即集中 5 万亲入兵力，准备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其部署是：以第三十二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

旅团主力配置于新泰、蒙阴、平邑、费县地区；以第二十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五、第六旅团主力配置于沂水、莒县地区；以第十七师团主力、第三十二师团一部配置于临沂地区。从而，对鲁中沂蒙山区构成合围态势。

针对敌之“扫荡”企图，山东军政委员会于11月2日决定：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直属队，适时转移至鲁南地区；山东纵队直属队转向泰山区；山东纵队第一旅主力转向敌合围圈的外围，待机作战；抗大一分校转向泰安、泗水、宁阳地区；鲁中军区及各军分区和县区武装就地领导民兵坚持斗争。活动在鲁中区附近的教导第一旅和山东纵队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旅等部，分别在滨海南部和北部、胶济路沿线及新泰以东和烟台一带，对当面之敌开展攻势，配合沂蒙山区的反“扫荡”作战。

11月2日晚，蒙阴、沂水、莒县之敌秘密出动，4日拂晓，偷袭山东纵队指挥机关的驻地马牧池。山东纵队指挥机关遂分散向东转移至南墙峪，复遭敌合围，经激战后，转移至新泰西南之石莱一带，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5日黄昏，敌以2万余人兵力，分多路向位于临沂以北孙祖、留田地区的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等领导机关进行合围，并以重兵由北向南进攻。同时，根据以往“扫荡”时我军多向滨海地区转移的规律，在沂河沿岸河阳、葛沟一带预伏重兵，布成口袋，企图待我东移时予以围歼；在西面津浦路上，构筑碉堡，加强戒备，防我西撤。第一一五师决定向西南方向突围，转移至敌兵力较为薄弱的费县东北地区。5日黄昏，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等领导机关5000多人，在仅有1个营兵力的掩护下开始突围。6日拂晓，顺利地由留田西南铁山子附近在敌之1公里半的间隙中迅速隐蔽地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接着，又在敌之两公里半的间隙中隐蔽地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安全到达蒙山南端的护山庄地区，从而跳出敌之合围圈。这次突围成功，使我军由被动变主动，由内线变外线，改变了不利态势。当时，随队突围的国际友人、德国记者希伯曾热情称赞这次突围是“无声的战斗”，歌颂突围指挥的神奇。敌在合围扑空后，即以一部兵力在我根据地内建立临时据点，其主力则继续寻找我军决战。我军除鲁中军区遭受部分损失外，其他部队均安全转移。

12日，敌开始分区“清剿”，将沂蒙山根据地划分为4个“清剿”区，并以南墙峪、孙祖两区为重点。敌每“清剿”一地，即挨户搜查根据地的党政干部和失散人员，捕捉壮丁，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许多村庄被烧毁，仅马牧池村即遭敌3次纵火，全部房屋化为灰烬。同时，敌还赶修临时公路网，分割根据地，以限制我军机动，为其长期控制沂蒙山区作准备。

为粉碎敌之“清剿”，保卫根据地，第一一五师除令教导第二旅、山东纵队第二旅主力在外线滨海区积极破袭敌公路、据点外，山东分局和师部又率山东纵队第二旅、蒙山支队、抗大一分校各一部返回沂蒙基本区，配合当地游击队和民兵，打击敌“清剿”分队，镇压汉奸，支援广大群众在内线坚持斗争。14日，敌集中7000余人，反复合击蒙山西部地区。为判明敌人的“扫荡”动向，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领导机关进至东西蒙山之间的大谷台。17日午后，敌从空中侦察发现后，即对大谷台进行合击。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领导机关遂东越临（沂）蒙（阴）公路进入沂蒙山基本区的北村，指挥年线部队在垛庄、绿云山等地以伏击、袭击、阻击等战术打击分散“清剿”之敌。同时，抽调大批干部分赴各地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30日，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领导机关转移至大谷台以南大青山时遭敌合击，突出合围圈后，12月4日，又在大青山附近瓮城子一带遭敌合击。为了保障安全和

不间断地指挥作战，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领导机关遂再次转向外线，进入天宝山区。内线作战部队，由返回坦埠地区的山东纵队统一指挥。

12月上旬，敌第十二军除留少数部队建立据点，扶植伪军，巩固其占领区外，以部分兵力分别对天宝山区和滨海区进行“扫荡”，以掩护其主力撤退。我军即以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不断袭击残留在根据地内的敌人。23日，敌主力分路撤退，我军乘机收复蒋庄、朱满、大桥、马牧池等村镇。至28日，基本上恢复了沂蒙山区根据地，反“扫荡”作战即告结束。

在将近两个月的反“扫荡”中，我军共作战150多次，歼敌2000余人，粉碎了敌消灭我领导机关的企图，坚持了根据地的斗争，但我军民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我军伤亡1400多人，群众被杀害和抓走的达1.4万余人，被抢走粮食160余万斤。

六、反对敌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华北日军在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蚕食”的同时，还进行“治安强化运动”，作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1年3月30日至4月3日，敌进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是在其占领区内，整顿和加强伪政权和伪组织，扩充伪军，建立与扩大乡村自卫团，清查户口，实行保甲制，以破坏我地下组织，搜捕我工作人员，并加强对占领区内人民的经济掠夺。

7月7日至9月8日，敌进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实行剿共、巩固治安”为方针，继续加强与扩充伪军、伪组织，扩充与加强乡村自卫团，搜剿我地下组织，并增修公路，挖封锁沟，进行分割封锁；同时，以县警备队等汉奸武装对根据地进行小规模军事进攻。为粉碎敌人这次“治安强化运动”，我军除以地方武装和民兵打击敌人的军事进攻外，主要是派出大量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镇压汉奸特务，开展政治攻势，瓦解伪军伪政权，揭露敌人的阴谋。第一二九师派出59个武装宣传队，携带50万份宣传品，进入敌占区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晋西北各军分区分别组织二三个武装宣传队由各团抽1个连的兵力配合，深入敌占区开展了连续1个多月的政治攻势，共散发宣传品30万份，并在宁武、崞县、神池和朔县地区恢复了210多个村的公开或秘密的抗日政权。晋察冀军区，派出由敌工部、侦察分队、各县公安局及游击队等组织的武装宣传队，专门打击敌人的别动队，使敌不敢远离据点活动。山东我军大力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争取了许多伪军、伪组织暗中为我服务。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下，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遭到破产。

11月1日至12月25日，敌进行以“经济战”为主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一面在其占领区内实行配给制，推行计口售粮、计口售物，强征房、地捐等各种苛捐杂税，加紧对钢、铁、粮、棉等战略物资和其他物资的掠夺；一面利用铁路、公路和封锁沟实行彻底的经济封锁，断绝根据地物资的来源，切断山区和平原根据地之间的物资交流；同时加紧对根据地内物资的掠夺和破坏，实行垄断贸易，控制市场，禁止边币（根据地抗日政府发行的货币）流通，妄图从经济上窒息根据地，摧毁抗日军民的抗战意志。

为了粉碎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统一领导下，同敌人针锋相对地展开了一系列反经济封锁的斗争。一方面以武装宣传队到敌占区和游击区展开政治宣传，揭露敌人实行配给制、进行经济掠夺和经济封锁的阴谋，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一方面以地方武装带领广大群众开展以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群众性的反封锁斗争。在根据地边缘区，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封锁沟墙，保证我方所需要的各种物资能够输入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则加强金融和市场管理，打击伪钞，提高边币地位，加强内外贸易，执行正确的商业政策，秘密购进敌占区的医药和通信器材等物资，加强出入根据地物资的管理，严禁由敌占区向根据地输入奢侈品和非必需品，严禁粮、棉、油等重要战略物资流入敌占区。在夏、秋收获季节，号召并组织群众快收、快打、快藏，打击敌人的武装掠夺和利用奸商套购我根据地物资的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经济建设，增强我根据地的经济实力。经过艰苦斗争和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终于粉碎了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是华北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一年。由于敌人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对根据地及边缘区进行“蚕食”和封锁，推行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特别是对平原和山区根据地的“扫荡”，由分进合击发展到“铁壁合围”和“梳篦清剿”，其时间之长，连续性和残酷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此严重的情况下，我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八路军兵力下降，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但是，华北敌后军民，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经过艰苦奋战，粉碎敌人千人以上的“扫荡”69次、万人至7万人的大“扫荡”9次，以及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初步打破了敌人的“蚕食”和分割封锁。同时，八路军的军政素质得到了提高，地方武装及民兵得到了扩大，从而促进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保卫了根据地的基本区，坚持了敌后抗战，为1942年继续战胜困难，扭转不利局面创造了条件。

第四节 粉碎敌顽夹击，坚持华中敌后抗战

1941年，敌中国派遣军总部为确保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和水陆交通线，巩固华中占领区，以第十一军所辖7个师团另3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武汉、信阳、九江地区；以第十三军所辖3个师团另4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长江下游苏、皖、浙等省，重点加强京、沪、杭地区的守备。其在华中的总兵力共26万余人。经常与新四军作战的有11万人。此外，还有伪军16万人。这些敌军依托据点和交通线，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和“清乡”。

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事变后，继续执行其消灭华中新四军的计划。以第五战区指挥第二十一、第三十一和第二十二集团军等部，分别进犯淮南、淮北和鄂豫边区等抗日根据地；以盘踞苏北车桥、曹甸地区的鲁苏战区韩德勤部，伺机向淮海区进犯，以接应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由淮北津浦路以西东犯皖东北和盐阜等抗日根据地。同时，以第三战区一部，向苏南抗日根据地进犯，并准备渡江北上，配合汤恩伯部东犯。

华中敌后抗战面临着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开始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为巩固华中敌后抗日阵地，中共中央于1940年11月1日发出《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要求中原局和新四军注意学习华北经验，要抓紧根据地政权建设，坚决实行“三三制”，根据地的各项政策要以统一战线原则为依据；要准备长期抗战，节省民力、物力；要特别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要密切党群关系、军政关系，严格军队纪律，并做好联络友军的工作；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建设。这一指示，对于巩固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41年1月下旬，发出指示，指出：“在敌顽夹击中奋斗，将是华中我党我军今后斗争的特点。一切军事上、工作上的计划，须根据这一特点来布置”；要求华中军民必须以更大的决心，以长期的游击战，坚持华中抗战。2月2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为贯彻执行中央军委所赋予的战略任务，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于4月27日至5月21日，在苏北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六中全会给我们发展华中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巩固发展”。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的决定，5月20日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并成立了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和华中军分会书记。5月下旬，华中军分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陈毅所作关于建军问题的报告，提出加强政治思想和军事工作、建设一支正规化党军的任务；同时作出建立军区、军分区和加强地方武装的决定。

一、讨伐伪军李长江部。粉碎日军对盐阜、苏中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讨李战役 新四军东进黄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打开了苏北抗战局面，威胁着日军占领区的安全。日军第十三军决定以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主

力和第十七师团一部，对盐阜、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消灭该地区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并威逼利诱国民党军鲁苏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投降。1941年1月中旬，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一部由泰兴进占黄桥镇，并加紧对李长江部诱降。新四军为团结李长江部共同抗日，对其大力进行争取工作；同时，在军事上也作了准备，一旦该部公开投敌，即抓住时机，予以歼灭。2月13日，李长江在日军利诱下于泰州率部公开投敌，编成伪第一集团军。

为讨伐伪军李长江部，隐蔽集结于海安地区的新四军第一师，于2月18日发起讨伐李长江部战役。该师沿海（安）泰（州）公路向西进攻。在取得姜堰（今泰县）和苏陈庄等战斗胜利后，以第一、第二、第三旅分左、中、右三路继续进击，20日攻克泰州。李长江率残部向泰州以西界沟、塘头等地溃逃，第一师分路追歼逃敌，俘获人枪600余，残敌分途逃窜。是役共俘李部官兵5000余人，并争取其两个支队反正。日军为援救伪军李长江部，分别由扬州、高邮、如皋等地出动，乘虚侵占海安、东台，并向泰州急进，对新四军第一师进行“扫荡”。为争取主动，第一师于21日撤离泰州，转入敌后进行反“扫荡”作战，并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动员与组织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四月间，我军发动攻势，连续作战半个月，先后攻克古溪、蒋垛、苏陈庄、大泗庄及老庄头等日伪据点。

盐阜、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参见附图41）6月6日，新四军军部发出准备粉碎日军大规模“扫荡”的指示，指出：敌为配合蒋介石反共行动，并乘夏收破坏我根据地，有向我进行大规模“扫荡”的征候。其特点将是突然的分进合击，而突击的主要目标，将是我华中党政军领导机关。因此，各部必须加强反“扫荡”作战准备，要周密组织侦察，掌握敌军动向；深入动员群众抢收夏粮和坚壁清野；党政军领导机关应速作分散隐蔽部署，选择一两个偏僻和群众基础好的地区，以备疏散转移之用；主力部队应适当分散，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避免过早与敌作正面的决战；地方武装应以连排为单位，准备广泛袭击疲惫敌军。根据军部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及时进行了反“扫荡”作战的各项准备。

7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和第十二军第十七师团一部及伪军李长江残部，集结于东台、兴化、盐城以西的射阳和陈家洋等地，准备对盐阜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歼灭新四军领导机关，摧毁抗日根据地，并夺取产盐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立即进行反“扫荡”部署：以第三师第七旅于建阳、湖垛和秦南仓之线，打击由射阳、兴化方向来犯之敌；以第八旅主力于东沟、益林和盐城以北地区，牵制由陈家洋南下之敌，并监视顽军韩德勤部的行动；以第一师第二旅位于盐城以南地区，阻止敌由东台北犯；以第一师主力在苏中地区牵制当面之敌，配合盐阜区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同时，在盐阜、苏中两区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破坏道路。新四军军部为便于指挥，于10日撤离盐城，后转至阜宁以西的陈集地区。

7月20日，日伪军1.7万余人由东台、兴化、射阳和陈家洋出动，合击盐城。我军即按上述部署，以阻击、袭击和伏击等手段，予敌以杀伤后，分别转向来犯之敌侧后的刘庄、大中集（今大丰）和陈集、板湖等地。22日，日军侵占盐城后即对周围地区进行“清剿”，并控制水陆交通要道，实行分割、封锁。在水网地区使用特制装甲汽艇到处搜索，寻歼新四军军部和主力

部队。由于我军先期分散转移，敌连连扑空。28日以后，日军重点转向对阜宁、东沟、益林地区“扫荡”，并占领阜宁县城。新四军军部当即令第七旅尾击进犯东沟、益林之敌，配合第八旅作战，同时于建阳、湖垛间打击敌之增援部队；令第二旅在盐城以南伍佑、大岗、秦南仓地区分散游击，牵制敌人。各部遵照军部命令立即行动，第七旅在东沟、益林和湖垛地区歼敌数百人，并利用自制触发式和引发式水雷，击毁敌装甲汽艇多艘。第二旅破袭盐城至东台的交通线，断敌补给。

为配合盐阜区军民反“扫荡”作战，第一师主力在苏中地区向当面之敌发动攻势，袭击泰兴、靖江、如皋、南通地区的十几个日伪军据点，围困泰州、泰兴城和姜堰，相继攻克蒋垛、黄桥、古溪、季家市等地，歼敌千余人，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日伪军，陷敌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

8月初，日军将“扫荡”盐阜地区的大部兵力转向苏中地区进行报复“扫荡”，先后侵占马塘、栟茶、李堡等地。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展开反“扫荡”作战，除一部就地坚持外，主力向北转移至三仓河地区。第一旅破坏泰兴至黄桥公路，并袭击沿线日伪军各据点，策应第三旅之反“扫荡”作战。与此同时，第三师和第一师第二旅等部，对当面之敌发起反击，先后收复阜宁、东沟、益林、大中集、裕华镇等重要集镇，使盐城之敌极为恐慌，被迫将“扫荡”苏中之兵力撤回，以保守其在盐城附近的占领区。

盐阜、苏中区军民在新四军军部的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相互策应，使敌顾此失彼，对粉碎敌之“扫荡”起了决定性作用。至8月底，敌之“扫荡”被彻底粉碎。在1个多月的反“扫荡”中，我军共作战130余次，歼敌3800余人，击沉敌汽艇30余艘。我军伤亡1000余人。盐阜、苏中区军民，经受了一次严重考验，提高了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

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 在盐阜、苏中区军民进行反“扫荡”斗争期间，淮南地区军民也连续进行了反“扫荡”作战。3月18日至25日，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一部和第六旅，在淮南津浦铁路西地区击退日伪军7000余人的进攻。4月中旬，该师第四旅和师直、第五旅各一部，在津浦铁路东向侵占天长、仪征、扬州地区之日伪军展开进攻，连克谢家集、金家集等据点，并在十二里岔全歼敌80余人。16日，扬州等地日、伪军700余人，尾随我军至樊家集。17日，敌分两路合击驻金牛山以南陈庄地区的第四旅一部。我军依托金牛山阵地，顽强抗击，经激烈战斗，毙伤日伪军500余名。敌遭痛击后，于5月下旬至6月初，由来安、滁县、天长、六合、盱眙等地出动50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向我淮南津浦铁路东根据地的中心区半塔集、竹镇集进行报复“扫荡”。第二师师直、第四旅和第五旅各一部，在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利用青纱帐、树林荫蔽自己，以阻击和伏击等手段迟滞和袭扰敌人，共作战20余次，迫使“扫荡”之敌撤退，坚持了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

二、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清乡”斗争

(参见附图42)

苏南抗日根据地处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对日军和汪精卫伪政权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京沪铁路等交通干线威胁甚大。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曾

于1月下旬至2月底，集中7000余人兵力，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茅山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经过连续作战，予敌以杀伤后，转移至太（湖）溇（湖）地区，恢复了溧阳、溧水地区。与此同时，第十八旅也在对敌、顽作战中，扩大了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无）锡虞（山）地区。

敌中国派遣军总部为彻底摧毁苏南抗日根据地，于1941年初，与汪精卫伪政权几经策划，决定在华中实行“清乡”，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分期分区进行。计划在江南进行三期“清乡”，达到逐步消灭抗日力量，摧毁根据地的目的。其具体步骤：先以日军为主，在“清乡”地区周围建立封锁线，切断我内外联系，进而反复“扫荡”，尔后以伪军、伪组织为主，进行政治、经济“清乡”，建立伪政权。5月，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自任委员长，同时在苏州设立办事处，训练警察和特务等“清乡”人员2000余人，准备对苏常太根据地进行第一期“清乡”。此后，敌即在苏常太根据地周围集结兵力，并依托城镇据点、铁路、公路和河流，利用汽车、摩托车和汽艇等进行巡逻，控制水陆交通，建立封锁线，构成包围圈，切断苏常太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将敌人这一动向误判为一般性“扫荡”，遂决定以游击战就地坚持斗争，并作出部署：以第五十四团一部与配属之警卫第二团组成东路支队，坚持苏州、太仓地区；以第五十四团另一部与第五十三团坚持无锡以北和常熟地区。

7月1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主力和伪军一部，共约1.5万人，按预定计划对苏常大地地区实施“清乡”。敌首先采取分进合击和梳篦式“清剿”，寻歼第十八旅主力及党政机关；接着，大量增设据点，并以竹篱篁、铁丝网和电网等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然后进行分区“搜剿”。同时，派出大量的伪“清乡”人员，逐乡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

在敌实行分进合击和“清剿”时，第十八旅鉴于内线活动地区狭小，周旋困难，遂令第五十一、第五十二团等部直逼江阴、无锡和苏州近郊，袭击日伪军据点，企图调动“清乡”之敌回援，但未达到目的。而留在年线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党政机关，虽经英勇奋战，终因敌众我寡，伤亡很大，仅部分突出重围。这一事实说明，在敌我力量悬殊，而斗争环境又不利于我的地区，必须不断研究敌情，采取新的对策，才能适应复杂的残酷的斗争环境。8月下旬，第十八旅一部奉命渡江转移至苏中地区。

9月初，敌集中4000余人，转向澄锡虞地区进行第二期“清乡”。第十八旅接受苏常大地地区反“清乡”的经验教训，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主力部队适时转至外线澄西地区，以少数地方武装，依靠群众掩护，坚持了原地斗争。至12月中旬，第十八旅全部奉命转移至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

在第十八旅进行反“清乡”斗争过程中，第十六旅在苏南茅山地区对敌发动攻势，连续攻克延陵镇和九里铺等据点30余处，恢复和扩大了金（坛）丹（阳）武（进）抗日游击根据地。11月28日，日军第十五师团和伪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由金坛、薛埠等据点出动，“扫荡”溧阳地区。第十六旅旅部在塘马（又名前马）由于对敌情不明，遭敌合击，虽奋战竟日，反复冲杀，毙敌数百人，但除一部突围外，兼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以下270余人壮烈牺牲。塘马战斗后，第十六旅进行了整顿，继续坚持以茅山地区为中

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在澄西、丹北、扬中地区，地方党及抗日武装也胜利地坚持了斗争，保持了大江南北的战略联系。

三、阻击顽军东犯，坚持淮北、淮南抗日阵地

1940年12月中旬，当国民党顽军汤恩伯部准备向豫皖苏边区进犯时，被我军收编的、驻永（城）萧（县）夏（邑）碭（山）地区的游杂武装耿蕴斋、刘子仁、吴信容等部，叛离我军投靠顽军，使豫皖苏边区部队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顽军韩德勤部为接应汤恩伯部东进，勾结伪军乘机占据了我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青阳（今泗洪）大部分地区，企图切断我豫皖苏边区与盐阜、淮海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了改变这一不利态势，在新四军军部统一部署下，皖东北地区部队在淮南地区部队的策应下，于1941年2月18日展开反击，经青阳和马公店等战斗，击退了顽军和伪军，恢复和扩大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保障了豫皖苏边区部队的侧后安全。

1月中旬，汤恩伯指挥第十二、第九十二军等部共9个师10万余人的兵力，进至涡河以南之涡阳和蒙城地区，企图歼灭豫皖苏边区的新四军部队。下旬，日军发起豫南战役，顽军汤恩伯部向西败退。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即令豫皖苏边区部队进攻日军侧背，援助国民党军，保卫中原。2月7日，我军主力进至阜阳、太和以东的张村铺、王市集和蒙城西南的阚疃集、江口集一线，准备继续尾敌西进。9日，进犯阜阳的日军开始撤退，同时放弃涡阳、蒙城等地。10日晨，败退至新黄河以西的顽军第九十二军和骑兵第三、第八师等部见日军撤退，即分三路向豫皖苏边区部队猛烈进攻。我军在江口集及马家店子、王圩子等地顽强抗击，但由于兵力分散，没有及时调整部署、集中兵力歼灭顽军一路，而是在宽正面上分兵把口，以致陷入被动。2月中旬，豫皖苏边区部队奉命编为新四军第四师。3月初，第四师被迫放弃涡河以南地区。4月初，顽军北渡涡河继续分路向我进攻，并策动土匪和封建会道门势力组织暴动，日伪军也乘机向淮上地区“扫荡”，第四师一面进行反“扫荡”作战，一面抗击顽军进攻。上旬，顽军约两个团兵力进犯水城西南的万楼，第四师一个营被围，苦战终日，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中旬，顽军进至北淝河沿岸龙山集、檀城集地区。此时，其第九十二军第四二五团团团长陈锐霆（共产党员）率全团在蒙城以东褚集举行反内战起义。我军乘势于4月20日集中两个团兵力，在蒙城以东大、小郭家歼灭顽军1个支队。下旬，顽军进犯更加猖狂。同时，日军也乘机不断对我军进行“扫荡”，我军处境日趋困难。25日，中原局、新四军军部指示第四师除留3个团及地方武装在津浦路西继续坚持游击外，其余主力转入皖东北地区。此后，形势进一步恶化，所留部队无法坚持，于5月间，也撤至皖东北地区。至此，除睢（县）杞（县）太（康）边和萧县等部分地区外，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大部为顽军所占。

第四师到达皖东北（后扩大为淮北苏皖边区）地区后，遵照华中局的指示，于7月中旬在洪泽湖西南仁和集召开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肯定了部队三年来创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成就，检讨与总结了反顽斗争的经验教训，统一了作战思想，明确了巩固淮北苏皖边区和坚持津浦铁路以西地区的方针和任务。会议前后，第四师大力开展整军和根据地建设工作，整编了部队，组建了骑兵团，并遵照新四军军部命令，撤销第十二旅建制，充实第十、

第十一旅，将第十旅与第三师第九旅对调；同时，以主力一部加强地方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初步巩固了淮北苏皖边区抗日根据地。

顽军汤恩伯部侵占豫皖苏边区后，企图越津浦铁路继续东犯我盐阜抗日根据地。7月，顽军韩德勤部为接应汤恩伯部东犯，乘日军“扫荡”我盐阜地区之机，以保安第七旅一部进占泗阳西北陈道口地区，并以第八十九军一部进占淮阴、涟水间的大兴庄、张官荡地区，企图构成一条东接曹甸、车桥，西达津浦铁路，横贯我淮北和淮海根据地的东西通道。为了打破顽军企图，新四军军部以独立旅和第二、第三、第四师各一部共6个团的兵力，于10月14日发起陈道口战役。我军首先将陈道口包围，并肃清其外围据点，尔后经三天近迫作业，发起总攻，突破顽军深沟高垒。经激烈的战斗，至21日，收复陈道口，并击溃由曹甸出援之顽军，攻克大兴庄等地。在此期间，顽军李品仙部为策应汤恩伯部东犯，以第一七一师和第八、第十纵队各一部，进占淮南抗日根据地津浦铁路西中心区大桥等地，企图迫使新四军第二师退出该区。第二师于11月16日，集中3个团的兵力，进行自卫反击，在地方党组织的接应下，收复大桥。

四、发展皖中抗日游击战争

日军为控制淮南铁路，于1941年3月侵占巢湖以南盛家桥、黄姑闸等地。驻守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一七六师退至巢湖、白湖以西地区，巢（县）无（为）地区沦为敌占区。新四军第七师深入该区开展游击战争，从日军手中夺回巢湖、白湖以东地区，并陆续收容了皖南事变中的突围人员。至4月，在无为以东长坝鸣和巢南山区召开了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皖中地区的斗争形势，统一了坚持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认识，明确了稳步向四周发展，积极与各师打通联系的方针。会后，第七师以巢无地区为基点，在周围地区积极打击日、伪军，攻克了土桥、临江坝、三官殿、汤家沟和黄山寺等敌军据点，随即东向含山、和县，西向桐城、庐江和泊湖湖畔发展，从而扩大了皖中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在皖南，以皖南事变中突围的部分干部为骨干，先后成立了数支游击队，采取隐蔽分散活动的方式，紧密依靠地方党组织，在铜陵、繁昌、芜湖、泾县、旌德、太平、绩溪、歙县等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至1942年4月，第七师活动于江浦、宣城、绩溪、宿松间及合肥广大地区，并一度与第五师和第二师打通了联系。

五、发展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

1941年，日军第十一军为确保其武汉战略枢纽，控制平汉路，连续向鄂豫边区进犯。顽军第二十二、第三十一集团军等各一部，共10余万人兵力，也不断向我进攻。在敌顽夹击的形势下，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根据中央军委2月2日关于新四军战略任务的指示，确定了坚持鄂中、豫南基本区，巩固襄（河）西，发展鄂东、鄂皖边的方针和任务。

1月中旬，顽军第三十一、第二十二集团军各一部，进犯鄂豫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随（县）南白兆山地区，占领向家冲和刘店等地，疯狂地破坏抗日根据地。鄂豫挺进纵队遂集中两个团兵力和随县等地方武装进行反击，收复刘店。下旬，日军发起豫南战役，鄂中地区的国民党军纷纷撤退。鄂豫挺

进纵队根据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进入鄂豫边应山、随县、桐柏、信阳等县，开展游击战争，策应豫南国民党军作战，并恢复了随南白兆山抗日根据地。豫南战役结束后，我军在豫南地区又击退了顽军的多次进犯。至此，罗（山）礼（山）边和信（阳）应（山）边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

为发展鄂东抗日游击战争，开辟鄂皖边区，鄂豫挺进纵队一部，于2月中旬对侵占大小悟山抗日根据地的顽军进行反击，恢复了这一地区。3月中旬，东进鄂皖边，又取得了彭思桥反顽战斗的胜利。4月5日，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下辖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旅。尔后，第五师以第十四旅一部继续东进抗日，开辟了鄂皖边抗日根据地，打通了与皖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5月，日军力确保其占领区，缩小抗日根据地，决心以较大兵力对鄂豫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自11日起，敌首先以3000余人兵力，采取突然袭击、分进合击手段对安陆、天门、潜江及（黄）陂

（黄）安南地区进行“扫荡”，并修筑据点、公路，进行分割、“蚕食”。第五师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和民兵利用河川、湖泊、港汊等有利地形，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伏击运动之敌，袭扰驻止之敌，围用敌之据点。在我军不断打击下，“扫荡”陂安南等地的日伪军被迫撤退。为进一步加强对敌斗争，第五师以第十三旅一部，于6月在地方党组织的接应下，深入武汉西北的汉（汉阳、汉川）孝（感）（黄）陂地区袭击敌人，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8月12日，日军以1个旅团兵力，由汉口、孝感和横店等地分13路对汉孝陂地区进行“扫荡”。我军安全转移。放军扑空，随即撤退。由于该区地近武汉，日伪势力较强，我军难以坚持。遂撤出该区。

9月，顽军保安第一旅向肢安南地区进犯，制造（黄）安麻（城）惨案。第五师以一部展开反击，打退顽军进犯，巩固和发展了鄂东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第五师第十五旅于荆门、钟祥和当阳等地，还打退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多次进犯，巩固了襄西抗日根据地。11月，敌集中3000余人兵力分九路再次“扫荡”陂安南地区，并建立据点，修筑公路，企图全部占领。第五师以第十四旅一部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配合下，广泛开展破袭战，坚决阻止敌人筑堡修路，并对伪军开展政治攻势，使敌难以立足，被迫撤退。下旬，敌又以2000余人兵力，采取稳扎稳打、筑堡修路、逐步推进的战法，对平汉路西侧安（陆）应（山）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针对敌之企图，第五师以第十三旅配合地方武装，不断袭扰、伏击敌人，并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经过20多天的艰苦斗争，终于迫使日军全部撤退。

与此同时，第五师决心乘武汉地区日军抽兵准备南进，该地日军兵力减弱、伪军恐慌动摇之机，以第十五旅主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开展（汉）川汉（阳）沔（阳）地区抗日游击战争。11月17日，第十五旅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部发起侏儒山战斗，由索河和肖良集出发，采取分路奇袭、速战速决的战法，歼灭伪定国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部，尔后迅速撤离。12月7日，第十五旅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部由天（门）汉（川）湖区出发，再次向侏儒山地区的伪军进攻，攻占将军岭和桐山头等地，歼灭伪军机炮营等部。此时，日军一部由蓼山来援，企图断我退路。我军主动转移。12月23日，第五师以第十五旅主力在地方武装一部配合下，向侏儒山地区伪军发起第三次进攻，一举攻占侏儒山，歼灭伪军1个营。尔后，第十五旅在第十三旅一部的配合下乘胜追击，于沔阳打退日军数百人的增援和残余伪军的反扑。至1942年2

月初，我军共毙伤日军百余人，全歼伪军 1 个师，击溃其另 1 个师，生俘伪军近千人。从而开辟了川汉沔地区，增加了税收来源，发展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中央华中局高于会议和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扩大会议后，华中地区各级党组织和新四军各部队，根据两个会议的精神，在战斗频繁、斗争极为紧张的环境中，为巩固根据地和军队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工作。各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三三制”原则，加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按照各阶层人民合理负担的政策，建立公粮、田赋和税收等财经制度，使部队军需给养得到了保障。在华中局指导下，苏中、淮北、淮海等根据地及盐城地区，抓紧夏秋收获时机，大力开展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群众工作，其中苏中、淮海、淮北 3 区共减租 10 万余石，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抗战主动性、积极性。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各种抗日组织，仅农民抗日救国会会员即达 100 余万人。随之，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和脱离生产的白卫军获得大发展，整个华中地区达 30 余万人。党的建设、文化教育，尤其是干部的培养教育，也都有很大成绩，开办了华中党校，加强了抗大各分校以及军政干部学校，大力培养干部和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根据军分会扩大会议提出的建军任务，新四军各部队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制度，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部队的思想教育，整顿政治、军事纪律；并在“政治工作面对连队，党的工作面对支部”的口号下，着重进行了连队建设。二是加强了部队军事训练和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司令部的建设，提高干部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建立严格的组织纪律，养成坚决服从命令的作风；并在苏中、淮南、盐阜、淮海、淮北等区先后建立了军区和军分区，以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三是加强了供给工作，从而在困难条件下保证了部队的军需给养。由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重视根据地和军队的建设，因而新四军在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下能够继续坚持抗战。1941 年，新四军在艰苦斗争中，进一步统一了战略思想，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巩固基本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粉碎了敌军的“扫荡”，阻止东犯顽军于津浦路西，巩固了津浦路东的基本抗日根据地；发展了浙东、皖中和鄂豫边区敌后抗战阵地，保存和积蓄了力量，为继续战胜严重困难，坚持华中敌后长期抗战，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条件和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五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形势。我党 我军的方针和任务。华北敌后军民 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参见附表 25)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形势。我党的 方针政策和我军的任务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者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紧接着又入侵美、英、荷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香港、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和东印度群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9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并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决心“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大量的牵制敌人”，“实行配合作战”。同日，在给党内《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中指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有着特别重大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积极牵制和打击日寇，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必要前提。因此，我党应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坦诚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日力量，并改善中国抗战的状况。同日，中国国民政府在全国军民浴血抗战近四年半之后，始尾随英、美两国，对日正式宣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中国派遣军总部根据其大本营的战略企图，决定继续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企图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变其在中国的占领区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为此，对国民党仍执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对正面战场不举行大规模军事进攻，力图利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有利形势，促使国民党投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以其主要力量继续推行“总力战”，进行“扫荡”、“清乡”、“蚕食”与“治安强化运动”，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为实现上述企图，填补其调往太平洋战场的6个师团的空缺，敌中国派遣军以6个独立混成旅团为基础，扩编为6个师团，从而使其在中国战场上（不含关东军）仍保持26个师团另1个骑兵集团和14个独立混成旅团，总兵力达63万人；同时，还大力扩充伪军，总兵力增至55.5万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虽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正式对日宣战，但仍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其配置于华北、华中敌后的部队，继续制造反共军事磨擦，并加紧围困和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在所谓“曲线救国”的口号下，又有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等高级将领率部投敌，配合日军进攻我军。与此同时，华北地区又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因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依然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

为适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抗战形势，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日本与中国战争已四年有余，现

在又与英美荷及南美等二十余国为敌，”“因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不能不有所减弱”，“日军士兵情绪将更觉前途渺茫，伪军伪政权将更形恐慌”；“然而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形势是有利于日本的。”“敌人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地之心必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同时敌人必更加控制伪军伪政权，增强其特务活动与破坏工作。”因此，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一方面要有在敌后长期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又要对日益增加的严重困难有充分的认识，在精神上、物质上、在各方面的工作上作好准备，去战胜困难。《指示》还明确指出：敌后抗战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全党全军要“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2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党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一九四一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一九四二年敌人忙于太平洋（战争）对中国（战场）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的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1942年敌后抗战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依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变化所提出的方针任务，对敌后军民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华北敌后军民展开春、夏季 反“扫荡”作战，打破敌第 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敌华北方面军根据其派遣军总部1941年12月10日关于确保华北，特别是确保重要资源地区、交通线的安全和加紧经济封锁的命令，于1942年2月25日和26日召开所属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规定继续“以剿共为主”，“实行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伐”，“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然后对太行山北部地区”进行“扫荡”，以求巩固占领区，使之担负起“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使命。为实现这一战略企图，华北方面军将2个独立混成旅团扩编成2个师团，以替补调往太平洋战场的2个师团，从而使其华北兵力仍保持10个师团、1个骑兵集团（辖2个骑兵旅团）和10个独立混成旅团，共约25万人。同时，大力加强伪军，使其兵力增至30余万人。

根据华北敌后抗战形势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心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继续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并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士气低落，伪军恐慌动摇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军事上实行“敌进我进”，普遍组建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打击与分化瓦解日伪军，开展群众工作，配合根据地内军民，粉碎敌之“扫荡”，打破敌之“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同时，厉行精兵简政，精干主力部队，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以利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开展。并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大力开展生产运动，节省民力，以战胜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

2月初，敌华北方面军根据其治安肃正计划，决定上半年以冀中为主要目标，开始对华北平原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毁灭性“扫荡”。根据敌之动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2月11日至25日，连续发出反“扫荡”作战的指示，指出：敌将对我各根据地进行更加残酷的“扫荡”，华北仍将为敌“扫荡”的重点地区。必须对于部和群众进行深入的教育，充分认识敌人“扫荡”的残酷性，防止产生轻敌麻痹、拼命蛮干或消极悲观、惊慌失措的情绪；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精干、分散，深入部队、基层，领导对敌斗争，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加强民兵自卫队的组织指挥，在作战指导上，应以打破敌之长期“扫荡”与分散“清剿”为目的，当敌主力进入腹地后，我军应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对深入我根据地之敌展开游击战，消耗与疲惫敌人，粉碎敌之“清剿”；主力大部应适时跳出敌之包围圈，乘敌后方空虚大胆地积极地对敌交通线和据点展开破袭战，并开展敌占区群众工作，配合内线部队的斗争，彻底粉碎敌之“扫荡”。华北敌后军民遵照上述指示，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

实行“敌进我进”，粉碎敌对太行、太岳 及晋西北根据地的春季“扫荡”

（参见附图43）

2月初，华北方面军以第一军和方面军直属部队一部，共3万余人的兵力，由第一军统一指挥，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根据地以及太岳和晋西北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毁灭性“扫荡”。

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我第一二九师和太行军区，根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及日军的动向，采取“敌进我进”、内外线结合的反“扫荡”作战方针，以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坚持内线斗争，另以主力一部组成若干轻便支队，深入敌占区，乘虚袭击敌交通线和城镇据点，迫使“扫荡”之敌撤退。

2月3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四、第一、第八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1.2万余人，分别由长治、襄垣、武乡、辽县、和顺等地出动，采用“铁环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奔袭太行山北部的桐峪、洪水、王家峪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我军即以主力一部在民兵配合下，袭扰和阻击敌人，领导机关及主力大部适时转移。敌奔袭扑空后即进行“辗转抉剔”，实行“三光”政策，到处掳掠烧杀，甚至施放糜烂性毒剂，残害根据地军民。我军乃以主力一部，结合地方武装及民兵，广泛袭击、伏击“清剿”之敌，予敌以杀伤。敌乃采取“反转电击”战法，三次合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麻田、桐峪等地，但均无所获。这时，太行军区基干武装已转向敌占之白晋、平汉两路进击，破路炸桥，袭击据点，两次攻占沁县车站，使白晋路5天未能通车，陷敌于腹背受击的境地，迫使“扫荡”之敌于20日撤回黎城地区。26日，第三十六师团等部，由黎城地区出动，对太行南部平顺地区进行“扫荡”。我军利用险要地形，以伏击和阻击先后在烟驮村、虹梯关和老马岭等地，不断给敌以打击。敌遭打击后，于3月2日由平顺地区撤退。我军及时集结新编第一旅和第三八五旅各一部，设伏于平顺以南的南寨里，歼敌200余人，并乘胜挺进至长治、潞城、壶关间之敌占区，袭击敌据点，摧毁伪政权、伪

组织。

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2月3日，日军第四十一师团7000余人，由安泽、霍县、灵石、介休等地出动，奔袭驻唐城、郭道地区的太岳军区领导机关。由于我军不断地适时转移，敌一再扑空，遂转入“清剿”。在我太岳北部地区军民严重打击下，敌于20日结束“扫荡”，以一部转向沁水地区，主力南下至临（汾）屯（留）公路，开始对太岳南部地区的“扫荡”。21日，日军分19路南北夹击唐村、孔滩、东峪地区，企图消灭我第三八六旅主力。同时，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4个团也乘机侵犯四十里岭的我军阵地。在此严重情况下，第三八六旅主力及时跳出敌之合击圈，并于东峪以北关爷岭歼敌200余人。我第二一二旅也阻顽军于三岔河，予以有力打击。至25日，敌结束“扫荡”。

在敌人“扫荡”被粉碎后，进占浮山、翼城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仍继续向我进攻。我军以抗战大局为重，反复进行交涉，但均无效，乃被迫于4月15日自卫还击，经两天战斗，击退了阎军的进攻，收复了被其抢占的根据地。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2月3日，敌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等部共5000余人，由三岔堡、五寨、西马坊等地出动，奔袭驻保德地区的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及暂编第一师机关；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主力共4000余人，由马坊、王狮、普明等地出动，奔袭驻兴县的晋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由于晋西北军区部队早有准备，在奔袭之敌到达前，即安全转移。敌在连续扑空后，转入分区“清剿”。我军即以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和民兵展开反“清剿”斗争，主力和地方武装则迅速挺进到敌据点和后方交通线上展开破击战。第三五八旅两个团在界河口、二十里铺之间，破击岚县至兴县的敌交通线；第二军分区以一部伏击、袭击岢岚、保德间的敌运输部队，主力进至五寨、三岔堡及神池地区，袭击敌据点和交通线。与此同时，第四、第八及第五军分区部队，也破击敌交通，袭击敌据点，策应第二军分区内线部队反“清剿”斗争。在我内、外线部队打击下，敌被迫于3月初撤退。

5月中旬，敌第六十九师团1个大队700余人，再次奔袭驻兴县的晋西北党、政、军领导机关。晋西北军区在侦悉敌之行动企图后，决定以小部队及游击队沿途袭扰，消耗与疲惫敌人，待敌深入根据地后，再集中兵力相机歼灭该敌。14日，该敌由岚县的东村、寨子出动，沿岚（县）兴（县）公路急进，15日拂晓进至界河口西南李家庄隐蔽。16日夜，从李家庄奔袭兴县。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先敌转移。敌扑空后发现我军早有准备，遂不敢久留，于17日中午撤离兴县，向东南逃窜。18日上午，当其进至二京山时，遭我第七一六团及工卫旅迎头痛击，遂即转向西南逃窜。我军前堵后追，两翼截击，将敌包围于肖家洼西南高地。激战至21时，敌乘夜暗向东南突围，逃至田家会，我又将其包围。19日18时，我军向敌发起攻击，经两小时激战，除少数敌人溃逃外，共歼敌500余人，缴山炮1门，轻机枪6挺。田家会战斗，是抓住敌人孤军深入，乘其仓惶撤退之际，集中兵力，连续围歼的歼灭战。此次战斗后，晋西北地区日军再不敢孤军深入。

太行、太岳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春季反“扫荡”中，共作战600余次，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这对坚持与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参见附图 44)

冀中平原盛产粮、棉，在经济上、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敌华北方面军确定上半年以冀中为“扫荡”的重点地区。为隐蔽其对冀中地区的“扫荡”企图，制造假象，迷惑我军，敌在“扫荡”冀中之前，首先分别对冀东、北岳和冀南区进行“扫荡”。

冀东、北岳、冀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 4月1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和关东军、伪军各一部共3万余人，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敌首先以重兵沿北宁铁路、长城和潮白河，构成对冀东根据地的包围圈，严加封锁；尔后，由东向西，由北向南，逐步压缩包围圈；进而又将冀东根据地基本区分割为东、西两部分，进行连续合击和分区“清剿”，逐村搜捕、屠杀我军政人员，大肆烧杀掳掠。4月18日，日、伪军4000余人包围冀东军分区后方医院所在地鲁家峪，我军伤病员及工作人员190余人惨死在敌施放的毒气中。敌之暴行更加激起冀东军民的无比愤恨，同敌展开了殊死斗争。坚持内线斗争的两个营配合地方武装，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之间，使敌连续扑空，疲于奔命，小股被歼。一月之内，作战20次，歼敌百余名，缴获步枪百余支。主力则及时突破敌之封锁，越过长城，转移到热河省南部地区，先后攻克平泉以南的亮甲台，承德以南的榆树沟，都山附近的于南庄，袭击了马圈子、汤道河等据点，破坏了锦(州)承(德)铁路和承(德)兴(城)公路，摧毁大量伪组织，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了内线部队的反“扫荡”作战。至5月底，敌人寻歼我军主力的企图落空，遂结束“扫荡”。由于敌在“扫荡”中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根据地人力、物力受到很大损失，约有两万群众遭敌杀害，两万多青壮年被敌掳走，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部分根据地与游击区沦为敌占区。6月初，冀东区党委和军分区乘青纱帐起及敌军主力南调“扫荡”冀中的时机，令主力部队回师根据地中心区，打击残留之敌，开展恢复根据地基本区的工作，并策应冀中军民反“扫荡”斗争。

敌在对冀东区进行“扫荡”的同时，于4月25日至27日，以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和第一一师团各一部共4000余人，分别对北岳区易县的刘家台、管头一带和平山县的慈峪、南甸等地进行“扫荡”，均被该地军民粉碎。

敌人在对北岳区的“扫荡”被粉碎后，即以独立混成第七、第一、第八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1.2万余人，在第十二军指挥下，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4月29日，敌对冀南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武(城)北地区进行合围。冀南地区领导机关在新编第七旅第二十一团及军区特务团等部掩护下，大部突出重围。与此同时，新编第四旅及第四军分区机关和主力一部，于威县南之香城固、下堡寺地区遭敌合围，激战后大部突围。随后，敌转入“清剿”，增建据点，加修公路和封锁沟、墙，进行严密封锁。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大部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面对这一严重形势，冀南区党委和军区，于5月初分别召开会议，检查了上半年的工作，总结了敌斗争的经验教训。会后，全区紧缩机关，实行主力军地方化，主力旅与军分区合并，加强地方武装，并大量组织武装工作队，广泛开展游击战，继续坚持冀南平原的抗日斗争。

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局就坚持冀南发出指示，指出：华北敌后抗战形势极为严重，战局发展将更加残酷，各地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与极大的警惕；但又要看到，整个国际形势有利于我军巩固山区抗日根据地和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要克服悲观失望情绪，提高坚持敌后抗战信心；各游击根据地必须在切实保护群众利益、减轻人民负担的斗争中，组织与武装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要切实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6月22日，中共中央向华北、华中各战略区转发了北方局的上述指示，并指出这个指示虽系针对冀南，但对全局有指导意义。

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敌“五·一”大“扫荡” 敌华北方面军在对冀东、北岳和冀南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期间，加紧准备对冀中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决定以3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另2个联队共5万余人的兵力，在方面军的统一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战术，围歼冀中我军，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其部署是：以第一一、第二十六师团各一部，配置于保定、定县和新乐一线；以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一部配置于河间地区；以骑兵第一旅团的第十三联队，配置于滏阳河以东交河地区；以第四十一师团配置于德石铁路沿线；以独立混成第九旅团配属于第四十一师团，部署于德石线以北。以上为直接进行“扫荡”的部队。另以第一一师团一部和第二十七师团主力为配合“扫荡”的部队，分别部署于石家庄和任丘、大城、文安地区。

中共冀中区委和冀中军区，在敌“扫荡”太行、太岳和晋西北地区时，预料敌将“扫荡”冀中，曾连续发出反“扫荡”紧急指示，要求冀中军民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并采取坚壁清野，划分活动区域，拟定分散活动方案，以及紧缩机关等措施。冀中军区司令部还于3月20日发出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总结了在对敌斗争中运用地道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经验，指出地道斗争对于坚持平原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强调动员群众自觉地投入这一斗争；要求构筑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由简单到复杂，形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联的四通八达的地道网；并提出了开展地道斗争的战术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采取的对策。冀中军民，根据上述指示，积极地进行了反“扫荡”准备。

5月1日，敌开始第一阶段的“扫荡”。首先自边缘区开始，以第一一、第二十六师团各一部“扫荡”潞龙河以北地区，以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一部“扫荡”滹沱河以北地区，以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及骑兵第十三联队“扫荡”德石铁路沿线以南地区。尔后，稳进稳扎，逐步增建据点，由边缘区向根据地中心区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县压缩，企图聚歼冀中地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在敌“扫荡”开始后，冀中区党委和军区，于5月7日发出指示，确定以发动全民武装自卫，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全面坚持根据地斗争为反“扫荡”方针，要求各部队既要灵活、积极地打击敌人，又要避免与敌硬拼；要求主力部队以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带领各地游击小组，分散坚持内线斗争，大部应迅速转向敌侧后，乘虚袭击敌据点和交通线，策应内线部队的反“扫荡”斗争。

9日和10日，敌“扫荡”兵力增至2万余人，并封锁了环绕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献（县）中心区的滹沱河、滏阳河、德石路、沧石路，构成所谓“铁环阵”；在滹沱河与滏阳河沿岸的重要渡口建立了据点，

并将滏阳河分段设闸，增高水位，使我军难于徒涉；在德石路和沧石路的重要路口增加了日军的驻守兵力，从而完成了对冀中中心区的包围圈，并开始向内压缩。冀中备军分区部队未能突破敌之压缩、包围，机关、部队大部被迫退向根据地中心区，陷于拥挤、被动局面。

5月11日，敌转入第二阶段的“扫荡”。敌对我中心区进行分割，企图分成4块，尔后进行分区“清剿”。

11日，敌7000余人合围晋（县）深（泽）安（平）地区；另以一部8000余人合围深县以南地区。12日，敌又以1万余人合围深武饶安地区和深（县）束（鹿）边地区。敌每次合围，都以五六架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和轰炸扫射，地面部队则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犹如“拉网”，逐步搜索，逐步推进，企图使我军难以机动和转移。针对敌之企图和行动，冀中军区决定留主力一部坚持中心区斗争，领导机关和主力大部，乘敌之隙向外转移，摆脱敌之合围。13日，军区机关率领第二十七团等部转至澄阳河以东地区。各军分区机关和部队也陆续突围。坚持中心区斗争的部队，紧密依靠群众，利用地道，同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冀中军民反“扫荡”的紧急时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18日、20日，先后发出关于冀中反“扫荡”的指示，强调指出敌人此次“扫荡”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号召冀中军民发挥最大的顽强性与坚韧性，争取反“扫荡”的胜利；决定冀中军区抽调3个团和部分地方武装转移至山地，以保存力量；要求冀中地方党政机关改变斗争方式，采取两面政策，不能立足的干部应随军转移；坚持原地斗争的武装，应采取公开和隐蔽、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同时，指示冀中邻近各区部队，积极行动，牵制当面之敌，配合冀中军民反“扫荡”作战。

敌在分区“拉网扫荡”未能捕捉到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后，即分兵追歼突围至滹沱河以北的冀中军区部队；同时，调整部署，以第四十一师团接替已经疲惫的部队，准备继续对冀中中心区进行“清剿”。这时，冀中区党委和军区认为“扫荡”之敌撤退，遂于21日和22日令已转到外线的第六、第八、第九军分区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恢复根据地。23日，当第六军分区机关率主力一部由德石线以南回到深县以南地区时，即遭刚调入之敌第四十一师团等部1.5万余人的合围。我军在李家角与敌激战终日，毙伤敌军400余人后，于当夜突围。第八军分区机关率主力一部，由束城地区返回河（间）肃（宁）公路以南的西道口，28日，准备向南伸入深（县）武（强）饶（阳）地区时，遭敌重兵合围，经激战后，突出重围，但付出了重大代价。第九军分区机关率主力一部，由白洋淀地区南下，进到肃宁以西，得悉第八军分区机关及主力一部遭敌合围，随即返回白洋淀地区。

面对敌之空前残酷的“扫荡”，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以连、排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生死与共，依托村落，利用并改造已有的地道，构成户户相联、村村相通的地道网，与地雷战、麻雀战等斗争方式相结合，顽强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坚持在无极、定县之间赵户村的第七军分区第二十二团两个连，利用该村已构成的户户相通、片片相联、东西有干线、南北有支线、能藏、能防、能打、能机动的战斗地道体系，并结合环村埋设的地雷200多处，在23天中，打退敌人4次大的进攻，歼敌300余人。5月27日，敌1000余人进攻定县东南的北疃村，该地抗日游击队依托地道，打退敌人的连续进攻，后因弹尽无援，村子被敌占领。敌进村后向地道内施放毒气，由于地道

没有经过改造，不能防毒，800余人惨遭杀害，造成“北瞳惨案”。

转至外线的部队，对敌之交通线和据点展开猛烈攻击，配合内线部队的斗争。第八军分区一部袭击赵扶、姚马渡、文安等敌据点，炸毁津浦路上两列火车。回民支队一部一度攻入交河、泊镇。第九军分区一部利用自洋淀的草荡、苇塘有利地形地物，伏击由任邱出动的敌人，并袭击安新县城。第十军分区一部袭击冬各庄，并一度攻入大城县城。

为策应冀中反“扫荡”斗争，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山东、冀南、太行及北岳、平西等地八路军，分别向津浦、平汉、正大等铁路沿线广泛出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支援了冀中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6月初，敌转入第三阶段的“扫荡”。敌完全控制了冀中根据地中心区，转入全面“清剿”，到处搜捕我在原地坚持分散斗争的党、政、军工作人员，破坏抗日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建立伪政权、伪组织，并大力建据点、筑公路、挖封锁沟。在此严重形势下，冀中区党委和军区，遵照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的历次指示精神，于6月4日决定，以部分地方武装，实行高度分散，配合民兵就地坚持反“清剿”斗争，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迅速转向邻区。上旬，第十七、第十八和第二十九团，先后经无极以北的贵子里和定县以南地区，冲破敌之重围，于7月初转至北岳区。接着，第二十二团和警备旅第一团等部也向邻区转移，6月9日，转移至深泽以北的宋庄时，遭日、伪军2000余人围攻。该部即依托村落，构筑防御阵地，与敌展开村落战，打退了敌人连续不断的冲击，至下午3时，第一、第二道防御阵地全被敌炮火摧毁，不得不撤到第三道防御阵地，继续顽强抗击。经过30多次的反复争夺，歼敌400余人，终于把敌人驱出村外。黄昏后，敌停止进攻。该部遂乘夜暗胜利突围。第八军分区机关率部于9日拂晓转移至河肃公路南侧时遭敌合击，激战至午后，大部伤亡、失散，一部突围，于7月初转至山东根据地冀鲁边区。冀中区党委和军区率第二十七团于6月12日转至冀南根据地南宫、威县间的掌史村时，遭敌合围，激战后突围，至7月初转移至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警备第一团、杭大第二团、骑兵团及回民支队等部，也于7月初分别转移至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转到邻区的机关、部队，于9月陆续转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

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向邻区后，留下坚持斗争的干部、游击队和群众转入了艰苦的反“清剿”斗争。敌人到处搜捕留下的部队和干部，挨村挨户搜查，并实行“三光”政策，妄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但冀中人民对我党我军的信赖和坚持抗战的决心坚不可摧。许多群众在家中挖地洞、垒暗墙，想方设法掩护我军伤病员和地方干部。留在冀中的武装和广大抗日群众，在极端残酷的情况下，转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以部分没有暴露的党员和群众中骨干分子出面组织两面政权，表面应付敌人，实际掌握敌人动向，掩护抗日游击队活动，把隐蔽的斗争与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结合起来，坚持抗日斗争。

冀中军民在两个月的反“扫荡”中，共作战270余次，毙伤敌1万余人，粉碎了敌消灭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但我损失也是十分严重。敌据点增到1635处，公路增到6000多公里，封锁沟增到3000多公里，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多小块，形成“格子网状”，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冀中军区部队减员46.8%，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受到很大破坏，群众伤亡和被掳走的共达5万多人，造成了“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

的悲惨景象。从此，冀中敌后游击战争进入了更加残酷和困难的阶段。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的 夏季反“扫荡”作战

(参见附图 45)

敌为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及第一二九师主力，并策应其对冀中区的“扫荡”，于5月中旬开始，以其第一军3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夏季“扫荡”。

太行、太岳军区在粉碎敌春季大“扫荡”后，总结了经验，进一步加强了战备。在反“扫荡”前夕，又进行了紧急动员，准备了较为充足的物资，并且派出于部协助地方党政机关指挥民兵作战，各军分区沿敌可能来犯的道路，布置了秘密情报网；党、政、军、民都作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和物资准备。

5月16日，敌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及第六十九师团一部，共7000余人的兵力，奔袭驻太岳南部沁河两岸的东峪、马壁地区的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该旅及时向北转移，威胁临屯公路敌交通线。敌扑空后，其第三十六师团主力于19日转向对太行北部地区进行“扫荡”，留下继续进行“扫荡”的第六十九师团一部在大岳南部军民不断打击下，于28日也分路撤回浮山、府城等原据点。至此，敌对太岳南部地区的

“扫荡”遂告结束。

5月19日，敌以2.5万余人的兵力，对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抗日根据地北部地区进行“扫荡”。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主力及独立混成第一、第八旅团各一部，由平汉铁路石家庄至安阳段和正太铁路沿线各据点出动，先后进抵峻极关、上庄、下庄及阳邑西北高地一线，从东、北两面向八路军总部驻地推进；第三十六师团主力，由长治、襄垣、武乡、辽县等地出动，进至砖壁、桐峪地区，从西、南两面向八路军总部驻地推进。至24日夜，各路敌军完成对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的合围。25日，敌在其航空兵的支援下，以南艾铺为目标发起攻击。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在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一部奋力掩护下，分西、北、南3个方向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和总部直属队几位负责干部在指挥突围作战中，于十字岭壮烈殉国。当日黄昏，敌军攻入南艾铺，但未达到其消灭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领导机关的目的。26日，敌转入“辗转清剿”，残暴地捕捉、杀戮我地方干部和群众，大肆抢掠资财，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敌之“清剿”，太行军区除以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内线斗争外，主力分别转到敌人后方，积极展开破袭战。30日，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一部，在民兵的协同下，设伏于辽县城东南苏亭镇，歼敌140余人。31日，新编第一旅一部组成突击营，奇袭长治敌飞机场，毁敌机3架，汽车14辆，油库2座。与此同时，第三八五旅另一部，乘敌后方空虚，一度袭入虜亭、五阳、黄碾等敌据点，给敌以很大打击。太行、太岳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也在平汉、白晋、同蒲和正太等铁路沿线展开破击战，有力地配合了内线部队的反“扫荡”作战。

6月9日，“扫荡”太行北部地区的日伪军，由邯（郸）长（治）公路及清漳河两岸地区南下，“扫荡”太行南部地区。第一二九师直属队及新编

第一旅一部，被敌压缩于涉县西南的石城、黄花地区。放军以密集队形齐头并进，从四面向我合围，我军处境十分险恶。但在第一二九师首长正确指挥下，乘夜暗，从敌军的间隙中，巧妙地跳出了合围圈。放军合围计划破产后，遂于 19 日撤退。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夏季反“扫荡”作战，历时 38 天，共歼敌 3000 余人，打破了敌人的企图，坚持和巩固了根据地。

广泛组织武装工作队，打破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敌在集中兵力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蚕食”的同时，于 3 月 30 日开始，发起为期两个半月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敌以“东亚解放”、“剿共自卫”为口号，对华北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同时，在其占领区加紧推行保甲和配给制度，并在我根据地边沿抢修碉堡、公路，增筑封锁沟墙，企图压缩我根据地，巩固与扩大其占领区。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打破敌前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第一二九师等部组织武装宣传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斗争的经验，决定广泛地组织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全面对敌斗争，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和打破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遵照上述决定，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地组织由军分区或旅统一领导的，由军队的连排干部、优秀战士及地方党政干部和工作人员、敌工干部、翻译人员（有的地区还有日人反战团体成员）组成的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对敌斗争。太行、太岳和冀南 3 个地区，至 8 月底止，共抽调约 1400 人，组成了 42 支武工队。其中太行地区的武工队，越过敌人的封锁沟，深入敌人统治的赞皇、临城、内丘、井陘、昔阳等县镇及其附近地区，按照“不大打，不硬打，积小胜为大胜，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配合抗日群众，对敌展开军事的和政治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仅在 4 月 10 日至 18 日的 9 天中，共进行战斗 45 次，毙伤日、伪军 310 名，俘虏 50 名，摧垮伪组织“维持会” 300 余个，镇压死心事故的汉奸 400 余名，隐蔽地开辟和恢复了有 5 万人口的游击根据地。晋西北根据地自 6 月起，共组织了 37 支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和游击区，对敌展开全面斗争。经过 4 个月的艰苦斗争，改变了敌进我退的不利形势，出现了敌进我也进的错综复杂、犬牙交错的新局面，收复了 200 多个自然村，并在敌占区开展了工作。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强调敌后活动同正面斗争相配合，平原与山地的斗争相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打破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向我根据地的“蚕食”。北岳区以主力部队的 1/3 兵力，组成几十支武装工作队，有的秘密越过敌人封锁线，挺进到敌占区；有的分散到敌封锁线两侧，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瓦解伪军和伪组织，收复和开辟了 1600 多个村庄。其中不少成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山东、冀鲁豫根据地，由主力部队派出若干支小部队，分散深入敌占区，发动与组织群众，对敌开展隐蔽斗争，配合根据地的反“蚕食”和反“扫荡”斗争。

实践证明，采取武工队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适合于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有利于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和开展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全面对敌斗争，并且能够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对打破敌“蚕

食”、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起重要作用。

三、粉碎敌秋、冬季“扫荡”，打破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从1942年7月开始，敌分别对晋绥、晋察冀、冀鲁豫、太行、太岳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进行万人以上的全面“扫荡”。

在晋绥地区，敌驻蒙军以第二十六师团主力及骑兵集团一部，共1.3万余人，自7月下旬开始，对大青山区发动空前规模的“扫荡”，企图消灭我大青山骑兵支队，摧毁根据地。大青山骑兵支队与当地各族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展开反“扫荡”斗争。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大青山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及主力大部于8月中旬转移至晋西北偏关等地区，一部继续坚持绥西和绥南的抗日游击战争，至11月中旬，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或变为游击区。

在晋察冀边区，敌华北方面军于8月初至8月下旬，以第二十七师团为主力，配属第一一师团、驻蒙军的坦克、炮兵、汽车部队及伪军各一部，共万余人兵力，对冀东根据地迁安、卢龙、滦县和丰润地区进行“扫荡”，被冀东军民所粉碎。9月17日，敌又以第二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主力及第一一师团和伪军各一部，对冀东根据地的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冀东军分区遵照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以地方武装坚持内线斗争，主力部队转至热（河）南和滦（河）东地区，打击与牵制敌人，策应内线斗争。敌为切断长城内、外的联系，防止我军回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线上，制造了长300余公里、宽20至40公里的“无人区”。至年底，北宁线以北，长城以南大部分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冀东地区党、政、军机关，遂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带领广大群众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

在冀鲁豫边区，敌第十二军以第三十二、第五十九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和伪军各一部，共1万余人的兵力，于9月27日拂晓，突然对冀鲁豫根据地中心濮（县）范（县）观（城）地区进行合围。冀鲁豫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教导第三旅、冀中南下支队及回民支队等部，适时跳出了敌之合围圈。敌扑空后，转向对昆山、张秋地区进行合围，第八军分区机关及教导第三旅第八团及时转移。敌再次扑空后即转入“清剿”，并增设据点26处，第八军分区等部遂暂时撤出昆山、张秋地区。在反“扫荡”作战中，我军和根据地虽受到部分损失，但敌围歼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未能实现。

10月8日，敌开始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企图是：在政治上实行怀柔、欺骗政策，瓦解我人民群众的抗日意志；在经济上进行封锁，掠夺战略物资，摧毁我抗战的物质基础；在军事上进行连续不断的所谓“治强战”，即全面“扫荡”，消灭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

10月20日，敌以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六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1.6万余人的兵力，以太行北部和太岳北部地区为重点，同时开始“扫荡”。我太行、太岳军区采取内线坚持与外线出击相结合，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展开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迫使“扫荡”太行北部之敌于11月12日撤回原据点。“扫荡”太岳北部之敌军主力亦被迫于11月18日撤离根据地，但留置1个大队及部分伪军据守沁源县城等据

点。太岳北部地区军民遂展开了对沁源之敌的长期围困战。

10月中旬，敌第十二军开始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敌在对清河区寿光以北地区和鲁中的泰山地区进行“扫荡”后，于26日，以第三十二、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五、第六旅团各一部，共1.5万余人的兵力，和对鲁中沂蒙山区进行“扫荡”。为了隐蔽其企图，敌以2000余人的兵力首先向滨海区佯动，散布“扫荡”滨海区的假情报。正在滨海甲子山地区的山东军区（即前山东纵队）机关，误认敌将“扫荡”滨海区，遂即率部转向沂蒙山区的南墙峪。27日，敌对南墙峪进行合围，山东军区机关大部适时跳出敌之合围圈，一部转移不及，遭敌合围，激战竟日，黄昏后分路突出重围。11月2日，当山东军区机关转移至对崮峪时，又遭敌合围，在特务营及鲁中第二军分区一部奋力掩护下，军区机关分路突出重围，但特务营大部壮烈牺牲。为策应山东军区机关突围，第一一五师指挥鲁中邻区各部队，向当面之敌广泛出击，钳制了敌军兵力，有力地支援了沂蒙山区的反“扫荡”斗争。11月中旬，敌被迫撤出沂蒙山区。

11月21日，敌以独立混成第五旅团主力及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六、第七旅团各一部，共1.5万余人，采取“拉网”战术，对我胶东区栖霞（霞）牟（平）海（阳）莱（阳）边的牙山、马石山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消灭我胶东军区领导机关。胶东军区机关率部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分区坚持。尔后，大部突出重围，向濒海地区转移。28日起，敌调整部署，于车平至海阳一线展开，继续向东推进，妄图聚歼我军于濒海地区。我军乘敌之隙，掉头西进，使敌聚歼计划破产。12月13日起，敌将“扫荡”重点转向青（岛）烟（台）公路以西，对平

（度）招（远）掖（县）莱（阳）边区的山东军区第五旅进行合围。第五旅以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内线斗争，主力部队及时转至敌占区打击敌人。在我内、外线部队打击下，敌被迫于12月底撤回原据点。

至此，我军打破了敌以“治强战”为主要内容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这对巩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扭转被动局面，有着重要意义。

四、深入开展反“蚕食”斗争， 扭转根据地退缩局面

1942年上半年，敌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继续进行疯狂的“蚕食”，致使许多根据地，特别是平原地区仍处于退缩局面。至4月底，冀中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约2/3。冀南根据地只剩下枣（强）南、武（城）北和威县以南香城固附近以及馆陶周围这3小块地区。山东根据地小清河以南、胶济线以北、寿光以西、邹平以东地区变成游击区或敌占区。晋西北根据地雁北地区，基本变成敌占区。地处忻县、岚县、离石、汾阳间的第八军分区仅剩17个行政村，第三军分区的忻

（县）静（乐）公路以南、汾河两岸地区的大部分村庄被敌占领。华北其他根据地也处于不同程度的退缩状态。

为了发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打破敌之“蚕食”，扭转根据地继续退缩的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5月4日联合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强调指出：反“蚕食”斗争是目前华北的党和军队的一个最紧急的任务，只有争取这一斗争的胜

利，才能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反“蚕食”的基本方针应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隐蔽斗争与公开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全面面对敌斗争；正规军要用 1/3 或 1/2 的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边缘区，与党政机关密切配合，灵活地开展游击活动，并充分发挥武工队的作用，针对敌人“蚕食”的每一步骤，予以及时、有效地打击。以坚持根据地。

各抗日根据地根据上述指示，积极展开反“蚕食”斗争。冀南军区从 8 月下旬开始，对敌发动攻势，收复了上半年被敌侵占的大部分地区。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运用“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有效地制止了敌之“蚕食”。其教导第二旅于 11 月 3 日在海陵县发动反“蚕食”斗争，向陇海路附近地区的罗庄、横沟、管圈沟等地挺进，仅 6 天内，即攻克滨海区敌据点 16 处。晋西北根据地，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向敌人“挤”地盘，自 6 月至 10 月共收复 218 个自然村。太行、太岳军区，以主力军一部，协同地方军和边沿区的游击队，实行正面坚持；以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和被“蚕食”的地区，开展军事、政治攻势，在 5 至 7 月间共摧垮伪组织“维持会”1064 个。冀鲁豫军区在秋季作战中，拔除敌据点 40 余处，恢复了濮阳等 6 个县的抗日斗争，开辟了东明、长垣、考城 3 个地区。晋察冀军区北岳区部队经半年多的艰苦斗争，共恢复 1600 多个村的抗日政权，并在敌占区内建立了许多块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经过党、政、军、民的一致努力，至 1942 年秋，基本上制止了敌人的“蚕食”，扭转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退缩局面。

五、深入发动群众，普遍加强根据地和军队建设，克服严重困难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发出的指示及 1942 年陆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先后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普遍加强根据地和军队建设。

首先，根据中共中央 1942 年 1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各地抓紧在反“扫荡”作战间隙和复收、秋收季节，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全面实行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要求地主应该普遍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又要求农民要交租交息。执行《决定》过程中，各地坚决贯彻了《决定》中规定的三条基本原则，即：承认农民（含雇农）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承认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因而，正确地处理了土地问题，调动了广大农民和绝大多数中、小地主、富农的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在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基础上，各抗日根据地还进一步整顿了县以下的各级抗日政权，在政府机构和参议会机构内，认真地普遍地实行“三三制”政策，调节了各抗日阶级内部的关系，逐步趋向更加合理，更能发挥作用。

第三，各抗日根据地普遍贯彻执行“精兵简政”政策。精兵简政是克服

敌人给我们造成的严重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渡过“黎明前的黑暗”的一个重大措施。毛泽东在论述这一政策时曾说：“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八路军、新四军在地方党政机关进行简政的同时，按照1941年11月日《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关于每个根据地脱产人员不能超过人口总数3%的原则，主力军实行“精兵主义”，主力军与地方军比例，在山区为2:1，在平原为1:1，在某些最困难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化。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大战略区普遍缩小了机关，充实了连队，撤销各纵队的指挥机构，并将大部主力旅与军分区合并，加强地方军，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样不仅改变了机关庞大臃肿，而且使各级组织十分精干，更加适应于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环境，并促进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开展。

第四，开展以减轻人民负担，改善军民生活，打破敌顽经济封锁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早在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即根据毛泽东关于“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的指示精神，向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依据不同环境、条件，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各部队凡有条件的均开展生产运动。1940年驻陕北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延安以南的南泥湾地区，实行“屯田政策”，经过两年辛勤劳动，至1942年全旅粮食自给达80%，经费自给90%以上，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据此，《解放日报》发表了“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推广第三五九旅经验。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表彰了各根据地军民、机关、学校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绩，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利用战斗间隙，展开了生产运动。各部队大力发展农业、副业、商业、运输业等生产，不少山区团以下部队做到了每人每年生产节约60元，分区（旅）以上机关达到每人每年生产节约100元，从而，逐渐克服了物质方面的困难，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并密切了军民、军政、官兵关系，增强了部队的劳动观念。

第五，加强党和军队的思想理论教育，普遍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开展整风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的决定，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开展了整风运动。八路军遵照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指示》，作出了整风运动的安排，并结合部队实际，强调在军事领域中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这就为尔后八路军各部队开展好整风运动，普遍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民族与阶级觉悟，改进党风、学风和文风，增强党内、军内团结，纯洁组织，提高战斗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六，调整抗日根据地各组织间的关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为调整党政军民各组织间关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以便集中一切力量，克服严

毛泽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83页和第884页。

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最后战胜敌人,中共中央于1942年9月1日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党应该领导一切组织;各地党委是各该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的决议,抗日民主政府,军队和群众抗日团体均须执行;各地军事政策与军事行动的大政方针,需经党委讨论,具体行动由军队首长指挥;主力军必须接受所在地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游击区党政机关必要时与军队领导机关合并,实行一元化领导。遵照中共中央这一决定,华北地区从中央代表机关——各中央局、分局到各地党委,均实行了一元化领导,撤销了过去各部队的军政委员会;各区党委、地委、县委书记大都兼任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这样,就在思想、政治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又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发挥党政军民整体力量,克服严重困难,战胜敌人,起了重要作用。

这些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和执行,并在斗争中不断充实和发展,至1943年,又增加了对敌斗争、审查干部、拥政爱民和时事教育等项政策,形成“十大政策”。这十大政策,特别是整风和生产,不仅对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为转入反攻,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精神和物质基础。

1942年,是华北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第二年。敌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达77次,其中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达15次;并疯狂地进行“蚕食”,推行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从而使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但华北敌后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为战胜严重困难、渡过难关所制定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的对敌斗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打破了它的“治安强化运动”,基本上制止了它的“蚕食”,扭转了不利局面,为以后的恢复和再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六节 华中敌后军民展开反“清乡”、反“清剿”和反“扫荡”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中仍驻有日军第十一和第十三军,下辖10个师团另7个独立混成旅团。1942年2月以后,其中4个独立混成旅团扩编为4个师团,从而使师团数增加到14个,总兵力约29万人。伪军也略有增加,总兵力达到16万人。敌为巩固华中占领区,确保主要交通线,掠夺战略物资,谋求自给和支援太平洋战场作战,加紧对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重点指向苏中、苏南地区,并大力扶植汪精卫伪政权,扩大和利用伪军,以便腾出日军兵力用于机动作战。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继续执行反共政策,不断制造军事磨擦,进犯鄂豫皖边区、皖中和淮南等抗日根据地。华中敌后抗战局势仍然十分严重。

为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战方针和政策的指示,总结和部署工作,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在江苏省阜宁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少奇、陈毅代表华中局分别作了形势、任务和军事工作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敌后抗战仍旧是长期的,艰难的,残酷的,与敌人的斗争可能更加尖锐”,“因此,坚持今后两年的艰苦奋斗,最关重要。”他详细地分析了敌顽我三方在华中的态势,指出:敌占大中城市、交通要道,控制了经济富庶地区,所以仍占

有优势；但其兵力不足与分散，社会基础薄弱，是它不可克服的弱点。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在华中较强，对敌后抗战仍起相当的牵制和破坏作用。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控制着广大乡村，建立了根据地，在乡村占有优势；但群众尚未充分发动，根据地不够巩固，在敌军和顽军进攻下，部分地区已经缩小和丧失。这是一种复杂的、不平衡的、长期的相持斗争的局面。在这种特点下，我们的方针与任务，是保持、巩固与继续加强我们的优势。陈毅在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华中地区敌我相持斗争局面的长期性，总结了反“扫荡”、反“清乡”的经验教训，论证了我军所应采取的战略战术，以及军队建设方面的方针政策等问题，并强调指出：必须在长期斗争中，依靠“我们主观指导的正确，配合国际国内的形势的变化，才能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和强弱的阵势。懂得这一点才不会被敌人的疯狂‘扫荡’所吓倒，才不会因为逆流高涨而使自己手足无措。”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以“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方针。同时，根据这一方针，确定了加强对敌斗争，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加强军事建设，开展群众工作，发展生产，加强政权和党的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及锄奸工作等九项具体任务。

一、苏南、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清乡”和反“清剿”斗争

日军继 1941 年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进行的第一、第二期“清乡”后，于 1942 年春，以其第十五师团一部，对京沪路以北澄西地区实施第三期“清乡”；同时，对京沪路以南茅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力图摧毁苏南抗日根据地，消灭新四军第十六旅。

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第十六旅在京沪路以北，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组织精干的便衣武装打击小股敌人，坚持澄西地区的斗争；在京沪路以南，采取以地方武装、民兵为骨干，开展群众性游击战，粉碎敌之“扫荡”。旅主力则分别向丹（阳）金（坛）武（进）、太（湖）滬（湖）、横山（溧水县西）、大官圩等地分散游击，恢复了这四块游击根据地。

与此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一部及伪军共 5000 余人，分三路“扫荡”苏中抗日根据地南通地区。3 月 9 日，当由东台潘家 出动的一路敌军进占三仓镇时，新四军第一师以一部兵力突然包围敌军，战至 10 日晨，歼敌大半，残敌施放毒气，突围逃窜。与此同时，由岔河和马塘出动的另两路敌军合击丰利。我第一师以一部沿途阻击敌军，另以优势兵力袭击敌侧后，歼敌一部，迫其于 12 日仓惶撤退。此役，共歼日、伪军 800 余名，并乘胜收复南坎、双甸等镇。

6 月，日军开始对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清剿”，企图歼灭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变苏中抗日根据地为其占领区。

6 月 12 日，敌开始对苏中第四分区的海门、启东地区进行“清剿”。以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一部及伪军 7 个营共 4000 余人，在完成对该地区包围封锁后，分别从茅镇、四甲坝、掘港出动，由西向东反复“清剿”，并在包场、吕四、久隆等地构筑据点，控制海门至启东、四甲坝至吕四两条公路；然后，依托这些据点、公路，逐乡搜捕我党政军人员和抗日群众骨干；同时，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进行经济掠夺和欺骗宣传。

第一师于敌行动前，即将后方机关北移至大丰县王家舍。师部及第三旅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也适时跳出敌之封锁区，转移至南通以西地区。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的第三旅第八团一部与海启警卫团密切协同，以班或排为单位，分散游击，穿插于敌严密封锁区内，袭击敌

“搜剿”分队和指挥机构，消耗、疲惫敌人；同时，广泛开展分化瓦解敌军工作，并选派部分政治上较强的人员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之动向。6月24日，根据新四军军部的统一部署，第二师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第三师在陈家洋、海河、上冈地区，第十八旅在江都、高邮地区，第二旅在盐城、东台、建阳地区，第一旅在泰兴、黄桥地区，同时对当面的日、伪军守备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展开破袭战，策应苏中海门、启东地区的反“清剿”斗争。在1个月反“清剿”斗争中，第一师共歼敌2000余人。敌遭我不断打击后，除留一部兵力在海门、启东地区巩固其所占地区外，主力转向对苏中第三分区进行“清剿”，企图继续寻歼第一师主力。

7月10日，敌以6000余人兵力分别对泰兴、靖江、泰州和如（皋）西地区进行“清剿”，构筑据点，修筑公路，并依托据点、公路进行分割、封锁，下乡捕捉我方人员，清查户口，编组保甲。第一师第一旅根据军、师首长的指示，主力适时转移至“清剿”区外，仅留两个营兵力于蒋垛东西地区，协同第三军分区独立团，分散游击，坚持原地斗争；同时，组织强有力的便衣短枪队，插入敌后方，袭扰敌守备薄弱据点。敌在寻歼第一师主力的企图破产后，遂于8月中旬转移兵力，准备对苏中第一分区的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行“清剿”。

9月25日，敌以1500余人首先对江高宝地区的临泽以北进行“清剿”；继于10月16日，又转向对临泽以南、樊川以北地区进行“清剿”。新四军第十八旅根据第一师首长指示，于敌“清剿”前即将主力大分别转移至东台和苏南之丹阳、金坛、武进地区，仅留一部兵力协同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但由于临泽南北均系水网地区，敌集中大量汽艇利用河川频繁巡逻，增加了我军隐蔽、机动的困难，而该区地方武装数量较少，干部又缺乏斗争经验，因而根据地受到较大损失，基本上受为游击区。

敌对苏中地区的“清剿”，持续近半年之久。第一师在敌人不断构筑据点，加修公路，严密封锁情况下，紧密依靠群众，坚持广泛的、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大力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把公开的武装斗争与秘密斗争、合法斗争结合起来，打破了敌消灭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变苏中地区为其占领区的企图，根据地军民得到了锻炼，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

二、开展和坚持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参见附图46）

早在1941年2月2日，中央军委在《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的指示》中就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

1941年4月，日军进犯闽浙沿海地区，连陷镇海、宁波、慈溪和余姚等地，打通了杭（州）甬（宁波）路。国民党军纷纷撤退。杭州湾以南、杭甬

路以北地区沦为敌占区。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即令苏南区党委组织力量，开辟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苏南区党委指示，中共浦东工委于5月派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等部共700余人，先后进入余姚、慈溪和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简称“三北”）地区，采取隐蔽发展的方针，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10月，成立“三北”总办事处，并以一部向姚江南岸发展，初步开辟了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年5月，日军为加强对我国的海上封锁，确保浙江沿海地区，切断浙赣铁路，消除美国空军利用浙江衢州等地机场对日本本土空袭的威胁，发起了浙赣战役。浙赣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纷纷撤退。7月初，日军打通浙赣路全线，浙江大片地区沦为敌占区。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浙东地区的形势，决心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随后，派出谭启龙、何克希等一批干部到浙东，加强与统一浙东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7月28日，中共浙东区委正式成立。8月19日，经华中局批准，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浙东抗日武装力量。同月，成立“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并将部队统一整编为第三、第四、第五3个支队，作为坚持“三北”地区和发展四明山、会稽山地区的基本力量，并组成一支精干武装回浦东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以保持党在上海外围的抗战阵地；同时，部署了发展地方武装、加强根据地建设等工作。

8月初，进攻浙赣线和浙南的日军退守金华、兰溪，并在宁波、绍兴及“三北”地区增设据点，增调伪军第十师对该区的新四军进行围攻。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趁机制造反共军事磨擦。浙东斗争形势骤然紧张。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及时发出指示，指出：浙东游击区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可能，宜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坚持游击战的基础，利用各种矛盾，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切组织和工作保持地方性、群众性，采取隐蔽方式，力求保存与发展自己，达到在浙东保持战略支点的目的。浙东区党委根据上述指示，在党内、军内进行了动员，同时调整了部署：以第三、第四支队向四明山挺进，开辟游击根据地；以第五支队分散游击，坚持“三北”地区，并开辟沿海地区及海岛工作，加强海上活动力量，力求保持从海上与苏中的交通联络。

第三、第四支队于10月初进入四明山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广泛与国民党地方部队及地方上层人士进行联系，争取他们合作抗战；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成立抗日政权，逐步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四明山地区的抗战局面。第五支队在“三北”地区，配合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渔民、盐民的工作，并争取团练了部分国民党地方游击武装，分化瓦解了部分伪军。10月上旬，日军“扫荡”“三北”地区。第五支队在反“扫荡”作战中，取得杨葛殿、竹山岙等战斗胜利，歼敌数百名。10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忠义救国军2000余人，由海盐、平湖侵入“三北”地区，向我第五支队步步进逼。我趁其立足未稳，予以反击，将其大部歼灭，从而巩固了“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

三、粉碎敌对淮海、淮北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冬季“扫荡”

(参见附图 47)

日军第十三军为确保其占领区和陇海、津浦铁路的交通，并为对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阜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作准备，于 1942 年冬季对我淮海、淮北和淮南抗日根据地先后发动“扫荡”。

淮海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11 月 15 日，日军第十七师团一部及伪军第三十六师共 5000 余人，分别由泗阳、淮阴、涟水、南新集镇、沭阳等地出动，向驻小胡庄、陈圩、张圩之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进行合围。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于内线坚持斗争，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第十旅主力大部向灌云东北方向转移。敌扑空后，又在六塘河两岸反复“扫荡”，并构筑据点，修建公路，将淮海抗日根据地分割成数块，尔后实行分区“清剿”。淮海军民经一个月的反“扫荡”作战，共歼敌 500 余人，但根据地被敌严重分割，从而加重了坚持淮海区敌后抗战的困难。

淮北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敌在对淮海地区进行“扫荡”的同时，还以其第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 6000 余人，附以骑兵、坦克，在航空兵支援下，以淮北中心区的青阳

(今泗洪县城)、半城为主要目标，采取分进合击战术，进行大规模的分区“扫荡”，企图歼灭新四军第四师主力，摧毁淮北抗日根据地。第四师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和对敌情的判断，决心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游击，袭扰、疲惫敌人；师主力大部跳出敌之合围圈，向泗县、灵璧方向转移，袭击敌侧后据点及交通线，迫敌回援；在敌回援或撤退时，则集中兵力，相机歼敌一路或数路，粉碎敌之“扫荡”。

11 月 14 日，敌军由泗县、盱眙、宿迁、淮阴、五河等地出动，分五路向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青阳、半城合击。第四师主力大部按预定计划先敌分路转移至外线，使敌合击青阳、半城、双沟、鲍集、管镇，连连扑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则带领广大群众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人走仓空，并开展锄奸运动，逮捕敌探、汉奸；同时，破坏大小道路，不断打击敌人。19 日晚，敌大部兵力撤回泗县城，仅留一部兵力驻守新关、枯河头等地。23 日，敌又分三路再次对青阳、半城地区进行“扫荡”。第四师转入外线的主力部队，抓住敌侧后兵力空虚之机，袭击蚌埠附近敌之大小据点；同时，在泗(县)灵(璧)公路展开破袭战，袭击泗县、灵璧县城，并在宿县以东地区摧毁日伪军据点 20 余处，予敌以沉重打击。29 日，敌大部撤退至泗县城内。

12 月初，敌再次由泗县出动，打通泗县至宿迁公路，控制青阳、马公店、归仁集、老韩圩、金锁镇等要点，企图分割淮北抗日根据地。为打破敌之企图，第四师决心以主力一部首先拔除青阳外围敌据点，孤立青阳；尔后集中主力，攻取青阳。不料敌于 10 日先我行动，以 1000 余人兵力分三路合击第九旅第二十六团于朱家岗(今江苏泗洪县北)。该团奋战终日，击退敌 10 余次冲击，歼敌 280 余人，迫敌撤退。12 日，第九旅一部袭击金锁镇，另一部配合地方武装袭击归仁集；同时，第十一旅一部在骑兵团一部配合下，夺取马公店，并准备协同第九旅一部进攻青阳。敌慑于被歼，遂于 17 日撤出青阳、金锁镇等地。

第四师历时 33 天的反“扫荡”，共作战 37 次，歼敌 800 余人，打破了敌聚歼第四师主力和摧毁淮北根据地的企图，保存了主力，锻炼和加强了地方武装，并使根据地面积略有扩大，对坚持淮北敌后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日军在对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同时，还以其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一部及伪军共 2000 余人兵力，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定远地区进行了“扫荡”，被新四军第二师所粉碎。

四、鄂豫皖边区军民粉碎敌顽夹击， 独立坚持敌后抗战

1942 年，日军第十一军为确保九江、信阳、宜昌、岳阳、南昌之间的占领区及岳阳至湖口的长江航运，不断对鄂豫皖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对我发动军事进攻，均力图消灭新四军第五师。同时，新四军军部与第五师之间的通信联络经常中断，因而第五师在敌顽夹击的严重困难形势下，处于独立坚持鄂豫皖边区敌后抗战的境地。

粉碎敌对鄂东、鄂中区的“扫荡” 1942 年 1 月，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一部 600 余人，由黄冈出动，对鄂东淋山河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摧毁第五师第十四旅的后方。黄冈地方武装广泛展开游击战，阻敌前进。敌被迫退回原地。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等部共 9 个团兵力，向浠水、蕲春、黄梅、广济地区进犯，企图围歼第十四旅主力。我军多次劝阻无效，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自 1 月 20 日至 3 月下旬止，先后取得浠水、广济、漕河镇等反顽战斗胜利，巩固了鄂皖边沿江地带的抗日阵地。

4 月下旬，日伪军数百人进攻大悟山抗日根据地，被我第十三旅一部击退。接着，鄂中之敌又向京山、天（门）汉（川）等根据地进行“扫荡”，我第十五旅主力与地方武装展开游击战，先后共歼敌 500 余人，粉碎了敌之“扫荡”。

抗击顽军对鄂中等抗日根据地的进犯 6 月，国民党军第五战区乘武汉地区日军抽调兵力参加浙赣战役之机，以 10 个师的兵力，对鄂豫皖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发动全面进攻，进占我鄂中、信南、襄西等根据地中心区，到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严重地摧残我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五师以主力一部配合各军分区地方武装，采取伏击、袭击战术，不断打击深入各根据地的顽军；同时，将主力隐蔽集给于机动位置，当进犯鄂中的顽军暂编第一师推进至随（县）南的古城、刘店、圣场（古城东南）一线，处于孤立、突出地位时，奋起反击，予以沉重打击，有效地制止了顽军的进犯。

6 月下旬，日、伪军 2000 余人，由团风、新洲出动，向（黄）陂（黄）安南地区进行“扫荡”。第五师第十四旅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经 3 天英勇作战，歼敌 400 余人，粉碎了敌之“扫荡”。

发展鄂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为发展鄂南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扩大我军回旋地区，新四军第五师决心以一个团的兵力渡过长江，挺进鄂南。5 月 9 日和 14 日，第十四旅第四十一团一部和第四十二团主力奉命分东西两路，先后渡江南下，分别在咸宁地区的西冷、挂榜山和黄石地区的龙角山、大王殿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7 月，两部在咸宁东南高搓桥会合后，建立中共阳（新）大（冶）和鄂（城）大（冶）两个工作委员会，初步打开了鄂南敌后抗战局面。8 月，第五师又增派特务团过江，配合先期到达鄂南的部队向通山以北的大幕山挺进，并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加强争取伪军的工作，建立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鉴于新四军军部与第五师通信联络经常中断，不便实施指挥，7 月 21

日，中央军委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建议，决定第五师暂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但仍属新四军建制。

打退顽军进犯，粉碎敌军“扫荡”，巩固大小悟山等抗日根据地 9月，参加浙赣战役的日军第十一军的部队返回武汉地区，并准备对鄂豫皖边区进行“扫荡”。进占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军闻讯仓惶后撤至大洪山、桐柏山。新四军第五师遂恢复了京山一带抗日根据地。然而，在鄂东，国民党顽固派以其第三十九军协同保安第四旅向我大小悟山抗日根据地进犯。第五师集中主力4个团和地方武装一部，在礼山以北对进犯的顽军保安第四旅实行自卫反击，取得了礼北反顽战斗的胜利。此后，进犯鄂东的各路顽军纷纷北撤。11月，日军开始对鄂豫皖边区大“扫荡”。边区军民即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在鄂东，粉碎了敌对黄陂新街、四姑墩的“扫荡”；在鄂中，击退了敌对京山熊家滩、应城、天门、汉川等地的“扫荡”；在鄂南，击退了敌对保福祠、谭家桥和龙角山的进攻。

12月，第五师师部率5个团在大小悟山抗日根据地整训。敌为围歼第五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以其第三师团主力及伪军一部共万余人兵力，对大小悟山进行大规模“扫荡”。15日，日伪军于礼山和大小悟山周围据点集结，并在平汉铁路、河（口）汉（口）公路沿线建立据点，构成封锁线，以防止我军转移。16日下午，敌分14路向大小悟山逼进，企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围歼我军。第五师及时侦悉敌之行动企图，即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主力趁各路敌尚在运动之际，于黄昏，分17路向安陆、应城和陂安南等外线地区转移。翌日拂晓前，第五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胜利突出重围，转至外线作战，先后袭击夏店及平汉铁路、河汉公路沿线敌之据点。敌在合围扑空，并不断遭受我内线部队的打击和后方据点受袭的情况下，被迫撤退。是役，我军共歼日、伪军200余人。18日，第五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重返大小悟山。至此，鄂豫皖边区空前严重的敌顽夹击，终于被粉碎。

五、放手发动群众，普遍深入地 加强各抗日根据地建设

中共中央华中局在第一次扩大会议后，根据会议决议和所提出的巩固根据地的九项具体措施，作了普遍深入地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部署。要求新四军各师、各抗日根据地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在粉碎日伪军“扫荡”、“清乡”，击退国民党顽军进攻的前提下，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彻底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并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完成改造政权、发展人民武装等各项任务。

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在开辟之初，先后都进行了发动与组织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等工作，尤其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到达华中敌后之后，在中原局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建立政权和扩大抗日武装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战斗频繁，干部和经验不足，因而，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开展得尚不够普遍、深入，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与组织起来。针对这些情况，并根据华中局关于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工作部署，各抗日根据地均确定于1942年集中力量，抓紧反“扫荡”、反“清乡”战斗间隙和夏、秋收获季节，按照中心区、边缘区和游击区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有步骤地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经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等指示的思想准备

和颁布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增加工资、实行合理负担等民主法令的政策准备，以及普遍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组织准备之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至 1942 年冬，基本完成了减租减息、发动与组织群众的任务。由于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的彻底执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形成了“踊跃交公粮，送儿打东洋”，以及拥护抗日民主政府，拥军优属的热潮。

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开始由下而上地进行政权的民主改造工作，在中心区，废除旧的保甲制度，民主选举村、乡政权，并在县以上政权机构彻底实行“三三制”政策，从而提高了工农群众的政治地位，团结了各抗日阶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加强政权建设的同时，大力进行民兵建设。在县区乡各级普遍成立了武装委员会，抽调大批干部从事民兵工作，健全人民武装的领导机构。以乡为单位，普遍组织若干民兵队。至 1943 年底，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民兵总数达 62 万余人，枪 10 万余支。

在此期间，各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坚决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裁减机关，减少脱离生产人员，大力减轻人民负担。各师在军部统一要求下，以一部主力加强地方武装，大力加强军区、军分区，以及县、区武装建设。经过精简整编，主力军一部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更有力地促进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广泛展开。

各师在精简整编之后，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思想建设和军事训练。师、旅根据地分会的指示，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以整风精神检查军队建设问题，强调发扬民主，搞好官兵关系，严格群众纪律，搞好军民和军政关系，健全政治、经济民主制度，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各师、旅经过这次会议之后，各项建设有了明显进展，部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战斗力更加提高。

为了进一步加强根据地建设，集中力量开展对敌斗争，各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同时，在党内进行民主集中制和增强党性的教育，在党政军民各组织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工作制度、方法和互相关系中存在的缺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行，密切了党政军民各组织间的关系，增强了全局观念，并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对发挥各抗日根据地的整体力量，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在进行上述各项建设的同时，为克服财经困难，支持长期抗战，改善军民生活，还大力领导军民发展生产。广大群众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兴修水利，组织互助，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机关、部队利用作战间隙进行生产，努力减轻人民负担，改善本身的生活。经过党政军民共同努力，初步战胜了敌顽的掠夺封锁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困难。

1942 年是华中敌后抗战最困难的一年，敌顽夹击形势十分严重。然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全面加强根据地建设，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发展了地方武装和民兵，因而，在敌顽夹击下，不仅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清乡”和“蚕食”，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坚持了华中敌后抗战，而且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为尔后彻底战胜严重困难和进一步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章小结

1941年和1942年，是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时期。在这两年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准备和进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变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强调起来，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进行频繁的大规模的“扫荡”，其中千人以上至万人的“扫荡”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大“扫荡”达27次，并继续进行“蚕食”和封锁，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在华北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进行“清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多次制造反共军事磨擦。由于敌顽夹击和严重自然灾害，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至近40万人，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但是，“经过这个困难时期，我军和解放区受到了锻炼，数量缩小而质量增强”。

在两年的艰苦斗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战胜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所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通过“精兵简政”、精干了主力军，实现了主力军地方化，加强了地方武装，健全了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促进了广泛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开展；通过开展整风、生产运动，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加强了党性，增强了坚持敌后抗战的物质力量。因而，我军能够在严重困难条件下，粉碎敌之“扫荡”，打破敌之“清乡”，制止敌之“蚕食”，挫败敌之“治安强化运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和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军事进攻，并从各方面积蓄了力量，为转入恢复再发展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开展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打破敌之“总力战”

日军经过三年多时间对我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作战，开始认识到“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采取“多元的综合措施”，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因而，在以“扫荡”为主要作战形式基础上，又采取了“清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等形式，目的在于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我军，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针对敌人的“总力战”，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了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党政军民整体力量，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以及思想文化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公开的斗争与隐蔽的、合法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打破了敌之“总力战”，达到了有效地保存自己，有力地打击和消灭敌人的目的。实践证明，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关键在于实行党的统一领导，才能协调各方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第364页和第411页。

面的斗争，使党政军民形成整体力量，实行全面的对敌斗争。而只有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才能更充分、更有效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和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作用，才能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敌人硬拼，才能不断地消耗与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力量，准备将来反攻。

二、实行“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指导方针，粉碎敌之“扫荡”、“清乡”，制止敌之“蚕食”，打破敌之“治安强化运动”

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敌我之间主要斗争形式是“扫荡”与反“扫荡”、“清乡”与反“清乡”，此外还有“蚕食”与反“蚕食”、封锁与反封锁、“治安强化运动”与反“治安强化运动”等斗争形式。敌以残酷的、频繁的、大规模的“扫荡”为主，并与“清乡”、“蚕食”、封锁、“治安强化运动”相辅而行，企图彻底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其“扫荡”特点：在华北，由1941年以前的分进合击、分区“扫荡”，发展到“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和“梳篦清剿”与“辗转抉剔”，并组织所谓“挺进杀入队”奔袭我领导机关或后方重要目标。在“扫荡”的兵力部署上，采取机动兵团与分散驻守点线的兵团相结合，力求造成兵力上的优势，并在方面军或军的统一指挥下，对我某一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在华中，敌由过去以分散驻守点线的兵力单独对其当面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小规模“扫荡”，发展到集中较大兵力，有重点地对我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所在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扫荡”，并改变过去的正面进攻，采取隐蔽部署，构成合围，尔后迅速地向心突击，妄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我军主力或领导机关。同时，在淮河以北多用骑兵和装甲汽车，在淮河以南和长江南北的水网地区，多用装甲汽艇实施快速机动。由于敌人采取更为毒辣的手段进行疯狂“扫荡”，配合以“清乡”、“蚕食”、封锁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使我抗日根据地出现日渐退缩的被动局面。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我军于1942年春季反“扫荡”作战中，首先在华北实行“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的指导方针，即敌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时，我则深入敌之后方，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配合根据地内军民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从而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创造。此后，通过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在组织和斗争形式上又得到了完善和发展，成为我军对敌斗争的重要指导方针。

实行“敌进我进”，应根据敌之行动采取适当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对敌之“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宜采取派出武装工作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组织领导群众反对敌人的残酷统治，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斗争，打击与分化瓦解伪军与伪政权，建立隐蔽的根据地，变敌之后方为前线，将斗争焦点引向敌占区，使敌不能全力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清乡”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反敌大规模“扫荡”时，“敌进我进”主要表现为敌向我根据地进攻，我则向敌后方进攻。我军除应正确地分析形势，建立严密的情报网以察明敌之行动方向、时间和企图，组织与动员根据地军民做好充分反“扫荡”准备外，还必须把内线广泛的分散的游击战与外线的进攻的破袭战有效地结合起来。在敌人开始“扫荡”时，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作战，消耗、疲惫敌人；而领导机关和主力大

部，应抓住敌已展开向我进行“扫荡”但又未形成严密包围的有利时机，乘敌之隙，分路转到外线。坚持内线作战的部队，要避敌锐势，保存力量，把“打”与“走”有机地结合起来，但“走”不是消极的“躲”，而是在“走”的过程中，抓住敌之弱点，创造有利战机，以便更有效地消灭敌人。转到外线的部队，则组织若干轻快敏捷的支队，向敌之后方交通线和据点展开多点的猛烈攻击，攻其必救，迫其回援；并在其回援时，协同内线部队对敌进行夹击，陷敌于腹背受击的不利态势。此外，“敌进我进”还表现在敌对我这一根据地“扫荡”时，我相邻的其他根据地军民则对当面之敌展开进攻，以牵制敌人，策应被“扫荡”地区军民的反“扫荡”斗争。战争的实践证明，“敌进我进”是变内线为外线、变被动为主动的有效的作战指导方针。我军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并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特别是武工队的形式，这是我军得以扭转被动局面，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因素。

三、实行主力军地方化、群众化，加强地方军和民兵，形成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促进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开展

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后，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根据地军事建设和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普遍实行“精兵主义”，精减主力军，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即以不少于 1/3 的主力军下放给各军分区、独立团、游击支队或县大队作骨干，以提高地方军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同时，撤销各纵队指挥机构，与军区合并，以部分主力旅与军分区合并，以加强地方军的组织指挥，并且以部分地方军加强区、乡群众抗日武装，直接带领民兵、自卫军就地坚持斗争，做到村不离村，乡不离乡，守土抗战。实践表明，精干主力，加强地方军和群众武装，把军事建设的重心由扩大与巩固主力军，转到加强地方军和民兵的建设上来，不仅对当时克服根据地财经困难，减少非生产人员，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加强地方军和民兵的领导，提高其战斗力，促进广泛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也有着重大意义。地方军和民兵、自卫军，在主力军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其对本地区的地形熟悉，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优点，创造出了合乎本地区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诸如地道战、地雷战、交通破击战、麻雀战和水上游击战等。这对于打破敌之“扫荡”、“清乡”、“蚕食”和封锁，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实践证明，这种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是实行人民战争最有效的组织形式，主力军是骨干，而地方军与民兵则是强大的后备力量。正如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中指出的：“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互相结合，这样造成了三者的有机联系。在最严重情况下可实施主力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反之，如在情况便利发展时，则民兵、地方军又可在一定条件下集结起来，配合主力或转化为主力，去完成更大的发展任务。”

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打破敌顽夹击

抗日战争期间，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军事磨擦和掀起反共高潮，因而阶级矛盾有时在有的地区相当尖锐突出。不反击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就不能坚持抗战。1941 年和 1942 年，日本侵略

者更加强调以打击我军为主，国民党顽固派也乘机向我军发动军事进攻，我军处于敌顽夹击的不利态势。然而，敌顽之间存在矛盾，这就使我军有可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打破他们的夹击，坚持敌后抗战。因此，我军处于敌顽夹击的态势时，要在掌握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的前提下，注意利用敌顽之间的矛盾，正确估量敌、顽、我之间的斗争形势，正确判断敌、顽的行动企图，分清主次，紧紧抓住当时对我危害最大的一方，予以打击，而对另一方暂取守势，避免西面作战、腹背受敌。这样，从战略全局上看，我军虽处于敌顽夹击的不利态势，但在局部的战役战斗中则是一面作战。实践证明，只要正确运用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是能够打破敌顽夹击不利局面的。

第五章 开展攻势作战，实行局部反攻， 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第一节 敌后抗战进入恢复发展时期的形 势。我党我军的方针和任务

(参见附图 48，附表 26、27、28、29、30)

1943 年春，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开始了战略反攻。德军转入战略防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阵线的转折。5 月 13 日，北非战场上最后一部分德意法西斯军队向同盟国军队投降。7 月 10 日，美英联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8 月 16 日占领全岛，并威胁意大利本土。这一形势加速了意大利统治集团的分裂，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赶下台。9 月 3 日，意大利政府向同盟国投降。至此，欧洲法西斯阵线土崩瓦解，世界人民看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

太平洋战场的形势也朝着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美军继 1942 年五六月间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海战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后，于 1943 年 2 月攻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从而转入战略反攻，迫使日军转入了战略防御。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在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特别是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有力打击下，受到很大消耗与削弱，其部队士气低落，厌战反战情绪日益增长，士兵投降自杀者日益增多，战斗力下降。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上的失利，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加剧了日本国内矛盾。1943 年 4 月和 10 月，东条英机内阁连续两次改组，内阁成员频繁易人，反映出日本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人对战争前途失去信心，政局不稳。同时战争经济也濒于破产。为了进一步加紧军备生产，特别是舰船和飞机的生产，日本政府自 1942 年底开始实行所谓军需生产总动员，1943 年 6 月制定了《增强军事力量的企业整备基本纲要》，企图以此来全面提高军需生产能力和重新调整分配原料、资金，把已经少得可怜的民需生产也转向了军需生产；并撤销了工商省和企划院，设立了军需省，由首相东条英机兼任军需大臣。由于大力发展军需工业，因此直接军费开支和军需工业投资大幅度上升，而民需生产投资则急剧下降。为了压缩民需，日本政府又制定了《增产粮食应急对策纲要》和《战时衣着简朴化实施纲要》，对粮食、纺织品和其他生活资料实行配给制。加之大批青壮年应征入伍补充前线，军需工业特别是煤、钢铁、铝等工业的扩大，又需要增加大批劳动力，因而出现了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政府除加紧从中国和朝鲜掳掠劳工外，还强制征用国内学生和妇女从事军工生产。这样就更加激起其国内及殖民地人民的厌战和反战情绪。特别是美英盟军加强对日本的海上封锁，以及中国敌后战场军民对日军占领区内工厂、矿山的破坏，使日本由东南亚和中国掠夺重要战略物资的计划无法实现，从而更加促使其战争经济濒于破产。政局日益不稳、经济濒于破产、士兵和人民反战情绪激增，这就从内部动摇了日本帝国主义赖以进行侵略战争的基础。

日本侵略者，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改变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不利态势，阻止美军反攻，急欲尽快结束对华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兵力

用于太平洋战场。为此，在 1942 年 12 月 21 日的御前会议上，制定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即所谓“对华新政策”。企图以大力扶植和加强汪精卫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并对蒋介石施加一定的压力，促成蒋介石、汪精卫合流，以达到其“以华治华”的目的。根据这一方针，2 月 27 日日军大本营制订了 1943 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并发布了《大陆命第 757 号命令》。规定中国派遣军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其占领区，首先力争蒙疆地方、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北部，以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迅速安定；同时，特别强调要确保重要资源开发地区、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安全。在作战指导上，要求把日军分为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并以伪军接替部分日军担任守备，以便抽出日军用于太平洋战场和在中国占领区内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同时，加强航空兵作战，摧毁中、美的空军基地。此外，还决定以由国内调来的 1 个旅团和在华的部分独立混成旅团为基础，扩编成 5 个师团，以接替准备调出的 5 个师团的防备。这样，敌中国派遣军所辖兵力仍有 24 个师团、12 个独立混成旅团和 13 个航空兵中队，共 60 余万人。

在国际形势日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然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既抗日，又反共和“上山”、“观战”政策。1943 年内，除印缅远征军配合盟军在缅北反攻作战中取得一定胜利外，在国内正面战场上，仅在岳阳至沙市的长江南北地区和常德等地进行了有限的几次防御作战。而对内却加紧反共，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同时，在“曲线救国”的幌子下，又有吴化文、孙殿英、庞炳勋、荣子恒等部共 4 万多人先后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进攻我军。

敌后抗日军民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克服了严重困难，坚持了敌后抗战，自 1943 年起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华中地区由于日军进行重点“扫荡”和“清乡”，斗争形势仍处于困难阶段。然而，由于总的形势对我有利，所以困难是暂时的，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为期不远了。

根据日益发展的有利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 1943 年 1 月至 7 月，多次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及敌后抗战的方针、任务向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发出指示。1 月 5 日，毛泽东针对华中敌后抗战的困难局势，在致电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人时指出：“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我军抗战。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他还指出：“整个抗战尚需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1 月 10 日，中共中央也针对华中敌后抗战形势，指示新四军：“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已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并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伪军、伪组织和人民中的合法工作，以便配合我之武装斗争及在必要时隐蔽干部等。”6 月 1 日，毛泽东在致电彭德怀时，对抗日战争的发展又作了重新估计，他说：“抗战还须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去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放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

是农民)经济趋干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二是审查干部,三是保存干部。”“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7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抗战6周年和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的干部晚会上的讲话中,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作了分析。他说:世界战争的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巨大胜利,美英盟军在北非的胜利,美军在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国的6年艰苦抗战是这一根本转变的主要因素。现在法西斯侵略阵线已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同盟国已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今后的问题是彻底打垮法西斯。而解决这个问题要分两步:先消灭德国法西斯,再消灭日本法西斯。今后的一年是欧洲决战的一年。对于中国抗战,毛泽东说:6年来也起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觉悟了,中国有了很大的进步。经过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必然要创造出更加进步的中国,这就是中国的方向。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有了方向还要有政策。就全国来说,我们向国民政府提出四条建议:一是加强作战,二是加强团结,三是改良政治,四是发展生产。至于抗战胜利后怎么办,我们早在去年“七·七”宣言中就说了,希望与各党各派继续合作,共同建国。对于敌后抗战,毛泽东指出:要继续加强对敌斗争,坚决粉碎敌之“扫荡”、“蚕食”;继续加强三三制政权建设,贯彻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等政策,以及开展生产、整风运动。7月2日,中共中央根据上述对党内军内的指示和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加以集中概括,以纪念抗日战争6周年的宣言形式,向国内外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继续坚持抗战的方针、政策。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加强团结,指出“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巩固这个基础,以利抗日,以利配合各同盟国打倒整个法西斯,实在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号召敌后战场军民“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加强自己的责任心,发扬自己的创造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与一切努力和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团结一致,支持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节 华北我军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继续粉碎敌军“扫荡”，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华北敌后抗日军民在 1941 和 1942 年的艰苦斗争中，粉碎了敌人的残酷“扫荡”和“蚕食”，并连续挫败了敌人的 5 次“治安强化运动”。我虽遭到很大损失，但经受了锻炼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从 1942 年冬，冀南、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开始恢复，至 1943 年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均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由于整个战争形势对日本侵略者不利，因而，其华北方面军也日益陷入困境。为摆脱困境和贯彻大本营的方针和意图，敌华北方面军于 1942 年 12 月 26 日和 1943 年 1 月 7 日，先后召开了所属各兵团长和参谋长会议。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讲话中宣称：“华北地区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就担负起兵站基地的任务”。今后“要更进一步发挥野战军的本领，除对重庆军加大压力外，同时要与中国战士合作，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

3 月 24 日，华北方面军下达了 1943 年度《作战警备纲要》，确定将作战重点指向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对国民党军则根据需要，进行抑制或给以打击；要各兵团负责各自警备地区的安定，特别要重视确保铁路及主要交通沿线地区、主要城市及主要资源开发区的安全，并促使伪军积极配合作战；强调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将原来高度分散配置的兵力逐步集中，以便加强机动作战能力；并提出创造和革新战法，强调实施奇袭和急袭，以捕捉我指挥机关和摧毁我根据地设施。为了填补调出之第二十七、第三十六师团的防务，方面军虽将其所属独立混成第四、第六、第十五旅团扩编成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师团，但其兵力仍有所减少，战斗力开始下降。华北伪军数量虽因国民党军大批投敌而有所增加，但因形势对其不利，士气更为低落。

根据日益发展的有利形势和华北对敌斗争情况，中共中央北方局于 1942 年 12 月 23 日发出《关于华北抗日根据地 1943 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1943 年是国际上两条战线进入决战的一年，反法西斯阵线力量在日益增长，而法西斯阵线败局已定。国际国内形势都向有利于我们方向发展。同时，敌寇为挽救其垂死的命运，必将加紧对我们的正面进攻与敌后的“扫荡”。因此，在华北我党我军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以便迎接伟大新时期之到来。同时指出：军事指导原则在于强化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加强民兵建设工作，扩大其数量，提高其政治素质和军事技能，巩固县区游击队，加强军事政治教育，使之成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提高正规军的素质；加强政治攻势，积极开展对日伪军的争取与瓦解工作。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根据上述方针和任务，进一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派遣大量武装工作队挺进到敌人后方，运用各种方式开展军事、政治斗争，恢复根据地和开辟新区，同时积极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并继续开展整风、生产运动和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等各项政策，为反攻作战在精神和物质方面进行准备。

一、派出大批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

根据 1942 年武工队对敌斗争的经验和 1943 年出现的新形势，华北我军派遣大量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恢复和扩大根据地。

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及北方局的指示和中共晋察冀分局 1942 年 9 月高级干部会议的精神，决定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以地方军的全部、主力军的 1/3 或 1/2，分别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据此，北岳区重新划分了部队的活动地区，并由各团、各地区队组织许多支武工队深入敌后，宣传与动员群众，开展镇压汉奸特务、争取和瓦解伪军伪组织、建立两面政权或隐蔽的根据地等斗争。至 1943 年底，北岳区共恢复和发展了 2000 多个村庄，成立了 5 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不仅制止了敌人的“蚕食”，打破了敌人在平汉铁路西建立第二道封锁线的计划，而且争取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冀中区在系统总结对敌斗争经验基础上，要求各军分区全面开展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将连队改为小连大班制，以适应执行武工队的任务。同时，充分利用纵横交错的地道，同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极大地发展了地道战、地雷战，创造了“院落伏击战”、“化装奇袭”等群众性的新战法。满城县民兵配合游击队进行作战，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 42 处。在袭击离保定仅 9 公里的江城据点时，民兵积极参战，数千群众冲入据点，搬运敌军用物资和粮食等。活动在白洋淀的雁翎队及大清河上的水上游击队，利用河川、湖泊、芦苇、草荡等有利条件，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仅在王寨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即毙伤日伪军 50 多人，截获满载粮食及物资的大船几十艘。至年终，我冀中军民共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 600 多个，恢复和扩大了 3500 多个村庄，使许多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从而大大改善了冀中的斗争环境。冀东区于春、夏季也派出大批武工队、小部队深入被敌侵占之丰润、宁河、滦县、遵化、玉田等地区，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攻克据点 40 余处，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基本区，并开辟了北宁铁路以南和滦河以东的一部分新区。同时在热（河）南及昌平、延庆地区挫败了敌之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的计划。

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遵照 1943 年 1 月太行分局高干会的精神，积极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全区共组织近 1000 支武工队和小部队在边沿区和敌占区开展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和在敌占区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武工队在斗争过程中，首先进行除奸反特斗争。冀南和冀鲁豫军区派出的武工队，先后在恩县（今恩城）、巨鹿、南和、成安和单县等地镇压了部分死心塌地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同时，结合政治攻势开展瓦解伪军的工作，并领导群众开展反掠夺、反劳役、反抓丁的斗争。通过上述斗争，不但打击了敌人，而且争取了一些伪军为我工作，控制了一些据点，在许多村镇建立了秘密政权，逐步发展成隐蔽的根据地。经过一年的斗争，冀鲁豫、太行、太岳和冀南等根据地，由武工队和小部队恢复和扩大的面积，约占全年恢复和发展总面积的 3/5。其中，冀南军区逼退和拔除据点 140 多个，恢复和开辟了 10 个县，约占冀南全区面积的 1/5。冀鲁豫第一军分区恢复和发展了 1140 个村庄，

并在齐河、茌平、禹城间开辟了一块纵横 70 多里的游击根据地。太行军区将平汉铁路西侧的广大地区，大部恢复为游击根据地。太岳军区打开了高平、晋城以北，长子、青城、沁水、曲沃、翼城、沁县等边沿区的斗争局面。同时，各区都开展了对敌宣传活动，争取和瓦解了一部分日伪军。冀南军区在伪军伪组织中建立“抗战复仇同盟”、“回心社”、“忠义社”等秘密组织，并在这些组织的配合下，拔除据点 100 多个。同时，还在敌占区大力组织民兵自卫队和群众性的秘密小组，打击伪村、乡政权及汉奸，仅冀南第二、第三、第六等 3 个军分区即建立了 573 个民兵自卫队等组织。

山东军区于 1943 年初决定继续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以 600 多名干部组成 43 个武工队，深入铁路沿线和被敌“蚕食”的地区活动。我武工队领导群众进行反抢粮、反苛捐杂税、反特务活动等斗争，并开展政治攻势。仅胶东、清河、滨海 3 个区在冬季的一次政治攻势中，即散发宣传品共 52 种 16 万多份。此外，武工队还采取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等办法，争取日伪军，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别是铁道游击队积极活动于铁路线上，破铁路、炸火车，夺取军用物资，给枣庄、滕县之敌造成严重威胁。一年中，山东军区部队共拔除据点 342 个，开辟村庄 7000 多个，在伪军伪组织中建立了 1000 多个内线关系，瓦解伪军 7000 多人。经过各种斗争，使鲁中区和滨海区获得了发展，清河区和鲁南区基本上改变了被敌严重分割的局面。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晋绥军区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于 1943 年初决定抽调 320 多名干部加强武工队，并将武工队扩大到 37 支。此外，还派出 39 个主力连和 49 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活动。武工队根据晋绥军区的对敌斗争计划，进入离石至岚县、忻县至静乐、五寨至三岔堡公路沿线及交城以西的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挤”敌人的斗争。第八军分区派出的武工队，在交城西北地区依靠群众，摧毁了由 40 多人组成的特务网，镇压了其中罪大恶极的分子，打击了敌特的气焰。2 月 7 日，又在岔口以西的石沙庄伏击战中，歼敌 28 名，并将 13 具尸体送进岔口据点，使敌受到很大震动。接着对岔口据点进行围困，动员据点周围的群众迁移到根据地内，断绝敌之粮食来源。30 日，我乘敌恐慌动摇之际，袭击岔口，歼敌 40 余人。至六七月间，我第二、第三、第六、第八军分区已基本把敌人挤到汾（阳）离（石）、离（石）岚（县）、忻（县）静（乐）、五（寨）三（岔）等公路线上。与此同时，雁北地区形势也开始好转。至年底，我共拔除敌军据点 58 处，收复村庄 1000 多个，使晋西北地区的斗争形势好转。

在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中，各地区的“日本人反战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的盟员，以喊话、写信、散发宣传品及慰问袋等方式积极参加斗争，对争取瓦解敌军起了很大作用。

武装工作队这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在 1943 年得到了重大发展，对进一步扭转根据地退缩被动局面，对打破敌之“蚕食”、“扫荡”和经济封锁都起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它是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对敌斗争，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

二、开展更加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大力加强民兵建设，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使民兵联防、交通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得到蓬勃的发展。

自 1942 年下半年开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即结合精兵简政，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对地方武装进行整顿与加强，使民兵数量得到发展，质量得到提高。到 1942 年底，晋冀鲁豫地区民兵发展到 9.2 万多人，晋绥地区民兵发展到 3 万多人，自卫队员发展到近 16 万人。晋察冀和山东地区的民兵也有很大发展。

在数量发展与质量提高的基础上，民兵的作战技能与斗争艺术也不断提高。在作战指导上，由过去的村自为战，逐步发展为地区性的民兵联防。民兵边参加生产边监视敌人，发现敌情即以预定的信号通知附近军民作好战斗准备，随时进行联合作战，采取各种方法积极打击敌人。晋绥地区的民兵，在联防警戒线上，设立许多哨位，并在哨位的前方设立武装侦察员，经常深入到敌据点附近监视敌人，一旦敌人出动，立即发出信号，迅速传到全联防区。有的还在敌必经之地挖沟、垒墙、埋设地雷，阻碍和限制敌人的行动。冀中地区民兵，根据本区情况，抓住敌人外出活动的规律，创造了埋伏在碉堡附近、敌人一出门便给以痛击的“堵门战”和埋伏在树林村边活捉敌零散人员的

“捕捉战”。山东地区的民兵，在开展“麻雀战”的同时，还开展了敌人走到哪里民兵打到哪里的“车轮战”，同敌人转圈子的“推磨战”，以及一村打响四处驰援的“蜂窝战”。胶东区沿海民兵，在海上进行游击活动，经常截获和击沉敌人的运输船只，俘虏押船之敌。据不完全统计，山东民兵在 1943 年 3 月到 1944 年 3 月的一年中，共作战 7000 多次，歼灭敌人 2700 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太行地区民兵，在 1943 年 5 月反“扫荡”作战中，参战民兵达 1.5 万多人，作战 2000 多次。敌人在太行腹心区活动时，几乎是“遍地枪声响，村村打敌人”，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有民兵作战。在敌从平顺第二区 7 个村经过时，周围 13 个村的民兵参战，联合起来打击敌人。涉县 89 个村的民兵，在反“扫荡”中作战 200 多次，歼敌 300 多人。各地区民兵积极开展的交通破袭战，给敌之交通运输造成很大困难。晋绥地区民兵，在 1943 年上半年向同蒲铁路和神（池）五（寨）、离（石）岚（县）等 5 条公路线开展了 8 次全面破袭，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收割电话线 4 万多斤。五寨县 7 个村的民兵，对长达 40 多公里的神（池）五（寨）公路，分段负责，按单双月轮流对公路、桥梁、通信设施进行全面破坏，使敌之交通运输、通信联络经常中断；太行区之黎城民兵，在 5 月反“扫荡”作战中，对赵店至东阳关电话线路进行连续破坏，使敌之通信始终不能畅通。

在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中，地雷战得到普遍的运用。民兵埋雷方法和手段越来越巧妙，在对敌作战中发挥了很大威力。太行地区民兵，在 5 月反“扫荡”作战中，巧布地雷阵，在小河沟、大道旁、水缸下、门楣上，凡是敌人可能到达的地方，都埋上地雷，使敌到处遭到杀伤。辽县（今左权）民兵，在山沟内埋设地雷，然后诱敌进沟，拉响地雷，给敌以很大杀伤。平顺县石城村民兵在村口埋雷，敌踏雷被炸后，不得不绕道爬山涉水行进，途中又中了地雷阵，最后只好沿原路回窜。在涉县之赤岸、王堡等地，敌遭我地雷杀伤后，十分惊恐，到处标上“危险区”，连厕所都不敢进。在太行区

5月反“扫荡”作战中，敌共触发地雷1900多个，死伤1000多人。山东地区的民兵，除以地雷阵保卫村庄和惩罚进行抢掠的敌人外，还开展了“飞行爆炸运动”，把地雷变成进攻性的武器。民兵把大量地雷埋在敌人交通线上、据点周围，甚至敌军的操场、办公室、浴池等场所，使敌人到处都有触雷丧命的危险。他们不仅制造了铁雷、石雷、瓦罐雷、瓷瓶雷等，而且埋雷方法也日益巧妙，有拉雷、绊雷、滚雷、水雷、连环雷和真假结合的子母雷等。只要敌人触动连着地雷的树枝或其他东西，都会引起地雷爆炸。鲁中地区民兵在围困垛庄据点的作战中，在据点周围布下层层地雷阵，将敌据点变为囚笼，使敌人寸步难行。晋察冀北岳区民兵，在1943年秋季反“扫荡”作战中，大显地雷战的神威。阜平县城厢民兵中队长李尚忠率领民兵，巧布地雷阵，使进入阜平县城之敌处处遭到地雷杀伤，炸得日军行不敢走路，住不敢入屋，处境非常狼狈。爆破英雄李勇率领的爆破组，在北岳区春季反“扫荡”中以冷枪射击和地雷阵相结合的战法，毙伤敌130多人，在秋季反“扫荡”作战中，又创造以地雷战与麻雀战相结合的战法，共毙伤敌300多人，炸毁汽车5辆。日军曾狂吠要以一百个“皇军”的代价活捉李勇。

地道战在平原地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反“扫荡”和反“清剿”作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冀中根据地的许多地区，不仅形成了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而且还形成了房上、地面、地下“三通”的“立体”的能藏、能打、能防毒、能防水、能机动的战斗地道体系。清苑县冉庄民兵，依托地道工事，两次打退大批日伪军的进犯。第一次日伪军以1个团的兵力向冉庄进犯，民兵在村头伏击敌人后转入地道，利用暗室和高房工事，以步枪、手榴弹火力结合地雷阵，杀伤敌人，毙敌50余人。之后敌又以两个团兵力进行报复，30多名民兵仅有17支步枪，依托地道与敌人作战13个小时，毙敌70多人，我无一伤亡，最后敌不得不撤退。冀南区肥乡县有的地区十几个村的地道互相连接，形成一个广大的地道网，能进能出，能打能退，有的把村落地道变成打击敌人的“迷魂阵”。1943年春，日军2000多人对平乡地区进行“清剿”，我武工队和民兵利用地道与敌人周旋，使敌束手无策。实践证明，地道战是保存自己、打击敌人，坚持平原敌后抗战的有效作战形式。

1943年是群众性游击战争蓬勃发展的一年。不仅在规模和范围上表现出普遍性和广泛性，而且在战术手段上表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对粉碎敌之“扫荡”、“蚕食”，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这是贯彻精兵简政、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加强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的结果。

三、粉碎敌军春、夏季“扫荡”

(参见附图49)

敌华北方面军，依据年度作战纲要，在1943年上半年，将“扫荡”重点指向我北岳、太行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为此，在年初即加紧进行搜集情报、调整部署、加修公路、赶运物资等准备工作。根据敌人的动向，八路军总部于2月27日，向各战略区发出反“扫荡”指示，指出“敌为巩固华北，虽有进攻潼（关）、洛（阳），打通平汉路可能，但更有直接进攻我各根据地可能，各战略区须切实注意与充分准备”。4月21日，八路军总部又进一步指出：敌对太南、豫北发动攻势，可能是今年大规模“扫荡”华北的开始，

其重点可能首先在山西和山东，特别是太行、太岳、北岳地区。敌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将采取集中兵力分区进行“扫荡”的办法，以求对我某一地区之兵力优势。因此，我各战略区应立即加强情报工作和战役侦察，并大力开展伪军工作，争取其部分反正，以钳制和分散日军兵力，破坏其集结兵力进行“扫荡”的计划。我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山东军区均根据上述指示，先后指令所属部队，加紧进行反“扫荡”的准备。

山东我军粉碎敌对清河和冀鲁边区的“扫荡”、 “蚕食”，并抢占鲁中、滨海山区

敌春季大规模“扫荡”首先从山东开始。敌第十二军于1月10日以7000余人兵力分由广饶、羊角沟、利津、滨县、蒲台、博兴等地出动，向小清河以北我清河军区驻地北隋一带合围。清河军区机关立即由蒲台、博兴之间转向敌后，使敌合围扑空。14日，敌又合围我驻高苑西樊家林地区之清西军分区部队，该分区独立团第七连遭敌合击。该连指战员与敌展开激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为配合清西地区军民反“扫荡”作战，清河军区令其他军分区部队在外线广泛开展破袭战，先后攻克沾化东北之韩家科等十几个据点，并一度袭入广饶西关。敌在我内外线部队打击下，大部退集于津浦铁路沿线，清河区军民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1月17日，日军8000余人和伪军4000余人对冀鲁边第二军分区实行合围“扫荡”。敌先后在平原、临邑、陵县间和禹城、济阳、临邑间，以及陵县、临邑、商河、德平间，连续进行3次合围。我军采取分散作战，使敌合围计划落空。敌在“扫荡”我清河区 and 冀鲁边区失败后，于4月22日至29日，又以独立混成第五、第六和第七旅团以及伪军各一部共2万多人，再次“扫荡”我清河区。敌在8天内连续进行3次合围，企图消灭我清河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我清河军区机关与主力部队在侦悉敌之企图后，适时转至外线，使敌围歼我军的计划彻底破产。尔后，敌在我清河区北面，以三里庄为中心，部署日伪军2500人兵力，控制黄河沿线；在南面以7000余人兵力，沿小清河由东向西展开，对我形成夹击态势，并逐步向内“蚕食”。我清河军区遂以一部兵力与民兵相配合，对敌展开广泛分散的游击战，打击敌“蚕食”活动，同时，整训主力，准备在有利时机集中兵力给敌以沉重打击。5月28日，我军先发制人，集中直属团及特务营，以袭击手段，攻克北线敌之三里庄据点，歼灭伪军1个团大部，给敌以有力打击。然而，敌并未放弃其企图，又于6月4日南北两线同时出动，占据我广（饶）博（兴）蒲（台）中心区，并建立据点20余处。我清河军区主力遂转移到利津以北垦区。7月，我军利用青纱帐，乘敌换防之机，发起反击。至9月，我军不仅歼灭伪军3个团，收复被占之中心区，而且恢复了小清河以南部分地区。

在清河区反“扫荡”作战的同时，滨海、鲁中军区部队展开夺取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的战役。沂山、鲁山和诸日莒山区原为国民党军鲁苏战区之吴化文、厉文礼、张步云等部所控制。在吴、厉、张等部投敌后，这些山区变为日伪军控制地区。而夺取这些山区对坚持山东抗战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据此，我山东军区决心以鲁中、滨海两军区部队夺取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同时令胶东、鲁南、清河等军区对当面之敌展开攻击，配合作战。7月初，滨海军区部队对占据诸日莒山区的伪军张步云部发起进

攻，经月余作战，基本控制了诸日莒山区。与此同时，我鲁中军区部队对盘踞于沂水东北和安邱西南之伪军吴化文和厉文礼部发起进攻，经月余作战，歼吴、厉伪军各一部，基本控制了沂鲁山区。从而改善了滨海、鲁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敌为寻歼我晋察冀军区等领导机关，并摧毁我根据地，于4月中旬和5月上旬先后对北岳区之第四、第三军分区进行分区辗转“扫荡”。4月19日，敌华北方面军以第一一师团、独立混成第八、第三、第四旅团各一部共1.2万多人，分别从平山、灵寿和五台、灵邱同时出动，向阜平以南之陈庄为中心的我北岳第四军分区进行合围。敌在控制我四分区四周要点后，逐步压缩包围圈，并利用夜间分数路突入我中心区，企图消灭我指挥机关及部队。我军即以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分别袭击桃林坪、白家河、陈庄、大湾等敌新设之据点，予敌以杀伤；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即就地分散游击，不断阻击和侧击敌人，并在与敌争夺白花山、九龙山等制高点的作战中，给敌人以重创。在我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打击下，至28日，敌“扫荡”我第四军分区的行动遭到失败。29日，敌“扫荡”重点转向我第三军分区。30日黄昏，敌以独立混成第一、第三、第八旅团及第二十六、第一一师团各一部共17个步兵大队，分别由曲阳、满城、定县和倒马关地区出动，采取分进合击手段，于5月1日拂晓，对阜平东北的军城、北晴醒及固城等地构成包围圈，然后以“扫荡剔抉挺进队”奔向各自的攻击目标，大肆捕杀我方人员，挖掘我坚壁物资，毁坏根据地设施。我第三军分区部队立即分散阻击敌人，并在清虚山、马耳山等制高点的战斗中给敌人以较大杀伤。同时民兵展开冷枪射击和地雷战，连续不断地袭击敌人，使进入我根据地之敌难于停留，被迫于5月10日撤退。我军共歼敌1700余人，但根据地也遭受严重损失。

在这次反“扫荡”中，由于敌采取轻装急进，迅速构成包围，进行辗转“扫荡”。而我军当时正分散进行反“蚕食”斗争，加之有的部队缺乏警惕，或对敌情判断不够准确，因而在反“扫荡”开始时，有的部队遭敌合击。但我军很快识破了敌之企图，并抓住敌昼夜连续运动，过度疲劳，翼侧暴露，兵力分散和后方更加空虚等弱点，采取内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积极打击敌人，从而由被动转为主动，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敌第一军在完成对驻晋东南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诱降后，即以其主力及伪军共2万余人“扫荡”我太行抗日根据地。我根据地军民根据八路军第一二九帅的反“扫荡”预先号令和关于反“扫荡”的补充指示，进一步完善了反“扫荡”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5月6日，敌第三十六师团所部分别由潞城向北，由武乡、左权等地向东；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由林县地区向北；第三十七、第六十九师团各一部由陵川地区向北；采取梳篦队形步步压缩，企图将我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帅主力部队围歼于左权、涉县之间清漳河两岸的狭窄地区内。同时，以日军为主组成的所谓“特别挺进队”，化装我军，于夜间由潞城直奔涉县，沿途不

经村庄，不走大路，专门奔袭我领导机关。当敌开始行动时，我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已判明敌之企图，决心乘敌合围圈尚未形成时，总部及第一二九师机关适时迫近敌之合围圈边沿，以便相机转到外线。5日晚，八路军总部先敌由左权东南之麻田西移太岳区，继续指挥反“扫荡”作战。同时，第一二九师师部由涉县西北的赤岸向四北转移，与由左权、武乡东犯之敌对进。当抵达黎城西北的下黄堂地区时，即以警卫部队之一部，迷惑牵制敌人，指挥机关则从敌梳篦队形的间隙中隐蔽地转向外线。8日，各路敌人开始构成以麻田及赤岸等地为中心的合围圈。而此时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已转到外线。敌扑空后，即在我根据地内疯狂地进行

“抉剔清剿”，捕杀我干部和群众。我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和参战的1.5万多民兵，以冷枪射击结合地雷战打击敌人，达到了迟滞、消耗和疲惫敌人之目的，并保卫了根据地群众。与此同时，我外线部队向敌交通线展开破击战。第三军分区部队在民兵配合下，以一部强袭武乡的柳沟；另一部向白晋线出击，攻克沁县东北之良庄，并接连袭击沁县以南的虢亭等据点。第一、第二军分区部队在同蒲、平汉、正太铁路沿线，毁铁桥、炸火车，并一度袭入太谷县城。第五军分区部队，攻克林县。太岳和冀南军区部队分别破击白晋路之沁县至长治段和平汉路之沙河至邯郸段，有力地配合了太行区军民反“扫荡”作战。5月下旬，敌分别向同蒲、正太、平汉铁路沿线撤退。至此，太行区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我军共歼灭日伪军2500余人。这次反“扫荡”作战，由于我正确判断了敌情，作了充分的反“扫荡”准备，领导机关恰当地掌握了转移时机，并发挥我熟悉地形与善于穿插的特长，以及以假动作迷惑敌人，因而使敌围歼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计划完全破产，并遭我有力打击。

四、发起卫（河）南、林（县）南战役，开辟卫南、豫北新区

（参见附图50）

1943年5月，盘踞于豫北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在庞炳勋、孙殿英率领投敌后，与伪军杜淑部合编为伪第二十四集团军，下辖暂

编第五、第六、第七军和独立第一、第二旅及太行保安队等部，分布于新乡至安阳间平汉铁路上各要点及两侧地区，积极配合同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7月10日，平汉路西之暂编第五、第七军和太行保安队共2万余人，在日军第三十五师团3个步兵大队配合下，侵占我太行区之林县城及其周围地区，平汉路东之暂编第六军及独立第一、第二旅共约8000人，侵占我冀鲁豫区卫河以南滑县、长垣间之焦虎集、瓦垭集地区。

为歼灭进犯之敌，保卫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总部统一的作战意图下，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先后发起卫南、林南战役。

冀鲁豫军区鉴于路东之伪军比较孤立、突出，并与庞、孙间存在着尖锐的派系矛盾，遂决心以第十六、第二十一团及新四路、卫河支队和骑兵团一部在部分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于7月30日发起卫南战役。我第十六、第二十一团协同新四路首先在官桥营一带歼灭正向我作试探性进攻的暂编第六军主力1000多人。接着，于31日夜袭击驻焦虎集之第七师师部，经过激烈巷战，

将其全歼。8月2日，我军又突然强袭瓦窑集，战至3日上午，全歼伪独立第一旅1600多人。尔后，我军撤回根据地内休整。19日，我军复出奔袭驻袁庄之伪第七师残部及独立第二旅。在击退由大范庄前来增援之伪军后，集中主力猛攻袁庄，迫其投降。当晚，我又乘胜向伪暂编第六军军部驻地大范庄发动攻击，残余伪军向卫河以西狼狈逃窜。此役，我军共歼灭伪军5600余人，收复和开辟了卫河以南地区。

为歼灭平汉铁路西之伪第二十四集团军主力，我太行、冀南军区主力部队，在太行军区统一指挥下，于8月18日发起林南战役。太行军区首长决心集中优势兵力，首先分割包围和各个歼灭林县城伪军指挥中枢及其周围据点，尔后扩大战果，继续消灭林县以南各据点伪军。其具体部署：以第一、第十、第十三、第三十四、第七七一团和警备第二团为东集团，向林县城北之姚村、城东之横水和城东南之东姚等地伪军进攻，以第二、第三、第二十、第三十二、第七六九团和警备第三十二团为西集团，向林县城及其西南的合涧镇、原康等地伪军进攻；另以主力一部及地方武装对平汉、白晋路之敌加强警戒，以策应主力作战。18日零时30分，我军发起进攻。东集团避开敌前哨据点，以主力插入敌纵深，包围林县城东北之南北陵阳、东西夏城等伪军据点，以吸引林县城之伪军的注意力。西集团则乘势集中主力向林县城及城西、城北敌外围据点发起进攻。战至中午，林县城之伪军全部被歼，残留的头道营之日军据点已被我包围。城西之桑园、郝家庄等据点亦被我军攻占。当日夜，我军集中力量对头道营之日军据点展开攻击，敌乘夜暗退守县城南关据点待援。19日，我又连克马圈、西坛等据点，全歼守敌。在西集团向敌发起进攻的同时，我东集团除准备阻击由安阳出援之敌外，也先后攻占南北陵阳、曲山、姚村等据点。至此，林县城及其周围除南关日军据点外，全为我军收复。20日，我东西两集团乘胜南下，扩大战果。东集团收复东姚、鹤壁、西鹿楼地区；西集团收复合涧镇、原康及临淇、西平罗等地。24日，由安阳出援日军1000余人进抵林县，从辉县出援日军400多人到达临淇。26日，敌从林县、临淇出动进占原康，并西进至连家坡一带，在遭我西集团的迎头痛击后，被迫于当晚渡淇河撤回林县。由于天雨山洪暴发，渡河困难，而且战役之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军乃停止追击，结束战役。林南战役历时9天，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与收复据点80多处，解放了林县以南、辉县以北拥有4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卫南、林南战役，是1943年八路军对敌发动的规模较大的进攻战役。由于正确地判断了敌情，周密地部署了兵力，充分利用日、伪军的内部矛盾，成功地运用奇袭、强攻和大胆穿插、分割包围等战术，发扬我军英勇顽强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因而取得了歼灭日、伪军共1.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开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

五、粉碎敌军秋、冬季“扫荡”

(参见附图51)

1943年上半年由于我军深入贯彻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因而粉碎了敌人的春、夏季“扫荡”，使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与发展。敌华北方面军为了改变其日益被动的局面，根据派遣军总部制订的

《秋季以后作战指导大纲》，修改了方面军的年度作战计划，企图尽可能在秋季，经过长期有组织的作战，摧毁抗日根据地。其“扫荡”重点指向我北岳、冀南、冀东、晋西北和太岳地区。9月1日，敌华北方面军召开所属各军及直属兵团的参谋长会议，下达了作战计划，并要求加快进行“扫荡”作战的准备。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和冀东地区 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为了迷惑我军，敌华北方面军先以一部兵力“扫荡”我平北地区。尔后，于9月2日令第六十三师团及第一一、第二十六、第六十二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各一部和伪军共4万多人，在方面军指挥下，预定以约两个月时间，重点“扫荡”我北岳区之第三、第四军分区。

晋察冀军区根据敌之动向，判断敌“扫荡”即将到来，遂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主力与民兵、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针，粉碎敌之“扫荡”。同时，令北岳区地方武装深入敌人后方，打击敌人，巩固边沿区和扩大根据地，令军区主力于机动位置休整待机，准备反“扫荡”作战和保卫秋收。反“扫荡”作战经历三个阶段。9月中旬，我军开始第一阶段反“扫荡”作战。15日，各路敌军向我根据地边沿区集结。16日至17日，日军第六十三师团和第一一师团共以3个步兵大队在炮兵、坦克兵掩护下，分别从满城、唐县及曲阳、灵寿、平山等地出动；第六十二师团以3个步兵大队从孟县附近出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以3个步兵大队从五台附近出动；第二十六师团以6个步兵大队从灵邱、涞源附近出动。至18日，各路敌军分别占领满城西北的松山、唐县西北的唐梅、平山西北的会口、孟县东北之六岭关和五台东南的蛟潭庄、灵丘以南之下关等地，完成对我第三、第四军分区的合围。为打破敌之合围，晋察冀军区以1/3的主力团和地区队及边沿区的县区地方武装、武工队，越过封锁沟，深入敌占交通线，展开破击战，切断敌之后方供应，破坏其后方设施，以2/3的主力团和地区队于内线，以营连为单位结合民兵广泛展开游击战，在敌必经之地大量埋设地雷，并依托有利地形，以阻击、侧击手段，迟滞、消耗与疲惫敌人。至9月下旬，各路敌军始进入我中心区，并依托临时据点实行分区“清剿”，大肆进行烧杀抢掠。针对敌之“扫荡”特点，我晋察冀军区于20日指示各军分区，利用青纱帐，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粉碎敌之“清剿”。各军分区根据军区的指示，大力组织射击组、爆破组与民兵的游击组相配合，展开麻雀战、地雷战，扼守要道、隘口，打击“清剿”之敌。当敌围攻阜平东北之神仙山和完县西北的青虚山时，为掩护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贮藏在该地的大批弹药物资，我第四十二团和第二团一部坚守制高点，与敌苦战多日，在第六团、特务团等部的配合下，将敌击退。“清剿”我陈南庄地区的3000日军，搜寻半月一无所获，却遭到我军和民兵的不断杀伤。25日，晋察冀军区又令各军分区，除以一部兵力分散活动于中心区及敌后进行游击战外，适当集结主力打击小股“清剿”之敌，以迫其缩小“清剿”范围和缩短“扫荡”时间。遵此指示，坚持内线作战之部队，适时集中兵力给“清剿”之敌以沉重打击。同时，在外线的部队则向敌后交通线和据点发动猛烈攻击，有力地配合了内线军民的反“清剿”斗争。敌在其后方据点遭我外线部队打击的情况下，被迫抽调“扫荡”的兵力回援

其后方，并加强交通线的守备，从而错乱了原定的“扫荡”部署。至10月上旬，我军第一阶段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

从10月中旬开始，我军转入第二阶段反“扫荡”作战。敌在其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缩小“扫荡”范围，并且改以抢粮和合击我领导机关为主。从10月13日起，敌集中兵力对我唐河、沙河、滹沱河流域的主要产粮区进行“扫荡”。我军则以一部兵力掩护党政干部分赴各产粮区领导群众抢收粮食，进行坚壁清野；同时集中主力坚决打击分散“清剿”之敌。至10月下旬，我已抢收完唐河、沙河、滹沱河流域85%的粮食。敌在其抢粮计划破产以后，妄图集中兵力与我主力决战。我军当即以主力一部转向外线打击敌人，大部分散坚持内线斗争。至11月上旬，敌寻我主力决战的企图又告落空。

自11月中旬，我军转入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敌在我军民连续打击下，伤亡已达7000多人，且后方不断遭到袭击，遂自11月中旬开始，改以一部兵力对我进行有重点的小规模奔袭合击，掩护其主力分批撤退。我军则以在内线的主力部队与在外线的部队紧密配合，分别在孟县以北的上社、涑源东南之曹庄台和平山双石洞等地给敌以重创，迫使敌人慌忙撤退。至12月15日，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

我晋察冀北岳区军民在历时3个月的反“扫荡”中，共作战4200多次，歼灭敌军9400多人，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200多处，并一度攻入保定、望都、唐县、完县、浑源等13座城镇，炸毁火车18列，击毁坦克3辆、汽车240多部，击落飞机1架，不仅恢复了根据地原有地区，而且在敌占区收复了1000多个村庄。由于我军根据敌各阶段“扫荡”特点，适时采取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和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法，并充分发挥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威力，以地雷战、冷枪狙击、袭击、伏击等手段打击敌人，因而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胜利。但在这次反“扫荡”中，敌人大肆烧杀，制造了阜平的平阳、易县的寨头、平山的南岗等许多惨案。在8个县中，即烧毁房屋13万间，抢走牲口1.2万多头，杀害我群众5000余人。这表明敌企图在抽调兵力增援其太平洋战场之前，对我根据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摧毁，使我在短期内难于恢复，以便减轻我对其后方和主要交通线的威胁。

敌在“扫荡”北岳区期间，于9月15日至12月中旬，以独立混成第八、第九旅团及关东军和伪军一部共1万余人，对我冀东抗日根据地之长城以南滦河两岸和西部平原进行分区“扫荡”，企图驱逐我军，重新控制冀东平原特别是沿海地区，并乘秋收抢粮。我军改变过去反“扫荡”时以主力向外线转移的方针，采取了在年内分散灵活地穿插和转移，与敌周旋，并寻机歼灭小股“清剿”和抢粮之敌的战法。经过4个多月的反合围、反“清剿”斗争，打破了敌人驱逐我军和控制冀东的企图，迫使敌军退回交通线和中心城市。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敌在“扫荡”北岳区和冀东区期间，其第一军所属部队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也进行了“扫荡”。9月23日，敌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以2个大队由三岔堡、五寨地区出动，“扫荡”我岢岚、保德地区，并于25日、27日进占岢岚、保德县城。26日，敌第六十九师团第五十九旅团之第八十五大队，由岚县以西之寨子村和临县以北之白文镇出动，奔袭兴县城，企图袭击我晋绥区

党政军领导机关。由于我领导机关已先期转移，敌虽于 27 日进占兴县城，但却扑空。尔后，敌北犯瓦塘，并进占裴家川口、黑峪口等黄河渡口，向我河西盘塘河防阵地炮击。在遭我河防炮兵还击后，向南撤退到赵家川口。这时，我晋绥军区判断进犯兴县地区之敌兵力较小，且系孤军深入，交通被我切断，难以在我根据地内久留，遂决心集中 7 个主力团于敌撤退时，采取沿途伏击、逐次围歼的战法歼灭该敌。10 月 5 日，敌由赵家川口向兴县以南之康宁镇方向撤退。当其进至小善畔附近时，即遭我军伏击包围。敌在飞机支援下数次突围，均被我击退。此后，我一面继续围困和消耗敌人，一面在小善畔至康宁镇 17 公里的道路上设伏，并在各路口埋设地雷。6 日晚，敌突围向康宁镇方向逃窜，沿途遭我连续伏击和地雷杀伤，伤亡很大。7 日又被我围困于花子村以南高地。战至黄昏，敌向东突围逃至甄家庄，再次被我包围。敌在我连续打击下，伤亡惨重，特别是后方补给断绝，仅靠空投少量物资作垂死挣扎。10 日晚，残敌 300 余人向东突围，逃至郑家岔又遭我迎头痛击，除 100 余人逃窜外，大部被歼。我军在甄家庄地区连续作战中，共歼日军 700 余人，伪军 100 余人。甄家庄战斗后，敌为进行报复“扫荡”，先后向我兴县、界河口、康宁镇等地进犯。我军以伏击、袭击等手段又歼敌一部。至 10 月下旬，敌分别撤退，我军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是役，我军共歼日伪军 1300 余人。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我根据地军民密切配合，积极作战，成功地运用袭击、伏击和地雷战等给敌以有力打击，尤其是我军及时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对进犯兴县之敌进行三次连续伏击和围歼战，取得甄家庄歼灭战的胜利，对粉碎敌人这次“扫荡”起了决定性作用。

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敌在“扫荡”我北岳区时，即以其第一军之第三十七、第六十二、第六十九师团各一部及伪军共 2 万多人，在飞机支援下，采用所谓“铁滚式”新战法，对我太岳根据地实行毁灭性“扫荡”，妄图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所谓“铁滚式”新战法，即以直接参加“扫荡”的部队及配属之伪军、特工队等，编成三个梯队，在 40 里纵深内分三线配置。其第一梯队以日军为主，配属特工队等，主要任务是合击我军主力兵团，第二梯队由日、伪军混合编组，裹胁大量民夫，编成物资搜索队、俘虏工作队等，其任务是挖掘我方资财，捕捉我地方党政人员；第三梯队又以日军为主，其任务是继续“清剿”，捕捉我零散人员，掩护第二梯队“抉剔”，维护交通运输。另以第六十二师团之一部兵力和伪军一部配置在白晋路之沁县至长治段西侧，切断我太岳、太行联系，阻止太岳我军向东转移，以第六十九师团 1 个步兵大队配置在同蒲路之霍县至洪洞段东侧，阻止太岳我军向西转移。为便于指挥，第一军作战指挥所由太原进至临汾。

10 月 1 日敌开始“扫荡”，第三十七师团自运城、侯马地区向东，第六十九师团由霍县、介休、南关镇地区向南，第六十二师团由长子地区向西南，对我太岳根据地形成包围，尔后沿沁河两侧由北向南推进，首先“扫荡”我太岳北部地区。我太岳第一军分区部队，在民兵配合下，节节阻击，给敌以一定杀伤。至 16 日，敌军推进到临汾至屯留公路两侧。这时，我第一、第二、第三军分区部队分别插入敌后打击敌人，积极策应根据地内军民之反“扫荡”。之后，“扫荡”之敌主力越临屯公路继续向南推进，对在太岳南部地

区我军连续进行合围。由于岳南地区我军主力已先期转移，并在外线不断袭击敌人，使敌接连扑空。我军主力转到外线后，向日军后方交通线广泛出击，先后袭击白晋路两侧之道兴、三家店和同蒲路东侧之赵壁以及石圈河、上阁等据点，并在苏堡地区进行伏击，给日军以有力打击。10月24日晨，我第二军分区第十六团在临汾东北韩略村附近设伏，全歼敌华北方面军为推广“新战法”所组织的旅团长和联队长以下军官120人的战地观战团。敌遭此打击后，慌忙抽调“清剿”兵力一部至临汾地区，从而使其“扫荡”计划开始错乱。10月28日，敌继续南进

“扫荡”我中条山地区的第四军分区。我军就地分散坚持，主动袭击敌人，给敌以杀伤。11月10日以后，敌主力北返，并继续对我太岳北部地区进行反复“清剿”。我主力部队与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保护了群众。在我军民打击下，至22日，敌分路回窜，我反“扫荡”作战结束。是役，我军共作战720多次，杀伤日伪军3500多人。这次反“扫荡”作战，由于我起初对敌作战特点没有掌握，有的部队曾一度陷于被动。但当我发现敌人的新特点后，即以主力转入外线作战，袭击敌后方，截击其运输队，并尾击、侧击“清剿”和搜掠物资之敌，从而变被动为主动。尤其是我第十六团抓住战机，伏击歼灭敌军官战地观战团，对挫败敌这次“扫荡”起了重要作用。

冀鲁豫边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9月21日，敌第十二军以其第三十二、第三十五、第五十九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各一部，共1万余人兵力，分别由新乡、开封、商丘、济宁、兖州等地出动，向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之单县东南地区合围。由于我军先期转移，敌人扑空。随后又向曹县西南地区合围。我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机关和少数部队于王厂村遭敌合围，受到部分损失。但我另一部袭入东明、考城等地，歼敌一部。10月12日，敌又集中日伪军1.5万余人，配属汽车、坦克，并在飞机支援下，由泰安、济南、聊城、滑县、郟城等地出动，采取多路并进、步步为营战法，对我冀鲁豫边根据地中心区之濮县、观城、范县地区实施“铁壁合围”和“拉网扫荡”，妄图歼灭我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我军区领导机关适时跳出敌合围圈，转移到内黄西南地区。主力部队在跳出敌合围圈后，于18日夜袭击东平县城，并连克夏谢、大井等据点11处。我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以伏击、袭击等手段积极袭扰敌人，破坏交通运输线。敌在我内外线部队打击下，于24日分别向开封、济南等地撤退。在撤退时，敌又分别“扫荡”了滑县、长垣地区及平阴以东之大峰山区，至11月13日结束“扫荡”。这次反“扫荡”作战，我军共进行大小战斗300多次，共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并恢复和开辟了部分地区。

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敌 冬季“扫荡”并开展攻势作战

敌第十二军继“扫荡”我冀鲁豫边区之后，又以第三十二、第五十九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1万人，对我鲁中沂蒙山区进行“扫荡”，企图消灭我鲁中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我根据地。敌为寻找我主力决战，首先以伪军吴化文部在沂蒙山北部向朴里集、金星头

地区佯动，企图诱我主力出动，而以日军隐蔽集结于蒙阴、土门（新泰东）、沂水等地，伺机围歼我军主力。我鲁中军区在察明敌之企图后，即决定待各路“扫荡”敌军出动并展开后，军区机关和主力大部转移外线。11月9日20时，集结于上述地区的日军同时出动，以沂蒙山北部之朴里、金星头（蒙阴东北）为中心，由东、南、西三面向我军合围，北面伪军吴化文部在诱我未成后也配合日军南犯，从而对我鲁中军区部队形成四面包围态势。

在四周敌军展开后，我鲁中军区机关和主力大部分路由敌之间隙中巧妙地转到外线，摆脱了敌之合围。敌合围扑空后，即在我根据地内辗转“清剿”。我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部队和民兵游击队分散隐蔽并伺机打击“清剿”之敌。其中，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的第十一团八连93名指战员，为了掩护群众转移，凭借天险，坚守南北岱崮（沂水西北）达15天之久，抗击敌1000余人在飞机大炮支援下的无数次进攻，终以伤7亡2的代价换取了歼敌300余人的胜利，受到山东军区的嘉奖，荣获了“岱崮连”的荣誉称号。至11月中旬，“扫荡”鲁中之敌大部转移至我清河地区。鲁中沂蒙山区反“扫荡”遂告结束。

11月18日，“扫荡”我鲁中沂蒙山区之敌军大部突然转向我清河地区进行“扫荡”，并将兵力增加到2.6万余人，同时配属数百辆汽车，在第十二军司令官直接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和“拉网”等战术手段，并以飞机配合侦察和轰炸，极力捕捉我清河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18日晨，敌以广饶以北之辛店、北隋我军区机关所在地为目标，实行合围，并以骑兵为前导，在飞机掩护下，逐步向内压缩。我清河军区机关于转移中，在辛镇与敌遭遇，情况十分危急。但军区特务营及直属团第三营利用灌木丛和抗日沟（即为限制敌机械化部队行动及便于我隐蔽转移而挖掘的道沟），与敌展开激战，毙伤敌骑兵30余人，并击落击伤敌机3架，阻止了敌之进攻，坚持至黄昏后，掩护机关胜利地突出敌之合围圈。19日，敌继续向利津东北的垦区合围。这时，我转至外线的机关和主力部队，广泛开展破袭战，内线部队与民兵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给敌以很大打击。至12月13日，敌全部撤退。我军在反“扫荡”中，共歼敌600余人，毁敌汽车30余辆，火车1列，攻克敌之据点10余处。

为策应鲁中、清河地区军民反“扫荡”作战，山东军区决定乘敌集中兵力“扫荡”上述两区，其他地区采取守势的时机，于鲁南、滨海等地区对敌展开攻势。鲁南军区根据山东军区命令，决定首先歼灭驻费县城西南东砬子一带的罪大恶极的伪军刘桂棠部。刘系惯匪，投敌后，更加危害人民。消灭该部不仅为人民除一大害，而且对改善鲁南斗争形势有着重要意义。为迅速全歼该部，我鲁南军区决心集中优势兵力，以主力第三团、第五团全部及地方武装和民兵一部，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手段，包围歼灭该敌。11月15日，我参战部队分路隐蔽急进，按预定部署突然将该敌包围，经3小时激战，全歼该敌1000余人，击毙刘匪，并打退敌之增援部队，尔后继续扩大战果，攻克敌据点13处。

在鲁南我军取得歼灭刘桂棠部的胜利后，滨海军区部队对赣榆县城发起进攻。赣榆是敌军“扫荡”与“蚕食”我滨海根据地沿海地区的前哨阵地，由伪第七十一旅李亚藩部共2000余人驻守。该部正准备向北进犯，打通海（州）青（岛）公路。我滨海军区决定先发制人，利用其内部矛盾，争取其一部为内应，采取里应外合的手段攻克赣榆县城，歼灭该敌。11月19日21

时 30 分，我军部分突击队化装伪军，在被争取过来的守城伪军打开城门后，进入城内，接着主攻部队也迅速突入城内展开猛烈攻击。伪军 1 个团为我争取，不加抵抗，我军遂集中兵力打击伪旅部和另 1 个团。在我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下伪旅长李亚藩于 20 日上午率部投降。是役，我仅以亡 3 人、伤 37 人的代价，取得了歼灭伪军 1600 余人、解放赣榆县城的胜利。22 日，驻新浦、青口（赣榆南）之日军 600 余人反扑，我主动撤出赣榆县城。26 日，敌人偷袭我滨海军区机关，军区政委符竹庭不幸牺牲。随后，我军又攻克赣榆附近 13 处据点。

12 月上旬，鲁中军区部队继夏季第一次讨伐伪军吴化文部和粉碎敌对鲁中沂蒙山区冬季“扫荡”之后，决定发起第二次讨吴作战。吴部系山东津浦路东地区最大的一股伪军，占据着鲁山山区，并乘日军冬季“扫荡”之机，进占我沂蒙山北部地区。为巩固和扩大鲁中抗日根据地，12 月 4 日夜，我鲁中军区集中 5 个团的兵力，分 4 个纵队，从 4 个方向对盘踞在鲁山以南、沂水西北之东里店、大张庄、石桥地区伪军吴化文部发起进攻。我军首先由敌之结合部突破，尔后实行分割各个歼灭敌人。经 4 昼夜作战，歼敌 800 余人，攻克据点 20 余处，严重地打击了伪军吴化文部。

敌华北方面军自 9 月发起的秋季“扫荡”，至 12 月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胜利。从此以后，敌在华北除对局部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进行“扫荡”外。再未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1943 年八路军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华北人民的全力支援下，共作战 2.48 万多次，歼灭大量日伪军，攻克据点 740 多处，粉碎了敌人的大规模“扫荡”，打破了敌之“蚕食”政策，使山区各抗日根据地获得发展，平原的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我军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斗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自己的变化。这就为我军 1944 年转入局部反攻创造了条件。我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主要是由于我华北敌后广大军民坚决执行了党的十大政策，特别是开展整风、生产两大运动产生了根本性的效果，使我们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方面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还由于我军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派出大量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和政治攻势，把斗争焦点逐步引向了敌占区；并且更加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进一步创造和发展了许多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所以，1943 年敌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虽仍不断进行季节性的和分区的较大规模的“扫荡”，但均遭到失败。而且我军抓住敌集中兵力分区进行“扫荡”的弱点，乘敌集中兵力对我这一地区进行“扫荡”而其他地区兵力空虚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展开攻势作战，从而大量地歼灭敌人，恢复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并为尔后开展大规模攻势作战积累了经验。这是 1943 年华北我军对敌斗争的新特点和新发展。

第三节 继续开展反“扫荡”、反“清乡”、 反“蚕食”斗争，扭转华中敌后 抗战局面

1943 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渡过极端困难时期，先后进入恢复与再发展的新阶段，而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加紧“扫荡”、“清乡”

和“蚕食”，因而仍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

敌中国派遣军，为了贯彻其大本营的“对华新政策”和 1943 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遂一面大力加强汪精卫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和占领区的殖民统治；一面准备对我华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并将重点指向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苏北、苏中和苏南抗日根据地，以便确保其江苏省北部与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占领区及长江下游的交通安全，并加强对东部沿海重要港口的控制。为实现上述战略企图，敌调整了华中的兵力部署，并以独立混成第十二、第十三旅团和由日本国内调来之独立混成第六十一旅团，分别扩编成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一等 3 个师团，以替补调往太平洋战场的第十五、第十七师团。调整后，敌在华中对我新四军的作战兵力仍保持在 11 万人左右。同时，大力扩充伪军，使其由上一年的 18.5 万余人增加到 22.8 万多人，并用伪军接替部分日军的守备任务，以便腾出日军兵力进行机动作战。

在华中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积极准备向我淮北、淮南、苏南、皖江和鄂豫皖边等抗日根据地进犯。

针对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华中局根据毛泽东 1943 年 1 月 5 日和中共中央 1 月 10 日关于华中地区我党我军应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的指示，于 1 月 28 日向各部发出了《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指出：“在此苏英美力量日益增强，德意法西斯总崩溃为期不远的时候，日寇冒险北进与继续南进虽将遭遇重大困难，但它为着最后挣扎起见，向中国发动局部攻势，尤其对我敌后进行残酷的全面‘扫荡’是势在难免。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局势，一方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更加接近胜利；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抗战局面更加日趋困难”。明确提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全党千百倍提高信心及警惕，在任何严重环境下，咬紧牙关，坚持敌后两年最艰苦的斗争，是目前华中全党最基本的战斗任务”。同时，要求各根据地彻底实行精兵简政，进一步发动群众，加强边沿区、敌占区的工作，并开展广交朋友的工作，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加强党的团结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军事斗争上，强调克服太平观念，对敌之“扫荡”、“清乡”和“蚕食”应作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特别要加强侦察和通信联络工作，加紧对重要物资的分散隐蔽，军政机关必须轻装，经常处在便于机动转移的位置，地方部队及民兵应以分散的游击战就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也要准备进行分散的、机动灵活的作战。并号召华中敌后军民，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遵照华中局的上述指示，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苏北和苏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都作了具体的部署和充分的准备，并领导本区军民展开了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的艰苦斗争。

一、粉碎敌对苏北等地区的春季“扫荡”

（参见附图 52）

早在 1942 年冬，敌在“扫荡”淮海、淮北和淮南等抗日根据地时，即开始向苏北盐阜地区和苏中抗日根据地年各据点增兵，并加紧侦察和作战演习。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敌人的动向，判定前段敌之“扫荡”只是侦察性行动，接着将要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其重

点很可能是苏中和苏北的盐阜地区。因此，要求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应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和不间断的指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1942年底自苏北的盐阜区转移到淮南的盱胎县东南之黄花塘地区。同时，令第一师之第二旅由苏中转移至苏南，以加强苏南反“扫荡”力量。

1943年1月底，敌第十七师团一部自徐州地区向淮阴、涟水方向前进，封锁了盐河及运河交通线；另一部自海州向新集镇（今灌南）、响水口（灌南东北）之线前进。敌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主力则由如皋、东台地区向盐城、兴化、宝应等地集结；原驻江南之敌第十五师团一部也经镇江陆续向兴化、宝应、淮阴、淮安之线前进。与此同时，驻守兴化、淮阴、盐城、响水口等地之伪军亦相继出动。至2月上旬，敌将兵力增至1.4万余人，并完成对我盐阜区和国民党军韩德勤部所在的淮安以东地区的包围。

根据上述情况，新四军军部判断敌很可能首先“扫荡”韩德勤部，然后再转移兵力“扫荡”我盐阜区。为了粉碎敌之“扫荡”，保卫苏北抗日根据地，军部于2月16日向第三、第四、第一师发出反“扫荡”作战指示。指出敌“对盐阜区之‘扫荡’是局部性的，非华中全区性，时间似不会很长。”据此，“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坚持与保卫盐阜区根据地，粉碎敌人‘扫荡’，并适当配合友军作战，扩大我之政治影响，以促进全国团结和国共关系的改善。”同时要求第三师应立即拟定盐阜区反“扫荡”的作战计划。并指出在敌“扫荡”开始时，师主力可以暂避敌之锐气，但必须掌握一部分主力在盐阜区，选敌弱点，不失时机地予以打击，以鼓舞党政军民坚持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情绪，已过盐河进到淮海地区的第七旅，应立即停止于适当地区，迅速准备配合盐阜区反“扫荡”作战。同时，要求第一、第四师及第十旅，应在苏中、淮北及淮海等地区，积极袭击敌之据点及交通线，配合盐阜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此外，还要求第三师和第一师之第五十二团，在敌向国民党军韩德勤部进攻时，应以游击战打击和钳制敌人，配合韩德勤部作战，但要谨防其乘机破坏我根据地。

根据华中局及军部的指示，苏北党政军民紧张地进行了各项反“扫荡”准备工作：在全体军民中进行动员，增强反“扫荡”的必胜信心；精简党政军机关，充实基层单位，加强反“扫荡”的骨干力量；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大力改造地形，以利我之隐蔽和限制敌之行动；开展伪军、伪组织的工作；肃清匪特奸细，控制会道门和流氓分子等等。与此同时，第三师（兼苏北军区）还确定了反“扫荡”作战部署：以第八旅主力和第七旅之第二十一团及盐阜军分区地方武装，坚持盐阜区内的反“扫荡”斗争；以第七旅主力和第八旅之第二十二团在敌“扫荡”开始时，转移到淮海区，与在该区的第十旅配合行动，积极策应盐阜区反“扫荡”作战；师部于敌“扫荡”临近前，分散转移至盐（城）东与苏中交界地区指挥反“扫荡”作战。

22日，敌由宝应、淮阴、淮安、湖垛（今建湖）和涟水等地出动，首先对淮安以东之凤谷村和曹甸地区的国民党军韩德勤部进行合击。韩部在敌进攻下，一部投敌，大部在我军掩护下退入淮海抗日根据地。16日，敌在占领韩部所控制的地区后，即向我盐阜区发起大规模“扫荡”。我盐阜军民立即投入了艰苦的反“扫荡”作战，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我军反合围作战阶段。2月17日，日军第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分别由东沟（阜宁西南）、

湖垛、沟安墩（阜宁南）、陈家洋（阜宁东）和新安镇（阜宁西北）等地出动，向我盐阜区之东坎（阜宁北）和八滩（东坎东北）地区合击，企图围歼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为避开敌之锋芒，我第三师除留一部于内线阻击，迟滞敌人，与敌周旋外，师部和第七旅主力及第八旅一部，分别向阜（宁）东和淮海地区转移。敌合围扑空后，于21日又分多路，以“梳篦拉网”战术，连续合击我阜东和滨海地区，继续寻歼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我第三师除令坚持内线斗争的第八旅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以分散的游击战积极打击敌人外，师部于敌合围前已先期转向盐（城）南地区，使敌再次扑空。与此同时，活动在淮海区的第三师之第七、第十旅和苏中、淮北、淮南之第一、第四、第二师的部队，不断袭击当面之敌军据点和交通线，有力地策应了盐阜区的反“扫荡”作战。在内外线我军的打击下，敌于26日被迫停止了全面“扫荡”。

第二阶段，为我军反“清剿”作战阶段。2月27日，敌又集中兵力开始对我阜宁东、西以及射阳河以东地区进行分区“清剿”，并修筑公路，安设据点，建立伪政权，妄图长期控制该地区。我坚持内线斗争的第八旅和地方武装及民兵密切配合，不断地袭扰敌人，先后袭击了陈集（阜宁西）、东沟等据点和阜宁县城。处在外线的第七旅等部与地方武装，亦先后在涟水、湖垛、伍佑（盐城南）和沙沟（兴化北）等地打击敌人。敌在我内外线部队的有力打击下，顾此失彼，不得不于3月初开始收缩兵力，准备撤退。根据敌人的这一动向，新四军军部于3月3日令第三师密切注视敌人行动，准备适时集中兵力。尾追、侧击撤退之敌，攻取敌之薄弱据点，以恢复原有地区。

第三阶段，为我军反击阶段。3月11日，各路“清剿”之敌开始向新浦、淮阴、盐城等地撤退。我第八旅根据军部的指示，立即集中兵力在内线实施反击。自14日起，以伏击、袭击等手段，先后在阜宁以西和以北地区进行了七套、黄营子、单家港、陈集等重要战斗，歼灭日伪军500余人。向淮阴撤退之敌，曾对我进行反扑，3月18日，我第七旅第十九团第四连，在淮阴北之刘老庄遭数千敌人合围。该连82名指战员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苦战竟日，打退敌人多次冲击，毙敌170余人，最后在敌猛烈炮火轰击下，全部壮烈牺牲。为了粉碎敌之“扫荡”，第三师各部于3月25日展开了全面反击。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紧密配合，内外线部队互相策应，以“围点打援”、伏击和袭击等手段，先后攻克和收复了东沟、花墩头（盐城西北）、八滩、钦工（淮阴东）和湖垛等据点10余处。至4月14日，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

此次反“扫荡”作战，由于我军在反“扫荡”作战前对敌情掌握准确，准备充分，部署周密；在反“扫荡”作战中，部队行动迅速、机动灵活，内外线配合默契，并在敌将要撤退时迅速集中兵力，适时发起反击，因而较顺利地粉碎了敌之“扫荡”，取得较大胜利。是役，我共歼敌18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挫败了敌消灭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并控制苏北的企图，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斗争情绪，为以后恢复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敌在“扫荡”我盐阜区期间，错误判断新四军军部已西移皖中，为此，于三四月间对我皖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扫荡”。3月17日，日伪军6000余人，由巢县、无为等地出动，以分进合击战术袭击我第七师领导机关。我第七师师部率主力避实击虚，跳出敌合围圈后，在外线攻克无为东之三官殿、汤家沟敌军据点，破击淮南铁路，歼日军一部，迫使“扫荡”之敌于30日撤

退。4月30日，日伪军2000余人，又向我巢无根据地进行“扫荡”。我第七师以内外线作战相结合，攻克槐村镇，并在高林桥歼日军一部，迫使“扫荡”之敌于5月6日撤退。

与此同时，敌第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在由苏北盐阜区分别向西向南撤退途中，还“扫荡”了我淮北和苏中部分地区，但均被我军所打退。

在此前后，活动在鄂豫皖边区的第五师部队，亦连续粉碎了敌对平汉铁路两侧我之根据地的“扫荡”，一度攻克应山之双河、浙河和安陆之马尾塘，并袭入云梦县城关和武昌之油房岭及黄冈之柳子港等据点，歼灭敌人一部，保卫了抗日根据地。

二、粉碎敌对苏中等地区的“清乡”

(参见附图53)

1942年12月1日，敌中国派遣军和伪中央“清乡工作委员会”制定了《1943年上半年清乡工作要领》，确定除在苏南继续进行“清乡”外，将“清乡”地区扩展到苏中南通和浙东余姚等地区，并以对其南京、上海及长江下游威胁最大的苏中区为重点。由于敌兵力不足，故在对苏中“清乡”时，以临江濒海、易于分割封锁的第四军分区的南通、如皋、启东和海门地区，作为首先“清乡”区。敌计划从4月开始以6个月为期，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2个月时间进行军事“清乡”，第二步，以4个月时间进行政治“清乡”，企图达到消灭或驱逐我领导机关和武装力量，变我抗日根据地为其“治安区”的目的。为实现上述计划，敌从江南调来有“清乡”经验的第六十师团4个大队，以及伪军、警察、特务和行政人员共1.5万余人；并从苏南等地运来大批竹子，编制封锁篱笆；同时，还在南通成立了“清乡”指挥机构。

根据敌之企图和动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1943年3月16日发出反“清乡”斗争指示，明确指出：国际形势日益对敌不利，我根据地已相当巩固，并取得了苏南反“清乡”的经验，只要我们依靠群众，正确执行各项政策，因地制宜，灵活运用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等斗争策略，就必能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同时还指出：敌之气焰十分嚣张，我们不能轻敌麻痹，必须进行充分的反“清乡”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坚决给敌以沉重打击。苏中区党委和军区，根据这一指示和苏南反“清乡”的经验，确定了就地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反“清乡”斗争方针，要求在敌“清乡”区内的部队和地方党政组织，应团结广大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击敌“清乡”部队，镇压敌“清乡”人员，粉碎敌之“清乡”计划。特别是敌可能进行重点“清乡”的第四军分区，更应把反“清乡”斗争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从各方面做好准备。要求在“清乡”区外的主力部队和各军分区，应以积极行动配合“清乡”区内军民的斗争。

按照上述指示，我第四军分区和地委及专署首先在全体军民中进行了坚持反“清乡”斗争的意义和有利条件的宣传教育，以增强信心，鼓舞斗志，同时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开明地主、士绅及文教界人士参加反“清乡”斗争。其次，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精减机关，建立了短小精悍、坚强统一的县区乡党政军领导机构，并选派有斗争经验、能联系群众、能指挥作战的干部担任领导；同时对敌可能安设据点的村镇，建立了

秘密党组织，布置了边缘区和敌占区的秘密工作。第三，在军事部署上，以主力一部并组织大批短枪队和狙击组，协同民兵分散在“清乡”区内打击敌人，以主力大部部署在敌“清乡”区的外围，随时策应“清乡”区内的斗争。第四，大力开展伪军和伪组织工作，利用社会关系秘密控制了部分伪军和伪“清乡”机构。第五，为了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和错乱敌之部署，3月下旬，苏中军区和第四军分区领导机关和大部分主力，分别转向“清乡”区的外围，并以主力一部，乘敌调防之机，向“清乡”区内外之敌展开攻击，先后在如皋、南通境内攻克据点10余处。与此同时，苏中其他军分区也进行了坚持艰苦斗争的准备，并对支援第四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作了相应的部署。

4月1日，敌开始对苏中第四军分区进行军事“清乡”。南通、如皋、海门和启东境内各据点之敌纷纷出动，采取“梳篦拉网”战术，分多路向我中心区之南通县中部和海（门）启（东）以北地区反复合击，企图寻歼我领导机关和部队；同时大量安设据点，并以此为依托不分昼夜地四出“搜剿”。伪“清乡”人员则在日伪军的掩护下，挨家清查户口，搜捕我党政干部和民兵，并建立伪政权。在此期间，敌还在“清乡”区的边缘，沿河川、道路赶筑了20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对“清乡”区构成了包围圈；并在封锁线上修筑碉堡，设立瞭望哨和检查站，盘查来往行人，妄图以此隔断我内外联系。

为打破敌之“军事清乡”，我内外线军民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反合击、反“搜剿”、反封锁的斗争。当敌开始对我合击时，我除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内线斗争外，大部主力则转移到“清乡”区边沿线上，在双（甸）岔（河）、马（塘）掘（港）和林（梓）白（蒲）等公路沿线，袭据点，毁交通，配合内线破坏敌之合击，尔后转至敌封锁线外继续打击敌人。在敌深入我中心区进行“搜剿”时，我留置在“清乡”区内的主力、地方武装及民兵，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在敌空隙中灵活穿插，避敌主力，专打敌

“清乡队”；并大量组织短枪队，潜入敌据点和城镇，袭击敌“清乡”机关，捕杀敌“清乡”人员。仅在敌“清乡”指挥中心的南通城内，即先后捕杀100多名敌“清乡人员”，同时，以抗日民主政府名义颁布了严厉镇压汉奸的《反清乡紧急治罪条例》，给敌人以很大震动。在此期间，我在敌“清乡”区内的400多个乡都迅速组织了以党员、民兵为骨干的锄奸组、狙击队，在广大群众配合下，严厉镇压伪清乡人员，使敌人陷入我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处处遭到痛击。与此同时，我以主力一部带领广大群众在敌“清乡”区的边缘线上，开展群众性的反封锁斗争，袭击敌“盘查哨所”，破坏敌之封锁篱笆，仅4月和5月即有组织地破击100余次，参加群众达几十万人次，烧毁敌用于筑封锁篱笆的竹竿达500万根以上。为了策应内线反“清乡”斗争，转至外线的第三旅之第七团和苏中其他军分区部队，亦在东台、兴化等地进攻敌人，先后攻克安丰、富安、钓鱼庙等10余处据点，有力地策应了内线的反“清乡”斗争。至5月底，敌“军事清乡”即告结束。

接着，敌转入分区“政治清乡”，妄图实现其“6月强化启东”，“7月强化海门”，“8月强化南通”，“9月强化如皋”的计划。6月初，敌集中大批军、警、宪、特和保甲人员，在海启地区开始政治“清乡”，实行和平编查保甲。首先诱迫部分地主、士绅、国民党党员及旧乡、保长等组成“编查委员会”；尔后利用他们清查户口，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保连坐”，

举办壮丁训练，编组“反共自卫团”、“爱乡会”，推行自首政策，并搜捕我党员、干部、民兵及群众团体成员，破坏我党政民组织。针对敌“政治清乡”所采取的手段，我首先充分揭露敌人和平编查保甲的阴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编查；同时对地主、士绅及旧乡、保人员进行教育，晓以民族大义，使其不为敌所利用，瓦解其编查组织，并广泛动员青壮年参加民兵，与短枪队密切配合，打击小股敌人，严厉镇压“清乡”人员和汉奸，从而挫败了敌和平编查保甲的企图。随后，敌又改为以武力为主，将群众集合起来或挨家挨户进行强制编查保甲。我即以游击队和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掩护群众进行反编查斗争，只要游击队枪声一响，群众就乘机逃散，使其不能顺利进行编查。当敌集中力量在启海地区编查保甲时，7月初我以主力一部挺进南通县西部和中部地区，对敌展开大规模的破袭战，攻据点，破公路，毁篱笆，迫使海启地区武装编查保甲之敌匆匆回援。当敌回援时，我海启军民又乘机镇压伪保甲人员，摧毁保甲组织，从而打乱了敌分区“政治清乡”的计划。8月以后，敌不得不将分区“清乡”改为“机动清乡”。针对敌兵力不足和伪军、伪组织恐慌动摇等情况，我自8月15日起，对整个“清乡”区的日伪军政人员，发动了一次全面的政治攻势。接着于9月16日至18日，又以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对敌发动了一次全面的军事攻势。在我军政攻势打击下，敌龟缩于据点内不敢妄动。南通境内十几个据点的伪军，经我秘密争取，也先后反正。至此，敌“政治清乡”又被粉碎。

敌在6个月的军事、政治“清乡”计划破产以后，仍不甘心失败，又实行3个月的“延期清乡”，企图以更加残酷的烧光、杀光、枪光的“三光”政策，彻底破坏我根据地。为此，敌调整了兵力，在每一个县组织一至两个机动部队，对我进行机动“清剿”：另以宪兵、警察和行政人员组成“武装特务突击组”，在我中心区继续编查保甲，建立伪政权。当时正值青纱帐落，敌活动非常便利，我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和党政组织，不断遭到敌人的袭击和破坏。在此严重情况下，为了减少损失，坚持斗争，第四军分区确定在中心区内相对减少公开的军事活动，加强秘密和合法的斗争；主力部队则到“清乡”区边缘和敌占区积极打击敌人。本此方针，我第四军分区迅速整理和恢复了遭受破坏的党政民组织，轮换了一批长期在“清乡”区内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干部，并对群众进行鼓励慰问和抚恤救济。接着，我党政领导机构，组织群众开展秘密的与合法的斗争。当敌强迫编保甲时，我即以假报户口来敷衍；当敌抓壮丁编组自卫队时，我即派人参加，从中控制；在敌设立瞭望台时，我即打入，使之变成我之警戒哨；对死心塌地之汉奸则坚决镇压；同时，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在边缘区和敌据点附近分散游击，积极打击敌人。经过3个月的艰苦斗争，至12月底，敌之“延期清乡”计划又被我军民所粉碎。

苏中军民，在9个月的反“清乡”斗争中，共作战2100余次，摧毁敌据点49处，歼灭日伪军和“清乡”人员共2400余人，并争取了伪军和伪行政人员1700多人向我投诚，从而挫败了敌人的“清乡”计划，削弱了敌人的力量。但是，我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根据地遭到摧残，被杀和被抓走群众达6.2万多人，被烧毁房屋5100多间，被抢走粮食1000万公斤。

在苏中反“清乡”斗争期间，我苏南、浙东和鄂豫皖边区军民也展开了英勇的反“清乡”斗争。在苏南，敌自3月到8月，先后在丹（阳）北、茅山等5个地区进行“清乡”。我苏南军民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顽强地进行了斗争，粉碎了敌对苏南地区的“清乡”。在浙东，敌于2月开始，

对庵东、慈溪、镇海等地进行“清乡”。我浙东军民，在敌“清乡”区的外线积极展开斗争，制止了敌人的扩张。在鄂豫皖边区，日军于6月下旬结束湘北、鄂西战役后，即成立“清乡”机构，调动兵力，开始对我云（梦）孝（感）安（陆）一带和黄冈等地实行“清乡”。我边区军民，一面以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区乡武装，带领群众与敌“清乡”人员作斗争；一面以主力一部配合各县武装，在外线袭击敌据点，破坏敌交通，打击分散之敌，最后，挫败了敌之“清乡”。

1943年，敌对华中敌后根据地、特别对苏中地区的“清乡”，是在总结苏南“清乡”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清乡”时间之长、动员人力物力之多、采用手段之毒辣，都是空前的。但是，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正确领导下，我苏中等地军民团结奋战，密切协同，终于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一、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使全体军民树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决心，并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好对付敌人可能采用各种毒辣手段的准备。二、坚决依靠根据地的广大基本群众，并团结中小地主、开明士绅，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对敌。三、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打击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分子，以教育和争取动摇分子，分化和孤立敌人。四、以武装斗争为主，同时又根据斗争形势变化，把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开展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五、采用内外线结合的方针，以一部主力为骨干，结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内线分散坚持斗争；同时以大部主力在外线不断向敌之要害和弱点进攻，陷敌于顾此失彼、被动挨打的境地。

三、粉碎敌对苏北、淮北、苏中、 鄂豫皖边等抗日根据地的 “蚕食”

敌为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在实行反复“扫荡”、“清乡”的同时，还以据点和交通线为依托，不断向我华中敌后根据地进行“蚕食”，其重点是苏北、淮北、苏中和鄂豫皖边区。

在苏北地区，从1942年冬开始，敌在“扫荡”我淮海区时，即加修公路，广设据点，尔后依托这些据点，向四周“蚕食”。我淮海区军民，针对敌之“蚕食”特点，积极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反“蚕食”斗争。首先，军民协力投入声势浩大的破路斗争，将新集镇（今新沂）、灌云、涟水、淮阴、沭阳之间的许多公路挖成交通沟，切断了敌各据点之间的联系，使之陷于孤立。接着，在敌孤立据点周围，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打冷枪，围据点，争取和瓦解伪军，从而更加壮大了群众性反“蚕食”斗争的声势。1943年5月以后，我军主力又乘青纱帐起和敌恐慌动摇之际，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发动以攻取沭阳东南之塘沟为中心的夏季反击，相继攻克据点10余处，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从而粉碎了敌人的“蚕食”，使淮海抗日根据地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态势。在盐阜区，我军取得春季反“扫荡”胜利之后，也投入了边缘区的反“蚕食”斗争。9月下旬，我第八旅主力乘敌调防之际，向潮河以南之小尖子、六套地区发动攻势，攻克大小据点20余处，完全恢复了滨海县原有地区；之后，又派出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活动，开辟了部分新区，

有力地配合了边缘区的反“蚕食”斗争。

在淮北地区，敌于1942年冬季“扫荡”中打通泗（县）宿（迁）公路后，即在该线增设了10余处据点，并“蚕食”了我淮（阴）泗（县）和邳（县）睢（宁）铜（山）地区的东陈集、顺河集及土山、叶场等地，进一步分割了我之基本区。我淮北军民以武装斗争为主，展开了以泗宿地区为中心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在夏秋之交，我第四师一部先后在泗宿公路沿线及淮泗、邳睢铜地区，拔除罗圩、顺河集、叶场等据点26处；并以武工队深入泗、灵、睢、宿等县的敌占区，恢复与开辟了13个区、70多个乡的游击区，基本上制止了敌人的“蚕食”活动，稳定了边缘区的形势。

在苏中地区，敌在对南通、海门、启东等地实行“清乡”的同时，还对我苏中其他根据地的边缘区进行“蚕食”。我苏中军民一面进行反“清乡”斗争，一面抽调干部加强边缘区的领导，发动群众打击敌之“蚕食”活动。仅在夏季，泰州、泰兴、靖江和如（皋）西等县的民兵就作战300余次，直接参加围困敌据点的群众达30多万人次。我苏中军民的英勇斗争，不仅粉碎了敌之“蚕食”计划，而且还扩大了根据地。

在鄂豫皖边区，敌自6月下旬起，除对我平汉路两侧之大小悟山、黄冈和云梦、孝感等地进行“扫荡”、“清乡”外，还对我根据地边缘区进行“蚕食”。为打破敌之“蚕食”计划，我第五师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及民兵，对敌展开群众性的破袭战，打击敌之“蚕食”行动；同时组织武工队深入敌之据点附近，对敌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并恢复党的组织，变伪政权为两面政权，从而遏制了敌之“蚕食”。在此前后，我第五师还令第十五旅和第三军分区部队，分批挺进襄（河）南和江南洞庭湖畔，先后开辟了洪湖和桃花山等游击根据地；同时还恢复了襄（河）西大片地区。

华中敌后军民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有效地制止了敌之“蚕食”，恢复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1943年是华中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一年。但我华中敌后军民，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开展了整风、生产运动和群众工作，加强了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大力发展了民兵和地方武装，有力地促进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开展。一年来，华中我军共作战4500余次，粉碎了敌之“清乡”、“蚕食”和30多次千人的“扫荡”，歼灭日伪军达3.6万余人，并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建立洪泽湖反共阵地的计划。因而，扭转了局面，渡过了“难关”，为在华中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第四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 第三次反共高潮

（参见附图54、55）

1943年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日、意法西斯已处于不利地位，盟军已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国内的敌后战场渡过了最困难的两年，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因不满蒋介石的黑暗统治而纷纷举义。在此形势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方面希望盟军迅速战胜法西斯德国之后，集中力量打败日本，他可以不费气力地赢得抗战胜利；

另一方面，担心抗日战争胜利，国内人民更加觉醒，共产党和民主力量更加壮大，他的反动统治将难以为继。为了维护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和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于3月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公然把“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加在我党头上，污蔑我党我军为“奸党”、“奸军”和“新式军阀”，污蔑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为“新式割据”；并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与此同时，密令其包围我各抗日根据地的第一线部队对我进行严密封锁，阻止我军向外发展，并要求各“清剿”部队认真包围进剿，彻底消灭我军，如不可能时，即将我军向敌伪后方压迫而封锁之。

3月上旬，驻华中阜阳、蒙城地区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越津浦铁路东犯我淮北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盘踞在淮阴地区之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也乘日军对我苏北进行“扫荡”之机西犯，侵占我苏北淮海区宿迁以东之里仁集、陈道口等地，企图接应王仲廉部东进，建立洪泽湖畔新的反共阵地，切断我苏北和淮南根据地的联系。3月中旬，韩德勤率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西渡运河，进占我淮北中心区青阳镇（今泗洪县）以北之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地区，并令第八十九军赶赴灵壁以北接应王仲廉部。顽军所到之处，大肆摧残我抗日民主政权，屠杀我抗日军民，从而激起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极大愤慨。为粉碎王、韩东面对进的图谋，保卫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军部决定在王、韩两部会合前，首先给韩部以痛击，然后再转移兵力阻止王部东进。3月17日夜，新四军第四师主力在第二、第三师各一部配合下，对盘踞于山子头一带之韩部进行自卫反击，战至18日上午，俘韩德勤以下官兵1000余人，迫使已经越过津浦铁路东进至灵壁以北地区的王仲廉部以及韩部之第八十九军仓惶退至津浦铁路西，从而粉碎了顽军东进夺占我淮北地区建立反共阵地的计划。山子头战役后，新四军仍以团结抗战为重，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韩德勤释放，归还其部分人枪，并划出睢宁、宿迁之间地区由其驻守，以促其与我共同抗日。4月上旬，国民党军第三成区顾祝同部乘日伪军对我苏南茅山根据地进行“清乡”之机，调动其第二十三集团军之第二十八军的两个师向我溧阳、溧水地区进犯。我新四军第十六旅奋起自卫，激战3昼夜，将顽军击退。

蒋介石在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的同时，令第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部由皖北出动，经冀鲁豫边区进犯我山东抗日根据地。5月，李部主力进占我单县、砀山和巨野以南地区，对我微山湖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形成三面包围。我冀鲁豫军区遂集中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部，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援下，对进犯之顽军展开有力反击，迫使李仙洲部退至成武地区。

蒋介石在上述反共军事行动受挫后，继续窥测时机，并积极准备进攻我陕甘宁边区，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内战。5月15日，共产国际根据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需要，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认为这是他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有利时机。于是，他一方面指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假借“民众团体”的名义发出通电，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另一方面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拟定了《解决中共问题之方案》，提出“利用第三国际解散时机”、“在军事上施极大压力”，“以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达到“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政府”，使“十八集团军完全国军化”，“其他

部队一律编遣”之目的。同时，密令其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调动兵力，准备在我不肯就范时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消灭我党我军首脑机关，夺取陕甘宁边区。据此，胡宗南先后从守卫黄河河防和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第二线部队中抽调 10 个师，加强其包围陕甘宁边区的第一线的兵力，并计划分三步夺占我陕甘宁边区。第一步，以第三十七、第三十八集团军分别组成关中、陇东两个兵团，并完成进攻准备，第二步，以关中兵团的 13 个师兵力，分别由洛川、同耀（同官、耀县）和邠县（今彬县）三个方向对我实施进攻，首先夺取位于正宁、旬邑、宜君、铜川之间的我关中分区“囊形地带”，迫我接受其无理要求。如我拒绝，则实行第三步计划：以南线之关中兵团沿咸（阳）榆（林）公路实施重点进攻，在西线之陇东兵团、东线之阎锡山部及北线之邓宝珊部的积极策应和空军的支援下，夺取关中及陇东全部地区，并攻取延安。6 月 9 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等在耀县召开作战会议。并于 15 日检阅了驻耀县之部队。18 日，胡宗南又在洛川召开了作战会议，并决定在洛川、黄陵、宜君、同官（今铜川）、耀县、淳化等地设置兵站派出所，在洛川、宜川、韩城设立野战医院及抢修同官境内之咸榆公路。6 月底至 7 月初，国民党军不断派小部队对我进行侦察袭扰，并炮击我关中军分区警戒阵地。7 月 2 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 10 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至此，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企图和动向，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及“有理、有利、有节”的一贯方针和原则，一面在政治上充分揭露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一面在军事上作好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准备。7 月 4 日，中央军委向八路军、新四军通报国民党顽固派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以使各部提高警惕，准备迎击国民党军之进攻。同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向大后方人民和美、英、苏等国驻华使团揭露国民党军进攻边区挑动内战的阴谋。7 月 4 日和 8 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对其发动内战的行径提出严正抗议和警告。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揭露和声讨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边区的宣传攻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政军民反对内战，反对分裂，支援陕甘宁边区的斗争。9 日，延安军民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向全国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12 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我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立即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纷纷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并从各方面支援陕甘宁边区的斗争。大后方人民和爱国人士也纷纷集会和发出通电反对内战，反对分裂。与此同时，我军在军事上迅速做好迎击国民党军进攻的作战准备。6 月，中央军委调第三五八旅由晋西北开赴陕甘宁边区，以加强防御力量。7 月 9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令八路军由晋察冀、太行等区抽调部队开赴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准备应变。10 日，八路军总部决定由晋察冀军区之冀中军区抽调部分部队开赴晋西北地区，由晋冀鲁豫边区之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抽调部分部队开赴陕甘宁边区，以增强晋绥军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防卫力量。为了迎击敢于进攻之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除令第三八五旅仍坚守陇东地区（合水、庆阳、曲子镇、孟坝镇），警备第一旅仍坚守关中马栏镇囊形地带，警备第三旅仍坚守三边（定边、安

边、靖边）地区外，将第三五九旅配置在南线的因临（今临真镇）、甘泉、邠县（今富县）地区，独立第一旅配置在北线的葭县（今佳县）、米脂、绥德、宋家川（今吴堡）地区进行防御；同时令第三五八旅和骑兵旅集结于部县以西黑水寺、直罗镇之葫芦河地区，以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和准备实施机动。与此同时，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及时向大后方人民及中外人士揭露国民党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反共内战的阴谋，并将朱德致蒋介石、胡宗南的电文，送交美英苏等国驻华使团。朱德在电文中指出：蒋介石“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7月7日，重庆的中外记者在抗战六周年纪念会上，纷纷质询国民党官员。美英苏等国为使中国继续抗战，消耗和牵制日本的力量，以利其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因而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美国政府公开表示：美英武器不能供给不打“轴心国”的国家。加之陇南民变蜂起，使胡宗南不得不抽调其陇东兵团的5个师前往镇压，从而削弱了进攻我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和我军已有充分的迎战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放弃对我边区的大规模进攻，并于7月10日电令胡宗南停止对我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至此，一场大规模的反共内战遂被制止。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和华中的反共军事行动并未就此停止。7月8日，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再令位于鲁西南成武、金乡地区之李仙洲部东越津浦铁路，进犯我山东抗日根据地，企图占据我鲁南山区。7月中旬，李部积极调整部署，令其在巨野以南地区之第二十一师及山东保安第七旅等部和丰县、砀山地区之第九十二军之一部向成武以南天宫庙附近地区集结，靠拢其总部，准备东犯。为阻止顽军东进，我冀鲁豫军区集中部分主力部队于7月24日开始对天宫庙附近地区之顽军发起反击。李仙洲部遭我打击后，于8月9日分三路南撤。8月13日，我山东军区鲁南部队向3月间进占我滕（县）峯（县）地区之顽军第一四二师主力发起反击，至18日，将其击溃，迫使其向津浦铁路以西撤退。8月底，李仙洲部主力撤到砀山南北地区。至此，我反击作战胜利结束。

在华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于7月上旬积极部署对鄂豫皖边区之新四军第五师进行“围剿”，并在罗田以北之滕家堡（今胜利）设立“清剿总指挥部”，以其副总司令刘和鼎为总指挥，集中第三十九、第八十四军之4个师和两个挺进纵队向黄冈、浠水和广济地区进犯，并深入我根据地寻我主力决战。面对顽军的大规模进攻，新四军第五师坚持严正自卫立场，采取深入顽军后方调动顽军回援，并抓住其弱点相机予以打击的方针，展开了反顽作战。各路顽军虽深入我根据地，但找不到我军主力，反遭我军不断袭击，其部队极为疲惫，乃于9月中旬停止进攻，9月初，顽军又增调兵力，重新部署，继续向我进攻。我军先后在鄂东、鄂南、鄂中和豫南等地，进行了50余次袭击战，阻挠疲惫顽军，迫使其停止了“围剿”。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于3月发动的波及西北、华北、华中各地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至10月彻底破产。这次反共高潮之所以被打退，主要是由于我党我军高举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旗帜，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在政治上开展强大攻势，及时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

1943年7月6日，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电。

我军的诽谤，揭露其破坏抗战挑动内战的阴谋，动员解放区军民和大后方人民进行坚决斗争，同时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时向中外人士进行揭露，唤起国内外舆论对我之同情和支持，促使美英苏等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在军事上则坚持自卫原则，不打第一枪，并做好充分的反击准备，对于一切敢于进犯之顽军予以坚决还击。从而打退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并使我党我军立于主动地位，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赞扬。

第五节 开展攻势作战，实行局部反攻

(参见附图 56)

1944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大规模战略反攻阶段。在欧洲战场上，苏军给德军以连续毁灭性打击，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根据 1943 年 11 月下旬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会议宣言中所提出的任务，美军在太平洋中部正向马利亚纳群岛和菲律宾进逼，并轰炸日本本土，危及其本土及海上交通的安全；与此同时，英军和中国的印缅远征军正向印缅战场的日军展开大规模反攻，中国的敌后战场也开始攻势作战，从而使日本法西斯陷入了完全被动的局面。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以及在海上交通被切断时，能够保持其本土与东南亚的联系，并摧毁中国和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以消除对其本土的威胁，日本大本营于 1 月 24 日发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命令，明确此次作战目的是：“击溃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摧毁敌空军主要基地”。“中国派遣军”根据其大本营的命令，以华北方面军之第十二军指挥

5 个师团，于 4 月中旬进行平汉铁路南段作战，打通并确保平汉铁路交通；以第十一军指挥 9 个师团、第二十三军指挥两个师团，于 5 月下旬开始进行湘桂作战，打通并确保粤汉铁路北段及湘桂铁路交通，并以第五航空军配合作战，摧毁中国和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

由于敌人集中大量兵力用于打通大陆交通作战，其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兵力受到了削弱，虽新组建了 14 个独立步兵旅团接替调出部队的防务，但兵力仍有所减少，战斗力下降，并且不得不将一些次要据点交由伪军据守，以便集中日军兵力加强主要交通线和重要资源开发区的守备。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继续坚持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政策，对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毫无准备，因而在敌进攻下迅速溃败。

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确定 1944 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1944 年 4 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我军“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我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乘敌军兵力减少，战斗力下降，从 1944 年开始，积极主动地向敌发起攻势作战，打击和牵制日伪军，以扩大抗日根据地，壮大我军力量，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并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为进行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和战略反攻作准备。

一、华北我军开展春、夏季攻势， 拔除根据地内的敌军据点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河南会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上册第 20 页。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949 页。

(参见附图 57)

1944 年初，敌华北方面军从所辖的 11 个师团、7 个独立混成旅团、1 个骑兵旅团中，先后调走将近 9 个师团的兵力，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和支援太平洋战场。其守备兵力，由原来的 135 个大队，减少到 75 个大队，而留下来的守备部队又多是新编成的步兵旅团。所以，不仅其兵力减少，而且战斗力也明显下降。特别是山东、山西北部 and 绥远地区的兵力大为削弱。但敌为巩固其占领区，除大力扩充伪军外，并采取以攻为守的手段，不断对我晋察冀等根据地进行“扫荡”。据此，中共北方局确定 1944 年全华北的工作方针是：“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

山东军区部队发动春夏季攻势

山东军区部队自 1944 年春季开始，连续发动以攻歼大股伪军和拔除深入我根据地的敌军据点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

第三次讨伐伪军吴化文部战役 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辖 3 个军 1 个独立师，虽经我两次打击，但仍为山东伪军的主力，总兵力共万余人，分布在鲁山南麓之鲁村、南麻、悦庄及其周围地区，处于我沂山、鲁山、泰山、蒙山各根据地之间，比较突出孤立；同时，日军正在调防，伪军处于整编，日伪军部署较为混乱。据此，山东军区决定，以鲁中军区 6 个团和滨海军区 1 个团发起第三次讨吴战役。并确定以 4 个团于东线担任主要突击任务，以 3 个团分别于西、南、北 3 个方向担任助攻。3 月 25 日夜，我军冒雨发起攻击，开始第一阶段作战。担任主攻的东线部队在悦庄东、南两个方向迅速攻占牛山、大泉庄等外围阵地，并一举突入纵深，于磋石、石桥、石陋全歼伪军 1 个师部和两个团，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使其东线陷于混乱。担任助攻的西、南、北各线部队先后攻占了芦牙店、上高、三岔店等地，歼灭伪军一部。至 27 日，我军将其第六、第七两个军的残部压缩至以鲁村、悦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固守待援。29 日，日军两个大队分别由莱芜、临胸向鲁村、悦庄增援。我军遂以一部监视守敌外，主力转至悦庄以南之胡庄、高厂地区待机歼敌。至此，战役第一阶段遂告结束。30 日，增援之日军 2300 余人进入悦庄，掩护伪军重新布防。在日军掩护下，吴化文将主力移至鲁村以西、莱芜以东地区。增援之日军因未发现我军主力，乃于 4 月 8 日开始撤走。我军遂乘日军撤走、伪军调整部署之际，发起第二阶段作战。15 日，我以主力首先围攻悦庄地区之伪军，歼其 1 个多团，并通过政治攻势促使据守蜚庄之伪军 600 余人投降。这时吴化文率 4 个团由莱芜以东之郑家王庄出援。我军乘其主力出援，后方空虚之际，留 1 个团于悦庄地区积极行动，迷惑、牵制敌人，集中 5 个团兵力于 18 日夜奔袭吴之后方机关所在地郑家王庄。当夜，我第一团于郑家王庄地区歼灭吴化文总部大部。其他各团也分别于铁车、黄庄等地歼敌一部。20 日，吴化文被迫率残部撤至鲁村一带。悦庄地区遂为我收复，战役即告结束。是役，由于我军集中主力，迅速突破敌之防线，并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奔袭吴伪后方机关，因而取得了歼敌 7000 余人、攻克据

点 50 余处的胜利，使日寇多年苦心扶植的山东伪军的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我军控制了鲁山大部地区，打通了沂、鲁、泰、蒙各山区根据地的联系。

继讨吴战役胜利之后，为保卫夏收，扩大根据地，我山东军区各部队于 5 月上旬开始，相继进行了夏季攻势。

讨伐伪军荣子恒部战役伪暂编第十军荣子恒部，下辖两个师共 3000 余人。该部盘踞于费县以南之崮口山区，分割了我鲁南抗日根据地。为消灭或击溃该部，控制崮口山区，改变鲁南根据地被分割的态势，我鲁南军区决心集中两个团另 8 个独立营及民兵一部，向荣子恒部发起进攻。5 月 1 日，我军以秘密迅速的动作实行长途奔袭，并且避开敌之正面，迂回其侧后，于当晚 23 时从南北两个方向直插伪第二师师部。由于敌将防御重点置于西面，我之主攻方向完全出乎敌之意料，敌顿时陷于混乱。至 2 日晚，我将伪第二师全部歼灭，伪师长被击毙。接着，我军乘胜又歼灭了伪第一师第二团主力，并积极向东北发展，威胁其军部。荣逆在我打击下，将残部全部集结于东崮口军部驻地。5 日，在援敌掩护下，分别向费县、临沂逃窜。我军全部解放了崮口山区，结束了鲁南根据地的被分割局面。

沂水战役沂水城为鲁中地区的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是敌人对鲁中进行大小“扫荡”之指挥机关所在地。城内有伪军 8 个中队共 1000 余人，南关驻有日军 1 个分队。城内外防御工事坚固。鲁中军区部队在取得第三次讨吴战役胜利后，即为解放沂水县城进行准备。首先，于 6 月 11 日在临朐以南攻克敌据点 3 处，切断了临（朐）沂（水）公路。接着又于蒙阴以南和费县以北歼灭伪军 1 个旅共 1100 余人，打破了敌人环绕蒙山的封锁线，使沂水县城东、南、西三面直接暴露于我军威胁之下。8 月 15 日晚，鲁中军区即以 4 个团及地方武装和民兵一部发起沂水战役。我以两个团攻城，1 个团攻南关，1 个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围攻外围据点。攻城部队以偷袭和强攻相结合的战术，从四面突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至 16 日，全歼守城伪军 1000 余人。与此同时，我攻南关的部队猛攻日军围寨，全歼守敌，毙 31 名，俘 20 名；此时，沂水城外围据点亦均被我攻克，战役即告结束。鲁中我军取得了首次攻坚战的胜利，巩固了鲁山山区，使鲁中、滨海两区连成一片。

在此期间，渤海军区在争取伪军 1 个团反正之后，攻克利津县城，歼敌 1 个团。滨海军区对盘踞在诸城东南泊儿镇地区之伪滨海警备军发起进攻，攻克据点 40 余处，歼敌 600 余人。

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发动春夏季攻势

晋冀鲁豫边区部队为进一步摧毁敌人的分割封锁，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对敌展开了春夏季攻势作战。

2 月，以太行军区部队向蟠龙镇发起攻击，收复被我国困达 8 个月之久的蟠龙镇；接着又乘胜向榆社、武乡之敌进攻，于 3 月 29 日收复榆社县城，同时拔除临淇等日军据点多处。由于蟠龙、榆社、临淇等地被我收复，再加上日军南调，盘踞于水冶至林县的伪军暂五军等部发生动摇。我太行军区第五、第七军分区奉命集中兵力，于 4 月 1 日乘机发起水林战役。首先，打击由林县外出抢粮之敌，并渐次逼近林县城，拔除城外一些据点，切断林县至水冶公路，使城内伪军补给断绝，逼使敌于 14 日弃城东窜。我收复林县城，拔除林县至水冶公路沿线据点，歼敌 900 余人。继榆社、林县胜利之后，我

又对平汉路西侧邢台、沙河及新乡、辉县地区之敌发起攻势，向临（城）内（邱）段敌第三道封锁线出击，先后攻克据点多处，摧毁平汉路西侧敌之第三道封锁线大部。在此期间，冀鲁豫、冀南及太岳军区均以部分主力结合地方武装及民兵，向敌之突出孤立的城镇及据点开展攻势，先后收复朝城、沁水县城及据点碉堡 200 余处。

春季攻势以后，为适应斗争形势发展需要，冀鲁豫军区与冀南军区于 5 月合并，成立了新的冀鲁豫军区。该军区为进一步摧毁敌对我根据地的分割封锁，将小块游击区扩展为大块根据地，以两个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在昆（山）张（秋）地区发动攻势，一周年先后收复戴庙、寿张集等据点 50 余处，歼伪军 1200 余人。尔后又以主力 1 个团和地

方武装一部，进攻清丰县城。该城伪军在我威逼下曾于 5 月 10 日弃城逃跑，县城一度为我收复。5 月 13 日，伪冀南道道尹在日军逼迫下率其所属 8 个县的伪警备队 2000 余人及全道 13 个县的县长和日本“顾问”等，再度占领该县城，并开庆祝会大肆宣扬其“光复清丰”的胜利。我军遂乘敌开会、疏于戒备之际，突然攻入城内，将伪军及冀南道道尹、各县县长、日本“顾问”全部俘获，从而消除了敌对我冀鲁豫边之中心区的威胁。6 月下旬，微山湖西我军，进行了 10 天的攻势作战，攻克据点 11 处，收复了单县、鱼台、丰县、沛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将敌人伸入我腹心区的“丁”字形封锁线全部摧毁，恢复了湖西中心区。7 月底，我以主力一部袭取莘县城，俘伪军 500 余人。冀鲁豫军区取得上述作战胜利后，为向旧黄河以南发展，集中 4 个团和 7 个县大队的兵力，于 8 月上旬对郟城地区之伪军刘本功部发起攻击。郟城是敌人在旧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地区的中心据点，驻有日军 1 个大队和伪军刘本功部 5000 余人。为歼灭该敌，摧毁郟城至鄆城敌封锁线，我冀鲁豫军区部队经过充分准备后，以 3 个团、5 个县大队在北线担任主攻任务，以 1 个团、两个县大队在南线阻援。8 月 3 日夜，各部队秘密插入郟城境内。担任主攻任务的部队，在九二步兵炮和迫击炮火力的掩护下，向敌发起攻击。至 6 日，攻克郟城外围肖垓、刘口重要据点。8 日，我将九二步兵炮移至敌付庄据点四五十公尺处，以猛烈火力掩护步兵强攻付庄，以小的代价取得了消灭伪军 4 个中队的胜利。至此，刘部战斗力最强的中队被歼灭，城内的日伪军恐慌异常，闭门坚守，不敢出援。我军即在东起梁山、西迄鄆城百余里的地区内，展开了军事、政治攻势。在我打击下，郟、鄆封锁线上各据点伪军全部崩溃，弃寨而逃。与此同时，我阻援部队也乘胜在郟城西南和鄆城东南发起攻势，攻克据点多处。历时 1 周的讨伐伪军刘本功战役，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比较好的发挥了炮火威力，因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共攻克据点 36 处，歼灭伪军近 3000 人。

济（源）垣（曲）战役 太岳军区部队在春季收复沁水县城之后，根据中共中央向河南发展的指示，于 6 至 8 月间，在边区的西部，对济源、垣曲之敌发动攻势。济源地区伪军建制复杂，指挥极不统一，不少伪军内部有我之内线关系。据此，太岳军区部队于 6 月 2 日至 7 月 12 日，首先打击了济源北部伪军，攻克大社、西承留等据点，迫使训掌、磕井的伪军携械反正。从 7 月 16 日起，我军转兵西向王屋地区发动攻势，段凹、邵源、白鹅等据点伪军遭我严重打击后，先后携械向我投诚。8 月 29 日至 30 日，我复以主力在济源以南展开攻势，攻克陈岭，又争取了伪军 1300 余人反正。是役，由于我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针，先后有大小 10 股伪军向我投诚反

正，毙俘日伪军 800 余人，攻克据点 20 多处，控制了东起孟津以北的坡头镇西至垣曲以东之芮村一带的黄河渡口，为豫西支队南渡黄河创造了条件。

晋察冀军区部队发动春夏季攻势

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及本区情况，确定一方面巩固根据地的基本区，一方面积极向游击区和敌占区伸展，扩大根据地。首先，北岳区部队自 1 月开始主动出击，至 5 月，攻克敌军据点碉堡 350 多个，并先后袭入忻口车站和定襄县城。6 月，我军向敌纵深地区发动攻势，接连袭击了保定、望都、完县、涞源、灵丘等城，并再次袭入定襄县城；与此同时，察南我军越过桑干河，在深井堡以西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并开辟了怀安、宣化、阳原、涿鹿部分地区；雁北我军深入到应县平川和广灵、浑源地区，并开辟了桑干河以北部分地区；平北我军在外长城、北平北郊及宣化、赤城以东地区攻克敌军部分据点，并开辟了张家口东北崇礼县的大部地区。冀热边我军采取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于 1 至 5 月间，在粉碎敌 1.5 万余人对热南地区的“扫荡”和粉碎敌对遵化、王田地区合击的同时，以一部穿插于敌纵深地区，灵活机动地运用伏击、袭击等战术，消灭了大量的敌人，并先后攻入宁城、昌黎县城，袭击北宁路的敌人火车，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在冀中，敌为弥补其兵力的不足，除陆续撤退一些据点外，还采取以攻为守的手段，经常用数百人至 1000 人以上的兵力，对我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进行奔袭合击。冀中我军则乘敌外出“扫荡”，其据点兵力空虚之际，袭击敌之据点。1 月上旬至 2 月上旬，我乘敌合击高阳、任丘地区和“扫荡”白洋淀以南地区时，以主力深入敌占区，先后拔除肃宁东北朱家庄等据点 40 余处，袭入肃宁、安新县城。接着，又在赵县东北和安国、定县地区对敌发起攻势，连克大马圈、西伯章等据点 40 余处，并一度袭入赵县城，开辟了赵（县）元（氏）宁（晋）地区。5 月，我再乘任丘之敌外出抢麦之机，将任丘县城包围，迫使 500 多伪军投诚，县城一度被我收复，同时再度攻克肃宁县城。6 月，我为打击抢粮之敌，在大城、深县、藁城、赵县、宁晋地区开展攻势，先后攻克敌军据点 40 多处，有力地保卫了夏收，并使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晋绥军区部队发动春夏季攻势

晋绥军区部队为进一步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加紧对深入我根据地内的敌之孤立据点的围困。自 1 月开始，首先在五寨、宁武、静乐、临县、离石、阳曲、忻县等地区，开展群众性的围困战。至 8 月，先后拔除头马营、蒲格寨、孝子渠、津良庄等 58 处据点。尤其是围困蒲格寨据点的斗争，给全区树立了榜样。蒲格寨据点位于忻县西北 30 公里，驻有日伪军近百人，自 1942 年 8 月敌在蒲格寨设立据点后，我抗日军民即展开挤敌人的斗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已把敌人的活动范围限制在 5 公里以内。1943 年底，蒲格寨的群众在我动员下，全部搬出村寨，使敌人更加孤立。1944 年初开始，我以武工队、民兵、游击队等实行联防围困，把据点周围划分为若干区域，分区负责，从四面八方逼近据点，日夜不停地进行严密封锁和冷枪射击，使敌人在取水送饭等日常活动中都受到我冷枪射击的威胁。3 月份以后，我逼近到碉堡附近活动，白天用冷枪射击封锁敌人，夜晚开展政治攻势，使敌昼

夜不得安宁，同时在通往蒲格寨的公路上，打击敌交通运输，断敌粮弹补给。敌在粮弹奇缺、生活极端困难情况下，于4月12日在三交镇敌人接应下，突围逃窜。突围中又不断遭我伏击和地雷杀伤，死伤惨重，仅一部逃入三交据点。在围困战中，“日本人反战同盟”盟员，积极参加斗争，运用喊话、送宣传品等方式进行宣传，对瓦解日军起了很大作用。在此期间，我军还对同蒲铁路北段和神池至五寨、五寨至三岔、离石至岚县、忻县至静乐、静乐至岚县等公路线展开3次全面破击，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并配合了围困战的开展。经过半年作战，我收复了大片地区，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二、华北我军发动秋、冬季攻势， 向敌占城镇和交通线推进

(参见附图58)

我军的春夏季攻势，给敌以沉重打击，敌被迫逐渐向大中城市及交通线收缩。为了进一步钳制和打击敌人，并逐步向敌占城市和交通线推进，以扩大根据地，中共中央于6月5日发出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根据地游击战争应采取各种妥善办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逐渐逼近，在那里建立隐蔽的游击区，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进行”。7月6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7周年时进一步指出：“敌后军民要再接再厉，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阻止敌人的进攻，驱逐敌人出中国”。

遵照上述指示，华北我军在取得春夏季攻势胜利之后，发起了向敌占城镇、交通线推进的秋冬季攻势作战。

山东军区部队发动秋冬季攻势

山东敌军在遭我军春夏季攻势打击后，8月下旬，集中万余人兵力，由临沂、莒县、日照、赣榆等地出动，分13路对我滨海地区进行“扫荡”，企图合击我指挥机关，摧毁我后方建设，破坏我反攻准备。为粉碎敌对滨海军区的“扫荡”，并扩大根据地，我山东军区部队抓住敌兵力不足，顾此失彼的弱点，决定在全区范围内迅速发起秋季攻势。

胶东军区部队的秋季攻势八九月间，胶东军区以第十三团全部、第十四团、第十六团各一部以及军区特务营、4个军分区的独立团，采取此起彼伏、交错进行、分区作战的方式，展开攻势作战。并要求各军分区均选择一两处敌之要点，集中兵力予以攻击，尔后广泛展开政治攻势，造成巨大声势，以收“我打一点，敌跑一片”之效。遵照军区指示，南海军分区独立团于8月19日晚，强袭敌重要据点平度县古岘，至25日，解放了平南的大片地区，并南越胶河，直逼胶济铁路。继而为改变西海地区被敌分割封锁的形势，我第十三团与西海军分区独立团各一部，于23日夜，突然袭击了大泽山东麓敌之重要据点旧店、大田，全歼伪军5个连，以后又连克大泽山周围之马厂、七十里铺、驿道等敌据点，恢复了西海地区战略支点大泽山区。8月29日，

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我第十三团一部，配合军区特务营，攻克了莱阳西北敌重要据点马连庄，歼灭日伪军一部。接着，我东海军分区独立团在第十六团一部配合下，以强攻牟平城南水道日军据点为主，展开军事和政治攻势。24日晚，我军以偷袭和爆破手段，全歼该据点日军1个分队和伪军两个中队，并伏击了由烟台增援牟平的日伪军，歼其大部。此次战斗，动摇了文登、荣城、牟平地区的敌军，我乘胜对敌展开了全面的政治攻势。30日，文登伪军弃城逃窜。9月2日，荣城伪军6个中队全部反正。我收复该城。至此，东海分区除烟台、威海、牟平等沿海地区外，全部获得解放。与此同时，北海军分区独立团于2日至10日，先后攻克龙口、黄县、蓬莱之外围据点10余处。从9月5日起，第十四团、第十六团、北海独立团各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烟（台）青（岛）公路展开大规模的破袭战，我军控制了烟青公路莱阳至福山段（除栖霞城外）近100公里。至9月下旬，历时1个多月的胶东军区攻势作战胜利结束。是役，共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收复县城两座，攻克与迫使日伪军放弃据点138处，使胶东4个分区完全连成一片。

渤海军区部队的秋季攻势 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从8月中旬开始，发起以解放沾（化）、利（津）、滨（县）边地区为主的攻势作战。军区独立团和特务营各一部在第四军分区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于8月24日对沾化以东和东南的富国、泊头等据点发动进攻，至27日攻克日伪军据点11处，我军控制了徒骇河下游地区。第一、第三军分区部队于8月27日围攻乐陵县城，伪军1个中队反正，其余突围逃窜，我军收复该城。9月13日夜，第二军分区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攻入临邑城，经一夜激战，全歼守城伪军，解放该城。第六军分区部队亦于同时对青城县境内敌军据点展开攻势，解放了该县除县城以外的地区。10月27日，第一军分区部队又一举攻克了靠近津浦铁路的南皮县城。至此，渤海军区部队的秋季攻势胜利结束，共歼灭敌军5000余人，攻克县城3座，打通了各分区的联系，并威胁敌占大中城市天津、德州和济南。

在此期间，鲁中军区以4个团的兵力，隐蔽设伏于沂水县城西北之葛庄、陶沟等地，待伏“扫荡”我滨海地区回窜之敌。9月3日下午，日军1个大队和伪军共2000余人进入我军伏击地域。经激战，我歼日军300余人、伪军1000余人，残敌在莒县敌军接应下逃入莒县。与此同时，鲁南军区部队亦积极向日伪军展开攻击，一度切断滋（阳）临（沂）和临（沂）枣（庄）等公路，使“扫荡”我滨海之敌的后方补给线受到严重威胁，从而有力地配合了滨海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秋季攻势胜利后，山东军区部队又发起以夺取莒县为重点的冬季攻势。

莒县战役 莒县位于我滨海与鲁中两区之间，是历次日军“扫荡”鲁中、滨海两区的基地。该城内外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驻有伪保安大队莫正民部3500余人和日军1个中队。莫部经我长期争取，反正条件业已成熟。据此，山东军区于11月中旬集中1个独立旅另4个团和7个营共1万余人的兵力，组成攻城、阻援和扫清外围据点等3个梯队，采取里应外合的手段夺取该城。14日，我军一举攻入城内，莫部按预定计划反正，并引导我军先后占领各要道和制高点，逐步将日军压缩到城中心的围寨内。尔后，我军从四面发起攻击，突入围寨，迫使日军退入最后两个碉堡。16日，诸城日军开始分批增援。我阻援部队坚决阻击，歼其一部，但因故兵力过大，约800人突入莒县城。我为争取主动，遂撤至城郊包围和监视敌人，并动员城内居民迁出城外。同

时还组织群众将莒县通往日（照）、临（朐）、诸（城）、沂（水）各县的公路全部破坏。敌在我围困打击下，极为恐慌，终于29日夜弃城北窜。是役，歼灭日军一部，伪军3500余人反正，扩大根据地面积7000平方公里，使滨海、鲁中两区连成一片。

在攻击莒县城的同时，鲁中军区部队肃清了临沂和费县城外围据点，并向北直逼胶济铁路附近；鲁南军区部队逼近临城、滕县、泗水、邳县等县城附近，胶东军区部队攻占了栖霞，渤海军区部队则粉碎了日伪军5000余人的“扫荡”。

经过一年来的攻势作战，山东军区部队共歼灭日军4800人，伪军5.4万人，争取伪军1.1万人反正，收复县城9座，解放国土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930万，根据地比1943年扩大了1.5倍，胶济铁路南的3个军区基本上连成了一片，路北两个军区也打破了被敌分割的局面。

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发动秋冬季攻势

敌遭我春夏季攻势严重打击后，于七八月间将用于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部分兵力自平汉铁路南段调回华北，并自9月起，先后向我晋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14次局部性“扫荡”。鉴于敌集中兵力进行“扫荡”，其后方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兵力更加空虚，顾此失彼的弱点更加突出，我太行、太岳和冀鲁豫等军区决定大力向敌占交通线和城镇推进，开展秋冬季攻势作战。在平汉线上，太行军区部队先后袭入石家庄、内丘及邢台等车站；在正太线上，袭入寿阳之马首、上湖及获鹿以西的微水等车站，并攻克平定以北之义井镇，袭入和顺城。在同蒲线上，我太岳军区部队，两次袭入太谷城关，攻克榆次之北田镇、翼城之北常镇等据点，并炸毁火车6列。在白晋线上，我地方武装及民兵在靛亭至南关镇段展开破击战，毁铁路20余公里。在道清线上，我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在沁阳、博爱地区攻克汉高城、柏山镇、玄坛庙等据点，并在道清路以南开辟了修武、武涉新区。在陇海线上，我冀鲁豫军区部队，攻入殳山，同时在津浦路西侧，一度攻克肥城，并攻入德石路南侧之枣强，收复莘县和寿张县城。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一年的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7.6万余人，收复县城11座，收复国土6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00多万，使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

晋察冀军区部队发动秋冬季攻势

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取得春夏季攻势胜利后，又举行以摧毁各根据地之间的敌铁路、公路为主要目标的秋季攻势作战。在北岳区，第四军分区部队于七八月间攻克平山以西回舍区敌军据点14处，收复回舍全区，扩大根据地100余平方公里；第二军分区部队突破敌建立在晋冀边区的封锁线，摧毁五台山南麓之石咀、横岭、耿镇段和孟县以北滹沱河沿岸椿树底至张家坪段的封锁线；第三军分区部队打破唐县、曲阳间封锁线，解放曲阳以北之西大洋和下河地区100多个村庄。各军分区积极开展的攻势作战，使冀西之满城、完县、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等敌占县城处于我进一步包围之中。在平西区，第十一军分区部队，为破坏敌修筑大同至塘沽铁路的计划，以主力一部在水关、沿河城、清水涧一线展开破袭战，迫使敌放弃修路计划。在

平北区，我平北支队全面出击，逼近北平北郊，攻克高丽营，收复香堂、八家、半壁店，袭入十三陵之长陵据点。我武工队深入到北苑附近和安定门、德胜门城关进行活动。与此同时，我在宣化以东攻克红石山，在赤城收复托拉庙等地，扩大了平北根据地。9月，粉碎了敌对平北大海陀地区的“扫荡”，歼敌一部，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在冀东区，我军根据中共冀热边特委确定的以恢复基本区蓟县等地为重点，同时向北平、天津郊区和长城以外敌占区发展的方针，对敌展开攻势作战。8月下旬，担任恢复蓟县的部队，先后攻克太平庄、新庄子、三岔口等21处据点，收复蓟县、平谷、三河之间大片地区。向平津郊区发展的部队，开辟了三河、通县公路以南和武清、宝坻、宁河三角地区，逼近了平津近郊，与冀中进入武清的部队会合。冀东我军的攻势作战，给敌以很大的震动，敌遂于10月下旬集中1万余人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我军经两个月艰苦的反“扫荡”作战，迫敌于12月底撤回原据点，反“扫荡”胜利结束。在冀中区，我再次对盘踞于肃宁之敌发起攻击。肃宁城于1944年2月和5月两次被我攻占，该城外围敌据点几乎全部肃清，广大乡村均被我控制。城内日军撤走后，只剩下伪军约600人左右。8月29日，第九军分区部队于河（间）肃（宁）公路北侧的张庆设伏，全歼由河间返回肃宁的伪军180余人，肃宁城内伪军极度恐慌。29日夜，我集中地方武装1000余人围攻该城。30日，攻城部队从东关和西关攻入城内，然后由东西两面以钳形突击向城中心压缩，将守城伪军全部歼灭。接着，攻克县城附近据点，解放肃宁全境。第七、第八、第十军分区部队也相继开展秋冬季攻势作战，先后攻克武强，攻入深泽、安平、献县、饶阳等县城，恢复了藁城、无极地区，长途奔袭了北平西南的长辛店车站，并一度袭入保定西关和天津市区。晋察冀军区部队在一年中，共歼灭日伪军4.5万余人，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1600余处，解放人口758万，收复了广大地区，为进一步开展攻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晋绥军区部队发动秋季攻势

晋绥军区部队自8月下旬开始，在军区统一部署下开展以攻歼忻（县）静（乐）、离（石）岚（县）公路沿线之敌为重点的秋季攻势。自28日开始，第八、第六军分区部队各一部先后攻克忻静公路上的利润和静（乐）宁（武）公路上的沟口等据点，切断了静乐至宁化堡的公路交通。9月4日，第三、第八军分区部队向离岚公路之敌发起进攻，先后袭击和攻克了公路沿线的胡堡、峪口、横泉、圪洞（今方山）、马坊等据点，切断了离岚公路。14日至16日，第八军分区部队对敌在晋西的军事要点汾阳进行了猛烈攻击。汾阳城内驻有日伪军700余人，其周围罗城、协和堡等据点驻有日伪军500余人。14日夜，我对汾阳的外围据点火柴公司、飞机场、火车站以及城北的大营盘等目标进行了袭击，歼伪军一部后撤出战斗。15日，我再次袭击上述目标，烧毁了火柴公司的哨楼，破坏了火车站、飞机场、电灯公司等重要设备。16日夜，我又袭击了汾阳西北的协和堡据点，经白刃格斗，将守备的日伪军全部歼灭。23日以后，第八军分区部队又先后攻克和收复了静乐以南之娄烦镇、东六渡和交城以西之东社、五元城等据点，至30日胜利结束秋季攻势，我军共攻克和挤退敌人据点48处，歼日伪军2000余人。晋绥军区经过一年的对敌斗争，共收复据点106处，

解放村庄 3100 余个、人口 40 余万，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三、华中我军开展攻势作战， 恢复和扩大根据地

(参见附图 59)

随着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形势的变化，华中敌后战场胜利地渡过了最困难的 1943 年，出现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形势。1944 年，华中日军从第十一、第十三军所辖 14 个师团中调出 8 个师团参加湘桂作战，以新编成的独立步兵旅团和野战补充队接替调离师团的防务，总兵力由 21 万人减少到 17 万人。华中日军为弥补兵力不足，一方面收缩防区，另一方面大规模地扩编伪军，使伪军兵力由 1943 年的 20 万人增加到 35 万人。对我根据地，则继续进行“清乡”、“治安肃正”和在沿海地区实行“屯垦”计划。根据上述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决定进一步恢复原有地区，争取新的发展，主动地有重点地对敌展开攻势作战。

苏中军区部队发起春季攻势和车桥战役苏中军区为打破敌对江都(今扬州)、泰州、海安及李堡以南进行的“清乡”和在东台沿海地区实行“屯垦”的计划，于 1944 年一二月间以高邮、兴化、宝应、东台以北和泰州、泰兴、如皋地区为重点，对敌连续发动攻势，相继攻克宝应南之大官庄、王家营，如皋西之运粮河、古溪镇，以及东台南之安丰等 17 处据点，并争取了伪军 1000 余人反正。随后，为进一步改善苏中的斗争局面，并为整风运动创造比较安定的环境，于 3 月上旬在淮安、宝应以东发起以夺取车桥为目标的攻势作战。

车桥是联系苏中和苏北的枢纽，是日军第六十五和第六十四师团的结合部，仅有日军 1 个小队和伪军 1 个大队据守，比较突出孤立。据此，我苏中军区决心集中 5 个团兵力组成 3 个纵队，采取攻点打援战法，以 1 个纵队夺取车桥，两个纵队于外围准备歼灭增援之敌。5 日 1 时 50 分，我担任主攻车桥部队避开敌之外围据点直取车桥，在炮兵大队的火力支援下，一举突入车桥镇内，经一夜激战，全歼伪军 1 个大队，并将日军压缩包围于核心工事。我军对车桥的进攻，震惊了周围日军，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日军遂乘装甲车和汽车分五批驰援车桥。当第一批增援之敌进至车桥以西芦家滩时，遭我阻援部队沉重打击，被迫退入我预设之地雷区。我军遂乘雷群爆炸奋勇出击，歼敌 240 余人。接着又给逐次增援之日军以歼灭性打击。6 日晨，车桥之残余日军乘隙逃窜。我军乘胜扩张战果，至 13 日相继收复泾口、曹甸等据点 12 处，战役遂告结束。在战役过程中，“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盟员，勇敢地参加火线喊话，松野党光荣牺牲。是役，共歼灭日军大佐以下 460 余人和伪军 480 余人，创华中地区我军歼灭战范例。在此次战役中，我军采取“掏心”战术，担任攻点任务的部队绕过敌人的外围据点，直取车桥，吸引周围敌军来援，并以大部兵力歼击援敌，从而取得了攻点与打援双胜利。这一战役的胜利，打乱了敌人的“清乡”、“屯垦”计划，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根据地的联系，并为苏中部队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安定的环境。

车桥战役后，苏中我军继续对敌发动攻势。5 月，为彻底粉碎敌人的“清

乡”计划，苏中第四军分区部队主动出击，连克据点 28 处，歼灭日伪军近 1000 人；6 月下旬，又在如皋之海河滩歼灭日伪军 500 余人，并乘胜攻克南坎镇。与此同时，南通、海门、如皋各地军民发动为时 20 多天的破击战，破坏公路 700 余公里，炸毁桥梁 50 余座，9 月，苏中第四军分区部队再次组织历时 45 天的攻势作战，基本上恢复了在“清乡”中被敌侵占的地区，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最后胜利。

苏北军区部队发起春季攻势和高沟、杨口战役 苏北军区部队自 1 月起，展开了反击日伪军“第二期治安肃正”的攻势作战，连克沐相、涟水之间的塘沟、王集、徐溜等 10 余处据点，收复了 1942 年冬敌大“扫荡”时所侵占的大部地区。4 月，为了进一步改善苏北局面，恢复和扩大根据地，我又在涟水西北发起了高沟、杨口战役。

高沟、杨口为伪徐海绥靖军第七十二旅所盘踞，该部以这里为核心，控制了前后六塘河地区，不断向我“蚕食”和骚扰。19 日，苏北军区集中第十旅主力和第七旅一部，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法，首先包围高沟。25 日，在炮火掩护下，我军打破夜间攻击惯例，出敌不意地突然于昼间发起攻击，一举攻克高沟，全歼守敌。接着，集中兵力围攻杨口，于 28 日攻克，并歼灭新安镇（今灌南）、大伊山（今灌云）等地出援之敌 140 余人。是役，我军共歼灭日伪军 2000 余人，攻克据点 14 处，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盐阜两区完全连成一片，改善了苏北抗日斗争局面。

在进行高沟、杨口战役的同时，苏北军区部队还攻克灌河口重镇陈家港和陇海路南侧之高流镇，共歼伪军 800 余人。6 月下旬，我军对滨海地区之敌发动攻势，先后攻克交通要冲大兴镇和敌之盐棉集中地合德镇等重要据点，并在灌河和射阳河之间开辟了部分新区，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屯垦”计划。9 月上旬，我再在运河线上一举攻克宿迁以南敌重要据点林公渡，粉碎了日伪军隔断我苏北与淮北战略联系的企图。

淮北军区部队自 3 月中旬开始，在东起运河、西至津浦路宽数百里之战线上，对守备薄弱之敌军据点展开了进攻。经 50 天连续作战，攻克据点 51 处，歼灭日伪军 2000 余人，解放泗县、灵璧，睢宁之间的广大地区。6 月，又以主力一部，发动了以夺取泗县北之张楼据点为主要目标的攻势，全歼长期盘踞该地的伪军 500 余人，并歼灭增援之日伪军一部，解放了泗北地区。

苏南地区部队在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打退顽军进攻之后，发起了攻势作战。8 月下旬一度攻入长兴城，并攻克其外围据点 13 处，歼灭伪军 4 个营。与此同时，还攻克了金坛以西的薛埠镇及南京郊区的六郎桥，并一度袭入溧水、溧阳两县城。

鄂豫皖边区部队，为巩固和发展鄂南，首先于 1 月间，开辟了嘉（鱼）蒲（圻）临（湘）地区。2 月至 5 月间两次粉碎国民党顽军攻占我大悟山根据地的企图，巩固了鄂豫皖边区之中心区。尔后，各部队对日伪军据点展开攻击并破坏敌之交通线。五六月间，共作战 30 余次，先后攻克潜江之龙湾、石首之横堤市、黄冈之孔家埠等据点，歼敌千余人。8 月，第三军分区部队围攻监利之汪家桥敌军，敌仓惶逃窜。9 月，该分区部队又向沔阳沙湖地区伪定国军残部进攻，歼其一部。与此同时，鄂南军分区部队逼近武昌，夜袭敌之青山据点。12 月，第三军分区部队在潜（江）沔（阳）边歼灭伪军一部，并以荆（门）潜（江）地方武装袭击长垸垸敌之据点。与此同时，第二军分区部队攻克李家店、同兴店等据点。一年来，鄂豫皖边区部队进一步贯彻“敌

进我进”方针，不断向敌军据点展开攻势，既粉碎了敌对我根据地之“扫荡”，又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同时，为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0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了鄂豫皖湘赣军区，新四军第五师领导机关兼军区领导机关，先后成立了第一至第六军分区及豫中、鄂皖边和鄂南军分区。

淮南、皖江和浙东地区的部队，在反击国民党顽军进攻的同时，也不断打击伪军。淮南我军袭入盱眙、定远两城，皖江、浙东部队攻克敌军据点多处，歼敌一部。

一年来，华中敌后战场军民，在攻势作战和反“扫荡”作战中，共歼敌5万余人，解放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人口160余万，基本上制止了日伪军对解放区的进攻，沟通了津浦铁路东各根据地的联系，改善了各地区的斗争局面。

四、开展冬季大练兵运动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于1944年7月1日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指出：我军要担负在反攻时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及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的任务，同时准备应付国内可能的突然事变，非有一至数倍于现有军事力最不能胜任。因此，应抓住目前时机，除继续对敌作战，加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外，要在一年内加紧训练现有军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如果我们不能完成此任务，则我们将来的大发展与我们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任务，必会受到妨碍。

遵照中共中央上述指示，我军利用作战间隙，从10月开始，陆续展开了以改进部队政治思想和提高军事技术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冬季大练兵运动。在政治整训中，主要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广泛开展尊干爱兵和拥政爱民运动，并总结模范连队的建设经验和奖励英雄模范人物，以改进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军事训练中，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主要开展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技术训练和近战、夜战、攻坚战等战术训练，并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教学相长以及联系实际，学用一致的群众性的新式练兵方法。同时，在练兵中注意培训干部。全军经过政治、军事整训，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 and 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在主力军和地方军实施大练兵的同时，各地区的民兵也开展了政治整训和练武运动。通过上述运动，不但提高了广大民兵的政治觉悟和投弹、射击、埋设地雷等作战技能，而且使民兵得到了新的发展，仅太行区的6个县即新发展民兵3.7万多人。民兵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发展，为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大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的大练兵运动，为尔后军队的大发展与实行全面反攻作了切实而有效的准备。

第六节 向河南、湘粤边、苏浙皖边 敌后进军，开辟新区

一、发展河南，缩毂中原

(参见附图 60、61)

1944年4月18日，日军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以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为主力，在第一军一部配合下，自豫北、晋南出动，向郑州及其以南的平汉铁路沿线和洛阳等地的国民党军进攻，至21日，突破国民党军防线，进至密县、新郑、尉氏一线，并继续向南进犯。22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应乘敌南犯后方空虚之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5月9日，敌打通了平汉铁路，并向豫西发展进攻。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和鄂豫皖边区党委发出指示指出：敌人已大举向河南进攻，河南大部地区已成敌后。河南地方党员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起来领导河南人民抗战，应该组织抗日游击队及民兵自卫军，保卫家乡，建立抗日根据地。《指示》并要求各地迅速派出干部深入河南敌后，组织与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5月下旬，日军占领了洛阳等地，国民党军退到洛宁、嵩县以西的伏牛山区。六七月间，中共中央为发展河南又多次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应以一部兵力进入豫西，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冀鲁豫军区应扩大水东（新黄河以东地区），发展水西，扩大豫东抗日根据地。要求新四军以第五师一部沿平汉铁路北上向河南发展，开辟豫南抗日根据地，以第四师主力进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地区，恢复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并打通与水东区的联系。要求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和新四军第三师应积极行动钳制日伪军和顽军，策应第四师西进。中共中央还在关于发展河南敌后抗战的政策指示中指出：河南情况复杂，关键在于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要更灵活地去适应具体情况，要善于插入敌顽空隙地区及敌占区和边沿区发动群众抗日运动，建立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同时要求我军厉行节约，遵守三大纪律，与人民同甘共苦；并注意容纳和吸收当地专门技术人材及知识分子为民主政权服务。

开辟豫西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太行军区第三团和新编的第三十五团组成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即第一支队）挺进豫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该支队经短期准备，于1944年9月初从林县出发，22日在济源西南之蓼坞渡口击退敌河防部队，胜利渡过黄河，从新安以西越陇海铁路，涉洛河、伊河，在伊川以东之杨岭打退追击之敌后，向箕山、嵩山地区急进，并于中秋节前夕，袭击登封敌机场，歼敌一部，解放民工数千人。尔后，独立支队进到临汝以北之大峪店，决定以第三团主力进入嵩山地区；以第三十五团主力进入箕山地区；以支队直属部队活动于大峪店及登封以南的东、西白栗坪地区；以第三十五团一部进至宜阳西南之东赵堡一带活动。各部分别进至上述地区后，即积极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袭击了偃师东南之回廓镇、巩县西南的黑石关等据点，同时建立了4个抗日

县政权及伊洛办事处，初步打开了豫西抗日局面。日军为了消灭和驱逐我军，遂以第一一 师团一部，乘我立足未稳，于十一、十二月间，纠合伪军一部，分别对我嵩山区及登封西之颍阳地区进行“扫荡”，均被我军粉碎。1945年1月15日，日伪军四五千分别人分别从登封、临汝、禹县等地出动，以登封南之东、西白栗坪和大峪店为目标进行“扫荡”。表独立支队第三十五团于19日夜突围，经登封东南之曹村，转移到密县西北的田种湾，与第三团会合。与此同时，残留于登封、密县地区的国民党游杂武装亦乘机向我进攻，占我箕山地区。为打破敌顽夹击，巩固嵩山、箕山根据地，我独立支队于27日由田种湾奔袭密县西南的苍萃山，全歼联日反共的顽军两个保安团，接着攻克严大川、舜帝庙等地。2月4日，我军又在曹村伏击歼灭由登封出犯之日伪军100余人，并乘胜向北发展，连克缙氏、皇姑寨、鲁庄、府店等9个据点，迫使“扫荡”之敌纷纷回窜。至此，我军粉碎了敌顽夹击，使箕山与嵩山区联成一片，并成立了第一军分区。

根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太岳军区以第十八、第五十九团等部组成的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即第二支队），于1944年11月6日渡过黄河，在歼灭伪军1个河防中队后，进入陇海铁路新安至渑池段南北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牵制了日军第一一 师团主力，有力地配合了第一支队的反“扫荡”斗争，并在新安、渑池、陕县南北地区建立了根据地。12月底，中共中央党校干部100余人、晋绥军区第六支队3个连奉命进抵新安北之园山与第二支队会合。第二支队得到加强后，集中兵力积极打击敌军，争取了一部伪军投诚，将根据地扩大到黄河以南、洛宁以北、陕县以东、新安以西地区，并成立了第二军分区。

为增强豫西我军力量，中共中央决定以驻陕甘宁边区的第三八五旅第七七 团和警备第一旅之第二团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三、第四支队，由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挺进豫西。该部于1945年2月中旬进抵宜阳西南之东赵堡，除留一部兵力与当地抗日武装组成伊洛独立支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外，主力继续南进。留下来坚持当地斗争的伊洛独立支队积极作战，连续攻克许多敌军据点，开辟了宜阳以南、嵩县以北和露宝寨山以东地区，建立了3个抗日县政权，成立了伊洛军分区。第三、第四支队主力则南进至东、西白栗坪，与第一军分区部队会师。2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了河南行署及河南军区。王树声任军区司令员，戴季英任军区政治委员，统一领导豫西的抗日斗争。3月下旬，太行军区又以第十三团主力为骨干组成第六支队进入河南，再次加强了豫西的军事力量。这时，豫西抗日根据地已拥有3个专区、20个县、300余万人口，部队也发展到1万多人，胜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开辟豫西的任务。

发展豫南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河南的指示，刘少奇、陈毅于1944年6月23日致电新四军第五师，要求其向河南发展，与其他兄弟部队共同“完成缩毂中原的战略任务”。7月初，鄂豫皖边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讨论边区工作和向河南发展问题，并于3日将发展河南的工作部署上报中共中央。1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在半年内以巩固原有地区为主，以发展河南及湘鄂赣边为辅的方针”，同时指出：发展河南“应首先沿平汉铁路两侧向北发展，以求得

和华北八路军打通联系”。遵照上述指示，鄂豫皖边区党委和第五师决定，以淮南支队3个连、信应独立第二十五团4个连和第三十八团第三营共1000余人组成豫南游击兵团。首先开辟平汉路东之汝（南）确（山）正（阳）地区，尔后西越平汉路并向北发展。1944年7月29日，豫南游击兵团以由5个连组成的先遣队从陡沟（罗山西北）以西北渡淮河，进入确山、正阳、信阳三县边界地区，以胡冲店为中心开展工作。8月中、下旬，国民党豫南挺进军等部围攻我先遣队，我遂转至正阳西南的张仪店一带分散游击。在此形势下，豫南游击兵团指挥部率第三十八团第三营赴肖王店西北之黎山头，与信应独立第二十五团和淮南支队会合，并于8月29日夜渡淮河北上，进占胡冲店，初步打开了汝（南）正（阳）确

（山）地区的斗争局面，并将淮南支队与加入我军的正阳常备队整编为挺进第三团，信应独立第二十五团改称挺进第二团。嗣后，即以挺进第三团执行巩固平汉路东的任务；主力越平汉铁路执行开辟路西并向北发展的任务。9月23日，主力西进至确山西北之沙河店、大乐山、板桥一带活动。10月6日，打退顽军两个团的进攻，随后一举歼灭盘踞爬头寨危害人民的土匪武装500余人，开辟了以竹沟东南之郭仙冲为中心的路西根据地，建立了两个县的抗日政权。

10月下旬，第五师派第四十五团第二营进入豫南。游击兵团遂以由第三十八、第四十五团调入的两个营为基础扩编为挺进第一、第四团，并以这两个团向豫中挺进，沿途突破日伪军和土匪的阻截，于11月初进至叶县西南的三皇庙、罗冲一带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政权，组建地方武装，并根据区党委的决定，将豫南工委扩大为河南工委，豫南游击兵团改称河南挺进兵团。11月8日，我军1个团在舞阳西南之辛集附近与日军遭遇，激战5小时，将其击退。12月15日，我军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后，南移至确山以西的马查山地区休整。

12月间，第五师又以第三十九团1个营和抗大十分校一批干部进入确山以西之郭仙冲与挺进兵团指挥部会合，并成立了豫南行政公署。河南工委和挺进兵团指挥部，即按中央军委12月初同意的“停止北进，集中力量巩固已占地区”的精神，整训主力，巩固新开辟的根据地，同时派一部兵力伸入临颖、上蔡地区活动，策应冀鲁豫军区部队西进水西；以另一部兵力向襄城、郟县地区活动，准备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

1945年3月，第五师又令第三十八团另两个营进到平汉铁路西，与挺进兵团会合，共同向舞阳、叶县一带发展。3月下旬，我军攻歼舞阳以南尹集一带的伪军1个旅，俘800余人。同时，打退了顽军的进攻，4月中旬，我军又歼灭驻西平县合水镇的伪军第二师一部，从而使叶（县）舞（阳）遂（平）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至此，我第五师部队在豫南敌后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政权，开辟了东西70余公里、南北近100公里的抗日根据地，为尔后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扩大豫东

中共平原分局和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加强水东、开辟

水西的指示，从军区警卫营及各军分区共抽调 300 余人，组成南下大队进入新黄河以东地区（简称水东）。1944 年 7 月初，南下大队与原在水东坚持抗战的独立团合编后，转战于睢县、杞县、太康及淮阳、西华地区，扩大并巩固了睢（县）杞（县）太（康）抗日根据地。1945 年 1 月，冀鲁豫军区为加强该区的领导，决定划水东区为第十二军分区，原独立团改称第三十团，并将调入该区之第八团改称第二十八团。第二十八团与第三十团会合后，于 2 月中旬攻克睢县以南的河堤岭，歼灭伪军一部，并在太康西南之逊母口，歼灭阻我抗日之顽军一部，控制了淮阳以北广大地区，建立了 3 个抗日县政权，为开辟新黄河以西地区（简称水西）创造了条件。

5 月 14 日，第二十八团从扶沟东北的吕潭渡过新黄河，向南进至商水、上蔡之间地区，攻占砖桥镇、五亭寺、五沟营等据点，歼灭伪军及地方反动武装一部，建立了 5 个抗日县政权，打开了水西地区的局面。6 月间，冀鲁豫军区为统一水东、水西区的领导和贯彻执行八路军总部关于加强水东、向东向南发展的指示，决定成立豫东指挥部。同时，调第九军分区第十五团加强水东，将党校警卫团改称第二十九团加强水西。第二十九团途经水东，在第三十团配合下，攻克通许以东之欧阳岗敌据点，歼灭日伪军 600 余人，扫除了西进障碍。随即渡过新黄河，一举攻克了扶沟县城，歼灭伪军 600 余人。尔后在西华、商水、上蔡之间，与第二十八团相互配合，扫除敌军据点，扩大了水西抗日根据地，并成立水西军分区。至此，我军控制了尉氏、临颖以东，睢县、柘城以西，朱仙镇、民权以南，上蔡、商水以北的豫东地区。

恢复豫皖苏边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第四师以 5 个团执行西进任务，以两个团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淮北地区之津浦铁路以东根据地，并令第三师第七旅进至淮北地区作为机动力量；令第二、第七师钳制国民党顽军，策应第四师西进。该师经过充分动员准备后，由师长彭雪枫率第十一旅之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团，第九旅之第二十五团和师属骑兵团及萧（县）铜（山）独立团之 1 个营，于 1944 年 8 月 15 日从泗洪县东南之半城集等地出发西进，20 日在宿县以北越过津浦铁路进入萧县以南地区。21 日，于小朱庄歼灭阻拦我军西进的顽军一部。尔后，又粉碎了日伪军 2000 余人的“扫荡”，并对敌展开攻势，连克据点多处，迅速恢复了萧县、永城、宿县之间地区。此时，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企图乘我立足未稳驱逐我军，遂以 3 个军和苏北挺进军在涡河南北阻我继续西进。其部署是：以 3 个师、4 个纵队渡涡河向北；以陇海铁路以北之苏北挺进军一部向南；以津浦铁路东之暂编第一军第三十三师段海洲部、苏北挺进军第十四纵队苗秀霖部向西，妄图合击我军于萧、永地区。顽军兵力虽大，但其建制不一，互有矛盾，且相距较远，利于我各个击破。据此，中央军委指示新四军，应采取首歼段、苗顽军，再打渡涡（河）北犯之顽军的方针，以西进部队在萧、永、宿地区准备迎击涡南来犯的顽军，以淮北路东部队尾追段、苗，在西进部队配合下歼灭该顽于萧、永地区。同时，令冀鲁豫军区部队歼灭顽苏北挺进军，打通与萧、永地区的联系，令睢杞太部队积极行动，牵制涡南顽军。新四军依据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即以第七、第九旅主力及第一师一部共 5 个团兵力截击段、苗部，歼灭该部于津浦路东或铁路两侧地区，以第四师西进部队准备迎击渡

涡河北犯之顽军，并以必要兵力歼灭可能西逃之段、苗残部。9月12日，段、苗两部由眼宁西南出动，当即遭到我军迎头痛击，被歼一部。与此同时，我西进部队于11日反击占据夏邑以东八里庄之顽军，全歼其1个支队。这两次战斗，打乱了顽军的进犯计划。但在八里庄战斗中，师长彭雪枫在指挥作战时不幸牺牲。中央军委遂任命张爱萍为第四师师长，韦国清为副师长，并令韦先赴津浦路西指挥作战。随后，我冀鲁豫军区部队进击顽苏北挺进军，歼其一部，控制了丰（县）沛（县）铜（山）砀（山）之间地区，基本上打通了与萧、永地区的联系。我睢杞太部队亦积极行动向东发展到柘城、宁陵地区。

在顽军被打退后，日伪军又向我萧、永地区进行“扫荡”。我军以灵活的游击战予以打击，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胜利。10月中旬，顽军集中3个师，6个挺进纵队向萧、永地区进攻，企图消灭我第四师西进部队。新四军军部一面揭露顽军勾结日伪破坏抗战，一面将第三师第七旅西调，协同第四师西进部队展开自卫作战；同时，鉴于顽军兵力较大，电请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南援。10月14日，南线顽军主力由涡阳、蒙城北犯；西线顽军苏北挺进军一部乘机由永城东犯，袭我侧后。鉴于南线顽军兵力密集，我军决心首先反击西线顽军苏北挺进军。当我主力北移时，西线顽军闻讯而逃。19日，南线顽军向我军进攻，但均被击退。这时，冀鲁豫军区南援之3个团已抵陇海路。20日夜，顽军撤向涡阳县城。我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我军不楔入顽军基本区的指示，立即停止对顽军的攻击，保持了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地位。11月下旬，我西进部队又开辟了商（丘）亳（县）永（城）之间地区。至此基本上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并建立了淮北第二专署和8个县的抗日政权，成立了第二军分区，使豫皖苏边区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发展河南的战略任务，是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各项指示，相互策应，密切配合，因而经半年艰苦作战，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打退了顽军的进攻，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达到了“缩毂中原”的战略目的。

二、进军湘粤边，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

1944年下半年，日军向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进攻，国民党军接连败退，湘、粤、桂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为增强华南的抗日力量，开辟五岭（越城、都庞、萌诸、骑田、大庾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以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组成南下支队，分批南下，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尔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以便将来配合全国的战略反攻。同时，中共中央还电令东江纵队向粤北发展。

10月，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4000余人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辖4个大队。另有中央派往鄂豫皖边区工作的干部900多人，编为两个干部大队一同南下。南下支队经过充分动员准备后，在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率领下，于11月9日从延安出发，经绥德东渡黄河，过同蒲铁路，再南渡黄河，越陇海铁路进入我豫西部

队所开辟的地区。又沿熊耳山、伏牛山麓继续南下，在新四军第五师河南挺进兵团接应下，通过敌平汉铁路封锁线，于1945年1月27日进抵湖北大悟山与第五师领导机关会师，将干部大队移交给鄂豫皖区党委，胜利完成了开进和护送干部的任务。

南下支队经短期休整后，在第五师第四十、第四十一团的配合下，于2月19日至23日从黄冈以东分批渡过长江，26日在大冶南之大田畈击退尾追之日军独立混成第八十四旅团，歼其100余人。这次战斗，给鄂南人民以极大鼓舞。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却以武力阻我南进抗日，早在我军过江时，即调集两个军、5个挺进纵队，妄图在鄂南、湘北地区消灭我军。南下支队冲破敌军和顽军的阻截，奋勇前进，于3月3日在第四十团配合下，攻占大幕山，俘伪军200余人。6日，攻克崇阳东南之金塘、大源。这时，第五师第四十、第四十一团留鄂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南下支队继续南下湘北的平江、浏阳地区，26日，进占平江县城，并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由4个大队扩编为6个支队。同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先在湘鄂赣边建立立脚点，尔后再继续南进。3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中间根据地，然后再南进”，同时指出：“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根据这一指示，我军对国民党军严守自卫立场。然而，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却调集4个师、1个纵队的兵力从东、北、南三面围攻平江城。我军于4月15日主动撤离平江，返抵鄂南通山、崇阳地区，并在第五师第四十团配合下，连克岳阳东南的杨林铺、大汉湖、毛家铺等敌军据点，歼灭伪军1个师，俘600余人，使鄂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尔后根据毛泽东5月4日关于“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创立，以为南北枢纽”的指示，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党委、行政公署和湘鄂赣军区，辖3个专署、13个抗日县政权和3个军分区。王震任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任湘鄂赣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区党委和军区成立后，为改变不利态势，粉碎顽军的进攻，巩固鄂南与发展湘北抗日根据地，决定以第一、第二支队东进江西修水、武宁地区，调动顽军东移；以第三、第四支队巩固鄂南，以第六支队开辟湘北桃花山地区。我第一、第二支队向修水、武宁的行动，虽调动了顽军1个师东移，但未能改变不利态势，遂于5月9日再返鄂南。尔后，我军主力向湘阴、衡山间粤汉铁路两侧地区行动，当进至平江以西地区时，又遭到顽军不断进攻，于6月初又返鄂南，准备等待第三五九旅后续部队到达后一同南进。与此同时，坚持平江西南桃花山地区的第六支队，建立了基层政权，争取了一部伪军反正，部队由100多人迅速发展到了2000多人。

鉴于日军行将崩溃，6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广东临时区党委，应即派遣大的有力部队速向粤北发展，以便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合。18日，由第三五九旅之第二梯队和警备第一旅之一部组成的八路军游击第二、第三支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张启龙、文年生率领下，由延安出发，兼程南下。24日，中共中央致电湘鄂赣边区党委和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指出：现在距日军崩溃时间短促，在湘中建立根据地，在目前是可能的，但在日军崩溃后要继续坚持，将是困难的，并难以实现建立南方一翼的战略意图。你们现有主力及张启龙、文年生部（即八路军游击第二、第三支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

南，直至湘粤边，和东江部队联接。尔后，将兵力与干部分散在粤赣边、湘桂边，建立五岭根据地，以便在日军崩溃、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山脉坚持并发展。同时，还指出：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敌占区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对国民党军队应严守自卫立场，只有在其向我进攻而我又有利条件时，才集中力量予以反击，其目的也在于便利我党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湘鄂赣区党委和军区遵照上述指示，决定留第三、第六支队配合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坚持湘鄂赣边抗日斗争，主力继续南下湘粤边。

7月7日，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由大幕山出发，经10日行程进抵平江西南的桃花山。22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山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遵此指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越粤汉铁路，西渡湘江，绕过长沙，于30日到达湘潭西南的方上桥。8月4日，毛泽东电示广东区党委：立即加强北江及小北江各部之兵力及领导，并从东江纵队派有力一部，于半月至一个月内到达湘粤边，与王震、王首道部会合。遵此指示，东江纵队立即组成粤北指挥部率第五支队等部1000余人由罗浮山地区兼程北进，以接应八路军南下部队。8月5日，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渡湘江，沿粤汉路东侧继续南进。当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南进至安仁地区时，遭到国民党两个军的围攻。我军且战且进，17日进入桂东西南的八面山，19日摆脱顽军的合围，28日到达粤北南雄县城西北的百顺地区。这时，东江纵队北上部队，遭到国民党军第七战区军队的围攻，前进受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也遭到国民党军第九战区的重兵围攻，难以立足。在此情况下，遂向北转移并报告中共中央。当我军返抵江西省遂川以西七岭地区时，接到中央军委9月4日回电：“日本投降，引起了时局的迅速变化，过去中央给你们的任务难以完成，今天的新任务是如何战胜顽军之追击、堵击、截击，达到保存自己，站稳脚”。7日，中央军委再电指出：“同意你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五师靠拢”。接此指示后，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兼程北进，在永新、莲花间突破顽军两个师的围堵，由安源跨过浙赣铁路进入湘北、鄂南，27日在鄂城地区北渡长江。10月上旬，在礼山（今大悟县）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再次会师，中旬奉命恢复第三五九旅番号，编入第五师野战兵团序列。游击第二、第三游击支队，进到河南新安地区时，正值日本投降，旋即奉命转赴东北。

南下支队向湘粤边进军，历时近1年，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7省，行程7900余公里，克服了严寒酷暑和山河险阻，作战74次，英勇地打击了日伪军，粉碎了国民党顽军的围攻和拦阻，到达了目的地。虽然由于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未能实现创建五岭根据地的战略企图，但保存了基本力量，并开创了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领导和推动了粤汉铁路沿线人民的抗日斗争，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增强了中原我军的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起了积极作用。

三、南下苏浙皖边，扩大江南抗日阵地

日军第十三军为确保京沪杭三角地带和占领东南沿海要地，防止美军可能在该方向登陆，于1944年9月9日攻占温州，并相继占领福州，控制了闽、浙沿海地区，迫使国民党军纷纷西撤。而我苏南敌后抗日军民经过长期艰苦

斗争，不仅坚持了阵地，而且开辟了郎（溪）广（德）和长兴外围地区，为开辟苏浙皖边创造了条件。9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以新四军主力一部渡江南下，发展苏浙皖边与浙江沿海，为以后收复南京、上海、杭州等各大城市创造条件。接着，中共中央确定了新四军南下的部署：以第一师与第十六旅担负南进任务，沿京杭公路发展太湖西南地区，浙东游击纵队除依托四明山逐步向南发展外，着重加强金华、义乌、兰溪、桐庐等地游击战争，接应由苏浙边南下的部队，并加强对浦东敌后斗争的领导，浙南游击队向浙、闽交界沿海敌后发展。同时还应从第一、第二、第三师抽组第二、第三批部队，待命南进。中共中央还指出：新四军在“西进、南下两个任务中，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确定第一师抽3个团组成第一批南下部队，会同在江南的第十六旅执行南进任务，采取逐步发展逐步巩固的方针，首先打开苏南、浙西局面，再与浙东打通联系，控制全浙江，然后相机向南发展；同时指示第二师、第七师、苏中军区部队和浙南、福建游击队积极行动，牵制敌人，以策应第一师发展东南的行动。

第一师3个团在师长粟裕率领下，于1944年12月27日渡江南下，1945年1月上旬于长兴地区与第十六旅会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于13日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随即将部队整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并确定了进军部署：第一纵队进至安吉、递铺以东，余杭以北，开辟莫干山及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第三纵队进至广德、泗安地区，配合第一纵队行动；第二纵队巩固四明、会稽山区，并逐步向西发展，策应主力南进。2月12日，第一纵队向莫干山地区挺进，沿途打击日伪军，粉碎了安吉、梅溪等地伪军的出扰，开辟了莫干山地区。

正当我军积极向日伪军展开进攻时，国民党军第三战区以5个团兵力，由天目山、孝丰地区向我发动进攻，企图断我第一纵队后路，进而消灭我军。我第三纵队和第一纵队主力于14日被迫发起自卫反击作战，至18日结束了天目山第一次反顽作战，占领孝丰县城，控制了天目山北部地区。尔后，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以巩固现地为宜的指示，一面加紧建设根据地，一面准备粉碎顽军新的进攻。3月1日，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又令苏浙皖挺进军以12个团兵力向我孝丰地区猛烈进攻，企图夺取孝丰县城。我苏浙军区以第一、第三纵队于6日发起反击，至27日再次粉碎了顽军的进攻，控制了东、西天目山和临安县城，取得了天目山第二次反顽战役的胜利。至此，我军已控制了苏浙皖边10个县的广大地区，解放了一百几十万人口。为巩固和发展苏浙皖边根据地，中共中央于3月中旬决定第一师副师长叶飞率教导旅3个团及地方干部数百人南下。该部于4月到达苏浙皖边，编为第四纵队。叶飞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

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在两次进犯均遭失败后，又增调兵力，准备发动新的进攻。我苏浙军区一面加紧新区建设，整训部队，准备反击顽军再次进犯；一面以第四纵队一部与第二纵队打通联系，以另一部与地方武装相配合开辟杭、嘉、湖敌后地区，解决军粮困难。在此期间，第二纵队主力依托四明山向西发展，并在上虞城（今丰惠）附近击溃伪军1个师，占领上虞城，尔后又打退顽军的进攻，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了四明山区。浙南游击队在匝江以北

1944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给华中局的指示。

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小块游击根据地。中共福建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武装在敌人占领的沿海地区，也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

5月27日，国民党军第三战区令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部进至淳安，统一指挥浙西和皖南的国民党军队，准备向我天目山地区大举进攻，企图占我临安、天目山、孝丰，聚歼我苏浙军区主力后，再进攻莫千山、郎溪、广德地区，进而全歼我军或压迫我军退出江南。29日，顽军开始进攻，首先以1个师进至富春江以北，切断我天目山和金（华）萧（山）地区的联系；以另1个师向我孝丰进扰，其主力分向于潜、宁国东南集结；与此同时，杭嘉湖地区的残余顽军亦向莫千山地区蠢动。为打破顽军的进攻，确保浙东同苏南的联系，我苏浙军区于5月29日集中3个支队击溃了富春江以北地区的顽军第七十九师，占领新登城（今城阳）。尔后又粉碎了顽军突击第一队的反扑。我军为保持主动，乃于6月4日撤出新登。顽军重占新登后，继续督令各部加紧向临安、孝丰推进。我军为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顽军作战，于8日撤离临安。9日，第三战区以第七十九师、突击第一、第二队为右“进剿”兵团，由临安向北进攻；以第五十二师、第一四六师、独立第三十三旅、挺进第二纵队、绥靖第一、第二纵队为左“进剿”兵团，由于潜、宁国向东北进攻，夺取孝丰，以第二十八军和忠义救国军进占天目山。其总兵力达到6.6万余人。此时我军能够集中的兵力共有3个纵队10个支队（团），共2万余人，不仅在数量和装备上处于劣势，而且经连续作战，十分疲劳，给养又极困难。在此情况下，苏浙军区决心放弃天目山，向孝丰地区转移，待顽军深入时再相机予以歼灭。15日，我军全部撤离东、西天目山，向孝丰地区转移。顽第二十五集团军误认为我军“向北溃窜”，乃于16日令其左、右“进剿”兵团对孝丰实行分进合击，以忠义救国军进占天目山北麓各要点。根据顽军的进攻态势，我苏浙军区决心集中兵力在孝丰地区求歼顽军一部，以粉碎其进攻，并作了具体部署，以3个支队扼守孝丰，迟滞、消耗顽军；以7个支队隐蔽集于孝丰西北地区，伺机实施有力的反击。19日，顽军左兵团进至孝丰以西，比较突出；右兵团进到孝丰东南的港口地区，两兵团相距约20公里。我军抓住比较突出的左兵团，于当夜集中6个支队发起猛烈反击，经一夜激战，歼顽第五十二师主力及独立第三十三旅一部，其余部逃窜。当我攻歼顽左兵团时，顽右兵团向我孝丰外围阵地猛攻。我坚守部队顽强战斗，打退顽军数次猛扑，牢牢地牵制住顽右兵团。21日晚，我军主力东进，将顽军右兵团包围压缩于孝丰城东南的草明山、白水湾、港口的狭小地区内。顽军虽多次拼死突围，但均未得逞，至23日大部被歼，残部向南逃窜。至此，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战役遂告胜利结束。新四军第一师部队在南下苏浙皖边的斗争中，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各战略区的有力策应下，艰苦奋斗，英勇作战，打击了敌人，粉碎了顽军的阻挠及多次进攻，巩固与发展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扩大了我军在江南的抗日阵地。

向河南、湘粤边和苏浙皖边敌后的进军，是战略相持阶段后期我军对敌实行局部反攻的重要的战略行动。由于我军在进军中抓住了有利时机，敢于远离根据地，跃进至敌后或敌、顽之间空隙地带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加之各大战略区的相互策应与配合，以及在反对国民党顽军的进攻中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基本上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河南、进军湘粤边、发展东南的战略决策，对于策

应我解放区内线的攻势作战，对于夺取抗战胜利和后来反对国民党挑起的内战，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七节 加强攻势作战，猛烈扩大解放区

一、1945年初的形势和我党我军的方针、任务

1944年6月6日，美英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实现了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会议上所确定的从东、西、南三面进攻德国的计划，从而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1945年初，苏美英等同盟国军逼近德国本土，德国法西斯覆灭在即。日本法西斯由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连续失利，以及在中国战场上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消耗了大量兵力，尤其在解放区战场军民局部反攻的打击下，占领区日趋缩小，因而也败局已定。为挽救危局，日军、大本营于1945年1月中旬决定建立日本本土及中国、朝鲜等占领区的防御体系，准备与同盟国军队决战。并指令其中国派遣军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华北、华中和华南沿海地区为防御重点，力求挫败美军登陆和中国军队反攻的企图。本此方针，敌中国派遣军于1月29日在南京召开各方面军和军司令官联席会议，决定：华北方面军确保现有占领区，并加强山东半岛对美和绥蒙地区对苏的作战准备，同时在第六方面军一部配合下，向老河口（今光化）一带的国民党军进攻，摧毁这个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第六方面军确保粤汉、湘桂铁路沿线新占领区和武汉周围地区，并向芷江一带的国民党军进攻，摧毁这个地区胁空军基地，同时保持与南方军的联系；第二十三军由第六方面军建制改归中国派遣军直辖，负责确保广东及赣南占领区，并防御美军在闽粤沿海登陆；第十三军确保京、沪、杭等占领区，并准备抗击美军在江、浙沿海的登陆；第五航空军除以一部协助地面部队并扼制在华之美空军活动外，集中主力在沿海口岸进行对美作战准备，同时，要求各方面军和军必须重点加强工矿区、交通干线和主要城市及机场的守备。为实现上述方针和任务，敌中国派遣军开始调整部署，整编部队。至1945年春，先后组建了6个师团、13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3个相当于旅团的独立警备队，总兵力约100万人。此外，伪军也增至80多万人。但由于总的战略形势对其更加不利，加之新建兵团多，老兵骨干少，日伪矛盾日益加深，因而士气更加低落，战斗力明显下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继续实行消极抗战的政策。国民党军在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起的豫湘桂等战役中，连续败退，丧失了豫、鄂、湘、粤、桂等省大片国土。但在美国帮助下，却在云南、贵州、四川大后方加紧美械装备部队的整训，以备发动反共内战之用。

敌后各解放区，经过1944年的局部反攻和整风、生产运动，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已拥有9000多万人口和200多万民兵。我军不仅在数量上已增加到78万人，而且经过攻势作战特别是冬季大练兵运动，在军政素质上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就为开展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扩大解放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于1944年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提出：全国“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明确解放区军民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并要求全军开展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

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任务和自己的特点部署工作，强调要“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各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制定了1945年扩大解放区的具体作战方针和计划，并领导本地区军民，对当面之敌，有步骤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二、八路军发动春季攻势

敌华北方面军为确保其占领区，准备对美、对苏作战和对老河口国民党军的进攻，并拟抽调一部兵力支援华中沿海部队抗击美军登陆，遂于1945年春加紧整编部队。三四月间，敌在济南组建了第四十二军司令部，统一了山东半岛的作战指挥；同时，对预定的对美作战兵团，增编了炮兵部队，对担任警备任务的独立混成旅团进行了扩编，并编组了11个独立警备队，以接替调出兵团的防务。这样，敌在华北的警备兵力只有125个大队，约19万人，平均1个大队要担负4个县的守备任务，充分暴露其兵力不足的弱点。华北伪军虽有第三、第五、第六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一部，以及华北绥靖军、伪蒙军和其他地方伪军共40多万人，但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据此，我八路军各军区部队为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以夺取敌守备薄弱之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将敌压缩、包围于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为目标，发起了大规模的春季攻势。

晋冀鲁豫边区部队以解放豫北地区为重点发起攻势作战

(参见附图62)

盘踞在晋冀鲁豫边区之敌，遭我1944年攻势作战打击后，大都退缩到中心城镇及主要交通线上。根据上述情况和毛泽东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我晋冀鲁豫边区各部除积极扫清残存在我根据地内和边沿上的敌军据点外，还为开辟豫北、晋南新区发起了猛烈攻势。

道清战役 为开辟道(口)清(化，今博爱)铁路两侧的豫北地区，打通太行根据地与豫西根据地的联系，太行军区首长决心以第七、第八军分区和平原分局党校警卫团等部共4个团又3个独立营的兵力，于1月下旬发起道清战役，消灭盘踞在道清铁路及其两侧地区的日军第一一七师团和伪第五方面军各一部。

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军以攻取道清铁路以南伪军所盘踞的小东、宁郭两镇为中心，扫除路南敌据点。为增强战役的突然性，我先以地方武装和民兵进行宽正面的活动，迷惑牵制敌人；接着以第七、第八军分区主力于1月21日夜，突然自九里山(修武北)等处南下，于修武以西越过道清铁路，远程奔袭小东、宁郭之敌。战至次日晨，相继攻克两镇，歼灭守敌大部。尔后，会同平原分局党校警卫团及地方武装，进攻道清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沁阳以东地区的日伪军，至31日，我军连克敌据点16处，歼敌一部。这时，日军第一一七师团第三九大队分由沁阳、博爱、焦作等处

出动，企图分三路合击我在大油、樊庄一带的部队。据此，我军即选其薄弱一路，以3个团的兵力设伏于樊庄，全歼了由焦作南犯的日军1个中队。其他各路敌军遭我阻击后，纷纷回窜。樊庄一战，痛击了日军，巩固了新开辟的道清铁路以南地区，胜利地结束了第一阶段作战。接着，我主力全部北上，转移到辉县以北的南平罗地区待机，同时又增调两个主力团准备参加第二阶段作战。战役第二阶段，我军以扫除道清铁路以北的日伪军据点为主要目的。2月20日2时，我军以3个团攻击伪第五方面军独立第十四旅旅部所在地五里源，以两个团攻击其外围据点陆村。主攻五里源的部队，经数次突击未能奏效，乃暂停攻击，重作部署；攻击陆村的部队获胜后，亦转入监视五里源之敌。是日黄昏，我向五里源之敌发起总攻，迅速突破围寨，攻入寨内。经激战，敌一部被歼，一部逃窜。攻克五里源后，我主力乘胜北上辉县地区，扩张战果。至23日，相继攻克赵固、峪河、百泉等重要据点，并袭入辉县城关，解放了除县城以外的全部地区，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根据敌抽调兵力增强修武、获嘉、辉县等城的守备，而新乡、郑县（今郑州）、开封之间敌兵力空虚的情况，我太行军区决定以主力一部挺进原武、阳武地区，开始第三阶段作战。3月22日夜，我第七军分区主力在武工队的配合下，东越平汉铁路，突然袭取了原武外围之王村、盐店、葛庄等据点。10天之内，我两度袭入原武县城，攻克据点7处，歼灭日伪军600余人，争取了伪保安大队300余人反正，并逼近开封城郊，控制了除原武、阳武县城以外的大片地区。与此同时，以第八军分区主力一部，南渡沁河，向温县、孟县地区挺进，一度攻入温县城。至4月1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我军共歼灭日伪军2500余人，扩大解放区20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75万，使以新乡为交点的平汉、道清、新（乡）汴（开封）三条铁路均暴露在我军的直接打击之下。道清战役是一次成功的运动战战役。4月11日，中央军委在致新四军、八路军南下支队和东江纵队等部领导人电中肯定了这次战役的经验。指出，确实弄清敌情，实行“重点主义”的兵力部署，采取不规律的闪击行动，并加强伪军工作和开展地方工作等，是战役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继道清战役之后，太岳军区又集中第二、第四军分区近4个团的兵力及地方武装，在道清铁路以西之沁阳、济源、孟县之间地区，发起第二次豫北战役。战役从4月3日开始到月底结束，我军共攻克敌据点40余处，歼敌2800余人，并争取了1700余名伪军投诚反正，控制了黄河北岸除沁、孟、济等县城以外的广大乡村。

通过道清战役和第二次豫北战役，晋冀鲁豫我军共歼敌7900余人，开辟了平汉、新汴铁路以西、黄河以北、王屋山以东3800余平方公里的豫北地区，建立了7个抗日县政权，使黄河以北的太行、太岳根据地与黄河以南的豫西解放区联成一片。

在集中主力开辟豫北地区的同时，晋冀鲁豫边区军民还对深入我根据地内敌之孤立据点和县城展开了广泛的围困战。

沁源围困战 太岳军区部队自年初以来，加紧了对深入我腹地之敌占据点和县城的围困。至4月底，我军先后收复沁源、阳城、晋城等县城。其中尤以长达两年半（1942年11月至1945年4月）的沁源围困战最为突出，创造了群众性长期围困战的范例。

沁源地处我太岳根据地的腹心。1942年10月，敌集中1万余人“扫荡”太岳根据地时，留下第六十九师团一部据守该城及其周围的阎寨、交口、中

峪店等据点，企图以此为基地不断“蚕食”、袭扰我太岳根据地。据此，太岳区党委和军区于11月中旬确定：“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并确定以沁源县委为核心，与太岳军区第三十八团共同组成县围困指挥部，统一领导围困斗争。为便于指挥，全县还以第三十八团为骨干并有第二十五、第五十九团各一部，结合县区基干队和民兵等组成13个游击集团。从此，沁源广大群众便在指挥部和游击集团的带领下，对城关及各据点之敌进行了长期的围困战，大量消耗和疲惫了敌人，迫使敌人两易防务，三次收缩阵地，最后被困于沁源城不到半平方里的西山头上。至1945年春，沁源军民对敌展开了更加猛烈的围困战。以1.5万颗地雷（石）雷密布雷阵，采取狙击、袭击、夜袭等各种手段困扰敌人。被围日军终因粮弹水来源断绝，被迫于4月11日，在沁县千余敌人接应下狼狈逃窜。在两年半的围困战中，沁源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太岳军区一部配合下，共作战2730次，毙伤日伪军4000余人。延安《解放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此战“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在春季攻势期间，太行军区部队还进行了陵川、和（顺）左（权）、祁（县）太（谷）平（遥）、安阳（第一次）等战役战斗，共歼灭日伪军2600余人，收复和顺、左权、陵川等县城。

南乐战役 冀鲁豫军区部队于1月16日采取里应外合手段一举攻克大名县城（18日为敌重占）、击毙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后，又于4月下旬集中4个军分区的部队，发起以攻取敌之孤立据点南乐县城为中心的南乐战役。其部署是：以第八军分区主力攻取南乐县城及部分外围据点；以第三、第七、第九军分区部队阻击大名、安阳出援之敌，并在浚（县）滑（县）和大名西北地区积极活动，迷惑敌人。24日23时，攻城部队在火力掩护下，从西南和西北两角迅速攻入城内，旋即对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三旅旅部和伪保安团部及日军小队实行分割包围，先打分散的小股敌军，后打集中的大股敌军，激战至26日中午，全歼守敌。与此同时，担任打援和牵制敌人的部队，亦将敌外围据点全部拔除，并击退了由安阳、大名等处出援之敌。至27日，南乐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灭日伪军3400余人，攻克南乐县城及其外围据点32处，解放了卫河以东大片地区。在攻取南乐城的战斗中，由于我军实行两个方向突破，接着勇猛穿插分割，先打分散之敌，后攻集中之敌，因而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此后，冀鲁豫军区部队还拔除了大名以南、卫河以西的敌大部据点，收复了大名、新河、南宫等县城。

山东军区部队连续发起以歼灭大股 伪军为主的春季攻势

（参见附图63）

1944年，驻济南之敌第十二军主力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后，山东日军兵力虽有所减弱，但伪军兵力却猛增到20余万人。其中吴化文、荣子恒、厉文礼、张步云、赵保原和张景月等部，已成为我继续扩大解放区的障碍。据此，山东军区于当年10月12日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军事斗争方针的指示，

明确提出：首先消灭伪军中最大股、最反动的部分，尤其是胶东军区和渤海军区应以赵保原和张景月为主要打击对象。根据这一指示，山东军区各部开始了1945年的春季攻势作战。

讨伐伪军荣子恒部战役 1944年底，敌为加强津浦铁路沿线的守备，将伪暂编第十军荣子恒部由临（沂）费（县）边调至泗水县城及其周围地区。该敌依仗泗水城靠近津浦铁路，以为我不敢轻易对其攻击，周而疏于泗水城防的工事构筑，尤以西关最为薄弱。我鲁南军区侦悉这一情况，决心集中主力在鲁中军区一部配合下歼灭该敌。2月1日晚，鲁南军区主力以奇袭手段，向泗水城之敌发起进攻，一举突破城垣，攻入城内。继而对城年各要点展开攻击，激战至2日拂晓，将伪军长荣子恒和日本顾问等分别围困于南门城楼上和伪县政府大碉堡里。当日18时，我分别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击毙荣子恒及其参谋长和日本顾问，其余敌人被迫投降。至19时，城年敌人全部肃清。与此同时，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部队和鲁南地方武装一部，亦攻克泗水外围之敌县、杨庄、杨公村等据点，并击退新组建之伪第三师，迫使伪第一团400余人投降。2日和3日，我军还打退了滋阳（今兖州）、曲阜等地敌军的增援。至此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敌2000多人，攻克泗水县城及其外围据点16处，使我军进一步逼近津浦铁路及敌之重要据点滋阳。

讨伐伪军赵保原部战役 讨荣战役结束不久，胶东军区即根据山东军区的指示，发起讨伐伪军赵保原部战役。赵本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之暂编第十二师师长，但其一贯勾结日寇，鱼肉人民，破坏抗战。自1944年8月起，进一步投靠日寇，被编为伪“剿共第七路军”，总兵力约1.8万人，盘踞于以玩底（今万第）为核心的五龙河及大小沽河中游地区，北与莱阳、南与即墨日伪军据点交错配置，互为依托，其防御工事坚固，尤以玩底、左村为最。据此，胶东军区决定集中5个团又5个营（含1个炮营）的兵力，在5万民兵和群众配合下，对赵部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其部署是：以第十三、第十六团和北海独立团全部、东海独立团一部及特务营和炮兵营组成的中央纵队，担任主要突击任务；以东海独立团大部与海阳独立营组成的左纵队和以第十四团与莱东、西栖两独立营组成的右纵队，负责堵击逃敌和阻击援敌。2月11日夜，中央纵队各部向伪军之指挥部所在地玩底发起攻击。由于各部协同动作不好，除一部按计划突入前玩底外，大部攻击未果，乃将突入部队撤出，退守外围既得阵地，准备调整部署后于12日黄昏再攻。12日，敌为解玩底之围，妄图对我实行内外夹击。从10时半开始，玩底之敌集中1000余人向外反扑10余次，均被我击退；与此同时，分别由左村和乔家泊增援玩底之敌1个营又10个连，亦被我左、右纵队在运动中歼灭。是日黄昏，我集中火炮10门，对玩底之敌实施火力急袭，发弹数百发，各部随即乘势发起总攻，仅10分钟即突入城内，全歼前玩底守敌5个营。此时，后玩底、西玩底之敌动摇逃窜，又被我截歼大部，仅赵保原率残部向南窜入即墨。

在攻克玩底之后，军区决定乘胜扩大战果，夺取敌之另一重要据点——左村。14日，我除以一部分别包围莱阳城西和城东之河源、乔家泊据点，牵制莱阳之敌以外，集中3个团和1个炮兵营围攻左村。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炮火准备后，步兵开始发起总攻，顺利突破敌军阵地，守敌4个团大部被歼，仅从东门逃脱200余人。与此同时，乔家泊、河源被围之敌，亦被我歼其一部，余部在莱阳援敌接应下逃入城内。15日以后，我军转入清扫五龙河两岸残敌，继续发展胜利。至19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毙伤敌2000余人，

俘虏 7370 人，击溃 2000 余人，给予赵部以毁灭性打击，剪除了胶东日军的羽翼，清除了大反攻的一个障碍，解放了 70 万被荼毒的人民。这次战役的成功之处在于集中优势兵力，首先击敌要害，打乱其指挥机关，歼其主力，以动摇其他敌人的守备信心，迫其投降；同时注意组织步炮协同，有效地发挥了炮火的威力。

继讨赵战役之后，渤海军区又按预定计划，以其主力及部分地方武装，在寿光东北之侯镇至羊角沟一线，进行了对付代伪第三方面军第六军张景月部的战役。战役从 4 月 15 日开始到 5 月 14 日结束，共歼敌 4000 余人，攻克据点 24 处，解放了洱河以北、小清河以南大片地区，将张部压缩到寿光南北地区，为进一步歼灭该敌创造了条件。

蒙阴战役山东我军在歼灭大股伪军的同时，对伸入我根据地年敌之孤立据点也展开了围攻。攻取蒙阴县城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该城位于我鲁中沂蒙山区根据地的腹地。城内驻有伪军 12 个中队和日军 1 个小队，城防坚固，但在城内有我内线关系，利于我以里应外合的手段夺取该城。据此，鲁中军区决心集中主力 4 个团及地方武装和民兵各一部，于 3 月上旬发起蒙阴战役。具体部署是：以两个团攻城，以另两个团包围外围据点，并准备于城北阻击援敌；同时，派人化装潜入城内，利用内线关系炸开城门，接应攻击部队入城。8 日夜，我军发起攻击。由于先头部队未能按时接近炸开的城门，城门复被敌人堵上，接应未果。我随即改取强攻，连克东、西、北三关，拂晓后转入坚守既得阵地，准备阻击援敌，待黄昏后再行攻击。9 日上午，新泰日军 1 个中队分两路驰援，其左路被我全歼于城北之墩台，右路则被我击退。当日 18 时，我军从东、西、北三面同时对蒙阴城发起攻击。在山炮火力掩护下，首由西门突破，接着其他部队亦从东、北、南三门攻入城内，展开巷战。至 10 日 4 时，全歼守敌。此役由于战前部署周密，战中又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进行了调整，使攻城与打援紧密结合，因而取得了歼灭日伪军 1300 余人的胜利，摧毁了敌历年来对我沂蒙根据地“扫荡”的重要基地，使沂蒙与泰南联成一片。

在此之前，滨海军区部队还在诸城以东和赣榆外围地区对日伪军展开进攻，攻克百尺河等据点 40 余处，毙伤俘敌千余人，并争取了诸城伪保安部队 1300 余人反正。

晋察冀军区部队展开以攻取边沿区敌占 城镇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

(参见附图 64)

1945 年初，在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周围地区尚有日伪军 10 万余人，其主要企图是：依托山阴、应县、灵丘、涞源一线据点，阻止我向雁北、察南发展；并在冀热辽边区长城内外扩大无人区，力图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冀东地区；在冀中则实行所谓“面”的控制。1945 年 2 月，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根据敌人情况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绥路两侧工作的指示以及毛泽东关于“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

冀东敌占区发展”的指示，确定：以开辟雁北、察南、绥东、热河、子牙河东、大清河北和律浦路以东地区为本年度扩大解放区的基本任务，并于5月展开大规模的战役行动。为此，各部队除派武工队到预定开辟地区进行侦察活动外，并首先对根据地年和边沿区的敌占城镇据点展开进攻。

任河、文新、安饶战役 冀中军区部队于1至3月间粉碎敌对清苑地区的清剿和重占肃宁的企图后，自4月中旬起，即对敌连续发起攻势。13日，首以第九军分区部队发起任（丘）河（间）战役，攻占了任丘何间之间、北（平）大（名）公路上的敌强固据点辛中驿。随后于23日，又对任丘、河间县城发起进攻。先以一部兵力佯攻大城，继而集中第八、第九军分区主力突然包围任丘、河间之敌。经7昼夜激战，于30日攻下任丘县城，5月9日再克河间县城，从而切断了北大公路，为东进北上创造了条件。任（丘）河（间）战役尚未结束，冀中军区即转移兵力东进北上，以攻取文安、新镇为目的，发起文（安）新（镇）战役。部署是：以第八、第十军分区部队分头插向大城、霸县，牵制两地敌军，掩护主攻文安、新镇部队的两翼安全；以第九军分区全部兵力实施中间突破，强攻文、新两城。由于新镇之敌凭坚顽抗，我军乃以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选择敌指挥部所在的碉堡为目标，进行坑道爆破。在爆破的同时向附近碉堡的敌人喊话，劝其投降。敌一部投降，一部弃城逃窜，我即解放新镇县城。尔后，第九军分区集中兵力攻取文安，由于部署周密，一举攻克该县城。文安、新镇的收复，使我军进一步威胁津浦铁路和天津。为配合文新战役，使敌顾此失彼，陷入被动地位，我于5月8日发起安（平）饶（阳）战役。先以第六军分区部队袭击深县、晋县、石门（今石家庄）及辛集，牵制各点之敌；再以第七军分区主力和第八军分区一部，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的战术，围困安平、饶阳之敌。13日，饶阳之敌果然向安平撤退。我遂以第三十二、第三十六、第四十二区队及安平大队等部在两城之间的韩村铺设伏，歼其600余人，并乘势解放了饶阳县城。随后，我军又收复了安平、武强和深泽等县城，从而把根据地扩大到德石铁路一线。在春季攻势中，冀中我军共歼敌3700多人，收复县城8座，使大清河以南、德石铁路以北、子牙河以西，潞龙河以东的基本区联成一片。

与此同时，冀晋和冀察军区部队，也对根据地年和边缘区的敌占城镇据点发动进攻。冀晋军区部队从1月份开始，连续攻克和收复村镇、据点79处。在封锁沟外活动的部队，先后袭入平山、繁峙和山阴等县城。3月底，冀晋军区集中主力一部在冀察部队配合下，向灵丘地区之敌发起进攻，连克其外围据点数处，并争取伪军一部反正，迫使日军于30日放弃灵丘，逃向广灵，灵丘县城遂告解放，为进一步开辟雁北地区创造了条件。冀察我军在这段时间亦派出主力一部，在游击队、武工队和民兵的配合下，向边缘和残留在根据地年的敌军据点展开围攻，先后袭入徐水、保定、崇礼等城，逼近北平城郊，收复了平西的紫荆关和斋堂镇，并在张家口以南开辟了2500平方公里的地区。

2至5月，冀热辽军区部队展开了反伪满军战役，共作战230次，歼敌5035名，粉碎了敌人“扫荡”和集家并村的阴谋，迫其退至北宁铁路沿线。

晋绥军区部队对主要公路沿线之敌展开攻势作战

(参见附图 65)

晋绥军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当面的敌情，制定了 1945 年军事斗争计划。计划规定：连续发动几次进攻战役，收复深入我根据地之离

(石)岚(县)、忻(县)静(乐)、神(池)五(寨)等 3 条公路沿线的敌军据点，把敌人挤到同蒲铁路和太(原)汾(阳)公路附近，使第二、第三、第六、第八军分区联成一片，为塞北地区的恢复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本此计划，军区决心于 2 月中旬发动春季攻势，首先夺取离岚公路沿线敌人据点，并为尔后向神五、忻静两线发展进攻创造条件。

离岚公路是敌在晋西北的一条重要交通线。该线由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和第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及当地伪军守备。据此，晋绥军区决定：以第一、第三军分区部队和军区直属第二十一团，在离岚公路以西分别向方山以南和赤坚岭以北之敌军据点展开围攻；以第八军分区部队在离岚公路以东积极牵制敌人，配合路西部队作战。与此同时，第二、第六军分区部队分别对神五、忻静公路沿线之敌出击，其他各军分区对敌之孤立突出据点加紧围困，以策应离岚线上的攻势作战。

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春季攻势于 2 月 17 日在晋绥区全面展开。各主攻部队首先将离岚线上的方山、圪洞、胡堡、峪口等据点紧紧包围起来，并不断打击出援和前运后送之敌。仅 17 日至 26 日 10 天中，即在树林、下西山、西坡村、东里上等地设伏 6 次，歼敌 240 多名。在我围攻和争取下，敌内部开始瓦解。3 月 4 日，圪洞伪军 1 个中队集体反正。5 日，峪口、圪洞、胡堡和方山之敌，开始向东村(今岚县)撤退。沿途 7 次遭我截击和伏击，4 次踏响雷阵，直到 6 日才狼狈逃到村里。接着赤坚岭、王狮据点之敌亦在我围逼之下逃进东村。于是，方山县城及上述据点即为我收复。在方山等处之敌节节败退的影响下，岚县之敌恐慌异常。在此有利形势下，军区于 3 月中旬发出继续发展攻势的指示，要求各部加紧围挤离岚线北端的东村、岚县、普明、寨子等据点。各部立即对敌采取分割包围、切断交通、开展地雷战和连续破击等战法，使增援与出扰之敌连遭打击。在供应断绝、待援无望的情况下，敌不得不于 4 月 5 日撤出岚县、普明、寨子等据点，而龟缩于东村一处。敌逃入东村后，又遭我军包围，被迫于 8 日上午突围逃至静乐。我军即收复岚县城及东村等据点多处。至此，长达 110 公里的离岚公路，除大武至离石 15 公里外，全部为我控制，我第一、第三、第八军分区完全联成一片。

我军在离岚线上的胜利，使在我根据地内的五(寨)三(岔堡)公路沿线之敌极为恐慌。3 月下旬，敌强征大车千辆，拟将三岔堡存粮全部运往五寨，并由宁武、神池增派部队护送粮车。我晋绥军区判断敌人有从五三公路撤退的可能，即指示第二军分区部队加紧对五三线展开攻势，并以第二十一团加强该部。4 月 9 日夜，第二军分区主力采取里应外合手段，一举攻克五三公路上的小河头据点，歼敌一部，切断了该线。在我连续打击下，敌被迫放弃原定运粮计划，遗弃粮食 50 万斤，于 12 和 13 两日从三岔堡、旧寨撤走。我乘势以第二军分区一部围困五寨、义井之敌，以第二十一团一部围困神池、贺职、八角堡等地之敌。至 24 日，我军先后攻占风子头、八角堡、贺职等据点，迫使石咀头、都咀头和凤凰山据点之敌投降。这时，据守五寨县城的日军已完全孤立，遂于 25 日弃城向义井逃窜。至此，五寨县境除李家坪一处外，

已无敌踪。

历时 68 天的春季攻势，晋绥我军共作战 537 次，毙伤日伪军 1590 人，俘虏和瓦解日伪军 810 人，收复方山、岚县、五寨 3 座县城及其他据点 54 处，夺取离岚、五三两条公路，扩大解放区 3840 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9.4 万。

三、新四军发动春季攻势

(参见附图 66)

1945 年春，敌为防止美军在华中沿海登陆，确保华中占领区，特别是京、沪、杭三角地带和武汉周围地区，控制水陆主要交通线，大量增强了华中的守备兵力。除原有两个军部、5 个师团和 6 个独立旅团外，又将关东军第六军司令部调至杭州，并新组建了 3 个师团、7 个独立混成旅团和 1 个独立警备队。同时以 3 个师团的兵力，在北起连云港南至杭州湾的沿海重要地区，增筑防御工事。华中地区的伪军除原有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一部及徐州、武汉、杭州绥靖军等部外，又将原驻河南开封一带的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调至苏北、苏中地区。此外，在津浦铁路以西的国民党第十战区部队，也阴谋向我华中解放区发动进攻。在此情况下，我华中局和新四军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决定集中部分主力向敌占领城镇和交通线展开进攻，以扩大解放区。

阜宁战役 苏北我军趁伪军孙良诚部抵达苏北立足未稳之际，于

1 月下旬主动出击，至 3 月中旬，共歼该部 1200 余人，解放了灌河以北广大地区。三四月间，敌为增强长江下游防务，再次收缩兵力，将阜宁等地的日军先后撤走而以伪军接替各据点守备。这样，阜宁县城及城北各据点共有伪军 5 个团，约 3400 人。鉴于阜宁城伪军失去日军支撑，忙于交接防务，内部矛盾突出，城内粮草缺乏等情况，新四军第三师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集中第八旅全部、第十旅主力和师特务团及 5 个县独立团共 11 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先以主力攻取城北各据点，尔后相机夺取阜宁城。具体部署：以第八旅全部和第十旅主力攻取城北外围各据点，并派主力一部阻击阜宁增援之敌；以师特务团主力、阜宁独立团和射阳独立团分别配置于城南串场河两岸，阻击苏中之敌北援或阜宁之敌南逃；以阜东、建阳和盐东 3 个独立团，分别配置于阜宁城以西、湖垛以北和鲁公祠、新兴场以东，牵制各该处敌军行动。

战役于 4 月 24 日午夜发起。第八旅各部分别向阜宁城北之头灶、七灶、掌庄等据点进攻；第十旅一部攻击城北之大顾庄，另一部位于小顾庄对阜宁城方向实施警戒。经过激烈战斗，至 25 日上午，各部先后攻克上述据点，全歼守敌。在我围攻上述据点时，驻阜宁城伪第五军军长王清翰率主力两个团分三路向大、小顾庄驰援。当其进至小顾庄以南地区时，即遭我第十旅部队的迎头痛击，敌仓惶回窜。第八旅一部随即跟踪追击，突入城里，占领了北门炮楼和护城河内侧要点。下午 3 时，我集中主力 3 个团投入巷战。战至 26 日上午，敌一部被歼，大部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投降，仅有伪军部及其所属一部乘夜暗南逃，沿途又连遭我截击，残部逃往盐城。随后，我军又乘胜收复了盐（城）阜（宁）公路沿线的大施庄、沟安墩、草堰口等据点多

处。

在历时 3 天的作战中，我军共毙伤伪军 339 人，俘伪副师长以下 2073 人，攻克阜宁县城及其外围据点 22 处，切断了联结苏北与苏中的南通至赣榆的公路，给伪军孙良诚部以沉重打击，扩大了苏北根据地。此次战役的胜利，主要是由于我军先打外围孤立分散之敌，后打集中较强之敌，并抓住出援之敌遭我打击回窜阜宁城之机，立即跟踪追击，一举攻入城内。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迫使大部伪军投降，从而避免了强攻，减少了伤亡。

三垛伏击战 4 月下旬，我苏中军区侦悉：伪第五集团军独立团由宝应调往兴化县以南的周家庄一带。其行军路线是：由宝应经高邮，再往东经三垛、河口至兴化之周家庄，并有日军两个中队护送。据此，军区决心集中第一军分区 3 个团又 1 个营的兵力，组成河南、河北两个纵队，沿北澄子河三垛至河口的河道两侧，设置了 7 里长的伏击圈。28 日中午，当敌进入预设地域后，我即发起猛烈攻击，将其斩成数段，经 4 小时激战，共歼灭日伪军 1800 余人，其中毙日军 240 人，俘 7 人。出其不意，速战速决，一举歼敌于运动之中，是这次伏击战的主要特点。

淮北、淮南军区部队的攻势作战 2 月上旬，驻天长、五河、淮阴地区之敌，为控制淮河下游与三河水交通，分别从所在地区出发，先后占领了天长以北的龙冈、金沟、蒋坝，五河以东的双沟、浮山，以及淮阴以南的顺河集。淮南、淮北我军，当即采取伏击、袭击和围困等手段，不断给进犯之敌以杀伤和消耗。随后又出击五河、泗县，袭入金沟、黎城（天长北），攻占了运河线上的豆瓣集（淮阴西）。至 4 月中旬，敌被迫从蒋坝、金沟、浮山等地向高邮、五河撤退。我军又趁势连克旧县（五河东南）等 10 余个据点，仅淮南部队即歼敌近 800 人，粉碎了敌控制淮河下游及三河水交通的企图。为进一步扩大攻势，淮北我军自 4 月 15 日开始，对洋（河）众（兴）、固（镇）灵（壁）和泗（县）灵（壁）等公路展开破袭战，尔后向北进击灵壁、睢宁之间的日伪军，同时围攻涡（阳）永（城）地区之敌军据点。在历时近 1 个月的作战中，我军共歼敌 3000 余人，攻克泗阳县城及大店、丘集、虞姬墓等据点 21 处，使睢宁等地之敌陷入我包围之中。与此同时，淮南部队还对驻守在盱（眙）蚌（埠）公路沿线之敌发起进攻，拔除津里、石坝等据点多处。

鄂豫皖湘赣军区部队和皖江军区部队的攻势作战 鄂豫皖湘赣我军根据边区党委二月会议关于以湘鄂赣为主要发展方向，相机发展其他地区的决定，积极向敌占区伸展。4 月上旬，当敌对南阳、老河口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时，我为牵制敌人西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即以近 6 个团的兵力，分别由大悟山和确山向随县以南和信阳西南敌之后方挺进，恢复了白兆山和四望山根据地。此外，我还分别在豫中、鄂中和鄂南等地歼灭伪军各一部，扩大了解放区。皖江我军根据华中局关于今后主要是向江南发展的指示，于 4 月间对芜湖地区之敌发动攻势，解放了部分地区。

四、1945 年的夏季形势。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45 年 5 月 8 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6 月，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攻占冲绳岛，打开了日本本土上的南部门户。在中国战场上，

日军被迫困守于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沿海一带。为作垂死挣扎，日军大本营除决定加强本土决战准备外，于5月28日命令其中国派遣军撤退在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部队，以加强其在华中和华北战场的守备；30日，又命令关东军加强朝鲜及我国东北的对苏。对美作战准备。敌中国派遣军根据其大本营的命令，决定进一步收缩兵力，撤退湘桂、粤汉铁路沿线及福建沿海的部队，集中力量控制华中和华北的重要地区，对中、苏实施持久作战，并粉碎进犯沿海重要地区的美军的进攻，以利本土决战。并确定对美战备的重点地区，首先为华中的三角地带，其次为山东半岛，“即使情况已到最后关头，也要确保南京周围、北京周围及武汉周围重要地区”。截至1945年夏，敌中国派遣军除奉命调出4个师团和1个军部加强关东军外，尚有27个师团、34个独立旅团和13个相当于旅团的独立警备队，总兵力达100多万人。此外，还有伪军100余万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形势下，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已经不是是否继续抗战的问题，而是战后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此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历史转折关头，国民党和共产党相继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于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一条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内战，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为抗战胜利后发动大规模内战进行了政治、思想、组织准备。

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致了开幕词、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讲演。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全面地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对比地论述了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所实行的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及其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具体地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即将取得彻底胜利的形势，指出中国面临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与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旧中国的两种前途；提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以及党在解放区、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从而，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后走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全面地总结了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区战场的抗战经验，阐明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指出由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所构成的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他提出了今后的军事任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二卷第二分册，第6页。

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01页。

务，强调我军必须“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指出“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善于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这抗日大反攻的战斗。”他要求“解放区的军队站在中国大陆的大反攻前线上，要担负起极其重大的战略任务，来协同国内一切友军和同盟国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并提出了准备反攻的各项具体任务和措施：首先，向一切被敌人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其次，要扩大人民武装，消灭与瓦解敌军；第三，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军的训练；第四，提高军事技术，特别是炮兵的技术和现代战争的战术；第五，加强指挥机关，提高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水平，使之能适应现阶段作战和未来反攻的需要；第六，厉行生产节约，储备粮食物资，准备大反攻的物质基础；第七，加强优待抗属，抚恤伤亡，安置残废与退伍军人的工作；第八，加强军内外团结。会议一致同意朱德的军事报告，并提出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要求我军“从各方面来准备大反攻，及准备战略上由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意义。

五、 八路军发动夏季攻势

6月以后，敌先后从华北方面军抽出5个师团，调往上海和东北地区，分别加强敌第十三军和关东军；又从东北抽调一批伪军到华北接替调出师团的守备任务。此时，敌华北方面军下属有4个军、5个师团、12个独立旅团和11个独立警备队，共30余万人。为加大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守备，敌进一步缩小作战范围，放弃一些次要地区，集中兵力坚守北平、天津、济南、石门等中心城市，以便进行机动的和持久的防御作战。

八路军总部于5月29日向所属各大战略单位发出指示，要求华北各大战略区应对敌展开“更积极的攻势”，“在主力兵团中确立正规作战观念，发扬顽强与攻坚精神”，在以消灭伪军为主的作战方针指导下，组织大规模的战役战斗，锻炼提高指挥员对正规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华北各区部队相继展开了以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为主要目标的夏季攻势。

山东军区部队发动以胶济铁路东段为重点的攻势作战

(参见附图67)

敌为加强山东半岛的防御，抗击美军登陆，因而对胶济铁路东段及沿海要地极为重视，除以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独立步兵第一旅团和第十二独立警备队等部驻守外，还将近8万伪军（约占山东伪军的半数）部署于胶济铁路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第178页。

东段地区，严重阻碍着我胶济铁路南北各根据地的联系；同时，楔入临沂、费县之敌，也妨碍着胶济铁路以南各根据地的联系。为破坏敌之沿海防御计划，扩大准备反攻的阵地，使我各根据地联成一片，山东军区早在1945年初就决定以胶济铁路东段力攻势作战的主要方向。4月12日，春季攻势尚未结束，军区即下达了以胶济铁路东段为重点，展开大规模夏季攻势的预备命令：令滨海、鲁中军区集中10个团的兵力，在山东军区直接指挥下，于5月6日先攻诸（城）胶（县）高（密）地区的伪军张步云部，再攻安丘、昌乐地区的伪军厉文礼等部；令胶东军区集中4个团发起平（度）西战役，歼灭当地之敌后，再会同渤海军区歼灭伪军张景月部；令渤海军区力求歼灭和削弱张景月部的力量；令鲁南军区与滨海南部各军分区部队主要向临（沂）费（县）地区及徐（州）海（州）地区发展。

正当我准备发起夏季攻势之际，敌突然增兵山东，并集中3万余人兵力，以鲁中、滨海为重点，于5月初开始了全区性的大“扫荡”。山东军区部队随即转入反“扫荡”作战。经过20多天奋战，胜利地粉碎了敌之“扫荡”，共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仅在5月7日石桥的一次伏击战中，鲁中军区部队即歼灭日军第五十三旅团旅团长田坂少将以下600余人。反“扫荡”作战胜利后，山东分局和军区分析了面临的形势，认为：山东敌兵力虽增至10万之众，但主要还是集中于铁路沿线及沿海地区，在其它地区守备力量并未增强，而渤海地区还有所削弱。据此，决心继续执行既定的夏季作战计划，并对原计划作了适当调整。由于诸城、日照地区日军增加，将原胶济铁路南的具体进攻方向改为从安丘地区开始，然后视情况向北或向东发展；渤海军区除执行原计划外，应寻机向敌守备薄弱的地方进攻；并将山东军区直接指挥整个攻势作战改为军区统一部署下的各区独立作战。

讨伐伪军厉文礼部战役 鲁中军区根据山东军区的指示，集中5个多团及地方武装共万余人的兵力，在万余民兵和群众支援下，于6月上旬发起讨伐伪军厉文礼部战役。厉系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所部共万余人，盘踞在以潍县（今潍坊市）、昌乐、安丘为中心的胶济铁路两侧地区。驻安丘地区之敌，为加强外围守备，在安丘西南之夏坡一带配置了5个团的兵力，另两个团配置在安丘以东和以南地段，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根据上述敌情，鲁中军区决定：攻取夏坡，孤立安丘，再向北发展，开辟昌乐地区，打通与胶济铁路以北各根据地的联系；尔后向东发展，与滨海根据地联成一片。战役自6月5日开始，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军攻取夏坡。夏坡是厉部的核心据点之一，其周围建有大小据点20余处。敌试图以集团式防御工事，阻止我军进攻。根据这一特点，我军首以主力分成效路，插入敌之纵深，将夏坡及其周围8个主要据点分割包围；同时以一部准备阻击安丘等地出援之敌，并以地方武装和民兵监视其他据点。6月5日黄昏，我各路部队迅速攻入夏坡，并分割、围攻各据点。经两天一夜激战，全部攻克夏坡及其外围8个据点。与此同时，阻援部队还打退了安丘出援之敌，保障了主攻部队的侧翼安全。随后，我军按计划挥师北上，以3个团向昌乐以南鄆部之敌进攻，歼其一部。后因潍县、昌乐和安丘数千敌人同时出援，我乃撤出战斗。当我军北进时，厉伪残部在日军掩护下，重占夏坡。在此情况下，我决定放弃北进计划，改为以夏坡为中心，向东、西两翼发展。

第二阶段，我军以夏坡为中心，西向临朐、东向景芝发展进攻。17日，

我军以4个团分三路向夏坡、临朐、景芝之敌发起攻击。以1个团为西路，直逼临朐城，全歼了驻城外之日军一部和伪保安队；以1个团及当地县区武装为中路，乘敌立足未稳，展开猛烈攻击，再克夏坡，以两个团为东路，采取奇袭手段，直插安丘与景芝之间的韩家夏坡，歼灭伪军1个团，并攻克景芝镇。同时争取了驻安丘以南大兴庄之伪军1个团反正。至此，厉部实力被歼过半。

第三阶段，我军南下诸城地区。24日，东路我军占领景芝后，即乘胜挥戈南下，向诸城西北斗鸡台一带之敌展开进攻，歼灭伪军张步云部两个团另一个营，拔除据点16处。至27日，战役胜利结束。

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共歼灭日伪军7300余人，攻克据点60余处，解放了安丘以南、临朐以东、景芝以西17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在胶济铁路东段南侧敌之防御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为继续发展攻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次战役，我军集中兵力，突然插入敌之纵深，对敌之核心据点及外围主要支撑点，实行分割包围，并同时发起攻击，因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讨伐伪军张步云部战役 讨厉战役结束后，我军乘胜向东发展，于7月中旬发起讨张战役。张为伪山东国民自卫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所部共1万余人，长期盘踞在诸城地区。在厉文礼部遭我严重打击后，其侧后更形暴露，于是收缩兵力，加强诸城以北的双庙、相州一线的防御，妄图依托潍河、渠河抗击我军。为歼灭该敌，滨海和鲁中两军区共集中4个团的兵力，分成两路，以相州和双庙为主攻方向，歼灭张部主力；同时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活动于诸（城）高（密）、诸（城）莒（县）、诸（城）日（照）等公路上，以牵制日军。7月15日夜，我两路部队冒着倾盆大雨，实施远程奔袭，分别攻击相州、双庙之敌，战至拂晓，相继攻克上述两据点，残敌向潍河以东逃窜。20日和26日，我军再分两路，先后东渡潍河，继续歼敌。一路向北进攻，先克郑公、双羊店，再取朱马等据点，歼灭高密伪自卫团一部；一路向南，于诸城以北之埠头一带与另一股伪军激战两日，将其全歼，并争取了伪军1个团反正。至30日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敌5000余人，解放了诸（城）高（密）胶（县）之间2500平方公里的地区，使敌之重要据点诸城更加孤立。

讨伐伪军张景月部战役 为策应胶济铁路以南鲁中、滨海两军区的攻势作战，在路北的胶东和渤海两军区也连续发起战役攻势。6月22日，胶东军区以4个团及地方武装一部，讨伐盘踞在乎度以西的敌军，至29日，攻克台头、谷庄等据点24处，歼敌3400余人。7月19日，胶东我军乘胜西进，在渤海军区一部配合下，向盘踞在胶河与潍河之间的敌军发起攻击，至22日，于昌邑西南之明家部一带歼敌2000余人，残敌大部溃散。接着，渤海军区部队又在胶东军区一部配合下，于7月底发起讨伐伪军张景月部战役。张部原有兵力1.5万余人，长期盘踞在小清河以南地区。经我第一次讨伐战役打击后，退至寿光南北地区，背靠胶济铁路，加强对我之防御部署，企图阻止我之进攻。寿光以北的田柳庄是张部的前哨据点，由其主力1个旅驻守。该据点设防坚固，筑有内外两道夹墙，外墙和内墙高宽各10余米；以墙为基，修有上、中、下三层工事，外有壕沟和复杂的障碍物；村内巷口碉堡林立，地道如网。敌自吹为攻不破的“铜墙铁壁”。渤海军区认为，如我攻克田柳庄据点，其它据点之敌将不攻自溃。因此，决心集中主力首先攻取田柳庄，用

以震撼其他各点敌军。7月31日，我主攻部队根据敌工事坚固，不易强攻的特点，采取沿庄挖封锁沟、筑掩蔽墙和碉堡的办法，对敌进行严密封锁和包围。在5000民兵支援下，仅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工事构筑任务，形成与敌沟垒对峙的阵势。8月3日，我炮兵开始对敌外墙工事进行破坏射击。4日，各主攻部队利用炮兵射击效果，一举攻占了庄西北和东北两角的外墙碉堡。由于此两处是敌之东、北、西三面的最大支撑点，因而敌拼命争夺。经数日激战，我打退了敌无数次大小反扑，并攻克碉堡10余座，至11日将外墙工事完全占领。12日，我军乘势向内墙工事发起攻击，敌继续凭坚顽抗。我军乃以坑道爆破手段，炸塌了庄西北角之内墙碉堡，并趁势攻入庄内，展开巷战。敌数度突围，均被击退，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投降。攻克田柳庄后，我军乘胜向南分路扫荡残敌，收复据点12处。张景月率残部逃至胶济铁路上敌之据点内。至此，讨张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敌2540人，解放了寿光外围大片地区，打通了渤海东部与胶东、鲁中的联系。田柳庄攻坚战证明：在我军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对有坚固设防之敌的攻击，采取以沟垒对沟垒，运用火力摧毁、坑道爆破和勇猛冲击相结合的战术是可行的。

为配合胶济铁路东段作战，扩大解放区，渤海军区从6月上旬起，还在小清河以北广大平原地区加紧进攻敌人，进行了蒲（台）滨（县）等战役，共歼灭日伪军3400余人，攻克与收复蒲台（今滨州市）、滨县、南皮、沾化、德平、庆云等6座县城，使敌在渤海区的中心据点惠民陷于孤立。在此期间，鲁南军区部队和鲁中、滨海军区各一部互相配合，从5月中旬开始，先后发起临（沂）费（县）边战役、郯（城）马（头）战役和讨伐张里元、申从周等部的战役战斗，共歼敌7700余人，收复邳县、郯城、费县等县城，并逼近陇海、津浦铁路，威胁徐州。

晋察冀军区部队以向北发展为重点展开攻势作战

（参见附图68）

晋察冀地区之敌，经我春季攻势打击后，将其主要兵力退守交通线、大中城市和工矿区，并加强平绥铁路以南特别是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冀东地区的防御，企图阻止我向北发展。晋察冀军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准备配合苏联对日作战，取得向北特别是向东北发展的前进阵地，从5月中旬开始，以平绥铁路两侧和锦（州）承（德）铁路以南地区为主要目标，发起一系列战役。

雁北战役 为开辟平绥铁路南北的雁北和绥东地区，冀晋军区于5月12日以第二、第四、第五军分区共6个团及6个县支队的兵力，发起雁北战役。首先以主力部队重点向雁北之浑源、应县、山阴一线和桑干河两岸及平绥铁路阳高至大同段之敌展开进攻，尔后越过平绥铁路向北伸展；同时以一部兵力围攻繁峙、沙河、五台、台怀等地敌人。为配合雁北战役，军区令在南线和东线的部队向正大铁路和平汉铁路定县附近之敌出击。

盘踞在雁北地区之敌为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四独立警备队及伪大同直辖警备队各一部，共9000余人，分布于山阴、应县、浑源、广灵和桑干河沿岸两道封锁线上的87个据点里。12日，战役发起以后，我主攻浑源、应县、山阴地区的第四军分区部队向浑源、应县问敌之第一线据点展开攻击。

由于敌沿长城一线筑有坚固工事，我攻击点选择不当，故未能攻下。于是转向应县、山阴间敌之守备薄弱环节进攻，连克茹越口、东安峪、胡峪口等据点，至 25 日，突破了应县以南敌之封锁线。接着又乘胜逼退了口前、水峪、大营等多处据点，并袭入山阴县城。尔后挥师向东，拔除了战役开始时未能攻下的北楼口、黄沙口、东尾毛等据点。与此同时，我向桑干河沿岸进攻的第五军分区部队，在扫除桑干河南岸的大王、友宰堡、大关、老册等据点后，立即北渡桑干河，向敌之纵深发展，相继攻克和收复安家屯、下吾其、大白登、将军庙、贾家屯等据点。然后乘胜北进，两次斩断平绥铁路，一度袭入大同机场。在此期间，第二军分区部队亦在繁峙、代县、崞县、五台等地主动出击，攻克与收复义兴城、二十里铺、西天河、白石村等据点多处，重创了沙河、台怀和少军梁等地的敌人。敌在我猛烈攻击下，无力反击，急忙加强浑源、应县、阳高、阳原、五台、繁峙等城守备。我又乘机以一部兵力越过平绥铁路，继续向北伸展，进到绥东之丰镇、兴和地区，建立了兴和、丰镇的抗日县政权。经过 50 多天的连续作战，冀晋我军共攻克和迫退日伪据点 40 多处，歼灭日伪军 966 名，扩大解放区 5000 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 40 万，为开辟平绥铁路以北和绥东地区取得了前进阵地。

察南战役 为开辟平绥铁路南北之察南和察北地区，把冀察、冀晋新解放区连成一片，冀察军区集中第一、第十一、第十二军分区共 6 个团及部分县游击支队，于 5 月 12 日发起察南战役。以第一、第十三军分区 4 个团及 4 个县支队向平绥铁路以南的怀安、涞源、广灵地区之敌发动进攻；以第十一军分区两个团及 1 个县支队沿平绥铁路南侧进攻怀来、涿鹿地区之敌；以第十二军分区一部在平绥铁路以北对张家口、宣化之敌进行袭扰活动，以牵制敌人。盘踞在察南地区之敌为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伪华北绥靖军、伪满军各一部及伪省、县警察大队，共 1.4 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宣化、怀来、涿鹿、蔚县、涞源等地区。5 月 12 日夜，我各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开始向散发起进攻。第十三军分区部队以奔袭手段，攻克怀安县城及其外围据点 16 处，并打下了张家口南郊的沈家屯据点。第一军分区主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对涞源及其外围据点展开围困战，拔除了马圈子、西龙虎等据点，收复涞源县城；另一部则向广灵外围据点出击，连克浮图村、郑家窑等据点 16 处，陷广灵之敌于我包围之中。第十一军分区主力和地方武装进入怀来、涿鹿地区以后，以围攻、坑道爆破，结合政治攻势，攻克和迫退了岔道、石门、倒拉咀等据点，使涿鹿城受到严重威胁。至 27 日，我军共歼灭日伪军 673 名，攻克与收复怀安、涞源两座县城及其他据点 43 处，并袭入宣化南关，逼近张家口城郊。

6 月中旬，为配合热辽战役，发展察北，开辟热河西南地区，冀察军区又以第十二军分区部队发起平北战役。我军向龙关、赤城、崇礼、后城一线展开攻击，先后攻克龙门所、永宁等据点 16 处，歼敌 700 余人，并袭占崇礼县城，迫使独石口到四海一线之敌全部撤退到长城以外，我军进入热河西南地区。7 月初，我军继续向察北之敌展开进攻，建立了万全、尚义两县抗日民主政权。与此同时，第一、第十一军分区各一部还主动向房山、涿县、涞水、易县和满城敌之外围据点出击，一度攻入房山县城在夏季攻势中，冀察我军共歼灭日伪军 1800 余人，攻克与收复县城 3 座，拔除据点 110 个，扩大解放区 1.3 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57 万，把冀察和冀晋新解放区联结了起来。

热辽战役 6月中旬，冀热辽军区为开辟热河和辽宁西部地区，夺取进军东北的前进阵地，决心集中第十四、十五、十六军分区主力，组织三支挺进部队，分三路北出长城，发起热辽战役。以第十四军分区一部结合武工队组成的西路挺进支队，于6月27日由古北口附近越过长城，向热河西北部进军，8天作战7次，歼敌一部，进至围场以西、大阁镇（今丰宁）以东、御道口以南、凤山以北地区。以第十五军分区主力结合武工队组成的中路挺进支队，于6月中旬自喜峰口等处出关，经过20多天的辗转作战，摧毁了19个“集团部落”。尔后，以一部活动于兴隆之驴儿叫一带，另一部进到平泉以东、凌源以南和赤峰附近地区。以第十六军分区主力结合武工队组成的东路挺进支队，由山海关西北之义院口等处出关，向热东和辽西之绥中、朝阳方向挺进，沿途攻克据点多处。尔后，以一部挺进到绥中以西地区，摧毁了7座“集团部落”，另一部到达叶柏寿（今建平）以南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我军出击热河、辽西的作战行动，使日伪军大为震惊。7月中旬，敌纠集北宁铁路、锦承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共3万余人，从南北两面夹击我军。我一面留武工队在内线与敌人周旋，袭扰敌人；一面适时将主力转移到外线，寻机打击进攻之敌。7月末，以第十五、第十六军分区主力组成的中路和东路挺进支队返回长城附近。此役我军虽未能大量歼敌，但在锦承铁路南北开辟了大片地区，为我进军东北建立了前进阵地。

为配合热辽战役，扩大解放区，冀中军区以主力和地方武装，向子牙河东和大清河北之敌发动攻势。攻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第八、第九军分区部队于6月8日发起子牙河东战役，至7月初共进行大小战斗123次，歼敌3662名，收复大城、献县两座县城及子牙河沿岸据点37个，扩大解放区4000多平方公里，使子牙河与滏阳河北段300多里完全为我控制。接着，冀中军区又以第九、第十军分区部队乘胜发起第二阶段的大清河北战役，以第六、第七军分区部队发起德石路战役和安博蠡战役，以第八军分区部队向淮镇、交河之敌发动进攻。从7月12日到7月下旬，我军共作战70多次，歼敌3500多人，收复交河县城及其它据点70多处，扩大解放区1300多平方公里，使我军逼近平、津市郊。

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向平汉铁路两侧及鲁西、 晋南之敌发动进攻

（参见附图69）

晋冀鲁豫各军区根据年度作战计划和日军进一步收缩兵力，加强城市及交通要道守备等情况，从5月开始，向平汉铁路两侧及鲁西、晋南地区之敌，展开更加猛烈的夏季攻势。

东平战役 5月中旬，冀鲁豫军区乘敌调集兵力“扫荡”山东沿海地区，而津浦铁路沿线敌守备薄弱之机，决心集中4个军分区的部队，在鲁西地区发起东平战役，以配合山东军区的反“扫荡”作成和扩大解放区。其部署：以第八军分区部队为中路，攻取东平；以第一军分区部队为左路，相机夺取东阿；以第十一军分区部队及骑兵团一部为右路，歼灭金（乡）济（宁）公路两侧之敌。18日凌晨，主攻东平城的中路军利用守城伪军麻痹之时，一举从南门登上城墙，插入敌纵深，拂晓前完成穿插分割，将日伪军分别包围在

几个孤立据点和院落里。随即分别展开围攻，在歼灭各据点伪军之后，又于19日歼灭了负隅顽抗的日军。此战共歼敌1300余人，解放了东平县城。进攻东阿城的左路军，则于17日一举攻入城内，歼灭守城伪军260余人，但未能扫除日军据点。向金济公路两侧进攻的右路军，歼灭伪军700余人。至24日，东平战役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冀鲁豫其他各军分区部队亦乘势对敌发动进攻。第二、第十军分区部队分别在宁晋以南和考城地区共歼灭日伪军1200余人。第四、第五军分区部队先后攻克阜城，收复故城、枣强、威县等县城。第三军分区部队在贾寨、尚寨一带，对进犯广平、馆陶之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七十三大队一部展开反击，歼敌大队长以下190余人。

安阳战役继东平战役之后，太行军区于6月底集中5个军分区共9个团的兵力，组成3个支队，在3万民兵和自卫队的配合下，于平汉铁路西侧发起安阳战役。盘踞在这一地区的敌军约7000人，其中有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一部，伪剿共第一路两个旅和伪第六方面军暂九师及伪林县总队等部。长期以来，敌在安阳以西地区大修据点碉堡，构成了一条对我太行根据地的封锁线，妄图阻断我山区和平原之间的联系。据此，这次战役的主要企图是：以盘踞在平汉铁路以西、观台以南、鹤壁集以北地区之敌为目标，力求消灭伪剿共第一路李英部和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一部，摧毁敌之封锁线，解放与巩固这一地区。战役拟分两步进行：第一步重点指向曲沟集和水冶镇；第二步继向积善、观台及天喜镇、西善应方向扩张战果。在进行充分的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的基础上，战役于6月30日正式开始，实际发展成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攻取水冶、曲沟两镇，歼灭增援之敌。30日2时，以第七军分区第一、第四十三团和第八军分区第二团及3个县独立营组成的第一支队，开始向曲沟集之敌发起进攻。经过突破围寨、分割包围和攻取核心碉堡等战斗，至7时，全歼伪军第三旅旅部及其第六团，俘伪旅长以下573人。以第四军分区第三十二团和第五军分区第三十四团、义勇军第五团及两个县独立营组成的第二支队，亦于30日1时向水冶镇之敌发起攻击。接连两次突击受挫，遂改用连续爆破结合冲击的战法。至黄昏，将守伪第二旅主力全部歼灭，企图顽抗的日军分队亦被解决。在第一、第二支队攻取水冶、曲沟时，担任阻击援敌的第三支队（由第三军分区第七六九团、第十四团和集总警卫团组成）进到北曲沟地区，适逢安阳出援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一部及伪军进抵北流寺。第三支队当即将敌包围，并于10时开始发起攻击，敌五次突围，均被击退。至17时，我将被围之敌全部歼灭。这时，安阳又有敌百余人再次出援，被我第一支队截击于王家邵村，歼其一部，余敌仓惶回窜。战役第一阶段遂告结束。7月1日，我乘势展开第二阶段作战，扫除水冶镇南北诸据点。第一支队向南，夺取北当山、东善应等据点；第二支队向北，进攻石官、东鲁仙各据点，第三支队向众乐、李家岗等处之敌进攻。经过两昼夜激战，将敌在安阳以西的据点碉堡全部摧毁，全歼伪剿共第一路之第二、第三旅残部及伪林县游击总队一部。第三阶段作战于4日开始，向观（台）丰（乐）铁路及汤阴地区扩张战果。第一支队继续向南发展，主力攻取鹤壁集，歼灭了伪第六方面军暂九师第二十六团，接着又攻克北唐仲、大湖、鹿楼等据点，并争取了伪军两个中队反正。第二、第三支队带领民兵自卫队，对观丰铁路进击，扫除了敌沿线大部据点碉堡，彻底破坏了铁路，并打退了丰乐出援之敌。至7月9日，安阳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我军共毙伤日伪军800余

人，俘虏日伪军 2500 余人，击溃伪军 900 余人，攻克据点 30 余处，扩大解放区 1500 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35 万，并进一步逼近平汉铁路及安阳敌军据点。同时，通过战役，锻炼、提高了我军攻坚和连续作战的能力。

为配合安阳战役，冀鲁豫军区以 6 个团和 5 个游击支队，在平汉铁路东侧之成（安）临（漳）安（阳）地区发起攻势，直插安阳至成安间敌之纵深，连克北皋、回隆、马头等据点 20 余处，歼敌 1500 余人。太行军区在乎汉铁路和道清铁路沿线的元（氏）获（鹿）、武（安）沙（河）和沁（阳）博（爱）地区，攻克据点十余处，并袭入赞皇县城和焦作车站。

阳谷战役当平汉铁路两侧攻势作战正紧张进行之际，冀鲁豫军区以第十、第十一军分区主力，在微山湖以西地区，向丰县、单县、虞城一带之敌展开攻势，先后攻克和收复丰、单、虞 3 座县城，歼敌 1600 余人。7 月下旬，又集中第一、第四、第七、第八共 4 个军分区的部队，在鲁西地区发起阳谷战役。阳谷县城是敌楔入冀鲁豫中心区的坚固据点之一。守敌系伪华北绥靖军第四集团第九团及伪阳谷县警备大队，另有逃入该城的伪寿张、朝城、莘县等警备大队，共 3000 余人。阳谷城高壕深，四面城门皆为两层，城楼及四角筑有明、暗火力点，城内街心筑有核心工事。自 1944 年日军从该城撤退后，守敌为巩固这一前进据点，积极加修工事，囤积粮食，准备作长期顽抗。但此时该城除北面可通聊城外，其余三面均处在我包围之中。为拔除敌伸入我中心区的这一孤立据点，肃清该地区的敌人，军区决心以第八军分区 4 个团及地方武装主攻阳谷城；以第七军分区部队攻取堂邑，进逼聊城；以第四军分区部队在临清外围进行牵制作战；以第一军分区部队控制聊（城）阳（谷）公路中段，阻击聊城可能出援之敌。7 月 20 日，我军开始在临清至阳谷间长达 80 余公里的战线上，对敌展开进攻。21 日 2 时，第八军分区主力对阳谷城东门发起猛攻。由于单纯攻击一点，两次突击均未奏效。第三次突击改用多处攻击、重点突破的战法，获得成功。敌退据城年各要点顽抗，我即进行分割包围。经火力突击和政治攻势，几个县的伪警备队相继投降，唯伪绥靖军第九团仍负隅顽抗。我乃采用连续爆破，将其核心碉堡炸毁，至 26 日上午，终将该敌全部歼灭。此战计毙伪团长以下 300 余人，俘伪军 2000 余人，解放了阳谷县城。策应阳谷主攻方向作战的第七军分区主力于 21 日攻克堂邑县城，并乘胜向东发展，进逼聊城；第四军分区部队攻克临清外围据点 9 处，并兵临临清城下。在我军强大攻势的震撼下，巨鹿至冠县一线之敌纷纷撤退，我遂乘势收复巨鹿、广宗、馆陶、冠县、武城等县城。至此，第一、第四、第七、第八军分区之间，除聊城至临清一线尚为敌盘踞外，广大地区内已无敌踪。

在太行和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上述战役期间，太岳军区部队亦在同蒲铁路南段之晋南地区发动攻势。目的在于肃清中条山以西地区之敌。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我集中主力先后对夏县以西、祁（家河）夏（县）公路两侧和曲（沃）绛（县）翼（城）三角地区之敌展开进攻，相继拔除新南庄、祁家河、梅村、安峪等据点 40 余处，消灭日伪军 600 余人，并向南抵近黄河北岸。与此同时，对根据地内残存的敌之孤立城镇据点继续进行围攻，先后收复安泽、高平两座县城。

**晋绥军区部队展开以夺取忻静、
神义公路为重点的攻势作战**

(参见附图 70)

晋西北地区之敌经我春季攻势打击后，退集于忻(县)静(乐)、神(池)义(井)等公路沿线各据点。为歼灭该敌或将其压缩到同蒲铁路上，晋绥军区决定于6月中旬发起夏季攻势。其主要目的是：挤退静乐及其周围据点，争取占领忻静公路西段，并挤掉神池至义井之敌。据此，军区责成第六、第八军分区在忻静公路以南共同组成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区部队向忻静线进攻，并以第一军分区和第六军分区各一部，分别在静乐以西和静乐以北进攻敌人，逐步向静乐逼近；以第二军分区一部向神义公路进攻，相机夺取神池城，并以一部负责保德、河曲的河防守备；另以塞北军分区、第三军分区主力和第八军分区一部，分别向塞北的清水河和南部的汾(阳)离(石)、离(石)军(渡)公路之敌进行攻、挤，以配合忻静、神义两线的攻势作战。

6月19日，我军首先围困静乐县城，并向周围及忻静公路两侧之敌展开进攻。当日，第六军分区一部袭入静乐以东的石河村据点，歼敌一部。随后，第八军分区一部夜袭静乐以南的丰润据点，歼灭守敌。27日，第一军分区一部于静乐以西的王端庄，伏击歼敌一部。接着，第八、第六军分区又先后袭击静乐东之利润和静乐北之宁化堡等敌之重要据点，再歼敌一部。在主力对静乐外围据点展开进攻的同时，我小部队、武工队和民兵，亦在忻静公路上进行破袭活动，先后炸毁桥梁20余座，击毁汽车多辆，给敌以很大威胁。在神义公路上，第二军分区部队一面对义井之敌加紧围困，一面在该公路线采用地雷战与伏击相结合的战法，消灭敌人。7月2日，在洪福寺附近，我军伏击歼灭敌运输队一部。24日，我又在凤凰山附近伏击由义井向神池开进之敌，并歼其一部。与此同时，活动在神义公路上的武工队和小部队，则大力进行破袭战，挖断公路达50余处，并埋设地雷，使敌之运输处于瘫痪状态。

为了配合忻静、神义两线的攻势，塞北军分区部队肃清了清水河以南之敌；第八军分区一部在太(原)汾(阳)和汾(阳)离(石)公路上袭击敌人，攻克据点多处；第三军分区部队一面围困大武等地之敌，一面向柳林至李家垣一线出击，给敌以打击。至此，晋绥我军夏季攻势告一段落。

六、新四军发动夏季攻势

(参见附图 71)

1945年夏，敌中国派遣军为防御美军在华中沿海夸陆，进一步加强了华中地区的战备。除原有兵力外，又从华北和华南调入8个师团，这样敌在华中地区的兵力增加到15个师团、13个独立旅团和1个独立警备队，共62万亲。此外，敌还将山东的伪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调至安徽蚌埠和淮南一带。在此形势下，新四军军部除令苏浙军区继续粉碎敌军和顽军进攻，巩固苏浙皖边区外，同时令其他各部乘敌向沿海、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收缩之机，对敌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展开积极进攻。

宿南战役 盘踞在安徽宿县西南之伪第四方面军直属第十五师共5000余人，不断向我津浦铁路西之淮上地区“蚕食”，企图截断我涡(河)北同淮南和津浦铁路以东的联系，成为我开辟宿(县)蒙(城)怀(远)地区的

一大障碍。为扫除这一障碍，扩大淮北解放区，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决心于5月下旬，集中第十一旅全部、第九旅一部和师骑兵团及8个县总队共1.3万余人的兵力，发起宿南战役。根据敌之部署特点，确定采取“攻点打援”战术，以第十一旅主力攻击敌主要据点，以第九旅之第二十七团和师骑兵团置于外围消灭援敌，并以各县总队部署在敌各主要据点之间，监视、牵制敌人，防敌逃窜。整个战役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围攻任家集，设伏葛庄，消灭援敌。战役开始前，我为调动迷惑敌人，创造战机，将主力自龙山集北撤。敌果尾追我军北进。我第四师令第十一旅第三十一团于5月21日夜转兵南下，向驻守任家集的伪特务第三团发起攻击。经过扫清外围、突破围寨和巧攻核心碉堡，至次日晨7时许，全歼守敌，俘伪团长以下100余人。8时许，孙疃集伪军一部出援任家集。我第四师随即以骑兵一部配合第三十一团将该敌歼灭。这时，我第九旅第二十七团侦悉芦沟集伪军增援任家集，当即设伏于芦沟集西北之葛庄。22日9时，敌进入伏击圈，我即突然开火，四面包围，穿插分割，仅激战45分钟，就将敌全歼，第一阶段作战乃告结束。

第二阶段攻击袁店集和界沟集，设伏于神仙井，消灭援敌。6月下旬，为达成预期战役目的，我决定开始第二阶段作战。24日6时许，第十一旅第三十二团向袁店集伪第五十九团第一营发起攻击，迅速突破三道外壕，克服鹿寨障碍，直逼敌核心据点，并在猛烈攻击的同时，利用俘虏进行战场喊话，迫使伪营长以下官兵投降。当我进攻袁店集时，驻孙疃集的伪第五十九团团团长率两个营驰援，行至袁店集以东之神仙井，被我预伏于该处的第九旅第二十七团歼灭，我俘伪团长以下180余人。伪第十五师遭我连续打击后，开始收缩兵力，将驻芦沟集之第五十八团撤回孙疃集，准备全力坚守孙疃集、界沟集等据点。为扩张战果，6月30日，我第十一旅第三十一团及骑兵团一部，强袭界沟集之伪第五十七团。至7月1日晨，歼其一部，其余敌人在我炮火震撼、杀伤和强大政治攻势下，缴械投降，我俘伪团长以下800余人。至此，宿南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灭伪第十五师两个整团和两个团的大部及一个团的一部，计2100余人。这一胜利，不仅使我巩固了涡河以北的阵地，而且开辟了宿南新区，使我津浦铁路以西8个县联成一片。在这次战役中，我军成功地运用了“攻点打援”战术，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睢宁战役 在宿南战役紧张进行之际，我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部队又于6月中旬在津浦铁路东侧发起睢宁战役。睢宁县城位于陇海铁路南侧，是徐州东南的重要外围据点。敌在1938年占领该城后，即在其周围构筑了大小据点多处，切断了我淮北第一与第三军分区的联系。1945年以来，敌为加强沿海地区的兵力，于6月中旬将睢宁之日军全部撤走，仅留伪保安队千余人守城，其外围据点兵力也较薄弱。据此，我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所属地方武装9个团，在主力一部配合下，攻取该城。具体部署：以第三军分区第一、第二团主攻睢宁县城；以睢宁总队和灵宿、泗灵独立团围困睢宁外围之高作、凌城、夏圩等据点；以泗宿、灵北、萧铜独立团及铜睢总队和骑兵团等部，分别配置于宿迁以西和双沟南北一带，执行打击援敌的任务。

6月20日，第三军分区主力首先攻占了睢宁县城以西的田河、邢圩、大王集等据点。与此同时，灵宿、泗宿独立团亦攻占了睢宁以东的耿车、沙集等据点，从而切断了睢宁与徐州、宿迁的联系，使之成为一座孤城。在此基

基础上，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于7月7日，对睢宁县城展开攻击。当日2时，我攻城部队在睢宁城年伪军1个排反正的策应下，迅速突入城内，展开激烈巷战，连续攻克伪军碉堡多处，至10时半，伪县政府在县长带领下缴械投降。这时，只有困守书院之敌仍凭坚顽抗，并先后反扑6次，均被我击退。黄昏以后，敌乘夜暗突围逃窜，被我外围部队歼灭。至此，睢宁县城遂告解放。随后，我将攻势指向睢宁城外之高作、凌城、夏圩及王圩子等据点。我军声威所至，夏圩、凌城之敌纷纷投降，高作之敌则在我猛烈攻击下大部被歼。王圩子之敌乘雨夜突围东窜，我跟踪追击，直至宿迁城郊，歼其一部，俘伪团长以下300余人。

7月10日，睢宁战役胜利结束，计克睢宁县城及其外围据点17处，歼敌2200余人，收复国土3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0万，直接威胁敌在苏北之战略要点徐州。

在进行宿南和睢宁战役的同时，苏北和苏中我军继续打击伪军孙良诚部，先后在苏北的盐阜、淮海和苏中的淮安地区，攻克据点数十处，歼敌一部，并积极展开政治攻势，争取了近1000名伪军反正。淮南我军于5月上旬，争取了嘉山县伪保安大队反正，并乘势攻入该城。皖江我军于7月上旬一度收复至德县城，并解放了彭泽、至德之间的部分地区。鄂豫皖湘赣我军于5月间在监利、华容、岳阳附近之广兴州、洪水港歼敌一部，攻克日伪军据点多处。5月底，顽军集中5个师又5个游击总队的兵力，大举进犯我白兆山和四望山根据地。鉴于顽军兵力较大，我军遂以部分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阻击、袭扰顽军，而将大部主力集结于机动地域待机。7月下旬，我乘顽军疲惫之际展开连续反击，至8月上旬，粉碎了顽军对我四望山地区的进犯，巩固了四望山根据地，并扩大了泌阳、桐柏、信（阳）确（山）、信（阳）随（县）等县部分地区，解放人口100多万、国土2000多平方公里。

我军在1945年的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共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攻克与收复县城61座，扩大解放区24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把敌人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线上及沿海重要地区，为转入全国规模的反攻创造了条件。同时，把大量日军兵力牵制在解放区战场上，从而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

1945年的春、夏季攻势作战是在1944年局部反攻的基础上展开的，但较之上一年又有新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逐步向正规战过渡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运动战和攻坚战逐渐增多；作战规模不断扩大，作战的正规程度渐次提高，出现了步、炮协同以及连续爆破与火力、突击三结合等作战形式；作战指挥渐趋集中统一，并且在正确选择主要进攻方向和集中主要兵力于主要方向上，以及加强集中统一指挥与组织协同动作上，取得了一些新鲜经验。这就为实施全面反攻，进行更大规模的正规作战创造了条件。

第八节 发展华南抗日游击战争， 巩固与扩大华南抗日阵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南日军第二十三军根据其大本营的命令，除以第三十八师团进攻九龙、香港地区外，还以第一四、第五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九旅团，加强对东江地区、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地区以及海南岛北部地区的抗日武装的“扫荡”，并确定以广州外围之惠州、队化、清远、北江及西江下游之间地区为重点作战地区，妄图消灭我东江抗日武装。

根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南地区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1941年12月9日在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必须努力开展华南各地日军占领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应尽可能与各抗日友军及英美等抗日友邦的军事行动协同一致，并取得他们在各方面的赞助。游击队所实施的各种政策，应该符合于反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同时，还必须大力开展南洋各地华侨工作。团结全体华侨共同进行抗日战争。

华南敌后各抗日武装，遵照上述指示，并结合本地区的情况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国际国内统战工作。

一、打退敌军进攻，坚持华南敌后抗战

（参见附图 72、 73）

坚持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华南日军第三十八师团共1.5万余人在海军和航空兵支援下，从沙头角、深圳、福田分三路进攻香港。25日，香港沦陷。当时，我国一些爱国进步人士以及英美等同盟国官员，被阻于香港，处境十分危险。在此情况下，坚持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组织营救。1942年1月，先后派出精干分队进入港九地区，经过3个多月的斗争，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胡绳、夏衍、邹韬奋、戈宝权以及英美等国官员共800余人。这一行动，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提高了我党的声望。在此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还乘日军兵力不足，无力顾及乡村和山区的弱点，派出小部队深入到港九之山区、乡村开展工作，打击汉奸土匪，并在元朗、沙田等地建立了几支群众武装。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总方针，1942年1月下旬，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抵东江地区，在阳台山根据地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三年来的东江地区的斗争实践证明，广州外围的水网地区是可以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应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积极开展广泛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继续扩大部队和根据地。为了统一并加强东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由林平任书记。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建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部，由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同时整编了部队，以第五大队为基础编成一个主力大队，其余分别编为第三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港九大队。这次会议对坚持与发展东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1942年春，国民党顽固派调集第一八七师、独立第九旅等部共5000余

人向我东江抗日根据地进攻，持续达一年之久，使该地区的斗争进入了极为艰苦的阶段。4月中旬，顽军首先以第一八七师及地方武装共3000余人，向我阳台山根据地进攻，占领了龙华、乌石岩等地。我军予以反击，并突围转至外线。顽军进入根据地后，大肆烧杀。这时，日军也乘机加紧“扫荡”。5月14日，日军以1个骑兵中队深入我根据地惠阳县的碧岭地区。我惠阳大队在碧岭与横岗间的铜锣径设伏，毙伤日军30余人，缴获军马30余匹。10月，顽军再次以第一八七师、独立第九旅向我展开全面进攻，我根据地逐步缩小，至12月，我军被压缩到东莞、太平、宝安以西至珠江以东的狭长地带。当时，东江地区遭受严重旱灾，部队和群众的生活都十分困难。在此形势下，军政委员会及时采取正确措施，实行“精兵简政”。12月下旬，军政委员会在九龙地区召开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在指示中指出，国民党对华南游击队的方针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我军要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会议决定立即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教育，提高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本质的认识，同时决定对日伪军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恢复和扩大根据地。从1943年1月开始，我军对日伪军展开广泛袭击。1月和2月，惠阳大队先后攻占伪军的重要据点王母圩和顽军的补给港口盐田。3月，国民党军第一八七师调离东江地区。5月，我主力大队攻占虎门东南的伪军据点福永。7月，我又袭占了乌石岩东北的伪军据点公明圩。至此，东、宝两县和广九铁路以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从1943年1月至11月，东江我军共作战70余次，歼日伪军1000多人，缴获武器500余件，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组织民兵近千人，打破了敌顽夹击的局面。

1943年11月，日军以近1万人的兵力，在广九铁路两侧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打通广九铁路。敌之“扫荡”首先指向我大岭山抗日根据地。11月18日晨，敌从平湖、樟木头、常平、东莞、桥头、太平等据点同时出动，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围攻我大岭山区。至11时左右，我军被压缩包围在方圆仅10余公里的大岭山区。我利用有利地形，抗击敌人，坚持至黄昏以后分三路突围。主力大队转至大进埔、杨西地区，第三大队率两个中队转至东莞县城附近的温塘地区，另一个中队转至桥头、双岗地区。19日拂晓，敌先以飞机轰炸和炮火袭击我大岭山阵地，尔后发起冲击，扑空后，即在我根据地搜索烧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此后，我主力大队转至宝安地区，第三大队在东莞地区坚持斗争。

敌在围歼我主力的企图失败后，即将“扫荡”重点转向宝安地区。11月20日和12月4日，敌1000余人分两路进犯龙华和乌石岩地区，均被我击退。

在敌“扫荡”宝安根据地期间，我第三大队袭击东莞县城，炸毁城外公路大桥，并以一部兵力在广九铁路东莞至宝安段展开破击战，攻占了广九铁路上日军的重要据点常平车站。在我内外线紧密配合连续打击下，日军被迫于12月上旬撤回原防地。

打破日军的“万人扫荡”，是坚持东江敌后抗战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一胜利说明，东江我军已成长为华南敌后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为了进一步发展东江的敌后游击战争，1943年12月2日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7个大队。此后，东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向粤东、粤北猛烈发展。

坚持珠江三角洲的抗日游击战争

敌为挽回其在西海地区作战的失败，于 1941 年底对我西海地区进行报复“扫荡”。我军及时转到外线，使敌寻歼我主力的计划落空。之后，敌继续增加兵力，对我西海地区实施新的包围和封锁，并施展阴谋手段，于 5 月将我广州市郊游击第二支队司令吴勤暗杀。吴勤牺牲后，林锵云接任该支队司令员，中共广东省中区特委书记罗范群任政治委员。为打破敌人的包围和封锁，从 1942 年初起，我军先后在韦涌、林头、广教等地袭击敌人，虽取得一些胜利，但未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和封锁。至 10 月，西海周围的重要村庄大部为敌所占。为了保存主力，坚持长期抗战，中共南顺中心县委决定只留少数部队坚持斗争，主力分别向南海、番禺、中山等县转移，重点开辟五桂山根据地。

五桂山位于中山县南部，是珠江三角洲的较大山脉。中山县沦陷后，中共党组织在该县积极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至 1942 年底，包括从西海转移来的部队，已有 300 人。为统一领导南（海）番（禺）中（山）顺（德）地区的斗争，广东军政委员会决定，于 1943 年 4 月成立珠江指挥部，并确定以五桂山为基地向平原发展。根据这一方针，我军一面在五桂山内锄奸清匪，建立政权；一面以主力向五桂山周围的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到 1944 年 1 月，五桂山根据地基本上得到巩固，部队、民兵各发展到 500 余人。为统一中山县抗日武装的领导和指挥，1944 年 1 月 1 日成立“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我军开创五桂山根据地，对珠江地区之敌威胁很大，因此敌于 1944 年 2 月 21 日，集中日伪军 2500 余人从石岐、南朗等地出动，分路向五桂山进逼，企图围歼我军主力。我军先在石莹桥附近伏击敌之一路，尔后转到外线，袭击中山县城和唐家湾等日伪军据点，破坏敌交通，共毙伤日军百余人，破坏桥梁两座，烧毁敌兵营一处，迫使日军于 23 日退出五桂山，回援中山县城。上述作战的胜利，对巩固五桂山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坚持琼崖地区抗日游击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把海南岛变为支援太平洋战争的要点，加紧对琼崖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蚕食”、“扫荡”。琼崖抗日游击队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1942 年春，日军首先向海口至文昌公路沿线的据点增加兵力。同时派部分兵力深入我根据地内修筑公路和据点，企图以据点为“锁”、公路为“链”，逐步向根据地中心区压缩，围歼我军。面对敌人的“扫荡”、“蚕食”，中共琼崖特委决定采取内外线相结合，广泛开展游击战，钳制和分散敌人，破坏其修公路建据点的计划，打破其“扫荡”、“蚕食”。坚持内线的部队将海口至文昌公路沿线的桥梁和通讯设施彻底破坏，使敌交通瘫痪。转至外线作战的部队，频繁袭击敌据点，使敌顾此失彼。敌遭我打击后，遂集中 1000 余人深入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消灭我军主力。根据敌情的变化，我军以第一支队转至外线，威胁敌必救之点，以第二支队于内线开展游击战。第一支队转至外线后，首先在文昌县城以北的竹崙桥伏击日军运输队，击毁敌汽车 4 辆，歼日军 30 余人，缴重机枪 4 挺，步枪 20 余支，并使敌文（昌）北平原交通遭到威胁，敌遂将其深入我根据地的

主力转向文北平原，从而减轻了我内线部队的压力。当日军主力在文北平原寻找我第一支队作战时，我以第二支队一部组成快速分队，直插海口市郊，突然袭击灵山镇，歼灭伪军 1 个连，威胁海口市，调动文北平原的日军主力奔向海口。我第一支队趁此时机，再次进入文北平原开展游击活动。

敌在寻歼我军主力扑空后，又调集了 6000 余日军及 5000 余伪军，以分进合击战术“扫荡”我根据地。我军虽英勇作战，但由于敌兵力过强，加之实行“三光”政策，使我根据地内的一些地区成为无人区，群众损失很大，我军处境困难。为了保存主力，琼崖特委决定除留少数部队于琼文根据地坚持斗争外，主力转到外线作战。12 月，第一支队西进渡过南渡江转至外线，向琼山西部和澄迈、临高方向发展。第二支队向定安方向转移。1943 年夏，第一支队在澄迈的绿现山和临高、琼山边界的儒万山以及儋县的四行地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1943 年夏秋间，日军在对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扫荡”告一段落后，立即将“扫荡”重点转向儋县、临高、澄迈地区。我军运用琼山、文昌根据地反“扫荡”的经验，以主力转到外线，直接威胁敌在琼岛的工业区北黎至石碌铁路沿线，转战月余，迫使日军停止“扫荡”。由于我军从琼山、文昌根据地转至外线打击敌人迭连获胜，使海南岛的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在东部地区，琼文根据地逐步得到恢复，并且由北向南发展，先后在万宁、陵水、保亭等县开辟了广大游击区。在北部和西部，不仅开辟和巩固了绿现山、儒万山根据地，并使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等县的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为适应正在发展的新形势，琼崖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 1944 年春将独立总队改编为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下辖 4 个支队，4000 余人，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庄田任副司令员，李振亚任参谋长。

二、向敌占城镇和交通线出击，巩固和扩大华南各抗日根据地

（参见附图 74）

1944 年初，华南日军第二十二军所属兵力为 1 个师团和 3 个独立混成旅团，分别部署于广州、汕头、中山、遂溪和海南之海口等地；另以海军一部驻守海南岛。为进行打通粤汉、湘桂铁路交通作战，并准备应付美军在华南沿海登陆，2 至 4 月间，敌派遣军总部又以 1 个师团和两个独立旅团加强华南的兵力。在此形势下，华南我军为打击和钳制敌人，配合国民党军击破敌打通粤汉、湘桂铁路和加强沿海防御的计划，对敌占城镇和交通线展开攻击。

活动在惠阳、东莞、宝安等地的东江纵队，积极向广九铁路及其两侧的敌人出击。1 月袭击了广九路之常平车站，歼灭伪军 1 个连；尔后又连续袭击了东莞、寮步、横沥、宝安等地及平湖车站。2 月中旬，东江纵队以另一部兵力北渡东江，挺进增城、博罗地区，并于 3 月中旬袭击广九线上之石滩。4 月上旬，我军在源头，茹屋地区，打退敌人的进攻，击毙日军少佐以下 70 余人。中旬，我对港九地区进行全面出击，先后在大埔、元 之间和吉坳地区打击敌人，并袭入九龙市区，炸毁铁路大桥，使敌人极为惊恐。5 月上旬，日军步骑兵 500 余人，对我东江纵队领导机关驻地梅塘进行“扫荡”。经激

战，我毙敌 50 余人，敌即撤退。与此同时，我另一部袭击沙井，歼灭伪军一部。6 月我攻克广九铁路东侧之清溪据点，袭入东莞西南之厚街，歼灭伪军一部。东江纵队经过半年作战，有力地打击了广九铁路沿线之敌军，威胁港九地区，并巩固和扩大了东江抗日根据地。7 月 25 日，中共中央指示东江纵队：敌“打通粤汉路仍势在必行，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根据上述指示，东江纵队以东莞地区的部队及在增城的部队一部组成北上先遣队，向粤北挺进，开辟英德、翁源新区。该部由东莞出发，经博罗、从化等地北进，沿途打击敌人，于 9 月上旬一度解放清远县城。留在东莞地区坚持斗争的部队，于 8 月下旬至 9 月初，粉碎敌 2000 余人的“扫荡”，歼敌 200 余人。尔后广泛出击，先后在博罗、沙井等地打击敌人，并于新界、横门袭击敌之运输船只，使敌之水上交通受到威胁。

活动在珠江三角洲的珠江指挥部所属部队，在 1944 年 2 月初粉碎了日伪军对我中山县五桂山地区“扫荡”之后，对敌展开攻击。为使游击战争在山地和平原同时展开，珠江指挥部决定将在南（海）番（禺）顺（德）地区活动的部队集中起来，执行较大的作战任务。4 月初，以主力一部渡过海峡袭击横门岛，消灭伪军一部。6 月，我炸毁石岐东南之大环公路桥，并拔除南 及西乡之伪军据点。同时，以一部兵力出击新造，摧毁伪军屯垦处、区署等机关。接着，袭击市桥、顺德等地，歼灭伪军一部。7 月下旬，我军粉碎日伪军 2000 余人对禺（番禺）南地区的“扫荡”，从而巩固了南番顺抗日根据地，并与中山之五桂山根据地打通了联系。秋季，珠江指挥部根据广东军政委员会的指示，以主力一部挺进粤中，开辟新区，准备建立粤桂边勾漏山根据地。该部在挺进中冲破敌军多次阻挠，于 10 月中旬抵达新会地区，与中区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开展抗日斗争。留在珠江三角洲的部队，先后出击大石等地，并解放了南村。从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部队也得到了壮大。1945 年 1 月，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简称珠江纵队），下辖两个支队和 1 个独立大队，林锵云任司令员，梁嘉任政治委员，周伯明任参谋长，刘向东任政治部主任。

活动在海南岛的琼崖纵队，为把游击战争扩大到全岛，于 1943 年秋，调整了各支队的防区和建制：第一支队接替第二支队全部防区，于琼山、文昌、澄迈等县开展斗争；第二支队向昌江、感恩（今感城）地区转移，开展西南地区的斗争；第三支队继续活动于乐会、万宁并向陵水、保亭和崖县发展；第四支队坚持儋县、临高、白沙等县；撤销第五支队的建制。同年冬，第一、第二、第四支队分别编组了主力大队，并对主力大队进行了 3 个月的军事政治训练。在防区和部署调整之后，各支队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第一支队在澄迈县的福山至花场、永兴至新桥公路和才坡等地袭击敌据点，伏击敌人，在永荣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第三支队在万宁的南桥、六弓等地伏击了敌人，并袭入小南据点。第二支队在昌感（今昌城）先后伏击与袭击了报板、东号、港门 3 个据点。第四支队在儋县东城乡南眼村一带击溃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这些战斗对巩固和扩大我游击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1944 年，根据中共琼崖特委的指示，第四支队派第一、二大队进入白沙县的阜青、

1944 年 7 月 25 日，中共中央关于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

龙头乡，建立了阜龙乡文头山根据地。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和第四支队第一大队奉命进入那繁村、来苗村一带打击敌人，并配合地方党组建了县政府，为尔后琼崖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进驻阜龙乡，创建白沙抗日中心根据地准备了条件。

在东江、珠江三角洲和琼崖抗日游击战争逐步发展的同时，广东的潮汕、粤中和南路（雷州半岛）等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逐步开展。在潮汕地区，1944年八九月间，当地中共党组织在揭阳、普宁等县组织了抗日武工队，1945年1月，成立了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在粤中地区，自1944年秋，珠江三角洲的部队400余人开进新会、鹤山、高明地区，与当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后，依托皂幕山开展游击战争，至10月，部队发展到800余人。11月中旬，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亦称中区纵队），由梁鸿钧任司令员，罗范群任政治委员，谢立全任副司令员，刘田夫任政治部主任。在雷州半岛，1944年春，中共南路地下党负责人周楠于重庆接受南方局的指示，6月在雷州半岛成立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在各地普遍发动武装起义。1945年1月，在各地普遍建立游击武装的基础上，成立了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改称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亦称南路纵队），周楠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华南我军在一年作战中，广泛向敌出击，有效地牵制了敌人，支援了粤汉和湘桂路上的国民党军对敌作战，并巩固了东江和珠江三角洲原有根据地，开辟了粤北、粤中新区，发展了潮汕和雷州半岛的抗日游击战争，成为我党我军在南方的战略支点。

三、开展攻势作战，夺取华南反攻阵地

（参见附图75、76）

1945年初，敌为加强华南沿海抗击美军登陆的作战准备，打通和确保粤汉铁路南段交通，不断向广东增调兵力，并扩编部队。驻广东日军第二十三军除原有1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外，又从第六方面军调来3个师团，同时将独立混成第十九旅团和谷支队扩建成两个师团。国民党军第七战区余汉谋部在日军不断增强兵力和进攻下，由韶关退至江西全南、定南、龙南地区。为打破敌控制广东沿海和粤汉铁路南段的企图，配合美英盟军登陆作战，扩大华南解放区，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于2月10日作出关于开展全省工作的部署。决定：以珠江纵队派出之武工队挺进清远、四会、广宁，打好基础后，继续向连阳及湘桂边推进，以中区纵队向沿海阳春、阳江发展，打通与南路游击队的联系，然后共同向粤桂边推进；以东江纵队第三、第四、第五支队巩固以罗浮山为中心的增城、龙门、博罗根据地，进一步建立南昆山根据地，同时派出武工队北上佛冈、英德、翁源，打好基础后，再向曲江、南雄及湘赣边推进；留在东江地区的部队，以惠阳为中心，向惠东、揭阳方向推进，开展潮汕、闽粤边的游击战争，以珠江纵队大部，在现有之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三（水）、东（莞）、宝（安）地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构成对广州的包围形势。3月6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广东临时省委的部署，并指出应“以湘粤桂边力为主要发展方向”。据此，华南我军以向北发展为主要任务，开始了春季攻势作战。

东江纵队在敌打通粤汉铁路和占领惠阳、博罗以后，即以三支部队挺进粤北，开辟新区。2月底，北江支队进至英德后，沿粤汉路东侧向北发展，在破袭粤汉铁路和粉碎顽军1个团的进攻后，于佛（冈）、新（丰）、翁（源）之间开辟了拥有20万人口的新区；西北支队越过北江后，在清远东北攻占了横石和高田等据点，开辟了以文洞（清远东北）为中心的新区；3月间，东江纵队又派第三支队北渡东江，协同原在博罗地区的第四、第五支队等部，扫除这个地区的日伪势力，开辟了罗浮山根据地。5月，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全部进入该区。在挺进粤北、开辟新区的同时，留在东江以南老区的部队，为破坏敌抗击盟军登陆的作战准备，在广九铁路两侧及惠东和海、陆丰沿海地区，主动袭击敌人，至4月底，共歼敌500余人，并在深圳东北攻克龙冈等据点多处。珠江纵队在1至4月间，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解放村庄400多个，巩固了五桂山根据地。中区纵队于1月间粉碎顽军五路围攻和两次攻打高明（今明城）之敌获胜后，于2月中旬集中主力向阳春、阳江挺进，先后取得袭击恩平和出击春湾、合水（阳春东北）的胜利。在雷州半岛的南路游击队于2月间挺进廉江以西的新塘地区，开辟了有10万人口的游击区。琼崖纵队领导机关于1945年1月迁入白沙以北的阜龙乡根据地，并调集第一、第二、第四支队的主力大队到阜龙地区，为进军白沙腹地作准备。3个主力大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从2月至6月，先后在光雅、可情、那雅、牙利等地歼灭与敌勾结的顽军百余人，使阜龙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1945年夏，敌将华南的大部兵力调往华北和华中，因而其兵力大为削弱。至6月底，华南日军仅留有7个师团和9个独立旅团，分布于湘南、广西和广东的广大地区。由于兵力不足，敌不得不缩短防线，确保广州、香港及其附近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6月16日指示广东临时省委：“华南战略根据地不可能以目前之东江地区为中心，……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并可东联闽、粤、赣，西联湘、粤、桂。”为此，“你们应即派遣大的有力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迅向北江地区发展，直至坪石、南雄之线”，“以便在数月后和王震、文年生各部打成一片。”“现在小北江支队及在紫金

（的）支队，亦应继续向北发展，以扩张左右两翼。”7月6日，广东临时省委在罗浮山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广东的实际情况，提出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创造进退有据的战略根据地，扩大解放区，扩大主力军。”并决定加派主力会同原在北江的部队迅速北进，打开始兴、南雄、仁化、曲江（今韶关）、乐昌、乳源的局面，准备协同八路军南下部队开辟五岭根据地。同时，为适应创建和扩大解放区的需要，还决定成立粤北、江北、江南和东进等指挥部，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广东区党委。

此后，中共广东区党委，以东江纵队第五支队等部1000余人组成的粤北支队，从罗浮山地区出发，经龙门、从化、新丰、翁源向北挺进，原在北江地区活动的北江支队和西北支队，积极向曲江、乳源前进，由珠江三角洲进入广宁、四会间的珠江纵队主力，亦向怀集、阳山、连县推进，准备接应八路军南下支队，共同开辟五岭根据地。与此同时，东江纵队还在东莞、海丰、博罗等地，粉碎了敌人对我根据地的多次进犯。中区纵队留在新（会）鹤（山）高（明）地区的部队，在顽军进攻的情况下，于5月间转移至新鹤地区，继续打击日伪军。南路纵队于5月回师遂溪，一举攻下杨柑据点，7

月又打退了日伪军对廉（江）西抗日根据地的多次进攻。活动在潮汕地区之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于7月中旬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部队发展到600多人，由林美南、谢育才任纵队负责人，辖两个支队，1个独立大队，活动于饶平、潮安、流沙（今普宁）、惠来之间地区，并于7月底在流沙以东的陇头击退顽军千余人的进攻，建立了流沙抗日民主政权。

琼崖纵队在白沙县阜龙乡取得立足点后，于1945年7月初，以第一、第二、第四支队的主力大队组成挺进支队，南下开辟以白沙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南进中，首战合口，再分路向白水港、罗任、南挽之敌进攻，击溃了与敖勾结的顽军守备第二团，占领了白沙。随后，又与在保亭地区的第三支队相配合，同向乐东发展，并于红毛乡击溃顽军1个团。从而使以白沙为中心的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并成立了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

华南抗日游击武装，在广州失陷到1945年8月将近7年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从数百人发展到2万多人，建立了东江、珠江、粤中、琼崖等抗日根据地，成为我党在华南的重要战略支点。这些抗日武装远离党中央，没有主力部队作骨干，并且长期处于敌顽夹击下，斗争是极其艰苦的。然而，它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坚定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并充分利用水网地形和亚热带丛林等条件，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壮大了人民的力量，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大量牵制了日伪军，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及同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

本章小结

1943年初至1945年8月是敌后抗战恢复、再发展时期。在此期间，敌后解放区军民，不仅粉碎了敌之“扫荡”、“清乡”，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恢复和发展了敌后抗日根据地，而且在敌军向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发起大规模进攻时，对敌展开了大规模攻势作战，实行了局部反攻。自1944年春至1945年夏连续发动五次攻势，并以有力一部转入外线作战，向河南、湘粤边、苏浙皖边进军，共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攻克城市70余座，恢复国土32万平方公里，在战略上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同时也有力地支援了同盟国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贡献。到1945年夏，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已经发展到90余万人，并且取得了实施大规模攻势作战的经验，从而为实行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取得上述重大胜利的主要经验是：

一、取得局部反攻的胜利关键，在于抓住战略上的有利时机和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方针

1944年，敌我力量对比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战争形势却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首先是敌为执行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不得不从敌后解放区战场抽调兵力，因而其后方兵力减弱；其次，我军在战胜了1941至1942年的困难之后，经过1943年的恢复和发展，力量有所增强；第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根本转变。在此形势下，为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援助正面战场和建立全面反攻的前进基地，我军适时发起局部反攻，首先在内线对敌展开攻势作战；同时，以一部主力打到外线去，远离老根据地，向河南、湘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开辟新区，建立全面反攻的前进基地，把内线与外线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实践证明：抓住战略上的有利时机，采取内外线结合，即使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还不占优势，仍可对敌实行局部反攻并取得重大胜利。

二、取得局部反攻的胜利，还在于正确地位定了主要进攻方向和攻击目标，并集中主要兵力于主要进攻方向和攻击目标上，同时掌握了由内向外、逐步推进和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作战指导原则。鉴于我根据地内和边沿区的敌军据点孤立突出，在我军包围和威逼下敌军心更加恐惧动摇，因而更利我攻击歼灭；同时，打下这些据点对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对于完成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战略任务，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我军采取由内向外、逐步推进的作战指导原则，把攻势作战的目标，首先指向残留在我根据地内部和边沿区的敌军据点。经1944年春夏季攻势，基本上拔除了根据地内和边沿区的敌之据点，不仅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而且为向敌占区推进创造了条件。因而自1944年秋季攻势开始，我军即将主要进攻目标指向敌占中心城镇和主要交通线。同时，集中主要兵力于主要进攻方向和主要攻击目标上，造成局部的绝对优势，并采取先攻弱点、后攻强点，先打伪军、后打日军的原则，从而取得了较大的战果。实践证明：在敌我优劣形势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只要正确选定进攻方向和目标，集中主要兵力于主要进攻方向和目标上，并贯彻由内向外、逐步推进和先打弱敌、后打

强敌的原则，仍能获取重大胜利。

三、实行局部反攻，还要教育部队从思想上认识正规战的作用，逐步实行由抗日游击战向抗日正规战的军事战略转变

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最后解决战争的是正规战而不是游击战。我军自 1944 年攻势作战开始，即逐渐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较大兵力的正规战过渡。在作战规模上，出现一次集中七八个团乃至十几个团的兵力，进行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在作战范围上，逐步由内线转向外线，使战场不断扩大；在作战形式上，攻坚战、运动战逐渐增多，出现了步炮、步工、步骑和大量民兵同时参战的新情况，随之产生了各部队之间和步炮、步工、步骑之间的协同问题。为了适应这些变化，我军根据中共中央 1944 年 7 月 1 日的整训指示，特别是 1945 年党的“七大”提出的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的战略任务，首先强调在思想上树立正规战的观念，克服游击习气；强调集中统一和密切协同动作，树立全局观念，反对各自为战、各行其是；要求部队进一步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攻坚精神，努力提高部队进行正规战的战术、技术水平，特别是提高各级指挥员组织指挥正规战的能力。其次，在组织上扩大了主力兵团，至大反攻前主力军的比例已占我军总数的 65%；同时加强了司令机关和后勤机关的建设，以适应正规战对司令部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提出的要求。第三，在作战形式上，逐步增强运动战、攻坚战的比重，缩小游击战的规模。第四，在组织指挥上，强调集中统一，精心组织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强调集中主要兵力于主要进攻方向上；强调周密组织各部队之间，步炮、步工、步骑之间的协同；强调火力、爆破、突击密切配合。实践表明，上述要求与措施，对取得局部反攻的胜利，对实行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和准备全面反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六章 实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日 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一节 全面反攻前的形势。我党 我军的方针和任务

(参见附图 77、附表 31—37)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在最后胜利的前夜。由于德国法西斯即将灭亡，欧洲战争快要结束，因而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和如何处理战后的欧洲事务，已成为苏、美、英等盟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法西斯尚在继续顽抗，英、美估计彻底打败日本，迫使其无条件投降，尚须一年半时间和付出 100 余万人的伤亡代价，因而要求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这也是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重大国际问题，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举行会谈，达成了“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的协议，秘密地签订了牵涉到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雅尔塔协定》。协定规定，中国的“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这个协定，虽然对加速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有着重要作用，但在没有四大盟国之一的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涉及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协定，这不能不说是少数大国主宰世界、推行强权政治的表现。

雅尔塔会议后，欧洲战场上的苏、美、英等同盟国军队从东、西两个主要方向加速推进。4月25日，苏、美盟军在柏林以南易北河畔的托尔高会师。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签字投降，欧洲战争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亚洲太平洋战场上的中、美、英等同盟国军队也向日本法西斯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美军于1945年2月底攻占菲律宾首府马尼拉市，控制了吕宋全岛，接着，占领硫磺岛，并逼近冲绳岛。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6月30日占领全岛。这就从东、南两个方向直逼日本本土。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加强了对日本战略轰炸。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英、澳等同盟国军队在当地人民的支援下，则正向残存的日军发动进攻。

1945年上半年，中国敌后解放区军民，响应中共中央“七大”的号召，继1944年春、夏、秋季攻势作战之后，又发起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歼灭和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迫使其退守主要交通线、重要城市和沿海地区。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政府于4月5日通知日本政府苏日中立条约不再延长，并自5月开始加紧向远东地区增调兵力和作战物资，积极准备对日作战。

至此，日本法西斯已经处于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在军事上，日

军处在中、美、苏、英等盟国军队的强大压力下，败局已定。在政治上，随着战争的失败，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战情绪更加高涨，军队士气极度低落。工人罢工、怠工，农民抗交粮税，士兵逃亡、自杀和携械投降等事件不断发生。自 1944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即三易内阁，其法西斯统治已摇摇欲坠。在经济上，由于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区急剧缩小，资源开发遭受严重破坏，以及美、英盟军的轰炸和海上封锁，因而其国内工厂严重缺乏原料，被迫停产，600 多家主要军工厂或被炸毁，或遭破坏，致使陆海军的武器装备生产，仅完成年度计划的 50% 左右。特别是从中国和东南亚掠夺资源的海上运输线已被切断，国内资源枯竭，因而储备告罄。至 1945 年 3 月，石油储备量仅有 40 余万吨，钢材储备量仅有 26 万吨。而粮食进口断绝，国内产米仅有 300 万吨，人民处于饥饿状态。这些表明其战争经济已濒于破产。面对此种严酷形势，日本统治集团哀叹：“战败虽属遗憾，但已无可避免”，于是在 6 月 22 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提出了结束战争、准备媾和的意向。然而，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一面企图通过苏联斡旋与美、英等国停战议和，一面仍在其本土和在中国占领区加强决战准备。

为准备决战，日军大本营于 1945 年 1 月 20 日即制订出《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这个计划，不仅规定了陆海军的作战方针任务，而且把日本人民直接投入决战准备。根据这个计划，4 月 13 日，日本政府决定成立国民义勇队。25 日，大本营陆军部向全国颁发了《国民抗战手册》。其中，除说明国民要有参加作战的思想准备以外，还决定把人民组成“国民义勇战斗队”，协同军队作战。为进一步加强本土决战准备，6 月 8 日，御前会议确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基本大纲》，要求日本人民“以七生尽忠的信心为力量的源泉，利用地利人和，战斗到底，以此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决心达到征战之目的”；要求迅速加强本土决战准备，将日军主要力量集中于本土，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同时注意苏联的突然变化。在国内，一切要适应本土决战，加强国民参战的体制，其中以组织国民义勇队为核心，巩固全体国民的团结，提高战斗意志，充实国家物资力量，特别要重点保证粮食和武器的生产。依据这个大纲，6 月 22 日召开的帝国议会第七十八次会议，通过公布义勇兵役法，规定凡属 15 岁至 60 岁的男子和 17 岁至 40 岁的女子，必要时应征。23 日，公布实施“国民义勇战斗队统率令”，明令规定凡属上述限定年龄内的男女国民均为国民义勇战斗队员。据此，组织起的国民义勇战斗队员竟达 2800 万人。在组建“国民义勇战斗队”的同时，日本还进行了三次扩军动员，在日本本土除原有的和从关东军调回的 21 个步兵师团、两个坦克师团外，新组建了 42 个步兵师团、4 个高炮师团、7 个独立坦克旅团、17 个独立混成旅团，陆海军总兵力最终达到约 370 万人。侵占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新组建了 16 个步兵师团、11 个独立混成旅团和 1 个独立坦克旅团，连同原有的和调入的部队，总兵力约达 75 万人。侵占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中国派遣军，新组建了 6 个步兵师团、13 个独立混成旅团、13 个独立警备队，连同原有的部队及海军舰队，总兵力达 110 多万人，此外尚有伪军 100 余万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第四卷，金铎、冷明译，商务印书馆 1962 年初版，第 180 页。

日本古代武将楠本正成曾说过“七生忠尽”一句话，意思是说即使转生七次也要尽忠报国。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 1 版，第 534 页。

人。

4月18日，日军大本营鉴于美军已在冲绳岛登陆，苏联已废止苏日中立条约的形势，指令中国派遣军收缩华南兵力以加强华北和华中的重要地区，并决定从在广西、广东的第十一、第二十三军中抽调第三、第十三、第二十七、第三十四师团集结于华北、华中要地。6月2日，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至大连召集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开会，传达大本营关于适应形势变化，加强对美、苏、中等盟国军队的作战准备的命令，要求中国派遣军设法迅速撤出湖南、广西、江西方面的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占领区，将兵力转用于华中、华北方面，以加强该方面的战略态势；要求关东军加强对苏作战准备。

根据大本营命令和大连会议的要求，中国派遣军于6月上旬确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决定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重要地区，对中、苏采取持久战，同时挫败进犯沿海重要地区的美军，以策应本土决战，并确定对美战备先以华中三角地带为重点，次为山东半岛，但应极力察明美军之登陆地区和企图，以便适时集中兵力粉碎之。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也要确保南京、北京、武汉周围重要地区。为实行上述计划，决定调整部署：令第二十三军以广州、香港为中心收缩兵力，确保广州、香港地区，另以3个师团兵力在摧毁粤赣边的中国第七战区主力后调往南京附近，由派遣军直辖，并限令于7月底前完成对美英作战准备；令第十三、第六军迅速撤回驻福州和温州的兵力，以主力确保京、沪、杭三角地带和海州地区，另分兵确保湖口下游长江地带和津浦铁路南段主要地区，并限令于7月底前在三角地带、9月底前在海州基本完成对美军的作战准备；令华北方面军所属各军及直属部队确保华北重要地区，并限令在9月底以前完成对中、美、苏三国军队的作战准备；令第六方面军利用所余兵力确保武汉周围重要地区，击溃反攻的中国军队；海军之中国方面舰队和第十三飞行师团密切协同派遣军各部队确保华北和华中的作战。根据上述计划，第六方面军及第二十三军即先后开始收缩兵力，由广西、湖南和江西向华中、华北撤退兵力，加强华中、华北重要地区，特别是沿海美军可能登陆地段的防务。

在日本法西斯行将灭亡，中国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由支持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转为扶蒋反共，撤换了对蒋介石不满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代之以魏德迈，并以赫尔利代替高思任驻华大使。赫尔利来华后，名为“调解”国共关系，实为扶蒋反共。紧接着，美国派大批军事顾问团，协助国民党军进行美械装备与训练，设立训练和供应装备中心，开办各类学校、训练班，培养各级军官和炮兵、工兵以及装甲兵等技术人员，先后以美式

武器装备国民党军30多个师，成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骨干力量。同时派遣所谓经济顾问，协助国民党政府解决财政金融和通货膨胀问题；派遣大量技术人员，并增拨1.5万辆卡车，帮助国民党当局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以提高其军事运输能力。

在美国大力支持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加紧准备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极力扩充武装力量，至1945年上半年，国民党陆军已有10个战区、4个方面军以及远征军等，共100多个军、300多个师、20多个独立旅，总兵力达250多万人。其分布是：第一方面军位于滇南蒙自、建水等地区；第二方面军位于桂西百色、田东、东兰地区；第三方面军位于湘黔交界之通道和晃县（今

新晃)等地区;第四方面军位于湘西桃源、新化、洞口地区;第一战区部队位于陇东、陕中地区;第二战区部队位于晋西隰县、吉县地区;第三战区部队位于皖南、浙江和赣东北地区;第五战区部队位于鄂西北及陕南地区;第六战区部队位于鄂西恩施、兴山、南漳地区;第七战区部队位于粤北、赣南地区;第八战区部队位于新疆和青海、甘肃、宁夏地区;第九战区部队位于赣西上高、宜春等地区;第十战区部队位于豫皖交界之沈丘和阜阳、立煌地区;第十二战区部队位于绥西五原及陕北榆林地区。从上述部署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军除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第二、第三、第五、第七、第九、第十等战区部队外,其余则部署于远离抗日前线的大后方。同时,除了其接近前线的第二、第三方面军在日军由广西撤退时先后收复南宁、桂林、柳州等地,第四方面军和第五战区部队曾在湘西、鄂西尾追撤退的日军外,没有进行大的反攻行动。

在上述国际国内形势下,敌后解放区战场军民,连续发动声势浩大的局部反攻作战,收复大片失地,猛烈地扩大解放区和缩小敌占区。至1945年8月,抗日根据地遍布19个省区,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控制县城100多座,把日伪军压缩到了主要城市、交通线及沿海地区。同时,解放区武装力量获得了大发展,军队达93万多人、民兵达220余万人。特别是经过整风、生产两大运动,深入贯彻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解放区党政军民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工农业生产获得很大发展,这就从思想和物质两方面为全面反攻奠定了胜利基础。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经过一年多的局部反攻作战和1944年的冬季整训,提高了战术水平和进行较大规模运动战与攻坚战的组织指挥能力,这就在军事方面为举行全面反攻做了较充分的准备。

在德国法西斯灭亡、欧洲战争结束之后,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7月下旬改由新首相艾德礼参加)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的波茨坦会晤。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指出:“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而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却于2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不理睬波茨坦公告”。8月6日,美国第1颗原子弹投在广岛。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同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9日,100余万苏军从北、东、西三个方向进攻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同日,美国第2颗原子弹投于长崎。应当指出,美国不投原子弹,日本也将投降。但是,苏联出兵和美国投掷原子弹,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起了加速作用,使中国抗战出现了空前有利的形势。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社1955年第1版,第299页。

森本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72页。

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10 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而日军大本营仍命令各地日军坚持继续作战。为歼灭顽抗的日本侵略军，中共中央于 10 日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区党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同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日伪军及其指挥机关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如遇敌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11 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区党委：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军向我投降，并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要求迅速集中大部兵力，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形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以便在解决日伪军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同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六道命令：令晋绥、晋察冀和山东军区各以一部兵力向东北进军，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保护人民。12 日，中共中央确定力争攻占太原以北之同蒲铁路，归绥（今呼和浩特）以东之平绥铁路，郑县（今郑州）以北之平汉铁路和以东之陇海铁路，以及北宁、正太、道清、白晋、德石、津浦、胶济等铁路和各路沿线之大小城市；对归绥以西之平绥铁路、太原以南之同蒲铁路、郑县以西之陇海铁路和以南之平汉铁路，以及长江以南各要道和大城市不作占领计划，而重点在于占领广大乡村。

正当解放区战场军民向日伪军展开大规模反攻之际，蒋介石却于 8 月 10 日发布三道命令：令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擅自行动”；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收编；令国民党各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

针对蒋介石的反动行径，毛泽东于 13 日在延安召开的干部会上指出：“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两次致电蒋介石，据理驳斥并坚决拒绝其错误命令。15 日，朱德总司令除令被解放区军民包围的日军迅速投降外，又在致美、英、苏三国政府的“说帖”中，阐明我军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及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包围的日军投降。然而，上述正义要求，却遭到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无理拒绝。在此情况下，各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坚决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

毛泽东：《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119 页。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中日战争史略》，正中书局 1968 年出版，第 504 页。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中日战争史略》，正中书局 1968 年出版，第 504 页。

蒋介石：1945 年 8 月 10 日《对沦陷区地下军、伪军之命令》。

毛泽东：《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141 页。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128—1129 页。

第二节 向日伪军占领的城市、交通要道展开大规模进攻

(参见附图 78)

为配合苏、美等盟国军队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利用自己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独立担负起向日伪军反攻的重任，立即对华北、华中、华南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进攻。

一、向敌占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

晋察冀军区部队进逼平、津，攻占张家口等城镇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延安总部的命令，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于 8 月 10 日在延安致电中共晋察冀分局和军区领导，指出：全区部队立即部署向北平、天津、保定、石门（今石家庄）、大同、阳泉、张家口、唐山、山海关前进，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冀东立即抽出 3 个主力团组成纵队，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率领向辽宁前进，相机发动进攻，尽可能占领最广大地区，准备与苏联红军会师；冀晋军区第二军分区部队尽可能抽两个团向太原逼近，准备配合晋绥军区部队夺取太原及其附近地区。根据中共中央和聂荣臻的指示，晋察冀分局和军区立即作了具体部署：以冀察军区主力在冀中、冀热辽军区各一部配合下夺取北平；以冀察军区一部兵力夺取张家口、张北等城，配合南下的苏蒙军作战；以冀晋军区部队夺取大同、丰镇、集宁、商都等城，并配合晋绥、冀中军区部队夺取太原、石门、保定等城；以冀中军区主力夺取天津、塘沽等地；以冀热辽军区主力进军东北，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夺取唐山、秦皇岛等地。11 日，晋察冀军区向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出通牒，限其在接到通牒后 48 小时内，令其所属军队交出全部武器、物资，并依照指定的地点分别集中，听候处置。为适应反攻作战的需要，晋察冀军区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建正规兵团的指示，先后将 38 个小团扩编成大团，同时又陆续以地方武装编成 62 个团参加反攻作战。

晋察冀军区各部队，依据军区的统一部署迅速逼近指定的进攻目标。向北平进军的部队，由冀察第一、第十一军分区部队及冀中第十军分区和冀热辽第十四军分区活动于北平近郊的部队组成，在冀察军区的统一指挥下，从东、西、南三面向北平逼近。第十四军分区一部于 8 月 20 日攻占通县飞机场，其第十六团攻入顺义县城，经一夜激战，歼灭日伪军 500 余人，后因由北平来援的日军到达，第十六团遂撤出该城，并掩护民兵破坏了从古北口到通县的铁路。与此同时，第一、第十一军分区主力，从西南面向北平攻击前进，推进到长辛店、丰台附近。第十军分区平南支队和涿良大队，进至南苑等地。至此，我军已对北平构成包围态势。

在进军北平的同时，冀中军区集中第八、第九、第十等军分区部队共 13 个团的兵力，于 8 月 19 日夜，以天津为重点，对北迄杨村（今武清）、南至唐官屯一线城镇之日伪军同时发起进攻。第九军分区第三十八团攻进天津西火车站，与守敌展开激烈巷战，后因日军兵力及工事较强，主动撤出战斗。

第十军分区第二十七团攻占杨柳青、韩柳墅，另两个团攻占杨村、北仓等车站及杨村西北的飞机场，切断了平、津之间敌交通线。第八军分区两个团，一度攻占静海县城，并配合地方武装攻克了天津以南的陈官屯、唐官屯火车站，主力另一部挺进天津南部地区，迫使伪津南自卫团 400 多人缴械投降，随即进攻天津外围据点，向市区逼近。至此，天津已陷入我军包围之中。此外，向德石铁路进军的第六军分区部队，攻克束鹿县城，全歼守敌。向平汉铁路北段和保定进军的第七军分区部队，攻克明月据点，占领张登和南、北大冉，并一度攻入河北省会保定市，切断了敌平汉铁路交通。

与进军平、津相呼应，冀察军区根据晋察冀军区关于配合苏蒙联军进攻张家口的命令，决定以第十二军分区察蒙骑兵支队北上接应南下苏军；以第十二军分区第十、第四十团及第十三军分区第二十团、蔚涿支队向张家口市进攻；以第十二军分区新编第六团、龙宣怀支队破坏怀来至沙城（今怀来）间铁路，阻止张家口之敌东窜。同时，令第十二军分区主力停止围攻赤城，向张家口开进，参加夺取张家口作战。张家口为察哈尔省会，北傍长城，南接平川，三面环山，地形险要；清水河由北向南流经市区，把市区分成两部分。8月20日，第十二军分区察明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驻有日军驻蒙军司令部率第一一八师团、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等部共 2 万多人，其主力部署于张家口以北的张北和以西的万全及以南的沙岭子一线，准备抗击苏蒙军和晋察冀军区部队的进攻，守城任务主要由伪军担任。根据地形和敌军设防情况，第十二军分区决心以第十团一部兵力攻占张家口东南的榆林飞机场及十三里日军营房，切断敌之退路；以第四十团和第十团主力从张家口东面敌兵力薄弱方向发动进攻。20日6时左右，部队开始攻击，至15时，全部占领清水河以东市区。由于暴雨河水猛涨，第十三军分区部队被阻于洋河南岸，而苏军停止于长城线以北，未能对张家口之敌构成围攻，因而，第十二军分区部队遂主动撤至张家口以东的人头山、羊房堡一线监视敌人。21日，张家口日军开始撤退。22日，我第十、第四十团乘势向敌发起猛攻，再次占领了张家口东部市区，并派出侦察分队进入清水河以西市区。11时后，由张家口西北和北面的狼窝沟等地后撤的日军主力先后进到张家口东都市区，与我攻入城内的第十二军分区部队在火车站、油脂公司等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由于敌兵力多、火力强，我军虽给其一定杀伤，但未能阻止该敌向北平和大同方向撤退。23日，第十、第四十团在刚到达的第二十团及蔚涿支队配合下，继续围歼顽抗的伪蒙军，至15时，全部占领了张家口及万全城。与此同时，策应作战的部队先后收复涿鹿、尚义、康保、崇礼等县城。是役，我军经3日作战，歼灭日伪军 2000 多人，缴获步枪 1 万多支、轻重机枪 20 多挺、炮 50 门、弹药库 10 余座、物资仓库 60 多座、骡马上万匹。这一胜利，使晋察冀解放区同晋绥解放区连成一片，并为进军东北创造了条件。

在此期间，冀晋军区第二、第三、第四军分区部队，分别占领了行唐、盂县、平山县城，并一度攻入石门和阳曲县城，切断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北段，向太原市逼近。第五军分区部队于8月13日攻克兴和县城，22日收复集宁、丰镇等城，歼灭日军第四独立警备队和伪军一部，并向大同推进。冀热辽军区为贯彻朱德总司令的第2号命令，成立了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决定以8个多团的兵力及地方干部共 1.3 万多人，分西、中、东三路向热河、辽宁、吉林等省进军。西路由第十三团和北进支队等部组成，分别从兴隆和围场地区出发，向承德方向前进；中路由第十一、第五十一团

等部组成，从喜峰口出长城，向赤峰方向前进：东路（又称挺进东北的前梯队）由第十二、第十八团、第七区队、朝鲜义勇队等部组成，在攻克抚宁东北的双旺镇、海阳镇等敌军据点后，于8月12日分别从义院口、九门口越过长城，经都山（今青龙）、平泉、凌源，向辽宁省西部地区攻击前进，配合苏军作战。留冀东的部队，立即向日伪军发动进攻，攻占了唐山外围的古冶、赵各庄等据点，一度切断北宁铁路之交通。

山东军区部队进军济南、青岛和徐州等地

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军区：执行“占领德州、济南、徐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交通要道之任务，但着重徐州、济南之占领及其他可能为我军占领的城市。”依此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于11日召开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和部署了反攻任务。15日，山东军区对所属各军区部队的作战行动进行了具体部署：以鲁中军区部队夺取济南，围攻益都、安丘、泰安、临沂等地之敌；以渤海军区主力配合鲁中军区夺取济南，一部收复津浦铁路沧（县）德（县）段沿线各要点及寿光、潍县（今潍坊市）等地；以胶东军区主力进军青岛，一部收复潍县以东之胶济铁路沿线及沿海各城市；以鲁南军区主力夺取徐州，一部向滋阳（今兖州）及其以南津浦铁路沿线之敌进攻；以滨海军区一部配合胶东军区夺取青岛，一部收复沿海地区，进占连云港等地，并沿陇海铁路西进，策应鲁南军区夺取徐州。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建超地方性野战兵团的指示，决定将所属各军区部队编成五路野战军，共8个师、12个警备旅及1个海军支队，并动员10万民兵组成数十个临时脱离生产的“子弟兵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7日，山东军区通牒日军第四十三军，令其“立即命令所属部队及机关停止一切抵抗，并在原地点不得调动，听候处理”，限接通牒起五日内派代表前来山东军区司令部，接受无条件投降。

山东军区各路部队按照以上部署，同时向山东省境内的日伪军展开了猛烈进攻。向济南进军的鲁中军区主力于8月19日攻占临朐县城，尔后乘胜西进，8月22日攻占博山，随即进逼淄川和明水车站，继向山东省会济南推进。为配合鲁中部队进军济南，渤海军区兵分三路：由第六军分区部队组成的中路军，20日收复博兴、高苑县城，21日占领长山县城，沿小清河向济南推进；由军区直属团、教导团、特务营及第五军分区部队组成的南路军，8月17日攻克寿光县城，尔后又收复昌邑、广饶县城，抵近张店（今淄博市）；由第一至第四军分区部队组成的北路军，19日攻克临邑，22日占领阳信、吴桥县城，并向济南以北之津浦铁路沿线据点展开进攻。

向青岛进军的胶东军区主力，分三路兼程南进：其右路军于8月14日至22日，攻克了高密城北各据点，炸毁沽河、密河铁桥，切断胶济铁路；左路军于16日攻占即墨以东的鳌山卫和窝洛子；中路军于17日控制了崂山地区各要点，进而占领即墨西南的流亭机场和城阳车站。与此同时，东海、北海等军分区部队，分别于8月17日攻克军港威海卫和牟平县城，19日攻占福山县城，21日收复黄县、招远、莱阳县城。为策应胶东主力作战，滨海军区两个团、1个支队分别攻克胶县城及王台、张家屯等据点，歼灭伪军2000多人。

向徐州进军的鲁南军区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直逼徐州近郊。第一

军分区部队于8月18日攻克滋阳以南的官庄车站，切断津浦铁路，19日夺取泗水、曲阜县城。为策应鲁南军区部队进攻徐州，滨海军区两个团和地方武装一部，分别攻占石臼所，收复赣榆县城及其东南的青口（今赣榆县城），直趋东海、连云港。

晋冀鲁豫边区各部队向边区 内主要交通线之敌进攻

根据中共中央赋予的反攻任务，1945年8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从延安致电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指出：我应迅速准备夺取城市，太行、太岳主力集结于沁源以北地区，保障晋西北部队夺取太原。太行第二军分区部队应以全力相机夺取榆次、太谷，并向太原前进，协同晋绥军区部队围攻太原。冀鲁豫主力相机夺取开封、新乡、归德（今商丘）三城及沿线城市。冀南主力相机夺取安阳至元氏之沿平汉线城市。据此，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进行了周密部署。太行军区以第二军分区主力相机夺取榆次、太谷，配合晋绥军区夺取太原；以第七、第八军分区主力组成道清支队，向道清铁路新乡至博爱段之敌攻击；以7个团组成西进部队，向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进军。太岳军区以主力5个团向平遥、介休地区之敌进攻；以沿同蒲铁路各军分区部队向该线广泛展开破击战，攻歼各据点之敌。冀鲁豫军区除以第一军分区部队配合山东军区夺取济南外，另兵分三路：以13个团组成中路军（辖3个纵队），歼灭新乡以东伪第五方面军，相机占领新乡、开封等城；以3个团组成南路军，协助中路军攻取开封；以11个团及地方武装组成北路军（辖8个梯队），其主力向平汉铁路安阳至邯郸段以东之敌进攻，相机占领安阳、邯郸等城，并分遣一部兵力攻歼德石铁路沿线之敌。全区腹地的各个军分区，组织地方武装与民兵，围攻各该区内的日伪军占据的城镇，配合主力作战。

8月14日，太行军区道清支队围攻博爱，17日占领该城，歼灭日军第六独立警备队及伪军共800多人。继之，19日攻占辉县，并切断道清铁路。向长治方向进军的西进部队，因国民党军阎锡山部抢占上党地区，遂停止西进，转战于沁县和武乡之间地区，歼灭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及伪华北绥靖军第十二集团各一部，控制白晋铁路一段，为尔后围歼上党地区之顽伪军创造了有利条件。白晋、正太、平汉铁路沿线各军分区部队分别向上述铁路沿线的敌占城镇和据点进攻，8月19日攻占潞城，20日夺取赞皇县城，21日占领襄垣、昔阳县城和许多据点，切断了平汉、白晋等铁路线。

太岳军区主力向平遥东南的东泉地区推进。同蒲铁路沿线各军分区部队，分别向当面之日伪军进攻，收复据点50多处。第五军分区部队于8月13日攻占运城盐池，歼灭伪军4个中队。16日，攻克夏县。17日，占领平陆县城及茅津渡等地，歼灭日伪军700多人。

冀鲁豫军区中路军，8月20日攻克延津县城，21日占领封丘、阳武（今原阳）县城，歼灭日军第六独立警备队及伪第五方面军各一部共3500多人，直逼河南省会开封。为协同中路军作战，南路军向开封地区的伪第五方面军及日军第十独立警备队进攻，控制了一段铁路，逼近开封、兰封（今兰考）等地。北路军第一至第五梯队，于22日分别收复广平、平乡、鸡泽、曲周县城，尔后向平汉线之敌进攻。第六梯队从8月17日起先后收复冀县、武邑和景县县城，同时切断了德石铁路。第七、第八梯队向夏津、清平方向

进攻。此外，第一军分区部队于8月14日攻占东阿县城，21日攻克肥城县城，继向济南推进。第八、第十一等军分区武装，结合民兵，先后收复沛县、鱼台、金乡、鄆城县城，并攻占陇海铁路之黄口、李庄车站，切断了陇海铁路。

晋绥军区部队逼近太原，攻入归绥， 夺取日伪军占据的城镇据点

晋绥军区根据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8月11日拟就最后通牒，由军区各部队向附近之日军送出，要求日军立即停止作战；限期将全部兵员、武器装备、运输工具及其他作战物资，开具清单，交与我军，不得毁坏；倘于限定时间内，拒绝缴械，我军即以违反命令，当坚决予以军事惩处。同时，军区决定集中主力在冀晋、太行军区各一部配合下，分南北两线同时向山西省会太原、绥远省会归绥及同蒲铁路北段和平绥铁路西段之敌进攻，并随时准备阻歼向我进犯的国民党军队。

在北线，我骑兵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8月中旬先后攻占武川、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县城及归绥以东的旗下营、白塔等车站。与此同时，第九、第二十七团攻克归绥以西之察素齐、毕克齐和兵州亥车站，尔后乘胜于18日攻入归绥，包围了日伪军1300多人。正当敌准备向我投降时，国民党军傅作义部经包头沿平绥铁路东进，逼近归绥，企图配合城内的日伪军夹击我军。我军因腹背受敌，遂撤离归绥。在此期间，我独立第二旅于19日攻克清水河县城，歼灭伪军1000余人。第二、第五军分区部队从8月16日起分别攻克右玉、平鲁、朔县县城及五寨西北的义井、李家坪等据点。

在南线，第八军分区主力分三路直逼太原市，于8月15日至19日先后攻占太原西、北之古交、河口、陈家峪、思西村、皇后园、南寨等据点，并一度攻入太原县城（今晋源），在从东面进攻的冀晋军区部队和从东南方向逼近的太行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对太原市构成包围态势。在此期间，为策应攻取太原，第六军分区部队攻占奇村、忻口等据点。第三军分区和第八军分区一部分别攻克离石以东的吴城镇和以西的李家垣等据点，并协同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于21日在芦家滩伏击歼灭自离石撤退的日军第一一四师团一部。

新四军各部队向苏、浙、皖地区敌占城镇进攻

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11日，新四军将执行中共中央10日电的具体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同日，向华中各地日军发出通牒，令其停止一切抵抗，并将一切武器、交通工具、军用器材及所有物资，于24小时内全部交就近之新四军，否则予以坚决消灭。12日，中共中央鉴于华中敌、顽兵力较大，新四军难于夺取大中城市，遂决定：新四军在长江以南的部队就地向四周发展，收复敌占乡村和县城；长江以北的部队力争占领津浦铁路及其以东的一切城市，并以有力一部配合八路军攻歼陇海铁路之敌，同时准备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华中局和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以第二、第三师及第七师主力分别集结于津浦铁路西，歼灭当面之敌，并准备抗击国民党军李品仙部的进攻；以第四

师配合八路军歼灭陇海铁路之敌，并准备抗击国民党军何柱国部的进犯；以各军区武装迅速向本区内敌占城镇进攻。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建野战兵团的指示，迅速补充和扩编了主力兵团，仅苏中军区在3天内即编组了17个步兵团。新四军各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立即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

在江北，淮北军区部队先后攻占宿县西南的孙疃集和五河东北的双沟等据点，歼敌一部，并乘宿迁、泗县、泗阳之敌仓皇逃窜时，收复上述3座县城。淮南军区部队从8月14日起分别收复定远、天长、来安县城，攻克嘉山、盱眙、六合县城及滁县以北之张八岭车站，同时迫使伪警卫第三师3000多人投诚。苏北军区部队于18日攻克沭阳县城，21日夺取涟水县城，共歼灭伪军600多人。苏中军区部队分别收复金沙（今南通县城）、掘港（今如东县城）及高邮以东之三垛、河口等30余处据点，并攻入姜堰（今泰县城）、黄桥，19日占领扬中县城，同时逼近泰兴、如皋、靖江、南通（今南通市）、启东等县城，皖江军区部队于8月17日攻克无为县城，尔后又占领襄安、运漕等据点，歼灭伪军300多人。

在江南，苏浙军区之第一、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先后攻克郎溪以北的东坝、梅渚等据点，并乘敌收缩之机于8月19日占领长兴、溧水、溧阳、金坛县城，同时还攻占了宜兴西南的张渚和句容东南的宝堰、天王寺等50余个集镇。第二纵队在浙东地方武装协同下，攻克余姚以北的周巷、庵东、浒山（今慈溪）等数十个据点及宁波以西之鄞江桥和西城桥。皖江军区之皖南部队，一度攻入芜湖市内。

河南军区及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向豫西和鄂豫皖边之敌进攻

河南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相机占领平汉、陇海铁路，迅速与鄂豫皖边区和水东区打通联系的指示，决定以主力一部组成陇海、平汉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分别向铁路沿线之敌进攻。8月18日，我军攻占密县县城，22日夺取登封县城，歼灭伪军数百人。尔后，又攻克了偃师东南的回廓镇，及大金店、顺店、大槐镇等数十个敌军据点，并一度攻入汜水。

新四军第五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全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的指示，以主力第十三旅攻占了安陆东南之魏家店、晏家河与平汉线之花园等据点，歼敌一部。尔后，沿平汉铁路南进，在孝感东北的三汊埠伏击歼灭撤往汉口的日军一部。与此同时，各军分区部队向当面之敌进攻，先后在确山、黄陂、天门、咸宁地区攻克敌重要据点12处，共歼灭日伪军3500多人。

华南各抗日游击队攻歼盘踞于本地区之敌

中共广东区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以主力继续向粤北发展，同时以一部兵力迅速进占广九线及某些小城市的指示，急令各部包围日伪军占领的城镇据点，迫其投降。据此，东江纵队即分路向沿海地区、东江两岸、广九铁路沿线之日伪军据点进攻。8月13日，攻入北栅、太平，歼灭伪军一部。17

日，收复宝安（今南头）县城，攻克常平、西乡、固戍、翟家村等据点，歼灭伪军第三十师及日军各一部。20日，占领厚街、赤岭和深圳等据点，切断广九铁路。21日至22日，先后攻入博罗、增城县城，并收复长洲岛和大屿山等地。与此同时，珠江纵队、中区纵队、南路纵队等，也分别向当面之敌进攻，收复一些集镇。

自8月9日全面反攻开始，至22日，我军抓住战略上的有利形势，毫不迟疑地展开反攻作战，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收复县以上城市80多座，解放大片国土，为下一步反攻作战创造了条件。

二、夺取敌占中小城市，控制广大乡村

在苏、美等盟国军队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于8月14日晚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宣布投降。22日，日军大本营命令各地日军从25日0时起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但中国派遣军“得在局部地区实行自卫措置”。而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所以，他要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令在中国的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投降，还要求日军守住所占地区，阻止在抗日战争中历尽千辛万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受降。蒋介石为麻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欺骗国内外舆论，于8月13日至23日3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去重庆商谈国内和平问题，同时调兵遣将，令傅作义、阎锡山、李品仙、顾祝同等部率先向解放区推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8月15日，蒋介石致电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要他维护占领区秩序，等待蒋军受降，不准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缴械和交出地区及物资。冈村宁次于18日通令所属各部，只向蒋军投降，不向其他军队缴械。尔后，他又命令日军，除蒋介石有命令外，对中国其他方面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此时，在中国战场上出现了美、蒋、日、伪加紧勾结的严重局势，这就使我军夺取大城市的计划难于实现。面对上述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改变方针，于8月22日指示各党委、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和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原定力争大城市的方针是对的，但形势变了，今后一个时期应夺取中小城市。26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指出：今后我军应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路北段、正太路、德石路、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昭和二十年的支那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71年出版，第550页。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李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第1版，第72页。

《冈村宁次战场回忆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71年印，第15页。

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兵力广占乡村和中小城镇。

根据上述指示，各大战略区立即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主力迅速转向夺取中小城镇，并控制广大乡村。

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作战行动

依据中共中央新的方针部署，晋察冀军区确定以一部兵力继续破击边区周围各铁路线，威胁大城市之敌：以主力广泛夺取敌占县城及据点。据此，冀中军区部队分三个方向展开进攻：在南线，第六军分区部队于8月28日攻占深县县城，9月1日占领赵县、宁晋县城，同时还攻占磨头、王家井、贡家台等火车站，控制德石铁路70余公里；在北线，第九、第十军分区部队，8月23日攻占霸县城，27日夺取永清、容县城，29日占领安次县城，以及旧州镇、牛驼镇和王庆坨、小站、葛沽等敌重要据点20多处；在西线，第七军分区部队于8月24至27日连续收复博野，蠡县、安国等三座县城，29日攻克安新县城，同时攻占了高阳城外各据点。冀察军区一部由张家口沿平绥路东进，迫使沙城伪军投降，并攻入宣化城；另一部占领柴沟堡（今怀安县城）和怀安城。冀热辽军区进军东北的前梯队，第十二、第十八团等部于8月30日在前所、绥中迫使伪满军1000余人投降，尔后转兵向南，在苏军一部配合下，攻占山海关，毙伤日伪军一部，俘2000多人。同时，收复临榆县城，切断了日本关东军同中国派遣军的联系，为我军后续部队进军东北打开了通道。留冀东的部队，攻占开平，收复秦皇岛，逼进蓟县、玉田、丰润、唐山等城。冀晋军区部队于8月24日收复阳高、灵寿县城，同时破坏了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北段，为阻止日军沿铁路机动创造了条件。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作战行动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8月20日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同时，恢复冀南军区。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以部分兵力威胁开封、新乡等城之敌，迫其集中；以主要兵力夺取中小城市，消灭分散孤立之敌。据此，太行军区主力于8月下旬攻克平遥东南之邢村镇和西南的张兰镇等据点，并对同蒲铁路平遥至介休段展开破击。第四军分区部队协同由陕甘宁边区路过该地南下的八路军游击第二、第三支队，于27日攻克济源县城，29日占领垣曲县城（今古城）。同时，同蒲铁路沿线各军分区部队，也先后扫清灵石、霍县、赵城、洪洞、翼城、绛县等城的外围据点，破坏了平遥至临汾段铁路，造成了阻止临汾、运城等地日军北进的有利态势。太行军区主力攻克武乡后，9月1日再克襄垣县城，共歼灭敌军1000多人。道清支队于8月24日攻占获嘉县城，月底先后攻克武涉、温县县城，歼敌1000余人，使焦作、沁阳之敌处于我军包围之中。平汉铁路沿线各军分区部队，在冀南军区一部配合下，相继攻占平汉铁路两侧据点多处，破坏了元氏至邯郸段铁路。与此同时，冀南军区在攻占清平县城后，又集中第四、第六、第七等军分区部队各一部，结合民兵，于31日攻占临清县城，歼灭伪军2000多人。冀鲁豫军区中路军第二纵队，攻

克道口（今滑县）、新镇，并围攻滑县。第三纵队于9月初攻克长垣县城，歼灭伪军1000多人。南路军回师新黄河以东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8月26日攻克通许、杞县县城，27日夺取民权县城，并迫使伪第四方面军独立师2000多人投降，郑县和商丘之敌陷入孤立。

晋绥军区部队的作战行动

中共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鉴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已占归绥，阎锡山部已入太原等情况，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威胁太原、归绥；以主力在北线夺取绥南、绥东各县城，在南线夺取太（原）汾（阳）公路上之县城及离石、柳林、大武等城镇。依据军区之部署和命令，北线独立第二旅于8月25日从清水河分兵北上，攻占左云、和林格尔、凉城（今田家镇）县城和新堂镇（今凉城）等地。第二、第六军分区部队，攻克神池县城及东寨镇等据点5处，直逼宁武城下。南线第八军分区部队，除以一部继续威胁太原外，转兵攻克汾阳以南的阳城镇、三泉镇。尔后，第八军分区以3个支队配合由陕甘宁边区赶到的独立第一旅，于9月1日攻克文水县城，歼灭伪军700多人。

山东军区部队的作战行动

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以一部兵力威胁济南，青岛、徐州等大中城市之敌，以主力攻占大部分中小城市，并夺取津浦、胶济铁路沿线日伪军控制的各车站、城镇。据此，鲁中军区部队于8月23日攻占益都、莱芜县城，25日进攻淄川县城，26日夺取章丘县城，31日收复新泰县城，同时还攻克胶济铁路西段的明水、周村等车站。滨海军区一部围攻诸城，另一部进攻临沂。胶东军区部队于8月23日至9月1日，分别攻占即墨、蓬莱、掖县及烟台等城市，迫使胶东之敌纷纷退缩青岛。在此期间，渤海军区南路军攻占桓台、邹平、临淄等县城及胶济铁路中段之辛店、淄河、普集等车站。中路军收复青城县城，攻占济南东北之张家林，对济南守敌形成侧击之势。北路军攻克惠民县城及津浦铁路上的桑园、寨子等车站，并围攻宁津、盐山等城之敌。鲁南军区部队于8月23日攻入贾汪，25日逼退台儿庄守敌，一部进到徐州以北之九里山。

新四军各部队的作战行动

根据毛泽东8月24日关于占领运河、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的指示，新四军各部队加紧攻击中小城镇之敌。淮北军区津浦路以东的部队，8月24日占领五河县城，继向蚌埠逼近。津浦路以西的部队，29日攻占永城，全歼守城伪军1000余人。淮南军区部队攻占蚌埠西南的刘府，并向凤阳、怀远推进。苏中军区教导旅及第一军分区部队在4万民兵配合下，8月23日攻占宝应县城，俘伪军约2000人。继之，由第一军分区特务第一、第二团及兴化独立团组成的苏中军区独立第一旅于28日夜，利用民船的掩护于青龙庵等地上陆进攻兴化。由于兴化系水网坚城，地形狭长，展开困难，我军经过反复争夺，至9月1日夜，始将兴化县

城攻克，全歼伪军第二十二师 5000 多人。苏中军区其余各部，在民兵配合下，分别占领东台、启东、海门、靖江等县城及盐城西北的湖垛、如皋东北的栟茶、丰利等重要集镇百余处。皖江军区部队收复淮南铁路南段的裕溪口及铜城闸、沈家巷、东关等车站。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在地方武装一部配合下，从 8 月 23 日开始，先后攻占句容、郎溪、广德、高淳等县城，以及当涂东北的小丹阳、南京东南的湖熟、土山等集镇。第三纵队攻占宜兴县城及其东南的鼎山、蜀山镇等据点，歼灭伪军 1000 余人。第四纵队在地方武装 3 个团配合下，8 月 23 日占领安吉县城及梅渚至吴兴间许多据点。浦东地方武装于 30 日攻占南汇县城，全歼拒降伪军。

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的作战行动

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和任务，各游击队加紧围攻日伪军占领的小城镇。东江纵队于 8 月 23 日收复沙头角，25 日攻入淡水，26 日渡过大鹏海峡攻克三门岛，27 日占领海丰之门港。琼崖纵队各支队分别向澄迈、儋县、北黎、感恩（今恩城）、崖县、三亚（今崖县）和海口等地进军。

在 8 月 9 日至 9 月 2 日的反攻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抓住战机，积极向日伪军占领的城镇及交通要道进攻，收复了县以上城市 150 多座，几乎切断了日军占领区的所有铁路交通线，迫使其纷纷向大中城市撤退。据延安总部不完全统计，共歼灭日伪军 7.6 万多人，缴获长、短枪 7.3 万余支，轻、重机枪 900 多挺，各种炮 160 多门，取得了全面反攻作战的伟大胜利。

第三节 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

(参见附图 78)

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了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完结。但是，被解放区军民包围的日伪军，仍继续顽抗，拒绝向我军投降。美帝国主义为取代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以大批飞机和舰船帮助蒋介石运送军队进攻解放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不仅如此，还派遣海军陆战队先后在秦皇岛、天津、塘沽、青岛等地登陆，替国民党军抢占被解放区军民包围的城市及交通要道。蒋介石集团不顾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反对，于9月9日在南京单方面接受日军投降，并委任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令他指挥日军协同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犯，先后攻占已被八路军和新四军收复的文水、益都、即墨、延津、封丘、海门等10多座县城和一些据点。同时，蒋介石把沦陷区（包括解放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下令其各战区、各方面军以空运、车运、水运及徒步等方式，向解放区猛烈推进，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占领华南、华中和华北各解放区，进而夺取东北。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11日指示各战略区：在打退国民党军进攻的同时，“积极集结与扩大力量，夺取中、小城市，扩大解放区，破坏交通，封锁与围困大城市，大量消灭伪军及敌之分散小部队，威胁敌人部分向我投降。”19日，中共中央在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又进一步指出：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日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并争取控制东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为我各战略区调整部署，明确打击重点指明了方向。我各战略区部队认真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在抗击国民党军进犯，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同时，继续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争取更大胜利。

一、继续夺取日伪军控制的中小城镇 山东军区部队的作战行动

为歼灭拒降顽抗的日伪军，山东军区第一师于9月5日夜，乘日军从诸城撤退之际，冒雨向守城伪军张步云部发起攻击，当即占领了东、西关有利阵地。翌日18时发起总攻，敌即溃乱，2000多人从小东门突围，被我追歼。当晚，城内之伪军亦被歼灭。计毙俘伪军2400多人。诸城东南的日照守敌慑于被歼，于8日弃城而逃。至此，滨海北部地区，除泊儿镇外，全部获得解放。与此同时，第八师于9月7日19时向徐州敌外围据点峰县城（今峰城）发动进攻，经一整夜激烈战斗，全歼伪军1500多人，日军200余人于8日夜突围逃往枣庄，峰县城遂被收复。

临沂战役 自日军从临沂撤退后，临沂伪军伙同伪费县保安大队及伪沂州道皇协军一部，凭借日军撤退时留下的武器弹药，固守顽抗。8月17日，滨海、鲁中军区部队各一部向守城伪军发起攻击，当即占领了四关。20日和

22日，攻城部队对龟缩城内之伪军实施两次强攻，因城墙坚固未能奏效，后改以坑道作业。9月10日晨，以4000斤炸药实施坑道爆破成功，突击队迅即攻入城内，与负隅顽抗的伪军进行逐屋争夺，至11日7时，我军全部占领临沂县城，计歼灭伪军2000多人。

平度战役 在胶东军区部队的打击下，招远、莱阳和掖县等地之敌纷纷窜入平度县城，计日军600多人，伪军6000余人，成为胶东境内敌之最大堡垒。为歼灭该敌，第五师及警备第五旅于9月7日从东、西两面向平度守敌发起总攻，经3日激烈战斗，除日军突围逃窜外，我军歼灭伪华北绥靖军第八集团等部共5700余人，占领了平度县城。至此，胶东半岛除青岛、即墨（被日军重占）外，均获解放。

在此前后，渤海军区部队收复济阳、齐东、盐山、宁津县城后，于9月10日将伪军4个师计4000余人的大部，围歼于惠民东南的陈集地区。继之，挥师北进，于17日攻克无棣县城，又歼灭另一股伪军6000余人。尔后，其回民支队及地方武装一部于24日攻占黄骅县城，歼灭伪军一部；主力则由无棣南进，于26日一举攻克商河县城，歼灭逃聚该城的德平、临邑、济阳等县伪保安队全部，其中俘4500多人，胜利结束商河战役。至此，渤海腹地县城全部收复。

10月初，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部赴东北。中共中央决定陈毅到山东工作并组成野战指挥部，统一指挥济南至徐州间津浦铁路两侧我军作战。这时，伪军吴化文部正配合国民党军沿津浦铁路北犯。野战指挥部遂决定第八师在警备第八旅配合下攻取邹县，破坏铁路，歼灭吴伪，并阻止国民党军北进。17日9时30分，第八师向邹县城发起进攻，战至19日16时，全部肃清城内之日伪军。黄昏，在我炮火威胁下，邹县车站日军缴械投降。与此同时，在北面阻援的第八师第二十四团，于18日攻克东滩店，并击退从滋阳来援之敌；在南面阻援的警备第十五团及特务营，迫使十里堡、下店日军缴械。在这一作战中，歼灭日军第十一独立警备队及伪吴化文部共2700多人。

平（原）禹（城）战役 平禹地区，被日军控制八年之久，碉堡林立，封锁沟密布，地形平坦，易守难攻。为迫使日伪军缴械投降，控制津浦铁路北段，渤海军区决心主力挺进津浦线，发起平（原）禹（城）战役。其部署：以特务第一、第二团及警备第六旅在地方武装和民兵1万余人配合下，向平禹地区发动进攻；以第一军分区武装挺进津浦铁路之德（县）沧（县）段，阻止平原县日伪军北窜；以警备第七旅破击昌乐至济南段胶济铁路，牵制胶济铁路西段日伪军，配合军区主力于津浦线作战。战役分为3个阶段：10月16日至31日为第1阶段，以攻歼平原地区之敌为主要目标。渤海军区主力特务第一、第二团及警备第六旅等从南、北两面首先攻占平原外围之恩县及黄河崖、李家庙、米风龙等据点后，于31日经半小时激战，攻克平原县城。在此期间，警备第七旅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临淄县城及普集、大临池、王村等车站，并攻入周村。第一军分区部队攻克南皮县城及许官屯、桑园车站，控制铁路30多公里。11月1日至20日为第2阶段，以攻歼平（原）禹（城）段铁路沿线之敌为主要目标。11月1日，济南日军1000余人纠集伪军1万人重占平原县城，并加强平原至济南段铁路的守备。渤海军区决心首先攻占铁路两侧伪军据点，再夺取张庄、林庄车站，控制平禹段铁路。经连续作战，至20日，军区主力分别攻克平禹段铁路两侧据点74处，占领张庄、

林庄车站，控制铁路 40 公里，使平原之敌完全孤立。10 月 25 日至 12 月 31 日为第 3 阶段，以攻占平原、禹城为主要目标。特务第一、第二团等部，从四面向平原压缩。12 月 8

日晨，平原守敌突围，被我军追歼一部，大部向北逃窜。向禹城进攻的警备第六旅攻克禹城外各据点后，10 日夜攻入禹城，歼灭守城伪军大部。此时，日军第四十七师团 1 个大队从济南来援，窜入晏城车站和禹城等地。军区遂集中主力歼灭禹城和晏城等地的日伪军。特务第一团经两日作战，攻克晏城，歼灭日军约 300 人及伪军一部，其余伪军溃散。29 日，禹城伪军 800 多人溃逃。当晚，特务第一、第二团围攻禹城车站，日军伤亡甚重。31 日，禹城日军弃城南逃，被我军围困于车站之南大沟内，鏖战 3 小时，毙日军 145 人，俘其大队长以下 613 人。渤海军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攻克县城 4 座，及津浦铁路沿线许多据点，毙伤俘日军第九独立警备队及第四十七师团各一部约 2000 人、伪军近万人。

在平禹战役期间，滨海军区警备第十旅和第十一旅一部，攻克泊儿镇外围各据点后，于 11 月 23 日开始坑道作业，12 月 20 日转入强攻，同据守泊儿镇之伪军反复争夺至 28 日夜，除一部分突围逃跑外，计歼灭伪滨海地区警备军 3000 多人，收复泊儿镇。至此，山东省境内除铁路沿线及西部几座县城外，均获解放。

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作战行动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军区决定以主力加紧肃清热、察两省残存的日伪军，以便控制热、察两省全境，同时继续歼灭边区境内拒绝投降之日伪军。据此，冀热辽军区留冀东的部队于 9 月 9 日夜攻击蓟县，激战 3 日，全歼守城伪军 4000 多人。22 日，攻克玉田县城，歼灭日军大队长以下 350 多人、伪军 1500 余人。九十月间，冀热辽军区部队还攻占香河、宝坻、迁安、抚宁等城，逼退乐亭、宁河、卢龙等城守敌，收复了冀东广大地区。

在冀热辽军区部队攻歼冀东之敌时，冀中军区决心攻克石门敌外围据点藁城。第六军分区依据军区的指示，部署一部兵力预伏于城西尚书庄附近，准备打击从石门来援之日军，以一部兵力攻击藁城。10 月 4 日 21 时，攻城部队在炮火掩护下越过护城河，攻占了东北和西北角敌城头堡垒。5 日拂晓，敌施放毒气，并进行反扑，被我打退。此时，石门出援之日军亦被我阻援部队击退。15 时，我军发起总攻，战至 6 日，歼敌大部，余敌被困于其指挥部岗楼内。为减少伤亡，我军一面加强政治攻势，一面准备爆破。7 日上午，敌被迫投降。此次战斗，共歼灭敌联队长以下 700 多人。

与此同时，冀中第十、第七军分区部队，分别攻克固安、高阳县城和许多据点，并肃清北平东南地区之敌。冀晋和冀察地方武装，分别收复完县、唐县及易县、满城等县城。至此，晋察冀边区中小城镇之日伪军已基本肃清，解放区连成一片。

晋绥军区部队的作战行动

为加强晋绥地区的反攻兵力，第一二 师第三五八旅于陕甘宁边区爷台山反击国民党顽军作战胜利后，奉令由关中地区返回晋西北，执行反攻任务。

该旅（欠第七一六团）于9月3至4日从宋家川渡过黄河后，即根据延安总部歼灭拒降之敌的命令，决心以第七一五团攻占柳林，第八团攻击离石县城。第七一五团隐蔽接近柳林，并突然发起攻击，经6小时战斗，占领柳林，全歼伪军300多人。此时，第八团绕过柳林，于4日夜进至交口、梁家会地区进行攻城准备。离石城墙坚固，高约10米。守敌为伪军1000余人，大部集中城内，仅以一部于城外，控制风山底和卧牛塢，以为离石城的屏障。第八团于6日4时在炮火掩护下，同时向风山底、卧牛塢发动进攻，经4小时作战，占领了两高地。尔后，调整部署，于6日21时冒雨发起总攻。因道路泥泞、运动困难、协同不好，攻击受挫，遂停止攻击，以小分队袭扰守敌，同时再次调整部署，并加强攻城准备。9日1时，第八团发起攻击，先后架梯登城成功，至8时，全歼城内守敌。在我军攻克离石的胜利震撼和政治争取下，大武镇、上芦桥、张子山等据点伪军纷纷缴械投降。至此，离石县境之敌全部肃清。

在此期间，晋绥军区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主力转到绥远境内，阻止国民党军东犯，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保卫张家口的指示，将所有主力编成野战兵团，辖5个旅11个团。9月上旬，贺龙率5个团先行北上，准备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作战。同时，为加强晋绥地区的军事指挥，经中共中央批准，于9月中旬成立绥蒙、雁门、吕梁3个军区，以便指挥该地区部队继续攻歼拒绝投降之日伪军。12日，雁门军区部队收复静乐县城。尔后，又相继攻克康家会、宋家庄、三交镇等据点，占领了忻（县）静（乐）公路全线。至此，北起左云、右玉，南迄离石之晋西北地区，全部获得解放。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作战行动

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战场形势，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在集中主力反击进占我上党地区的国民党军的同时，以冀鲁豫军区和冀南、太行军区各一部继续肃清平汉铁路新乡以北地区之日伪军，以太行、太岳军区另一部攻取焦作、沁阳，扫清道清铁路沿线的日伪军，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向新乡以北平汉铁路沿线之日伪军进攻的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于8月29日包围滑县，并攻占其外围据点道口镇。当日16时，向滑县城发起攻击，至30日晚，将伪军压缩包围于西南门内一小围子中。为使其孤立无援，第二纵队分兵一部攻克浚县城。但滑县之敌仍凭坚固守。自9月1日起，第二纵队展开围困战，至15日黄昏，守敌因弹尽粮绝，遂开始突围。我军在敌突围时，歼其1600多人，解放滑县域。

尔后，第二纵队乘胜北上，直取汤阴。24日，肃清四关守敌，当晚即从三个方向进行坑道作业。28日晚，坑道爆破成功，我军乘机突入城内，巷战至29日15时，歼灭伪第六方面军新九师2200余人，占领汤阴县城。为保障第二纵队作战，第一纵队攻克淇县东北之巨桥，歼灭伪军1000余人，并在广大群众支援下，破毁了新乡至汤阴段铁路。

为歼灭盘踞于平汉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太行军区以第五、第四十一、第四十七团、安阳独立团及警卫总队组成太行独立第一支队，准备首先夺取磁县，尔后视情况夺取邯郸、安阳。该支队受命后，分由彭城、临水、峰峰等地向磁县逼近。9月29日，独立第一支队歼灭了磁县四关守敌，30日进行攻城准备，10月2日发起总攻，全歼伪军两个旅计3000多人，解放磁县。磁

县战斗前后，平汉铁路沿线之太行军区各军分区部队，在冀南军区一部兵力协同下，先后攻占临城、内丘、武安、沙河、高邑等县城。继之，于9月24日攻克邢台，歼灭逃聚该城的9个县的伪保安队共3000多人。10月1日，向邯郸发起进攻，经过连续战斗，4日晚占领邯郸县城，歼灭伪军1900多人。至此，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已控制新乡以北平汉铁路50余公里。

在新乡以南地区，冀鲁豫军区部队攻克原武、中牟县城。在道清铁路沿线，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在八路军游击第二、第三支队配合下，攻占焦作、修武、孟县、沁阳县城。在德石铁路及鲁西地区，冀鲁豫、冀南军区部队分别收复齐河、夏津、高唐、在平、菏泽、衡水等县城。至此，晋冀鲁豫解放区之太行、太岳与冀南、冀鲁豫边区连成一片。

新四军各部队的作战行动

根据刘少奇关于长江以北主力分散作战，扫清苏中、苏北之敌的指示，新四军决定第三师主力东调攻击淮阴、淮安；第二、第四师进击津浦铁路沿线；各军区武装继续进攻所在地区之敌。

两淮战役 第三师直属队和第十旅受令后，于8月26日由高良涧、蒋坝一线出发，向淮阴开进。与此同时，苏北地方武装5个团从东、北两面向淮阴逼近。27日6时，第十旅先头部队向淮阴外围据点发动进攻，尔后主力陆续到达参战，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经3日战斗，全部肃清淮阴外围据点，并对淮阴城构成包围态势。31日夜，第十旅调整部署，同时开始修筑高于城墙的多座火力点，开挖数条坑道，直逼城下，并两次向坚守淮阴之伪军发出通牒，令其投降。9月6日14时，我军开始总攻，激战至15时30分，全歼伪军第二十八师师长以下约9000人，解放了淮阴城，并乘胜包围了淮安县城。此时，第三师第七、第八旅奉命由淮南返回苏北，歼灭淮安之敌。该两旅于9月5日分别从明光、怀远等地出发，15日进抵淮安城下，接替第十旅进行攻城准备。淮安位于淮阴东南17公里处，为运河线上的水陆交通枢纽之一，城内和四周河流纵横，城墙高12米，是座水网坚城，守城伪军共5000多人。第七、第八旅及苏北军区武装一部，经周密准备后，于22日8时开始总攻，各部在炮火掩护下，先后攻入城年，对敌实施多路穿插分割，各个围歼。战至15时，全歼伪军5000多人。在两淮战役中，第三师以极少代价，取得了歼灭伪军近1.4万人的重大胜利。

在第三师主力攻取淮安时，第十旅配合苏北地方武装攻克了沐阳以东的新安镇（今灌南县城）、大伊山（今灌云县城）、响水口（今响水县城）、陈家港等据点，歼灭伪军第十一旅及第十二旅各一部，收复运河、串场河流域一些集镇，完全解放了苏北盐场。

九十月间，苏中军区部队攻占泰兴、如皋县城及海安、安丰镇等据点，歼灭伪军暂编第十九师、独立第十九旅共9000多人。第二师和第四师主力分别配合地方武装攻克津浦铁路宿县以北之夹沟、符离集和滁县以南的担子街、乌衣等9个车站，破坏了徐州至宿县和浦口至滁县段津浦铁路。淮北军区部队攻克灵璧、萧县县城及宿县东北多处据点，计歼灭伪军4000多人，并争取了永城以西的酇县（今酇城）地区伪军4000多人投诚。

盐城战役 两淮战役后，新四军为肃清苏北伪军，以便机动作战，在第三师奉命调往东北后，决定从苏中抽调主力，在盐阜区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

合下，发起盐城战役。战役分两个阶段：10月31日至11月7日为第1阶段，苏中军区主力经过激战，打垮了伪军多次反扑，连克伍佑、蔡家祠、二墩子等15个据点，歼灭伪军第三十九师全部3600多人，同时肃清盐城外围据点，又歼敌800多人。随即紧缩对盐城之伪第四军军部及第四十师的包围，并以猛烈炮击结合政治攻势瓦解敌之战斗意志。11月8日，战役进入第2阶段。我军发起总攻，迅速攻克盐城近郊之九里窑、袁公庄据点，占领飞机场。守城伪军迅即动摇，被迫于11日投诚。此役，全歼伪军两个师，俘1万余人。

高邮战役 在盐城战役期间，为适应华中斗争形势的需要，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于10月下旬成立了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11月，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辖4个纵队另1个特务团。华中分局领导机关和华中野战军组成后，鉴于国民党军已占扬州、泰兴，正准备同高邮之日伪军打通联系，以分割华中解放区。为解除这一威胁，华中野战军遂发起高邮战役。高邮西靠运河、高邮湖，东濒水网，墙高城大，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守敌为日军两个大队，伪军7个团。12月19日，华中野战军主力第七、第八纵队及地方武装共15个团，采取攻城与打击援敌相结合的战法，向高邮、邵伯等地之敌发动进攻。至20日晨，第七纵队攻占邵伯等地，并完成断敌退路和阻敌增援之准备。与此同时，特务团攻占车逻，第八纵队扫清高邮城外围各据点，并对据守高邮之伪第四十二师展开政治攻势。25日晚，第八纵队由北、东、南三个方向对高邮守敌发动总攻，经激烈战斗，于26日全部占领高邮县城，歼灭伪第四十二师师长以下4000多人、日军大队长以下1000余人。为配合主力作战，苏中军区部队在扬州至泰州及泰州至口岸公路沿线歼灭伪军4000多人。

此后，华中野战军为歼灭陇海铁路东段之日伪军，粉碎国民党利用其切断我华中与山东联系的企图，以第八、第九纵队在第六纵队及地方武装协同下，发起陇海路东段战役。经两天作战，华中野战军不仅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而且破坏了徐州以东之陇海铁路，使华中与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

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的作战行动

中共广东区委，遵照中共中央9月19日关于分散坚持、保存力量的指示，根据国民党4个军和地方保安团不断向华南解放区进攻的严重形势，决定分散坚持斗争，保存武装、保存干部。据此，东江纵队将其活动地区重新划分为11个区，每区保持1000人或数百人的武装，依靠群众和统一战线关系，采取分散隐蔽的方式，继续坚持斗争，并积极寻找战机，适时集中兵力打击敌人。9月3日，活动于广九铁路南侧的部队围攻元 日军，迫其投降。活动于惠东地区的部队相继于8日收复白芒花和稔山墟，控制平海盐场，10月10日攻占平山。活动于海陆丰地区的部队，于9月20日和26日，分别攻克海丰西南的马鬃港及以北的高潭等地。与此同时，琼崖纵队一度收复儋县、感恩县城，并攻克100多个大小据点。

二、收复热河、察哈尔两省全境

热、察两省北靠蒙古、南临河北，东接辽宁，西连晋、绥，是连接西北

和东北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历来重视热、察两省的抗日斗争。早在抗战初期，即指示晋察冀军区在察哈尔省南部之平绥铁路两侧地区及热河省西南部，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大反攻前期，又令晋察冀军区部队进军热、察，配合南下苏军作战。9月11日，中央军委根据战场形势和进军东北的需要，指示晋察冀军区大量消灭分散孤立的日伪军，控制热、察全境。晋察冀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决定在主力集中阻击向张家口进犯的国民党军的同时，大力歼灭拒绝投降缴械的日伪军，并置重点于平绥铁路东侧地区。在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下，冀察军区主力一部攻克宣化后，于9月19日攻克平绥铁路东段重镇新保安，歼灭伪军数百人。尔后，追歼逃敌，连克怀来、延庆及永宁等城镇，肃清了平绥铁路东段附近地区之敌。

蔚（县）广（灵）暖（泉）战役 为收复晋、察边境地区，进至蔚县东北西合营的冀中纵队第十二旅奉命停止北进，歼灭察南之敌。察南之蔚县、暖泉及晋东北的广灵县城均有坚固城墙，特别是蔚县城墙高12米，宽3米多，并有宽达7米、水深1米多的护城河，由伪保安队及大刀会等武装共2000多人坚守。第十二旅决心以第三十四团攻暖泉；以第三十五团及第三十六团一个营攻蔚县；以第三十六团主力攻广灵。各团均以奇袭手段，于9月29日拂晓前，突然分割包围了上述城镇。第三十四团于当日黄昏发起攻击，在巷战中歼灭暖泉伪军大部，余部在逃窜中被我全部歼灭。尔后，该团赴蔚县参战。第三十六团于30日攻占广灵四关，并加强攻城准备。10月6日，架梯登城受挫，遂改为坑道爆破。26日，将第三十四团调至广灵参战。当日22时，第三十六团在第三十四团配合下发起总攻，坑道爆破获得成功，我军迅即突入城内，经3小时巷战，全歼广灵守敌。在此期间，进攻蔚县之第三十五团，于10月1日发起攻击未果，后调来第三十四团，于6日再次发起攻击，又未奏效。但敌已动摇，我军一面进行政治争取，一面准备坑道爆破。同时，军区调来1个炮兵连支援攻城。11月2日，我军在西、南门爆破成功，并迅速突入城内，经5小时巷战，守敌除30余人逃跑外，余均被歼。这一战役，历时35天，计歼灭伪军3000多人。

与此同时，冀晋军区向察南开进的3个团，于10月1日攻克阳原县城，在阳高地区作战的第五军分区部队于12日攻克晋东北浑源县城，两战共歼灭伪军1300多人。至此，察哈尔省全境获得解放。

在肃清察哈尔省日伪军的同时，冀热辽军区向热河进军的西路第十三团于兴隆迫使伪满军3800多人投降，尔后进入承德，与苏军会师，挺进支队收复围场、隆化县城后，亦进至承德，与第十三团会合。中路第十一、第五十一团等部于8月17日出长城后，在平泉同苏军会师，迫使伪满军1个旅缴械，随即分兵占领了凌源、赤峰、朝阳地区，全部肃清了热河省境内的日伪军，为我军挺进东北创造了条件。

三、 进军东北

东北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与苏联、朝鲜、蒙古接壤，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东北沦陷14年之久，人民饱受日本侵略者践踏之苦，渴望早日解放。为配合苏军歼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东北人民，朱德总司令在8月11日即令晋绥、晋察冀、山东军区各以一部兵力立即进军东北。8月20日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向各中央局和各军区连续发出指示，要求派出组建100个团

所需要的干部及主力部队陆续进入东北。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冀热辽军区部队首先进入东北，其前梯队于兴城、锦西地区迫使伪满军 5800 多人投降。尔后，以一部兵力控制锦县，并解除辽宁省西部 15 个县的伪军武装，主力于 9 月 5 日进入沈阳，随即分兵前往辽阳、鞍山、营口、本溪、安东（今丹东）、抚顺、清原、梅河口、铁岭、开原、四平、郑家屯等地区迫使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与装备。在此期间，冀热辽军区直属队及第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团组成的第 2 梯队共 5000 多人，于 9 月 6 日进到山海关，尔后李运昌率第十五团及警卫营沿北宁铁路前进，14 日进抵沈阳，同前梯队会师，并积极配合苏军歼灭残敌。至 11 月底，冀热辽军区进军东北的部队控制了辽宁省全部、吉林省南部和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共迫使伪满军 3 个旅、两个团和 60 个县市的伪警察大队等约 4 万人，以及日本关东军残部 5000 人缴械投降。东北抗日联军在松花江下游地区主动配合苏军作战，参加了饶河、宝清、同江、富锦和汤原地区的战斗，并同时组成 50 多个工作组，分赴东、南、北满 50 余县积极开展工作，接管伪满地方政权，组织人民武装和建立人民政权，控制了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大部分地区。

山东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自 9 月至 11 月下旬，以主力 6 万多人分 3 批先后从陆路和海路向东北急进。在此期间，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新四军以第三师进军东北。同时，晋绥军区第三十二团，冀鲁豫军区第二十一团，冀中军区第三十一、第六十二、第七十一团，以及准备南下湘粤边的八路军游击第二、第三支队和延安炮兵学校、抗日军政大学和教导第二旅等部亦先后进入东北。

至 12 月上旬，到达东北各地的部队约 11 万人，另由延安、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和华中解放区派到东北的干部约 2 万人。上述部队进入东北地区后，在东北抗日联军和当地人民的支援下，收缴伪军武装，摧毁伪满各级地方政权，剿灭土匪特务，建立人民政权，从而奠定了东北解放区的基础。

本章小结

1945年8月9日至9月2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向日伪军发动了全面反攻，尔后又继续攻歼拒绝投降的日伪军。至年底，共歼灭日军1.37万多人、伪军38.5万余人，缴获步、马枪24.3万多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炮1300多门，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并一度攻入归绥、天津、保定、石门、芜湖等城市，切断平绥、北宁、同蒲、平汉、津浦、正太、德石、胶济、陇海、广九等铁路线，取得了全面反攻和歼灭拒绝投降之日伪军的重大胜利，为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区战场的全面反攻是在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我国东北，美军逼近日本本土和实施原子弹突击，日本帝国主义放弃抵抗但其侵华军队拒绝向我军投降，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又加紧以武力夺取人民抗日胜利果实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这一反攻行动也表现出一些特点。首先，由于国际因素，全面反攻的形势来得很快；其次，由于美、蒋、日、伪合流，被我解放区包围的日伪军拒绝向我军缴械投降，我解放区军民在日本签字投降后仍须歼灭拒降之敌。同时，还要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抗击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斗争形势异常复杂。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运筹帷幄，审时度势，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命令各解放区部队毫不迟疑地发起全面反攻，积极配合苏、美等同盟国军队作战。据此，各解放区武装部队立即行动，边开进，边动员，边补充，边作战。自8月9日开始全面反攻至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不足1个月时间，即收复了县以上城市150多座，歼灭数万日伪军，解放了大片国土；如果稍有迟疑，则难以取得这一重大胜利。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改变作战指导方针，是夺取反攻胜利的又一重要因素。当解放区军民排除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干扰，竭尽全力向日伪军控制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加紧进攻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向日伪军迅速勾结起来，阻止解放区军民的反攻作战，同时指令其军队纷纷向解放区进攻，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美国帮助国民党调兵遣将，并不准日军向解放区军队投降。日伪军不仅拒绝向我军缴械，还替国民党军队守卫大中城市与交通要道。在美、蒋、日、伪合流的形势下，如继续执行原定夺取大城市的作战方针，势必陷入日伪军及向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推进之国民党军的夹击之下，即使付出重大代价，亦难达到攻取并控制大城市的目的。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毅然放弃夺取大城市的方针，改取中小城市和控制广大乡村，使我军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不仅避免了因攻取大城市而过多消耗力量，而且得以争取时间，集中兵力，夺取更多的中小城镇，扩大并巩固解放区，进而为抗击国民党军进攻的自卫战争创造了条件。

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由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爱国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支援下，在苏、美等同盟国军队的配合下，彻底地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八年来，我军在敌后解放区战场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密切配合下，与敌军共作战 12.5 万余次，歼灭日军 52.7 万余人，歼灭伪军 118.6 万余人，缴获各种枪 69 万余支（挺）、各种炮 1800 余门，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解放国土近 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 1.2 亿，解放区遍布 19 个省区；我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 5 万余人发展到 120 余万人，民兵达 260 余万人。在对敌作战的同时，我军还和全国人民一道，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阻止了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逆流，挽救了抗战危局，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国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首先灭亡中国、进而吞并亚洲和称霸世界的狂妄企图，拯救了民族的危亡，并通过抗日战争进一步唤起人民的觉醒，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中国自身的独立解放，而且为世界进步人类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长达 14 年之久。中国人民为战胜日本法西斯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牺牲最大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 2000 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民党军的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约 1000 亿美元。中国的持久抗战，特别是敌后抗战，牵制和消耗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和海军及航空兵部分兵力，打乱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计划，迫使其不得不放弃“北进”侵略苏联的企图，使苏联在卫国战争中避免了两面作战的局面。即使在德国法西斯兵临莫斯科城下，苏联处境十分危急时，日本法西斯也未能实行“北进”，履行其同德国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正是由于中国抗战遏制了日本“北进”，苏联才得以从远东地区先后抽调 40 多个师 50 余万人的兵力用于西线对德国法西斯作战，从而转危为安直至最后打败德国法西斯。同样，中国的持久抗战，特别是敌后抗战，拖延了日本法西斯的“南进”时间，限制了它“南进”的范围，打破了它变中国占领区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的计划，陷其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使其南取澳洲、西取印度和在中东与德国法西斯会师的企图成了泡影。这对支援太平洋战场美、英盟军作战，加速太平洋战场反攻起了重要作用。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之所以能够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首先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并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全国性抗战，制定了全面全民族的即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以及各项正确的方针、政策。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便没有全国抗战；没有全国抗战，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作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和团结

的核心，便没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其次是由于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包括国民党内广大爱国人士和官兵，以及海外爱国侨胞，特别是广大工农兵的英勇牺牲、团结奋战。没有全民族的英勇奋斗也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是由于敌后解放区战场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正确的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抗击敌军主力，担负了抗击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的重担。第四是由于世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尤其是苏联最早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后期出兵我国东北，在我军的配合下击败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也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并在太平洋战场上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这对中国抗战也是有力的支援。特别是朝鲜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及白求恩、柯棣华参加的援华医疗队，都直接或间接地援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此，中国人民是永志不忘的。

抗日战争是中国在 20 世纪 30 ~ 40 年代之间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它具有与国内革命战争不同的特点。首先，抗日战争受当时世界三种势力和逐渐形成的两大阵线的影响颇大。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展开以后，它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密切相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抗战；而中国抗战的成败，又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着重要的影响。二者相互支援，相互策应，在战略上协同作战。因此中国必须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决定对日作战的方针、政策，并不断加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以协调战略上的相互配合。其次，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而且有时是相当尖锐的。特别是在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致使统一战线内发生了尖锐的斗争，出现了敌、顽、我三方面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我党我军经常处于敌顽夹击之中。这就要求我党我军必须正确地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才能打破这种夹击的局面，保存和发展自己，坚持持久抗战。第三，抗日战争是在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上进行的。这两个战场对于争取抗战胜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两个战场执行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因而，产生的结果及各自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在战略防御阶段，敌军重视国民党，集中力量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实行战略进攻，加之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比较积极，其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因而正面战场抗击着日军的主力，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但由于国民党当局推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实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呆板的阵地战，致使正面战场连续失利，处于极端被动不利的地位，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而敌后战场的我军，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全面全民族的即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执行持久战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以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作战原则，因而，迅速在华北、华中站稳了脚跟，创建了许多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对敌人构成了致命威胁。所以，敌在占领武汉后即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移其主要兵力进攻我敌后解放区战场。从此，敌后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日的主战场。解放区战场军民挑起了抗日的重担，成为抗战的主力军。第四，抗日战争是在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的条件下进行的。敌强我弱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我国必须采取持久战的方针，并在持久抗战过程中转变敌强我弱形势，以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敌小我大，

决定了敌经不起长期战争，必然凭借其暂时的优势，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妄图达到其灭亡我国的目的。然而，其人力、物力和财力先天不足，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必然遭到国内外人民的反对，失道寡助，这就注定了它必败的命运。而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持久抗战的人力物力，加之战争的正义性，得道多助，所以抗战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国的。正是这些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敌我双方战争指导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第五，抗日战争呈现出“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这种特殊的战争形态表现为内线与外线、正面与敌后、有后方与无后方、有固定作战线与无固定作战线、包围与反包围等相互交错，以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斗争形式的交互运用。毛泽东曾指出：“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第六，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主要地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中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担负着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它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遍及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四大敌后战场；它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贯穿战争的全过程；它不是永远停留在游击战状态，而是随着战争进程逐步向正规战发展，使之成为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我党我军正是认识和掌握了上述基本特点，并根据这些基本特点，确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各项政策和作战指导原则，从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抗日战争是一个大而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同一个小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最后，大而弱的中国打败了小而强的日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是弱国打败强国的范例之一。特别是我军通过持久的人民战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打破敌顽夹击，战胜严重困难，最后成为战胜敌人、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这又是弱小军队转弱为强，最后战胜强敌的范例之一。这里仅将其基本经验概述于下。

一、实行全民族抗战，必须建立 与巩固民族统一战线

强敌入侵，必须实行全民族的抗战。实行全民族的抗战，必须建立与巩固各阶级、各政党、各阶层、各行各业以及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组成浩浩荡荡的民族解放大军，方能战胜入侵的强敌。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必须根据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的新形势，以及新形势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及时地实行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转变，积极倡导与组织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成为团结与领导全民族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核心。

由于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政党、阶层和社会集团为了抗击民族敌人的侵略而组成的同盟，因而在统一战线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63页。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96页。

这就要求参加统一战线的一切阶级、政党、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必须把民族利益摆在首位，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以利战胜共同的民族敌人。但是，由于各阶级的本性、利益和要求不同，因而其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就不同。以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进步势力，主张坚决抗击入侵之敌，并要求政治民主和生活的改善；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为主体的中间势力，也主张抗战和政治改革，但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顽固派的斗争，则表现软弱；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的顽固势力，则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动摇、妥协和不彻底性，并仇恨、惧怕和力图限制共产党和人民民主力量的发展。这样，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必须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的政策。在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则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和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坚持有理即自卫的原则，以保持斗争的防御性；坚持有利即胜利的原则，不反则已，反则必胜，集中力量打击最反动的顽固派，避免四面出击，以保持斗争的局部性，坚持有节即休战原则，反到一定程度适可而止，决不能无休止的反下去，以保持斗争的暂时性。实践证明，这是反顽斗争必须遵循的正确原则。

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况下，统一战线中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必须贯彻既联合、又斗争，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不能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只讲统一，不讲独立自主；而是要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并通过斗争达到联合的目的。要警惕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顽固派借“统一”之名，行消灭和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之实。并且要在统一战线中发挥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作用，以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战中的妥协、动摇和不彻底性，争取其与全民族共同抗战到底。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适时地为全国抗战提出正确的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是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因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建立与巩固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还必须不断克服内部出现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在统一战线建立之前，主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充分认识在强敌入侵的情况下，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一致性，坚持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在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主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认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顽固势力的反动本质，保持阶级的警惕性，以免遭其暗算，使自身受到损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正是纠正了内部曾经出现过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才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巩固。

二、夺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 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

打败入侵的强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亦即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所指出的：“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兵民是胜利之本”

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33页。

。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首先必须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要把战争的政治目的以及达到政治目的的方针、路线、政策告诉广大军民，以激发广大军民的爱国热忱，发挥全民族抗战的自觉能动性，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以弥补武器装备落后等缺陷。并且要随着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加深政治动员，使战争的动员工作经常化，以保持士气的旺盛和持久。同时，还要有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借以统一全民族的意志和行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战开始时所制订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动员全国军民实行人民战争的政治纲领。它在敌后战场的贯彻执行，对于开辟敌后战场，坚持敌后抗战，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人民战争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动员广大军民积极参加抗战，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把抗战与人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本着合理负担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过程中，制订了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以及财政、税收、生产、劳动和教育等等政策。这些政策在敌后解放区的贯彻执行，既给广大劳动人民以看得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同时，也照顾到统一战线内工商业者和开明士绅的利益，并且实行精兵简政，发展军民生产，努力减轻人民负担，从而调动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积极性，形成了真正的全民抗战的局面。正如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中指出的：“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

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必须在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军民总动员的基础上，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以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在抗日战争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并且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把武装的与非武装的，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公开的和隐蔽的，“合法的”与“非法的”等各种斗争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行全面的对敌斗争，因而发挥了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打破了敌人推行的所谓“总力战”。

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还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抗日战争中坚持这种体制，对建军、作战、开展群众工作以及巩固和发展敌后根据地都是十分有利的。首先，有利于主力军的发展。在主力军的带领下，地方军经过战争的锻炼，军政素质和战斗力逐步提高，并逐步上升为主力军；而广大的民兵游击队则成为地方军和主力军雄厚的后备力量。其次，有利于发挥各自的长处，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主力军主要执行外线的和在有利条件下以运动战形式歼灭敌人较大兵力的作战任务；而地方军和广大民兵游击队，则主要执行内线的，村不离村、乡不离乡、县不离县就地坚持斗争的任务，以分散的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与敌周旋，配合主力军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蚕食”和封锁，直接保卫家乡、保卫生产。第三、有利于适应斗争形势，灵活地改变组织形式，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在斗争形势极为严重时，主力军可实行地方化和群众化，加强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以便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当形势有利于根据地发展时，则地方军又可转化为主力军，执行扩大根据地的任务；当需要实行“敌进我进”，把斗争焦点引向敌占区时，则可由主力军、地方军结合游击队和民兵，组织大量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政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8页。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攻势，建立游击根据地。实践证明，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进行人民战争有效的体制。

在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主张并实行的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另一条是国民党主张并实行的单纯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由于坚持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以仅有 5 万余人之兵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敌后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日军，在全国十几个省区创建了 19 个抗日根据地，并使人民武装力量获得了大发展。而国民党则因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束缚军民的抗战积极性，所以尽管它掌握着全国政权和经济命脉，并拥有 200 多万军队，但不能发挥其作用。历史事实证明，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是弱国打败入侵强国唯一正确的战争指导路线。

三、战胜入侵的强敌，必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

在敌强我弱、敌之战争非正义性和我之战争正义性、敌失道寡助和我得道多助的条件下，我在战略上必须实行持久战的方针。通过战略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的长过程，达到打败敌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然而，为了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还必须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具体方针。第一，要采取正确的作战形式，在战略防御阶段，主要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在战略相持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在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是运动战，但阵地战提到了重要地位。第二，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应采取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战略反攻阶段，则应是战略的攻势作战。第三，在战略防御与战略相持阶段，力求避免赌国家之命运的战略决战，但决不放弃战役和战斗的有利决战。并且要以战役战斗的歼灭战，达到战略上的消耗战的目的。第四，要注重保持作战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作用，变战略上的被动为战役战斗上的主动，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逐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并通过持久战的长过程，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为最后战胜敌人创造条件。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战略的持久战以及为了实行持久战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方针，是弱国战胜入侵强国行之有效的战略指导方针。

四、坚持敌后抗战，必须实行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

争取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要靠正规战，但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因而，敌后的游击战争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在战略防御阶段，游击战争担负着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根据地、牵制与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战略任务。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争担负着坚持敌后抗战，发展与巩固根据地，消耗与削弱敌人，支援正面战场作战，并积蓄力量，逐步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和准备反攻的战略任务。在战略反攻阶段，游击战争则转变为正规战，展开大规模反攻，收复失地。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与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在战

略上对敌人构成夹击态势，陷敌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抗日战争实践证明，敌后游击战争是敌强我弱条件下，保存与发展自己，消耗与削弱敌人，配合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争，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有效的作战形式。游击战争最能发挥广大群众抗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最适合于采取广泛的、分散的、群众性的麻雀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战术手段，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以小的代价获取较大的胜利，并积小胜为大胜，逐步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为最后战胜敌人创造条件。所以，游击战争又是战略上以少胜多，以弱制强，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的有效的作战形式。在抗日战争中，我军正是由于坚决地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方针，因而取得了敌后抗战的伟大胜利。

然而，实行上述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特别是以正规军分散进行游击战争，就需要有一个军事战略的转变，即由过去的正规军转变为分散作战的游击军，由过去的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这一转变是一个表现为倒退的较为困难的转变。然而，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军实行这一转变时，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引导，正确地解决了集中兵力作战与分兵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以及运动战与游击战的主次关系，纠正了一些人轻视游击战、主张以大兵团运动战为主的错误思想，使我军较为顺利地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战争的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实现这一转变具有重大意义。正如毛泽东说的：“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随着战争的发展，当战局发生对我有利的变化时，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七大”会议上，适时地提出了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较大兵力对敌进行较为正规作战的转变，为全面反攻做准备。这又使我军在全面反攻形势迅速到来时，能很快进行全面反攻，并取得重大胜利。实践证明，当战争的对象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应及时地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制定和实行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这是战略指导上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指导游击战争除必须掌握游击战争的主动性、进攻性、分散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这些一般特点外，还必须着眼于敌之特点和战争的发展，贯彻敌变我变的指导原则。在敌实行战略进攻、沿交通线长驱直入时，我军的游击战争主要在敌之翼侧和后方，以伏击和袭击战的形式，歼灭运动之敌，切断敌之后方补给线，配合正面防御作战。当敌为解除后顾之忧、对我初创的敌后根据地实行多路围攻时，我军的游击战则转为内外线结合，以内线歼敌为主，即以一部兵力于内线消耗、疲惫、牵制敌人，为主力机动和歼敌创造条件；主力则转移到围攻之敌的侧后隐蔽待机，尔后抓住其孤立突出、疲惫沮丧的一路，予以歼灭或歼灭性打击，再转移兵力击破其他各路，以粉碎敌之围攻。当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由战略进攻转为以保守其占领区为主，并企图变“点线”占领为“面”的占领，对我根据地由过去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围攻，变为逐步推进、压缩包围圈、然后分割清剿的“扫荡”时，我军的游击战争，则由以内线歼敌为主，转为以外线歼敌为主，即在敌分进合击逐步推进时，主力适时转入外线对“扫荡”之敌的后方交通线及据点展开积极的广泛的攻势，迫使进入我根据地之敌回援，从而粉碎敌之“扫荡”。当敌人利用点线对我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实行“囚笼”政策时，我则主动对敌

占交通线发动不同规模的交通破袭战，以打破敌之分割封锁和变“点线”占领为“面”的占领的企图。在战略相持阶段中期，敌为巩固其占领区，使之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则由过去的逐步推进，压缩包围圈，然后进行分区清剿，变为“铁壁合围”、“辗转抉剔”，“拉网式扫荡”，其使用兵力之大，“扫荡”时间之长和残酷程度都是空前的，并配合以“蚕食”、“治安强化运动”。这时，我军的对策是：在敌人展开进行合围时，采取“化整为零”，以分散对敌之集中，避敌锐势，保存力量；在敌分兵进行“辗转抉剔”时，则“化零为整”，以集中对敌之分散，给敌以有力打击，挫败其“扫荡”。尤其重要的是，从1942年起，我军正确地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并派出大量的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把斗争焦点引向敌占区，变敌之后方为前线，变我之被动为主动，从而更有效地打破了敌之“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扭转了根据地的退缩局面。这是敌后游击战争的一个重大发展。在战略相持阶段后期，当敌人取守势时，我军的游击战争则转为主动地、有计划地对敌展开攻势作战，广泛采取围困战的形式，迫敌撤退，并在其撤退中歼灭之；同时集中较大兵力，对边沿区敌之城镇据点展开攻击，以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总之，敌后游击战争要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敌之作战特点、规律，适时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不要墨守成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敌后游击战争脱离国家的总后方，加之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因此，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就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根据地的选择，要考虑地理、经济、政治等条件。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主要是选择地形复杂、便于隐蔽和回旋的山区，其次是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有良好群众基础的平原和河湖港汊地区。总之，一切有敌人和有群众的地方，均可建立根据地，关键是要反对流寇主义思想，树立牢固的根据地观念。建立根据地，首要的问题是要有一支武装部队；其次是以这支武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去战胜敌人；第三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在内，去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民主政权，组织群众武装，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有在建立了抗战武装、战胜了敌人、发动了群众这三个基本条件具备之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才算真正的建立起来。在敌人战略后方建立根据地固属困难，而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则更为困难。但要坚持敌后抗战，不仅需要巩固根据地，而且需要发展根据地，否则游击战争既不能坚持，更不能发展。这就要求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既不能只求发展而不求巩固，又不能只求巩固，不求发展。只发展不巩固，则经不起敌人进攻，结果不仅丧失了发展，而且危及原有根据地的存在，而当形势有利时仍不求发展，则不仅不能壮大抗战力量，而且根据地也难于巩固。正确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效办法。当然，巩固与发展应根据形势有所侧重，一个时期可以侧重于发展，一个时期可以侧重于巩固。巩固根据地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加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使根据地成为坚持游击战争的可靠基地。

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还必须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由于敌后各根据地均处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状态，而且斗争环境复杂，情况多变，需要迅速作出反应和决策。因此，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应根据上级总的

战略意图和方针、政策以及当地斗争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定下决心和决定政策。如果事事都等报请上级决断后行动，势必贻误战机和影响工作时效。而上级指挥机关也应给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以独立自主临机处置之权。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时曾指出：既反对绝对的集中，又反对绝对的分散，正确的原则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由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很难得到国家总后方的物资供应，加之敌人的分割、包围和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因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部队，必须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组织军民发展生产，厉行节约，以及秘密地同敌占区工商业者进行有利于我的贸易等等，以解决军需民用。抗日战争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响应毛泽东关于“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从而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战胜了严重困难，坚持了敌后抗战，这是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结果。

八年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充分说明，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胜利，是全面抗战即人民战争的路线的胜利，是全国实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胜利，是我军坚决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战略方针的胜利。总之，一句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我军愈战愈强，在战胜入侵强敌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完成了光荣而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光辉史篇。

